

2021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 北方民族考古

#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 12 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经费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 第12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办的集刊，迄今已出版11辑。本辑内容包括考古新发现、研究与探索、北域撷英、碑铭考释四个栏目，收录论文25篇，以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探索为重心，也包括一些重要境外考古发现的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在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方面的前沿动向和重要成果。

本书适合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者及高等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考古．第12辑 /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12

ISBN 978-7-03-071164-9

Ⅰ．①北…　Ⅱ．①中…　②中…　Ⅲ．①古代民族－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Ⅳ．① 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68260号

责任编辑：王琳玮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 //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21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22年 6 月第二次印刷　印张：22 1/2
字数：534 000

**定价：2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北方民族考古》编辑委员会

# 目　　录

## 考古新发现



## 研究与探索



## 北域撷英

**碑铭考释**

#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发现的一座唐代突厥墓葬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博物院

**摘要：**2006年5月，为配合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翔宇新城的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和林格尔土城子东南，209国道以东地区发现一座殉马墓。墓葬为竖穴土坑偏洞室，葬有一人一马，出土陶、铜、铁质随葬品7件套。该墓的形制、葬式和出土随葬品具有典型的突厥风格，年代为7世纪中后叶。墓主人应为唐代羁縻于漠南的突厥部族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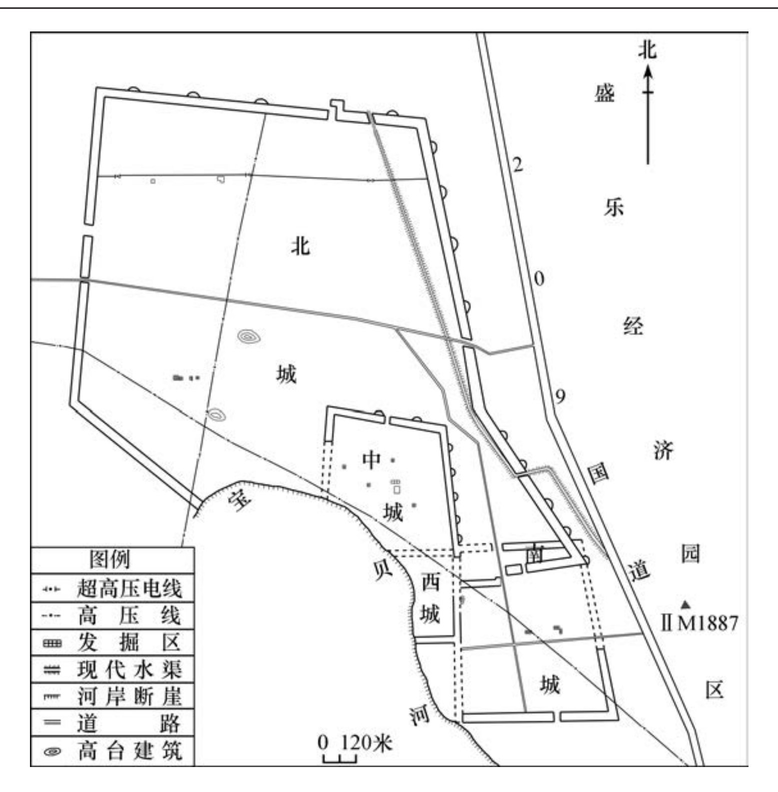
**关键词：**和林格尔土城子　突厥　殉马葬

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北1千米的宝贝河（古“金河”）北岸，南距和林格尔县城10千米，北距呼和浩特市区40千米。城址坐落于土默川平原东南部，东傍蛮汉山，北望阴山，西濒黄河，南扼杀虎口古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2006年5月，为配合和林格尔县盛乐翔宇新城的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土城子遗址东南、209国道以东发现一座唐代突厥殉马墓，编号ⅡM1887（图一）。兹将该墓葬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 一、墓葬形制

该墓葬为竖穴土坑偏洞室墓，由于早期洞室顶部向下塌陷，清理时将顶部揭掉。墓道为竖穴土坑，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长250、宽110、深170厘米。在距墓口104厘米处殉葬一马，头向北。马头部正立，吻部向下，屈腿右侧卧，骨骼保存较好。发现铁马衔、铁马镫及铜饰件，马左前腿部还有一件铁刀。




图一　和林格尔土城子ⅡM1887位置示意图

墓道底部西侧为偏洞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50、宽70厘米，洞高已不清楚。人骨保存较好，仰身略屈肢。头向北，方向5°。经鉴定，墓主人为女性，20～25岁。随葬有陶壶、铜罐、铁镞各1件。铜罐置于陶壶上，铁镞置于头骨下（图二）。

## 二、随葬器物

该墓出土器物7件，质地有陶、铜、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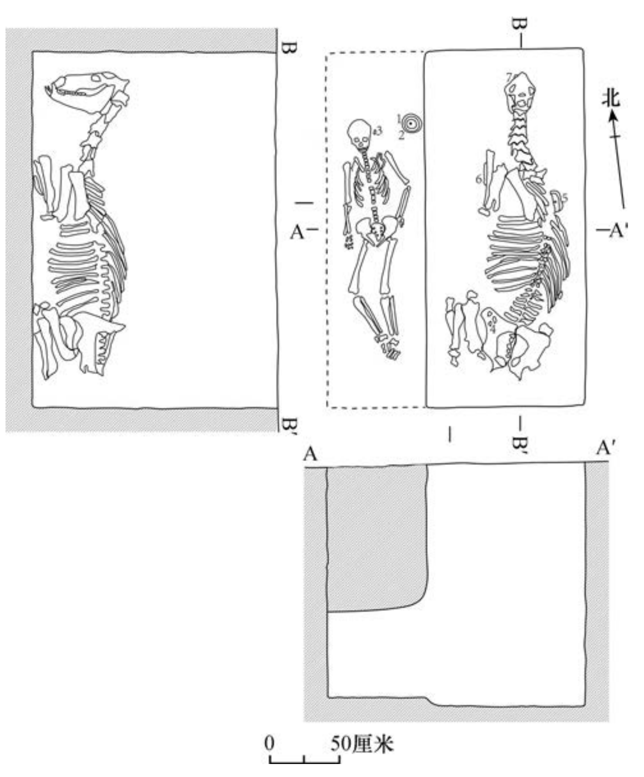
陶壶　1件。ⅡM1887∶1，泥质灰陶。小盘口外撇，束颈，溜肩，微鼓腹，小平底。肩、腹饰重菱格纹。口径7.7、腹径12、底径7.5、高21.7厘米（图三，3）。

铜罐　1件。ⅡM1887∶2，侈沿，束颈，溜肩，鼓腹，平底。素面。一侧腹部有圆环状单耳，上有宝相花形指垫。口径5.8、腹径7.8、底径5.4、高7厘米（图三，1；图四）。

铜饰件　1件。ⅡM1887∶4，平面近箕形，一面素面，一面有郭棱，内有三铆钉。长2.8、宽2.4厘米（图三，6）。

铁镞　1件。ⅡM1887∶3，截面略呈三角形，锈蚀严重。前锋较钝，尖残，两侧略有边锋，尾部残存箭梃。残长6.3厘米（图三，7）。

铁马镫　1件。ⅡM1887∶5，镫穿呈长方形，中有长方形穿孔；镫柄呈圆柱形，




图二 ⅡM1887墓葬平、剖面图

1. 陶壶 2. 铜罐 3. 铁镞 4. 铜饰件 5. 铁马镫 6. 铁刀 7. 铁马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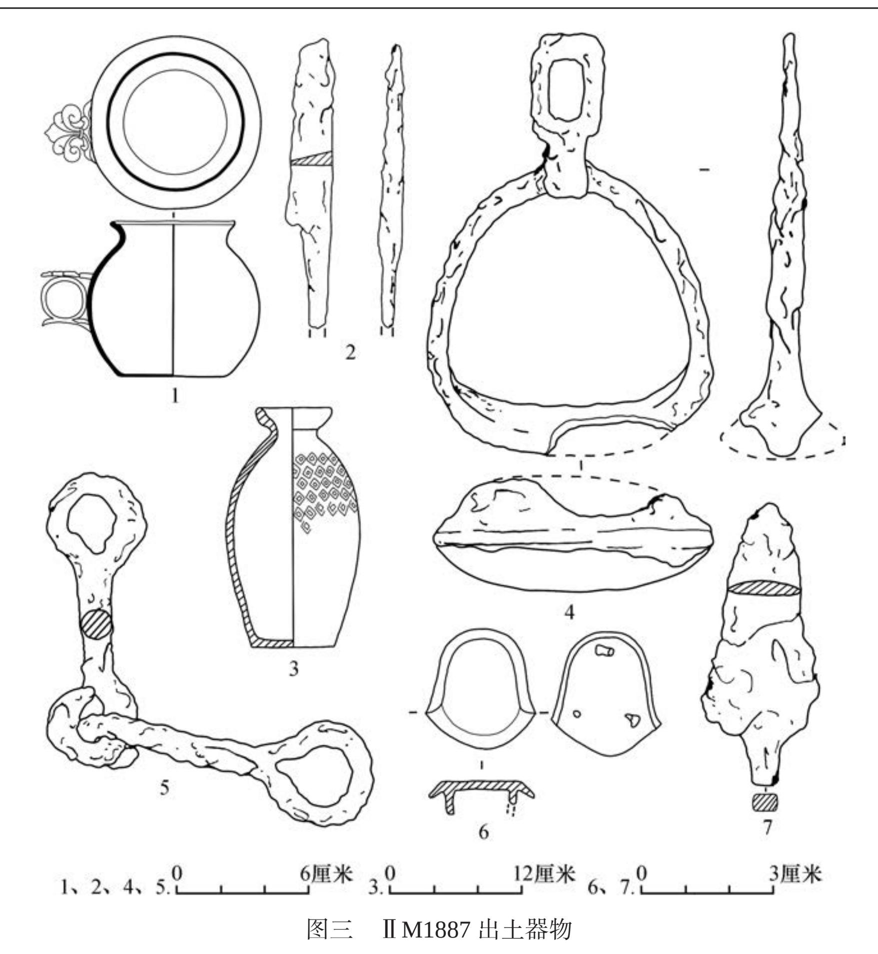
较短；镫环近似马蹄形，踏板较宽，残缺。通高19、镫穿高5、宽3.2厘米（图三，4）。

铁刀 1件。ⅡM1887∶6，残。长柄，刀背较平直，刃部有凹缺。残长13厘米（图三，2）。

铁马衔 1件。ⅡM1887∶7，为两节衔，衔外端为圆环，里端呈钩环相套连接。一节长13厘米（图三，5）。

## 三、相关认识

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古代城址之一。1997～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单位对古城周边古代墓葬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清理春秋晚期至辽金元不同时代墓葬2755座。但像ⅡM1887这类殉马葬在土城子遗址周边所发现各类墓葬中较为少见，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也为数不多。该墓与蒙古国腹地、阿尔泰山周边及东哈萨克斯坦地区发现的大量突厥时期殉马墓非常相似。一般为偏洞室墓，洞室内葬一人，竖穴墓道底部陪葬一马，个别墓葬的偏洞室墓口用石块封堵，墓葬顶部有圆形石封堆。出土随葬品




图三　Ⅱ M1887 出土器物

1. 铜罐（Ⅱ M1887：2） 2. 铁刀（Ⅱ M1887：6） 3. 陶壶（Ⅱ M1887：1） 4. 铁马镫（Ⅱ M1887：5）
5. 铁马衔（Ⅱ M1887：7） 6. 铜饰件（Ⅱ M1887：4） 7. 铁镞（Ⅱ M1887：3）

包括杯、罐等日常器用，弓箭、矛槊等武器以及马衔、马镫、马鞍等马具装备等[①]。

土城子Ⅱ M1887 在文化内涵上与蒙古国漠北地区发现的桑特苏木墓葬[②]( 图五 )、宝拉格陶勒盖葬马坑等相似[③]。通过比较中国北方地区和蒙古国已发掘材料，对该墓葬的具体年代、历史背景等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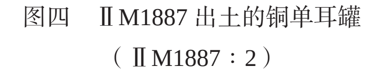
---

① 尼古拉·斯热金著，权乾坤译：《蒙古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葬俗》,《北方民族考古》( 第 6 辑 )，科学出版社，2018 年，194 ~ 210 页。

② Өлзийбаяр С. Өгөөмөрийн уйгур булш. Түүхий Судлал. Tomus ⅩⅩⅩⅤⅦ, Fasc1-17,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26-33.

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布尔干省布雷杭盖苏木宝拉格陶勒盖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民族考古》( 第 6 辑 )，科学出版社，2018 年，55 ~ 69 页。





图四 ⅡM1887 出土的铜单耳罐（ⅡM1887：2）



图五 蒙古国色楞格省桑特苏木墓葬

## （一）具体年代

ⅡM1887 出土的铜单耳罐、铁马镫、陶壶等器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此类铜罐也称“突厥罐”，与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壁画墓出土的金罐①、仆固乙突墓园内出土的银罐②形制非常相近，均为素面、平底，后者肩颈部出现折棱。这样的单耳罐还见于后突厥汗国时期的毗伽可汗祭祀陵园，分别出土金、银罐各 1 件③，但是形制上有了新的变化，开始出现圈足，且颈部变长，肩部折棱明显。巴彦诺尔壁画墓的下葬年代约在麟德年间前后（664～665 年）。仆固乙突的下葬年代为仪凤三年（678 年），银罐为墓葬封土东侧的祭祀遗留，年代或稍偏晚。毗伽可汗下葬年代为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通过该类型器物的演变规律（图六），推测ⅡM1887 所出的铜单耳素面罐的流行年代应介于巴彦诺尔壁画墓和仆固乙突墓二者之间，且与前者更为接近。

铁马镫的形制与巴彦诺尔壁画墓、郑仁泰墓④出土马镫较为相似，为唐代早期形制。陶壶的器形也不多见，其上的重菱格纹在蒙古国境内的突厥时期陶器上较为流行，如詹和硕遗址ⅠM2⑤、毗伽可汗祭祀陵园等，最晚流行至 8 世纪初期，即后突厥汗国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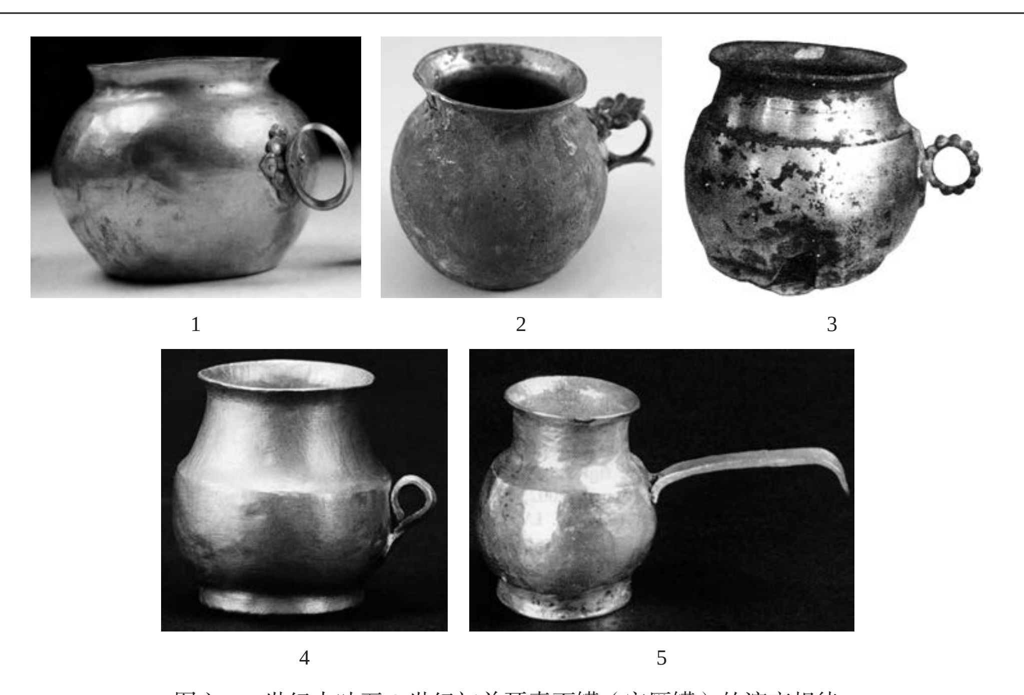
① 阿·敖其尔、勒·额尔敦宝力道著，萨仁毕力格译：《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的发掘》，《草原文物》2014 年 1 期，15～23 页。

② Очир А., Данилов В. С., Эрдэнэболд Л, Цэрэндорж Ц.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Б., 2013.

③ Bayar D. Rec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Bilge-Kagan′s Site.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4 (20): 73-84.

④ 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 7 期，33～41 页。

⑤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布尔干省达欣其楞苏木詹和硕遗址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5 年 2 期，8～31 页。



图六　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单耳素面罐（突厥罐）的演变规律

1. 蒙古国巴彦诺尔壁画墓出土　2. ⅡM1887出土　3. 仆固乙突墓园内出土

4、5. 毗伽可汗祭祀陵园出土（其中1、4为金质，2为铜质，3、5为银质）

期。进入回纥时期，陶器上重菱格纹较为少见，器形和纹饰均发生了明显变化。综合来看，ⅡM1887的年代应主要集中于7世纪六七十年代。

## （二）历史背景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派李靖讨伐东突厥颉利可汗，将其俘至长安，这标志着东突厥政权的灭亡。颉利余众或走西域，或北投薛延陀，同时也有近十万人归附唐朝。唐朝依照两汉时期对待匈奴降附者的旧例，按照突厥的土俗和部落组织，将其安置于漠南塞下。析颉利部为两个都督府，左部为定襄，右部为云中。龙朔三年（663年）置云中都护府，麟德元年（664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统辖突厥诸部府州，属关内道，辖地在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①]。调露元年（679年）冬十月，漠南归属单于大都护管辖的阿史德傅温、奉职二部反唐。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后裔阿史那骨咄禄重建突厥政权，史称“后突厥”汗国，至此突厥部众又大部叛归漠北。唐朝对漠南突厥部族的羁縻政策最为有效的时期就集中在这半个世纪，和林格尔土城子时为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处理民族事务的中心。其间，突厥人在这一带虽有小规模叛乱，但总体上生活较为安定，部众孳盛。

① 《新唐书》卷37《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年，976页。

ⅡM1887 就是在单于大都护府建立前后的一段较为稳定的时期内形成的遗存，这座墓葬非常完整地保留了突厥民族本身的文化特征，这在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周边发现的 350 座唐代墓葬中算是少有的个案，但确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缩影。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突厥部众在这里生居死葬，但是该地区发现的典型突厥文化墓葬并不多见，一方面说明突厥人有可能仍保留有“焚尸”的火葬传统①，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中一部分突厥部众或许融入中原文化之中，这都需要在今后的考古过程中进行仔细甄别。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及周边墓葬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5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蒙古国杭爱山东段北麓古代游牧民族遗存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1BKG031）。

发掘领队为陈永志，参加发掘和资料整理的工作人员有李强、朱家龙、萨仁毕力格、程鹏飞、郑淑敏、乔金贵等。线图由郝晓菲、程鹏飞绘制，照片由朱家龙拍摄。

执笔者：程鹏飞　郑淑敏　李　强　李永洁　陈永志

## A Turkic Tomb of the Tang Dynasty Found at Tuchengzi Site in Helinge’er County, 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northern ethnic archae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Museum

**Abstract:** In May 2006,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Xiangyu New Town Project, Shengle Economic Area, Helinge’er County, a martyred horse tomb was excav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Tuchengzi site, It is in east of national highway 209. The burial is a vertical pit with a side grotto, with one person and one horse. Seven sets of burial articles such as pottery, copper and iron were unearthed. The shape, burial style and unearthed articles of the tomb have typical Turkic style, which were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of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omb owner should be a member of the Turkic tribe in the south of the desert in Tang Dynasty.
**Keywords:** Helinge’er Tuchengzi site; Turks; Horse burial

① 《隋书》卷 84《北狄・突厥》，中华书局，1973 年，1864 页。

# 湖北鄂州机场梅家塆墓群发掘简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2019 年 9～12 月，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对湖北鄂州机场梅家塆墓群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共清理砖室墓 6 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1 座。其中凸字形砖室墓 2 座、长方形砖室墓 4 座。年代为六朝至隋唐时期，共出土瓷器、陶器 14 件。本次文物保护发掘点有 20 余处，主要为六朝至隋唐时期的砖室墓与部分遗址。梅家塆墓群作为其中一个较为主要的发掘区，对丰富该区考古材料、研究该地墓葬文化有重要意义。同时对进一步推进吴王城的研究也有极大的帮助。

**关键词：**梅家塆　墓群　六朝至隋唐

梅家塆墓群位于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燕矶镇坝角村东南部，长江南岸，朱家嘴西北部。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北纬 30°21′17″，东经 115°2′36″，海拔 73.2 米。该区域大致呈弧形阶梯状台地，地势东高西低，地表主要为房屋基址、耕地以及红砂岩地，厚 60～260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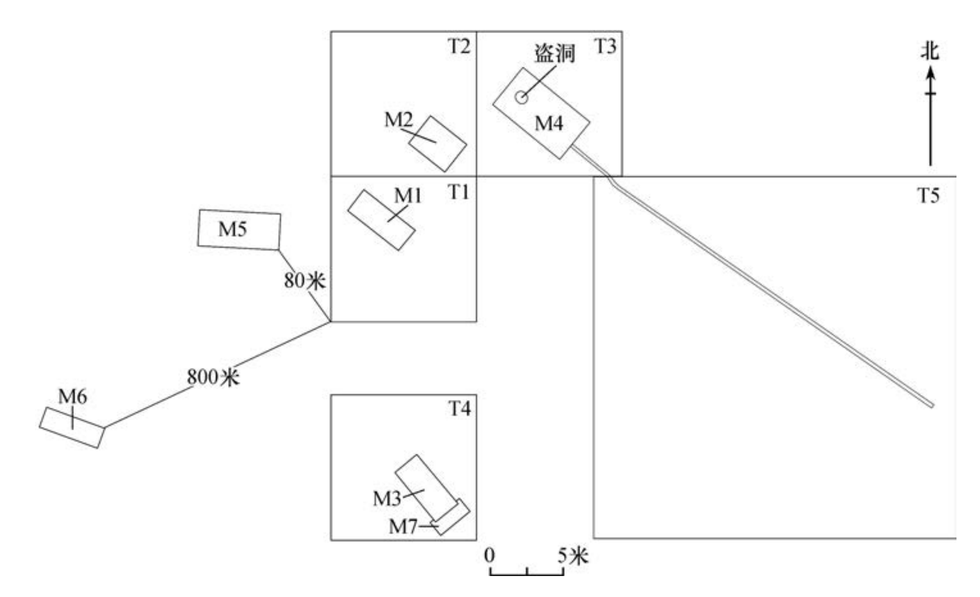
规划建设的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工程，选址位于鄂州市城区东部，长江南岸，地跨鄂城区的燕矶、杨叶、沙窝、花湖四个乡镇。工程占地总面积 75 平方千米，机场建设核心区面积约 11.84 平方千米，预计建成后旅客年吞吐量 15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 266.5 万吨。

文物保护工作是该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2019 年 9 月，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鄂州机场梅家塆墓群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实际发掘面积 400 平方米。

梅家塆墓群位于山坡台地，表土层包含物较多，且较厚，对前期的勘探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于机场建设工作，施工单位对预定发掘区及其周围环境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系列的发掘工作。布方前发掘区表土及台地边缘已经遭到破坏，发掘区第 1、2 层土均被红砂岩不同程度打破，部分红砂岩甚至打破了砖室墓的墓圹及墓道，使得墓葬的完整程度遭到破坏。

该区墓葬的保存状况一般，出土文物较少。此次发掘共清理砖室墓 6 座，包括凸字形砖室墓 2 座和长方形砖室墓 4 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1 座。其中有一座砖

室墓清理出较完整排水设施，残长36米。出土随葬器物14件，均为瓷器和陶器（图一）。




图一　梅家塆墓群遗迹平面图

## 一、墓葬概况

现将具体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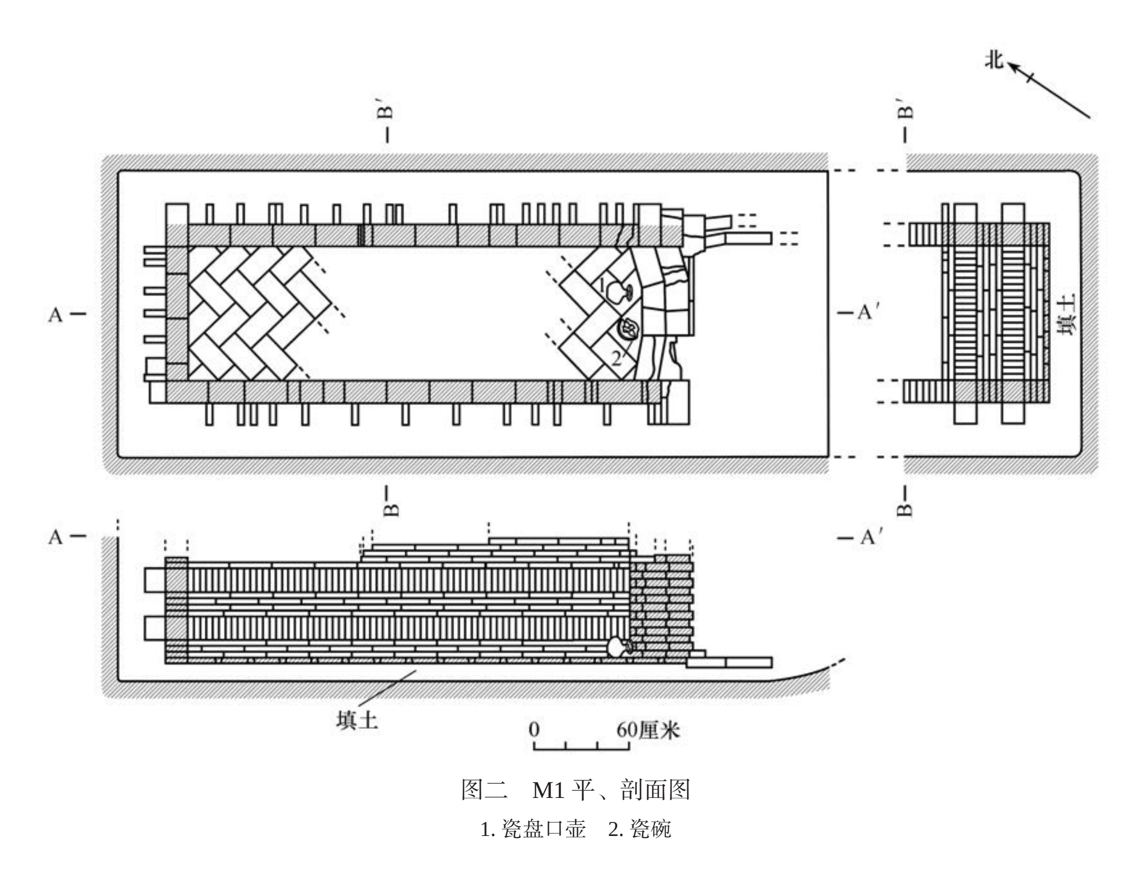
### （一）砖　室　墓

共6座，分别为M1～M6。M1、M2、M4位于墓群中部，并列分布。M3位于中部地区南侧，M5位于中部地区西侧，M6位于中部地区西南侧，其中M3打破土坑竖穴墓M7。

**1. M1**

M1为近长方形砖室墓，墓圹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方向145°，长4.5、宽1.8、深0.9米。封门墙向外倾斜，残存13层。封门砖长29、宽15、高5厘米，平面饰3组菱格绳纹，侧面饰凸弦纹。墓壁由下至上为一组三顺一丁和一组四顺一丁，北壁丁砖上残存2层，东壁丁砖上残存5层，西壁丁砖上残存6层，后壁与侧壁丁砖伸入土圹中作“咬土砖”，上平砖错缝顺砌，后起券。地砖呈人字形平铺墓室，无纹饰，在墓葬南部，铺地砖塌陷断裂。壁砖与地砖长27、宽14、高4厘米。壁砖有2组菱格绳纹，墓葬有明显墓圹，墓道被红砂岩土扰乱。在墓道东北部封门墙处发现排水沟，平铺顺砌垫底，

中层以两块条砖相间顺砌，形成沟槽，上层平铺作沟盖。条形砖长 29、宽 7、高 6 厘米。在墓室东南部、近封门墙处出土 2 件青瓷器。一件为盘口壶，表面施釉，烧结，口沿破损；另一件器物破损严重，推测为碗（图二）。




图二　M1 平、剖面图

1. 瓷盘口壶　2. 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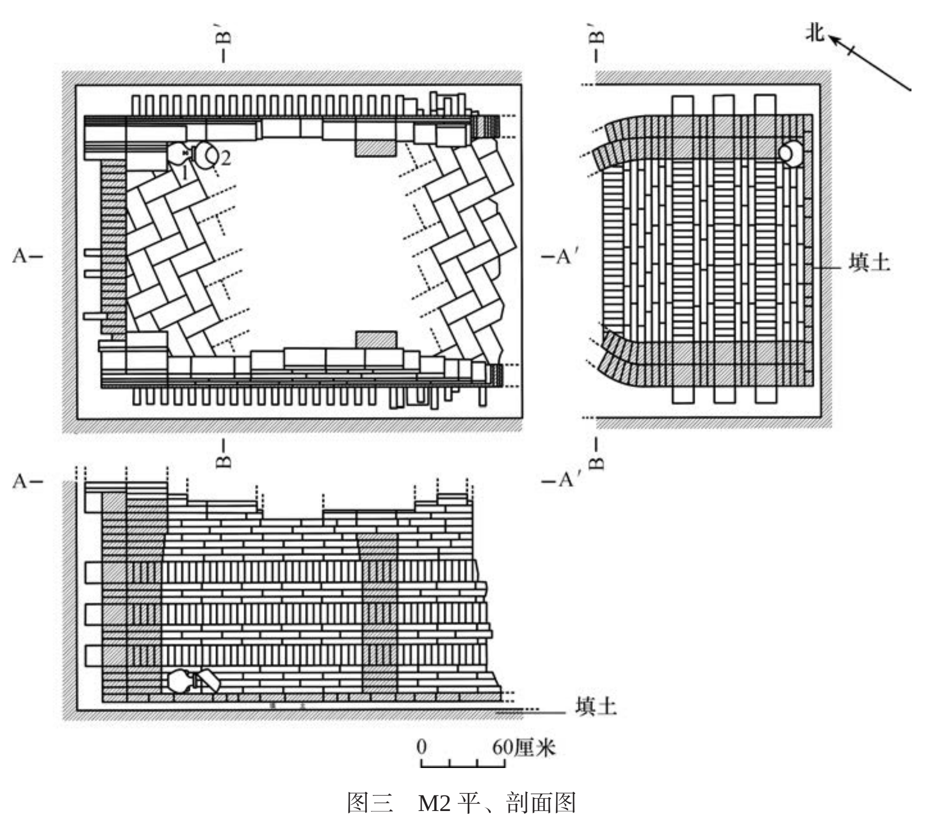
瓷盘口壶　1 件。M1∶1，盘口较浅，短颈，鼓腹，平底。盘口、肩部和上腹部各有一道凹弦纹，肩部有扁宽的双竖系，系长 3.4、宽 0.8～1.4 厘米，为银锭状。釉色黄绿，胎釉结合较好，部分剥落，有流釉现象。部分口沿处有烧结现象。盘口厚 0.3、器壁厚 1、口径 10.2、腹径 16、底径 9.5、器深 15.5、通高 16.7 厘米（图九，1）。

瓷碗　1 件。M1∶2，侈口，圆唇，斜腹，假圈足。外口沿下有一道较宽、较深的凹弦纹。釉层较薄，釉色黄绿，多半剥落。口径 17.6、底径 11.2、壁厚 0.5、器深 5、通高 5.5 厘米（图九，5）。

**2. M2**

M2 为近长方形砖室墓，墓圹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方向 148°，长 3.12、宽 1.96、深 1.54 米。墓道及封门墙无存。墓室侧壁从下至上依次为四顺一丁一组、三顺一丁两组、上平砖错缝顺砌，平砖长 28、宽 15、高 5 厘米，丁砖长 15、宽 5、高 14 厘米。在第 17 层起券，券砖长 30、宽 15、高 5 厘米。后壁在第 17 层为三顺一丁，其余与侧壁筑

法大致一样。地砖呈人字形排列，于墓室自西北向东南 290 厘米处断裂，以南部分均损毁，地砖长 30、宽 14 厘米。墓室西北壁与侧壁连接处残存砖柱 2 根、墓室侧壁中部残存砖柱 2 根，砌筑方式与侧壁相同，应起支撑、加固作用。由于墓室东南部已损毁，推测墓室东南壁与侧壁连接处应原有两根砖柱。砖柱长 30、宽 16、高 120 厘米。侧壁与后壁壁砖在第 1～4、6～8 层均发现有半弧形上下对称纹饰，纹饰朝内，东北壁第 10 层仅有一块壁砖发现有相似纹饰，券砖均为凸棱纹。墓室西北壁受挤压变形，致使墓壁内凹，券顶、东南壁已全部损毁，未见明显盗洞，未见排水沟（图三）。墓内填土为褐色砂土，土质疏松，在墓室北部出土 2 件青瓷器,1 件盘口壶、1 件碗，表面均施釉，烧结，保存完好。




图三　M2 平、剖面图

1. 瓷盘口壶　2. 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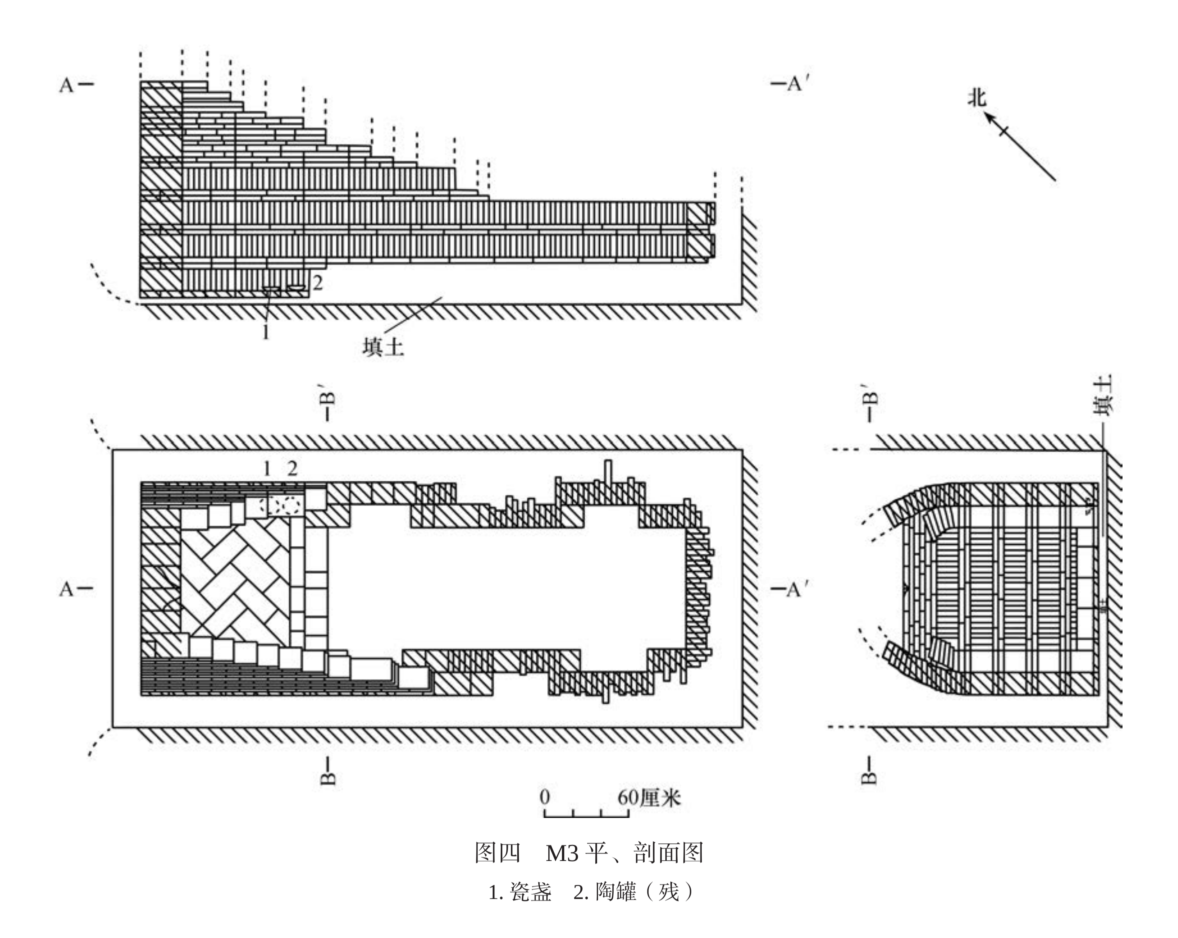
瓷盘口壶　1 件。M2∶1，盘口较大，较浅，短颈，鼓腹，平底。肩部和上腹部各有两道凹弦纹，肩部有扁宽的双竖系，为银锭状，系长 3.4、宽 0.6～1.4 厘米。施釉只及中腹部，釉色黄绿，胎釉结合较好，有流釉现象。部分口沿处有烧结现象。口径 10、腹径 14.8、底径 9.1、通高 16.5 厘米（图九，2）。

瓷碗　1 件。M2∶2，侈口，圆唇，斜腹，平底。外口沿下有一道较宽、较深的凹

弦纹，胎色灰白，釉层较薄，釉色黄绿，多半剥落。外底釉下有明显的轮旋纹。口径 17、底径 10.5、器深 5、通高 5.5 厘米（图九，6）。

**3. M3**

M3 为近长方形砖室墓，墓圹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方向 140°，长 4.5、宽 2、深 4.04 米。墓道被红砂岩土扰乱，封门墙由下至上二顺一丁 5 组，上平砖错缝顺砌 6 层。墓室东北、西南壁由下至上二顺一丁 4 组，上平砖错缝顺砌 12 层后起券，墓葬西北部侧壁和西北壁，与封门筑法大致一样，但仅存二顺一丁 1 组和 1 组丁砖，东北壁二顺一丁 4 组，上平砖错缝顺砌 6 层，壁砖和券顶砖长 32、宽 16、高 4 厘米。地砖呈人字形平铺于墓室东南壁底，至墓室中部 132 厘米处，地砖长 30、宽 14、高 4 厘米。墓室东南壁与侧壁连接处和墓室侧壁中部残存砖柱各 2 根，中后部疑似塔形砖柱各 1 根，砌筑方式与东、西侧壁相同。墓砖、券砖与地砖陡面均为菱格纹（图一〇，1），颜色与其他墓葬有所区别，呈现出青白色（图四）。墓内填土中发现 1 件破碎陶罐，墓室外填土还出土少量陶片。墓内券顶下方西南部发现棺钉若干、瓷盏 1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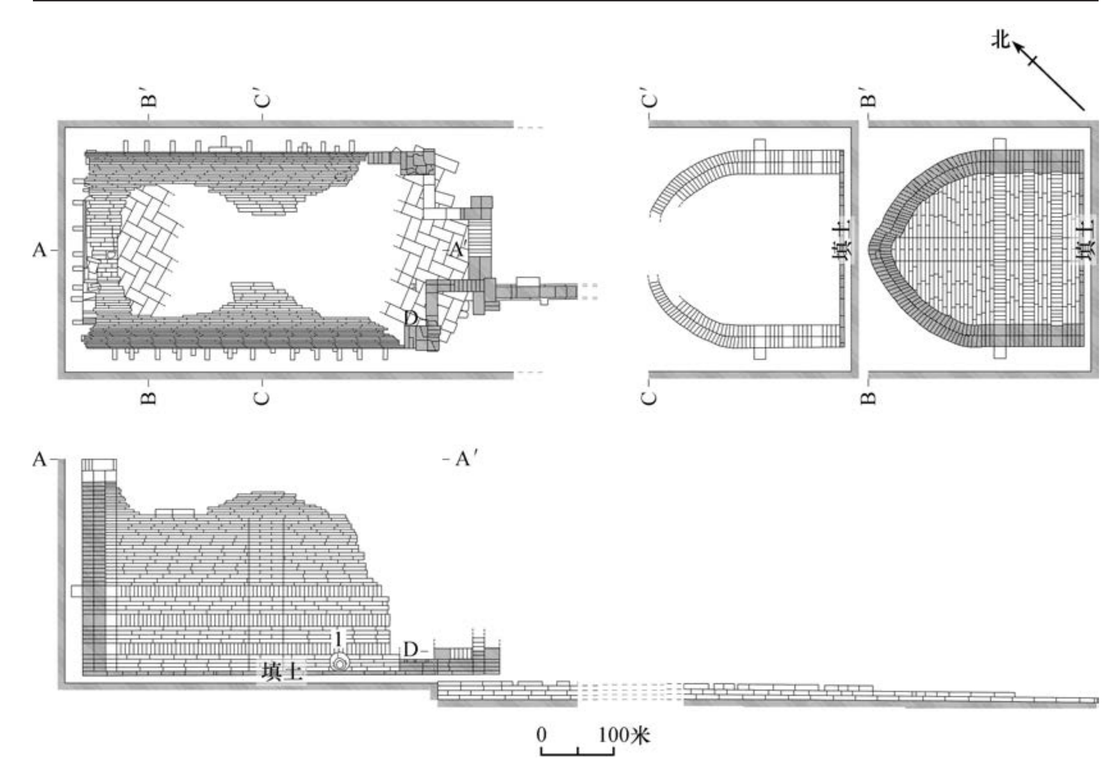

图四　M3 平、剖面图
1. 瓷盏　2. 陶罐（残）

瓷盏　1件。M3：3，侈口，圆唇，斜腹，圆饼状假圈足。胎色灰黄，釉层较薄，釉色黄绿，多半剥落。部分口沿处有烧结现象。口径13、器深3.8、圈足径4.5、通高4.3厘米（图九，8）。

**4. M4**

M4为凸字形砖室墓，由墓室、甬道、墓道组成。方向140°，长6.16、宽3.4、深2.96米。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盗洞，填土为灰褐色，土质松软，出有夹砂红褐陶片和瓷片，据陶片推测为缸或瓮等大型盛储器，年代不详，深度约40厘米。墓圹与墓壁之间相距30～34厘米。墓道被红砂岩土扰乱。甬道在墓室东部，甬道壁仅存四顺一丁2组。墓壁由下至上为四顺一丁、三顺一丁，上平铺错缝顺砌3层后起券。墓底用砖平铺一层，呈人字形，铺地砖伸出墓壁之外，显出“菱角牙子”。两侧壁中部各有砖柱1根，后壁中央有砖柱1根，与四壁筑法相同。券砖为刀形砖，长32、宽16、高4～6厘米，其余均为长方形砖，长32、宽16、高6厘米，墓砖上有纹饰，陡面为菱格绳纹（图一〇，2），卧面为凹弦纹。墓葬排水沟始自墓室西南侧一方形排水孔下，由孔至外部排水沟部分，从甬道西南壁底部穿过，上压三层顺砌平砖，一层丁砖。排水沟向甬道朝向顺延约36米后断裂，断口处仅余一层平砖，未发现明显架筑沟槽。从底层剖面及周围土质土色看，没有明显晚期或近代扰坑；又根据东南侧地形地貌，可以初步判断其被东南方池塘及塘前台地打破，现存遗迹短于原始长度。排水沟由西北向东南呈长条形，中部有6处略有弯曲，整体基本沿直线排列。距现存地表1.2～3.1米，由于墓室处被完整表土层所覆盖，排水沟处表土层已被基建方清理深度约2.9米，因此距原始地表4.1～6米。水沟由西北向东南，高度分三段逐渐降低，第一段14米，坡度3°，第二段14米，坡度5°，第三段8米，坡度7°，平均坡度5°。排水沟主要由地砖与条形砖组成，条形砖长30、宽7、高7厘米。由上至下基本分为四层，第一、二层为平砖错缝顺砌，下压条形砖，应为槽盖。其中第一层保存情况较差，残存60余块。第二层保存情况良好，残存80余块。第三层主要为两列条形砖平铺顺砌，条形砖并列平行，平均间距6厘米，形成方形沟槽。保存情况较好，一侧残存120余块。第四层主要为平砖顺砌，与第二层类似，上承条形砖，应为槽底。保存情况较好，残存100余块。其中，第三层条形砖，在第1、120号砖时，存在使用整块地砖替代的现象，砌筑方式与条形砖相同；在第76～119、121～126号砖时，存在使用半块地砖替代的现象，横铺顺砌，短边向外，以甃为壁，形成沟槽。除第118～121号砖，西南壁以整砖顺砌外，其余部分两壁砌筑方式均保持一致（图五）。墓内填土为褐色疏松砂土，出土瓷盏2件、瓷碗1件。墓室东北部出土1件青瓷盘口壶，表面施釉，保存较完整。

瓷盘口壶　1件。M4：1，盘口较大，颈较长，圆鼓腹，下腹部缓收为较大的平底，肩部六系，两对竖系一对横系，均做银锭状。竖系长3.5、宽0.7～2.5厘米，横系长3、宽0.5～2厘米。盘口、肩部和上腹部都有凹弦纹装饰。釉色黄绿，胎釉结合较差，釉




图五　M4平、剖面图
1. 瓷盘口壶

层多半剥落。口径16.5、最大腹径28、底径16.4、器深32.5、通高33厘米。盖为钵形，直口，圆唇，上腹较直，下腹斜收，平底，外口沿下有两道较深的凹弦纹。釉色黄绿，胎釉结合较差，釉层多半剥落。胎面灰白，下腹部及底部颜色加深泛红。器盖口径15、底径10.8、器深5、器通高5.5厘米（图九，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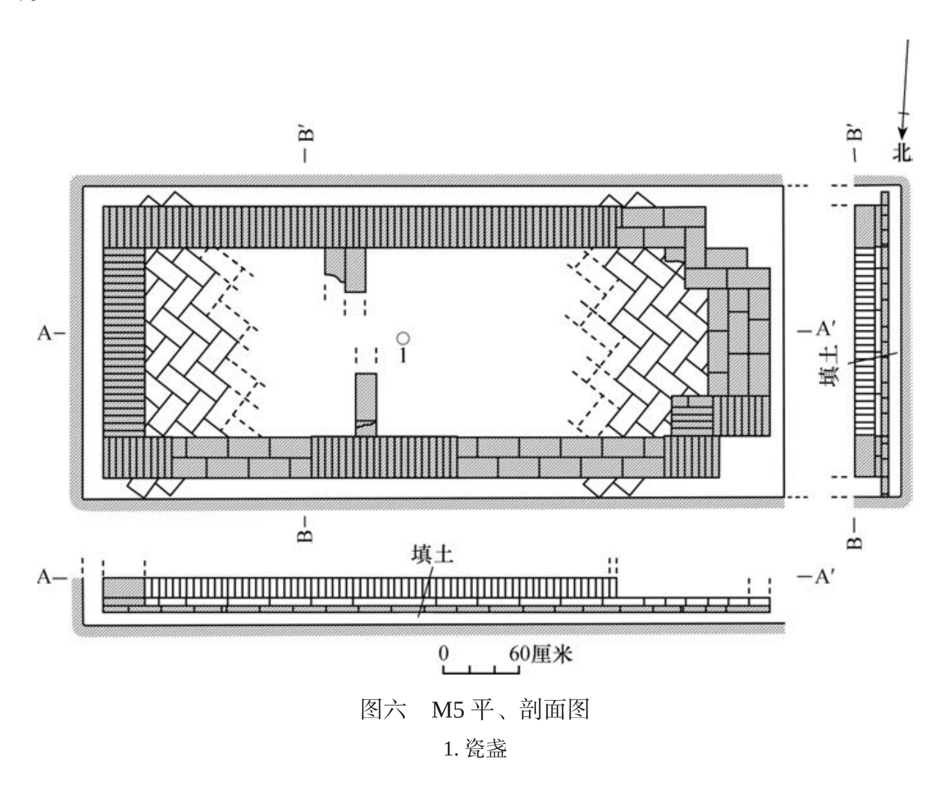
瓷盏　2件。M4：③，直口，圆唇，上腹较直，下腹缓收，底部为低矮的假圈足。外口沿下有一道凹弦纹。釉色黄绿，多半剥落。口径9.4、圈足径5.6、圈足高0.5、器深3.1、通高3.6厘米。M4：④，侈口，圆唇，弧腹，平底。釉色黄绿，胎釉结合较差，多半剥落。口径9.6、底径5.6、器深2.4、通高2.8厘米（图九，7）。

瓷碗　1件。M4：⑤，侈口，圆唇，卷沿，弧腹，圈足。釉色黄绿，多半剥落。器深5.1、器壁厚0.4、通高6.1厘米。

**5. M5**

M5为凸字形砖室墓，墓圹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方向267°，长5.56、宽2.46、残高0.26米，未发现盗洞，但前期取土应当遭到过基建工程的破坏。甬道两壁东西向平砖错缝顺砌2块，封门处残存两层南北向砖，每层3块。南壁共两层，第一层墓室南壁与东壁接口至甬道处均为南北向平铺，共74块，砖甃面向墓室内侧有不规律纹饰搭配。

其中可辨纹饰自东向西分别为铜钱纹、鱼纹。砖甃素面，卧面有网格纹和铜钱纹。北壁共两层，第一层仅残留 31 块甃砖。东壁共两层。第一层东西向甃砖平铺，共 25 块，砖甃面向墓室一侧有纹饰外框痕迹，纹饰无法辨认，推测与南、北壁同层砖纹饰相同。第二层南北向并列两排，东西向平铺顺砌，共 4 块。无可辨纹饰。墓砖长 33、宽 16、高 5.5 厘米。地砖呈人字形平铺式，端面饰鱼纹和铜钱纹，侧面饰铜钱纹，铺满墓室，地砖边缘伸出墓壁之外，形成锯齿状。地砖长 33、宽 16、高 5.5 厘米。墓圹与墓壁之间相距 16 厘米。墓葬填土为褐色砂土，土质疏松，在墓室中部发现 1 件瓷盏，破损（图六）。




图六　M5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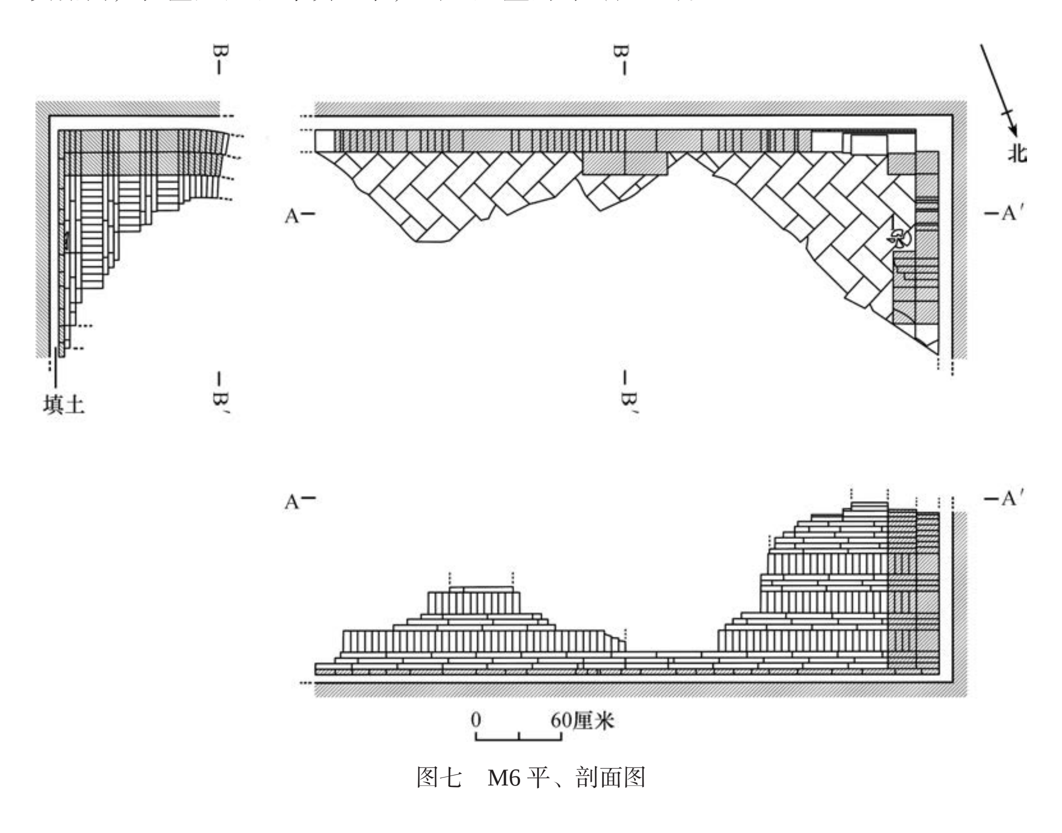
1. 瓷盏

瓷盏　1 件。M5：1，直口，圆唇，上腹较直，下腹缓收，底部为低矮的假圈足。外口沿下有一道较细的凹弦纹，内底有一圆饼状凸起。釉色黄绿，多半剥落，假圈足底部疑似遗留两个叠烧时的支钉。口径 8.3、圈足径 4.6、器深 3、通高 4 厘米。圆饼状凸起直径 2.5、高 0.5 厘米（图九，10）。

**6. M6**

M6 为长方形砖室墓，墓圹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方向 110°，长 4.26、宽 1.44、深 1.21 米。未发现盗洞，没有发现墓道及排水沟，但前期取土应当遭到基建工程的破坏。仅存西南、西北两侧壁砖及与之相连的部分地砖，其中西南壁中部已损毁。墓壁排列方式为三顺一丁 3 组，向上平砖错缝顺砌至 19 层起券。砖长 32、宽 16、高 4 厘米，平面

饰方格绳纹；丁砖长 16、宽 5、高 15 厘米，无纹饰；券砖长 30、宽 15、高 4 厘米，平面饰有方格绳纹。墓室西南壁与西北壁连接处 1 根砖柱、西南壁中部 1 根砖柱、西北壁中部 1 根砖柱，应作支撑、加固功用，砌筑方式与侧壁相同。墓壁外有丁砖残留，因损毁严重，无法确定其形制及纹饰。地砖呈人字形排列，墓室券顶、东南壁、东北壁及东南东北部地砖已全部损毁，地砖长 32、宽 16、高 4 厘米，无纹饰。墓葬内为褐色砂土，土质疏松，在墓室西北部填土中，出土少量陶片（图七）。




图七　M6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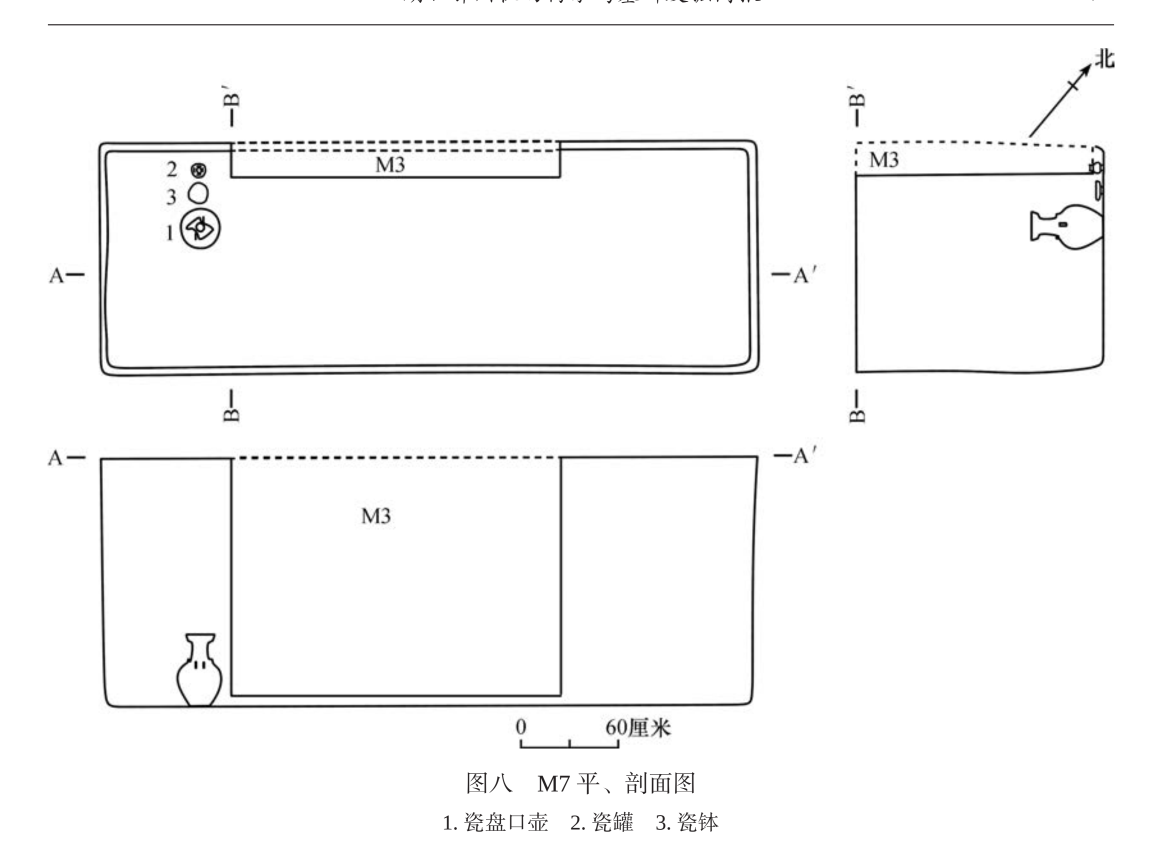
## （二）土坑竖穴墓

共 1 座，为 M7，位于墓群南侧，被 M3 打破。

**M7**

M7 为竖穴土坑墓，墓圹平面大致近长方形，方向 230°，长 4、宽 1.4、深 1.5 米（图八）。在墓中发现瓷盘口壶 1 件、瓷罐 1 件、瓷钵 1 件。

瓷盘口壶　1 件。M7：1，盘口外侈并较深，长颈，鼓腹，平底稍内凹。肩部六横系，均做银锭状。系长 3.8、宽 0.9 ~ 1.2 厘米。施釉只及上腹部，釉色黄绿，胎釉结合较好，釉层部分剥落。口径 37、腹径 26.5、底径 13、器深 12、通高 42.2 厘米（图九，4）。




图八 M7 平、剖面图

1. 瓷盘口壶 2. 瓷罐 3. 瓷钵

瓷罐 1 件。M7：2，直口，圆唇，短颈，圆鼓腹，假圈足，圈足底部略内凹。四横系，均为银锭状。釉色黄绿，大半剥落。肩部有三道凹弦纹。口径 4.8、圈足径 6、圈足高 0.8、器深 7、通高 7.8 厘米（图九，11）。

瓷钵 1 件。M7：3，盘口大而浅，圆唇，斜腹，底残，隐约可见圈足，推测为假圈足。釉色黄绿，胎釉结合较好，部分剥落。口径 12.4、底径 6、深 2.3、残高 4.2 厘米（图九，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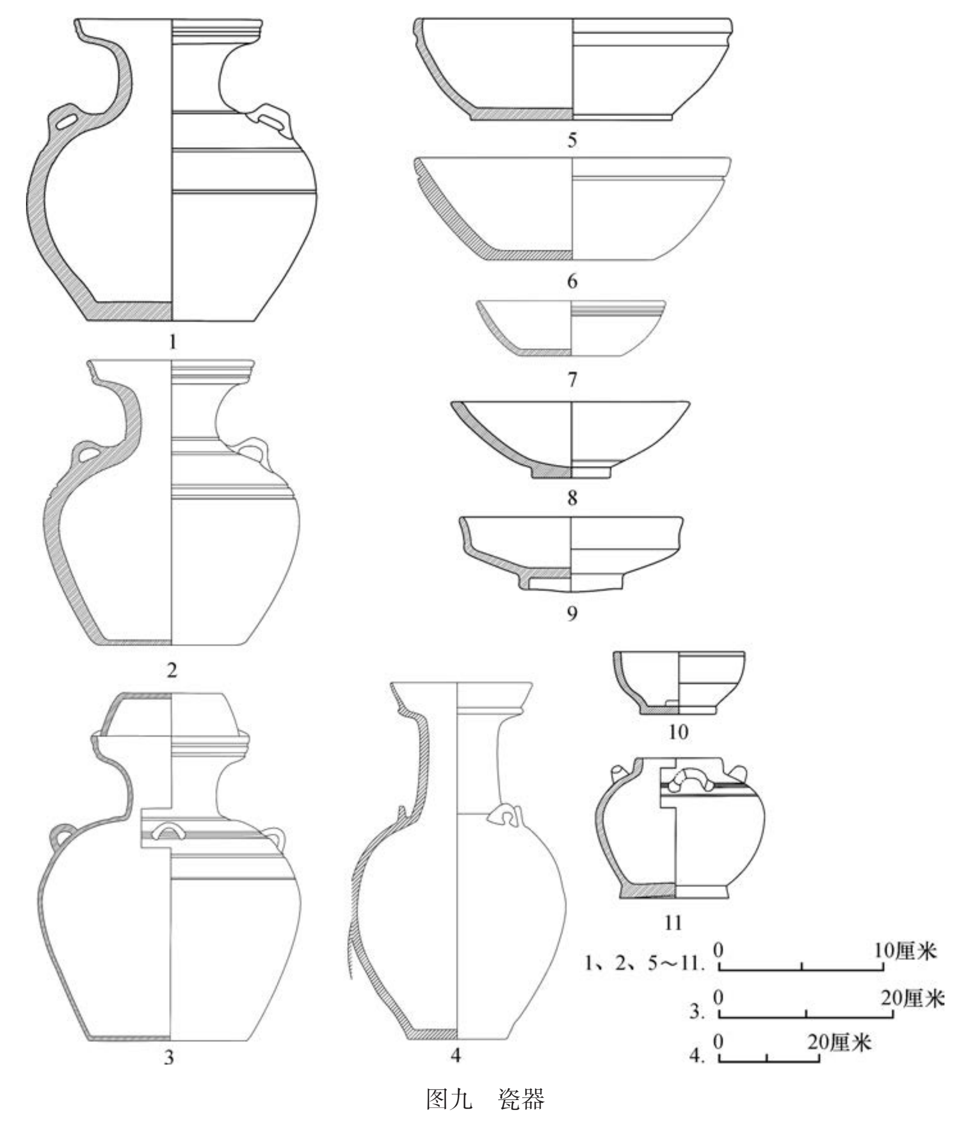
## 二、墓葬年代探讨及相关认识

本次清理的墓葬中，除 M7 外均为砖室墓。

M1 的单层封门墙采用错缝平砌，墓壁三顺一丁上错缝平砌起券，人字形地砖等墓葬形制，都属于吴末西晋初的典型形制，如鄂钢综合原料场墓①。但 M1 的盘口壶相较吴末晋初的盘口壶更加高瘦，更接近石山的盘口壶②（M2：2）。墓砖的绳纹与郭家细湾

① 鄂州市博物馆：《鄂钢综合原料场 M30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5 年 3 期。

② 湖北省博物馆：《鄂城两座晋墓的发掘》，《江汉考古》1984 年 3 期。




图九　瓷器

1～4. 盘口壶（M1∶1、M2∶1、M4∶1、M7∶1） 5、6. 碗（M1∶2、M2∶2）
7、8、10. 盏（M4∶④、M3∶3、M5∶1） 9. 钵（M7∶3） 11. 罐（M7∶2）

M8 的绳纹砖一致，墓壁与排水沟也与郭家细湾 M5 与 M11 基本相似[①]。基于此，M1 的年代应当在两晋时期。

M2 的墓葬形制与 M1 基本无异，只是封门、排水沟与墓道无存，墓室西北壁内凹应当是受到坑壁挤压，类似无名冢 M7[②] 的情况。且 M2 与 M1 相邻并列，墓葬开口也在一个水平位置上，墓砖纹饰也一致。此外，该墓所出的盘口壶与五里墩 M6∶3 Ⅰ式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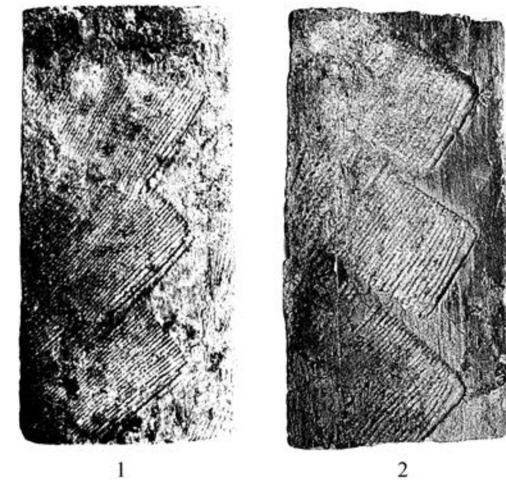
① 黄义军、徐劲松、何建萍：《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文物》2005 年 10 期。

② 荆州博物馆：《318 国道荆州段六朝、宋、明墓葬发掘简报》，《文博》2018 年 1 期。

口壶相似，瓷碗与五里墩 M8：1 Ⅰ式碗[①]、大北山 M4：1Ab 型Ⅰ式碗[②] 相似。墓壁的砌筑方式与地砖的铺设方式均基本一致，由此初步推测 M2 的年代应当在两晋时期。

M3 的墓葬形制与晋墓不同，与六朝砖墓接近。墓中所出瓷盏属于六朝时期，与郭家细湾的浅腹盏（M10：3）类似[③]，由于保存情况较差，综合考虑与 M7 的打破关系，初步推断为六朝晚期至隋唐初期墓葬。

M4 的墓壁、墓顶与鄂州饮料厂墓葬[④] 相同，该墓拥有当时最长的排水沟，但 M4 的排水沟残长已经超过其长度，砌筑方法也类似。M4 填土中所出的碗也与饮料厂 A 型Ⅰ式碗相似。据此推测 M4 很可能为孙吴晚期墓葬。但 M4 封门处所出盘口壶在形制上比饮料厂的高瘦，更加接近 M1、M2 的盘口壶。而 M4 虽然墓葬开口较深，但仍然与 M1、M2 基本等距且并列，很可能有一定关系。同时，M4 的墓壁起券位置与任家湾墓葬[⑤] 一致，所以不能仅根据与饮料厂墓葬的对比就判定 M4 为吴墓。综上所述，初步推断为东晋晚至六朝早期墓葬。




图一〇　墓砖纹饰

1. 券砖（M3） 2. 墓砖（M4）

M5 由于保存情况较差，只能通过墓砖纹饰粗略判断，M5 墓砖的钱币纹与鱼纹，与金龟山 M1[⑥] 一致，其中鱼纹为南朝所特有[⑦]。M5 所出瓷盏平底内凹，与塘角头 M7、M13[⑧] 相似。据此初步断定为南朝墓葬。

M6 由于保存情况较差，只能通过墓砖纹饰粗略判断，其墓砖的绳纹与 M1、M2 均一致，据此粗略推断其可能为两晋墓葬。

---

① 鄂州市博物馆：《鄂州市五里墩晋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3 年 4 期。

② 荆州博物馆：《荆东高速公路公安县大北山六朝墓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5 年 4 期。

③ 黄义军、徐劲松、何建萍：《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文物》2005 年 10 期。

④ 鄂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 年 1 期。

⑤ 蓝蔚、游绍奇、夏承彦、郭建安、陈恒树：《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12 期。

⑥ 大冶市博物馆：《大冶市六朝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97 年 4 期。

⑦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鄂州市博物馆：《鄂州市泽林南朝墓》，《江汉考古》1991 年 3 期。

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 年 11 期。

M7仅出土的盘口壶形制与古城M1：3[①]相似，与陈坡村M9：4Ⅱ式盘口壶[②]器形一致，仅盘口略有区别。加之与M3的打破关系，可以推测其年代应当为六朝晚期至隋唐早期。

## 三、结　语

通过对已发掘墓葬材料的观察可知，从墓葬形制的角度出发，墓壁的砌筑主要以顺砖丁砖的组合最为常见，从二顺一丁至七顺一丁不等，孙吴时期至东晋末的墓葬，除滨湖西路吴墓[③]外，多为单一的三顺一丁[④]，六朝时期的墓葬多为三顺一丁[⑤]与四顺一丁的组合[⑥]，或者平叠砌筑[⑦]。同时还有叠座式塔形座[⑧]，整砖横纵叠铺封顶[⑨]的情况。孙吴时期的墓顶多见V字形砌顶[⑩]、两块砖斜靠形成的三角顶和“叠涩”顶[⑪]，排水沟虽存在三层砖平、纵铺的现象[⑫]，但也有三块砖构成的攒尖式三角形沟孔[⑬]，而六朝墓多以三层砖平、纵铺设排水设施[⑭]。至于砖柱，无论是侧壁后壁加砖柱[⑮]，还是四壁外侧中部加砖

① 谷城县博物馆：《湖北谷城六朝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7期。

② 襄樊市考古队、襄阳县文物管理处：《襄阳县东津陈坡六朝隋唐墓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4期。

③ 冯务建：《鄂州市滨湖西路吴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233、234页。

④ 徐劲松、余夏红、谢四海：《鄂州市司徒方家山晋代家族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340～342页。

⑤ 大冶市博物馆：《大冶河口镇六朝早期墓》，《江汉考古》1999年2期。

⑥ 徐劲松、谢四海、余夏红、方顺：《鄂州市椅子山六朝墓及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文物出版社，2010年，330、331页。徐劲松、余夏红、谢四海：《鄂州市邵家玥六朝墓及元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文物出版社，2010年，334、335页。

⑦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

⑧ 鄂州市博物馆：《鄂州市观音垅南朝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5年4期。

⑨ 咸宁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杨家河发现汉魏六朝墓群》，《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14日第008版。

⑩ 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四座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2年3期。

⑪ 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城吴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7期。

⑫ 徐劲松、徐国胜、谢四海：《鄂州市新庙袁家店孙吴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文物出版社，2010年，327、328页。

⑬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11期。

⑭ 镇江博物馆：《镇江金家湾墓地六朝至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2期。

⑮ 徐劲松、谢四海、余夏红：《鄂州市仙姑庙六朝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文物出版社，2010年，328、329页。

柱[①]，砖柱与四层平铺顺砌的排水沟和丁砖伸入墓圹形成的“咬土砖”一样，始终贯穿魏晋南朝墓葬，很难作为年代判定的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M1、M2 与 M4 地砖下均有垫土的情况。这三座墓的生土都为红砂岩，墓圹很可能凿穴而成。红砂岩土质坚硬，难以形成平整的地面，因此使用填土将地砖之下铺平。这种现象在鄂州饮料厂墓葬[②]也有出现。

在鄂州市主城区以西、以东，西山以南地区，发掘了包括青龙咀[③]、郭家垴、刘家堰、邵同湾[④]等在内的魏晋六朝墓葬，多达百余座，其中不乏孙将军墓等贵族墓葬。这为环武昌城地区的墓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潘佳红，执行领队为李梅田，参加发掘的人员有郭东珺、黄楠茜、王盼盼、李锐莎、张奕鹏。本次发掘工作得到了鄂州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摄影：郭东珺　张奕鹏
绘图：张奕鹏　李锐莎　黄楠茜　王盼盼
整理：张奕鹏　李锐莎　黄楠茜　王盼盼
执笔：郭东珺　黄楠茜　王盼盼　李锐莎　张奕鹏

##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Meijiawan Tombs at Ezhou Airport, Hubei Province

School of history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of 2019, an archaeological team of Remin University

---

① 徐劲松、谢四海、余夏红：《鄂州市西山六朝墓与明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文物出版社，2009 年，315、316 页。

② 鄂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 年 1 期。

③ 田桂萍、宋博：《鄂州市西山青龙咀六朝至明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文物出版社，2016 年。

④ 徐劲松、谢四海、余夏红：《鄂州市郭家垴六朝墓及宋墓》《鄂州市刘家堰六朝墓及宋墓》《鄂州市邵同湾六朝墓及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文物出版社，2010 年，331 ~ 336 页。

of China excavated Meijiawan Cemetery in Ezhou Airport, Hubei Province. There are one earth-pit tomb in the form of rectangle and six brick-chambered tombs in the form of “凸” (2) and rectangle (4). The dating of these tombs i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 addition, burial goods were unearthed, including fourteen pieces of porcelain and pottery. More than 20 sites have been excavated. Most of them are brick-chambered tombs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Meijiawan Cemete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ing burial culture for enrich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s one of the major excavations. Furthermore, it is of great help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tudy of WuWang City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Meijiawan; Cemetery; Six Dynasties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河南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出土的东汉曹魏南部君墓志砖

杨利娟　高耀伟

（新安县博物馆，洛阳，471800）

**摘要：**2014 年冬，河南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一座墓葬，墓葬遭到破坏，仅发现墓志砖 5 块。该墓志的出土为研究东汉末年以及曹魏时期地理、职官、选才制度、书法等方面的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新安县　东汉　曹魏墓志砖

河南省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位于县城东部，洛阳市区西部，与谷水搭界。2014 年冬，洛新产业集聚区在基建施工中发现 1 座墓葬，新安县文物局闻讯派工作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墓葬遭到破坏，仅发现墓志砖 5 块。从残存的墓葬形制看，为土洞墓，形制较大。墓志砖现藏河南新安县博物馆。

## 一、墓志砖形制及录文

所出墓志砖共 5 块，大小略同，长 28、宽 15、厚 5.5 厘米。砖呈长方形，泥质陶，青灰色，表面较粗糙。志铭系烧后刻制，字迹清晰可辨。其中 4 块正面有文字，1 块正背两面均有文字，且背面文字中间部分有人为抹去的痕迹。5 块墓志砖志文如下。

第一块墓志砖，志文自右向左 5 竖行，满行 11 字，共 55 字（图一）。录文如下：

君讳陵，字子皋，天水冀人也。以汉建安八年（203 年）春正月七日，癸巳生，魏景初三年（239 年）夏五月十二日丙申，遭疾而卒，年三十有七。冬十有二月葬于此土。

第二块墓志砖，正背两面均有文字，正面志文自右向左 5 竖行，满行 12 字，共 60 字（图二）。背面志文自右向左 5 竖行，满行 12 字，共 59 字，有三行内容被完全抹去（图三）。录文如下：




图一　第一块墓志砖及其拓片




图二　第二块墓志砖正面及其拓片

君之祖父，故上计掾，察茂林四城令，张掖太守。伯父武陵金城太守。父举孝廉贤良方正，察茂林高平令。司空府辟举茂林槐里令，西海太守议郎，谏议大夫。

一从父举孝廉金吾丞。……君在官，惠爱公平，吏民称述。




图三　第二块墓志砖背面及其拓片

第三块墓志砖，志文自右向左 4 竖行，满行 12 字，共 40 字（图四）。录文如下：

南部君长女字金璧，以魏黄初七年（226 年）秋九月二日生，至太和三年（229 年）春三月遭厉气夭折。年四岁，时在京师。




图四　第三块墓志砖及其拓片

第四块墓志砖，志文自右向左 4 竖行，满行 12 字，共 47 字（图五）。录文如下：

南部君第二女字悪药，以魏太和二年（228 年）冬十有一月二十六日生，至五年（231 年）秋八月十九日，遭疾夭折。亦年四岁，时在都尉官舍。




图五　第四块墓志砖及其拓片

第五块墓志砖，志文自右向左 4 竖行，满行 12 字，共 46 字（图六）。录文如下：

南部君第三女字君寿，以魏太和六年（232 年）秋九月十七日生，至青龙二年（234 年）秋七月十三日遭疾夭折。年三岁，时在都尉官舍。

## 二、相关问题探讨

5 块墓志砖，第一块记述据志主“南部君”名陵，字子皐，天水冀人，以及南部君生卒年月日。第二块记述南部君的祖父通过“察”任茂林四城令，伯父任张掖太守，父亲通过“孝廉”“察”任茂林高平令，后通过司空府“辟举”任茂林槐里令、西海太守、议郎、谏议大夫，自己通过“孝廉”任金吾丞；第三块主要记述南部君长女金璧于曹魏黄初七年（226 年）秋九月二日出生，到太和三年（229 年）春三月遭厉气夭折时，年仅 4 岁，时在京师；其余两块记述南部君二女悪药于魏太和二年（228 年）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到魏太和五年（231 年）秋八月十九日，遭疾夭折时，也是年仅 4 岁，






图六　第五块墓志砖及其拓片

三女君寿于魏太和六年（232 年）秋九月十七日出生，到青龙二年（234 年）秋七月十三日，遭疾夭折，年仅 3 岁，均在都尉官舍。

志文“冀”为秦代置县，在今甘肃甘谷东南。察、辟举、孝廉是汉时的用人制度。汉时选才、任官主要是察举、征辟。察举属于选举制的一种，人才由乡举里选故称选举。察举是由州、郡、国等地方政权的长官，也就是由州刺史、郡守、国相等地方官吏，在辖区内选择人才，经过考察，推举给朝廷，经过皇帝策问后，分高低等级，任命官职。征辟是与察举并行的另一种访才、选官办法。征和辟都是召的意思，就是征召贤俊未仕的人士为官。朝廷诏聘为征，三公以下，包括地方州牧、郡守等官府请召的为辟。孝廉为“察”的一种选才方式，意思为孝顺父母、廉能正直①。

文中上计掾、令、太守、司空、议郎、都尉、谏议大夫、金吾丞为汉代的官职②，司空、议郎、谏议大夫为中央官制，金吾丞属京官，上计掾、令、太守、都尉为地方官；四城、张掖、武陵金城、茂林高平、茂林槐里、西海、京师为汉时的地名。

南部君出身仕宦之家，至少三世数人都做到太守、都尉等职，其本人去世前任都尉八年以上。汉末石砖质墓志较少，此时尚无设置墓志的礼俗，只有偶尔为之，东汉建安后期至曹魏西晋应是墓志发轫时期，东汉曹魏南部君墓志即是其代表③。

---

① 《中国历史研究知识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② 《后汉书 · 百官志》，中华书局，1965 年。

③ 王晓光：《从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志〉看“东晋铭石体”源流》，《中国书法》2017 年 5 期。

东汉曹魏南部君墓志为魏碑体，与《文物》1979年第5期刊登的《山东东阿县鱼山曹植墓发现一铭砖》一文中铭砖所用字体接近，曹植墓铭砖所刻时间为太和七年（233年），河南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出土的东汉曹魏墓志砖的写刻时间为魏景初三年（239年），与之相比晚了六年[①]。

## 三、结　　语

志主生活的时代为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墓志中内容涉及该时期的地理、职官、选才制度、书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研究东汉末年以及曹魏时期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 Tomb Tiles of Cao Wei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Luoxi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rea, Xin'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Yang Lijuan　Gao Yaowei

**Abstract:** In the winter of 2014, a tomb was found in the Luoxin industrial cluster, Xin'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dur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tomb was damaged, and only five epitaph bricks were found. The unearthed epitaph provides necessary physic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geography, officials, talent selection system and calligraphy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Cao Wei period.
**Keywords:** Xin'an County; Eastern Han Dynasty; Cao Wei tomb brick

① 张宗子:《曹魏南部君墓志》,《书法丛刊》2016年4期。

# 试论哈民忙哈文化与裕民文化的关系

刘肖睿[1]　孟庆旭[2]

（1. 吉林省博物院，长春，130117；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130033）

**摘要：**文章对哈民忙哈文化主要的三类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第一类为来自红山文化的因素；第二类为刻划纹陶器，应该来自本区域早期考古学文化，其源头可能来自吉林省中部；第三类文化因素是哈民忙哈文化的主体，目前研究尚未发现直接源头。近年内蒙古及河北坝上草原发现裕民文化，哈民忙哈文化主体文化因素与裕民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年代差距过大，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中有少量相似的文化因素，故推测裕民文化可能在周边强势考古学文化的挤压下北上续存，并进入科尔沁地区形成哈民忙哈文化。

**关键词：**哈民忙哈文化　裕民文化　文化因素

2007～2009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吉林省西部科尔沁沙地进行田野考古调查过程中，辨识出一类以麻点纹为主要纹饰的史前陶器遗存①。2010～2012年，吉林大学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②，确认以哈民忙哈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有别于周邻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命名为哈民忙哈文化。

“哈民忙哈文化是分布于科尔沁沙地西辽河以北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哈民忙哈文化以斜壁深腹筒形罐、小口矮领溜肩双耳壶、斜壁深腹斜口器、斜直壁平底盆、大口浅腹钵为典型陶器，麻点纹和方格纹为特色

---

① 朱永刚、郑钧夫：《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3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的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7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的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10期。

纹饰，以及房址和墓葬等特征组合。”[①]

从哈民忙哈遗址的发掘来看，遗址内包含至少三类文化因素，第一类为红山文化因素，主要包括遗址出土的各类玉器、彩陶，以及矮领双耳壶、三足罐及饰有各类“之”字纹的筒形罐等。但是这些器类在哈民忙哈遗址内并不以独立的组合形式存在，而是与其他文化因素遗物混杂共存，部分陶器虽然器形仍是红山文化风格，但是纹饰则为不见于辽西红山文化的麻点纹。可见哈民忙哈遗址中的红山文化因素可能不是人群的融合，仅是器物方面的交流与仿制。

遗址内的另一类文化因素为以斜口器和刻划纹陶器为代表的陶器，这类文化因素，多被认为来自吉林省中部的左家山下层文化。此类刻划纹饰近年来在吉林省中西部的大安后套木嘎遗址[②]、长岭腰井子遗址[③]、长岭西凤凰岭遗址[④]等都有发现，大安后套木嘎遗址与长岭腰井子遗址的发掘表明此类遗存年代为距今6800～5500年，早于哈民忙哈文化，这些遗址都共存有哈民忙哈文化遗存。因此，哈民忙哈文化的刻划纹陶器因素，更多地应该是继承本地区早期文化遗存，吉林省中部的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刻划纹因素，或许是哈民忙哈文化中刻划纹陶器的祖源而非直接源头。

哈民忙哈遗址内最主要的文化因素是各类麻点纹陶器，主要器形有筒形罐、钵、盆等。除陶器类的遗物外，哈民忙哈文化在遗迹上也有独特之处，各处哈民忙哈文化遗址发掘出的房址面积均较小，且在发掘过程中多发现房屋开口面积大于清理出的房址底部的室内面积，发掘者认为与房址内营建二层台结构有关。目前哈民忙哈文化墓葬除哈民忙哈遗址外还在白城双塔遗址有发现[⑤]，两处遗址内的墓葬都为折叠下肢的埋葬模式。上述文化因素，均不见或少见于本区域及周边早期考古学文化。王立新认为“该类遗存目前仅带流器、钵等极少量成分尚可看出与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之间的联系，而陶器群的主体特征则明显有别，显示出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文化传承上的‘断裂’”[⑥]。

2014～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化德县裕民遗址进行了为期4

---

① 郑钧夫、朱永刚、吉平：《试论哈民忙哈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②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AⅢ区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9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AⅣ区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11期。

③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地区博物馆、长岭县文化局：《吉林长岭县腰井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8期。

④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长岭县西凤凰岭遗址调查简报》，《草原文物》2020年1期。

⑤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4期。

⑥ 王立新：《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18年2期。

年的考古发掘[①]，清理出一批房址，并出土了以圜底器和片状器为代表的陶器组合，有别于周边同期的考古学文化。结合内蒙古自治区此前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认识，发掘者认为此类遗存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并命名为裕民文化。

裕民遗址房址面积均不大，且多带有二层台结构，目前发现墓葬较少，仅在裕民遗址发现1座，葬式也为折叠下肢的“蹲踞葬”。裕民文化陶器的主要纹饰风格为各类麻点纹。不难看出，上述文化因素与哈民忙哈文化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

从分布地域上看，裕民文化主要分布于阴山山脉以东的蒙古高原草原地区，目前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有化德县裕民遗址、化德县四麻沟遗址[②]、康保县兴隆遗址[③]。哈民忙哈文化主要分布地域为西辽河以北的科尔沁沙地。目前哈民忙哈文化经过发掘的除哈民忙哈遗址外还有吉林白城双塔遗址[④]，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兴安盟科右中旗哈尔沁遗址[⑤]，通辽市南宝力皋吐遗址[⑥]、道老杜粮库遗址[⑦]等。由上可以看出，二者在地域上不重合。

从年代上看，裕民遗址$^{14}$C测年数据为距今8400～7600年，光释光测年数据为距今8600～7300年。康保县兴隆遗址的发掘表明，尚存在晚于裕民遗址的第二期、第三期文化遗存，其测年数据第二期遗存为距今8000～7600年，第三期遗存年代为距今7450～7150年。哈民忙哈遗址测年数据为距今5700～5100年[⑧]，研究者根据遗址内出土遗物等因素对比分析认为哈民忙哈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二者在年代上也并不衔接。

---

①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化德县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1期。

② 胡晓农、包青川等：《内蒙古自治区化德县四麻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82页。

③ 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北康保县兴隆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1期。

④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4期。

⑤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右中旗哈尔沁新石器时代遗址》，《草原文物》2011年1期。

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遗址D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12期。

⑦ 江岩：《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道老杜粮库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文物出版社，2012年，173、174页。

⑧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洛考古中心：《论哈民遗址与哈民文化——“哈民遗址现场学术研讨会”侧记》，《南方文物》2013年4期。

2018～201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康保县兴隆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清理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者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划分为五期，其中第一期即为裕民文化遗存，第二、第三期遗存与第一期遗存之间遗迹存在大量叠压关系，其中多数房址属于完全重叠的原地重建，并且房址面积总体存在不断变大的趋势。同时出土的陶器组合除圜底演变为平底外，基本变化较小，尤其是陶板状器几乎一脉相承，陶器纹饰亦以各种编织物印压形成的麻点纹为主。

基于上述因素，虽然康保县兴隆遗址新石器时代第二、第三期遗存年代已经超出裕民文化所定义的年代范围，但是基本前后相继，可以认为由裕民文化发展而来。此后的康保县兴隆遗址新石器时代第四期遗存数量较少，且发现了广泛分布于华北平原地区的束颈圜底陶釜。第五期文化遗存已经不见房址，基本以墓葬为主。可以基本认为裕民文化因素在康保县兴隆遗址传承至新石器时代第三期遗存，也即距今7450～7150年。

在距今7000年前后，来自河北中部的后岗一期文化强势北进，越过太行山进入河套地区，也曾沿太行山地河谷西行至山西境内[①]。庙底沟文化也强势北上，进入内蒙古中部岱海地区[②]。最终在内蒙古中部形成海生不浪文化与庙子沟文化[③]。向东挤压由裕民文化发展而来的兴隆遗址新石器时代第三期空间。

在坝上草原的东部，分布有继兴隆洼文化而兴的赵宝沟文化，赵宝沟文化分布于西起大兴安岭，东到医巫闾山和渤海西岸，北起西拉木伦河流域，南抵滦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内，年代在公元前5500～前4500年[④]。陈国庆指出赵宝沟文化的一、二期主要分布于燕山以南，三、四期则主要分布于燕山以北[⑤]。可知在距今7000年前后，赵宝沟文化亦北上在东部压迫兴隆遗址新石器时代第三期的分布空间。

那么，在此条件下，由裕民文化发展而来的兴隆遗址新石器时代第三期遗存有可能北上至科尔沁沙地与哈民忙哈文化产生地域上的联系，在距今7000年前后，科尔沁沙地区域主要考古学文化为黄家围子类型[⑥]，该文化类型目前发现的遗址数量较少，从侧面反映了该遗存的发展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即便如此，康保县新石器时代第三期遗存年

① 海金乐：《晋中地区仰韶晚期文化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田广金：《内蒙古岱海地区仰韶时代文化遗址的调查》，《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③ 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26页。

④ 索秀芬：《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79页。

⑤ 陈国庆：《试论赵宝沟文化》，《考古学报》2008年2期。

⑥ 刘景文：《论腰井子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兼谈吉林省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博物馆研究》1990年3期。

代与哈民忙哈文化亦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仔细梳理坝上草原、辽西及科尔沁沙地距今 7000 ~ 5500 年的考古学遗存，发现在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的二期乙类遗存[①]墓葬内有部分为折叠下肢的葬式，同时房址内多用石板灶，这些特点不同于辽西地区年代较早的兴隆洼文化遗址。石板灶在康保县新石器时代第三期遗存大量使用，折叠下肢的葬式亦与裕民文化的“蹲踞葬”相类。

而在随后的赵宝沟文化中，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墓葬，亦不见石板灶。但是在赵宝沟遗址[②]房址 F2 内出土的 A 型指甲窝纹陶片，以及迁西西寨遗址[③]出土的戳印窝纹陶片，实际上都是编织物压印形成的麻点纹。

1991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④]，该遗址主体为红山文化遗存，但是遗址内出土了少量带有麻点纹的筒形罐。

上述遗址，均位于坝上草原北部的东侧边缘，这些零星的文化因素自距今 7000 年的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屡有发现，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这种零星的文化因素长时间在某一区域出现，多数情况下可认为该区域属于两个考古学文化的边缘重合区。反之即预示存在着以上述文化因素为主体的核心区，从距今 7000 ~ 5500 年这一时段的考古学文化分布情况看，如果存在以麻点纹陶器、折叠葬等为主要可辨识对象的考古学文化，那么有可能分布于坝上草原以北，大兴安岭、努鲁尔虎山山脉西侧的广大草原之上，后来越过上述山脉东进至科尔沁沙地形成哈民忙哈文化。

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锡林郭勒盟文物保护管理站对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文贡乌拉苏木乃仁陶力盖进行了发掘[⑤]，清理出裕民文化的房址、灰坑等遗迹，为上文推测的裕民文化向北发展提供了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通辽市腰伯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⑥]，清理出一处典型的红山文化遗址。该遗址北距哈民忙哈遗址约 24 千米，二者地域相连，但是遗址内只有少量的哈民忙哈文化麻点纹陶片，与哈民忙哈遗址大量

①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年，200 ~ 209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171 页。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西县文物管理所：《迁西西寨遗址 1988 年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 年 S1 期。

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96 ~ 113 页。

⑤ 《内蒙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居住遗址》，《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 年 18 期。

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辽市博物馆：《内蒙古通辽市腰伯吐遗址 2015 年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20 年 5 期。

出土红山文化因素陶器及玉器相比，二者之间的交流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种现象说明红山文化在社会发展上具有相对的优势地位，也说明哈民忙哈遗址可能只是哈民忙哈文化分布的边缘区。目前来看，吉林省中部历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以左家山下层文化、左家山上层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自成体系，且其典型的刻划纹陶器在吉林省西部的大安后套木嘎遗址、长岭腰井子遗址[①]都有发现，那么哈民忙哈文化可能在吉林省西部科尔沁沙地的分布范围亦有缩减，可能其核心范围或者控制范围在更西部跨过大兴安岭的草原地带。

除了上述推测之外，翻阅北方草原诸民族历史文献，据《魏书・序纪》载，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迁徙至内蒙古中部并取得部落联盟领导权经历了二百余年，其中还曾有拓跋力微率众依附没鹿回部，经历数十年，部族才重新复兴的记载。后来的契丹、女真都有过这一历程。那么哈民忙哈文化的产生似乎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康保县新石器时代第三期遗存以后，该族群走向衰微，依附兴隆洼、赵宝沟诸文化，并保留了零星的文化因素，直到红山文化晚期，这些文化因素得以结晶析出，形成了独立的哈民忙哈文化。

对裕民文化分布的坝上地区古环境研究表明，在距今 10000 ~ 8200 年，坝上地区为暖湿期；距今 8200 ~ 6900 年，为冷湿期；距今 6900 ~ 5700 年，是全新世大暖期中最稳定的暖湿期，发育了较厚的古土壤；随后进入冷干气候时期，并形成了深厚的灰砂层[②]。在哈民忙哈文化分布的科尔沁地区，则在距今 7000 ~ 5000 年形成古土壤，说明该时期气候相对温湿[③]。可见距今 10000 ~ 8000 年的坝上草原与距今 7000 ~ 5000 年的科尔沁沙地有着相似的自然环境。两地不同时代相似的自然环境也为裕民文化与哈民忙哈文化某些文化因素的相类提供了环境背景。

#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min Mangha Culture and Yumin Culture

Liu Xiaorui　Meng Qingxu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three types of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Hamin mangha culture. The first type is the factors from the Hongshan culture, and the second type is the

①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地区博物馆、长岭县文化局:《吉林长岭县腰井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 年 8 期。

② 孙建中、盛学斌、刘云霞:《坝上地区一万年来的环境变化》,《第四纪研究》2000 年 3 期。

③ 裘善文:《试论科尔沁沙地的形成与演变》,《地理科学》1989 年 4 期。

carved pottery, which should come from the early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the region. The source may come from the central part of Jilin Province. The third type of cultural factor is the main body of the Haminmangha culture,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not found its direct source. In recent years, the Yumin culture has been discovered in th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and Hebei. The main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Haminmongha culture have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Yumin culture, but the age gap between the two is too large. There is a small amount in the Xinglongwa culture and the Zhaobaogou culture. Due to similar cultural factors,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Yumin culture may survive northward under the squeeze of the surrounding stro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enter the Horqin area to form the Haminmangha culture.

**Keywords:** Haminmangha Culture; Yumin Culture; Cultural factors

# 蘑菇山鲜卑墓地断代研究

潘　玲　谭文好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西安，710110）

**摘要：**蘑菇山墓地资料发表较为完整，为进一步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基础。通过对可做年代分析的 11 座墓葬出土器物的对比分析可知，蘑菇山墓地已发掘墓葬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包括 M1、M2、M5、M6、M7、M8、M10 等 7 座墓葬，年代以西汉中期为主，最早的 M8 可到西汉早期。晚期墓葬包括 M3、M4、M9、M11 等 4 座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蘑菇山早期墓葬自身文化特征不明显，受到匈奴文化、汉书二期文化的影响比较强烈。晚期墓葬出现了鲜卑文化特有的器物。蘑菇山墓地早期墓葬的断代，将鲜卑出现在呼伦贝尔地区的时间提前到西汉早期，也为理解文献记载的鲜卑和乌桓族源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蘑菇山墓地　鲜卑　断代　族源

蘑菇山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政府所在地东北约 2 千米处的一个名为蘑菇山的台地西北坡。2011 年，蘑菇山墓地因取土被破坏，同年 4 月，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在满洲里市文物管理所、扎赉诺尔区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抢救性清理了 1 座被破坏的墓葬。同年 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和以上三家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墓地清理了 6 座被破坏的墓葬。2012 年 7 月，联合考古队在墓地又抢救性清理发掘了 5 座墓葬。以上三次发掘，共发掘墓葬 12 座。

蘑菇山墓地的发掘材料共发表过三次。第一次为 2012 年发表的《内蒙古满洲里市蘑菇山发现古墓群》一文，介绍了墓地发现和发掘经过，简要介绍了墓葬结构和葬俗、随葬品种类，发表了 13 件出土器物的黑白照片，作者认为墓地为拓跋鲜卑南迁大泽后期的遗存，年代晚于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墓地[①]。第二次为 2014 年四家发掘单位联合发表的《满洲里市蘑菇山墓地发掘报告》，该文完整发表了 2011 年发掘的 7 座

---

① 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内蒙古满洲里市蘑菇山发现古墓群》，《草原文物》2012 年 2 期。

墓葬的资料，包括每座墓葬的线图、所有可看出形制的出土器物的线图[①]。该报告对墓地年代的认识与上文相同，认为是东汉时期的鲜卑墓地。2015 年出版的《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发表了蘑菇山墓地 12 座墓葬出土器物的彩色照片和每件器物的尺寸、简要文字介绍，其中包括以前未发表的 2012 年发掘的 5 座墓葬（M8 ~ M12）出土器物[②]。这样，蘑菇山墓地发掘的 12 座墓葬的随葬器物已经完整发表，也发表了大部分墓葬的形制和结构、葬俗等方面的信息，为学界开展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蘑菇山墓地的 $^{14}$C 测年数据尚未公布，发掘者虽然提出墓地年代为东汉时期，但是没有做详细的断代论证。蘑菇山墓地的 12 座发掘墓葬中，有 11 座墓葬的出土器物可做断代分析。本文通过器物的对比分析，逐一确定这 11 座墓葬的年代，对墓地整体年代和分期提出新的认识。

## 一、蘑菇山 M1

M1 只有一件陶镀（M1：1）可以断代。该陶镀为高圈足镀，侈口，球形腹（图一，1）。这种球形腹的高圈足陶镀在呼伦贝尔地区鲜卑墓中发现的数量非常少。扎赉诺尔区的完工镇采集 1 件与蘑菇山 M1：1 的形状类似的圆腹陶镀，但是口部较小，有束颈（图一,2），推测这件器物可能与完工墓地有关[③]。完工墓地的年代在西汉中期前后[④]，那么完工镇的这件陶镀可能也是这一时期的器物。外贝加尔的伊沃尔加墓地 M139 出土 1 件腹部近球形的高圈足陶镀，与蘑菇山 M1：1 形状接近（图一,3）[⑤]。伊沃尔加墓地的年代在西汉早期偏晚至西汉中晚期[⑥]，与完工墓地的年代相当。

呼伦贝尔地区鲜卑墓葬发现的陶镀，数量最多的是下腹内收较急、器身略显瘦长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满洲里市文物管理所、扎赉诺尔区文物管理所：《满洲里市蘑菇山墓地发掘报告》，《草原文物》2014 年 2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文物出版社，2015 年，155 ~ 209 页。

③ 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考古》1962 年 11 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 6 期。

④ 潘玲：《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 年 9 期。

⑤ Давыдова А. В. Иволгинский могилъ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6. 以下伊沃尔加墓地材料均出于此。

⑥ 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此书将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年代上限定为西汉中期，但是出土与其相同匈奴式器物的西岔沟墓地的年代明确可早到西汉早期晚段。所以，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的年代上限也应为西汉早期晚段。




图一　蘑菇山 M1 陶馊断代对比图

1. 蘑菇山 M1：1（线图和照片） 2. 陈巴尔虎旗完工镇采集　3. 伊沃尔加墓地 M139　4. 扎赉诺尔墓地 1984 年发掘 M3　5. 扎赉诺尔墓地 1959 年发掘墓葬　6. 东大井 M6　7. 善家堡 M17　8. 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南沙带采集（1～5、8. 陶馊，6、7. 大口深腹陶罐）

高圈足馊。其中扎赉诺尔 1959 年发掘出土的一件肩部有 4 个纵向盲耳，颈部有稀疏的篦点纹（图一，5）。这两种装饰同时出现在一件器物上的，还见于年代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长城地带中部的东大井墓地[①]、善家堡墓地[②]（图一，6、7）。因此，该陶馊的年代应该与东大井和善家堡墓地的年代相距不远，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可能性最大。呼伦贝尔地区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南沙带采集的 1 件高圈足馊的形制与上述扎赉诺

① 李兴盛、魏坚、郝晓菲、李言：《商都县东大井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 年，55～102 页。潘玲：《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 13 辑），科学出版社，2013 年。

② 王克林、宁立新、孙春林、胡生：《山西省右玉县善家堡墓地》，《文物季刊》1992 年 4 期。潘玲：《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 13 辑），科学出版社，2013 年。

尔所出的相似，但是肩部饰一周锯齿状附加堆纹，下接锯齿状附加堆纹组成的 L、U 字形图案（图一，8）[①]。这种肩部饰锯齿状附加堆纹的做法是呼伦贝尔地区年代晚到十六国前期的团结墓地陶罐流行的装饰[②]。南沙带的这件陶镀附加堆纹的形制与东大井 M6 陶罐肩部的附加堆纹也有相似之处（图一，6）。综合以上对比可知，乌珠尔苏木南沙带的这件陶镀的年代应在东汉晚期至十六国前期。扎赉诺尔墓地 1984 年发掘的 M3 还出 1 件圆腹略垂的高圈足镀，肩部有一对横桥状耳，口沿下缘有锯齿纹（图一，4）[③]。口沿下缘饰锯齿纹的装饰手法，在扎赉诺尔墓地大口深腹陶罐中所占比例较高，其中 1986 年发掘的 M3002 所出的大口深腹罐口沿下缘带锯齿纹，与三鹿纹牌饰、一根铜丝拧成大环的耳饰共出，后两种器物是东汉时期鲜卑遗存特有器物[④]。因此，扎赉诺尔 M3 的这件圆垂腹陶镀的年代也应在东汉时期。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蘑菇山 M1 随葬的陶镀与呼伦贝尔地区其他东汉及更晚时期的鲜卑墓葬出土的陶镀形制均有明显差别，与其形制相似的陶镀年代均为西汉中期左右。因此，该陶镀的年代也应该在西汉中期前后，蘑菇山 M1 的年代也应与此相当。

## 二、蘑菇山 M2

蘑菇山 M2 出土陶壶（M2：2）（图二，1、2）、陶碗（M2：1）、铜耳环和铁耳环各 1 件，后三种器物无明确的时代特征。但是陶壶形制特殊，器身较瘦，略外敞口，折肩，斜腹，不见于本地其他鲜卑墓。类似形状的陶壶也见于外贝加尔的伊沃尔加墓地和德列斯图依墓地[⑤]，是当地匈奴墓葬陶壶的常见形制之一（图二，3～5）。蘑菇山 M2 的这件陶壶很可能是将外贝加尔器身较宽的折腹壶的外敞口与器身略瘦的直颈折腹壶的器身形状综合到一起，但是制作技术较后者粗糙，器壁较厚，陶色斑驳无纹饰，应是对外贝加尔折肩陶壶的较粗糙的仿制器物。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陈巴尔虎旗完工镇六队也征集到 1 件形状接近的折肩陶壶（图二，6），但是资料发表者没有说明是否出自完工墓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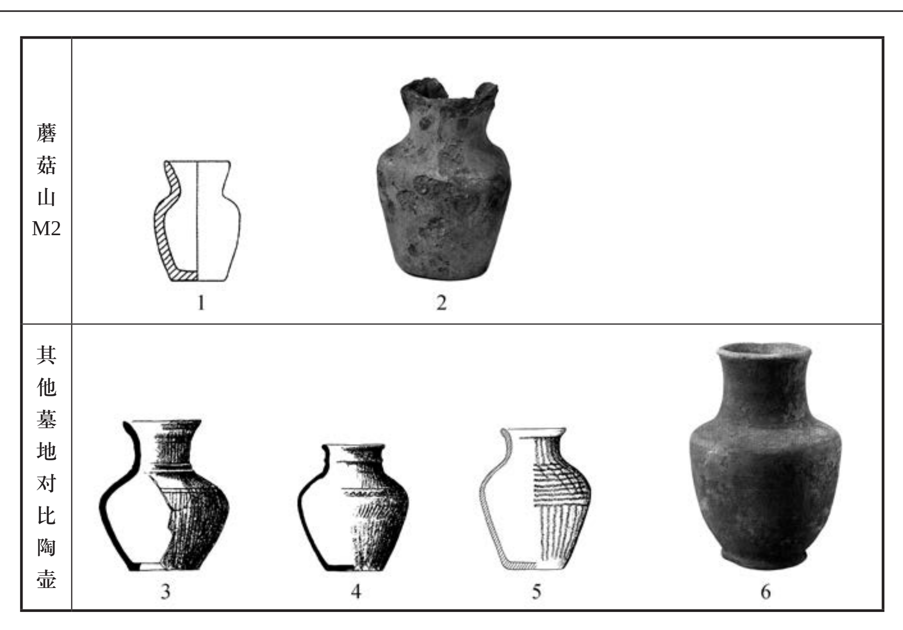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文物出版社，2015 年，155～209 页。

② 潘玲：《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 13 辑），科学出版社，2013 年。

③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 年 3 期。

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 1986 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369～383 页。

⑤ Миняев С. С. Дырестуйский Могилъ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ом, 1998. 以下德列斯图依墓地材料均出于此。




图二　蘑菇山 M2 陶壶断代对比图

1、2. 蘑菇山 M2：2（线图和照片） 3. 伊沃尔加墓地 M211　4. 伊沃尔加墓地 M173　5. 德列斯图依墓地 M43　6. 陈巴尔虎旗完工镇六队征集

这里仅作为断代参考[①]。伊沃尔加墓地、德列斯图依墓地、完工墓地均为西汉中期前后的墓地[②]，据此可知蘑菇山 M2 年代应在西汉时期。

## 三、蘑菇山 M3

该墓随葬器物相对较多，其中唯一的 1 件陶器是形制特殊的大口深腹罐，无形状相似器物做对比。但是随葬的 1 件石镞、1 件铁镞及铁腰带具可作为断代依据。

蘑菇山 M3 随葬的石镞（M3：6）为桂叶形压制石镞，器身略宽，最宽处居中，没有明显可区分出的铤部（图三，1）。在东北地区的平洋砖厂[③]、西岔沟[④]、完工、拉布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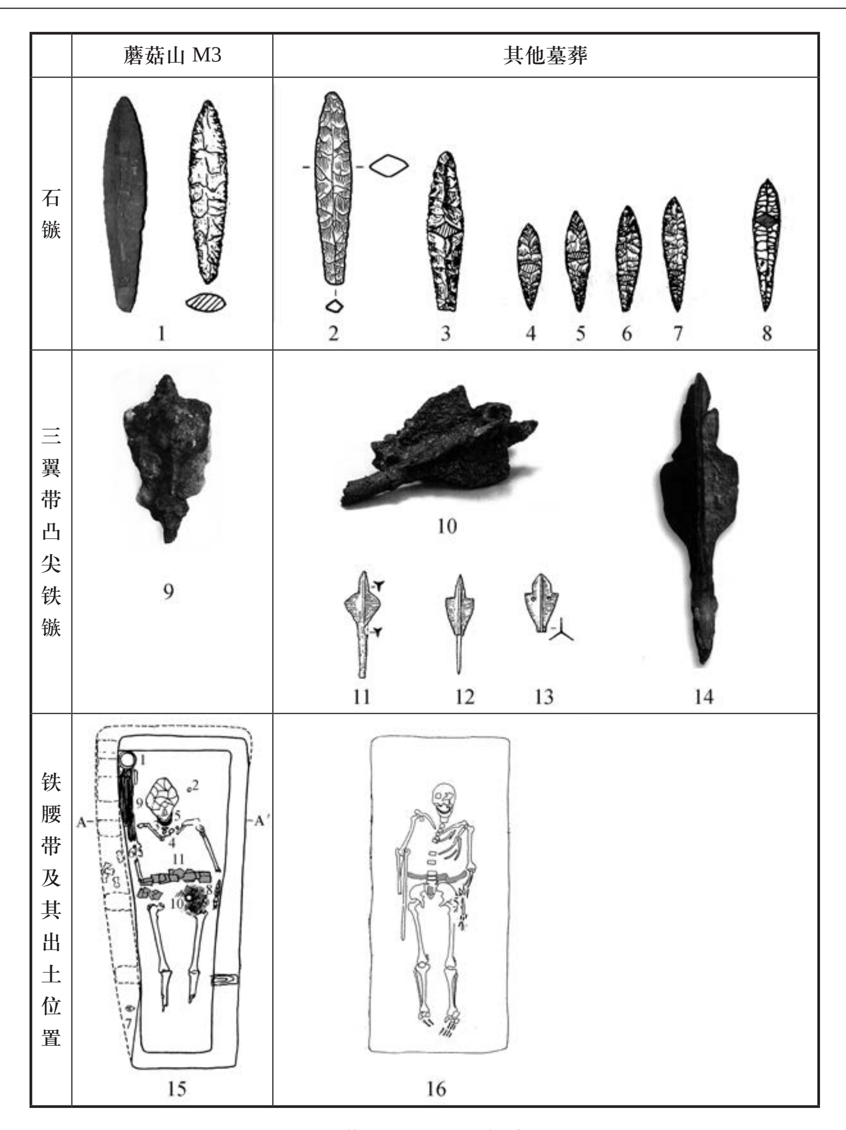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文物出版社，2015 年，155～209 页。

② 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

③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洋墓葬》，文物出版社，1990 年，109 页。

④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丰西岔沟墓地》，文物出版社，2021 年。




图三　蘑菇山 M3 器物断代对比图

1. 蘑菇山 M3（照片和线图） 2. 西岔沟 M23　3. 完工 M2　4 ~ 7. 拉布达林 92 M24
8. 拉布达林 87 M3　9. 蘑菇山 M3　10. 蒙古国杜尔利格纳尔斯墓地 M2　11. 俄罗斯伊里莫瓦谷地匈奴墓地
12、13. 俄罗斯切列姆霍夫墓地　14. 蒙古国布尔干陶勒盖墓地　15 蘑菇山 M3 平面图
16. 补洞沟 M3 平面图（15、16 的灰色部分为铁腰带具）

林[①]等墓地都发现少量随葬压制石镞的墓葬，西汉早期晚段至西汉中期的西岔沟墓地 M23（图三，2）、完工墓地 M2（图三，3）出土的压制石镞均偏细长，大多数有明显可

---

① 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 年 10 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384 ~ 396 页。

区分的铤部，只有完工 M2 的 1 件石镞接近桂叶形，但是镞的最宽处明显偏上。拉布达林墓地 92M24 出土 4 件桂叶形石镞，镞的最宽处均居中或略偏上，形制与蘑菇山 M3 石镞相对最接近（图三，4～7）①。拉布达林 92M24 随葬新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可知其年代在新莽至东汉前期。拉布达林 1987 年发掘的 M3 也随葬 1 件石镞（图三，8），形状近桂叶形，器身偏宽，最宽处偏上，石镞的压制痕迹明显粗糙，该墓随葬 10 件骨镞、6 件铁镞、1 件铜镞，但是只有 1 件压制石镞，与上述其他墓葬石镞与骨镞数量相当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②。拉布达林 87M3 的 $^{14}$C 测年数据为距今 1715 年 ± 65 年，即为东汉末至曹魏时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汉中期或略早至东汉末，东北地区西部的压制石镞经历了器身逐渐变宽、带铤镞数量逐渐减少到最后只保留器身较宽的桂叶形无铤镞的变化过程，镞的数量在东汉晚期明显减少。蘑菇山石镞器身略宽，区分不出铤部，其形制与拉布达林 92M24 的石镞最接近，蘑菇山 M3 只随葬 1 件石镞的做法与年代更晚的拉布达林 87M3 的情况相同。拉布达林的这两座墓都是东汉时期的墓葬。因此，蘑菇山 M3 的年代应与拉布达林 87M3 接近，也可能相当于 92M24，即蘑菇山 M3 应为王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

蘑菇山 M3 随葬有凸尖的三翼铁镞（图三，9），这种形制的铁镞在匈奴遗存中很流行，其中在外贝加尔地区只见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匈奴墓葬（图三，11～13）。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墓葬中也随葬这种形制的铁镞，其中墓地年代明确的也为西汉晚至东汉前期。如肯特省的杜尔利格纳尔斯墓地随葬带凸尖的三翼铁镞（图三，10），该墓地出土流行于王莽至东汉早期的花纹缘四神博局纹镜；布尔干省布尔干陶勒盖墓地也出土带凸尖的三翼铁镞（图三，14），该墓地随葬流行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宽平缘日光镜③。据以上分析，可将蘑菇山 M3 带凸尖的三翼铁镞断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蘑菇山 M3 的墓主人腰部有一排铁质腰带具，带具主要为横向长方形，应为下葬时带在身上的腰带上的铁带具（图三，15）。在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及邻近地区，只有匈奴墓葬普遍随葬腰带具，其中西汉时期匈奴墓葬的腰带具绝大多数为铜质，石质腰带具在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匈奴和鲜卑墓葬均有发现，铁质腰带具则在东汉时期才普遍使用④。如内蒙古伊克昭盟补洞沟墓地 M3 即与蘑菇山 M3 类似，在腰部出一排腰带

---

①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384～396 页。

② 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 年 10 期。

③ Eregzen G.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Ulaanbaatar: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2011.（杜尔利格纳尔斯墓地和布尔干陶勒盖墓地的材料均来源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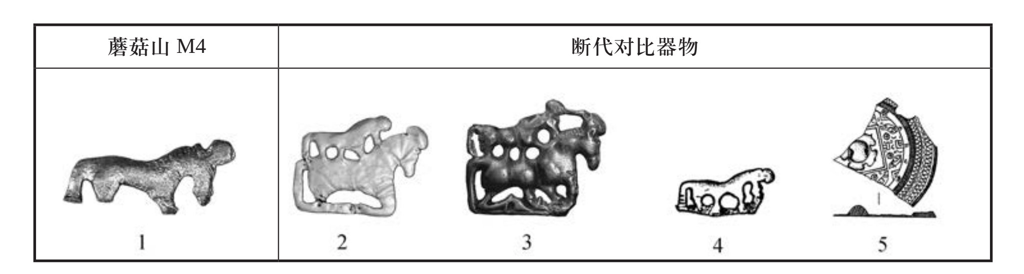
④ 潘玲：《两汉时期北方系统腰带具的演变》，《西域研究》2018 年 2 期。

具（图三，16）。补洞沟是东汉前期南匈奴的墓葬[①]。东汉晚期的大安渔场墓地也出土铁腰带具，但是腰带的带身上的装饰性铁带具均为纵向长方形[②]。因此，从出土位置、腰带具形状两方面分析，蘑菇山 M3 的铁腰带具应为东汉前期，与补洞沟 M3 的年代相当。

根据上述对石镞、铁镞、铁腰带具的对比分析，可将蘑菇山 M3 断代为东汉前期。

## 四、蘑菇山 M4

该墓为一座残墓，可断代器物是 1 件马形金牌饰和 1 组铁腰带具。马形金牌饰为双马形牌饰残存的大马背上的小马（图四，1）。双马形牌饰是鲜卑遗存特有的器物，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双马形牌饰，年代比较明确的出自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 M15（图四，2）[③]、开鲁县福兴地鲜卑墓葬（图四，3）[④]，前者年代在东汉中晚期，后者根据随葬的马形牌饰和铜镀形制判断在东汉时期[⑤]。在俄罗斯赤塔州的左尔郭勒 1 号墓地 M37 出土 1 件残存小马的马形牌饰（图四，4），该墓随葬 1 件新莽至东汉早期流行的带锯齿纹宽平缘




图四　蘑菇山 M4 马形金牌饰断代对比图

1. 蘑菇山 M4　2. 三道湾 M15　3. 福兴地鲜卑墓葬　4、5. 左尔郭勒墓地 M37（1～4. 马形牌饰　5. 博局纹铜镜）

---

①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补洞沟匈奴墓葬》，《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 年，394～402 页。该墓断代见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

②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大安渔场古代墓地》，《考古》1975 年 6 期。大安渔场墓地的断代根据潘玲：《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 13 辑），科学出版社，2013 年。

③ 杜承武、李兴盛、田丽、李庭跃、哈达：《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 年，16～5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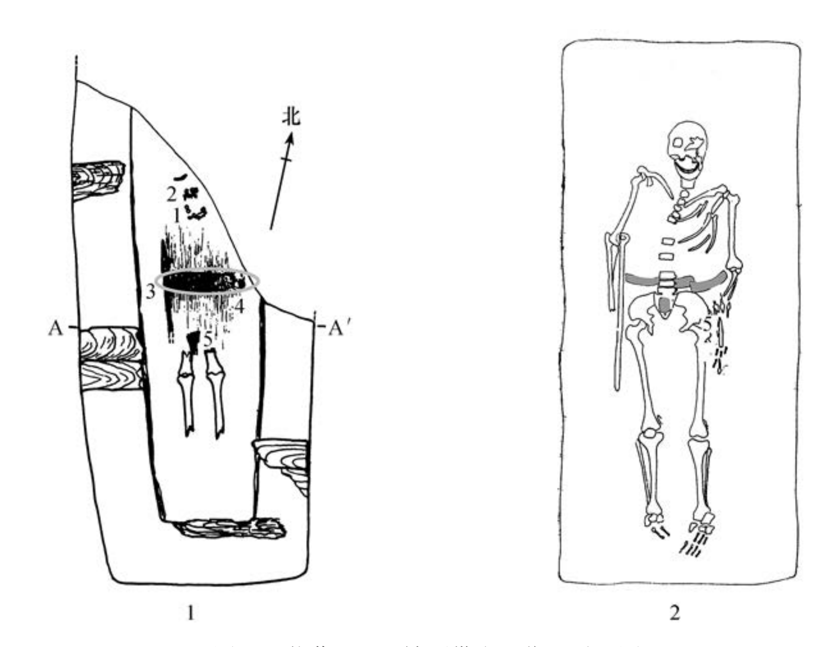
④ 武亚琴、李铁军：《开鲁县福兴地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 年 2 期。

⑤ 林沄：《鲜卑族的金、铜马形牌饰》，《边疆考古研究》（第 3 辑），科学出版社，2004 年。关于马形牌饰为鲜卑特有器物的论证见此文。潘玲：《中国北方晚期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 年，28 页。关于福兴地墓葬年代的认识见此文。

的博局纹铜镜（图四，5）[①]。根据以上对比，可知蘑菇山 M4 的马形牌饰年代应为新莽至东汉时期。

M4 墓主人的腰部有一排条带状的铁腰带具，但因锈蚀具体形制不清（图五，1）。根据上文对蘑菇山 M3 铁腰带具的分析可知，蘑菇山 M4 的铁腰带具也应为东汉时期流行的器物（图五，2）。

根据以上分析，可将蘑菇山 M4 年代断代为新莽至东汉时期。




图五　蘑菇山 M4 铁腰带出土位置对比图

1. 蘑菇山 M4 墓葬平面图（灰色椭圆区域内为铁腰带）　2. 补洞沟 M3（灰色条带为铁腰带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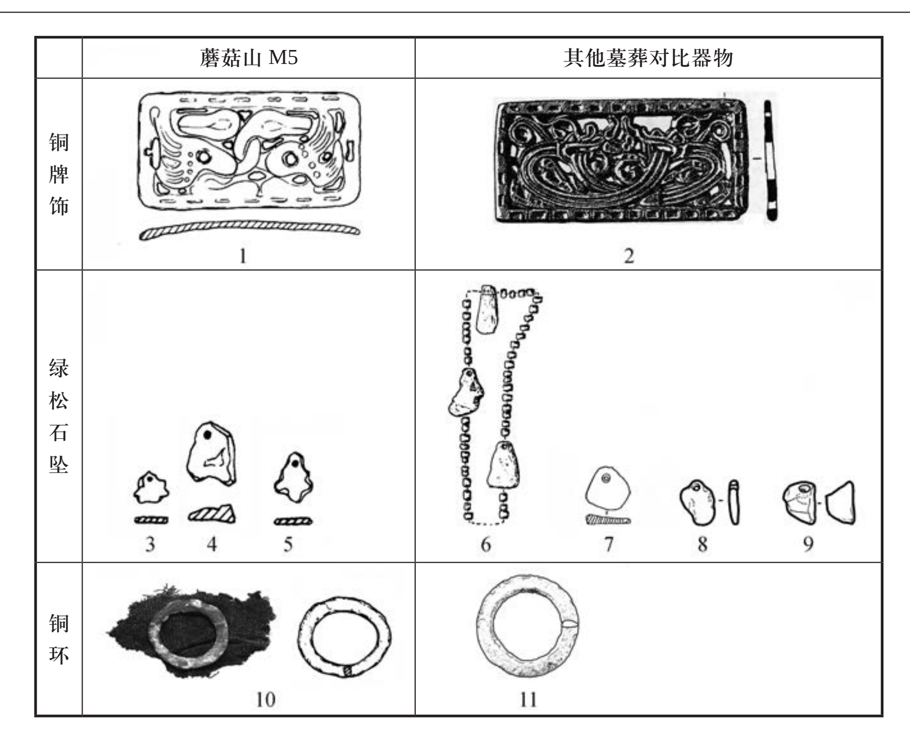
## 五、蘑菇山 M5

该墓随葬品有矩形镂空动物纹铜牌饰、表面不规整的绿松石坠、器身偏扁的铜环、颈部带附加堆纹的大口深腹陶罐。

蘑菇山 M5 的镂空铜牌饰上有两只交颈的水禽，边缘有竹节状纹饰，出于墓主人腰部（图六，1）。动物纹镂空铜牌饰流行于西汉时期，常见于西汉中期前后的匈奴墓葬，

---

①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Я. О. Могильник Зоргол-Ⅰ—памятник хунно-сяньбийской эпохи Степной Даурин.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к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ей универеситет им. Н. Г. Чурнышевского, 2005.




图六　蘑菇山 M5 器物断代对比图

1、3～5、10. 蘑菇山 M5　2. 德列斯图依 M118　6. 德列斯图依 M114　7. 完工 M1　8、9、11. 西岔沟墓地

或受匈奴文化影响的墓葬（图六，2）[①]。但通常是成对出现。蘑菇山 M5 只出土 1 件，可能用法有所改变。

M5 墓主头部一带出土 3 枚轮廓不规则的绿松石坠，在较窄的一侧均有一圆形穿孔（图六，3～5）。这种形状不规则的绿松石坠也见于年代相当于西汉中期前后的德列斯图依墓地（图六，6）、完工墓地 M1（图六，7）、西岔沟墓地（图六，8、9）。进入东汉时期，在匈奴和鲜卑墓葬发现的绿松石坠均表面形状规则，加工精细（详见下文对蘑菇山 M11 绿松石珠子和坠饰的分析）。可见，M5 的绿松石坠是西汉时期的器物。

M5 墓主人腰部一带出土 1 件铜环，铜环长、短径分别为 4.1、3.7 厘米，剖面为扁椭圆形（图六，10）。类似形状和尺寸的铜环，在西岔沟墓地发现数量较多，也出于腰部，推测应穿挂在腰带下（图六，11）。西岔沟墓地年代为西汉早期晚段至西汉中期。拉布达林墓地 1992 年发掘的 24 座墓葬中出 8 件铜环，出自 2 座墓葬，其中 7 件出于 92M24，该墓随葬 5 枚大泉五十铜钱，说明其年代在新莽至东汉前期。从拉布达林墓地

① 潘玲：《矩形动物纹牌饰的相关问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 3 辑），科学出版社，2004 年。Миняев С. С. Дырестуйский Могилъ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ом, 1998. 以下德列斯图依墓地材料均出于此。

1992 年发掘墓葬出土铜环情况可以看出，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墓葬随葬扁体铜环。可见，这种扁体铜环在东北地区西部流行的时间是西汉中期或稍早至东汉前期，其中西汉时期发现的数量最多。

根据蘑菇山 M5 出土的以上三类器物的对比分析，可知该墓最有可能是西汉时期的墓葬，但是不排除可晚到新莽时期。

## 六、蘑菇山 M6

该墓为单人二次葬。该墓随葬品有 1 件大口深腹陶罐（图七，5）、1 件三翼铁镞、1 件骨镞、3 件骨弓弭、6 件圆片状铁器等。

三翼铁镞残存一小段铤，器身呈三角形（图七，1）。这种铁镞无凸尖，与西汉末至东汉前期匈奴墓流行的带凸尖的三翼铁镞的形制有明显差别，是西汉时期匈奴文化流行的铁镞形制[①]，在德列斯图依墓地、伊沃尔加墓地均有出土，其中完整的均有较长的铤部（图七，2～4）。

骨镞为四棱形銎孔镞（图七，6）。这种骨镞发现数量很少，通常见于外贝加尔西汉时期匈奴遗存，如伊沃尔加城址（图七，7～9）[②]、德列斯图依墓地 M93 均出土銎孔式骨镞（图七，10），其中出自伊沃尔加城址的 1 件镞身接近四棱形（图七，7），与蘑菇山 M6 的形状最接近。

蘑菇山 M6 还出 3 件骨弓弭（图七，11～13），其中 2 件为两段部分重叠接在一起的弓弭的下半段（图七，12、13），重叠部分的一面削成较缓的斜坡。这种两段分体的骨弓弭可以随着弓体的拉伸转动，在西汉时期匈奴墓葬中发现的频率最高，与单体的骨弓弭配合使用[③]。如德列斯图依墓地 M123，即至少有 1 件弓弭为两段分体弓弭（图七，14～16）。与德列斯图依墓地年代相当的完工墓地也出土 1 件两段分体骨弓弭的下半段（图七，17）。

根据以上对铁镞、骨镞、骨弓弭形制的对比分析，可将蘑菇山 M6 断代为西汉时期墓葬，在西汉中期前后的可能性最大。

## 七、蘑菇山 M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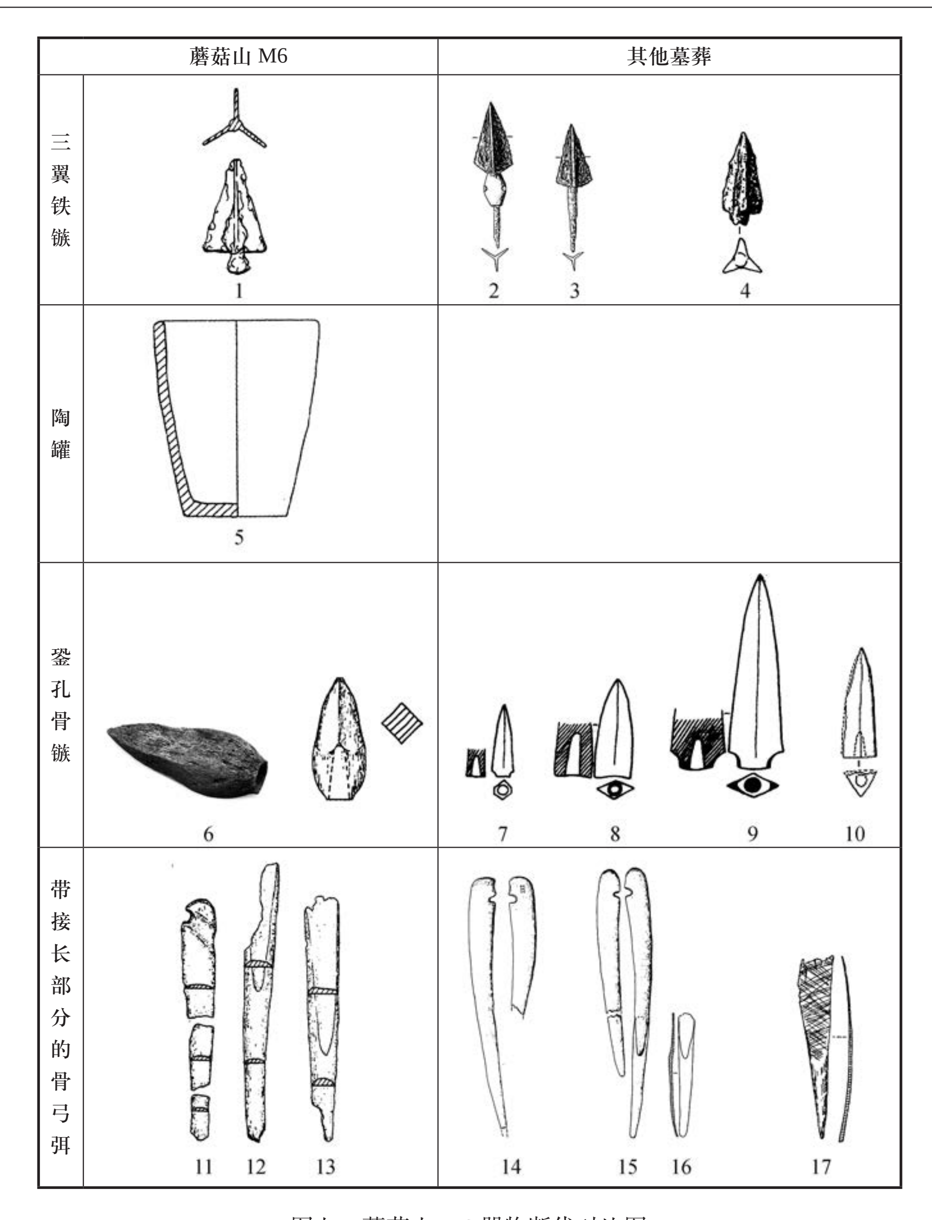
该墓为男、女二次合葬墓，只随葬 1 件骨镞和 1 件陶罐。骨镞为瘦长的扁铤镞，镞身为细长的菱形，横截面为菱形。铤扁而长，从一面削薄（图八，1）。这种形制的

---

① 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

② Давыдова А. В. Иволгиское горлищ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5.

③ 潘玲：《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 年 9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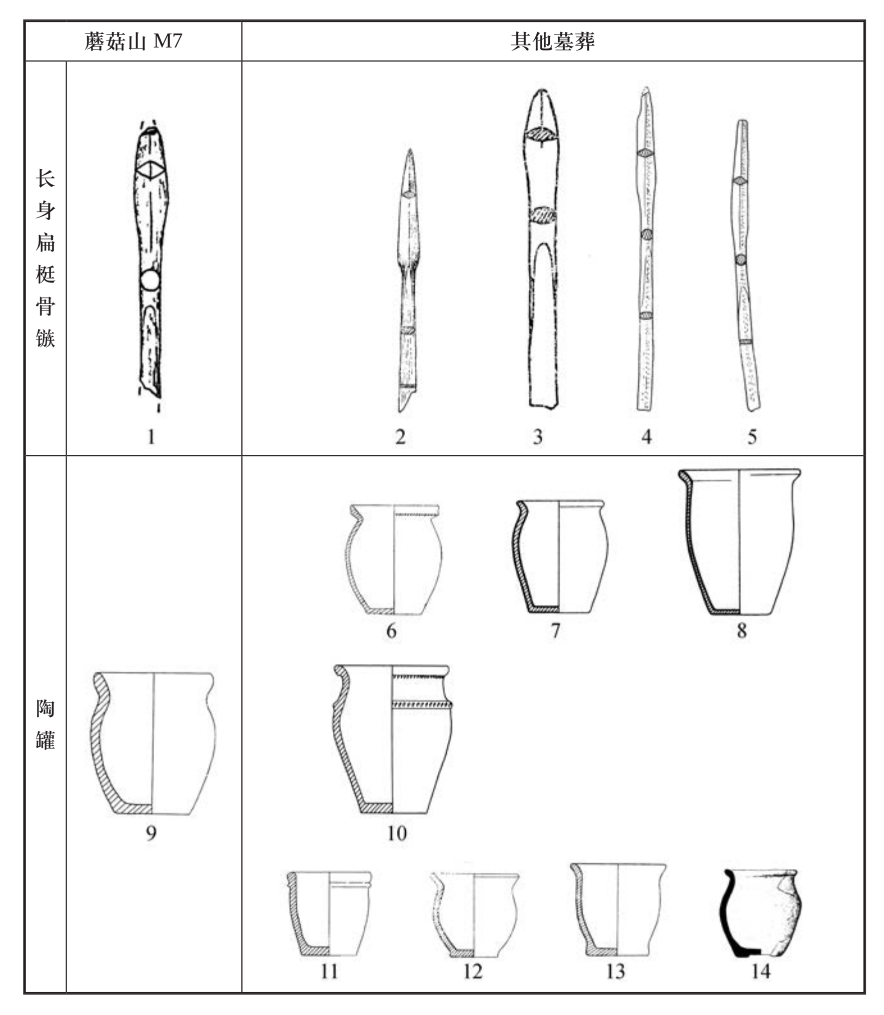



图七 蘑菇山 M6 器物断代对比图

1、5、6、11～13. 蘑菇山 M6 2、3、14～16. 德列斯图依 M123 4. 伊沃尔加墓地 M96
7～9. 伊沃尔加城址 10. 德列斯图依 M93 17. 完工 M1B

骨镞在东北地区西部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是这一区域很有地域特色的骨镞形制[①]。这类长梃骨镞在西汉时期的汉书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中仍然非常流行，如平洋砖厂墓地

① 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潘玲：《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 13 辑），科学出版社，2013 年。




图八　蘑菇山 M7 器物断代对比图

1、9. 蘑菇山 M7　2. 平洋砖厂墓地 M141　3. 完工 M3　4、5. 拉布达林 1992 年发掘墓葬
6. 扎赉诺尔 1984 年发掘 M4　7. 扎赉诺尔 1986 年发掘 M3003　8. 扎赉诺尔 1986 年发掘 M3012　10. 团结墓地 M5
11. 蘑菇山 M3　12. 拉布达林 1992 年发掘 M5　13. 拉布达林 1992 年发掘 M6　14. 德列斯图依 M109

M141 的骨镞即如此（图八，2）。以汉书二期文化为主体的完工墓地发现的骨镞大多数是此类长扁梃骨镞（图八，3）。1992 年发掘的拉布达林墓地的 24 座墓葬中出 24 件骨镞，其中只有 3 件是此类长扁梃的骨镞（图八，4、5），该墓地出新莽时期钱币和西汉晚器至东汉早期流行的铜镜。呼伦贝尔地区其他鲜卑墓葬不见此类骨镞。可见，长扁梃骨镞是西汉时期汉书二期文化及受其影响遗存流行的骨镞，新莽至东汉早期数量已经锐减，在当地骨镞中只占非常小的比例。蘑菇山 M7 的这件长梃骨镞最有可能是西汉时期遗物。

蘑菇山 M7 随葬的大口深腹罐器壁较厚，腹部略圆（图八，9），其器身形制与蘑菇山 M1 的高圈足陶镀的器身形制相似（图一，1），可以作为断代的参考。呼伦贝尔

鲜卑墓葬大多数大口深腹罐的器壁厚度适中，有几类形制：第一类腹部外鼓，最大径位于中腹（图八，6）[①]；第二类器身略显瘦，肩部明显，最大径靠上位于肩部（图八，7）[②]；第三类器身瘦长，肩部不显，底部略小，最大径位于中腹偏上处（图八,8）[③]；第四类似从第三类进一步发展而成，细高器身，下腹内收器壁略内凹，肩部变成外鼓并有一周锯齿状附加堆纹，年代可到十六国早期（图八，10）[④]。蘑菇山 M7 的大口深腹罐与以上四类形制均有较大差别。器壁较厚的大口罐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现数量较少，器身均偏矮，年代均相对略早。如蘑菇山 M3 出土器壁较厚的大口深腹罐，前文已论证该墓年代为新莽至东汉前期（图八，11）；拉布达林 1992 年发掘的 M5 和 M6 的大口罐器壁均略厚，两座墓葬分别出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新莽至东汉早期流行的昭明镜和博局纹镜的残片，两者的年代应分别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新莽至东汉前期（图八，12、13）。这种厚壁、矮身的大口罐，在外贝加尔西汉时期的德列斯图依墓地也有发现（图八，14）。

综合以上对蘑菇山 M7 出土长梃骨镞、大口深腹罐形制的对比分析，可将该墓年代判断为约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

## 八、蘑菇山 M8

该墓随葬品相对丰富，墓主人腰部有包金箔的腰带、玉环，颈部戴由琉璃珠和带条纹玛瑙坠组成的项链，应是已发掘的 12 座墓葬中墓主人身份相对最高的墓葬。M8 可做断代分析的器物有陶罐、铜泡、玛瑙坠、玉环、包金腰带等 5 类。

M8 随葬 1 件大口深腹陶罐，器身偏矮，口沿下有锯齿状附加堆纹，锯齿较钝而稀疏（图九，1）。陶罐壁的厚度不详，器身形状与蘑菇山 M7 的大口深腹较相似（图九，5）。该陶罐虽然口沿下饰锯齿状附加堆纹，但与扎赉诺尔墓地大口罐的同类纹饰有明显差别，后者的锯齿密集而较尖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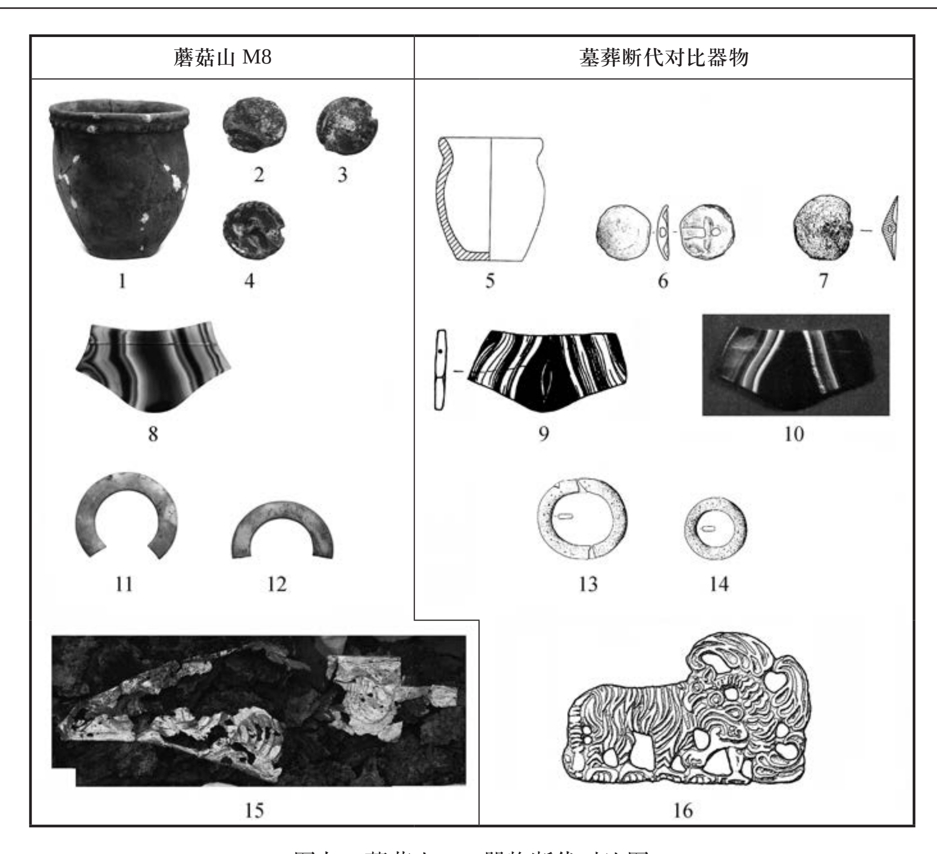
---

①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 年 3 期。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384 ~ 396 页。

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384 ~ 396 页。

④ 呼伦贝尔市民族博物馆、海拉尔区文物管理所：《呼伦贝尔市团结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 年。潘玲：《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 13 辑），科学出版社，2013 年。




图九　蘑菇山 M8 器物断代对比图

1～4、8、11、12、15. 蘑菇山 M8　5. 蘑菇山 M7　6. 西岔沟 M15　7. 平洋砖厂 M107　9、10. 伊沃尔加 M142（线图、照片）　13、14. 德列斯图依 M49　16. 西岔沟墓地（1、5. 大口深腹陶罐　2～4、6、7. 铜泡　8～10. 玛瑙坠　11、12. 扁体玉环　13、14. 扁体泥灰岩环　15. 包金箔腰带局部照片　16. 动物纹铜牌饰）

蘑菇山 M8 发表的 3 件铜泡直径分别为 1.5、2.3、2.8 厘米，其中 2 件发表背面照片的铜泡均为在桥形背纽下有长三角形凹槽（图九，2～4）。这种形状和尺寸的铜泡在西岔沟墓地、平洋砖厂西汉时期墓葬均很常见[①]（图九，6、7），进入东汉时期则不见或非常少见。

M8 墓主人颈部挂的项链底部为一个近 U 字形的带纵向彩色条纹的玛瑙坠饰，有一横向穿孔，长 6.3 厘米（图九，8）。类似形状和尺寸的玛瑙坠饰在伊沃尔加墓地 M142 也发现 1 件，纹饰也与蘑菇山 M8 的这件非常接近，也有一横向穿孔（图九，9、10）。

位于 M8 墓主人腰部附近的 2 件扁体玉环直径 6.5 厘米（图九，11、12），同样形

①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丰西岔沟墓地》，文物出版社，2021 年。潘玲：《平洋墓葬再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 10 辑），科学出版社，2011 年，215～243 页。

制和相似尺寸的石质扁体环在外贝加尔的德列斯图依墓地（图九，13、14）、伊沃尔加墓地均有发现，多数为成对悬挂在腰带下面，在东汉时期的匈奴墓葬则不见此类扁体环[①]。腰带下坠成对的石质、铜质的扁环流行于西汉时期匈奴墓葬和西岔沟墓地等受匈奴文化影响的墓葬，M8 的玉环明显是受匈奴文化影响出现的。

蘑菇山 M8 墓主人腰部有包金箔的皮腰带，金箔虽然残破，但是可见纹饰由成组的平行曲线组成（图九，15）。战国晚期长城地带的动物纹牌饰上流行这种平行线组成的纹饰[②]，西岔沟墓地出土的装饰这种纹饰的 P 字形动物纹牌饰，是装饰这种纹饰的牌饰中年代最晚的（图九，16）。西岔沟墓地的年代为西汉早期晚段至西汉中期。

根据以上对陶罐、铜泡、玛瑙坠饰、金箔带具纹饰的分析，可知蘑菇山 M8 的年代应与伊沃尔加、德列斯图依墓地以及西岔沟墓地的接近，即主体年代在西汉中期，可早到西汉早期晚段。根据包金箔腰带的纹饰分析，墓葬年代在西汉早期的可能性较大。

## 九、蘑菇山 M9

该墓随葬漆器，还有夹金箔玻璃珠、蓝色玻璃珠等，但是年代最明确的是 1 件泥质灰陶碗（图一〇，1）。该碗斜壁，平底边缘外凸，形状与拉布达林 92M10 随葬的陶碗非常相似（图一〇，2）。1992 年发掘的拉布达林墓地的 24 座墓葬，根据共出铜镜、钱币和骨镞等性质判断，应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蘑菇山 M9 的年代也与此相当。

## 十、蘑菇山 M10

该墓随葬器物较多，包括大口深腹陶罐、铜泡、铜环、管銎铜镞、三翼铁镞等，大多数具有明显的西汉时期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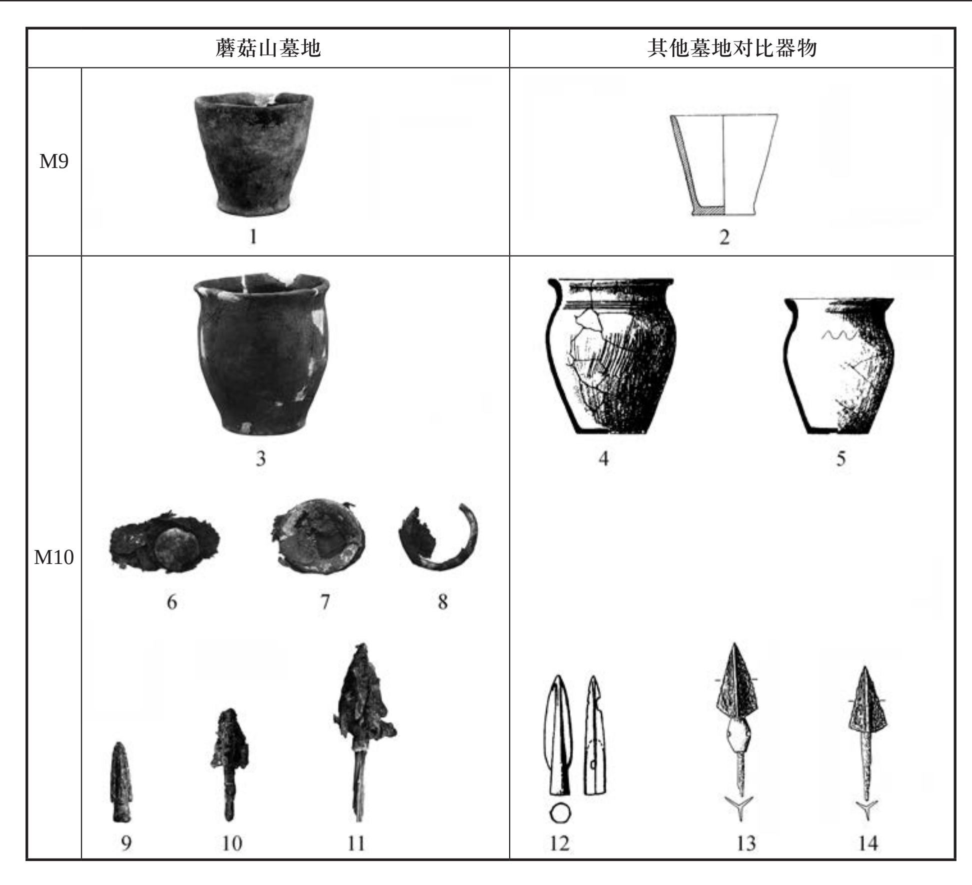
M10 随葬的大口深腹陶罐（图一〇，3）的形状与外贝加尔伊沃尔加墓地等西汉时期匈奴墓葬的一种常见的大口深腹罐较为相似（图一〇，4、5）。

2 件铜泡的直径分别为 1.8、2 厘米，1 件背纽下有凹槽（图一〇，6）。上文蘑菇山 M8 的铜泡对比分析中已经说明，这种铜泡流行于西汉时期。该墓随葬的青铜环中有 1 件为扁体铜环，直径 5.6 厘米；另 1 件为横截面近圆形的圆体铜环（图一〇，7、8）。上文对蘑菇山 M5 的扁体铜环分析中已经说明，这种铜环是西汉时期流行的器物。

---

① 潘玲：《平洋墓葬再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 10 辑），科学出版社，2011 年，215～243 页。

②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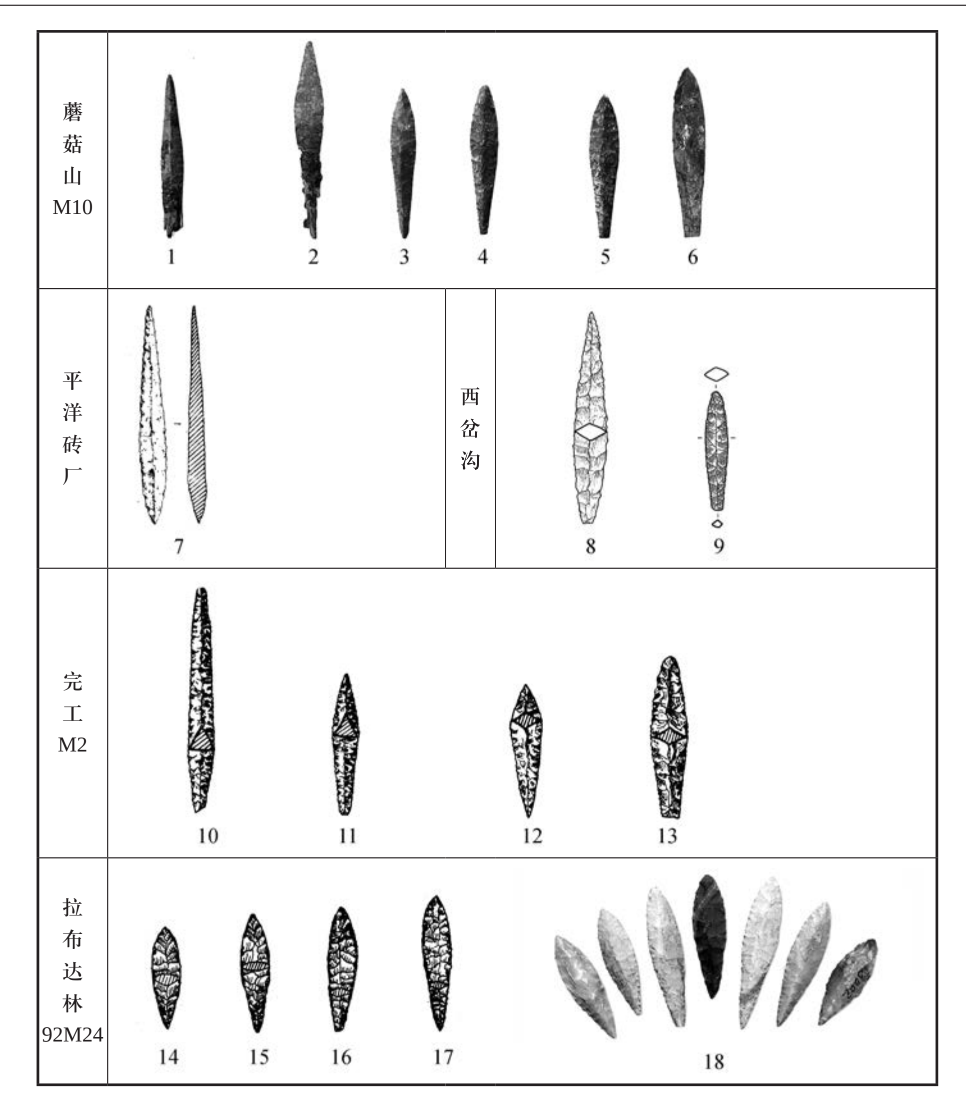

图一〇　蘑菇山 M9、M10 器物断代对比图

1. 蘑菇山 M9　2. 拉布达林 92 M10　3、6～11. 蘑菇山 M10　4. 伊沃尔加 M55　5. 伊沃尔加 M160
12. 伊沃尔加城址　13、14. 德列斯图依墓地 M123（1、2. 陶碗　3～5. 大口深腹陶罐　6. 铜泡　7、8. 铜环
9、12. 管銎铜镞　10、11、13、14. 三翼铁镞）

M10 随葬的 1 件青铜双翼管銎镞的器身近矛形（图一〇，9）。这种管銎铜镞在西汉早期晚段至西汉中期的西岔沟墓地 M59、伊沃尔加城址均有发现（图一〇，12），数量也非常少，两地均只发现 1 件，与蘑菇山 M8 所出的形制基本相同。

M10 出土 2 件三翼铁镞，均无凸尖（图一〇，10、11），前文对蘑菇山 M6 的同类三翼铁镞的对比分析已经说明，这种无凸尖的铁镞是西汉时期匈奴墓葬流行的铁镞形制，见于外贝加尔西汉匈奴遗存（图一〇，13、14）。

蘑菇山 M10 共发表 6 件石镞照片，有三种形制，西汉时期在东北地区西部发现的石镞中均可见同类者。第一种石镞只有 1 件，器身细长近柳叶形（图一一，1），见于年代在西汉中期前后的平洋砖厂 M107（图一一，7）、西汉早期晚段至西汉中期的西岔沟墓地（图一一，8）、西汉中期前后的完工墓地 M2（图一一，10）。第二种石镞共 3 件，器身接近较窄的桂叶形，最宽处偏上，器身下半部略窄（图一一，2～4）。在完工 M2 有 1 件与之类似形状的石镞（图一一，11）。第三种石镞的器身上半部为柳叶形，下半




图一一　蘑菇山 M10 石镞断代对比图

1～6. 蘑菇山 M10　7. 平洋砖厂 M107　8. 西岔沟 M45　9. 西岔沟 M23　10～13. 完工 M2
14～17. 拉布达林 1992 年发掘 M24（线图）　18. 拉布达林 1992 年发掘 M24（照片）

内收形成较宽的梃，梃的底部平直（图一一，5、6），这种形制的石镞见于西岔沟墓地（图一一，9）、完工 M2（图一一，13）。蘑菇山 M10 三种形制石镞的组合，与完工 M2 的基本相同（图一一，10～13）。但是完工 M2 较蘑菇山 M10 多了一种器身较宽的近菱形的石镞（图一一，12），这种镞应该是第二种形制石镞变宽、变短后的形制。到东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一方面随葬石镞的鲜卑墓葬数量明显减少，另一方面石镞的形制锐减，只有一种器身较宽、最宽处略偏上的桂叶形石镞，即应为从上述第二种形制的石镞发展而来的形制。如拉布达林墓地 1992 年发掘的 M24 共出土 7 件石镞，形制均为较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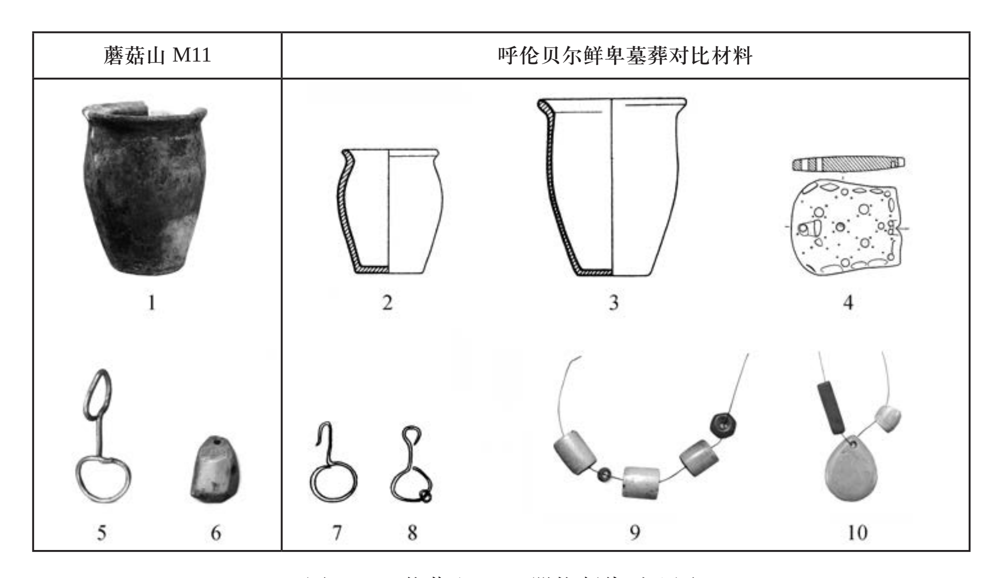
的桂叶形（图一一，14～18）[①]。该墓随葬5枚新莽时期的大泉五十，据此可知墓葬的年代在新莽至东汉早期。根据以上对比可知，蘑菇山M10的石镞形制、种类与西汉时期东北地区西部墓葬发现的石镞最相似，与东汉时期的有明显差别，其中与完工M2的最接近。根据完工墓地的年代，可将蘑菇山M10石镞的年代定为西汉中期前后。

根据以上对青铜环、铜泡、铁镞、青铜镞、石镞的对比分析，特别是三种质地镞的对比分析，可知蘑菇山M8的年代应在西汉早期晚段至西汉晚期期间，在西汉中期前后的可能性最大。

# 十一、蘑菇山M11

该墓随葬品中的陶罐、金耳饰、绿松石珠子和坠可以作为断代依据。

M11随葬的大口深腹陶罐器身瘦长，肩部略外弧，最大腹径偏上（图一二，1），其




图一二　蘑菇山M11器物断代对比图

1、5、6. 蘑菇山M11　2. 扎赉诺尔1986年发掘M3003　3、4. 扎赉诺尔1986年发掘M3012　7、8. 拉布达林92M5　9、10. 拉布达林1992年发掘墓葬（1～3. 大口深腹陶罐　4. 煤精带扣　5、7、8. 金耳饰　6. 绿松石坠　9. 绿松石珠和玛瑙珠　10. 绿松石坠、绿松石珠和玛瑙管）

①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384～396页。线图来源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额尔古纳市卷》，文物出版社，2019年，76页。照片来源于此。

形制特征与扎赉诺尔墓地 1986 年发掘墓葬中的一部分大口深腹罐最接近（图一二，2、3）。在扎赉诺尔 1986 年发掘的 M3012，与上述大口深腹罐共出的还有嵌宝石的椭方形煤精带扣，带扣的两侧边缘略内凹（图一二，4），这是东汉时期椭方形带扣的形制特征，据此可将扎赉诺尔 M3012 断为东汉时期的墓葬[①]。蘑菇山 M11 大口深腹陶罐的年代也应该与此接近。

M11 随葬的金耳饰为一根金丝两端各弯成环形。底部的环较大，金丝一端与在环开口处只与另一侧的金丝有一小段重叠，没有缠绕在立柱上（图一二，5）。这种耳饰形状和结构与拉布达林 1992 年发掘的 M5 出土的 2 件金耳饰的形状和结构很相似（图一二，7、8）。拉布达林 92M5 出土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文字字体较方正的昭明镜。在可断代为东汉中晚期的三道湾墓地等地也出此类金丝弯成的耳饰，但是耳饰下半部的圆环均用金丝的一端缠绕在立柱上，而不是与环的另一侧对接或重叠。所以，M11 的这件金耳饰与拉布达林 92M5 的形制最接近，年代也应与其相当，即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或东汉前期。

M11 出土 1 件绿松石坠，坠的表面磨制光滑，形状规整，上端坠体变薄，中部有一穿孔（图一二，6）。西汉时期的外贝加尔匈奴墓和完工墓地发现的绿松石坠均形制不规则，没有加工出规整的形状（详见上文 M5 断代分析）（图六，9）。形状规整经过精细加工的绿松石坠饰和珠子见于拉布达林墓地，发表的耳饰彩色照片资料虽然没有说明绿松石珠子和坠的出土单位[②]，但是根据发掘简报发表的线图可知绿松石坠和珠子均出自该墓地 1992 年发掘的墓葬（图一二，9、10）。这批墓葬出土的中原式铜镜和货币的年代均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这些绿松石珠子和石坠的年代也应该在这一时期。可见，从西汉至东汉前期，匈奴及受其文化影响的鲜卑墓葬随葬的绿松石珠子和坠饰形制发生了明显变化，经历了从不加工定形到器表磨制工整的变化过程。蘑菇山 M11 的绿松石坠加工工整、器表磨光，其年代应与拉布达林墓地的同类器物年代相同，即在西汉晚器至东汉前期。

根据以上对陶罐、金耳饰、绿松石坠饰的对比分析，可将蘑菇山 M11 的年代定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 十二、墓地年代、分期及文化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蘑菇山墓地已发掘的 11 座墓葬年代范围为西汉早期晚段至东汉时期，其较晚墓葬年代在东汉前期的可能性最大。具体情况见表一。

① 潘玲：《两汉时期北方系统腰带具的演变》，《西域研究》2018 年 2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 · 额尔古纳市卷》，文物出版社，2019 年，76 页。照片来源于此。

**表一　蘑菇山墓地 11 座墓葬断代表**

| 墓号 | 年代 | 断代器物 |
| --- | --- | --- |
| M1 | 西汉 | 陶鍑 |
| M2 | 西汉 | 陶壶 |
| M3 | 东汉前期 | 石镞、有凸尖的三翼铁镞、铁腰带具 |
| M4 | 新莽至东汉 | 马形金牌饰、铁腰带具 |
| M5 | 西汉（也可能晚到新莽时期） | 镂空动物纹铜牌饰、绿松石坠、铜环 |
| M6 | 西汉（最可能为西汉中期前后） | 三翼无凸尖铁镞、銎孔式骨镞、分体骨弓弭 |
| M7 | 西汉中期左右至东汉早期 | 扁梃长骨镞、陶罐 |
| M8 | 西汉早中期 | 陶罐、近 U 字形玛瑙坠、铜泡、腰带上的金箔包片 |
| M9 | 新莽至东汉前期 | 陶碗 |
| M10 | 西汉早期晚段至西汉晚期 | 陶罐、铜环、铜泡、三翼无凸尖铁镞、管銎铜镞、石镞 |
| M11 | 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 陶罐、金耳饰、形制规整的绿松石坠 |

蘑菇山墓地发掘的 11 座墓葬中，有 5 座年代在西汉时期、4 座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2 座可能是西汉至东汉早期。其中 M4 因铁腰带形制不详，只能粗略断在新莽至东汉。但是参考其他 4 座可晚到东汉时期墓葬的年代，推测该墓年代应不会晚过东汉前期，即在新莽至东汉前期的可能性最大。可见这 11 座墓葬的主体年代偏重西汉时期。墓地延续时间接近二百年。可进一步将这 11 座墓葬分为两期，早期有 5 座墓葬，年代为西汉早中期至西汉晚期；晚期有 4 座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有 2 座墓介于两期之间。

蘑菇山墓地的陶器以大口深腹罐为主体，墓葬的二层台上横搭木板和梯形的木棺，流行随葬弓箭，这些特征在墓地一直延续，并且与呼伦贝尔地区同时期的鲜卑墓葬特征保持一致。这说明蘑菇山墓地是一座连续发展的鲜卑文化墓地。蘑菇山墓地整体年代明显早于呼伦贝尔地区的拉布达林、扎赉诺尔等鲜卑墓地，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鲜卑墓地。

蘑菇山墓地早期墓葬的自身文化特征不明显，陶器、矩形镂空动物纹牌饰、铁镞、弓弭、玛瑙坠和绿松石坠饰明显受匈奴文化影响，骨镞和石镞来自呼伦贝尔地区及邻近地区的汉书二期文化，铜泡和扁体铜环也与汉书二期文化相同。这一时期应为鲜卑文化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目前可确定属于这一时期的鲜卑墓葬只见于蘑菇山墓地。这说明此时的鲜卑是一支人数较少、自身文化特征不明显、明显受到周边人群文化影响的势力较弱的北方部族。

蘑菇山墓地晚期墓葬随葬双马形牌饰、一根金丝弯成的耳饰、敞口碗等不见于其他文化遗存的鲜卑文化特有器物，大口深腹陶罐的形制也与匈奴的差别明显，与本地其他鲜卑墓葬的大口深腹罐形制趋同。这说明在蘑菇山墓地晚期，鲜卑的文化特征已经形成。此时鲜卑墓葬在呼伦贝尔地区分布范围也明显扩大，出现拉布达林、扎赉诺尔等规模较大的墓地。这反映出此时鲜卑的部族规模和分布范围明显扩大，摆脱了周边势力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的族群。

# 十三、学术意义

蘑菇山墓地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鲜卑文化墓地，它的发现，将鲜卑在呼伦贝尔地区出现的时间提早到了西汉早期。这在鲜卑历史研究中有重要意义。

西晋时期王沈著的《魏书》记载鲜卑和乌桓是东胡后代，东胡在秦汉之际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而分别逃往两处，各以所到达地区的地名为族名[①]。这是最早的关于鲜卑和乌桓族源的记载。但是，该文献出现的时间已经距离冒顿打败东胡的时间约五百年，其中是否有演绎的成分？这一记载在西晋时期是否有文献依据？这些都值得怀疑，因为两汉时期成书的《史记》和《汉书》均没有涉及鲜卑和乌桓族源问题。对相关考古遗存的研究成为解开这一谜团的唯一途径。

如今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现可早到西汉早期的属于鲜卑的蘑菇山墓地，在该地区有同一时期的以汉书二期文化为主体的完工墓地[②]，有南迁到辽宁中北部的以汉书二期文化为主体的西岔沟墓地[③]。上述三处墓地年代均不晚于西汉中期，均受到匈奴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匈奴势力确实在西汉早期对东北地区北部人群造成巨大冲击，导致实力强大的以松嫩平原西北部为基地的汉书二期文化在当地迅速衰落，其中的一支伴随着匈奴的文化影响，南下到位于辽东西汉塞外的西丰西岔沟墓地一带[④]。从时间、地点和文化特征三个方面分析，汉书二期文化人群，最有可能是被匈奴打败后迁走的乌桓。呼伦贝尔地区没有发现早于蘑菇山墓地的同类遗存，目前这里只发现蘑菇山墓地这一处主体为西汉时期的鲜卑墓地。所以，留下蘑菇山墓地的鲜卑人，有可能是从呼伦贝尔地区以西的俄罗斯东外贝加尔地区或蒙古国东北部一带，因受匈奴打击而进入呼伦贝尔地区南部，并在两汉时期在此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就是说，鲜卑被匈奴打败后，从西向东迁徙到今呼伦贝尔地区，在那里停留近三百年后才开始大批南下；乌桓被匈奴打败后，其中的一支从北向南迁到今辽宁中北部的西丰一带。

可见，王沈对鲜卑和乌桓族源的记载，不是凭空的演绎，应该有文献或史实依据。但是他的观点有一点与考古发现相矛盾，即考古发现证明乌桓和鲜卑并非同源，两者人群的主体体质特征分别为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和蒙古人种东北亚类型，虽然两者都有北亚

① 《三国志》第30卷《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中引用王沈的《魏书》内容，中华书局，1959年，832、833页。

② 潘玲：《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年9期。

③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丰西岔沟墓地》，文物出版社，2021年。

④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丰西岔沟墓地》，文物出版社，2021年。

蒙古人种的成分，但是所占比例明显有别[①]。文化特征也与体质特征类似，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主体特征明显有别。所以，鲜卑和乌桓应该是最初居住地域邻近、文化上有联系的两支来源不同的族群。

附记：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早期鲜卑遗存研究”（项目编号：16JJD780006）的成果。

## A Study on the Chronology of Mogushan Cemetery of Xianbei

Pan Ling　Tan Wenyu

**Abstract:** The archaeology material of Mogushan cemetery has been published relatively completely, which provides the basis for further chronological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from eleven tombs that can be dated, the excavated tombs in Mogushan cemetery can be divided into early and late periods. The early tombs include M1, M2, M5, M6, M7, M8 and M10, and their dates are mainly in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earliest M8 can be dated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tombs of the late period, including M3, M4, M9 and M11, were dated from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self-specif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Mogushan are not obvious, and they we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Xiongnu and the second period Hanshu culture. In the tombs of a late period, utensils peculiar of Xianbei culture appeared. The dating of the early tombs in the Mogushan cemetery advances the time of Xianbei appearing in the Hulunbuir area to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also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origins of Xianbei and Wuhuan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Keywords:** Mogushan cemetery; Xianbei; choronology; ethnic origins

① 朱泓：《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文物季刊》1998 年 1 期。朱泓：《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北方文物》1989 年 2 期。

# 关于游牧国家的理论反思

## ——以匈奴帝国为例

张　炼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摘要：**西方人类学界一般认为，游牧社会因为其“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保持了一种以分裂与平等为核心特征的“分支性组织”；其建立的国家因此松散而脆弱，与农耕社会截然不同。但是，重新梳理文献与考古资料，考察匈奴帝国的形态特征，发现其社会相当分化，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已形成分封制和官僚制度；通过和亲政策，匈奴帝国向汉帝国展示了它的强大与对等地位。匈奴帝国相当稳固，尽管中间经历了几次分裂，其政权前后延续了三百年之久。所有这些特征，与同时期的汉帝国大同小异。因此，在研究游牧国家时，更应关注其国家特征而不是游牧特征；同时，不能完全依赖民族学材料，还要充分利用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这些是研究游牧社会复杂化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匈奴帝国　游牧国家　分枝性组织　国家理论　游牧－农耕关系

## 一、引　　言

公元前一千纪后期，匈奴人在蒙古草原上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帝国，在游牧社会的发展史上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但是，在过去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受学术背景、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关心的主要是农耕民族，而不是游牧民族。在我国有关匈奴帝国的研究中，人们大多关注其政治史和物质文化，而较少关注其国家形态。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我国学者一度探讨了匈奴帝国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问题。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游牧社会；但是在人类学理论的长期熏陶下，他们着重研究游牧帝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它们与农耕帝国的互动关系。他们的学术著作逐渐进入我国，影响了我国学术界，但是其局限性也随之暴露出来：他们因为关注游牧社会“独特”的结构特征，而忽视了游牧国家普遍的“国家”

特征。关于匈奴帝国的研究亦然。因此，本文通过梳理西方人类学理论存在的问题，同时利用考古及历史文献材料，重新考察匈奴帝国。为此目的，本文将从社会分化、官僚制度、宗教活动以及对外关系四个方面来剖析匈奴帝国的国家特征，完善我们对游牧社会形态的认识。

## 二、游牧社会的“独特性”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受斯大林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影响，我国的一些学者讨论了匈奴帝国的社会形态。一些学者认为，匈奴帝国在对外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人口作为奴隶，其社会形态是奴隶制[①]。另一些学者指出，匈奴帝国中奴隶的数量远低于学者们的推测，难以支持其正常的经济生产；因此匈奴帝国并没有经历奴隶制，而是直接过渡到了封建制[②]。此后，双方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③]。总体而言，“封建制说”后来居上，占据主流。但是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与国外研究成果的引入，一些学者认为应摆脱五种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束缚，更多地关注游牧社会的独特性[④]。

西方人类学家先一步注意到了游牧社会的独特性。他们认为，游牧社会因其高度流动的经济生产方式而保留了早期游团、部落社会的结构特征，即“分裂”与“平等”[⑤]。前者指游牧社会像树干一样逐级分枝，不过它既可以分裂，也可以组合，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后者则指游牧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单个家庭或多个家庭组成的牧团——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政治体的规模具有极大的弹性。他们会因生产需要、环境刺激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当面临竞争与挑战时，多个家庭或牧团会联合结成更大的集团，如部落、氏族；一旦这些挑战消失，则集团分裂，再次回到单个家庭、牧团；由于游牧经济的流动性，每一个家庭或牧团也随时可能退出大一级的集团。总体而言，各个基本组成单位是相互平等、独立自主的。在极度贫瘠或极端易变的环境中，家庭或牧团倾向独自生产，其行动也就更为独立自主。为了应对挑战或对外扩张，他们会形成部落，产生常设的、有极高政治权力的部落首领。相应地，一旦没有了这些需

---

①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11 页。

② 欧阳熙：《匈奴社会的发展》，《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 年，251 ~ 277 页。

③ 王庆宪：《匈奴人口的计算方法与其社会制度》，《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 年 3 期。李春梅：《匈奴政权的社会性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 年 3 期。

④ 马利清：《匈奴社会形态再析》，《中州学刊》2011 年 6 期。

⑤ Emanuel Marx. The tribe as a unit of subsistence: nomadic pastor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77, 79 (2): 343-363．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55 ~ 61 页。

求，部落就会解体，部落首领就会消失[①]。因此，这些部落归根结底是众多的家庭、牧团因现实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性组织。血缘发挥一定作用，但在实际生活中，部落也能通过选择性遗忘或更改记忆来融合事实上与其没有亲缘关系的群体。因此，血缘只有表面上的重要性[②]。

涂尔干最早将这种树枝形的社会组织称为“分枝性组织”（Segmental Organization），用来描述相似性极大的、由“同质的大众”构成的早期社会组织[③]。塞维斯等人类学家接受了这个术语，用来描述游团、部落时期的社会组织[④]。研究游牧文明的学者又将其用于游牧社会的分析之中[⑤]。他们根据民族学调查资料提出，每个时期游牧社会的组织和行动都具有“分裂”与“平等”的特点，游牧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也不例外。这些学者认为，促成游牧部落联合成为游牧国家的主要因素来自外部。以中国北方的游牧国家为例，它们“只是在当有可能将其自身与中原经济相联系时方能存在”[⑥]。游牧人群常年流动，并且分散居住，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只是其发展中的特例。一旦游牧国家崩溃，游牧人群又会回到原有的分裂状态。换句话说，游牧国家本身是不稳定的，它的国家特性是服从于它的游牧特性的。在这样的解释模式下，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游牧国家看作是“阴影帝国”（Shadow Empire），将它与周边农耕国家的交互过程视为共同进化（Co-Evolutionary）的典型案例[⑦]。

一些匈奴史的研究者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狄宇宙认为，汉帝国的扩张为匈奴带来了“危机”，为冒顿这一新首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是游牧人群政治集权化的“催化剂”[⑧]。而在帝国的运作方面，巴菲尔德提出了“外边疆战略”，认为匈奴帝国维持经济与政治稳定的途径就是开发草原以外的资源。通过掠夺与和亲制度，匈奴从汉地获取

---

① Marshall D. Sahlins. The segmentary lineage: 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61, 63 (2): 322-345.

② Gulliver P. H. *The Family Herd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5: 100-117.

③ 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135～142 页。该译本将 Segmental Organization 译为“环节组织”。

④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141.

⑤ 这些材料通常来自那些被认为仍处于典型游牧社会的族群，如阿尔泰山及周边地区的蒙古人、哈萨克人等。部分相关材料可参见 Lawrence Krade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The Hague: Mouton, 1963.

⑥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11 页。

⑦ 对这一观点发展历程的梳理，可参见 Walter Scheidel. The Xiongnu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mpire // Ursula Brosseder, Bryan K. Miller, eds. *Xiongnu Archaeology*.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2011: 111-120.

⑧ 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205～209 页。

了农产品与人口，使帝国不稳定的游牧经济得到了足够的补充；来自草原之外的奢侈品则集中在单于的手中，掌握这些财富的分配成为其维持政治地位的重要保障。而在帝国内部事务的处理上，协商则是主要途径，因为帝国的整体权力是分散的。在他看来，匈奴帝国是一种“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y）①。在王明珂的笔下，游牧社会的“分裂”与“平等”更是与国家体制下政治权力的集中、社会等级的分化构成了匈奴帝国乃至后期草原帝国的一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最终造成了匈奴帝国的内乱与覆灭②。

然而，将游牧国家的产生归因于外部的挑战，而对于游牧社会本身的复杂化关注不多③。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来自这些研究的人类学倾向。由于游牧人群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关于他们的记载主要来自农耕文明。这种局限迫使学者们将目光集中到民族学材料上。在工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游牧人群仍然存在。但是我们需要明白，游牧人群在历史上虽然曾经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如匈奴、突厥和蒙古），征服了农耕人群，但是实际上遭到不断扩张的农耕人群的排挤，丧失了很多原来的领土；工业革命以后他们更是处于劣势。今天这些“纯粹的”游牧人群要么依附于工业社会而存在，要么处于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分裂”与“平等”无疑是这两种特定状态的游牧人群最为突出的特点，但是把这种状况投射到古代的游牧人群上恐怕不妥。

事实上，在上述游牧人群的研究中，考古材料是严重缺位的。这是因为，有关游牧人群的考古工作长期得不到重视，发掘资料相当有限，只是 21 世纪以来才有大幅度的增加，而其他背景的学者限于学科和语言壁垒，没有充分利用俄罗斯和蒙古国的游牧人群发掘资料。早在 19 世纪，考古学家就在外贝加尔和漠北发现了匈奴的墓地，此后新发现不断，既有墓地，也有城址④。但是因为学科和语言的限制，这些发掘资料没有得到西方和我国学者的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我国境内也发现了一些匈奴墓地⑤。可惜的是，我国、俄罗斯和蒙古国学者主要关注不同地区匈奴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寻找匈奴人的发源地，不太重视匈奴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生活。

20 世纪末以来，美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加入匈奴考古中来，带来了新的

①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46 ~ 76 页。

②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147 ~ 156 页。

③ 在巴菲尔德眼中，马克思主义范式下对游牧国家起源的解释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其线性的进化观与游牧社会的发展情况并不吻合，因此其从内部阶级关系展开的分析也是站不住脚的。本文认为，早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研究确实存在着这种教条刻板的倾向，但内部分析的视角仍有极大的价值，不应简单地放弃。相关论述参见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6 ~ 11 页。

④ С. И. 鲁金科，孙危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中华书局，2012 年，7 页。

⑤ 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3 ~ 8 页。

发掘技术、研究方法及理论。最近几年，不断有学者提出了有关游牧国家形成的新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公元前一千纪欧亚草原各区域的游牧人群已独自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制度[①]。这种趋势在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中逐渐强化，最终促使了游牧国家的产生[②]。从这个角度来看，游牧国家的产生实际上和一般理论中早期国家的产生大体上是相似的，都是内部社会复杂化和外部交流、竞争这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游牧的特性只是使得国家产生的具体情况与其他文明有细微的不同。如此看来，游牧社会并不是那么独特。

那么，游牧国家又与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国家有着多大的不同呢？下文将以考古学材料为主，结合历史文献，从匈奴政治的复杂化入手，具体考察匈奴社会的国家特征。马克思主义将国家定义为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③]，准确地指出了国家的两大政治属性，一是阶级与社会等级的分化，二是阶级间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确立，具体表现为军警、官僚系统等统治工具的出现。本文对匈奴社会国家特征的考察自然从这两方面展开。除此之外，匈奴社会日常的宗教仪式反映了政治的影响，而匈奴社会的对外关系则更体现了其政治的成熟。简而言之，对内，匈奴愈加集权；对外，匈奴愈加独立。由此可知，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国家与农耕国家的共性远比过去认为的要多。

## 三、社会分化与中央权力的集中

从墓葬材料来看，在匈奴帝国建立之前，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并未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人们一般认为匈奴人群起源于石板墓文化。在已发掘的该文化墓地中，墓葬数量都不大。根据统计，截至 1998 年，一共发掘了 211 个墓地的 570 座墓葬。每个墓地一般包含 10 座墓葬，只有少数几座墓地的墓葬数量多达几十。这些石板墓之间的形制和大小差异也都不大。它们的年代则大致为公元前 13 ~ 前 6 世纪[④]。这说明了在匈奴帝国以前，蒙古高原活跃着一个个小单元组成的牧团，它们在绝大多数时间独立生活，社会内部也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异。这与上文提到的“典型游牧社会”相类似。

---

① Frachetti M. D. Multiregional emergence of mobile pastoralism and nonuniform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cross Eur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2, 53 (1): 2-38.

② 可参见 Rogers J. D. Inner Asian States and Empires: theories and synthesi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12, 20 (3): 205-256. William Honeychurch. Alternative complexities: the archaeology of pastoral nomadic stat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14, 22 (4): 277-326. 二者主要观点相似，但前者对十六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展开了研究，后者则主要以匈奴为研究对象，同时还关注了交通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

③ 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 年，6 ~ 15 页。

④ A. Д. 策比克塔洛夫著，孙危译：《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商务印书馆，2019 年。

而在人们一般认为是早期匈奴人群活动区域的鄂尔多斯，汉代以前墓葬的随葬品显示出极其明显的财富集中[①]。一些高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银装饰品，包括各种制作精美的装饰片和金银环等。有的墓葬还出土了由多种颜色宝石制成的串珠。由青铜制成的各类武器、生活用具则更为常见。这些墓葬通常随葬大量羊、马等与游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同样显示了墓主人生前对游牧资本的高度占有。相对地，低等级墓葬只随葬少量日用品。

帝国时期的匈奴墓葬进一步显示出系统的等级分化。它们的年代主要为公元前 3 世纪末至公元 1 世纪。按墓葬在地表上的形制，我们可将其分为圆形石堆墓和甲字形土堆墓两类。一般而言，前者等级较低，数量多，见于所有匈奴墓地；后者等级较高，数量少，只见于部分墓地。单月英又按照墓葬形制、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特征等因素，将这些墓葬划分成四个等级：第一等级的墓葬以两椁一棺、大量随葬品为特征，等级最高，墓主人应属于匈奴王族或高级贵族；第二等级的墓葬为一椁一棺墓，墓主人应为贵族；第三等级的墓葬多为单棺墓或石椁（棺）墓，墓主人应属于低等贵族或一般成员；第四等级的墓葬则基本无葬具，墓主人应属较为贫穷的群体[②]。

蒙古国后杭爱省的塔米尔（Tamir）墓地是一处典型的匈奴贵族墓地[③]。该墓地位于鄂尔浑河与塔米尔河汇流处，经 2005 年开展的调查可知，其由 287 座圆形石堆墓组成。但这些墓葬规模各异，直径从 2 米到 12 米不等，最常见的规格有 4 米、5 米、3 米及 6 米。大型墓较少，直径达 12 米的墓葬只有 1 座。靠近塔米尔河岸的墓葬直径均较小，而远离河岸的墓葬则大小各异，且分布更为密集。考古工作者对其中 5 座墓葬展开了全面的发掘，揭示了该墓地的部分情况。这 5 座墓都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极为丰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铁器、青铜器，以及一些丝织品，还发现了产于汉地的漆器、铜镜与五铢钱。该墓地的年代也主要依据这些汉地产品来判断，其中铜镜将塔米尔墓地的年代上限定在了西汉中期[④]。单从已发掘墓葬来看，随葬品的精细程度、价值高低与墓葬的规模有一定的正比关系。这 5 座墓葬中，只有最大的 M109 发现了金器。据此，我们推断此墓地内部也存在着细微的等级分化。此墓地极大的规模、丰富的随葬品、处于额尔浑河谷的地理位置，以及其附近的 3 座带土墙的聚落遗迹，都暗示着它是一处匈奴高级贵族墓地。无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此墓地的遗迹遗物无疑反映了匈奴上层阶级对财富的高度占有。

---

① 对相关材料的总结可参见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年，268 ~ 287 页。

② 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 年 1 期。

③ 相关材料参见 David E. Purcell, Kimberly C. Spurr.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f Xiongnu sites in the Tamir River Valley. *The Silk Road*, 2006, 4 (1): 20-32. David E. Purcell. Maps of the Xiongnu Cemetery at Tamiryn Ulaan Khoshuu, Ogii nuur, Arkhangai Aimag, Mongolia. *The Silk Road*, 2011, 9 (1): 20-32.

④ Guolong Lai. The date of the TLV mirrors from the Xiongnu Tombs. *The Silk Road*, 2006, 4 (1): 36-44.

被认为属于匈奴王侯贵族的甲字形墓则更直接显示出匈奴社会中巨大的等级差异。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北部及外贝加尔地区的墓地之中，其中诺音乌拉（Noyon uul）墓地和高勒毛都（Gol Mod）一号、二号墓地包含的甲字形墓最多。甲字形墓本身也有着等级差异，从规模上来看，最小的墓葬边长约为 8 米，最大的高勒毛都二号墓地 M1 边长则能达到 46 米[①]。大型甲字形墓的周围常呈环状分布有圆形石堆墓，应该是陪葬墓。在许多墓地中，最大的甲字形墓一般都位于最北端[②]。至今已发掘的甲字形墓中，规模最大的为外贝加尔布里亚特共和国南部查拉姆（Tsaram）墓地的 M7[③]。地表上的部分为 29 米 ×28 米的方形土堆，现存高约 1.5 米。土堆四周砌有石板，周围还存留着一些较完好的石柱。土堆内部被一条南北向隔墙和七条东西向隔墙分为九个独立空间，隔墙由原木堆砌而成。南部开有长达 20 米的墓道，其平面呈梯形。墓穴内部的四壁上有台阶，逐层向内收缩。墓葬填土中发现四层石板，最上层及第二层下设置有稻草，第三层与第四层之间则含有卵石、木炭、桦树皮及一些稍小的石块。在第三层的北缘还发现了多种家畜的骨骼，包括马、牛、羊等。第四层石板直接盖在棺椁之上。墓内葬具为木制棺椁，有内外两重木椁及一重木棺。在墓穴及棺椁内都发现了大量陪葬品，包括位于土堆下方的汉式铜镜碎片、位于第三与第四层石板之间的完整汉式二轮马车，以及棺椁中的大量马具、人偶、漆器、青铜器、金银制品等。显而易见，对于这类甲字形大墓来说，无论是墓葬的内外布局与结构，还是其中的各式随葬品，都是经过精心布置的。据对高勒毛都二号墓地甲字形大墓陪葬墓的发掘可知，这些陪葬墓一般都是同时的，即其死者都是同时殉葬的[④]。大型甲字形土堆与陪葬墓的丧葬仪式的预设观众是生者及后世之人，通过营造这样一种带有纪念碑性质的大型墓葬，贵族权力的特殊性、崇高性深入人心。而墓葬内里复杂的布局与大量的珍贵随葬品，则是对墓主人生前财富、权力的一种反映。来自汉地的铜镜、漆器、马车，以及带有西亚元素的各类金银器，都体现了墓主人对长距离贸易的控制。在前现代社会，国际贸易

---

① Ursula Brosseder. Xiongnu terrace tomb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as elite burials // J. Bemmann, H. Parzinger, E. Pohl, D. Tseveendorj, eds.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09: 249-256.

② Sergei S. Miniaev, Julia Elikhina.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Noyon uul Barrows. *The Silk Road*, 2009, 7 (1): 21-30.

③ 相关材料参见 Miniaev S. S., Sakharovskaia. L. M. Investigation of a Xiongnu Royal Tomb Complex in the Tsaraam Valley. *The Silk Road*, 2006, 4 (1): 47-51. "Investigation of a Xiongnu Royal Complex in the Tsaraam Valley Part 2: The Inventory of Barrow No. 7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Site. *The Silk Road*, 2007, 5 (1): 44-56.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 2 号墓地 M189 陪葬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8 年 2 期。

若没有中央政府的组织，其规模是很难扩大的。而通过开展这些贸易活动，其控制者获得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因控制贸易而来的权力[①]。反观匈奴墓葬中常见的低等级无葬具墓，与之差距极大，足以证明匈奴帝国社会中高度的阶级分化。

至于权力是如何集中的，历史文献向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在历史文献中，匈奴社会的变迁主要是个别精英的行为造成的。这类史料的可靠性高低不等，但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社会变迁的脉络。具体而言，匈奴的统治者要实现政治权力集中，首先需处理的就是带有分权性质的早期游牧部族体制，而其采取的主要手段则是建立威权统治与官僚体系。他们首先通过武装斗争和对外扩张等政治手段，提升了对各部族的控制力，建立起“无上的”权威和政治合法性。之后则又通过创立一套初步的官僚政治制度，取代原有的部族政治，真正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匈奴帝国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这些举措始于头曼单于。头曼之所以见于汉文文献，部分是因为有冒顿弑父继位的史实，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已建立起了一个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头曼的具体行为因史料缺乏而无从考证，但他已拥有巨大权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头曼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论者常以此认为此时匈奴实力弱小。但事实上，秦始皇攻打匈奴时，仍“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②]，可见他对匈奴的重视。虽然头曼领导的匈奴战败了，但要应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十万秦军，头曼若是没有对其政权的足够掌控力，只会败得更惨，匈奴的整个国家组织可能都会再度分裂。与此同时，头曼还曾“欲废冒顿而立少子”[③]，这表明他已部分掌握了政权继承者的废立，这在早期匈奴部族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那时的领袖由各部推举产生。而继承头曼的冒顿进一步完善了匈奴政权，他统治的时期是匈奴政治权力集中的新高潮。冒顿在文献中是以富有魄力的领导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不惜牺牲“善马”“爱妻”以建立一支从令如流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冒顿成功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取得王位，且“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④]。他采用这种武装政治斗争的手段，彻底消灭了乃父的势力，并将自己的威望推上了高峰。此后，冒顿又借助与东胡的外交强化了贵族群体对“领土”的重视，整合了国内力量，并借此机会一举攻破东胡，继而东征西讨，以其政治手段和非凡战绩赢得了众贵族的拥戴，使其皆“以冒顿单于为贤”[⑤]。

自此以后，匈奴单于在国内的地位始终无太大波动，而他这种尊贵、权威的地位

---

① 权力与贸易之间其实更像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有的学者就认为对贸易的需求会产生对集权的需要，参见 Marshall D. Sahlins. The segmentary lineage: 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61, 63 (1): 322-345.

②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2886、2887 页。

③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2888 页。

④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2888 页。

⑤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2889 页。

也在其头衔中显现出来。匈奴祭祀的对象是祖先、天地、鬼神及日月，它们被认为拥有极强的力量，是万物的创造者，单于因此化身为“天之子”：“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①] 这种称呼也可能是受中原影响而产生的，在单于与汉帝的书信来往中，他们也常常自称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或“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 四、分封制和官僚制度

这样的历史背景为冒顿创立官僚政治制度提供了条件。而这一制度从根本上取代了部落的政治功能，匈奴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掌控由此提升了一个层次。依文献记载，匈奴帝国的疆域可分为三个部分：直辖匈奴中部的单于庭，管辖匈奴东部的诸左方王，管辖匈奴西部的诸右方王。单于是匈奴帝国的最高首领，总揽军政大权。单于庭内设左右骨都侯辅政，协助单于处理政务，呼衍氏、兰氏等政治家族成员担任主要官职[②]。西嶋定生在论及秦汉国家时曾指出，官僚制的特点就是非世袭，它否定了氏族世袭的政治制度，其母体即是氏族崩溃下游离的个人[③]。但是在匈奴帝国的官僚制度中，血缘仍有一定地位，其重要官职由一些氏族世袭，如呼衍氏、兰氏、须卜氏等（这点与西汉也相似）。自左右贤王至左右当户共有二十四长，各有分地，且都率领着数千至万人的军队。诸王以左右贤王为最大，其与左右谷蠡王均建庭，作为区域统治中心。二十四长各自行任命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等职务，形成一套完善的层级结构。诸王按照与单于的亲疏来任命，它们的继承名为世袭，但实际并不稳定，受单于控制。与之相对，诸王下的各级职位与中央一样，以外姓贵族为主。“诸王”拥有的权力主要为行政权，匈奴原有依氏族部落的分地制也因此发生变化，成为一种以贵族官僚系统为依托的原始分封制[④]。因此，匈奴帝国的官僚制度，虽然仍带有一些氏族社会的血缘残留，但是显示出了朝着帝制官僚体系发展的趋势。由此，上层形成了一个以单于为中心，由王族和贵族

---

① 《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 年，2457 页。

②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2890、2891 页。《汉书·匈奴传》中对匈奴政治制度的记载大体与《史记》相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和《晋书·四夷传》有更详尽的描述，但其对象主要为南匈奴，显示出匈奴政治制度在汉地的影响下的不断完善。

③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特质——皇帝统治之出现》，《中国上古史论文集》，华世出版社，1979 年，734～736 页。

④ 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1 期），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1987 年，74～82 页。

联合组成的官僚统治阶级[①]。

关于匈奴分封制下诸王治所的具体位置，国内许多学者曾做过历史地理研究[②]。但因时代所限，这些研究过于依赖文献，因此大多数结论都失之偏颇。单月英曾对匈奴墓地材料展开过分期与分区研究，将帝国时期的匈奴分为四个区域[③]。但这种分区的目的是将典型匈奴文化与边缘地区匈奴文化区分开来，匈奴核心区域（主要包括蒙古国全境与外贝加尔南部地区）都归为一区。这对研究匈奴政治的地域性帮助不大，但边缘地区中匈奴文化的强势从侧面反映了其时匈奴的强大。而有国外学者曾综合居址、普通墓地、甲字形大墓三类材料，将匈奴帝国时期的外贝加尔及蒙古高原地区大致划分成了十个区域。其中今天的蒙古国色勒格省与俄罗斯外贝加尔交界地区、蒙古国中央省地区以及蒙古国后杭爱省地区内的遗址复杂程度最高，且自然环境优越，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等级更高的区域性经济政治中心[④]。

从考古材料来看，匈奴统治地域内确实呈现出多中心且遗址等级分化的情况，文献中所描述的分封制得到了证明，但并不能与“诸王”封地一一对应。匈奴地方政治的现实显然更为复杂，且各区域发挥的功能也应有所差异。在单月英的分区中，蒙俄交界地区被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带有本地及汉地因素的伊沃尔加（Ivolga）遗址，以及稍南的以查拉姆遗址为核心的典型匈奴遗址群。前者包括城址及周边墓地，城内北半部有长期耕作留下的痕迹，南部则主要是房址及少量手工业作坊遗址。墓地位于城址东北 400 米处。房址与墓葬的等级普遍较低，且个体间差异极小。在遗址内出土了铁镬、铁犁等大量铁制农具[⑤]。实际上，外贝加尔地区并不是匈奴旧有的领土，冒顿单于之时才被征服。此地居民之前就从事农业，被匈奴控制后继而成为其农产品的重要来源之一。此后迁入的汉人又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农具及农耕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⑥]。伊沃尔加遗址南部的匈奴遗址群则显示出高度的政治复杂性，以查拉姆墓地、苏吉（Sudzha）墓地为代表，有着大量贵族官僚的高等级墓葬。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伊沃尔加遗址承担着匈奴帝国内部重要的经济功能，其南部不远的匈奴遗址即以此为依托，成为这一区域的政治中心。两处遗址共同塑造了该区域的重要地位。在匈奴分地制的安排下，有别

---

① 对于王族与贵族通婚及其政治影响的考察，可参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 年第 41 本第 2 分。

② 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可参见王兴锋：《百年来匈奴族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唐都学刊》2016 年 5 期。

③ 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 年 1 期，第 64、65 页。

④ Holotová-Szinek J.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Xiongnu territories in Mongolia // Ursula Brosseder, Bryan K. Miller, eds. *Xiongnu Archaeology*.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1: 425-440.

⑤ 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

⑥ 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0 年 4 期。

于传统游牧经济的农业生产也能在帝国的“经济区域”中存在，其对匈奴帝国运转起到的作用也愈发显著。这种与农耕国家的相似性自然在抱有“他者”目光的汉文文献中找不到记载。

在带有行政性质的“分地制”下，社会基层的传统游牧经济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游牧的核心是季节性的迁移。牧民通过在夏季牧场与冬季牧场之间转场，最大限度地延长畜牧的时间。在日常的游牧生活中，牧民每年活动的区域不会有大的变动。所谓游牧，实际上是在一定范围内以年为周期的季节性流动。这个范围可大可小，依具体的环境情况而定，最低能满足游牧者的基本生存需求即可。由于热量变化的情况不同，通常高山谷地中的游牧民活动范围小，草原戈壁中的游牧民活动范围大[①]。这种游牧空间的限制是来自自然的，但若遭遇特殊事件如战乱、自然灾害等，牧民也会选择离开原本熟悉的牧场。由于游牧资本本身就是移动的，游牧民族迁移的成本远比农耕民族低，迁移发生的频率自然更高。游牧经济的这种特性无疑不利于人群的聚合，上文提到的游牧社会的分裂性与平等性与之密切相关。因此，加强游牧经济中原有的固定性成了匈奴强化基层控制的主要手段。人为划分、限定游牧空间的分地制有效地完成了这一目标，因此被后期各个游牧国家所沿用[②]。草原上的游牧经济因国家的参与而增加了秩序，地方因争夺草场、水源而爆发的冲突无疑能够得到一定控制。这一制度下的匈奴牧民，便以若干家庭为单位，组成“瓯脱”，在自有分地之内展开游牧活动[③]。“坐盗者没入其家”，“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④]，匈奴律法和战争时的这些情况共同说明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并流行。而匈奴的收继婚制也与这种社会背景相适应，带上了“保留一家一族的个体家庭的劳动人手和增强家庭的生产力量的经济意义”[⑤]。匈奴家庭的具体结构也更为灵活多样，从文献上看，有多个对偶婚形成的复合家庭、一夫一妻及其子女的核心家庭、多个核心家庭联合形成的扩大家庭等形式[⑥]。

这些家庭在生活上都脱离了氏族组织的干预，独自生产生活，唯独在征收赋税和发动战争时与国家发生联系，其渠道则正是分地制下的贵族官僚系统。在特殊的日子里，国家通过“课校人畜计”的方法不断检验自己对民众的掌控。汉文帝时宦官中行说投

---

① 如生活在阿尔泰山脉的哈萨克族与生活在蒙古草原的蒙古族，相关民族学调查可参见阿利·阿布塔里普、汪玺、张德罡等：《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Ⅱ）——哈萨克族的游牧生产》，《草原与草坪》2012 年 5 期。乌日陶克套胡：《论蒙古族游牧经济的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 2 期。

② 韩茂莉：《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 4 期。

③ 陈晓伟：《“瓯脱”制度新探——论匈奴社会游牧组织与草原分地制》，《史学月刊》2016 年 5 期。

④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2892 页。

⑤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162 页。

⑥ 谢剑：《匈奴社会组织的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8 年第 40 本下册。

靠匈奴，并“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①，将汉地先进的户籍核算制度带进了匈奴帝国。有学者将 10 ~ 14 世纪修建于蒙古草原的大型单出口石城看作是游牧帝国为征收赋税而建设的②。已发现的一些匈奴时期的城址可能也有着相同的作用，如位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巴彦·温代尔城（Baian Under）③和蒙古国南戈壁省的曼加森·库里城（Mangasyn Khuree）④。它们都有着两重城墙，且外墙较为低矮，建造质量较差。这两座城现存外墙均超过一半，但都没有发现出入口。它们的防卫作用不大，很有可能是为了清点牲畜数量建的。而在战争之时，匈奴层级化的官僚结构使其能有效掌握帝国内部的人力资源。

总之而言，匈奴的地方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它解决了传统游牧经济不稳定的问题，并使之成功地掌控了基层，游牧的分枝性社会结构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 五、宗教活动的政治化

在宗教领域，匈奴帝国借由原有的宗教仪式发挥影响力，并以此强化国家建构与政治认同。这种对宗教仪式的利用几乎是每一个政治体在早期阶段都经历过的。通过利用原有的成熟的宗教仪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便能相对轻松地建立起来⑤。

匈奴帝国的宗教仪式主要是于正月、五月、九月进行的“大会茏城”的“蹛林”仪式⑥。颜师古注曰：“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⑦通过与民族学材料的比对，我们得知以自

①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2899 页。

② Wright Joshua. A possible archaeological case of the taxation of Medieval Eurasian nomad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015, 58 (3): 267-292.

③ Sergei V. Danilov. Typology of ancient settlement complexes of the Xiongnu in Mongolia and Transbaikalia // Ursula Brosseder, Bryan K. Miller, eds. *Xiongnu Archaeology*.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1: 130.

④ Chunag Amartüvshin, et al. On the walled site of Mangasyn Khuree in Galbyn Gobi // Ursula Brosseder, Bryan K. Miller, eds. *Xiongnu Archaeology*.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1: 509-511.

⑤ 如廖小东在分析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的政治因素后发现，国家祭祀首先源于原始宗教信仰，在这一过程中巫师的职责转由君主行使，该仪式活动背后的“公共权力”由此发挥出了极强的政治作用。参见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39 页。

⑥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2892 页。《后汉书》卷 89《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2944 页。

⑦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2892、2893 页。

然林木或竖起的树枝为祭坛，绕其周匝而祭天的祭祀仪式存在于许多北方早期民族之中[①]。如蒙古族的宗教圣坛鄂博（或称敖包），即为在石堆或土堆上插上柳枝而成。牧民们在鄂博前供奉牛羊、奶酒等物，接着排队绕坛数圈来完成整个祭祀仪式。许多其他游牧民族也都会以树木或枝条作为祭祀的祭坛，甚至是对象。因此，匈奴祭祀仪式的主要活动应即为“众骑”围着林木或竖起的树枝绕圈的“蹛林”仪式。这一仪式的主要目的是祭拜祖先、天地、鬼神，以求得风调雨顺、家畜繁殖等，其间还包括祈愿、走马、角抵等社会活动。

五月与九月的祭祀正处于北方草原的春秋二季，分别是游牧经济里一年两次转场的开始。此时一般的游牧部落都会集中起来举行规模最大的祭祀活动。除了宗教仪式活动之外，这种年度的集会也是牧民开展社会交往的场合。他们主动举行大型集会，以使民族聚合并乘此机会稍做休整，清点人畜，为接下来的转场做准备。而当这种集会的组织者转换为匈奴的官僚系统之后，它又为国家“课校人畜计”的管理行为提供了便利。但正月时的祭祀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首先其地点被明确为单于王庭，其参与成员也缩小为匈奴各部诸长，即各贵族官僚。在这样一个草木衰枯的时节，草原上的社交活动基本难以进行，因此有学者就推测正月的祭祀活动可能与汉地正月朝会的制度相当，匈奴单于庭的祭祀因此上升为国家祭祀，而与春秋两次大型祭祀活动并称为“三龙祠”[②]。正月的集会不只为祭祀，更是为聚集诸长，以商议国事。宗教与政治在此处相结合，原有的宗教上的认同也逐渐转换为国家的认同。在位于蒙古国中央省的特尔吉因·德罗夫尔钦城址（Terelzhiin Dörvölzhin）[③]及塔米尔墓地旁的三连城遗址[④]都发现了类似的大型祭祀建筑，包括中心的祭祀高台与将其包围的踏道、木制回廊。这些建筑都位于匈奴区域政治中心，结合周边墓葬的等级，它们应为重要的祭祀地点，极有可能是所谓的“龙城”。从最初简单由林木构成的“茏城”到复杂的祭祀建筑“龙城”，单于庭因此获得了政治与宗教双重层面上的崇高地位。而在南匈奴，祭祀的对象又加入了汉帝，整个祭祀过程与安排都能依照政治的利益进行调整。“议国事”的活动也被扩展到春秋的祭祀，整个匈奴的宗教仪式都被政治所侵入。每一次祭祀都由单于及贵族官僚统领，因此又为他们增添了宗教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

---

① 王其格：《匈奴“蹛林”与北方民族祭祀形态》，《论草原文化》（第 8 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 年，323 ~ 341 页。

② 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9 卷），中华书局，1993 年，1 ~ 36 页。

③ Sergei V. Danilov. Typology of ancient settlement complexes of the Xiongnu in Mongolia and Transbaikalia // Ursula Brosseder, Bryan K. Miuer, eds. *Xiongnu Archaeology*.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1: 132-136.

④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等：《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和日门塔拉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 年 5 期。

宗教仪式就这样被国家所借用而政治化，既为统治者带来政治权威与政治合法性，又成功地参与到匈奴国家认同的建设之中。

# 六、匈奴的对外关系

在现代之前，国家无法对国民实现“全景”式的掌控，只有在资源分配时二者才会发生互动。因此，集中资源并再分配的能力便是检验传统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就匈奴帝国在东亚世界的地位而言，它无疑是独立而强大的。

汉匈战争常被认为是游牧民族因对农耕社会物资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发动的。然而，日本学者内田吟风分析了文献记载的每一次匈奴入侵汉地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匈奴入侵汉地的原因极其复杂多样[①]。内田吟风反对的传统观点既是以农业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影响而成的，也是在前文提到的人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他的材料与论证告诉我们，匈奴与汉朝之间的战争，更像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时间保持敌对状态而发生的，而不是所谓游牧国家所采取的扩张与掠夺行为。实际上，在汉匈关系之中，匈奴多是处于弱势的。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定居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就曾开展过不间断的征伐[②]。这更像是中原各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延伸，而不太可能是防御性举措：其时各国生存的主要威胁显然来自同为华夏的其他诸国，而不是北方较弱的游牧民族。匈奴帝国从未大规模攻进汉帝国腹地，反而常被对方攻入漠北，甚至“燔其茏城”[③]。如此一来，汉匈战争可能更应从汉帝国一方找原因，将其归结为匈奴对汉地农业产品的依赖则有失公允。在长久的对立中，双方经济文化领域内的交流却从未间断。不只是汉地器物传入匈奴，草原文化的金属冶炼技术及其制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原文明的发展[④]。

不可否认的是，帝国时期的匈奴仍是其时亚欧大陆东部的强权之一。面对唯一能与其抗衡的汉帝国，匈奴通过和亲制度与其维持了相对的和平。其他国家要么处于匈奴势力范围之内，要么摇摆于汉匈两国之间。据《汉书》记载，在汉帝国控制西域之前，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以至于“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楼兰、车师甚至还“数为匈奴耳目”[⑤]。有的学者甚至

---

① 内田吟风著，童岭译：《古代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国家的原因——以匈奴史为例的考察》，《西域研究》2016 年 4 期。

② 如赵“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诸胡”，见于《史记》卷 43《赵世家第十三》，中华书局，1959 年，1809 页。此类史料广泛见于先秦文献关于北方诸侯国的记载之中。

③ 《史记》卷 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中华书局，1959 年，2959 页。

④ 杨建华、邵会秋：《欧亚草原东部金属之路的形成》，《文物》2017 年 6 期。

⑤ 《汉书》卷 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 年，3872 ~ 3876 页。

根据文献得出了新疆地区“几乎已是他们最主要的物资综合补给站”的结论[①]。从上文提到的考古材料看，这一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但匈奴对西域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极为强大。此时在吐鲁番盆地的考古学文化中，带有匈奴因素的奢侈品时有发现，反映了此时期西域诸国上层阶级与匈奴的密切交往[②]。而在匈奴东面，自冒顿攻破东胡之后，便再没有能与其争锋的国家。如乌桓，便“臣服匈奴，岁输牛马羊皮”[③]。匈奴的势力更是一直沿着欧亚草原延伸至阿尔泰地区，与西亚文明发生了物质上的交流。蒙古国北部地区发现的多座匈奴甲字形大墓即为证明，其中便既有来自汉地的漆器，也有明显来自西方的带角海马图银器[④]。这一幅员辽阔的草原霸权正是匈奴国家政治发展的结果。

## 七、结　　语

上面我们分析了匈奴帝国的中央集权、分封制和官僚制度、宗教活动和对外关系。从中我们能够发现，匈奴帝国已然建立起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社会政治体系及国家管理制度。通过各类权力运作，匈奴单于获得了远超其他贵族统治者的政治、宗教地位。原本能威胁这种地位的部落联盟政体又被新建立的血缘性较弱的官僚政体所取代。这一体系中各职位的政治合法性都来源于单于。在地方，原有的部落组织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名义上为军政长官的王族成员及实际上发挥着行政作用的异姓官员。汉帝国的一些行政方法随着高级汉人官员的入降被匈奴所学习，一些针对游牧经济的管理政策如分地制、“瓯脱”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在匈奴政治体制的成熟过程中，宗教活动成为极好的工具，既被用来提高单于的地位，又合理地为行政举措创造了条件。这样一种完善的国家政治体系给予了匈奴对外扩张的资本，并成功将其在北方草原的统治延续了三百多年。

然而，与南方汉地的早期国家相比照，匈奴的国家体制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西周虽以独特的血缘宗法体系建立起了周王的王权核心及层级式的社会体系[⑤]，但这种脱胎于特殊地理政治环境的统治模式却意味着高度的分权，并最终在外部势力入侵的压力下造成周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各地方封国的崛起[⑥]。而在匈奴帝国中，分封制下出自王

①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华夏出版社，2017 年，69 页。

② 张良仁、吕恩国、张勇：《吐鲁番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早期中国研究》（第 2 辑），文物出版社，2016 年，142 ~ 145 页。

③ 《后汉书》卷 90《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2981 页。

④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年，15 ~ 17 页。

⑤ 徐良高：《家国天下——西周的社会与政体》，《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 年，476 ~ 494 页。

⑥ 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336 ~ 338 页。

室的地方“领主”的地位也在不断稳固[①]，一旦出现天灾或对外战争失利的情况，对单于位的争夺便时有发生。此外，匈奴内部的民族同化程度仍较低，这也造成了在匈奴危机之时“诸国羁属者皆瓦解”[②]的局面。秦汉时臻于成熟的郡县官僚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权的问题，而北方草原则在蒙古建立怯薛、千户百户等制度时也基本实现了这一目的[③]。

因此，不管是单独审视作为早期国家的匈奴，还是历时地观察游牧国家的发展，我们似乎都能从中发现与农耕国家极为相似的特征。建立这样的国家体制，其目的在于稳固统治，而不会受到“游牧”或“农耕”等经济方式的过多影响。游牧国家中可以存在农耕，农耕国家也能容纳游牧。“游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国家”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大范围内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显示，社会政治层面、复杂程度相近的文明会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④]。社会复杂程度越高的文明，对特定经济作业方式的依赖程度便越低，经济、文化的发展倾向多元化，政治层面上的差异则越小。

附记：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9XNL010）阶段性成果。

本文源于2017年“南京大学俄罗斯阿尔泰国际科考与科研训练项目”，文章初稿曾于中国史学会2019年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上宣讲，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良仁教授的悉心指导，并曾向南京大学特木勒教授请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Nomadic Countries—Taking the Xiongnu Empire as an Example

Zhang Lian

**Abstract:** Western anthropologist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nomadic societies maintain a “Segmental Organization” with segmentation and egalitarianism as their core characteristics

① 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1978年。

②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3787页。

③ 张帆：《元朝的特性》，《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457～480页。

④ 布鲁斯·G. 崔格尔著，徐坚译：《理解早期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96页。

due to their “unique” mode of subsistence strategies. Therefore, the nomadic states are supposed to be loose and fragile, which differs from farming societies greatly. However, by re-investigating the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e find that the society of the Xiongnu Empire has come up with a mature hierarchy. Its political power is highly centralized, by building a feudal system and bureaucratic system. Through the policy of Han-Xiongnu marriage, the Xiongnu Empire shows its equal and robust status to the Han Empire. Finally, the Xiongnu Empire is relatively stable, although it had experienced several regime disunities, and its regime lasted for 300 years. 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Han Empire in the same period. Therefore, when studying nomadic state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state characteristics than nomadic one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only rely entirely on ethnological materials but also make full use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literature materials. These will be an essential inspiration for us to study the complexity of nomadic society.

**Keywords:** Xiongnu Empire; Nomadic States; Segmental Organization; Theory of Early State; Nomad-Farming Relationship

#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初探

吴　忧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武汉，430204）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对平安的向往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建筑构件上刻绘鬼脸纹就是其中之一。“鬼脸纹”取自日本鬼面纹的叫法，是笔者对建筑构件上人兽不分、注重刻画阔口的愤怒面部图像的统称。笔者通过大量收集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材料，按照鬼脸纹图像构成要素分为三类；三类中再根据图像组合关系分型，最后讨论流变和中西交流问题。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用凶恶愤怒的神态起到震慑的目的，进而镇宅（墓）、辟邪，祈求护佑。而宗教建筑中的鬼脸可能还蕴含了使役小鬼的宗教含义。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建筑构件　鬼脸纹

魏晋南北朝，从 220 年东汉献帝禅让，曹丕建立曹魏始，到 589 年隋灭南朝陈而重新统一结束。这一时期文化蓬勃发展，东西各国家、南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相交融，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佛教的输入以及对波斯、希腊文化的吸收等，都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兽面纹作为装饰纹样在我国源远流长。但自东汉始，与以往强调眼睛不同，兽面纹形象逐渐关注对嘴部形象的刻画。魏晋南北朝时期，兽面出现位置增多、数量也增加，瓦当、壁画、葬具、石门、墓砖、窟龛、造像碑、青瓷器等器物上都有出现，形态各异。但有一类兽面纹并不特指某类动物，阔口、张嘴露齿或獠牙，通过牙齿或毛发表现出一种愤怒的姿态。而这类图像除了兽面，还有其他一些称呼，如“兽首”“魌头”“神兽”“饕餮”等。其特质与其他兽面纹之间有区别，也有共性；但国内对此类兽面的单独研究较少，且并未对其单独命名。在日本，装饰在栋端的瓦被称为鬼瓦，主要有莲花纹鬼瓦、鬼面纹鬼瓦、几何纹鬼瓦和凤凰纹鬼瓦四大类。且从出土材料看，日本鬼面纹鬼瓦（图一）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兽面纹瓦当明显有着承继关系。因此，笔者根据日本鬼面的称呼将此类兽面称为“鬼脸纹”。





图一　奈良 7～8 世纪佛寺出土鬼瓦[①]

# 一、魏晋南北朝建筑构件上鬼脸纹的型式分析

经过搜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鬼脸纹主要出现在建筑构件上。建筑构件通常指构成建筑物的各个要素，主要有楼（屋）面、墙体、柱子、梁、基础等，其含义多指房屋等人居建筑的构件。但本文所指的建筑构件含义更为广泛，分人居、墓葬和宗教三类建筑。人居建筑分类下的鬼脸纹瓦当出土数量最多，墓葬建筑的墓门、墓砖、棺椁，以及宗教建筑的龛楣、碑额、壁画等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出现。材料分散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鬼脸纹瓦当集中分布在以南京、镇江为中心的南方地区，以洛阳、平城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及以丸都山城、国内城为中心的辽东地区三个中心。鬼脸纹墓砖的分布地域广、数量散，福建地区、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关中等地墓葬内都有出现，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墓门、龛楣、碑额上出现鬼脸纹的情况很少，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棺椁上的鬼脸纹主要以鬼脸纹棺饰铺首出现，还有一些刻绘在石棺床床腿上，大同地区比较集中。宗教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主要出现在石窟龛楣和龛间、造像碑碑首，其他地方有少量发现。而不论是人居、墓葬还是宗教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图像都可以简单归纳总结为三种风格：第一种是有犄角、兽耳在眼旁的鬼脸，此类图像其犄角似卷草，在魏晋之前未见，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第二种是无犄角、无兽耳或兽耳在眼旁的鬼脸以人面为基础；第三种是无犄角、兽耳在眼上的似兽面，以祥瑞动物为粉本。

## （一）第一类　有犄角鬼脸

形象较为图案化，一般为两眉上卷，双目鼓凸，三角形隆鼻，鼻翼两侧各有鬓向两侧展开，末端向内侧卷曲，其下两侧各有一枚獠牙，头上两侧有两犄角内扬，双耳竖

① 玉田芳藏：《鬼瓦ルーツを尋れて》，東京書籍，2009 年。

立，额间图案多样，有三角形单峰、重峰、忍冬纹、莲花纹、扇形额面、人像、人兽组合像等。笔者根据图像组合关系将第一类有犄角鬼脸分为三型（图二）。




图二　第一类有犄角鬼脸纹类型图

A 型　鬼脸单体图像，左右无对称图形，口部也不衔物，额间装饰丰富。人居、墓葬、宗教建筑中都有出现。从目前发现情况看，此型鬼脸纹最早实例出现在棺饰铺首上，后出现在瓦当、墓砖及龛梁等位置。标本为北魏永宁寺出土鬼脸纹瓦当[①]。

B 型　单体鬼脸图像，自嘴角伸出对称条带状图案，或为璎珞（幔帐），或为枝蔓，或为胜，或其他神兽，或简化为线条，额间装饰多样，有单峰、重峰、忍冬。根据口中所衔内容不同，可分为四个亚型，标本分别位于古阳洞元祐龛龛楣[②]（Ba 型）、北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 1979—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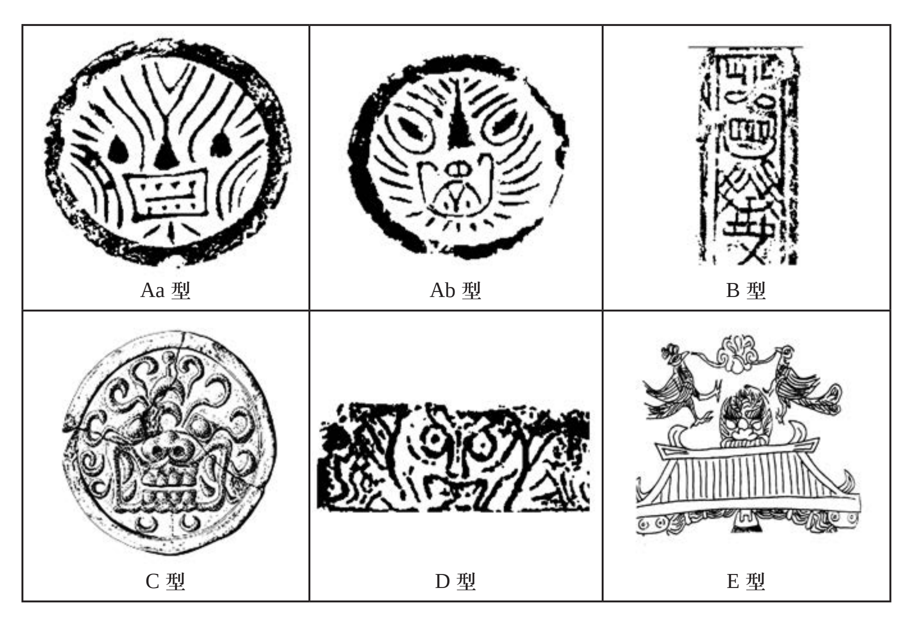
②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 11 龙门石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

安伽墓石墓门门楣[①]（Bb 型）、邓县学庄南朝墓门楣[②]（Bc 型）、权旱郎造像碑碑首[③]（Bd 型）、郑家湾山东吴—西晋 M1 出土鬼脸纹刀形砖[④]（Be 型）。

C 型　左右两侧有对称兽形图，与中间鬼脸组成组合图形，突出鬼脸的中心地位。此型鬼脸纹额间形式多样。标本为徐显秀墓门额鬼脸组合图形[⑤]（C 型）。

## （二）第二类　无犄角无耳鬼脸

此类鬼脸纹着重描绘双眼和阔嘴，无耳；集中出现在瓦当和墓砖上（图三）。




图三　第二类无犄角无耳鬼脸纹类型图

A 型　双目瞪视，树纹鼻，无面部轮廓线，通过向外放射的须毛、上挑双眼、紧咬的牙齿或两侧獠牙表现鬼脸的愤怒和凶恶。其中根据口部轮廓和舌头形状可分二亚型。标本为南京中山东路南侧出土瓦当[⑥]（Aa 型）、南京张府园附近出土瓦当[⑦]（Ab 型）。

---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 年 6 期，28 ~ 35 页。

② 引自李海磊、慕漫红：《南北朝兽面图像谱系及其传播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18 年 3 期，26 ~ 37 页。

③ 引自甘肃省博物馆官网。

④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浙江宁波北仑小港郑家湾山六朝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7 年 3 期，127 ~ 130 页。

⑤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北齐徐显秀墓》，三晋出版社，2015 年。

⑥ 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兽面纹瓦当再探》，《考古与文物》2004 年 4 期，60 ~ 72 页。

⑦ 贺云翱：《南京出土的六朝人面纹与兽面纹瓦当》，《文物》2003 年 7 期，37 ~ 44 页。

B 型　仅刻绘面部眼睛、口部，构图简单，与人面相似。标本为福建政和石屯凤凰山墓群西晋至东晋早期 M31 出土的长方形墓砖[①]，端面和长侧面都有鬼脸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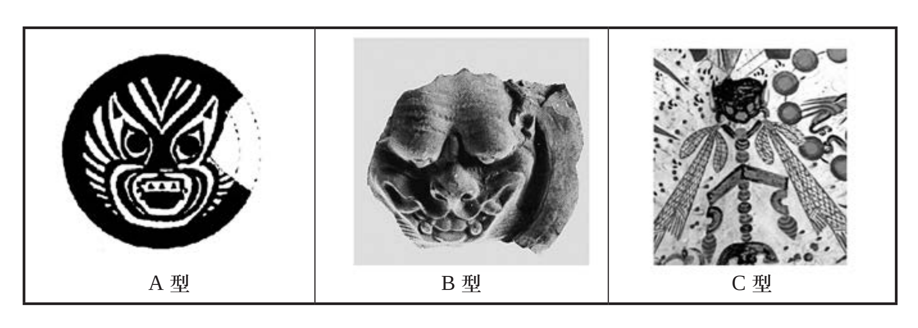
C 型　鬼脸纹以辽东地区鬼脸纹瓦当为典型，地域特征强。高浮雕式，人字形额，双目圆睁，蒜头鼻，阔口，两排牙齿外露，凹字形或矩形，嘴角几与眼角相连，嘴部占画幅近二分之一。整体风格一致，无耳无角，面部细节少，类人面。标本为丸都山城宫殿址第三层出土鬼脸纹瓦当[②]。

D 型　无犄角，有完整的面部轮廓线，狰狞可怖。发现的两例都发现于南方砖室墓墓砖上。标本为南京万寿村六朝 M1 墓砖[③]。

E 型　鬼脸呈愤怒状，毛发竖立，口衔建筑构件，左右两侧有对称兽形图。标本为田良宽等造像碑正面庑殿顶[④]。

## （三）第三类　无犄角有耳鬼脸

此类型鬼脸纹出现地点多样，在人居、墓葬和宗教建筑中都有出土，但差异性显著，主要根据图像耳朵位置分为三型（图四）。



A 型　　B 型　　C 型

图四　第三类无犄角有耳鬼脸纹类型图

A 型　耳朵位于眼睛上方，主要出现在瓦当上。以虎面为粉本，兽面上宽下窄，双目瞪视，双耳竖立在眼睛上方，嘴部大张近似方形，有獠牙，有明显的面部轮廓线。双目由吊梢眼转为圆眼，对面部特征的刻画呈现出复杂—简单—复杂的演变。标本为镇江铁瓮城出土瓦当[⑤]。

① 福建博物院：《福建政和石屯六朝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2 期，17 ~ 28 页。

②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2001—2003 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③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 5 期，231 页。

④ 胡文和：《陕西北魏道（佛）教造像碑、石类型和形象造型探究》，《考古与文物》2007 年 4 期，64 ~ 77 页。

⑤ 镇江古城考古所：《江苏镇江市出土的古代瓦当》，《考古》2005 年 3 期，36 ~ 44 页。

B 型　双耳位于眼部两旁，此型以北魏时期鬼脸纹瓦当为代表。瓦当制作规整，质地细密坚实，边轮较宽平。当面浮雕鬼脸，整个鬼脸图案隆起，高于边轮。标本为洛阳永宁佛寺出土瓦当①。

C 型　口衔条带状图形，如幔帐、铃铛，主要出现在石窟室中。标本为莫高窟 285 窟窟顶四角②。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出现地点零散，共出关系不明显，笔者认为分期研究较为困难。鬼脸纹瓦当由于出土数量较多，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而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变化不明显，组合型式多样，从时间和材质上很难概括出鬼脸纹的变化与发展，但不同环境的流行类型不同。墓葬和宗教建筑主要流行第一类鬼脸纹，第二类和第三类鬼脸纹主要流行于人居建筑瓦当上。

## 二、鬼脸纹的流变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三类鬼脸纹的类型可分为单体鬼脸面部、口衔条带型、“鬼脸 + 对称禽兽”组合图像型，以及口衔条带组合图像型四种图像特征。笔者将各特征要素拆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各类型鬼脸纹的流变问题。

### （一）有犄角的鬼脸纹单体图像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犄角类鬼脸纹目前已知最早的可明确判定年代的为孟津曹休墓 ZM44（228）出土的 6 件鎏金棺饰铺首③（图五）。那有犄角的鬼脸纹单体图像是由铺首演变而来吗？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我们将陕西华阴晋墓 M1 出土的墓门铜铺首一对④（图六）与棺饰铺首 30 件（图七）对比，在同一环境下，明显可以看出它们图像特征并不相同。因此，笔者认为第一类有犄角鬼脸纹图像虽然较多以铺首形式出现，但并不是汉代流行的兽面纹铺首发展下的产物。

但湖南溆浦马田坪西汉墓鬼脸滑石面具⑤（图八）、沅水下游常德柏子园东汉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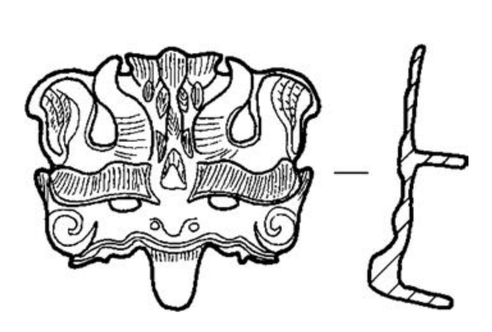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 1979—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

② 曾布川、冈田健：《世界美术大全集 · 东洋篇 3 魏晋南北朝》，小学馆，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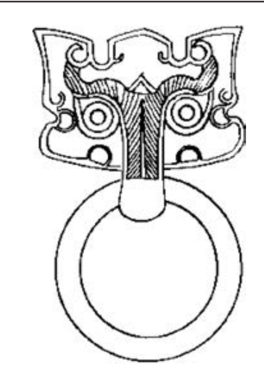
③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 年 9 期，32 ~ 47 页。

④ 夏振英：《陕西华阴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 年 3 期，36 ~ 4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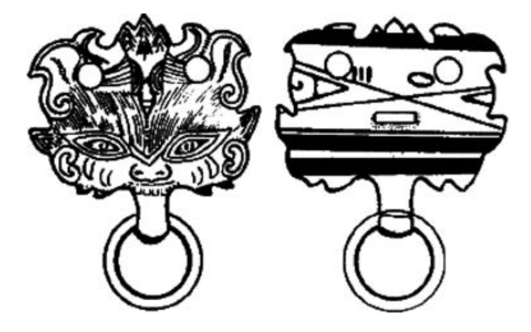
⑤ 湖南省博物馆、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溆浦马田坪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2）》，岳麓出版社，1984 年，38、69 页。



图五　曹休墓 ZM44 鎏金棺饰铺首



图六　华阴 M1 墓门铜铺首



图七　华阴 M1 棺饰铺首





图八　湖南溆浦马田坪西汉墓鬼脸滑石面具

M2416：35 瓦当[①]（图九）、浙江凤凰山东汉晚期墓 M1 墓砖[②]（图一〇）上刻绘的鬼脸



图九　沅水下游常德柏子园东汉墓 M2416：35 瓦当



图一〇　浙江凤凰山东汉晚期墓 M1 墓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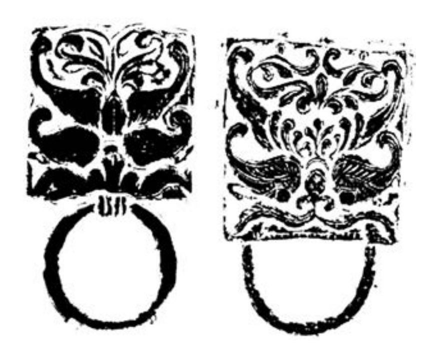


① 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常德博物馆、鼎城区文物局等：《沅水下游汉墓（下册）》，文物出版社，2016 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省德清县凤凰山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 年。

纹图像，都可在上文鬼脸纹类型学分析中找到相应位置，因此鬼脸上有“犄角”也并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原创。从目前材料看，此类鬼脸纹应来源于墓葬鬼脸纹图像，北魏平城及以后转移至地上建筑。自北魏大量使用后，从平城、洛阳地区传播到内蒙古、青海、南方等全国范围。第一类鬼脸纹传播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

而虽称这种自眉心向额头外撇，在末端向内卷曲的对称图形为“犄角”，也不一定都是动物犄角。以宋绍祖墓房形石椁上的铺首[①]为例（图一一），同时期雕刻的图像有的像牛角，有的像卷草纹，想必工匠在照图施工时也并不是完全清楚所绘为何。而从北魏平城时期出土的棺饰铺首看（图一二）[②]，眉心周围都是连续波卷状纹饰。但青海徐家寨六朝画像砖照墙上的鬼脸纹、第一类 A 型南方鬼脸纹瓦当上则是明显的犄角。第一类 Be 型鬼脸纹的卷草纹更是明显，丸都山城的鬼脸纹瓦当也受其影响。因此，笔者推测，有犄角鬼脸纹单体图像虽为本土图像，但在北魏时期受到佛教因素的影响，将“蔓草”形象融入其中，动物犄角和蔓草两种形象同时存在。







图一一　宋绍祖墓石椁上两件铺首拓片

图一二　仝家湾 M9 棺饰铺首

## （二）口衔对称条带型

笔者为何会有外来图像传入与本土图像融合吸收形成新式图像的推论呢？佛教中有一狮面神兽，只有面部没有身子，被藤蔓和花草环绕、阔嘴、露舌[③]，刻绘在佛寺入口、门柱和窟龛门楣，名叫“克尔提姆哈”。其面部最显著的特征即在额头、眼尾、嘴角有卷草纹。克尔提姆哈形象目前所知在 3 世纪的菩提伽耶栏杆上即有实例（图一三）[④]，与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 7 期，19 ~ 39 页。

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仝家湾北魏墓（M7、M9）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 12 期，4 ~ 22 页。

③ Stella Kramrisch, R B. *The Hindu Temple (Volume 2)*.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6.

④ 图一三 ~ 图一五引自 Gautama V. Vajracharya. Kirtimukha, the Serpentine Motif, and Grauda: the Story of a Lion that turned into a Big Bird. *Artibus Asiae*, 2014, 74 (2).

第一类 A 型相似。5 世纪的阿旃陀石窟中也有克尔提姆哈的形象，如阿旃陀第 26 窟上的提姆哈与捻角羚组合图（图一四），与第一类 Bd 型、Cb 型相似；而阿旃陀第一窟柱头上的克尔提姆哈（图一五）与方山思远佛寺 T039：4 鬼脸纹装饰物（图一六）[1] 几乎一样，这种摩羯鱼吞克尔提姆哈吐珠串的造像与权氏造像碑非常相似（图一七）[2]，而权氏造像碑这种中心鬼脸，建筑构件两端刻兽的图案在我国宗教建筑中非常常见，爪哇中部 8 ~ 9 世纪婆罗浮屠佛塔也有此种类型（图一八）[3]。



图一三　菩提伽耶栏杆克尔提姆哈



图一四　阿旃陀第 26 窟与捻角羚组合图



图一五　阿旃陀第一窟柱头

①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 年 4 期，4 ~ 26 页。

② 曾布川、冈田健：《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篇 3 魏晋南北朝》，小学馆，2000 年。

③ 肥塚隆：《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篇 12 東南アジア》，小学馆，2000 年。



图一六　方山思远佛寺 T039：4 鬼脸纹装饰物



图一七　权氏造像碑

宫治昭先生认为口衔瓔珞、旌胜，或是从嘴角伸出对称卷草等都是双叶形图案的变体，而双叶形图案可以在克尔提姆哈上找到原型[①]。口衔瓔珞、幔帐、建筑构件等图像大多发现于北魏佛窟龛楣，口衔蔓草主要出现在南北朝墓砖及门楣上。图像同克尔提姆哈图像存在极大的相似，而此种组合图像在魏晋前未曾见到。而且在第一类 Bc、C 型，以及第三类 C 型中口衔铃铛珠串的图像中，这种底部敞口的钟形铃铛并非中国本土所有，秦汉以来的铜钟都是两头略收中间微鼓。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铃铛也是一种外来式样，为此型图像外来增添了又一证据。因此笔者认为，口衔对称条带鬼脸纹造型应属西传。两座南朝墓中所出口衔旌胜造型是图像本土化的产物。



图一八　爪哇中部 8 ~ 9 世纪婆罗浮屠佛塔

## （三）鬼脸与禽兽的组合图像

此型图像最早出现在北魏石棺床中间，与人、兽组成组合图形，主要出现在墓葬的墓门门楣或门额处，年代为南北朝中晚期。第一类 C 型、第二类 E 型都属于此种类型

① 宫治昭先生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巴米扬》中认为巴米扬的鬼面塑像“双目突出，鼻子呈三角形，丰厚的嘴唇中露出了獠牙，好像在威吓着看它的人。尖耳也是特征之一。脸上到处有双叶形的图案。……这种带双叶形或叶形图案的鬼面塑像可以在印度笈多王朝的兽面（克尔提姆哈）中找到原型”。

鬼脸纹。而在第一类 C 型和第二类 E 型里，都出现左右两旁为禽鸟的图像。

从时间上看，田梁宽等造像碑庑殿顶、云冈石窟第 12 窟前室西壁第 3 层屋形龛楣上的鬼脸与禽鸟图[①]（图一九）是目前所知“鬼脸 + 禽鸟”组合图像时代最早的两例，其后墓葬墓门刻绘的主要为北周、北齐时期。从禽鸟图像看，田梁宽等造像碑和云冈石窟第 12 窟前室出现的禽鸟同徐显秀墓、康业墓、娄叡墓出现的鸟形完全不同：北周、北齐墓葬墓门所刻绘的禽鸟已非常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为凤鸟或朱雀图案；而北魏宗教建筑上出现的两处对称禽鸟图案更加写实，口衔蔓草造型让人联想到袄教含绶鸟[②]（图二〇），而且三座粟特墓门楣刻绘的禽鸟虽然已本土化，但依然保留了口衔蔓草的造型。因此，笔者认为，此类组合图像早在传入前已成定式，非本土组合。



图一九　云冈第 12 窟前室西壁第 3 层屋形龛楣（第一类 C 型）



图二〇　都兰吐蕃墓含绶鸟织锦

## （四）无犄角无耳类

此类鬼脸纹主要发现在南方地区瓦当、辽东地区瓦当以及两地的墓葬中，图像简单，变化不大。从咬牙切齿到显露獠牙，从山字到树形额头，至额头无装饰，显示的是从神性至兽性的转变。此类 A 型和 C 型鬼脸数量最多，主要彰显在南方地区对辽东地区的影响上。

D 型鬼脸纹（图二一）[③]与汉画石上雕刻的畏兽兽面有较强的相似性，可能是此类兽面的简易变体。画像石上所雕刻的有火焰形肩饰和二趾三爪特征的正面兽形图，最早出现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图二二）[④]。D 型鬼脸纹主要出现在墓砖上，墓砖由于画幅

①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 10 云冈石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

②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 年 1 期，5 页。

③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兼论出土的青瓷器》，《考古学报》1957 年 4 期，83 ~ 106 页。

④ 蒋英炬：《中国画像石全集 第 1 卷・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年。



图二一　江苏宜兴晋墓 M1 鬼脸纹墓砖（第二类 D 型）



图二二　山东沂南画像石石雕正面兽

有限，无法将畏兽正面形象全部刻绘，因此笔者认为 D 型鬼脸纹属于正面畏兽的简易形式，火焰形肩饰被压缩至面部左右使之像竖立毛发。

## （五）无犄角有耳类

此类 A 型鬼脸纹明显以动物面为基础，但与 B 型鬼脸图像特征一致，几乎没有型式变化，耳朵在面部两侧为人面特征，而嘴角两边的獠牙又是兽的特征，所以此型鬼脸也应属于组合图形（图二三）[①]。在粟特地区，发现了同种造型的鬼脸纹图像。此图像是在片治肯特一座 6 世纪城墙的砖石建筑上发现的银鎏金圆形饰件（图二四），马尔沙克称作“克尔提姆哈”，并推测是从银碗上脱落下来的浮雕饰。通过同样焊有这种装饰的蒙查克 − 特佩碗底的布哈拉铭文，可证年代为 5 ~ 6 世纪，并说明自贵霜时代以来，克尔提姆哈形象经常在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盛行[②]。由于图像存在极高的相似性，笔者认



图二三　北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出土瓦当



图二四　片治肯特出土银鎏金圆形饰件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 年 7 期，63 ~ 78 页。

② 鲍里斯 · 艾里克 · 马尔沙克著，李梅田等译：《粟特银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为第三类B型无犄角、兽耳在眼睛左右、大张嘴露獠牙与舌的鬼脸纹是存在中西交流互动的。但这种互动是图像之间直接的复制，还是因为中方和粟特的图像都以狮面为粉本，图像的相似是工匠创作造成的偶然性，由于材料太少，笔者暂无法下定论。

## 三、文化内涵及功能

列维－斯特劳斯在《面具之道》中也曾说“面具跟神话一样，无法就事论事，或者单从作为独立事物的面具本身得到解释。……面具跟神话一样，连同其起源神话以及二者均出现的仪式，必须通过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关系才能理解”[①]。因此，探讨鬼脸纹的文化内涵必须从各种不同名称的面部图像出发，将各种不同名称图像背后的文化意义同图像特征及图像所处位置联系起来，探讨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这个面部图像集合群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功能。

这些有着不同文化内涵的神兽有着不同的神话或者宗教故事，可以分为本土图像和西传图像两类。本土图像有饕餮、方相氏、畏兽、神人、虎，西传图像主要为“克尔提姆哈”等狮面像。从各种不同名称看，不仅有本土图像和西传图像代表不同的文化源流，方相氏、畏兽、神人、虎都是用脸部表现全身，局部代整体的表现方式，而饕餮、西传狮面像本身就只有面部，没有身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饰自然不是饕餮纹，但意义传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哪一种类型，其阔口、獠牙都是为了使观者感到害怕。结合出现的位置，建筑屋檐，墓门门额，洞窟内的龛楣、龛间，造像碑的碑额，壁画上的梁间、四隅，以及墓砖，震慑的功能就构图基本已呈定式，不分南北和东西、不分朝代，而且主要特征一致。这说明这种图案的普遍性，也说明人们对这种图像含义及使用的普遍理解以及对其强烈的认同感，更说明这种图像有着特定的意义和比较稳定的图像结构。

第一类有犄角鬼脸出现在瓦当、石墓门、龛楣、石棺床中间足等“入口”，与克尔提姆哈所处位置相似，而墓砖上的鬼脸纹也多与佛教图像同出。如果此类图像同佛教相关，其功能意义自然免不了寄信于佛，祈求护佑。人居建筑构件上是为了辟邪，保护屋主人免受侵害，除了辟邪之外，应还有镇墓的目的。而宗教建筑上，阔口、獠牙除衔璎珞功能外应与震慑相关，此外可能也有帮助佛祖倾听供养人心愿的含义。另外，鬼脸纹从地下墓葬建筑转向出现在地上建筑，更是反映了时人对现状的不安，祈求护佑的心态。鬼脸纹即是在这种环境下流行的。

而一种图像的流行必然有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含义支撑。不论是本土图像还是西传图像，都有其合理性。将文化意义也按其来源分开，主张不同建筑构件上的鬼脸纹有不同的含义也不是不可以。但鬼脸纹作为一个泛指的概念，它在人居、墓葬、宗教建筑构

①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张祖建译：《面具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件上的流行自然也有其通用的文化意义。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启发，我们可能不清楚图像想表达什么，但图像不想表达的反面也一定蕴含在图像中。鬼脸纹图像不需要身子，仅面部图像就能传达其蕴含的文化。阔口、置于屋檐、门楣是其图像特征和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鬼脸纹的流行深层次的原因是整个社会渴求保护，认为凶恶的面部能护佑主人，以恶制恶。

# Research on the Ghost Face Pattern on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u You

**Abstract:** During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ople always yearned for peace which was manifested in many aspects. One of them is the ghost-face pattern on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The“ghost-face pattern”is initially called by Japanese scholars as one of the animal-face pattern styles. The author calls the image broad-mouthed and angry and cannot be clearly recognized as an animal or human face, as a“ghost-face pattern”on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The author collected the ghost-face pattern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did a typology analysis on these images and talked about the spread and transformation theme. Different ghost-face pattern types have different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s.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distinguish tha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ghost-face pattern is from the exact origin becaus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hings called by different names that have the same or similar cultural meaning. However, the author regards that the ghost-face pattern frightens the intruder using the fierce and angry face. Maybe, the ghost-face pattern above the niche or on other religious architecture components can convey patrons’wishes to the deity.

**Keywords:**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ghost face pattern

# 北魏房形葬具初探

王子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210023）

**摘要：**北魏时期产生的一类特殊的葬具——房形葬具，对后世的丧葬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尝试将这类葬具初步进行类型学分析，探究其形制变化；罗列其目前可获得的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并从东汉石祠、西方工艺传入、与实体建筑关系、与“棺亭”和东汉房形葬具的关系几方面入手，重点讨论其在北魏出现和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北魏　房形葬具　类型学

北魏（386～534年）是北朝时期重要的政权之一，其上层建筑为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少数民族贵族，经过长期的征服和交流，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王朝，并统一中国北部。在这种政治、文化大背景下，北魏时期的丧葬文化也随之不断产生变化。其中一类葬具形制较为特殊，其外形模仿殿堂式建筑，以石料构建，与同时期其他的丧葬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别，并且对后世的丧葬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这类葬具的出土环境、使用方式等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发掘清理者和研究者对其命名也有所不同，有称“棺”者，亦有称“椁”者，但其实其共性远大于差异，可作为同一类器物进行研究。本文统称其为“房形葬具”。本文尝试对这类葬具进行初步的类型学分析，罗列葬具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葬具的来源，并就一些观点与前辈学者商榷。

## 一、北魏房形葬具及其类型学分析

### 1. 北魏时期房形葬具的出土与发现

目前报道的北魏时期房形葬具主要集中于北魏中期都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一带，其中包括2010年阳高县王官屯“尉迟定州”墓一件[①]、御东2014年发现“解兴石堂”

①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12期，4～12页。

一件[①]、市公安局 2011 年"张志朗"葬具一件[②]、南郊富乔发电厂"邢合姜"葬具一件[③]、2000 年雁北师院宋绍祖墓一件[④]、2014 年云波路 M10 一件[⑤]、1994 年智家堡北魏墓一件[⑥]、2018 年沙岭建材市场一件，此外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藏一件；北魏晚期都城洛阳附近仅发现一件，即已流失海外的"宁懋石室"一件[⑦]。

**2. 类型学分析**

依据北魏房形葬具整体形制的不同，可以将北魏房形葬具分为两个类型。A 型：歇山顶式，再分为三式，Ⅰ式，尉迟定州、宋绍祖、沙岭建材市场 3 件；Ⅱ式，廊柱与前壁紧贴，前廊退化：云波路 M10、北朝艺术研究院 2 件；Ⅲ式，无前廊和廊柱：智家堡、宁懋 2 件；B 型：解兴 1 件（图一）。

A 型　造型为两面坡的歇山顶式，均采用了相似的构筑方式，即首先以石板拼合长方形地栿，石板上雕凿槽口以稳固前后面和两山。正面均为三块石板构筑，中间（主间）为门板，两山分别为两块梯形石板长边拼合，顶部预留孔洞以搭圆柱形脊檩。除宁懋葬具之外，其他葬具均以内部三角形横梁和脊檩垂直相交构成稳定的结构，然后在两者之上铺设多块石板，即顶部望板结构。

Ⅰ式：带有明显的前廊，因此前檐远长于后檐，前檐向前延伸。前檐下设脊檩一条，承托其重量，脊檩置于斗拱斗口内，斗拱下为前廊柱，多为八角形。柱底以圆形柱础承接。葬具内置棺床。

Ⅱ式：前廊退化消失，但前檐柱保留，从侧面看前檐仍然长于后檐。由于前面空间狭窄，斗拱、柱础等实体结构已趋于退化。葬具内发现有套棺的现象，也有内置棺床，说明这类葬具的使用人群发生了变化。其他设计与Ⅰ式相似。一些葬具望板开始雕刻出装饰性的椽头等结构。

Ⅲ式：前廊痕迹完全消失，前后檐趋于等长，葬具承重结构发生变化。较早的仍使

①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青铜器 陶瓷器 墓葬壁画》，文物出版社，2016 年，8 ~ 10 页。

② 王秀玲：《平城北魏墓葬房形石室探析》，《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 4 期，51 ~ 5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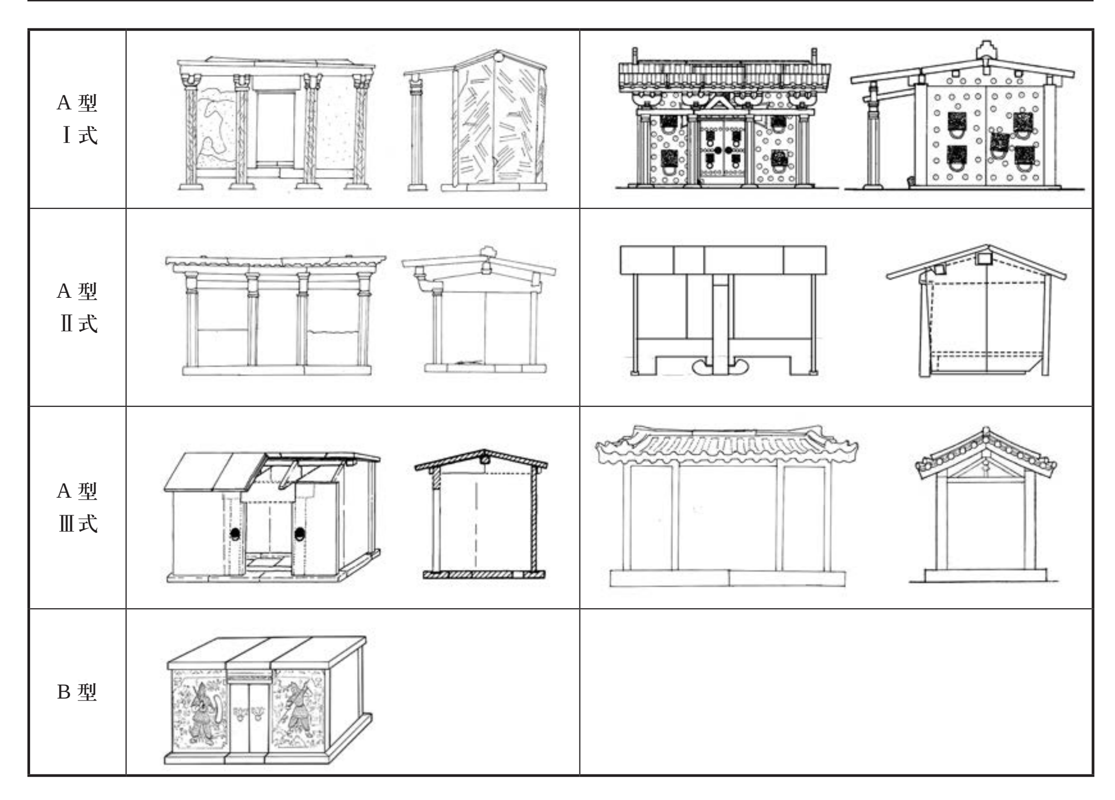
③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 年，71 ~ 162 页。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 7 期，19 ~ 39 页。

⑤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M10）发掘简报》，《文物》2017 年 11 期，2、3、6 ~ 22、99 页。

⑥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 年 7 期，40 ~ 51 页。

⑦ 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中原文物》1980 年 2 期，33 ~ 40 页。




图一　北魏房形葬具

A 型Ⅰ式. 尉迟定州、宋绍祖　A 型Ⅱ式. 云波路 M10、北朝艺术研究院　A 型Ⅲ式. 智家堡、宁懋　B 型. 解兴

用三角梁和脊檩，较晚的（迁洛之后）内部已放弃上述结构，顶板使用整块石板雕刻而成，直接以前后板、两山承托屋檐结构，葬具结构设计平衡。葬具更注重非实体的图像化装饰，均有大幅彩绘或线刻画。Ⅰ式中的宋绍祖墓虽然整体形制更偏早期，但繁缛的装饰体现了房形葬具的发展趋势，具有Ⅲ式的特征。

B 型　正面设计、地栿与 A 型相似，两山则分别使用矩形石板。顶部无两面坡结构，以多块石板拼合成平顶，直接搭于前后板和两山板上，整体呈匣式。葬具周身满饰彩绘，题材繁多。

从时间上看，A 型中的Ⅰ式出现比较早，且工艺复杂，部件较多，从北魏早中期太安至中晚期太和都有实例，与后者相比，前者显然在构造上采取了简化，极大压缩了前廊的宽度，并以此减少屋顶用板数量，因此从侧面看，A 型Ⅱ式的廊柱与前壁紧贴，因此廊柱下的柱础消失，柱头上的铺作也区域简化，仅做出斗口；实质性的前廊已经消失，但顶板前檐仍然宽于后檐，残留了前廊的痕迹。Ⅲ式与Ⅱ式同时出现，或略晚于Ⅱ式，在Ⅲ式上，前廊、廊柱以及廊柱上附属的铺作都完全消失，且前檐仅稍宽于后檐，而北魏迁都洛阳后的唯一一件房形葬具，即宁懋葬具，前后檐已经完全相同。因此，A 型的三个式的变化体现了随着时代发展，结构工艺趋向简化的趋势。早期的几件葬具更

注重部件设计，前廊柱、柱础、斗口、前檩均为实体部件，而较晚的几件则逐渐开始侧重使用壁画、线刻图像来使葬具更精美。宋绍祖葬具是处于发展中间阶段的代表，既采用了雕刻精美的柱础、叉手等实体部件，又在葬具表面浮雕乳钉、铺首，同时还彩绘乐伎等图像，同时使用了各种不同的装饰设计，是北魏房形葬具设计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

B 型与 A 型 Ⅰ 式同时出现，但数量不多，仅解兴葬具一件，不是房形葬具的常见形式。虽然整体形制与其他北魏时期房形葬具相差较大，但表面彩绘的一些题材在北魏以后的房形葬具再次被应用，如门板两侧分别绘制守门武士，北周、隋唐房形葬具的正面门两侧次间几乎全部出现，而门额板榜题墓主简要信息的做法与北周史君房形葬具的相同。

## 二、时空分布和使用人群

从时间范围看，目前所发现北魏时期的房形葬具中最早的一件，为太安三年（457 年）的尉迟定州房形葬具，但是从葬具较为成熟的构造工艺来看，极有可能存在更早使用房形葬具的墓葬，有待发现和研究。这一时期，这类葬具的构造还不够统一，如太安四年的解兴房形葬具虽然同样为房形葬具，但并未在屋顶等特征上表现建筑构造的特点。到大约孝文帝时期，这种葬具的造型趋于稳定，数量也增多，均采用了相似的构造方式，即先以石板搭建地栿，屋顶两面坡悬山式，屋顶下以脊檩和三角梁垂直交叉制成屋顶望板。随着这种葬具模式的固定，其营造方式也在发生简化，从上述 A 型葬具的类型看，总体趋势是前部廊柱、柱础、铺作，内部脊檩、三角梁逐渐退化，板材的总数在不断减少，承重的方式因此也发生了改变，由梁柱架构转变为完全以地栿和墙板承受顶板重量。至最晚的一件，即魏都南迁后的孝昌三年（527 年）宁懋葬具时，葬具除底座、墙板、顶板以外的构件全部消失，铺作、叉手等构件以线刻的方式雕刻于墙板上。因此，这种葬具的使用时间贯穿北魏中后期。倪润安先生注意到，伴随着北魏平城时期时代的发展，北魏墓葬的比例由坐东朝西较大逐渐转为坐北朝南较大，可以看作北魏丧葬传统及礼制转型过程的表现。倪先生还敏锐地认识到，智家堡北魏房形葬具墓是北魏前后期墓葬的过渡[①]。从智家堡墓房形葬具分析，此说甚是，上述葬具构件的简化、结构的调整，也可看作北魏平城时代前、后期墓葬中变化的因素之一。因此可以说，房形葬具的变化是在北魏丧葬文化演变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从分布地域来看，北魏房形葬具具有强烈的中心分布规律。目前所报道的这类葬具，无一例外出土于北魏都城，且绝大部分发现于北魏平城。可见这种丧葬形式主要流行于北魏首都一带。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当与使用人群有关。目前身份可考的

① 倪润安：《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考古学报》2014 年 1 期，33～66 页。

房形葬具墓主有“尉迟定州”、解兴夫妇、张智朗、邢合姜、宋绍祖夫妇、宁懋。所谓“尉迟定州”墓，其实墓主应该并非尉迟定州本人。葬具封门板铭文“步胡豆和民莫堤尉迟定州……”，据殷宪、刘俊喜先生考证，莫堤“比刺史”，其品秩与同级刺史大致相当[①]。但墓主经鉴定为成年女性，因此墓主应该不是尉迟定州本人，尉迟定州只是负责墓葬工程。因此，墓主为尉迟定州亲属的可能性大[②]；张智朗，为“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镇远将军汝南庄公”毛德祖之妻[③]；宋绍祖为“幽州刺史敦煌公”；宁懋为“横野将军甄官主簿”。从解兴葬具后壁绘制的夫妇并坐图来看，解兴也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主。总体来看，这种葬具的使用者均为官员、贵族及其家属，但是人群的身份差异较大，如宋绍祖“敦煌公”，为从一品；宁懋“横野将军”，史料记载，官秩仅为第九品[④]。除墓主夫妇合葬外，“尉迟定州墓”的墓主、张智朗、邢合姜均为女性单人葬。可见，北魏时期，这种葬具虽然是流行于贵族、官员间的一种丧葬用具，但似乎尚无严格的制度规范和等级要求，具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可以选择制作这种葬具。因为财力富足的贵族和官员，主要聚居于京城，所以这种葬具在大同地区的集中发现也属情理之中。

## 三、北魏房形葬具来源的讨论

### 1. 山东、苏北、皖北地区的石祠

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画像石流行于以山东中、西部为中心的青、徐地区。画像石在这一地区，不仅用于石椁、地下墓穴，还流行于墓上祠堂的构造，这与其他画像石流行区域是十分不同的。至今保存相对完整的地上石祠已经很少，如山东长清孝堂山的“郭巨石祠”、嘉祥武氏家族墓地石祠，金乡“朱鲔石祠”等，经过中西学者百年以来的长期研究，得到了较为可信的复原。在此基础上，信立祥等先生对该区域石祠的类型、构造进行了分类和总结。以有代表性的山东中西部的滕州地区发现的石祠构件为例，石祠主要的构造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形制矮小、平顶式的房屋建筑；第二类为单开间悬山顶式的房屋建筑，由基石、两山墙及后壁、屋脊、前后屋顶拼合而成，屋顶石两端雕刻瓦当，外表面还雕刻瓦垄；第三类为小型双开间平顶或悬山式房屋建筑，中间原有一条开间柱；第四类为单檐悬山顶，双开间式，研究者认为其建筑方式为将左右山墙石和后壁石立于基石上，在前面正中位置设置一根石柱，在石柱和后壁上部正中预先设置好的槽内置入一块三角形隔梁石，使石祠形成双开间构造，前后坡放置屋顶石，两坡接缝

---

① 殷宪、刘俊喜：《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文物》2011年12期，47～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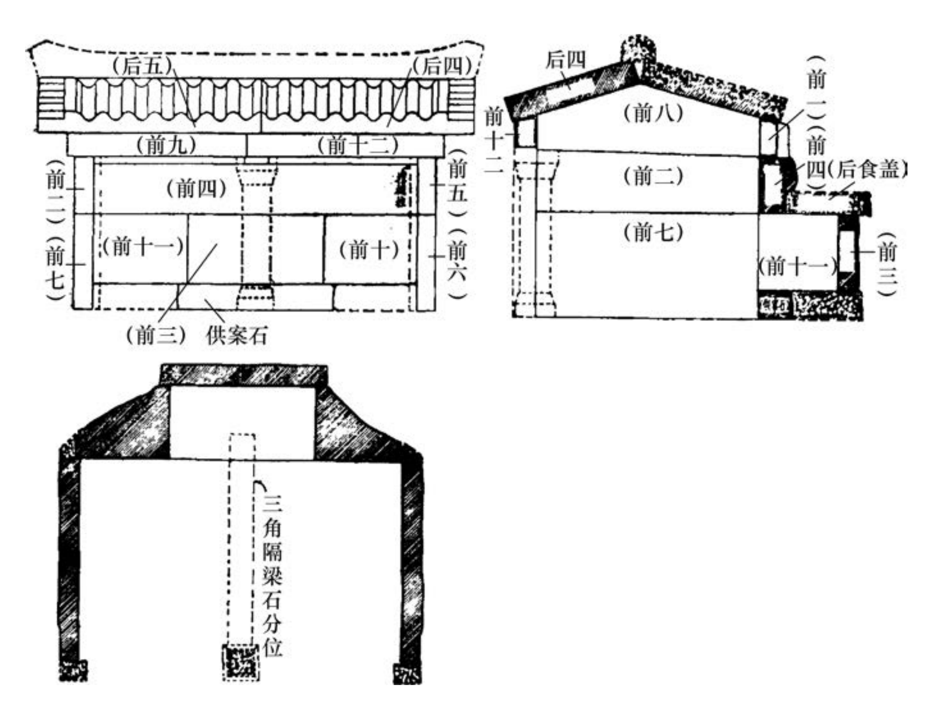
② 郝军军：《北魏尉迟定州墓墓主身份再考》，《文物》2014年12期，89页。

③ 持志、刘俊喜：《北魏毛德祖妻张智朗石椁铭刻》，《中国书法》2014年7期，120～123页。

④ 《魏书》卷第113《官氏志》，中华书局，1997年，3002页。

处安装屋脊石，室内后壁前横向放置长方形石祭台一条[①]。

蒋英炬、吴文祺先生成功复原了嘉祥武氏祠的结构。从复原图上看，武梁祠的结构属于第四类，底部有石板作地栿，正面正中立柱，三角梁与两山平行，一端架在后侧石板上端，另一端架于前面立柱顶部，支撑前檐板和后檐板[②]（图二）。这显然与北魏较早的几例房形葬具的构筑模式具有高度相似之处。郑岩先生认为，北魏时期，这些汉代的石祠仍然矗立于地表，且北朝时期还有参观者在这些祠堂上书写题记，因此，这类祠堂可能被北魏的墓葬修建者作为蓝本[③]。但这无法解释为何这类房形葬具只在北魏的都城出现。




图二　武梁祠的构筑模式（示立柱与三角梁）

北魏平城时代也是征服和移民的时代，这种移民不仅仅是鲜卑统治者对征服地区的入驻与管理。为了推动京畿地区的发展，平城时代，北魏动用国家力量，从全国各州县迁徙大量人口以充实京城[④]。从道武帝东征开始，经过长期争夺，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年）春，北魏从刘宋手中夺取山东全境，慕容白曜为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改刘宋

①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66～1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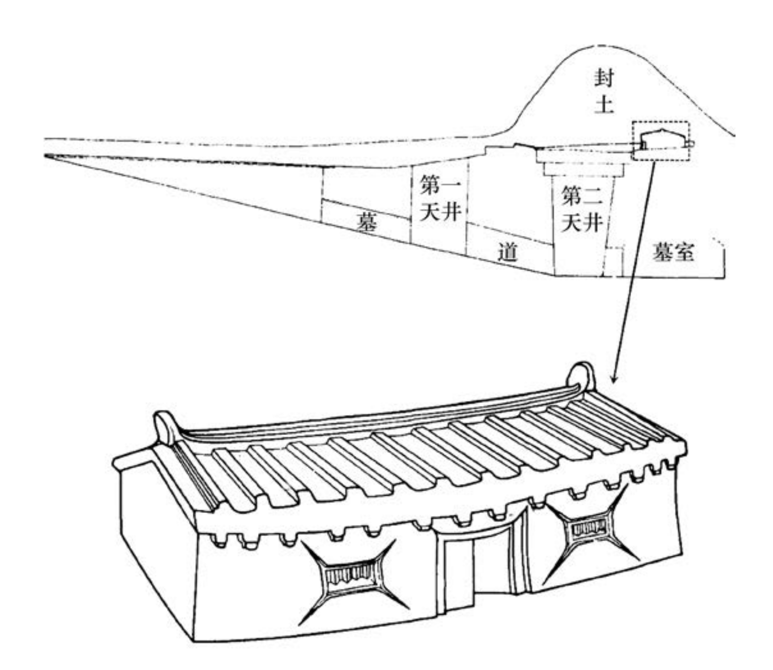
② 蒋英炬、吴文祺:《武氏祠画象石建筑配置考》,《考古学报》1981年2期，165～184页。

③ 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266～306页。

④ 刘美云:《北魏迁都前后平城的开发与建设》,《史志学刊》2007年4期，24、25页。

冀州为齐州，并于“五月，徙青州民于京师”①。由此，山东中部的吏民开始大规模进入北魏平城。在迁徙的人口中，不乏百工伎巧之类从事手工业的工匠类人群，有学者考证，太武帝时就已迁徙百工入京，从事各类手工业活动②。山东中南部自东汉以来，就有大批从事石制品雕刻的石工，甚至形成家族产业，传代经营，甚至时至今日，如山东嘉祥石雕，为国家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古发现山东地区的许多画像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可以想象，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一批技术精湛的石工迁徙至代京，将技术直接传入平城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时间段，北魏开始出现房形葬具。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即在墓室前方天井两侧修筑“土房子”。这样的丧葬形式发现于宁夏彭阳县新集 M1 和西安韦曲北魏 M1③。如彭阳新集 M1（图三），墓道第二天井前后各以土筑“房屋模型”一座，前面的一座为一面坡式，后面的一座恰在墓室垂直上部，塑造成庑殿顶式殿堂式的建筑，还塑出屋脊、鸱吻、瓦垄、滴水、正面的双扇门、破子棂窗，虽粗犷但十分形象。土塑建筑完成之后，又将封土堆于其上，将其掩埋④。可以发现，这类墓前土质建筑出现的位置与东汉山东地区祠堂的位置极其相似。巫鸿先生认为，山东地区的石祠，应当建筑于墓葬封土前，甚至可能将后




图三　彭阳新集北魏 M1 及其土筑房屋模型

① 《魏书》卷第六《显祖纪第六》，中华书局，1997 年，129 页。

② 任重：《平城的居民规模与平城时代的经济模式》，《史学月刊》2002 年 3 期，107 ~ 113 页。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长安县北朝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 5 期，78 ~ 82 页。

④ 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 年 9 期，26 ~ 42 页。

半部分埋入封土中，以此形成死者与阳间亲属沟通的场所[①]。上述的这类土质房屋模型，恰恰也出现于墓室顶端，不同的是完全埋入封土之内。完全填埋于封土中，说明其功能已经不作为目前用于祭拜的祠堂。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墓葬形式，处于墓上祠堂与墓内房形葬具的过渡状态，其虽然失去了在地表的使用功能，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作为墓主居住的殿堂居室。由此看来，山东地区传入北魏的可能不仅仅是墓葬石雕技术，还有某些丧葬习俗。这些文化因素进入北魏社会后，经过一系列演变，形成了房形葬具这种丧葬形式。

**2. 西方工艺技术的传入**

石雕工艺在希腊文化及希腊文化发展延伸的欧亚文化，如罗马文化，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程，并形成了成熟而完善、有代表性的石雕艺术风格。公元前 5 ～公元 3 世纪欧亚希腊、希腊化文化以及罗马文化的一些石葬具，建筑式构造、列柱人物浮雕等题材和因素值得注意。这些葬具中的一类构造为“两面坡顶”、列柱式的殿堂形，如“哀悼女子石棺”（Sarcophagus of Mourning Women）、“赫拉克勒斯石棺”（Sarcophagus of Herakeles），外形与北朝中后期出现的房形葬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自魏晋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族的长期往来为中西文化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以粟特人为代表的异域民族不断进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在考古发现上，来自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物质文化遗存开始广泛而普遍地出现于中国。史料记载，太武帝“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可见，在北魏平定凉州前，就已与西域诸国，以至葱岭以西的粟特开始了文化交流。至沮渠北凉后，又控制了一度阻碍交通的鄯善，“拜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②]。至此，长期阻断的交通重新恢复，丝绸之路再次畅通。史料中对粟特、波斯等国的情况记载甚详，可知丝路畅通之后，北魏与西域文化交流之频繁。这一时期在西域以东，考古发现中亚、西亚器物数量很多，如大同出土的大夏八曲银洗、波斯狩猎纹银盘、刻花玻璃器[③]，定州北魏塔基出土的厌哒钱币，以及北方各地发现的大量萨珊波斯银币乃至东罗马金币等。

十六国时期，石窟造像传统开始由新疆地区传入中原，处于丝路要冲凉州的沮渠氏北凉首开造像之风。《魏书》：“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④]这一事件后，佛教文化迅速在中原发展，在此影响下，佛教石窟造像形成了新的“平城模式”，平城石窟群开凿的主持者及工匠中，显然不乏直接来自中亚、

---

① 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11～47 页。

② 《魏书》卷第 120《西域》，中华书局，1997 年，2262 页。

③ 王银田：《萨珊波斯与北魏平城》，《敦煌研究》2005 年 2 期，52～57 页。

④ 《魏书》卷第 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97 年，3032 页。

西亚，或者对中亚、西亚艺术较为熟悉的人，平城石窟群最初的开凿主持者高僧昙曜，就是来自罽宾的高僧。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云冈石窟第 9 窟，北壁的一间一铺三身龛两侧的柱，即是典型的希腊“爱奥尼克”（Ionic）式柱[①]（图四）。北朝艺术研究院藏房形葬具内置的棺床，中间一条腿较短，腿下有一件酷似倒置的爱奥尼克式柱头的石质特殊部件支撑。此外，房形葬具普遍采用的八角形廊柱显然也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西方石刻工艺的传入是不容忽视的。不难想象，参与石窟寺开凿的石雕工匠，吸收和学习了石窟寺开凿的技术和艺术题材，在其他用途的石雕上，以同样的技术和题材来作为其元素，如司马金龙墓中的石棺床，床腿两侧力士以及床栏板上缠枝忍冬纹内的伎乐形象，与云冈二期力士、天宫伎乐的体态、造型如出一辙，只是大小不同。从北魏时期的房形葬具上看，还很难说这种影响直接来源于西方工匠的技术和风格，但显然间接的影响已经不断渗透。



图四　爱奥尼克式柱头

1. 云冈 9 窟北壁　2. 北朝艺术研究院藏房形葬具棺床部件　3. 哀悼女子石棺（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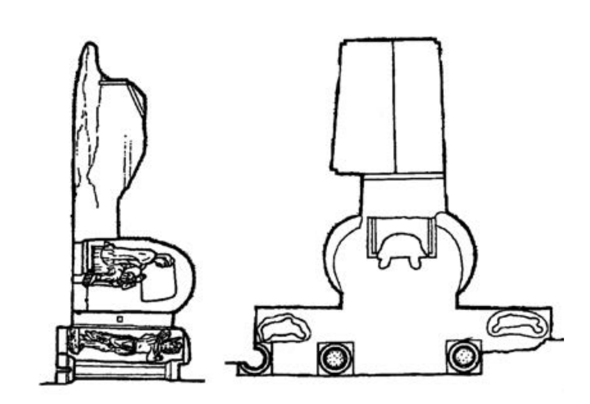
**3. 实体建筑与石窟寺的影响**

虽然目前北朝中、后期的木构建筑已经无迹可寻，但房形葬具作为一种建筑型的器

① 彭栓红：《云冈石窟造像的鲜卑特色与文化多样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 5 期。

物，其中体现的建筑因素，必然直接取材于当时木构建筑的模式。北魏平城时期的几件房形葬具，大多采用了带有前廊的歇山顶式构造。这种构造的建筑模式，同样大量见于北魏孝文帝及之后，乃至北齐、北周的石窟中，如云冈石窟第9、10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前，即宿白先生所划分的“第二期”，其平面构造为前后室殿堂形①，其所谓“前后室”，即在主东室前面开凿带有廊柱的前廊，两窟前各两根廊柱，形成面阔三间的格局。同样的格局在天水麦积山石窟第1、28、49窟等也有发现，时代属于北魏晚期至西魏②；邯郸南响堂第7窟、太原天龙山第8窟等同样存在，时代属于北齐③。实体建筑的遗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建筑模式，如2004～2005年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北朝晚期至隋的建筑遗址F5，面阔10米以上，是一间殿堂式的建筑④，基址中发现三排柱础，南侧一排与中间一排相距较近，与北侧一排较远，由此推测，殿堂前部应当是一道前廊。

石窟寺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即天水麦积山第43窟（图五）。此窟与其他洞窟的用途不同，除了前室开凿造像之外，后面还开凿了后室。经付熹年先生考证，第43窟应为西魏皇后乙弗氏的墓葬，即所谓“寂陵”⑤。史料记载，西魏文帝“更纳悼后（郁久闾氏），命后（乙弗氏）逊居别宫，出家为尼……复徙后居秦州……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后号寂陵”⑥。在石窟寺凿窟以安葬死者的丧葬形式十分特殊，因而非常少见。耐人寻味的是，第43窟的空间分配与北魏的房形葬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室前修建廊柱，后室停放尸身，唯一不同的是以造像分隔前后室，使后室成为对外隔离的空间。通过这一特例，墓葬、石窟寺、实体建筑三者的相互影响鲜明地体现出来。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丧葬方式与房形葬具如此相似，说明北朝时期佛教石窟营造与墓葬营造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比目前所研究和认识到的更加深刻。



图五　麦积山第43窟平、剖面图

---

①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91年，3～5页。

②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③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108页。

④ 国家文物局：《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48、49页。

⑤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1998年，201～218页。

⑥《北史》卷第五《后妃传》，中华书局，1997年。

#### 4.“棺亭”与四川地区的房形葬具

巫鸿先生提出了北魏房形葬具的几种可能来源，除山东地区汉代的墓上石祠外，还有以满城汉墓为代表的崖洞墓中的“石室”[①]。其次是墓上的“棺亭”。这种“棺亭”，史料不见记载，实物也难寻踪迹，巫鸿先生援引美国纳尔逊－阿特肯斯美术馆藏一件北魏石棺上的线刻画像，提出了“棺亭”与房形葬具同作为丧葬环境中的建筑元素，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但棺亭的结构，以“亭”为模式，四面通透，结构对称，而房形葬具显然是以“殿堂”为模式，以尸床或棺内墓主为中心，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外观宏伟的空间，且北魏的几件房形葬具，显然前后也是不对称的。因此，两者虽然时代相同，但构造模式及用途具有较大的差异。

巫先生还提出四川地区汉代的房形葬具为北魏房形葬具来源的猜想，现就这一观点进行讨论。首先，观察两个不同时代的房形葬具的整体规律，可以发现两者间存在的差异很大。从构造方式看，四川地区汉代的房形葬具（以下简称汉代葬具），多是以整石分别制作顶盖和房身，因此也不需要制作底板地栿；而北魏的房形葬具（以下简称北魏葬具），则无一例外是以多块石板拼合，并以梁架的形式支撑葬具结构，不仅使用了柱、三角梁，有些甚至还有铺作、额枋、柱础等实体构件。为了葬具的结构稳定，其底部必须先以石板铺设底板地栿。由于葬具中多不使用金属的销钉、活页，为保持葬具顶部的稳定，北魏葬具均制作成前后两面坡的形式，以三角梁支撑顶板；但汉代葬具的顶盖以整石雕刻，不需考虑其结构是否稳定，因此多做成四面坡庑殿顶的形式。从葬具的使用方式来看，汉代葬具均直接作为棺盛殓尸身，无其他附属结构，因此，其主要是作为“棺”使用；但北魏葬具内部均放置一件榻式棺床或木棺，可见北魏葬具作为“椁”的因素更多。从葬具的装饰看，汉代葬具一般仅在顶盖上体现作为房形葬具的建筑因素，除去顶盖后可以发现，葬具与其他汉代四川地区的画像石棺几无差别，棺身以分区的形式雕刻画像；北魏葬具则多无画像雕刻，除宋绍祖房形葬具房身外侧的乳钉和铺首、宁懋葬具的图像为雕刻外，其他葬具上的图像多为彩绘，甚至不加图像装饰。从整体上看，汉代葬具更偏重画像装饰，而北魏葬具则注重建筑构造，这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造规划。

巫先生认为四川汉代的天师道派从3世纪初开始向陕西、山西迁徙，并建立了新的基地，在寇谦之带领下在北魏兴起。这些人群继承并传播了四川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因此房形葬具在北朝时期中国北部变化和使用是这一文化互动的体现。但巫先生并未注意四川地区天师道派与寇谦之北天师道派的差异。四川地区的天师道派的渊源，首先是汉代首任天师张道陵在鸡鸣山、青城山的活动，以及张鲁的长期经营。张鲁之后，历

① 巫鸿著，郑岩译：《“华化”与“复古”——房形椁的启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年2期，1～6页。

代张天师的主要活动地区为龙虎山，并形成道教正一派。而寇谦之学道于嵩山，从未至巴蜀和龙虎山，且寇谦之自称天师后，对天师道的组织、仪轨等都进行了较大而彻底的改革，如编订《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取消原二十四治等[①]。因此，很难说来自四川的丧葬习俗，在新的“北天师道”系统中还能保留多少。在张天师道派系统主要活动的江西地区，至今未发现与四川地区汉代房形葬具相同的丧葬形式和葬具，因此认为北魏房形葬具来源于四川，还需商榷。有学者认为汉代葬具的性质与北魏葬具不同，汉代葬具为“棺”，北魏葬具为“椁”，因此，即便汉代葬具对后世葬具存在影响，至少也应直接影响到棺，而北朝“画像石棺”为无房形结构，因此北魏葬具来源并非于此。此说也需斟酌[②]。试举北魏宁懋房形葬具。这件葬具内外都线刻图像，而从线刻的题材和手法看，显然与北朝的“画像石棺”相似，两者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以此理由否认两种房形葬具存在关系，稍显证据不足。

# 四、结　　语

北魏时期房形葬具的出现开创了一类新的丧葬模式，虽然对比同时代其他墓葬形式并数量上的优势，但其对于后世，即北朝后期到隋唐时期的高等级人群的丧葬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其研究的继续深入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北朝隋唐时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从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对比看，山东地区的汉代石祠可能是房形葬具的来源之一，因为石祠的构造模式与房形葬具十分相似，且史料记载山东地区的工匠在北魏统一北方过程中也被大量迁徙至魏都平城。从北魏平城发现的大量石雕遗物，如石窟寺造像等可以认识到，石雕工艺在北魏平城时代发展和繁荣，显然与这批工匠的迁徙定居有着密切关系，北魏较早的几件房形葬具构筑采用的三角梁、抬梁的结构与山东地区汉代石祠构筑方式的极大相似性也可作为佐证。另外，北魏政权与魏晋时期传统汉文化的“保留地”河西地区产生大量文化借鉴、吸收。倪润安先生认为，这类房形葬具是汉文化在鲜卑北魏政权影响力逐渐增强的体现，其说不谬。魏晋以来河西地区保留了传统的中原汉文化因素，北魏在发展中，也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和采用了河西地区的文化。宁夏、陕西、甘肃等地发现的魏晋十六国以来的一些墓葬更是直接在墓室上构筑房屋模型，或将墓室处理成瓦顶房屋形。从墓葬文化上看，北魏早中期出现的房形葬具，其源流之一显然是河西地区墓葬中大量采取的建筑因素。一些学者试图解释北朝时期的房形葬具与汉代房形葬具的相似性，甚至认为两者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根据本文观察，四川地区汉代的房形葬具对北魏房形葬具的影响，难以找到直接证据，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

---

①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378 ~ 385 页。

② 齐香钧：《北朝至隋墓葬出土石堂再研究》，《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 6 期，68 ~ 73 页。

系，东汉—蜀汉时期四川地区的房形葬具（画像石棺）并非衰落后在华北重现，且两者的构造方式具有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所谓“四川移民”和“天师道教”影响可能不成立，因此笔者认为此说应当商榷。而山东地区的东汉石祠雕刻和构造技术以及河西地区的墓葬环境中体现的大量殿堂建筑构造以及其思想内涵被北魏的一些人群所吸取，并以房形葬具的形式表现，这不仅在考古资料中体现出来，在有限的北魏时期史料中同样可以找到证据，北魏王朝对中国北部的征服和统一，以及大量山东、河西移民在北魏平城地区的定居说明，这种技术和文化的引入和影响是直接的。

附记：最近，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进行，又有一批新的房形葬具材料被发现，如大同贾宝墓、吕续墓发现的房形葬具。将这批新发现的葬具纳入本文已发现的房形葬具进行考察，发现一些规律仍然符合。这批新材料详细资料的进一步公布，相信可以对这类葬具的规律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

## Research on Room Shaped Coffi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ang Ziyu

**Abstract:** Room shaped coffins, as a special kind of coffins, which were developed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uneral culture of later Dynasties. In this paper, a preliminary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se room-shaped coffins would be made to explore the pattern of their shape-changing. Furthermore, the identity information currently available of the users of these coffins are listed in the paper. At las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for the reason of the“stone templ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extension of Western craftsmanship,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ntity building, the“Guan Ting”，and the room shaped coffins of Eastern Han Dynasty.
**Keywords:** Northern Wei Dynasty; Room-shaped coffin; typological analysis

# 唐代“东突厥汗国”复兴原因探究

张　锐[1，2]　那　玮[3]

（1.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2. 安徽建筑大学，合肥，230601；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呼和浩特，010010）

**摘要：**贞观四年（630年），唐灭东突厥汗国，广设羁縻州府安置降户。内附的东突厥降户经过五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于永淳元年（682年）起兵反唐，并建立汗国。“东突厥汗国”的复兴，与唐朝政治上羁縻制度的建立、经济上优待政策的推行、军事上战略举措的失当、周边民族的兴起等因素有关外，民族意识在其复兴过程中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唐朝将突厥降部和其他不同民族安置于河曲地区，彼此间文化上的差异、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为突厥民众族属意识的保留、民族情结的维系和民族认同感的强化提供了空间上的保障，其在“东突厥汗国”复兴中起到了内聚力量、外御强敌的作用，并推动复兴事业走向成功。

**关键词：**东突厥汗国　复兴　原因　探究

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上，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突厥人建立了一个以游牧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强大国家——突厥汗国。但是突厥汗国的统治并不稳固，由于受到游牧经济的脆弱性、统治集团内部汗位争夺、被征服诸部落的反抗，以及隋朝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离间计”等因素的影响，突厥汗国在历经土门可汗、木杆可汗和他钵可汗几代的强盛之后，于开皇三年（583年）分裂为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于贞观四年（630年）被唐所灭，唐太宗本着“怀柔远人，义存羁縻”的原则，设置羁縻州府安置内附突厥民众，以安定异族、稳固统治。贞观十三年（639年），发生突利之弟结社率和突利之子贺逻鹘谋刺太宗事件，太宗反思羁縻政策的得失并做了相应的策略调整，将在河南等内地的突厥人遣返漠南故地。重返漠南的突厥人在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于永淳元年（682年）重建汗国，史称“后突厥汗国”或“第二突厥汗国”。

东突厥汗国兵败内附，唐王朝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安置降户，突厥部民在唐的羁縻统治下本是安居乐业、人畜兴旺，为何还要铤而走险，起兵反唐呢？诸多学者提出了

一些见解，如经济上缺少维护“华夷一统”的内聚力，政治上唐王朝的复杂矛盾，军事上唐王朝战略防御和决策的失误，等等。以上因素确实存在，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独立、振兴和发展中，维系民族共同体核心因素的民族意识至关重要，东突厥降户在唐朝设置的羁縻州府已安居乐业几十年，如果自我认同的民族意识消失了，即使外部条件如何有利，他们也不会自愿放弃较为安逸的生活而采取残酷的战争形式复兴汗国。故本文拟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史料，对“东突厥汗国”复兴的原因做进一步剖析。

## 一、政治上羁縻制度的脆弱

630 年，东突厥汗国“举族内附”，唐设置众多羁縻州府，以“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方式对突厥民众进行安置。

依据史料记载，将唐设置的羁縻州府统计如表一。

**表一　唐设置的羁縻州府**

| 州府名 | 治所 | 知名都督 | 建置年代 | 文献出处 |
| --- | --- | --- | --- | --- |
| 顺州都督府 | 先寄治营州五柳戍，后迁至幽州 | 突利设 | 贞观四年 | 《资治通鉴》：“五月，辛未，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帅其部落为官（顺州，寄治营州五柳戍）。”卷 193，第 6077 页 |
| 化州都督府 | 夏州 | 阿史那思摩（李思摩） | 贞观八年 | 《资治通鉴》：“壬申，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考异曰：旧传云为化州都督。”卷 193，第 6077 页。<br>注：贞观十三年，李思摩重返漠南，废 |
| 祐州都督府 | — | — | 贞观四年 | — |
| 长州都督府 | 德静 | — | 贞观七年 | 《旧唐书・地理志》：“七年，于德静县置长州都督府。八年，改北开州为化州。十三年，废化州及长州，以德静、长泽二县来属。”卷 193，第 1413、1414 页。<br>注：贞观十三年废。 |
| 北开州都督府 | 德静 | 阿史那思摩（李思摩） | 贞观四年 | 《资治通鉴》：“……独思摩随之……拜右武侯大将军，寻以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卷 193，第 6077 页。<br>注：贞观八年改为化州 |
| 北宁州都督府 | 灵州 | 阿史那苏尼失 | 贞观四年 | 《资治通鉴》：“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卷 193，第 6079 页。注：李思摩北渡后废 |
| 北安州都督府 | 灵州 | 康苏密 | 贞观四年 | 《资治通鉴》：“壬寅，以右骁卫将军康苏密卫北安州都督。”卷 193，第 6079 页。注：李思摩北渡后废 |
| 北抚州都督府 | 夏州 | 史善应 | 贞观四年 | 《资治通鉴》：“六月，丁酉……以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卷 193，第 6079 页。注：李思摩北渡后废 |

续表

| 州府名 | 治所 | 知名都督 | 建置年代 | 文献出处 |
| --- | --- | --- | --- | --- |
| 贺兰州 | 凉州 | 契苾何力、沙门 | 贞观六年 | 《册府元龟》：“六年十月契苾何力率其部六十万余家款塞，帝处之凉州。”卷 971，外臣部，降附，第 11480 页。注：贞观十六年沙门带领众叛归漠北 |
| 丰州都督府 | 丰州 | 史大奈 | 贞观四年 | 《资治通鉴》：“丁丑，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卫丰州都督，隋以五原郡置丰州……是年，复以突厥降户，置丰州九原郡。”卷 193，第 6078 页 |
| 定襄都督府 | 寄治宁朔，领阿德州、执失州、苏农州、拔延州 | — | 贞观四年 | 《新唐书・地理志》：“定襄都督府（贞观四年析颉利部为二，以左部置，侨治宁朔），领州四：（贞观二十三年分诸部置州三。）阿德州（以阿史德部置）、执失州（以执失部置）、苏农州（以苏农部置）、拔延州。”卷 40，志第 33，第 1120 页。注：贞观十五年李思摩北渡后成为军府 |
| 云中都督府 | 寄治朔方县，领舍利州、阿史那州、思壁州、绰州、白登州 | — | 贞观四年 | 《新唐书・地理志》：“云中都督府（贞观四年析颉利右部置，侨治朔方境），领州五：（贞观二十三年分诸部置州三。）舍利州（以舍利吐利部置）、阿史那州（以阿史那部置）、绰州（以绰部置）、思壁州白登州（贞观末隶燕然都护，后复来属）。”卷 43，志第 33 下，第 1120 页。注：贞观十五年李思摩北渡后成为军府 |
| 瀚海都督府 | 车鼻部 | 吐迷度 | 贞观二十一年 | 《旧唐书・列传》：“以吐迷度子前左屯卫大将军、翊卫左郎将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瀚海都督。”卷 195，列传 145，第 5197 页 |
| 新黎州 | 羯漫陀部 | — | 贞观二十三年 | 《新唐书・列传》：“初，其子羯漫陀泣谏车鼻，请归国，不听。乃遣子菴铄入朝，后来降，拜左屯卫将军，建新黎州，使领其众。于是突厥尽为封疆臣矣。始置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都护府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卷 140 |
| 狼山都督府 | 歌逻禄右厢部 | — | 永徽元年 | |
| 浑河州 | 乌德鞬山左厢部 | — | 永徽元年 | |
| 仙萼州 | 车鼻汗部 | — | 永徽元年 | 《新唐书・地理志》：“榆溪州（以契苾部置）、窴颜州（以白霫部置）、居延州（以白霫别部置）、稽落州（本高阙州，以斛萨部置。永徽元年废高阙州，更置稽落州，后又废，三年以阿特部复置）。余吾州（本玄阙州，贞观中以骨利干部置，龙朔中更名）、浚稽州仙萼州（初隶瀚海都护，后来属）。”卷 43，志第 33 下，第 1122 页 |
| 浚稽州 | 车鼻汗部 | — | 永徽元年 | |

羁縻府州是唐朝安置内附少数民族而采取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其特征是以内附民族的活动范围作为行政区划的基础，各府州设都督、刺史管理民众，都督、刺史均由原部落首领担任，且可世袭。羁縻府州制度是当时唐朝与少数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被广泛应用于处理边疆民族关系中，对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促进民族融合产生了积极作用。羁縻州府实质是在原部落治理方式的基础上做简单的调整，其治理方式、隶属关系、生活方式不变，各府州的都督、刺史权力较大，监管方式单一且薄弱。《新唐书》

载："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①] 都督或都护个人的行为向背，很容易成为全府或全州民户的群体行动，尤其是游牧部落这种"一呼百应、上下用命"的特性，更加剧了羁縻州府的不稳定性。薛宗正先生曾指出："（羁縻政策的维系）保证了突厥羊马蕃息，增强了突厥各部的经济实力，从而导致突厥游牧奴隶制度的恢复和发展，于是享受优待的突厥降部不再满足于既得的优待，羽翼丰满的突厥游牧奴隶主贵族不再乐于从事受人指挥的征讨，而要求独立及大规模武装行动的自由，以利于肆无忌惮地劫夺奴隶与财富。"[②] 羁縻州府的设置，主观上是唐朝为安定异族，巩固统治，但因俗而治的特性在客观上为加强内附民族贵族统治者与民众间的联系和彼此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内附民族铤而走险，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进行军事行动提供了可能。

## 二、经济上优待政策的推行

唐朝对内附的突厥民众实行优待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对初降突厥人的赏赐。《旧唐书·李大亮传》载李大亮对太宗进言曰："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③] 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唐朝给予突厥贵族、平民的待遇是相当丰厚的，"时颉利可汗败亡，北荒诸部相率内属。有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勤及七姓种落等，尚散在伊吾，以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以绥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众冻馁，遣于碛口贮粮，特加赈给"[④]。唐朝对内附突厥民众的经济优待政策具有普遍性，因而耗费巨大，既增加了唐朝的经济负担，又促进了羁縻州府内突厥民族经济的复苏。

二是内服突厥民众不承担各项赋税。《新唐书》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⑤] 薛延陀主夷男对唐的优待政策也感到奇怪："至尊破突厥，须收为奴婢，将与百姓，而反养之如子……"[⑥] 薛宗正先生在其著作《突厥史》中提到："630年（贞观四年）东突厥初降时每人颁帛一匹，碛口屯粮，来即赈济，保证他们衣食无缺。突厥降户虽立州府，待遇与汉民编户有异，既不收

---

①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1119页。

②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35页。

③ 《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中华书局，1975年，2389页。

④ 《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中华书局，1975年，2388页。

⑤ 《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1119页。

⑥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5164页。

租、庸、调，又不征羊马口赋，仅仅象征性地‘岁贡貂皮以充租赋’。”[①] 唐朝希望用优待的经济政策来维系羁縻州府的统治，其效果固然能招揽人心，但却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内附人口基数庞大，其生存所需物质资料是唐朝所不能长期承受的，唐朝君臣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册府元龟》载：“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匈奴。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②] 优待的经济政策在调整藩属关系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新唐书·突厥传》称：“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③] 实质上这种经济政策是一种金帛收买政策，《苾伽可汗碑》《阙特勤碑》均有记载，“他们（唐朝）慷慨地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丝绸，中国人民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他们用甜言蜜语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们靠近他们”[④]。

优待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唐王朝强盛、开放的气魄，但在客观上带来了两方面的弊端：一方面损耗了唐朝的经济实力，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因为赐给突厥的这些金、银、丝绸等都是由农民纳税提供的；另一方面，五十余年不承担贡赋，使得内附突厥经济实力大增。“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⑤] 在唐优待政策统治下，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程度显而易见。

## 三、军事上战略举措的失当

东突厥举族内附后，北方边患基本解决，太宗便开始实施他的东西扩张的军事计划，在计划执行中，一些战略举措的推行，逼迫“东突厥汗国”复兴。

### （一）牵制薛延陀汗国

贞观二年（628 年），摆脱了西突厥残酷统治的薛延陀人返回故地与漠北的薛延陀人会合，建立汗国，称雄于漠北。东突厥汗国降唐后，薛延陀在唐朝的支持下不断壮大，成为北方草原地区一个强大的民族政权。《旧唐书》载：“（贞观）四年，平突厥颉利之后，朔塞空虚，夷男率其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尉揵山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三百里，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⑥] 薛延陀的日益强盛，引起了唐太宗的注意，他对漠北地

①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432 页。

② 王钦若、杨亿《册府元龟》卷 407《将帅部·谏诤》，中华书局，1960 年，4847 页。

③ 《新唐书》卷 25《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 年，6042 页。

④ 转引自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阙特勤碑》南面第 5 行。

⑤ 王钦若、杨亿《册府元龟》卷 964《外臣部·封册》，中华书局，1960 年。

⑥ 《旧唐书》卷 199 下《北狄传·铁勒传》，中华书局，1975 年，5344 页。

区出现的又一个强大的民族政权，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担心薛延陀成为突厥第二，对边疆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又想使薛延陀成为唐王朝的蕃屏。《旧唐书》载："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①] 这种分化瓦解措施的作用，在夷男死后两子因争夺汗位而相互杀戮的事件中显露出来。

贞观十三年（639年），结社率的叛唐也给唐王朝削弱薛延陀势力提供了机会。结社率谋刺之事，给太宗迁突厥部分降户回故地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诱因，实际上是太宗想让突厥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重新出现在北部边疆地区，它是太宗调整北部藩属管理体制的结果。其目的主要是试图在日益强大的薛延陀汗国和唐朝直接管辖区域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以缓解薛延陀王朝给唐王朝带来的压力。唐太宗的这个意图在给夷男的诏书中有充分的体现："思摩等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我策尔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居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镇抚部落。若其逾越，故相抄掠，我即将兵各问其罪。此约既定，非但有便尔身，贻厥子孙，长守富贵也'。"[②] 这段史料反映了唐太宗的意图是让突厥牵制薛延陀，两者相互监督、制约，而这在无形中为"东突厥汗国"的复兴提供了"资本"，东突厥的复兴先声正是这些迁回漠南的突厥人首倡的。

在唐朝分化瓦解政策影响和军事进攻下，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灭亡，归附唐朝。"其后延陀西遁之众，共推夷男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率部落七万余口西归故地。乃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北。"[③] 薛延陀的灭亡为突厥族的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少了薛延陀的军事进攻，突厥部民发展生产的时间得到了保障，同时薛延陀的灭亡使广大的北方草原成为突厥的领地，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其休养生息提供生产资料基础。先进的生产技术、广阔的发展空间、唐朝的扶持和大漠南北较为安定的环境，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以后骨咄禄的复国行动奠定了基础。

## （二）频繁的军事扩张

唐太宗时期，频繁地征用突厥人进行军事行动，纵观这一历史时期，其军事行动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前期的主动征讨；二是后期附属国反叛而不得已的被动应战。这些军事行动，客观上为"东突厥汗国"的复兴提供了壮大军事实力的机会。

最为典型的军事扩张为用兵西域。唐朝为进一步促进内地与西域的政治、经济和

---

① 《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铁勒传》，中华书局，1975年，5344页。

②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5163、5164页。

③ 《旧唐书》卷199《北狄传·铁勒》，中华书局，1975年，5348页。

文化的交流，于东突厥汗国灭亡后，便开始极力经营西域。《新唐书》载：“(贞观)二十一年，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杨弘礼、李海岸等五将军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讨龟兹。”[①] 指挥这次战争的主帅是原东突厥首领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还有契苾部和突厥侯王十余万骑。“社尔攻凡四十日，入之，擒其王，并下五大城。遣左卫郎将权祗甫徇诸酋长，示祸福，降者七十余城，宣谕威信，莫不欢服。”[②] 在用兵西域过程中，突厥、铁勒等内服部落成为唐朝可靠的兵源保障，这次以游牧民族武装为主进行的战争，反映出突厥等游牧民族军队在唐朝经营西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突厥等内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强大战斗力。此外，突厥借唐用兵之机，多次向唐索取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将东北的契丹、奚等族收归治下，大大扩充自身实力。作战中，突厥人对唐朝将领的用兵策略和军队部署有了充分了解，为此后“东突厥汗国”的复兴做好了兵源储备、物质保障和战略部署的准备。

## 四、文化上民族意识的激发

民族意识是“人民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③]，具有稳定性、排他性特征，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生命力的核心，是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东突厥汗国”复兴深层原因还在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激发。

### （一）多民族聚居强化了民族认同感

唐朝除了将突厥部落安置于河曲之地外，同时也将其他降附于唐的民族处之于河曲地带，以羁縻府州进行管理。以时间为序，简述如下。

粟特族：“贞观四年，唐廷将随突厥降户入唐的粟特部落，安置在灵州与夏州两州南境的‘六胡州’，由粟特首领担任刺史，行政上隶属灵州都督府与夏州都督府。”[④] 与此同时，将归降的粟特诸部牧民安置在“河曲”地域的中偏西区域，即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及鄂托克旗的东半部、乌审旗西境、宁夏盐池县与陕西定边县北境之地[⑤]。

党项羌族：羌族入居河曲之地，最早是在贞观五年，《册府元龟・降附》记载：“先

① 《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传・阿史那社尔传》，中华书局，1975年，4116页。

② 《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传・阿史那社尔传》，中华书局，1975年，4116页。

③ 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113页。

④ 朱振宏：《突厥第二汗国建国考》，《欧亚学刊》(第十辑)，中华书局，2012年。

⑤ 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期。

是，(贞观)五年，诏开河曲地为十六州。是年，党项等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①]高宗龙朔三年，党项羌族拓跋部被吐蕃所逼，请求内徙，唐廷“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②]。

铁勒：“贞观二十年，铁勒归附，于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③]灵州都督府位于河曲西部。

吐谷浑：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汗国被吐蕃所灭，《旧唐书·吐谷浑传》记载：“高宗遣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等救吐谷浑，为吐蕃所败，于是吐谷浑遂为吐蕃所并。诺曷钵以亲信数千帐来内属，诏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置大使，始徙其部众于灵州之地，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欲其安而且乐也。”[④]

稽胡族：唐初，稽胡活跃，永淳二年(683)四月，“绥州城平县人白铁余率部落稽之党据县城反，伪称尊号，署百官，又进寇绥德，杀掠人吏，焚烧村落，诏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⑤]。可见，东突厥降唐前后，河曲已有不少的稽胡族。

河曲地区内附民族较多，文化多元、生活方式多样，彼此间的差别明显，民族意识就在差异中突显出来。多民族交错杂居，使得内附的突厥民众的民族意识没有被解构，而是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民族的认同感也被强化。由于军事、经济力量的悬殊，东突厥汗国虽然被唐灭亡，但唐朝分化瓦解的羁縻统治仍然没有削弱他们的民族意识，一旦时机成熟，这种维系突厥民族存在的精神力量便会迸发而出。

## （二）群体观念强烈

突厥民族的群体观念主要通过他们的图腾文化反映出来，美国语言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曾对“图腾”一词做过详述：“在鄂吉布瓦方言中，有‘图腾’一词——实际上往往读作‘多丹’——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例如，狼的图形是狼氏族的图腾。”[⑥]

突厥人生活在沃野千里的蒙古草原和中亚草原。草原上草木茂盛，禽兽杂多。突厥人以有灵性的动物——狼作为他们的图腾。史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

① （北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中华书局，1960年，5060页下。

②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党项羌》，中华书局，1975年，5292页。

③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灵州大都督府》，中华书局，1975年，1415页。

④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吐谷浑》，中华书局，1975年，5300页。

⑤ 《旧唐书》卷83《程务挺传》，中华书局，1975年，2785页。

⑥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1年，162页。

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①] 突厥人对狼顶礼膜拜，在突厥的文化里处处体现着“狼”元素，如首领的大帐门前，立有狼纛，杆上刻有狼头；突厥可汗的卫队，称为“附里”，意即为狼。“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②] 考古发掘也发现狼图腾的迹象，“苏联考古学家在蒙古的一个古墓中发现一条腰带，腰带正中央绣有一只母狼奶四个突厥男孩的图画”[③]。突厥的狼图腾在突厥文学上也有所反映，“传说我是你们的可汗 / 你们拿起弓箭随我征战 / 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 / 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 让我们的铁矛向森林一样 / 让太阳作旗帜 / 蓝天作庐帐”[④]。

研究图腾文化，对了解、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共同心理和精神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家弗莱曾说：“图腾观不但是一种崇拜信仰，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就宗教信仰方面来说，人们对图腾具有一种出乎自然的尊敬和保护关系，同时也划出了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应有关系。”[⑤] 突厥族以狼为图腾，狼的智慧、团队精神、家族责任感、顽强与尊严的性格是突厥族文化的象征，也是突厥人民精神风貌的缩影，这些因素对东突厥汗国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阙特勤碑》东面第 12 行写道：“由于上天赋予力量。我父可汗的军队象狼一样，（而）其敌人象绵羊一样。”[⑥] 这不仅反映了他们狼图腾的意识，更深层含义在于狼的精神品质赋予他们以力量和勇气，对狼的崇拜正是突厥人对自身民族性格的界定，实际上起到了凝聚民族亲和力、增进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加强民族团结的作用。因此，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一旦物质条件和外部机遇具备，复兴便是理所当然之事，所以，“突厥反，二十四州并叛之”，这种上下率命、一呼百应、共同进退的特征正是群体观念强烈的生动体现。

## （三）尚武精神突出

突厥族的尚武，主要体现在对马匹和武器的重视。突厥民族生活在北方草原中，纵

① 《周书》卷 50《异域传下 · 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 年，907、908 页。

② 《周书》卷 50《异域传 · 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 年，909、910 页。

③ 转引自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阿不都克里木 · 热合曼：《维吾尔民俗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462 页。

④ 朱涛：《史诗〈各古斯可汗的传说〉的美学旨趣》，《西域研究》1991 年 1 期。

⑤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年，133、134 页。

⑥ 转引自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阙特勤碑》，东面第 12 行。

马驰骋，弯弓射杀是他们的天赋"才能"，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大唐创业起居注》载："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①] 突厥军队以骑兵为主，骑兵的装备主要是战马，马是突厥族进行战争的主要装备，同时也是突厥族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突厥人基本上户户有马，人人善骑，征战时，每一战士带数匹马偕行，除战用马、备用马外，还有食用马。所至地区，劫掠为食，供应不足时，就宰自己的一匹公马，如果需要饮料就挤一匹母马的奶解渴。可见，马是突厥族最基本的战争装备。骑兵的武器有弓矢、鸣镝等远程射器和可以在马上使用的长矛、马绊。史载："突厥有角弓、鸣镝、甲、矟、刀、剑，善骑射，性残忍。"[②] 突厥当时使用的弓箭已相当复杂，马的装备也很先进。考古发现突厥人的随葬品中都离不开铁刀、弓箭和马具等，这在库德尔格类型的突厥墓葬中得到了体现。库德尔格类型的突厥墓又称"库德尔格文化"，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于阿尔泰至图瓦西部地区，墓中殉马或随葬马具……，典型遗物包括弓箭、装饰素面饰牌的腰带及簪头、马鞍、马镫以及铁剑和短剑。这些随葬品充分反映了游牧经济生活的特征，重马、尚武成为马背民族的标志。而这种标志在阿尔泰山的考古发掘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对阿尔泰山突厥墓葬随葬品经过粗略整理，统计如表二。

**表二　阿尔泰山突厥墓葬随葬品统计**

| 墓葬类别 | | 殉马 | 马镫 | 马衔 | 带具 | 武器（铁镞等） |
|---|---|---|---|---|---|---|
| 土堆墓 | 单人葬 | √ | √ | √ | √ | √ |
| | 合葬 | | √ | √ | √ | √ |
| 石堆墓 | 单人葬 | √ | √ | √ | √ | √ |
| | 合葬 | √ | √ | √ | √ | √ |
| 不明墓葬 | | | √ | √ | | √ |

注：资料来源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③]

此外，在蒙古国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突厥石人像，也反映了突厥族尚武的风俗。他们多袍服左衽，腰束宽带；头戴无檐高帽或披散头发；左手持杯，右手杖刀抚剑，贴于胁下。以小洪那海地区的石人最为典型。老一辈学者以岑仲勉为代表，认为："此中石像，显系突厥人所称之 ballbal（杀人石）。"[④] 这在唐朝的史书上也有记载："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春夏死者，候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 1，中华书局，1985 年，1 页。

② 《隋书》卷 84《北狄传 · 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 年，1864 页。

③ 吉谢列夫著，王博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 年。

④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卷，中华书局，1958 年。

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瘗之。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①]《隋书・突厥传》载：“……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②] 这些记载表明了突厥族是以战争求生存的一个民族，突厥尚武、重马等习俗，充分体现了其好战的民族特性，这在突厥兴起和巩固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深深影响着突厥族的民众。

## 五、吐蕃的兴起为其复兴提供了机遇

唐太宗前期的武力征伐终于在 7 世纪中后期引发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使唐朝出现了周边不宁的形势，尤其是 7 世纪吐蕃的迅速崛起和向外扩张使唐朝陷入了军事困境。吐蕃的扩张严重损害了唐朝的拓展疆土，双方的军事冲突是在高宗当政时期（650 ~ 683 年），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东突厥复兴之时。龙朔二年（662 年），吐蕃开始进军西域，并联合西突厥对抗唐朝，唐朝将主要兵力用于征讨吐蕃，客观上为东突厥汗国的复兴提供了机会。679 年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在北方开展大规模反唐行动，正是受到了唐大败于吐蕃的影响。《旧唐书》卷 84《裴行俭传》载：“调露元年（679 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单于管内二十四州并叛应之，众数十万。单于都护萧嗣业率兵讨之，反为所败。于是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十八万，并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余万，连亘数千里，并受行俭节度。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③] 反叛很快得以平息，但随着唐朝守势局面的形成，永淳元年（682 年）阿史那骨咄禄又发动了叛唐的战争，史载：“永淳元年，骨咄禄又反。”[④] 此时，唐朝将主要兵力用于与吐蕃的作战，无力讨伐骨咄禄，东突厥汗国复兴成功。

吐蕃的兴起及其与唐朝的军事对抗，极大地牵制了唐朝对内附“东突厥汗国”反叛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吐蕃的兴起及其与唐朝的军事斗争为“东突厥汗国”复兴提供了最重要的外部机遇。王小甫在《唐对突厥的战争》一文中提到：“在唐消灭东突厥的前一年，西域高原上出现了一个吐蕃王朝（629 ~ 846 年），后来成为唐朝在西部的一个劲敌。……唐朝在与吐蕃的激烈的对抗中，把大批军事力量投向西北……”[⑤] 张广达在探讨突厥复兴时说：“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唐在与吐蕃的激烈对抗中把军事力

① 《周书》卷 50《异域传・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 年，909 页。

② 《隋书》卷 84《北狄传・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 年，1864 页。

③ 《旧唐书》卷 84《裴行俭传》，中华书局，1975 年，2803 页。

④ 《新唐书》卷 215《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 年，6044 页。

⑤ 王小甫：《唐朝对突厥的战争》，华夏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

量投向西北，这为东突厥复兴提供了机会。”[①] 孟彦弘指出：“突厥复兴是在吐蕃兴起并威胁唐廷的背景下取得成功的。”[②]

## 六、结　　语

“东突厥汗国”的复兴，是客观条件、主观因素加之恰当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唐朝在政治上设置羁縻州府，其不稳定性使得突厥民众要求摆脱唐朝统治的愿望异常强烈。经济上推行优待政策，为其休养生息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军事上唐朝一方面利用内附的突厥民众牵制薛延陀，另一方面不断征用突厥等边境民族士兵对外大规模开拓疆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也提高了内附突厥士兵的战斗力，加之藩属国人民不断的反叛和唐朝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民族政策上的举棋不定，致使其政治内聚力衰弱，军事威慑力削弱、文化影响力下降，维系羁縻统治的强大后盾土崩瓦解，客观上成就了“东突厥汗国”的复兴。主观上突厥民族文化中长期积淀的恒定因素——突厥民众的民族意识复苏及向往曾经辉煌历史的强烈民族情结，对“东突厥汗国”的复兴起到了凝聚人心、巩固团结的作用。此外，吐蕃的兴起及其与唐朝的战争，为“东突厥汗国”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永淳元年（682 年）内附“东突厥汗国”民众在阿史那骨咄禄带领下重建汗国，至天宝四年（745 年），白眉可汗被回鹘思力裴罗斩杀，标志着存在了 62 年的“后突厥汗国”灭亡，“东突厥汗国”的复兴，对唐朝内政外交和各民族间的政权交替、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Study the Factors of the Eastern Turkic Khanate’s Revival

Zhang Rui　Na Wei

**Abstract:** In 630, The Eastern Turkic Khanate was exterminated by the Tang Dynasty, Tang Dynasty, implemented an appeasement policy to govern it. With more than fifty years developed, the Eastern Turkic Khanate broke out a fierce war with Tang Dynasty in the first year of Yongchun (A. D. 682), and established their state power, known as “The Later Turkic Khanate” or “The Second Turkic Khanate”.

---

① 转引自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70 页。张广达：《突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426 页。

② 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252 页。

The reasons of the Eastern Turkic Khanate’s revival were include many factors, first,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appeasement policy by the Tang Dynasty;seco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preferential policies;thirdly,the improper measures of military strategic;fourthly,The rise of surrounding nationalities and so on. Furthermore,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stern turkic khanate’s revival. The Tang Dynasty settled the Turks and other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Hequ area, and their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difference in lifestyle provides spatial guarante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urkic people's ethnic consciousness,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complex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t plays a role of cohesive force and external defense against strong enemies in the revival of the “Eastern Turkic Khanate”, and promotes the success of the revival.

**Keywords:** Eastern Turkic Khanate; Revival; Factor; Study

# 五代十国壁画墓图像研究

李馥瑀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北京，100105）

**摘要：**本文由五代十国时期壁画墓的图像为例，对于主要壁画图像以及葬具装饰图样进行内容辨识，从人物题材、宇宙模式图像，以及神煞明器的图像化，讨论地区丧葬习俗以及信仰影响到图像制作工艺的差别，借此推断当时墓主、工匠、赞助者的创作意图，以及人群流动所形成的图像使用习惯的差异。高等级壁画墓的壁画设计能还原现实生活的场景，结合天象图模拟灵魂升天的宇宙空间，重现墓主人希冀的理想世界；而普通壁画墓则将墓主的燕居的生活，以连环故事的方式设计在墓室壁面上，使用“虚坐”与“通天之门”表示墓主的生死观。

**关键词：**五代十国　壁画墓　丧葬习俗　通天之门

墓葬壁画反映了人类对死后世界的幻想，甚至是向往，其中包含了墓主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以及一个时代所遵从的仪礼，因此本文借由讨论唐宋之际壁画艺术题材选择的转变，思考当时创作这些题材形成的背景。

半个世纪以来，除了王建墓之外还发现了八处高等级墓葬，分别是后梁王处直墓、后唐李茂贞墓、后周冯晖墓、后周恭帝柴宗训顺陵、南唐二陵、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吴越国钱元瓘元妃康陵、后蜀孟知祥及福庆长公主墓，这些高等级墓葬，对研究唐宋之际壁画题材的转变过程十分重要。

无纪年墓的发现则主要集中在洛阳地区与内蒙古地区，分别为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洛阳道北五路五代壁画墓、洛阳苗北村五代壁画墓、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内蒙古清水河县山跳峁墓地、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壁画墓。这些发现使得五代十国壁画墓平民墓葬的材料得到了补充，墓葬形制多用圆形墓、多角形墓葬，搭配壁面的布局，让图像的时代特征更为鲜明。以下使用五代十国壁画墓中常见的母题作为分类原则，从墓主到壁画空间的分布进行比较分析。

# 一、墓主身份辨识

辨识壁画墓墓主的重要性在近几年已经成了墓葬美术研究的重点，在人物画中辨析墓主或是夫人、侍者、仕女的身份，成为壁画研究必须直面的课题，恰好五代十国的普通墓葬中，有尚未进行墓主及其身份辨析的例子。

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第二幅为中年贵妇手持幞头（图一），旁边跟了一穿着卷口裤、软锦靴，着似胡服的侍女；第八幅与第二幅构图形式相同，第一位是青年贵妇，旁边的仆人穿着与第二幅一样较为中性。除了图像以女性为主，在两幅相同构图中，可知工匠以青年与中年区分墓主在不同时期的样貌，加上女子手里还拿了男性佩戴的幞头，这些人物设定都是为了更强烈地凸显墓主在墓葬中的形象，并且结合陪葬品出土有铜镜、铜簪，可合理推测此墓葬的墓主就是图中的贵妇。




图一　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第二壁面女子与仆人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 年 1 期，37 ~ 47 页）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提及，“汉代以来的习惯，会用古装绘古代故事人物”[①]，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描述了“在礼泉燕妃墓里后室屏风画中，男子

①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 年，372、373 页。

的衣冠与女子的发髻、衣饰皆为汉晋的形制，并非唐代时装”[①]。而在内蒙古塔尔梁墓地的壁画中则有墓主以穿着古装与时装出现的现象（图二）。而笔者在壁画的人物比较之下，发现工匠只用红色服饰表示墓主的身份，因此根据墓葬西南壁中间人物服饰颜色，可推断出殡图踩着黄色高台的就是墓主，并且此处应为墓主年老逝世之后的白发老人升天形象。其下方第二层有耕作图、刑罚图，笔者认为内容意义可待定，不过依据服饰形式及颜色，可判定人物就是在壮年黑发时期的形象，穿着也与出殡图相同，同为赭色交领服。如同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以女子青年及老年的样貌表现墓主的生平，便可知这是洛阳与内蒙古地区普通墓葬共通的特色。此墓葬壁画中体现时装的部分则在墓主日常生活的图像中——西北壁打马球休憩图与钓鱼图着唐代的圆领服时装，并非前面所塑造的古代形象。

由交领服的形制则确定其为北齐以前的服装样式，可知在此将墓主绘为古代人物，同壁面上也用古装表现孝子图，同沈从文等人认为古装是绘古代故事的人物，用古装表现墓主的孝行，在五代十国壁画墓较少见，但此类图像在宋代则开始流行成为固定样式，由塔尔梁 M1 孝子图布局与构图较为混乱的现象，可知此时孝子图并非经常使用的故事图像。

内蒙古塔尔梁墓地孝子图，原报告形容为老莱子彩衣娱亲，但主角抱住一柱，他人围着他拿着棍棒欲殴打，因此笔者认为有另一可能，《说苑·建本》：“伯俞有过，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尝见泣，今泣，何也？’对曰：‘他日俞得罪，笞，尝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②]同样的孝行故事也见《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卷末伯俞之注记[③]。画面右方有一红衣男子像是哭泣一样手捂住面部，而右方并列的位置绘制了王祥卧冰求鲤以及郭巨埋儿的孝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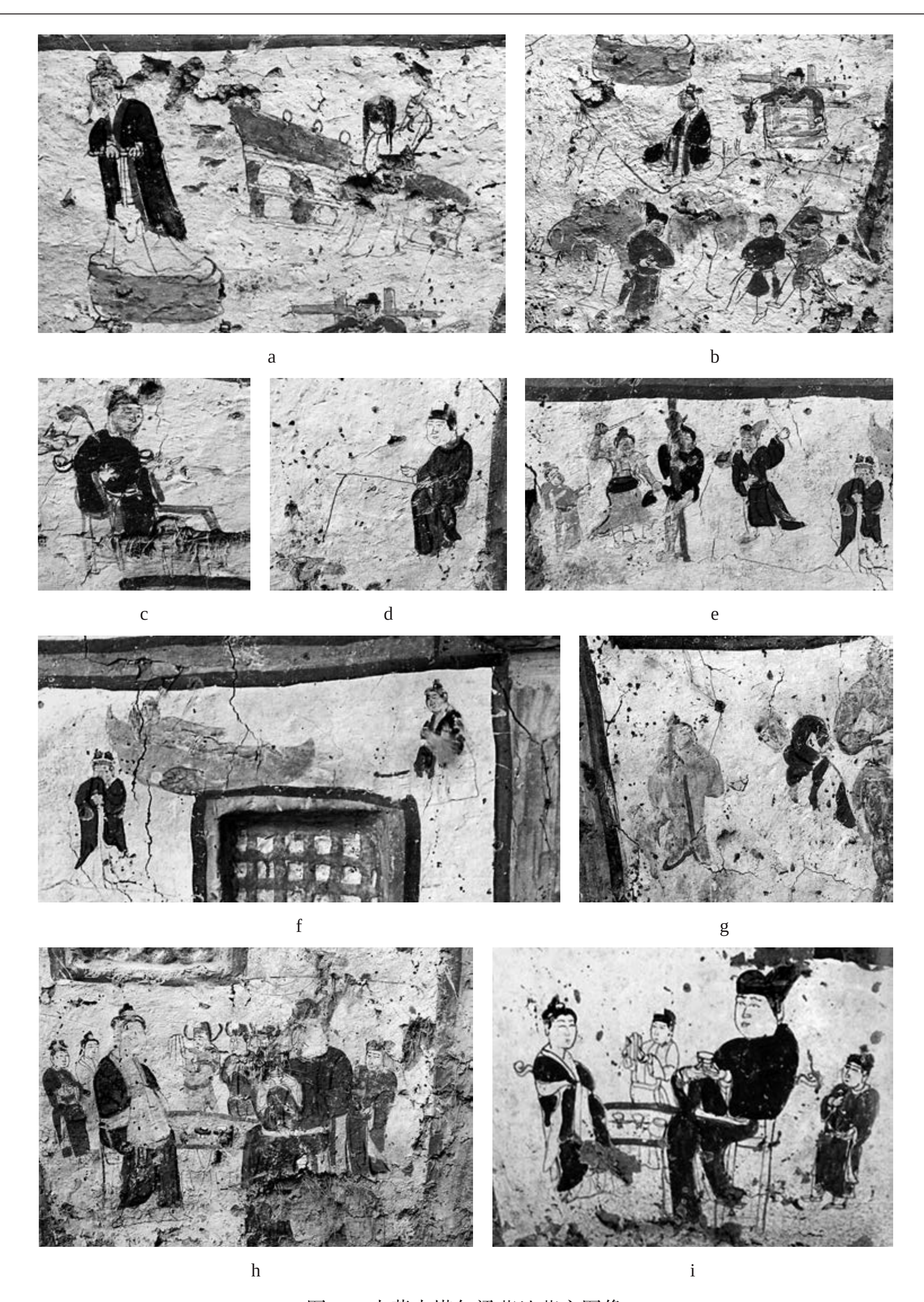
壁面最下层为典型墓主与夫人的宴饮图，墓主冠戴平巾帻，着圆领袍时装，平巾帻（图三）形制是从进贤冠转变而来，在《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自外品子任杂掌者，皆平巾帻，绯衫，大口袴。”当时无官品者穿着大袖口红衣衫以及冠带平巾帻，与墓主穿着相同。夫人衣着长裙，搭配披巾，头发用黄布挽成小螺髻（图四），此服饰形式是晚唐特色，服装宽大，宽袖长裙，比较冯晖墓（图五）与王处直墓的服饰可看出到五代十国时期，长裙较少搭配半袖，而是搭配披巾或长袍。后方侍立三位伎乐，可见此伎乐的队伍人数比起宫廷式壁画已经锐减，可见此图像的伎乐有实质作用，作为热络侍宴的气氛而用，此时伎乐已经不是作为象征墓主身份的仪仗队伍。

---

①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年，250、251 页。

② 刘向：《说苑·建本》，影印平湖葛氏传朴堂藏明钞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年。

③ 郭居敬：《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影印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全国书房，1946 年。



图二　内蒙古塔尔梁墓地墓主图像

a. M1 西南壁出殡图　b. M1 西南壁刑罚图　c. M1 西北壁打马球休憩图　d. M1 西北壁钓鱼图　e. M1 北壁韩伯俞孝行图　f. 王祥孝行图　g. 郭巨孝行图　h. M1 宴饮图　i. M2 宴饮图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4 期，16 ~ 38 页）



图三　文官戴平巾帻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 年，372、373 页）



图四　礼泉燕妃墓后室东壁南侧南边侍女头梳螺髻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年）



图五　五代冯晖墓墓室东壁持巾妇女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 年）

## 二、伎乐到宴饮图的场景变迁

唐代至五代时期，伎乐图在墓室空间中的分布位置出现变化，其含义也随之转变。墓葬里面从墓道、甬道进入墓室，伎乐首先是安排在墓道、甬道，带领墓主进入墓室，是作为象征墓主身份的图像，而在洛阳与内蒙古地区则根据墓室形制的转换之后，伎乐的规模缩小，变为以在居家场景奏乐演出的形式出现在墓主夫妇的图像场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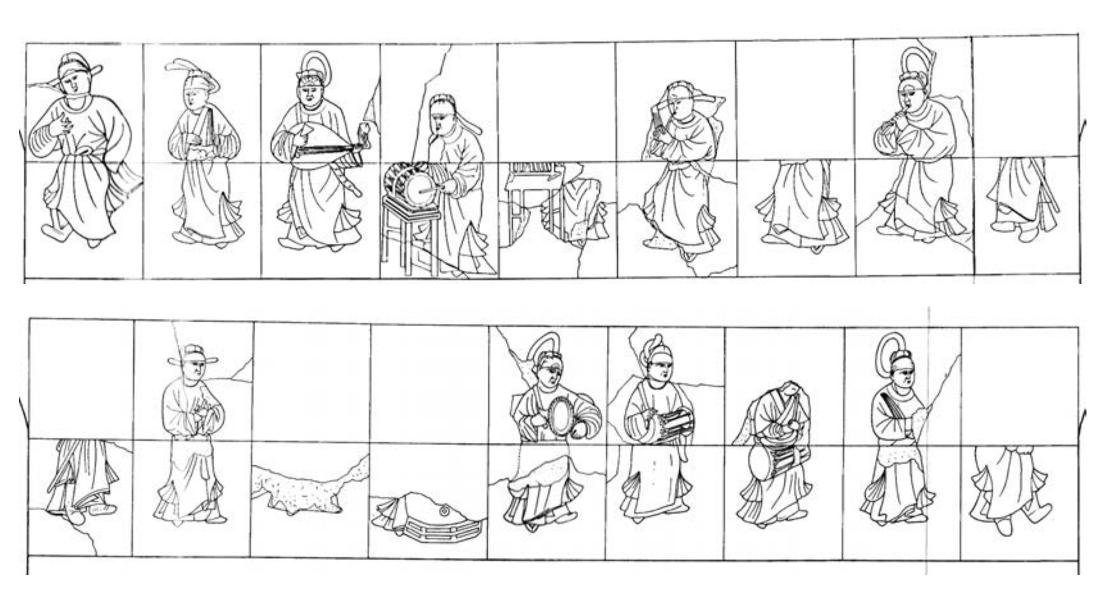
首先是以仪仗队伍象征墓主身份尊贵的墓葬，如王处直墓（图六）、李茂贞夫妇墓（图七）、冯晖墓（图八）、王建墓（图九），可见将墓主与伎乐场景分开的画面，除了李茂贞夫妇墓、冯晖墓承续了唐代的壁画配置将伎乐图放在甬道，王建墓则将伎乐图绘至棺床边，可见伎乐图位置配置与葬具之间的距离逐渐拉近。

内蒙古塔尔梁墓地将伎乐融合于墓主与夫人的宴饮场景，是目前少数具有伎乐、侍者与墓主夫妇皆出现在画面中的例子。类似的构图也在洛阳地区发现，过渡样式的例子为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图一〇）、洛阳苗北村五代壁画墓（图一一），其画面只描绘伎乐没有墓主及夫人。后晋孙璠墓（图一二）、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图一三）、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图一四），则将宴饮的场景省略，只有桌椅，没有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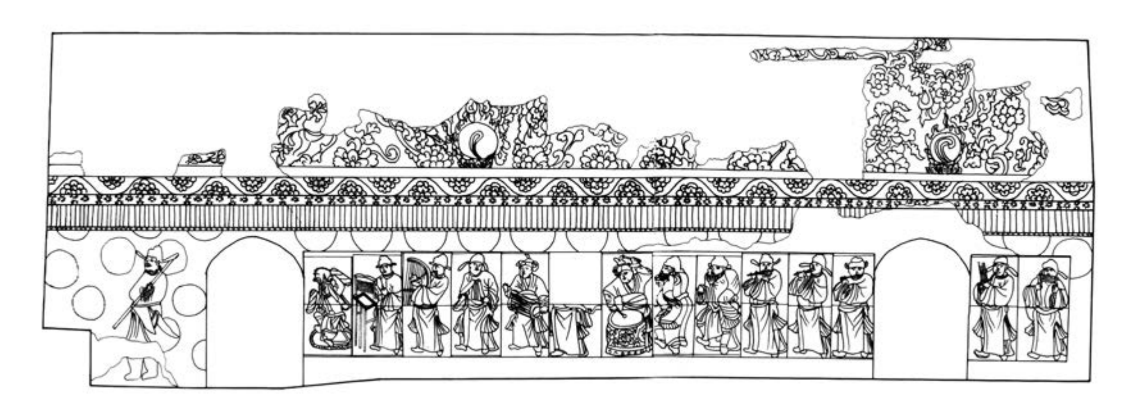
图六　王处直墓散乐浮雕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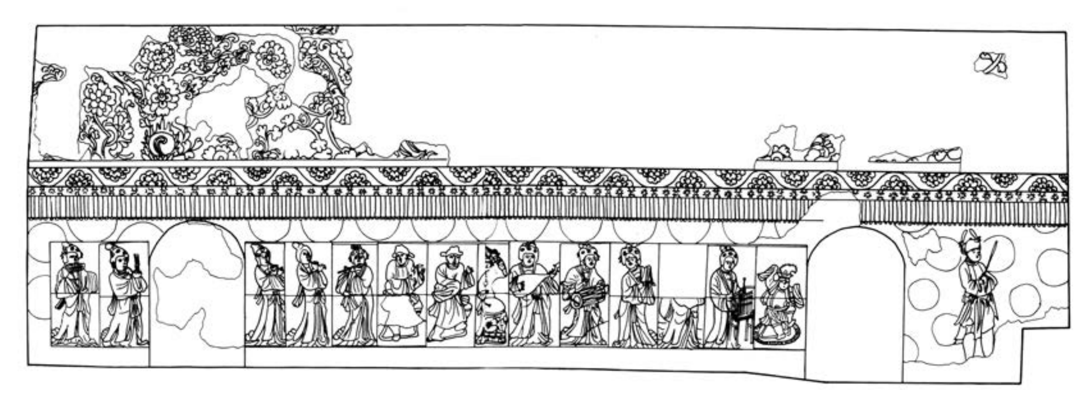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 年）



图七　李茂贞夫妇墓 M1 后甬道东西壁正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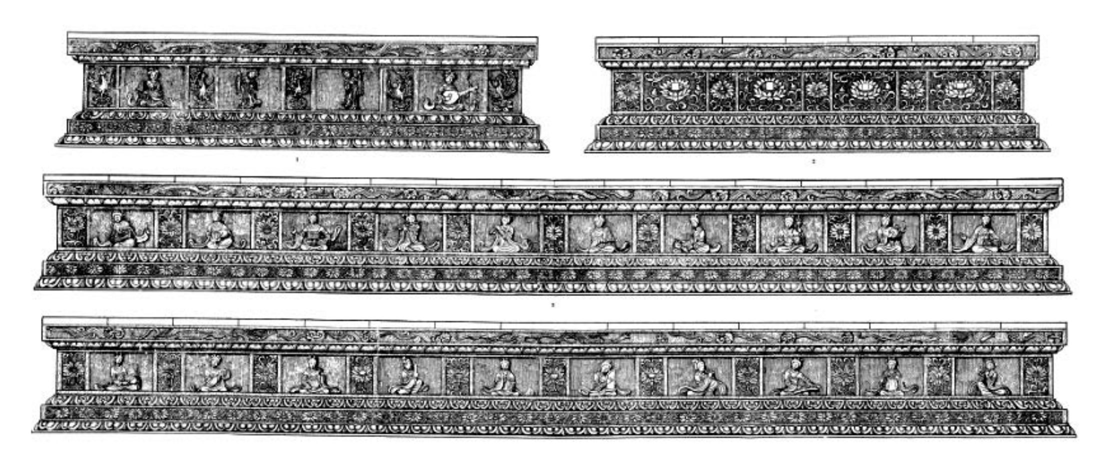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 年）





图八　冯晖墓甬道西壁正视图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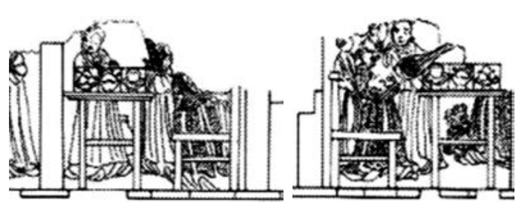


图九　王建墓棺床侧面浮雕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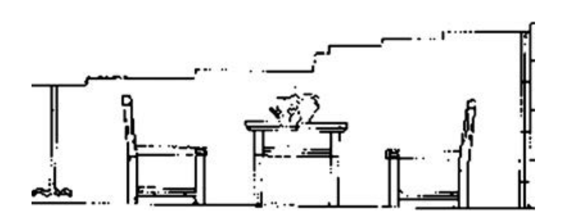
图一〇　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伎乐图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洛阳考古》2013 年 1 期，48～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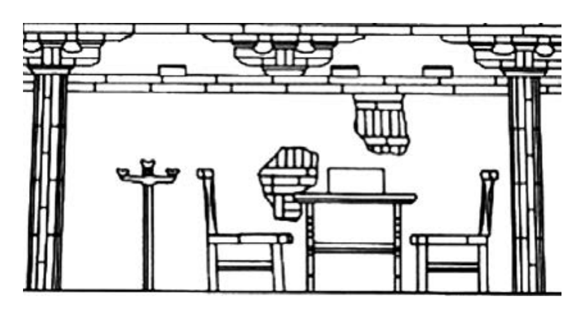
图一一　洛阳苗北村五代壁画墓伎乐图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苗北村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 年 1 期，58～65 页）



图一二　后晋孙璠墓家具图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后晋孙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 6 期，9～15 页）



图一三　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家具图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 年 1 期，29～3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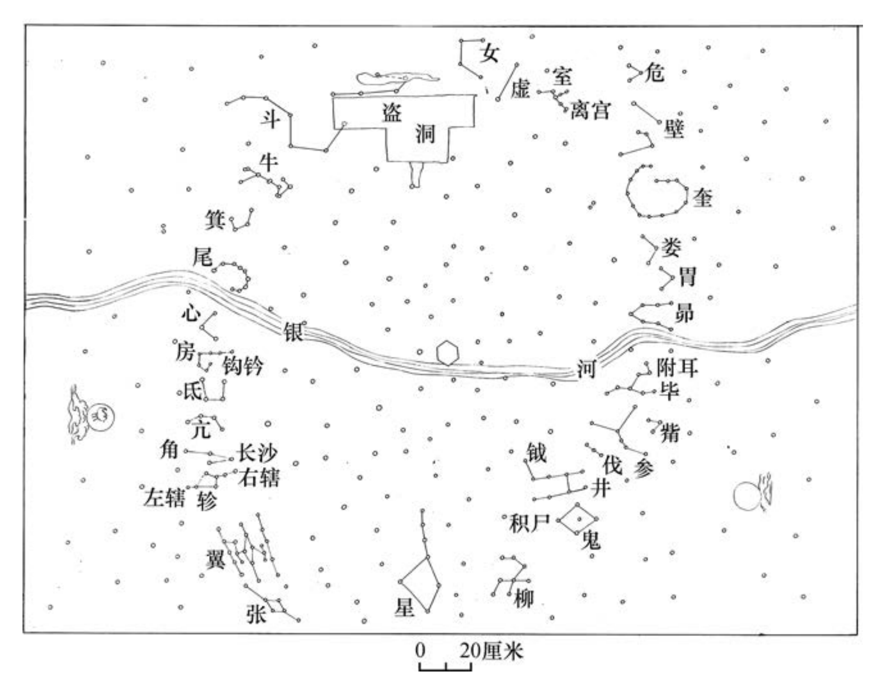


图一四　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家具图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 年 1 期，37～47 页）

# 三、宇宙模式

唐代墓室壁画已经有使用天象图、四神、十二生肖的传统，而后转为墓志盖作为载体之后，图像意涵随之改变，因此本文主要分为三类图像，天象图、四神与十二神，针对其图像形式的差异做比较。

天象图目前笔者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天象图，其能够标示明确星座，如王处直墓（图一五）、冯晖墓（图一六）、钱氏家族墓（图一七）、南唐二陵（图一八）；二类为象征天象图，是以点表示星座或用颜色涂抹象征日月与银河，如李茂贞夫妇墓（图一九）、后晋孙璠墓（图二〇）、北汉刘继元太惠妃墓（图二一）。从这可以推断南方墓葬的天象图星座较为写实也稍微精确，而北方的三座墓葬则是象征性的天象图，以点状或颜色涂抹象征天空，从此现象可得知，五代十国延续唐代的传统[①]，在高等级墓葬使用天象图，象征墓主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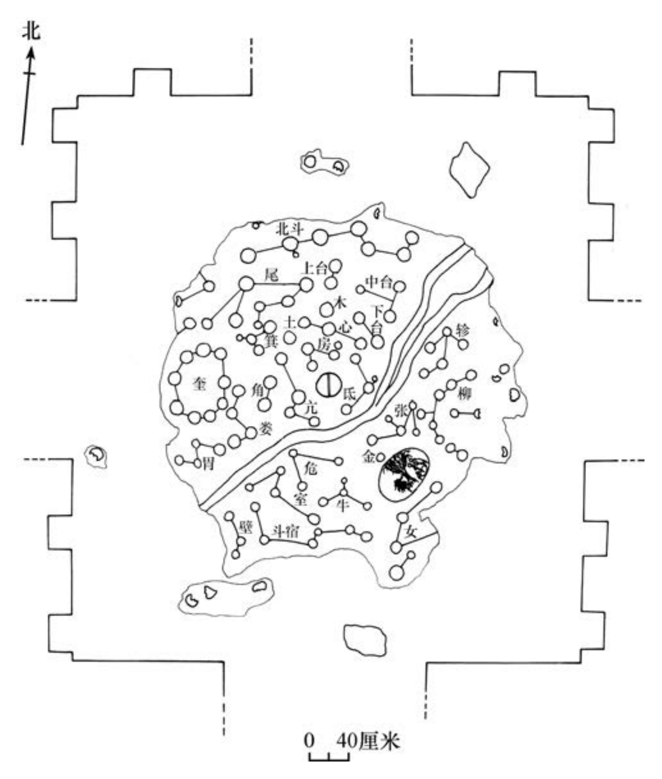



图一五　王处直墓天象图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不同于天象图，四神与十二神的图像载体较为多样，王处直墓（图二二）、李茂贞墓（图二三）的四神像在墓志盖上；冯晖墓在墓志盖上刻十二神与八卦纹（图二四）；

① 庄蕙芷：《汉唐墓室壁画天象图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198～2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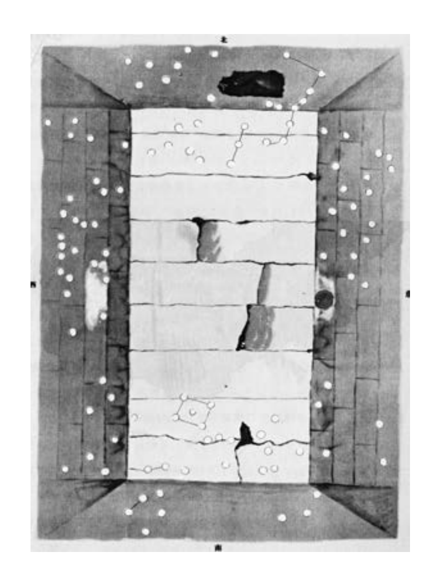

图一六 冯晖墓天象图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 年）



图一七 钱氏家族墓天象图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 年 3 期，186 ~ 19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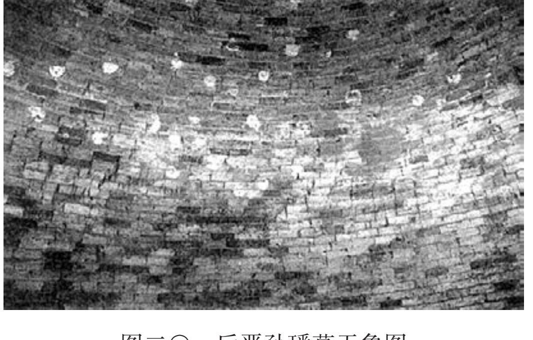
图一八 南唐二陵天象图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南京出版社，2015 年）



图一九　李茂贞夫妇墓天象图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 年）



图二〇　后晋孙璠墓天象图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后晋孙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 6 期，9 ~ 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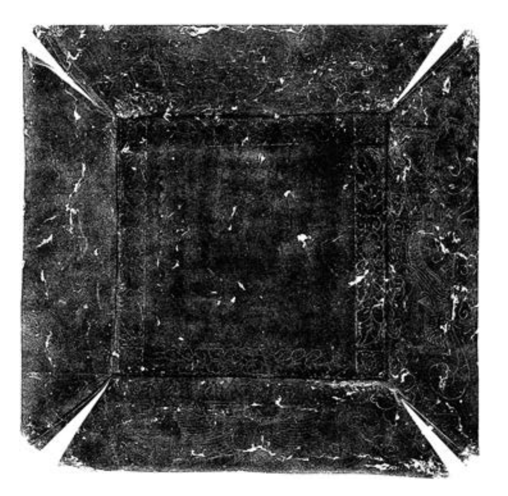
图二一　北汉刘继元太惠妃墓天象图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青阳河北汉太惠妃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 年 6 期，51 ~ 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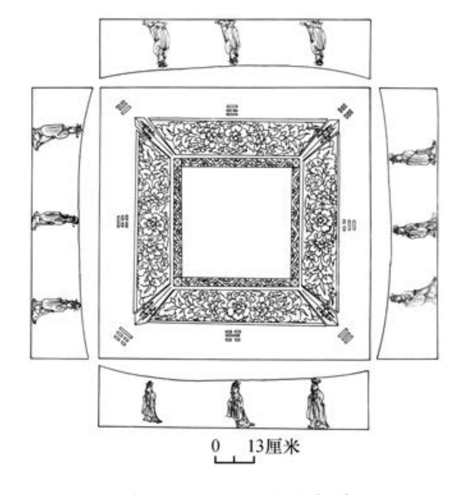
图二二　王处直墓墓志盖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 年）



图二三　李茂贞墓墓志盖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 年）




图二四　冯晖墓墓志盖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 年）

王建墓的十二神像可能为药师佛的眷属十二神将[①]（图二五），力士形态的十二神只出现在蜀地，可见其含义确实不同于其他地区；后蜀孟知祥与福庆长公主墓将四神绘于彩坊四柱上；后蜀宋琳墓则在葬具上表现四神（图二六）；钱氏家族墓在墓室壁上绘画四神以表示方向，下方配十二生肖（图二七）；太惠妃墓将宇宙模式分为墓室壁画绘四神、墓志盖刻十二神与八卦纹（图二八）；内蒙古塔尔梁墓地则用四神指出方位，厌胜图像与神煞同样也绘于图像中（图二九）。



图二五　王建墓十二神像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 年）



图二六　后蜀宋琳墓葬具
（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简报》，《考古》1958 年 5 期，18 ~ 2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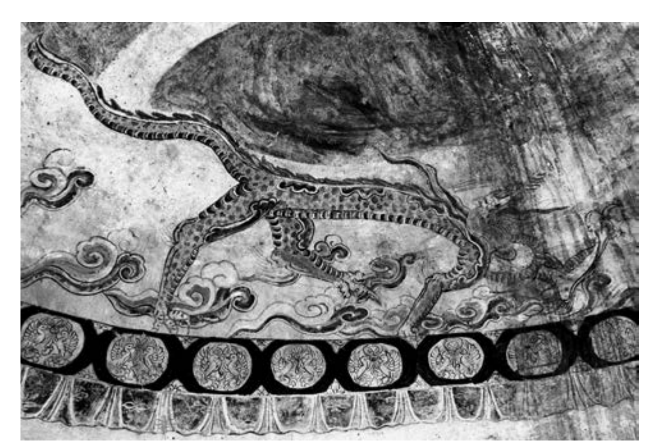
图二七　钱氏家族墓四神像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 年 3 期，186 ~ 19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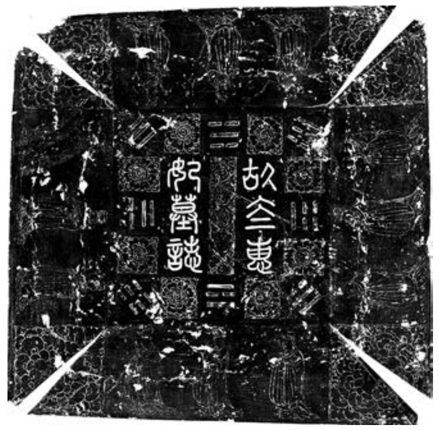
除了四神与十二神将墓志盖作为图像载体之外，还有天象图也使用此载体的现象。李星明提出宇宙模式由四神、十二神以及天象图组成，并还原墓志盖上方绘制宇宙模式[②]，以及此组合与式盘之间的联系。庄蕙芷则在比对日本高松冢的墓室天象图形式之后（图三〇），认为用墓室的四壁作为二十八星宿的载体，与墓志盖上方的天象图方向相符[③]（图三一）。

① 郑以墨：《往生净土——前蜀王建墓棺床雕刻与十二半身像研究》，《四川文物》2012 年 6 期，50 ~ 63 页。

②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年，202 ~ 205 页。

③ 庄蕙芷：《再论日本奈良两座墓室天象图》，待刊稿。





图二八　太惠妃墓宇宙模式图像（墓室壁画与墓志盖）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青阳河北汉太惠妃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 年 6 期，51 ~ 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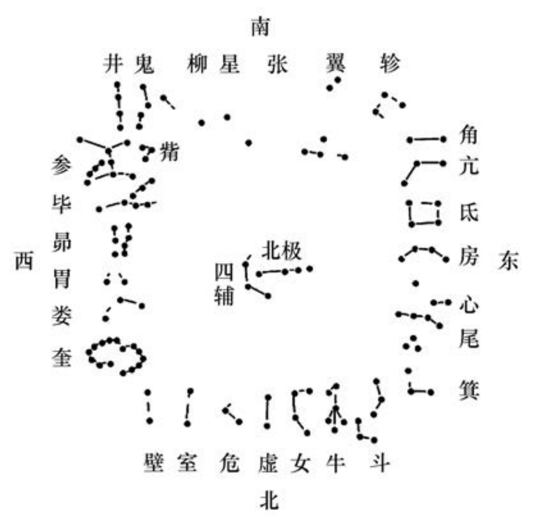






图二九　内蒙古塔尔梁墓地四神像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4 期，16 ~ 38 页）




图三〇　高松冢古坟天井模式图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星々と日月の考古学》，奈良：飞鸟资料馆，2011 年，24 页）




图三一　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

（潘鼐：《中国古天文图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 年）

结合以上目前学术界的看法，笔者认为需更加注意的是这些母题的发展——墓室壁画演变为墓志盖的装饰图样，在墓室壁画出现宇宙模式的图像时，观看顺序是先从墓室顶部的天象图（象征天空），再向下望向墓室四壁的四神或十二神（表示方位），目的是将墓室塑造成墓主升天之后的生活空间，这与汉代墓室壁画由天象图、四神、十二神所构建出宇宙空间的概念相符[①]。古代式盘、墓志盖以天象图象征宇宙，五代十国则出现了四神以及十二神用于墓志盖与葬具，笔者更认为宇宙模式的图像已经脱离了墓室空间的束缚，将图像转移至能直接接触墓主的葬具，唐代开始加入八卦纹以及挽歌的元素[②]，可以得知到了此时此类图像及载体的组合有了压胜镇墓的意涵，成为墓葬的缩影，反应丧葬观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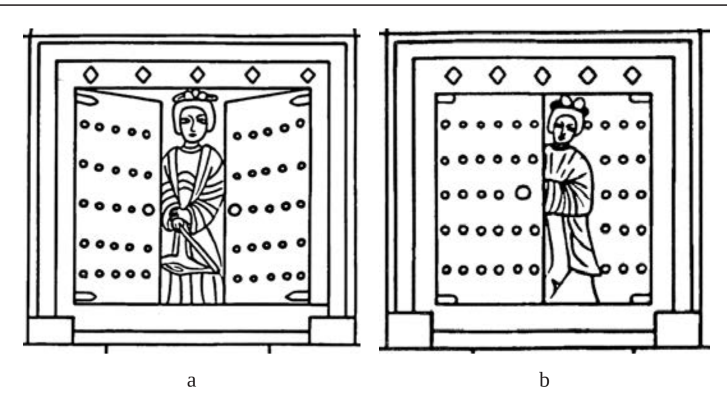
## 四、妇人启门图

五代十国妇人启门图的例子，出现于李茂贞夫妇墓、冯晖墓，在墓门处设置一隅，大约有三类侍立样式，第一类为正立于全开门口之后（图三二，a），第二类为半身藏于门后探头看向门外（图三二，b），第三类为门半开侍立于门之外（图三三）。第二类是宋代墓葬固定使用的样式，借由人物探头望向门外，制造出门内人物与外界互动的感觉。

---

① 庄蕙芷：《再论日本奈良两座墓室天象图》，待刊稿。

② 王庆卫、王煊：《生死之间——唐代墓志中新见挽歌研究》，《碑林集刊》2010 年 1 期，82 ~ 10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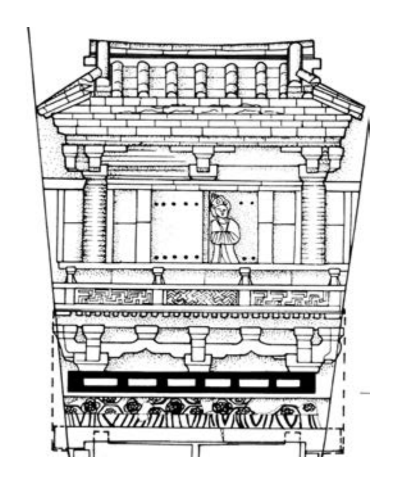



图三二　妇人启门图

a. M1 端门东厢妇人启门图　b. 西厢妇人启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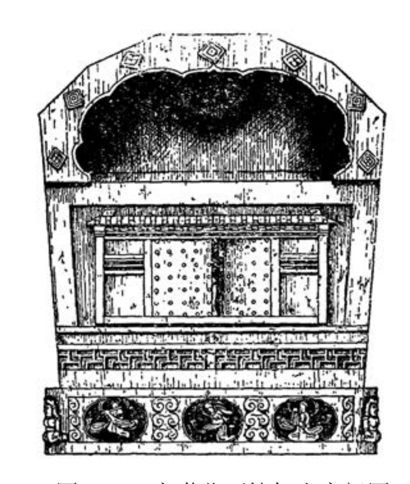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 年）

后蜀宋琳墓棺墙刻有门，妇人做启门姿势，半身于门后，这是五代十国目前唯一出现棺墙上妇人启门的例子，这里使用葬具作为载体的目的，可能是希望此门可以作为引魂升天的出口（图三四）。



图三三　五代冯晖墓墓门门楼妇人启门图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 年）



图三四　宋琳墓石棺妇人启门图

（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简报》，《考古》1958 年 5 期，18～26 页）

洛阳苗北村墓的妇人启门图，是五代十国时期少数刻于墓室壁上而非刻于门楼的启门图，可见在此时妇人启门图所安排的位置尚无固定，此女子站于半开的门后向外张望，此门上还刻有铺首，洛阳地区单室墓的墓室壁上刻有许多浮雕，塑造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空间，以假门、假窗制造出虚拟空间，具有延伸墓室空间的效果。这是五代十国墓葬空间的变革，让图像之间的关系减弱，但又在整体绘画内容的布局上达到平衡，主旨就是让整体墓葬空间能作为生与死、虚拟与真实之间的桥梁（图三五）。

以上五代十国妇人启门图的三种载体，墓门、葬具、墓室后壁，都具有不同的含义。墓门的图像，是为了在墓葬入口带领墓主灵魂进入墓室；葬具的图像反映了墓主灵魂升天之后的世界，因此在棺墙设计妇人启门图，是为了引魂升天，带领墓主前往天界；墓室后壁的图像，笔者认为可与洛阳地区其他墓葬的后壁假门的形式做比较，都是作为墓主灵魂升天的出口。



图三五　洛阳苗北村五代壁画墓妇人启门图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苗北村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 年 1 期，58～65 页）

# 五、明器神煞的图像化

《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墓葬中记载：“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五呼将，长一尺二寸。镇墓五方五精石，镇五方。祖司祖明，长一尺二寸，安棺后。仰观伏听，长一尺二寸，安埏道中。当圹当野长一尺二寸。五谷仓一尺二寸。三浆水高九寸，安棺头。金鸡高一尺二寸，安酉地。玉犬长二尺九寸，高一尺，安戌地。篙里老公，长一尺五寸，安堂西北角。天关二个，长一尺二寸，安堂南北界上。地轴二个，长一尺二寸，安堂东西界上。天丧刑祸一对，长二尺，安墓。墓龙长三尺，高一尺二寸，安辰地。……以上皆大夫庶人用之吉。”[①] 以下比照其中的记录，推测出土物或图像的方位是否符合规制。

## （一）地　　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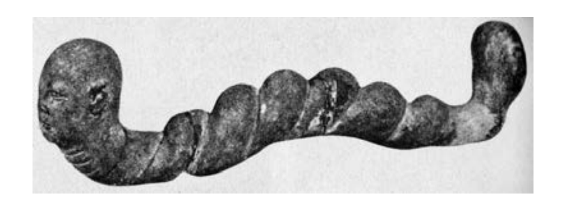
目前学界认定双首蛇身像较有可能为地轴[②]，内蒙古清水河县塔尔梁墓地的报告中名为伏羲女娲像的图像可能就是此墓的地轴，安堂东西界上，伏羲女娲像左边有一个金鸡也绘于东北壁，符合神煞摆放的位置安酉地（图三六）。同形象的神煞也出现在南唐二陵（图三七）、后蜀宋琳墓的地轴出土于后室的西墙（图三八），符合制度，但可惜的是南唐二陵没有其余神煞出土的精确位置。

①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180～2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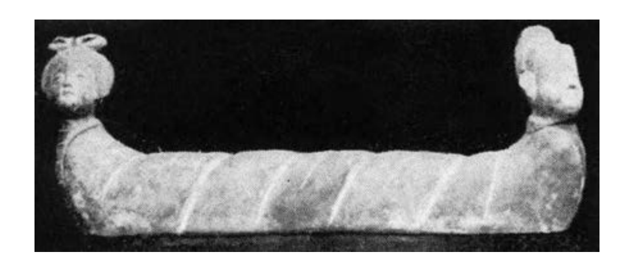
② 沈睿文：《唐宋墓葬神煞考源——中国古代墓葬太一出行系列研究之三》，《唐研究（第十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201～223 页。程义、郑红莉：《〈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复原的再探讨》，《中原文物》2012 年 5 期，79～86 页。




图三六　内蒙古清水河县塔尔梁墓地 M1 东北壁
（上为厌胜物、下为伏羲女娲像）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4 期，16 ~ 38 页）



图三七　南唐二陵双首蛇身像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南京出版社，2015 年）



图三八　后蜀宋琳墓双人首蛇身俑
（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简报》，《考古》1958 年 5 期，18 ~ 26 页）

## （二）仰观伏听

塔尔梁墓 M1 的南壁有两个图像（图三九），对比南唐二陵的人首鱼身像（图四〇）、宋琳墓伏地女俑与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①]的人首鱼身俑、跪俑的形象（图四一），可知南壁东边的人首鱼身像有三种身份可能，一为仰观伏听[②]，二为雷神[③]，三为仪鱼，但因为西边的伏地像身上没有绘制动物形象，因此笔者推断两者为仰观伏听，且图像绘于甬

①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 年 8 期，41 ~ 51、101、102 页。

② 张勋燎、白冰：《中国道教考古》（第 6 辑），线装书局，2006 年，1611 ~ 1750 页。

③ 白冰：《雷神俑考》，《四川文物》2006 年 6 期，66 ~ 7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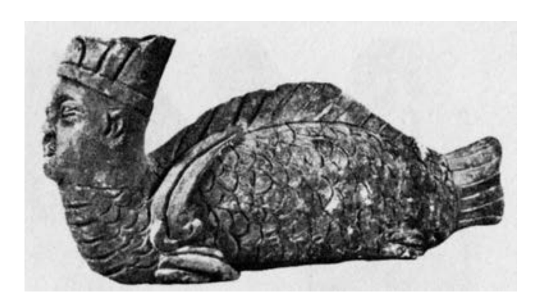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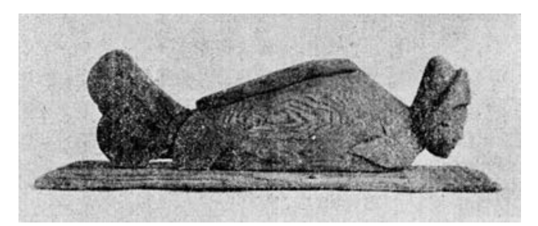
图三九　内蒙古清水河县塔尔梁墓地 M1 的南壁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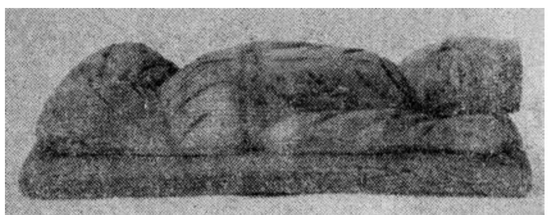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 4 期，16 ~ 38 页）



图四〇　南唐二陵人首鱼身俑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南京出版社，2015 年）





图四一　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人首鱼身俑与跪俑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 年 8 期，41 ~ 51 页）

道口，也符合神煞方位**安埏道中**的位置。

内蒙古塔尔梁墓地是目前笔者发现少数以壁画元素表现明器神煞的例子，一般会以明器放置在墓葬之中，较为精确地放在当时葬俗所习惯放置的位置，然而墓壁画上相关的图像，则表示墓主受了当时风水习俗的影响，由于限制而改用图像达到目的，用明器神煞图像的原因有两个：一为因墓主迷信，欲使用明器的图像，让墓葬符合规制；二为因身份未达到制度的要求，而改用壁画图像，但还是希望借由风水术达到安魂的效果与造福后代。然而根据五代十国的葬俗，天子使用天象图象征身份，但明器神煞庶人也能使用，更何况是图像，这个现象表示当时的上层阶级使用明器神煞的习惯已经影响到平民百姓，甚至简化至使用图像达到模仿效果。

# 六、墓葬壁画中垂幔的使用



图四二　王处直墓前室南壁壁画摹本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 年）

从唐到五代十国时期，政治经历了稳定至纷乱的局面，相同的在各自的政权统治之下，从帝王到庶民的墓葬皆凸显了这个社会意识，其一是宗教，其二就是墓主的喜好。在内蒙古的墓葬中可见有道教打坐的图像，以及在四川地区的棺床也能发现用莲花的纹饰反映墓主有宗教信仰的可能；其余部分描绘生活细节的图像反映的是墓主的悠闲生活的情怀。除了这些题材之外还有墓葬整体空间元素，构建出与唐代差别较大的场景。王处直墓前室四壁的边缘装饰纹带，而画面之间使用垂幔隔开，垂幔的使用则可追溯至唐代经常使用的帐幔式布局（图四二）[1]，冯晖墓也同样在墓门、甬道使用垂幔，绘制在主要母题（人物图、星象图）与装饰母题（花草纹）之间，使用垂幔分隔墓主引魂之后的活动路线，以及制造出墓主灵魂与壁画人物之间空间上的差异，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已经将人与灵魂存在的空间用壁画的形式体现其差异。

① 沈睿文：《太原金胜村唐墓再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8 年，7 ~ 32 页。

# 七、仿木砖雕墓室的壁面设计

洛阳地区、内蒙古地区的五代十国壁画墓通常为多边形或是圆形，在每个壁面上绘制墓主的生活场景，然而在壁画之外也会用砖雕的手法雕刻立体的日常用具、家具，表现出虚实之间的空间感，由孙璠墓使用的砖雕图样可得知（图四三），在此类墓葬中，绘以棂窗也能达到将墓葬内部空间与外界相通的效果，在后壁雕刻门的图像，表示墓主的灵魂可以由此升天，而不将灵魂限制于墓葬以及棺木之中。这些砖雕图样在后来成为宋代经常在壁画墓里面使用的母题样式，促使这些壁画图样的发展从平面转变成立体。



图四三　孙璠墓 M1 墓室后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后晋孙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 6 期，9 ~ 15 页）

# 八、小　　结

首先是壁画主要图像分析的部分，从人物图像中识别出墓主，此时期的特色有三类：一为性别空间上的解读，由壁画人物的设置与陪葬品辨识墓主。二为墓主青年、壮年、老年的形象同时出现在图像场景中。三为古装人物表现墓主孝行、时装人物作为重现墓主生前的样貌。宇宙模式从墓室壁画到盝顶式墓志盖之间，载体使用上的差别主要是因为葬俗的差异，壁画的宇宙模式图像的创作意图是来自再现自然现象中天空的样貌，而将壁画上的元素使用在墓志盖上，为的是以墓志盖达到压胜、安魂的目的。然而宇宙模式图像、妇人启门图图像载体的选择，可能是不同地区工匠对图像理解不同，因此图像诠释出现了差异。伎乐场景的变化，是因为图像使用者的身份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此时使用此图像的墓主身份从帝王、官吏至平民皆可使用，与天象图相同都只是作为一种身份象征的图像。《通典》记录明器使用的等级制度，《盟器神煞篇》则是依照墓主身份的差异，将其使用明器的规范记录下来，根据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对五代十国的神煞配置有基础的复原，笔者在文中尝试辨识明器的种类，以及图像化之后的意涵。

这一时期的图像发展进一步分析，可以理解成从看到（seeing）到理解（knowing）[1]

---

① E. H. 贡布里希著，范景中、杨思梁、涂一维译：《视觉的节省》，《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年，109 ~ 131 页。

是此时工匠，也就是当时的艺术家，他们在构思图像所经历的过程看见、体会并且理解转化成图像，他们的创作久而久之成为制式化的粉本，让壁画构成约定俗成的意象，如伎乐图、天象图。随着工匠、赞助者与墓主脱离了模本限制的思维，图像出现了简约化或是象征化的现象，揭示了这个时代对一个空间维度认知的差别，由夫妇对坐宴饮简化至虚拟空间的家具，此图像发展可见此认知现象（knowing）。

## Image Study of the Mural Tomb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Li Fuyu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aking the mural tomb imag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as an example, the content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jor mural images and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burial utensils are carried out. Moreov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gional funeral customs and beliefs affecting the image production process are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haracters, the image of the universe pattern, and the image of the burial objects of God and ghost. This paper also infers the creative intention of the tomb owner, craftsman and sponsor at that time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images formed by the flow of people. The mural design of high-grade Mural Tombs can restore the real-life scene and simulate the universe space of the soul ascending to heaven combined with the sky picture and reproduce the ideal world that the tomb owner yearns for. Also, the ordinary mural tomb designs the owner’s leisure life through serial stories on the wall of the tomb chamber and uses “seat” and “door” to express the owner’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Keywords:**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mural tomb images; funeral customs; The door to heaven

# 辽代茶器初探
## ——以墓葬壁画及伴出茶器为中心

陈　驰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受宋代影响，辽代也是一个茶文化“风靡”的时代，茶文化潜移默化着辽人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反映在墓葬文化上尤为明显。本文以辽代墓葬中与茶有关的壁画及出土器物为研究对象，通过茶事图所绘茶器与伴出器物，初步探讨辽代墓葬所反映出的“茶文化”的特点、出现“茶文化”因素的原因，以窥辽人生活的部分面貌。

**关键词：**墓葬　壁画　茶文化　辽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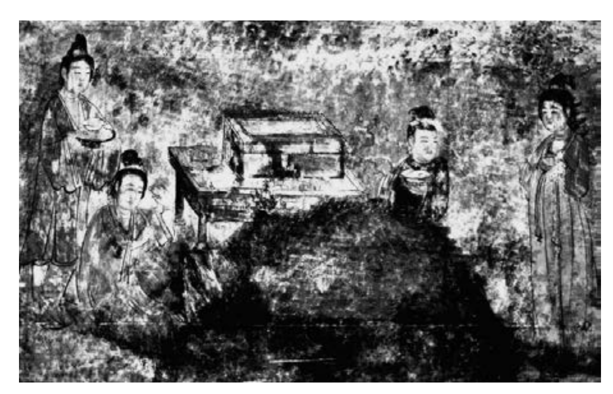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了大量辽代墓葬，其中有茶事题材的壁画墓数量可观。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群、内蒙古敖汉旗下湾子 1 号墓及 5 号墓、山西大同东风里 1 号墓及纸箱厂辽墓等。这些有茶事题材的壁画墓往往也出土茶器实物，二者是否有关联及它们有何异同之处？本文选取这种题材墓葬壁画中清晰可辨者，以辽墓出土壁画及伴出器物为着眼点，关注壁画所见茶具和出土茶器随葬品。从辽墓分期及壁画墓研究情况、辽墓茶事及茶器研究情况等方面梳理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结合文献，初步考察辽代茶器的面貌，探索辽代茶器发展的部分文化因素，分析“茶文化”在辽代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 一、辽茶事题材壁画墓统计分期

本文对辽代壁画墓进行了统计，有茶事题材壁画且清晰可辨者共有 27 座。根据已有的分期方法将这些墓葬分成早、中、晚三个时期（详可见附表）[①]。其中早期共有 7 座，分布于北京、山西、辽宁、内蒙古等地。如 1985 年山西省大同市纸箱厂辽墓出土的备茶图（图一）。位于墓室东南壁，中间一方桌，摆放一篋笥和盏。左侧一侍女端一托盏，

① 徐苹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一侍女跪坐，右手持一物，有一火盆，似在备汤。其右侧站立二侍女，一侍女端一大碗，一侍女捧一小盘[①]。中期共有 5 座，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地区。如 1990 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出土的点茶图（图二）。位于墓室南壁，三人正在备茶，中间侍者双手执汤瓶，正在点茶，右侧侍者双手托盏，躬身接茶[②]。晚期共有 15 座，主要分布在朔州、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如 1993 年河北宣化下八里 7 号墓出土的备茶图（图三）。位于前室东壁，画面由八个人物和相关器具组成。中间地上放有茶碾、风炉、汤瓶和漆盘等；桌上放着注碗注壶一套、圆盘、瓷碗等物[③]。再如 1989 年河北宣化下八里 5 号墓出土的备茶图（图四）。位于后室西南壁，桌前放火盆，上有一白色带盖汤瓶。桌上摆满了茶具，侍女们手捧黑托白盏的茶盏和渣斗[④]。



图一　山西大同纸箱厂辽墓备茶图
（徐光翼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29 页）



图二　内蒙古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阿鲁召嘎查滴水壶辽墓点茶图
（徐光翼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内蒙古》，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37 页）

## 二、茶器图像与实物的对照比较

墓葬中壁画所绘及伴出的茶器较多，有碾茶用具、煮汤用具、点茶饮茶用具及贮茶用具。此处取最常见碗盏、注壶结合分期进行排列[⑤]，并探讨这些器物的形态、组合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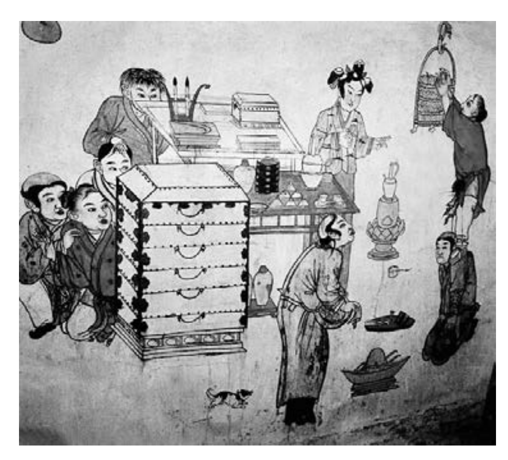
① 徐光翼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科学出版社，2012 年。

② 徐光翼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内蒙古》，科学出版社，2012 年。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

④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

⑤ 图中器物图、线图和壁画图均来自相关考古发掘报告。



图三　河北宣化下八里 7 号张文藻墓备茶图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宣化区文物管理所：《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 年 9 期，25 页）



图四　河北宣化下八里 5 号张世古墓备茶图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宣化区文物管理所：《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 年 9 期，25 页）

其中圆口碗在墓葬伴出器物及壁画中较常见。陶碗：早期各地均有出土、晚期集中出土于河北。瓷碗：早期出土白瓷碗较多（图五，6～8），另有北京、大同出土青瓷碗（图五，9、10）。晚期的有朔州、宣化出土的白瓷碗（图五，11～13），以及影青小碗、黄

| 分期 | 随葬陶器 | 随葬瓷器 | 壁画所绘 |
| --- | --- | --- | --- |
| 早期 | 1、2 | 6、7、8、9、10 | 16 |
| 中期 | | | 17、18 |
| 晚期 | 3、4、5 | 11、12、13、14、15 | 19、20 |

图五　圆口碗

1、2. 北京青云店辽墓出土陶碗　3. 宣化辽墓 M3 出土陶碗　4. 宣化辽墓 M1 出土陶碗　5. 宣化辽墓 M5 出土陶碗　6. 北京大兴青云店辽墓出土白瓷碗　7. 辽韩佚墓出土白瓷碗　8. 朝阳召都巴出土白瓷碗　9. 辽韩佚墓出土青瓷碗　10. 大同机车厂辽墓出土青釉碗　11. 朔州辽墓出土白瓷碗　12. 宣化辽墓 M3 出土白瓷小碗　13. 宣化辽墓 M9 出土白瓷碗　14. 大同东风里辽墓出土影青小碗　15. 宣化辽墓 M10 出土黄釉碗　16. 辽韩佚墓壁画　17. 敖汉旗下湾子辽墓 M5　18. 喇嘛沟辽墓壁画　19、20. 宣化辽墓 M2 壁画

釉碗（图五，14、15）。壁画：常见且数量众多，部分与出土器相似，如图五中 7 与 11 白瓷碗，深弧腹，口沿微撇，分别出土于中期敖汉旗下湾子辽墓和晚期朔州辽墓。喇嘛沟辽墓壁画所绘小碗（图五，18）与大同东风里辽墓出土小碗（图五，14）相似度也很高。圆口碗形制多样，壁画所绘能在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中找到对应实物（图五）。

此处统计的辽壁画墓中花口碗出土较少，壁画所绘形象较多。出土器物中早期有白瓷花口碗，晚期不仅出土白瓷花口碗，还有高足影青釉花口碗。早、中、晚各时期壁画均有花口碗形象且出现频繁，晚期许多壁画中绘有成摞的花口碗倒扣在桌面上（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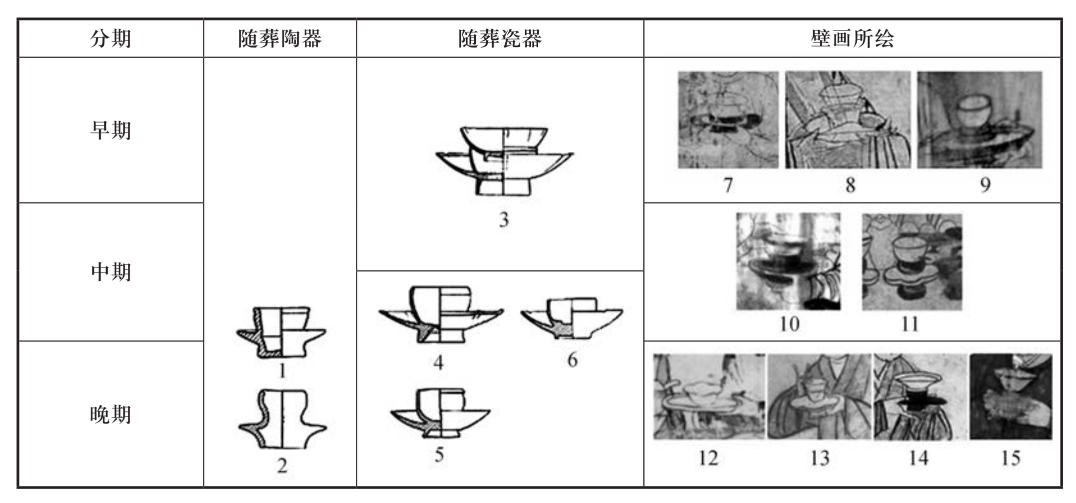
| 分期 | 随葬瓷器 | 壁画所绘 |
| --- | --- | --- |
| 早期 | 1 | 6 |
| 中期 | 2 | 7 |
| 晚期 | 3 5 4 | 8 9 10 11 |

图六　花口碗

1. 辽韩佚墓出土白瓷碗　2. 宣化辽墓 M2 出土白瓷花口碗　3、4. 宣化辽墓 M10 出土白瓷花口碗　5. 大同东风里辽墓出土影青高足碗　6. 大同许从赟夫妇墓壁画　7. 敖汉旗下湾子 M1 壁画　8. 宣化辽墓 M4 壁画　9. 宣化辽墓 M1 壁画　10. 宣化辽墓 2 区 M2 壁画　11. 宣化辽墓 M3 壁画

此处统计的辽壁画墓中盏托出土实物不多，壁画所绘形象较多。陶盏：只有晚期出土，数量少，制作粗糙；瓷盏：早期 3 号辽韩佚墓出土一青瓷盏，盏沿荷叶形，高圈足，外刻花纹，晚期出土较多，器形与早期类似，但釉色更为丰富，有黄釉和影青釉，如图七中 4～6，均出土于宣化辽墓群。各时期壁画中所绘盏数量庞大，颜色、样式较出土更丰富，有花口托、红色黑色托（图七）。

此处统计的辽壁画墓中注壶出土实物及壁画所绘形象较多。陶壶：早期形象为大曲把接于口腹处，短流。晚期肩部有一直流，曲形柄较大，接于肩腹部。瓷壶：早期出土保存良好的瓷器较少，仅有一套青瓷注碗。后期出土较多成套注壶，如宣化辽墓出土的白釉圆腹壶、黄釉瓜棱壶、影青釉小执壶，基本都是长流、大柄。壁画中出现的注壶形象数量多，早期所绘执壶为短流，把手接于腹部。中后期流变长，把手衔接位置靠近肩部。结合实物和图像，能看出壶变化的大概趋势：流变长，把手接口位置逐渐靠近肩部（图八）。




图七　盏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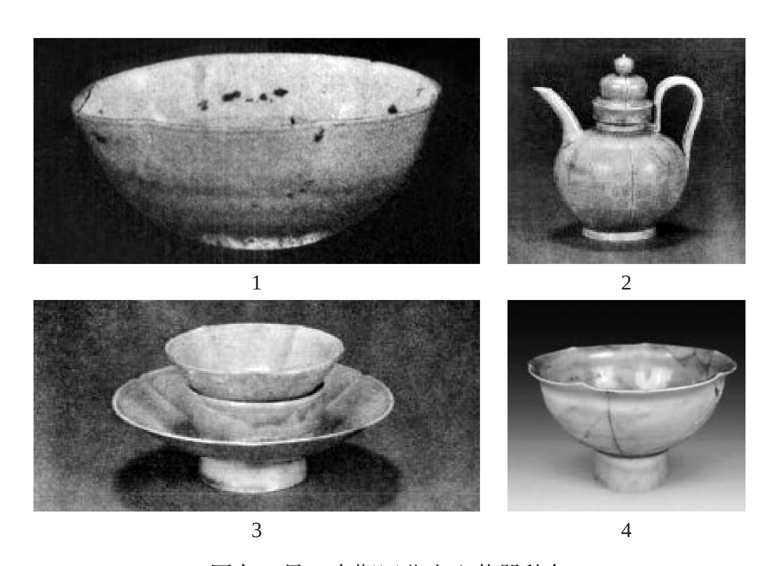
1. 宣化辽墓 M3 出土陶盏　2. 宣化辽墓 M5 出土陶盏　3. 辽韩佚墓出土青瓷盏　4. 宣化辽墓 M10 出土黄釉盏　5. 宣化辽墓 M3 出土黄釉盏　6. 宣化辽墓 M1 出土影青釉盏　7. 大兴青云店辽墓 M1 壁画　8. 大同许从赟夫妇墓壁画　9. 友爱辽墓壁画　10. 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阿鲁召嘎查滴水壶辽墓壁画　11. 羊山 1 号墓壁画　12. 宣化辽墓 M3 壁画　13. 宣化辽墓 M7 壁画　14. 宣化辽墓 M5 壁画　15. 巴林辽耶律弘世墓壁画

| 分期 | 随葬陶器 | 随葬瓷器 | 壁画所绘 |
| --- | --- | --- | --- |
| 早期 | 1　2 | 5 | 9　10　11 |
| 中期 | | | 12　13　14 |
| 晚期 | 3　4 | 6　7<br>8 | 15　16　17　18　19 |

图八　注壶

1. 辽韩佚墓出土陶壶　2. 青云店陶执壶　3. 宣化辽墓 M10 出土陶壶　4. 宣化辽墓 M7 出土陶壶　5. 辽韩佚墓出土青瓷壶　6. 宣化辽墓 M2 出土白釉圆腹壶　7. 宣化辽墓 M10 出土黄釉瓜棱壶　8. 宣化辽墓 M1 出土影青釉小执壶　9. 巴林右旗友爱辽墓壁画　10. 朝阳召都巴辽壁画墓　11. 大兴青云店 1 号辽墓　12. 宣化 2 区 M2　13. 敖汉旗下湾子 M5　14. 敖汉旗下湾子 M5　15. 宣化辽墓 M5　16. 宣化辽墓 M6　17. 宣化辽墓 M10　18. 宣化辽墓 M5　19. 宣化辽墓 M1

在对比分析的同时发现茶器釉色在不同时期也有差异，此处罗列各时期墓葬出土的釉色器。早中期：北京韩佚墓出土白瓷 13 件、青瓷 9 件、褐瓷 2 件[①]；辽宁朝阳召都巴辽壁画墓出土白瓷 1 件、淡黄釉瓷器 1 件[②]；山西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出土青瓷 1 件[③]；北京大兴青云店 1 号辽墓出土白瓷 1 件[④]；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闫杖子村北羊山 1 号墓出土白瓷 3 件[⑤]；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出土黄釉器 1 件[⑥]。晚期：山西大同东风里 1 号辽代壁画墓出土白釉器 1 件、影青釉瓷器 2 件[⑦]；内蒙古敖汉旗喇嘛沟辽墓出土青釉器 2 件[⑧]；河北宣化辽墓 M10 出土白瓷器 28 件，三彩器、黄釉器、酱釉器共 8 件[⑨]；河北宣化辽墓 M1 出土三彩器、黄釉器、青釉器、影青器、墨绿釉瓷器等共 11 件[⑩]。可以看出早期集中于青、白瓷。晚期器物釉色增多，各个时期白瓷发现数量均较多（图九、图一〇）。



图九　早、中期辽墓出土茶器釉色

1. 韩佚墓出土白瓷碗　2、3. 韩佚墓出土青瓷盏托、注壶　4. 大同东风里辽墓出土影青高足碗

① 黄秀纯、傅公钺：《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 年 3 期，361 ~ 381 页。

② 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召都巴辽壁画墓》，《北方文物》2004 年 2 期，64 ~ 66 页。

③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文物》2006 年 10 期。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兴区青云店辽墓》，《考古》2004 年 2 期，18 ~ 25 页。

⑤ 佚名：《敖汉旗羊山 1—3 号辽墓清理简报》，《草原文物》1999 年 1 期，1 ~ 3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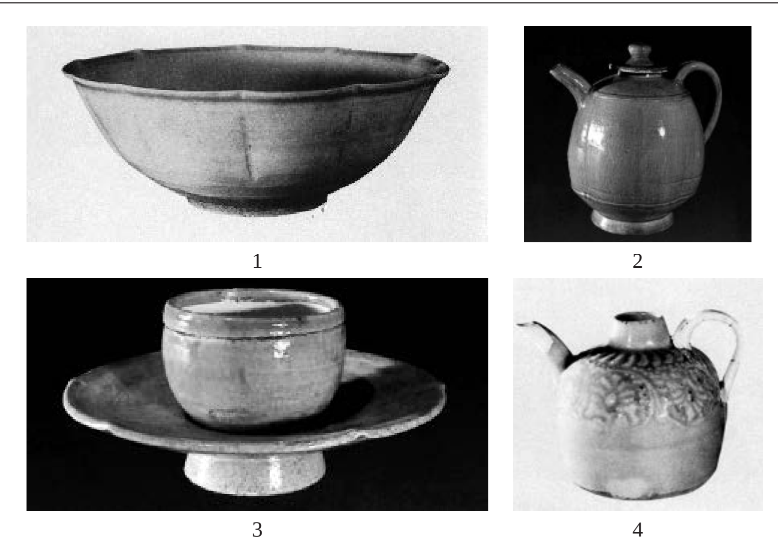
⑥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文物》1996 年 11 期，29 ~ 34 页。

⑦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 10 期，43 ~ 54 页。

⑧ 佚名：《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草原文物》1999 年 1 期，90 ~ 97 页。

⑨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

⑩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



图一〇 晚期辽墓出土茶器釉色

1. 宣化辽墓 M7 出土白瓷花口碗 2、3. 宣化辽墓 M10 出土黄釉瓜形壶、盏托 4. 宣化辽墓 M1 出土青釉小执壶

# 三、现象与结论

对上述两部分材料的梳理，可以归纳出以下五个现象：①从辽代早期到晚期，不论是壁画所绘的，还是出土的茶器，数量和器形不断丰富，尤其是圆口碗和花口碗数量众多。②与出土相比，壁画所绘盏托样式及颜色更多样。③从早期到晚期，注壶器形变化较大：流变长，把手接口位置逐渐靠近肩部。④各时期白釉器发现数量均较多。⑤早期出土集中于青、白釉器，晚期器物釉色逐渐丰富。

《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如今……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①]《萍洲可谈》中记载：“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宴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②]从这些文献可知，当时的饮茶习俗是从南方向北方不断普及。陆羽《茶经》中有提及：“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③]赵佶《大观茶论》中记载：“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止。……三汤多寡如前，……四汤尚啬，……五汤可少纵，……

① 封演：《封氏闻见记》，中华书局，1985 年。

② 朱彧：《萍洲可谈》，商务印书馆，1941 年。

③ 陆羽：《茶经》，华夏出版社，2006 年。

六汤以观立作，……七汤以分轻清重浊，……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①] 可以看到由唐及宋，制茶的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辽墓所见的注壶器形变化很有可能与此有关。

结合墓葬中壁画所绘及茶器出土数量、形制变化情况，我们可以初步窥探辽代茶器的面貌：受南方影响，茶文化在辽代所占的重要地位与日俱增。辽代有茶事题材的壁画墓中主要出土圆口碗和花口碗，在壁画墓及伴出器物中常见，辽人在日常饮茶中最常使用的可能是这两种类型的碗。同时，与出土器物相比，壁画所绘盏托样式及颜色更丰富，可视作对实物的补充。随着南方饮茶文化的变化发展，辽代在制茶、饮茶、器物使用，乃至审美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附表　辽代出土茶事题材壁画的墓葬统计**

| 序号 | 年代 | 墓葬 | 备茶图 | 奉茶图 | 资料来源 |
|---|---|---|---|---|---|
| 1 | 早期 | 北京八宝山辽韩佚墓 | | 西壁 | 《考古学报》1984 年 3 期 |
| 2 | 早期 | 山西大同市南郊新添堡村辽代许从赟墓 | | 东北柱间壁 | 《考古》2005 年 8 期 |
| 3 | 早期 | 辽宁朝阳召都巴辽壁画墓 | 西壁 | | 《北方文化》2004 年 2 期 |
| 4 | 早期 | 山西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 | | 东南壁 | 《文物》2006 年 10 期 |
| 5 | 早期 | 山西大同市纸箱厂辽墓 | 东南壁 | 东南壁 | 《中国出土壁画全集 2・山西》 |
| 6 | 早期 | 北京大兴青云店 1 号辽墓 | 南壁 | | 《考古》2004 年 2 期 |
| 7 | 早期 | 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闫杖子村北羊山 1 号墓 | 墓室西南侧壁 | | 《草原文物》1999 年 1 期 |
| 8 | 早中期 | 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 | | 天井西壁 | 《文物》2014 年 4 期 |
| 9 | 早中期 | 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 | | 木帐门两侧外壁 | 《文物》1996 年 11 期 |
| 10 | 中期 | 内蒙古敖汉旗南塔子乡城兴村下湾子 5 号墓 | 西壁 | |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 年 1 期 |
| 11 | 中期 | 内蒙古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阿鲁召嘎查滴水壶辽墓 | 南壁 | | 《考古》1999 年 8 期 |
| 12 | 中期 | 内蒙古敖汉旗南塔子乡城兴村下湾子 1 号墓 | 西壁 | 北壁 |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 年 1 期 |
| 13 | 晚期 | 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 21 号辽墓 | 北壁 | 南壁 | 《文物季刊》1995 年 2 期 |
| 14 | 晚期 | 北京斋堂辽壁画墓 | | 墓门内西侧 | 《文物》1980 年 7 期 |
| 15 | 晚期 | 山西大同东风里 1 号辽代壁画墓 | 东壁 | 东壁 | 《文物》2013 年 10 期 |
| 16 | 晚期 | 河北宣化下八里 7 号张文藻墓 | 前室东壁 | 后室东壁 | 《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
| 17 | 晚期 | 河北宣化下八里 6 号张姓墓 | 前室东壁 | | 《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
| 18 | 晚期 | 河北宣化下八里 2 号张恭诱墓 | 西南壁 | | 《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
| 19 | 晚期 | 河北宣化下八里 10 号张匡正墓 | 前室东壁 | | 《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

① 赵佶：《大观茶论》，学苑出版社，2017 年。

续表

| 序号 | 年代 | 墓葬 | 备茶图 | 奉茶图 | 资料来源 |
|---|---|---|---|---|---|
| 20 | 晚期 | 河北宣化下八里 9 号张姓墓 | 前室东壁 | | 《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
| 21 | 晚期 | 河北宣化下八里 1 号张世卿墓 | 后室东壁<br>后室西壁 | | 《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
| 22 | 晚期 | 河北宣化下八里 5 号张世古墓 | 后室东南壁<br>后室西南壁 | | 《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
| 23 | 晚期 | 河北宣化下八里 3 号张世本墓 | | | 《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
| 24 | 晚期 | 河北宣化下八里 4 号韩师训墓 | 后室东南壁 | | 《宣化辽墓：1974—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
| 25 | 晚期 | 辽宁法库县叶茂台 16 号辽萧义墓 | 墓门西侧壁 | | 《考古》1989 年 4 期 |
| 26 | 晚期 | 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日嘎苏木辽庆陵陪葬墓耶律弘世墓 | | 西耳室甬道北侧 | 《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内蒙古》 |
| 27 | 晚期 | 内蒙古敖汉旗贝子府镇大哈巴齐拉村喇嘛沟辽墓 | 西南壁 | | 《草原文物》1999 年 1 期 |

# A Discussion on Tea Sets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omb Frescoes and Accompanied Tea Sets

Chen Chi

**Abstract:** Influenced by Song Dynasty, tea culture swept the country of Liao, and this culture produced an effect on several aspects of Liao’s social life, in particular in burial custom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frescoes and accompanied tea sets in Liao tombs. Via tea murals and artefacts, it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 culture presented in Liao tombs and reasons of the tea elements, which affords glimpses into the Liao dynasty.

**Keywords:** Tombs; Frescoes; Tea Cultural; Liao Dynasty

# 从房山金陵考古发现看金朝帝王丧葬习俗的变迁

姜子强　赵云会　刘卫军

（通辽市博物馆，通辽，028000；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赤峰，025550；准格尔旗博物馆，鄂尔多斯，010321）

**摘要：** 从房山金陵的考古发现来看，从太祖睿陵到世宗兴陵，金朝帝王的丧葬习俗发生了巨大转变。主要表现在陵墓地宫、陵墓朝向以及出土遗物的变化上。在前期的太祖睿陵尚存诸多女真习俗，及至中后期的世宗兴陵，女真原始习俗开始消退，汉文化因素逐渐占据主流。究其背后原因，则与金朝陵墓营建时间、政治环境、山陵使的设置以及礼制改革密切相关。同时这些转变也反映了女真对中原王朝政治体制、国家治理以及礼制思想的一种接受和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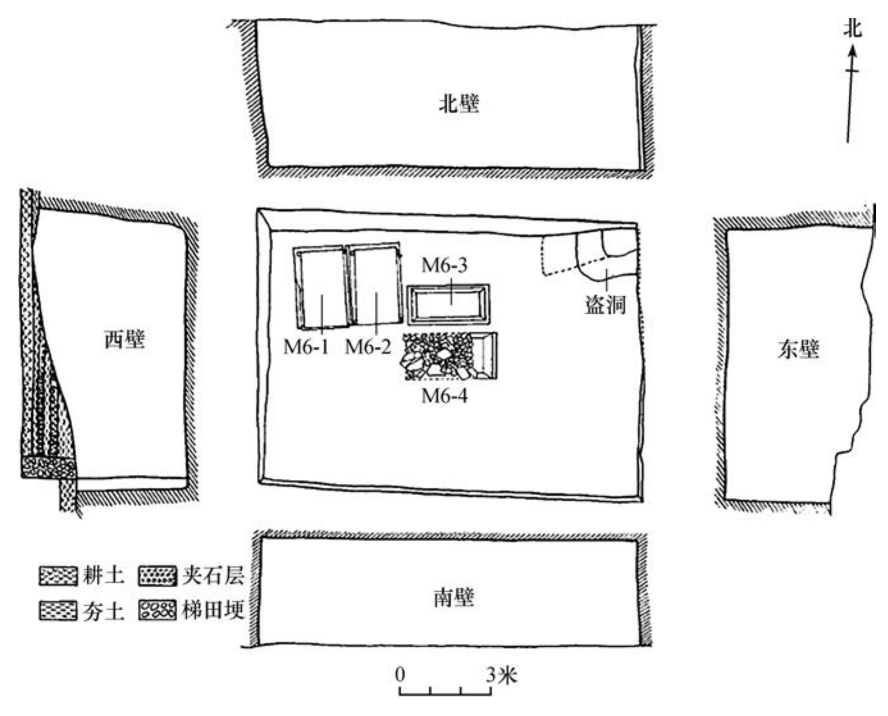
**关键词：** 房山金陵　陵寝制度　丧葬习俗

金朝曾先后以上京（今哈尔滨市）、中都（今北京市）和汴京（今开封市）为都城，相应地遗有三大陵域，分别为上京胡凯山陵区、中都大房山陵区和汴京陵区。三大陵区中，以大房山陵区制度最为完备，并且以房山金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开展的时间最早，所做工作最多。因此，要探讨金朝帝王丧葬习俗，以房山金陵入手为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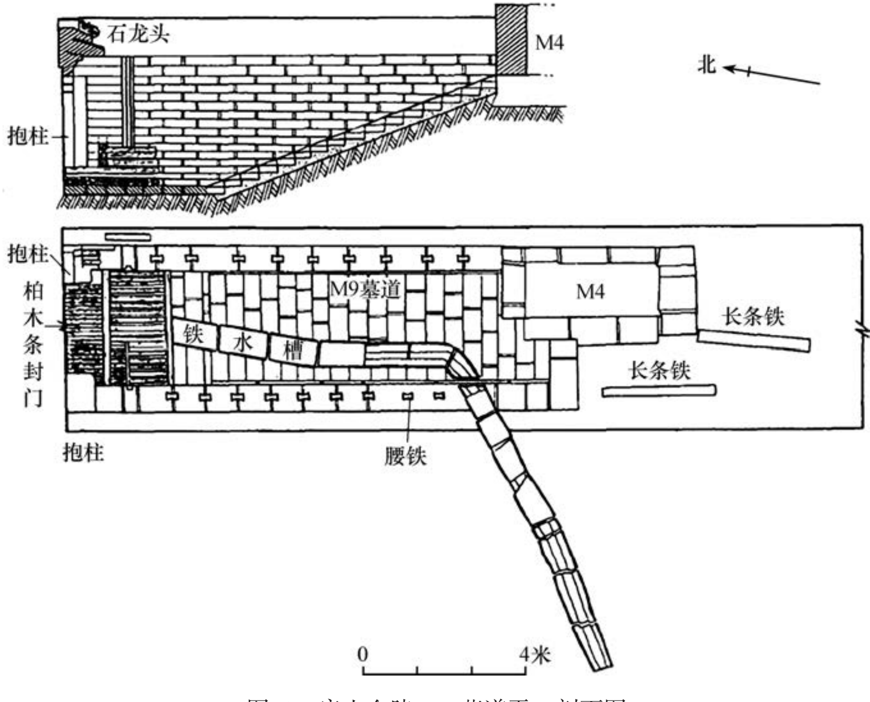
2001～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北京房山金代皇陵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发现墓葬9座，对M6地宫（图一）和M9的墓道（图二）进行了清理发掘，并推测M6为金太祖睿陵、M9为金世宗兴陵[①]。笔者试以两座陵墓的考古发现为线索，对金朝帝王丧葬习俗的转变进行探索。

---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




图一　房山金陵 M6 平面及四壁立面图




图二　房山金陵 M9 墓道平、剖面图

# 一、地宫形制的变革

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太祖睿陵到世宗兴陵地宫形制的变革①。太祖睿陵 M6 地宫为石圹竖穴，平面呈长方形。四壁为麻岩石凿穴而成，无墓道，口大底小。东西长 13、南北宽 9～9.5 米，坑底长 12.1～12.4、宽 8.3～9.4 米，深 3.6～5.2 米。这种石圹竖穴并不见于其他王朝的陵墓地宫中，其渊源应源于东北民族，属于我国东北民族的古老葬制②。

太祖睿陵（M6）地宫属于金代早期女真无室石椁墓的范畴，说明在金陵建成之初还保留此种女真人的葬制③。而到了世宗兴陵（M9）使用的则是横穴室类的地宫结构。金世宗兴陵 M9 位于太祖陵西南约 70 米处，目前仅清理至墓道，墓道残长 12.8、宽 3.3 米。东西两壁用长 85～94、宽 60、厚 25 厘米的青白石平铺错垒而成，最深处 3.3 米，共 15 层。台阶石长 65、宽 23～25 厘米，共 19 层。墓门为仿木构结构，青白石雕刻门楼，现仅残留三分之一，通高 4.5 米④。

兴陵由墓道、墓门和墓室组成，这种墓室明显是室类墓的结构，应为石室墓⑤。兴陵墓门为仿木建筑结构，青白石雕刻门楼。屋顶雕刻瓦垄、屋檐、椽和瓦当。这种仿木结构装饰的墓葬，在宋朝非常流行，如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整个墓门即为仿木构建筑⑥。到了金代，原北宋统治的山西和河南地区的汉人墓也多为仿木结构的室类墓，如山西长治市北郊安昌村金墓⑦、河南焦作市西北郊王庄金墓⑧皆为仿木构石室墓。由此可见，在陵墓地宫结构上，从世宗兴陵开始发生了巨大转变，由原来的具有女真特色的石圹竖穴变成了汉人墓葬中流行仿木构石室墓。这一现象并非孤例，在中都地区，许多金代后期和晚期的贵族石椁墓都经历了从无室向有室的转变。金代后期，石椁与木棺之间

---

① 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叶帅：《金代女真汉化的考古学观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

② 刘晓东：《金代土坑石椁墓及相关问题》，《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 年，397～401 页。

③ 吴敬：《从金陵考古发现看金代女真人的汉化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 9 辑），科学出版社，2010 年，222～228 页。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 年，88～94 页。

⑤ 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

⑥ 周到：《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 年 7 期，349～354 页。

⑦ 商彤流、杨林中、李永杰：《长治市北郊安昌村出土金代墓葬》，《文物世界》2013 年 1 期，3～7 页。

⑧ 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 8 期，1～11 页。

的空隙增大，如乌古论窝论墓①。而到了金代晚期，石椁与木棺之间出现了更大的空间，基本演变为石室墓葬②，如乌古论元忠墓③。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原王朝流行墓室墓的影响。此外，在兴陵的墓道以及墓门建筑构件的装饰上，普遍用龙纹和花纹为装饰题材，如垂脊前端刻有昂首的龙头、门框两侧雕有极为精美的高浮雕腾龙及云纹（图三），在栏额正面及两侧面剔刻缠枝牡丹纹，这些纹饰无不透露出浓重的汉文化因素，更加说明其受影响之深。




图三　房山金陵 M9 墓门东西两侧云龙抱柱

## 二、陵墓朝向的转变

关于太祖睿陵的朝向，原报告认为 M6 为南北向，方向为 356°。然而从太祖睿陵主要的两具石椁——龙纹石椁与凤纹石椁的朝向看，均为东西向。而 M6-3 凤纹石椁中的头骨出在石椁东端，M6-4 龙纹石椁中的头骨出在东南角，如两具头骨未经移位，则说明其头向为朝东。这都说明太祖睿陵 M6 的墓向应为东西向，且头向朝东。在金中都地区发现的石椁墓多采用女真民族崇尚的东西墓向④，女真人崇东，东向拜日是北方民族的传统习俗，这种头向向东的葬俗应与女真东向拜日习俗有关。据史载女真“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门皆东向”⑤，说明女真人生活在北方苦寒之地，其地处契丹东北隅，其人则耐寒、忍饥，居所房门是朝向太阳初升的东方，这种习俗既受生活条件制约，又反映了他们的崇日、尚东观念⑥。而墓葬头向向东是这种习俗在陵墓朝向上的孑遗。

及至世宗兴陵 M9，原报告认为金陵 M9 墓道朝北，方向为 350°。但从世宗兴陵墓道平面图来看，M9 墓道在南，墓室居北，其墓道方向应为南向，而非北向，因此兴陵的墓向应为坐北朝南。金世宗兴陵取向南方，是承袭了东汉以来陵墓南向化的传统。

---

①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内部资料，1983 年。

② 吴敬：《金代女真贵族墓汉化的再探索》，《考古》2012 年 10 期，81 ~ 88 页。

③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内部资料，1983 年。

④ 丁利娜：《从考古发现谈金中都的社会等级结构》，《北方文物》2019 年 3 期，39 ~ 42 页。

⑤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3《政宣上帙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7 页。

⑥ 徐洁：《略论女真拜日礼俗》，《地域性辽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230 ~ 235 页。

《周易》载“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①]，帝陵南向这一现象，在西汉晚期已初现端倪，如汉平帝康陵的陵园朝向即为南向[②]。伴随着南向理念影响的深入，东汉以后陵墓的南向化确立起来，东汉之后，除特殊情况，各时代均流行南向、单墓道的使用制度，至明清未有改变[③]。

## 三、出土遗物的变化

在太祖睿陵 M6 发现的遗物大多具有女真本民族特色，其中出土的两件玉雕“海东青”饰件更是极具女真特色。在 M6-1 石椁中，发现随葬 2 件玉雕“海东青”饰件，样式相同，玉质粗糙，灰白色，雕刻海东青和梅花。长 5.5、宽 4.2、厚 0.8 厘米[④]。这两件玉雕海东青饰件应为服饰上的饰品，《金史・舆服志》载：“其胸臆肩袖，或饰以金绣，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⑤] 太祖睿陵 M6 作为最高等级的帝陵，发现的遗物仅有衣物上的装饰品，并未随葬陶瓷器以及金银铜铁器等金属器，这与上京的齐国王墓[⑥]十分相像。以此可见金朝早期帝王的薄葬风气[⑦]。

世宗兴陵墓室尚未完全发掘，仅清理至墓道部分，因此墓室之中的具体随葬物品尚无从知晓。但在世宗兴陵 M9 的墓道之中发现有大量铁器，经鉴定的共 21 件。其中生产工具 9 件，包括铲、镐、凿、斧、剁斧、三齿叉；兵器 2 件，包括矛、枪；生活用具 2 件，主要为锅；其他类 8 件，包括板材、铁过梁、帽钉、链、锔[⑧]。在 M9 墓道夯土中还出土一件白釉瓷盘（图四），轮制，白胎坚硬，外施半截釉，盘内满釉，釉质细润。内底有 10 个圆形支钉痕，口径 23.2、底径 8.5、高 5 厘米[⑨]。

---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327 页。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平帝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文物》2014 年 6 期，50～63 页。

③ 段清波、朱晨露：《古代陵墓墓道研究——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之四》，《考古与文物》2019 年 5 期，64～70 页。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 年，76 页。

⑤ 《金史》卷 43《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 年，984 页。

⑥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 10 期，1～10 页。

⑦ 龙小松：《冲突与融合——金代文化的变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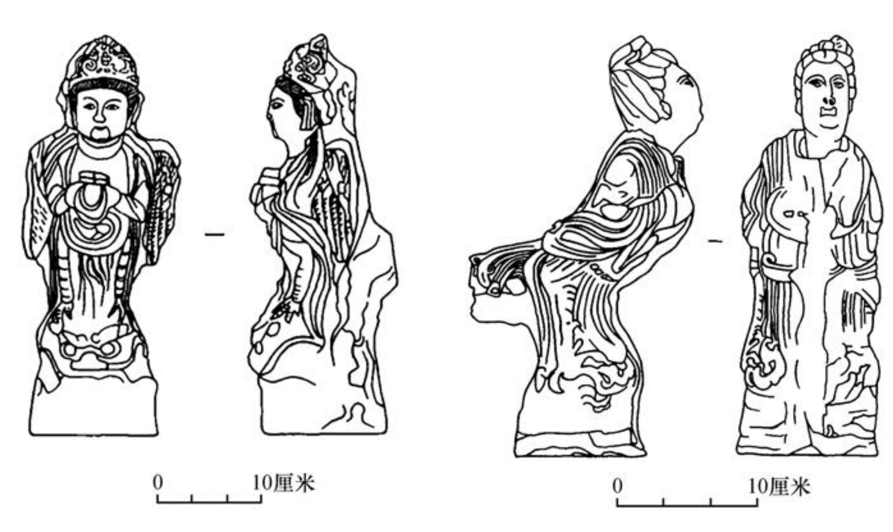
⑧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陵遗址出土铁器的金相学分析》，《北京文物与考古》（第 6 辑），民族出版社，2004 年，53～63 页。

⑨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 年，104 页。

在早期太祖睿陵之中的遗物多为衣物之上的饰品，且颇具女真特色。迨及世宗兴陵，遗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发生了变化，除饰品外，一些金属器，尤其是瓷器开始出现。说明女真帝王葬俗有早晚的变化，这应是受汉人大量随葬瓷器的影响，金朝在原北宋统治区和原辽统治区内汉人的墓葬中，随葬器物主要以瓷器和陶器为多[①]。显示出在世宗大定以后，女真贵族无论是生前，抑或是亡后，对瓷器的喜好都始终如一。


图四　M9 墓道夯土出土白釉瓷盘

此外，在房山金陵发现有两类迦陵频伽。一类为外施绿琉璃釉的陶迦陵频伽（图五），直径 7、高 24.8 厘米[②]。另一类为灰陶质迦陵频伽（图六），直径 10、高 31 厘米。迦陵频伽，又称嫔迦，作为脊饰出现在宋人李诫的《营造法式》[③]中。目前发现迦陵频伽的金代遗址主要有河北观台磁州窑址[④]、吉林安图县长白山神庙遗址[⑤]、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城址[⑥]。河北观台磁州窑址的迦陵频伽发现于第三期，年代在海陵王天德元



图五　房山金陵发现的绿釉陶迦陵频伽　　图六　房山金陵发现的灰陶迦陵频伽

① 赵永军:《金代墓葬研究》，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 年，120 页。

③ 李诫:《营造法式》卷 13《用兽头等》，商务印书馆，1954 年，57～59 页。

④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 年，300、30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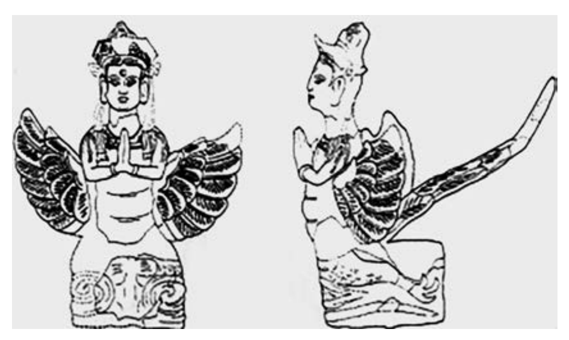
⑤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安图县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考古》2018 年 7 期，67～81 页。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考古》2019 年 7 期，77～91 页。

年到金宣宗兴定三年（1149 ~ 1219 年），在世宗大定年间瓷窑的发展达到鼎盛；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始建年代为大定十二年（1172 年）；太子城的年代应为金代中后期（大定元年以后，约 1161 ~ 1234 年）。由上可知，金代发现的迦陵频伽年代多在大定以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土瓷器，多为大定以后的产品，而甚少发现大定以前的产品，反映了中原地区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情况[①]。可以推测房山金陵发现的迦陵频伽的年代也应在世宗大定以后。除房山金陵外的历代皇陵中，在北宋皇陵（图七）[②] 以及西夏三号陵（图八）[③] 中亦发现有迦陵频伽。从迦陵频伽的整体造型和形象来看，房山金陵发现的迦陵频伽与北宋皇陵更为接近，而与西夏三号陵的差异较大，可见北宋皇陵对其的影响。



图七　北宋皇陵出土迦陵频伽头部



图八　西夏三号陵出土迦陵频伽

## 四、原　　因

房山太祖睿陵为海陵王于贞元三年（1155 年）营造完成，而世宗兴陵则是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兴建。之间相差三十余载，在这三十多年间，世宗虽然先后从上京迁其父陵墓于房山金陵，追陵号曰景陵[④]；为熙宗追以陵号曰思陵，并改葬峨眉谷[⑤]。但这些皇帝的陵墓规格皆未达到金朝正式登基皇帝之标准。也就是说，在这三十多年间，金朝并未大兴土木营建合乎皇帝标准的陵寝。因此世宗兴陵创造了继太祖睿陵之后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2006 年，325 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

③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 年。

④ 《金史》卷 19《世纪补》，中华书局，1975 年，410 页。

⑤ 《金史》卷 4《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 年，87 页。

的另一种皇陵模式，并极有可能成为金朝后继之君陵寝营建的范式。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世宗兴陵并未如太祖睿陵所建那样匆忙。海陵王初建大房山金陵时，因政局未稳，对外战争也未结束，导致营建工期较紧，可谓“一边建，一边迁，一边葬”①。因此其在迁建太祖睿陵过程中并未做过多改变，从而保留了诸多太祖初葬时的女真习俗。世宗时，金朝政局已安稳，有充裕的时间、人力、物力来营建陵寝。世宗“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②，金朝与南宋的“绍兴和议”标志着宋金之间的关系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结束了二者之间长期的战争与对抗状态，从此开始了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的全新局面。金朝此时“与民休息，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③，这为金朝陵寝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金朝吸收借鉴中原王朝陵寝制度开辟了新的道路。

其次在营建世宗陵寝时，金朝吸纳中原王朝制度始设山陵使之制。设置山陵诸使来负责皇帝陵寝营建以及丧葬事务，早已有之，如在唐代即设置山陵使、礼仪使、卤簿使、按行山陵地使、桥道置顿使等官④，北宋亦置此类官员⑤。金朝前期并无山陵诸使之设置，因此多任用富有营造经验的官员来营建、监督山陵工役，海陵王在中都营造陵寝时即任前工部尚书耶律安礼为提点营造官，任用参加过缮治中都的苏保衡来监督工役。世宗崩后，金朝始设山陵使制度，由官员充任山陵使，来掌议、监造皇帝陵寝。世宗兴陵的山陵使为户部尚书刘玮“世宗不豫，拜参知政事，仍领户部，既而为山陵使”⑥。此后，金朝山陵使制度被确立下来，如正大元年（1224 年）正月参知政事仆散五斤在免官后，也曾充任大行山陵使⑦。无论是陵墓的打造、送葬与下葬的大型活动的组织、丧礼与葬礼的备办举行以及仪注本身的建立都离不开山陵使，山陵使的设置使得皇帝的整个葬礼更加具有可操作性⑧。

最后世宗在位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礼制改革，极力推行儒家礼制，“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统以宰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⑨。在这之后，汉礼典仪在金朝帝王的丧葬之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如在储君完颜允恭去世后，世宗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 年）六月戊寅，命皇太子妃及诸皇孙执丧，并用汉

① 丁利娜：《试析女真帝王对中都金陵的营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 年 5 期，143 ~ 147 页。
② 《金史》卷 6《世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 年，203、204 页。
③ 《金史》卷 6《世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 年，203、204 页。
④ 吴丽娱：《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8 年，110 ~ 137 页。
⑤ 叶春芳：《北宋皇帝丧礼探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 年 3 期，81 ~ 91 页。
⑥ 《金史》卷 95《刘玮传》，中华书局，1975 年，2112 页。
⑦ 《金史》卷 17《哀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 年，374 页。
⑧ 吴丽娱：《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8 年，110 ~ 137 页。
⑨ 《金史》卷 28《礼一》，中华书局，1975 年，691、692 页。

仪[①]。又如在世宗崩后，金朝曾就世宗停殡一事展开过一场议礼之争：世宗死后，遗诏是将其停殡于寿安宫。百官中大多认为应按遗诏进行。然而移剌履却认为此事“非礼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其可使万国之臣朝大行于离宫乎？”章宗也认为此行为于礼未安，遂将世宗梓宫殡于大安殿[②]。由此可窥见金朝重视帝王丧礼之一斑。

在金朝中后期，曾尝试恢复女真习俗，世宗、章宗时期，金朝统治者一再指令金朝女真人保留女真旧俗。如世宗：“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③]章宗时“亦恐女直人废射也”[④]，因此“敕女直进士及第后，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⑤]。但从金世宗丧葬习俗的转变来看，金朝的汉化趋势已难以阻挡。

##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从太祖睿陵到世宗兴陵，金朝帝王的丧葬发生了巨大转变。在陵墓地宫上，按照“事亡如存”的理念，地宫作为帝王在另一个世界的卧室，不仅是容纳皇帝棺椁与个人地位生活相关随葬品的处所，更是皇帝本人思考帝国治理、精神理想的场所[⑥]。作为王朝的重要礼制建筑，陵墓地宫的营建在各朝代都要遵循一定的模式，特别是在一代成规确立后，整齐划一、少有变异是最常见的面貌[⑦]。世宗陵由椁墓到室墓不单纯只是地宫形制的变化，更是金朝对中原王朝政治体制、国家治理以及礼制思想的一种认同。在陵墓朝向上，古代帝王的陵墓墓向的形成原因，受到地理位置、文化传承、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影响[⑧]。金朝帝陵的朝向由最初太祖睿陵的东西向至世宗变为南北向，是其最初女真崇东习俗向中原王朝帝国南向理念的巨大转变，也意味着金朝帝王丧葬礼制的汉化趋向。在随葬品上，为了墓主的灵魂在冥界的家中能够继续享受如阳界一般的生活，中国古代陵墓极为重视随葬品[⑨]。金陵从太祖睿陵随葬具有女真特色的遗物到世宗兴陵开始出现金属和陶瓷类遗物的这一转变，既是金朝皇帝丧葬习俗的变迁，也是其日常生活移风易俗的真实写照。

---

① 《金史》卷8《世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189页。

② 《金史》卷95《移剌履传》，中华书局，1975年，2100、2101页。

③ 《金史》卷9《章宗纪一》，中华书局，1975年，194、195页。

④ 《金史》卷9《章宗纪一》，中华书局，1975年，213页。

⑤ 《金史》卷9《章宗纪一》，中华书局，1975年，229页。

⑥ 段清波：《秦始皇陵所见帝国文明宇宙观》，《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2期，90～95页。

⑦ 刘毅：《清西陵的“个性张扬”问题》，《文物春秋》2019年4期，49～57页。

⑧ 丁岩：《先秦两汉帝陵墓向问题初探》，《华夏考古》2014年1期，85～91页。

⑨ 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文物出版社，2015年，426页。

# The Changes in Funeral Customs of the Emperors in the Jin Dynasty Reflected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Fangshan Mausoleum of JinDynasy

Jiang Ziqiang  Zhao Yunhui  Liu Weiju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 of the Fangshan mausoleum of Jin Dynasty, from the Rui mausoleum of Taizu to Xing mausoleum of Shizong, the funeral custom of the emperors of the Jin Dynasty changed significantly.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hanges of the underground palace, the orientation of the mausoleum and the unearthed relic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Taizu Rui mausoleum, there were still many Jurchen costumes. Howev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Xing mausoleum of Shizong, the primitive Jurchen costumes began to fade, and the Han culture gradually occupied the mainstream. Thu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tim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setting of mausoleum of envoys, and the ritual system's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these changes also reflect the Jurchens' acceptance and recogni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ritual system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Keywords:** Fangshan mausoleum of Jin dynasty ;mausoleum system；funeral custom

# 高丽青瓷铭文举要

唐邦城

（保定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院，保定，071000）

**摘要：**对高丽青瓷涉及的铭文进行分类举要，大致分为干支年号铭、诗词铭、佛教相关铭、道教相关铭、官署铭、陵寝祭祀用铭、人名铭和其他类铭，共计八大类。其中，重点对诗词铭、官署铭和其他类铭文进行了讨论，将诗词铭具体划分为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并确定其创作作者。以高丽青瓷鼎形器与我国宋代古籍《宣和博古图》中记载商鼎相对应，反映我国古代书籍的传播对朝鲜半岛物质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论证了其他类铭文对研究我国与朝鲜半岛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整体而言，本文通过对高丽青瓷铭文的举要，反映出10～14世纪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存在着的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关键词：**高丽青瓷　铭文　文化交流

我国与朝鲜半岛之间自古就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交流，早在公元前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我国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便与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展开了以陶器为主的物质文化交流。根据朝鲜史料记载，从我国北宋建立至南宋初年，北宋的商船到达高丽有230次之多。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高丽睿宗十三年），明州太守奉旨在明州设置“高丽司”，主管与高丽国往来的政务，并在菊花洲上设“高丽使行馆”[①]。北宋与高丽之间互遣使者在宋徽宗时期最为频繁[②]。在10世纪，高丽光宗（950～975年）、成宗（982～997年）年间大量引进中国唐代的制度，如成宗八年至十一年（989～992年）高丽首次决定按照中国周礼的要求来规范国家的礼仪制度[③]。可以说，从10世纪开始，我国与朝鲜半岛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这些物质交流体现在瓷器、佛造

---

① 帅倩：《试析中国青瓷制瓷技艺影响下高丽青瓷的发展与传播》，《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7年4期，101～108页。

② 彭善国：《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中原文物》2001年2期，76～79、85页。

③ 任芳琴：《高丽青瓷的起源与中国越窑的关系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像、铜镜和其他金属器等，其背后所反映的是我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所存在的广泛文化交流。本文主要关注高丽青瓷，通过对高丽青瓷所涉及的铭文进行举要，从而揭示我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情况。

高丽青瓷大约产生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主要流行于10～14世纪，可分为绿青瓷（10世纪左右）、纯青瓷（或青瓷）、象嵌青瓷和铁画青瓷。10世纪，是高丽青瓷的形成期，主要受到以浙江地区的越窑为代表的中国各瓷窑的影响，生产粗质的绿青瓷。11世纪，是高丽青瓷的发展期，其烧制技术逐渐成熟，广泛借鉴龙泉窑、耀州窑、汝窑、磁州窑等知名瓷窑的生产工艺特点，生产出一系列釉色胎质良好、造型优美的青瓷。12世纪至13世纪前半期，高丽青瓷迎来发展的鼎盛期，在12世纪前半期，以生产翡色青瓷为代表。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前半期以生产象嵌青瓷为代表。此时，高丽青瓷釉色透明度高，纹饰充满民族特色，如云鹤纹、柳芦纹等，纯青瓷、刻纹青瓷、铁画青瓷和练理纹青瓷等品种交相辉映，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高丽王朝受到蒙古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高丽青瓷的生产制作开始走向衰落，在胎土、釉色以及造型方面均较以往有所下滑[①]。

近年来，高丽青瓷在朝鲜、韩国和我国都有出土，截止到2018年，据部分学者统计，我国境内出土的高丽青瓷共29批，其中以辽宁和浙江相对较多，分别为8处和7处，其次为江苏4处，其他地点较为零散，分别为吉林、内蒙古、北京各2处以及黑龙江、河北、山东、安徽各1处[②]。有关高丽青瓷的记载在宋代便已存在，如宋人徐兢在其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将高丽青瓷记为与越州古秘色和汝州新窑器所类似精美的翡色瓷器[③]。宋人太平老人在其《袖中锦》一书中更是将高丽青瓷与端砚、晋铜和福州茶等物并列为天下第一[④]。据《宝庆四明志》载，当时宋朝从高丽进口的物品中，除人参等特产外，尚有“青器”（即高丽青瓷）[⑤]。可见，高丽青瓷早在宋代便已有所名扬。目前，国内学界对高丽青瓷的造型起源和烧造方式等都已有较多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令人满意的进展。但关于高丽青瓷上所存在的铭文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尝试以郑良谟先生所著的《高丽青瓷》[⑥]为基础，对高丽青瓷铭文进行梳理和拓展，将较常出现的高丽青瓷铭文分为八类，分别为干支年号铭、诗词铭、佛教相关铭、道教相关铭、官署铭、陵寝祭祀用铭、人名和其他类铭文。

---

① 王芬、罗宏杰：《高丽青瓷与中国青瓷》，《中国陶瓷》2007年1期，74～77页。

② 吴敬、付亚瑞：《中国境内出土的高丽青瓷及相关研究述要》，《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1期，63～70、154、155页。

③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丛书集成初编》3236，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④ 太平老人：《袖中锦》，《丛书集成初编》2882，中华书局，1985年。

⑤ 罗濬：《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5070页。

⑥ 郑良谟著，金英美译：《高丽青瓷》，文物出版社，2000年。

# 一、干支年号铭

## （一）干　支　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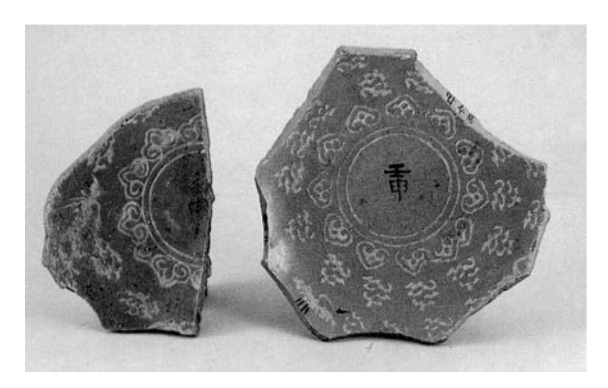
高丽青瓷上较为常见的干支铭文有己巳（1269 年）（图一）、庚午（1270 年）（图二）、壬申（1272 年）（图三）、癸酉（1273 年）（图四）、甲戌（1274 年）（图五）、壬午（1282 年）（图六）、乙未（1295 年）（图七）和丁亥（1347 年）（图八）等。总结带干支铭文的高丽青瓷特征，可以看出，干支铭文流行于 13 世纪晚期至 14 世纪中期（中国：南宋末年—元代），其相关青瓷类型主要以碗、碟为主，干支铭文都位于内底。干支铭文因可推断特定的年代，结合高丽青瓷的其他特征，可对断代有一定的帮助。朝鲜半岛在 12～15 世纪深受我国的朝代更替影响，从带干支铭文的高丽青瓷可以看到，



图一　象嵌青瓷云鹤纹“己巳”铭大碗
（1269 年相当于中国南宋咸淳五年，高 5.2、口径 15.5、底径 5.8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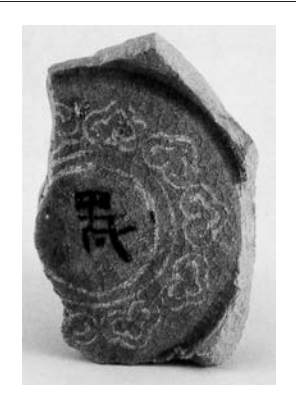
图二　象嵌青瓷柳芦水禽纹“庚午”铭大碗
（1270 年相当于中国南宋咸淳六年，高 6.3、口径 18.6、底径 6.2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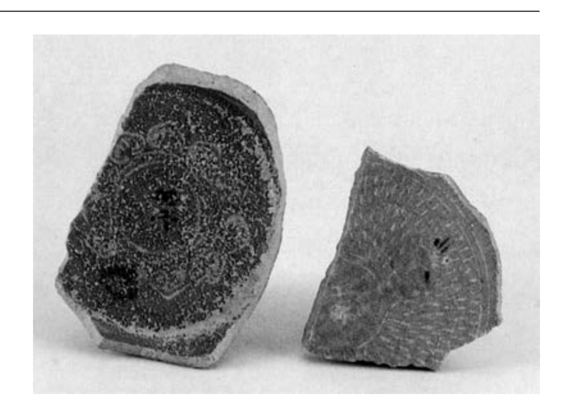
图三　象嵌青瓷云鹤纹“壬申”铭大碗标本
（1272 年相当于中国南宋咸淳八年，右高 3.5、底径 6.4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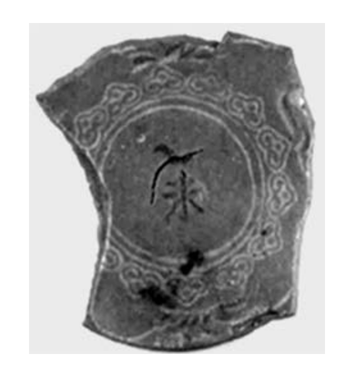
图四　象嵌青瓷云鹤纹“癸酉”铭大碗
（1273 年相当于中国南宋咸淳九年，高 5.9、口径 19.8、底径 6.1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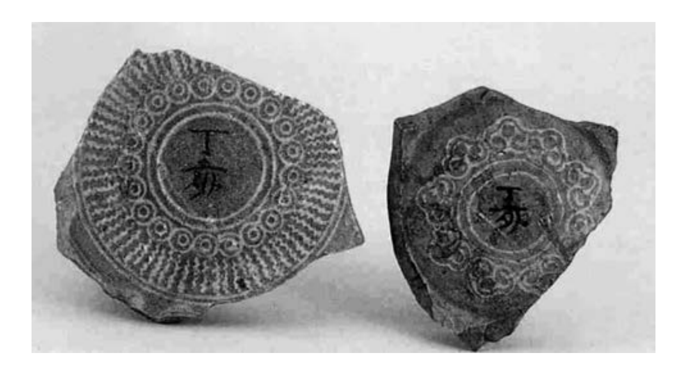
图五　象嵌青瓷云鹤纹“甲戌”铭标本
（1274 年相当于中国元代至元十一年，高 1.7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六　象嵌青瓷“壬午”铭标本
（1282 年相当于中国元代至元十九年，左高 4.9、底径 6.9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七　象嵌青瓷“乙未”铭标本
（1295 年 相当于中国元代元贞元年，高 3.2、底径 6.7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八　象嵌青瓷“丁亥”铭标本
（1347 年相当于中国元代至正七年，右高 2.1、底径 6.8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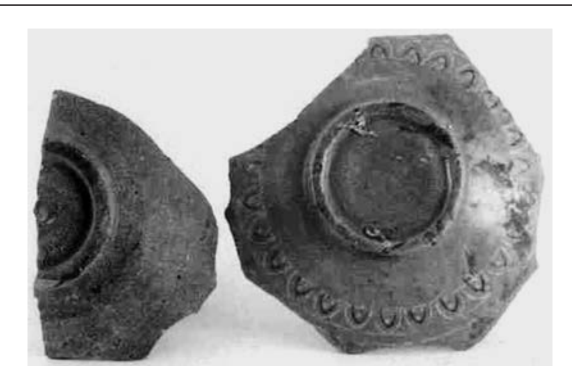
时间相当于南宋末年时期的高丽青瓷，其外底大多施全釉，且采用支钉烧的烧造工艺。而到了相当于元代时期的高丽青瓷，其外底大多不施全釉，且外底圈足相对于南宋时期的高丽青瓷有所加宽、加厚，外底圈足也多有沾沙，说明高丽青瓷的烧造工艺发生了变化（图九 ~ 图一二）。故从高丽青瓷的圈足宽度和厚度以及外底是否施全釉，是否有支钉痕迹或沾沙痕迹，可辅助推断其年代。13 世纪晚期的高丽青瓷外底大多施全釉，有支钉痕迹。13 世纪末期至 14 世纪中期的高丽青瓷外底则多不施全釉，且有沾沙痕迹，圈足也较 13 世纪晚期的高丽青瓷更显宽厚粗糙。

## （二）年　号　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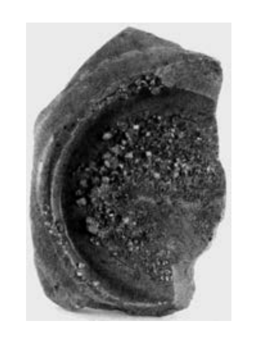
目前高丽青瓷上常见到的年号铭文有至正（中国元代年号）（图一三）、淳化（中国



图九　象嵌青瓷云鹤纹“己巳”铭大碗底部



图一〇　象嵌青瓷云鹤纹“壬申”铭大碗底部



图一一　象嵌青瓷云鹤纹“甲戌”铭标本底部



图一二　象嵌青瓷“丁亥”铭标本底部

北宋年号）（图一四）等[①]。从年号铭可以看出，古代的朝鲜半岛与我国之间紧密的物质文化联系。



图一三　象嵌青瓷“至正”铭标本
（长 8.2 厘米，藏于韩国海刚陶瓷美术馆）



图一四　“淳化四年癸巳太庙第一室享器匠崔吉会造”铭壶底部
（高 35、口径 18.3、底径 16.3 厘米，藏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

① 姜敬淑：《韩国陶磁史》,《韩国文化艺术大系 3》，一志社，199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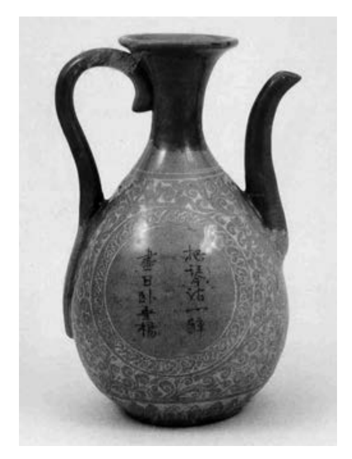
# 二、诗　词　铭

在 12 ~ 13 世纪（中国宋代—元代初期）的高丽青瓷上可见到一些诗词铭文，其中大部分是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有些诗词是来自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王维和韩愈等，也有些诗词是来自我国唐代知名度相对较低的诗人，如朱彬、李崇嗣等。通过高丽青瓷上的诗词铭文可以看出，12 ~ 13 世纪的朝鲜半岛对唐风的追慕。同时，高丽青瓷上我国诗人创作的诗词也可与今天国内所流传的版本进行对照。

## （一）五言绝句

### 1.“把琴沽一醉　尽日卧垂杨　暂入新丰市　犹闻旧酒香”

该青瓷象嵌宝相唐草纹注子上的诗词铭文为唐代朱彬所作的《丹阳作・一作陈存诗》，但在书写顺序上与原文相颠倒[①]。将诗词铭文与器形相结合，可以推断该件注子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酒具使用（图一五）。




图一五　象嵌青瓷诗词铭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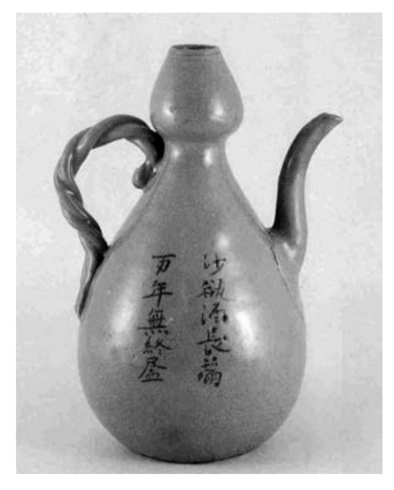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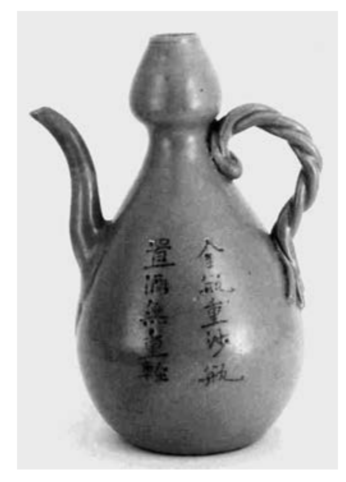
（12 世纪，高 24.1、底径 8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2.“沙瓶酒长满　万年无终书　金瓶重沙瓶　置酒无重轻”

该青瓷象嵌葫芦形注子上的诗文可能为朝鲜半岛的诗人所作，具有研究价值。结合

① 《丹阳作・一作陈存诗》是唐代诗人朱彬所创作的五言绝句，全文为：暂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抱琴沽一醉，尽日卧垂杨。

器形可知，该件注子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酒具使用（图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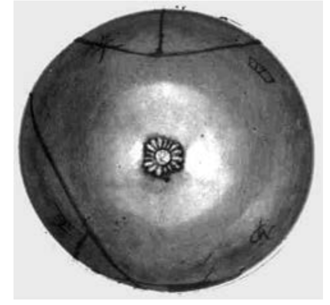



图一六　象嵌青瓷诗词铭注子

（12 世纪，高 27.9、底径 9.2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3.“方四笑盃　三盃诗　天许方四盃　三盃皆已得　何逢方二杯　亦足含笑盃”**

该件青瓷象嵌唐草纹诗词铭文杯内底贴塑一朵菊花，菊花旁有一小孔，与外底相连。外底中心处有一小孔。其结构与我国公道杯相类似，结合器身五言绝句铭文，推测其是作为量酒器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同时出现两种“杯”字的写法，一种是“盃”，另一种是“杯”，在过去“杯”也被写作“桮”[①]，然而此处出现两种写法，是否意味着这两个字在 12 世纪的朝鲜半岛有着不同的意思？该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研究（图一七）。


图一七　象嵌青瓷诗词铭杯

（12 世纪，高 8.8、口径 16.9、底径 6.1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① 陈廷敬、张玉书、王宏源：《康熙字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 （二）五言律诗

**1.“何处难忘酒　青门送别多　敛襟收涕泪　促马听笙歌　烟树灞陵岸　风尘长乐坡　此时无一盏　争奈去留何”**

该件青瓷象嵌菊花纹玉壶春瓶上的诗词铭文出自唐代白居易所作的《劝酒十四首 · 何处难忘酒七首》[①]，其中“促马听笙歌”中的“促”字在现今我国所流传的版本中被写为“簇”[②]（图一八）。





图一八　象嵌青瓷诗词铭玉壶春瓶
（13 世纪，高 34.6、口径 12.5、底径 8.2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2.“闻道城都酒　无钱亦可求　不知将几斗　消得自来愁　无尘终不扫　有鸟莫令弹　若要添风月　应除数百竿”**

该件青瓷象嵌云鹤纹注子上的诗词铭文中前四句来自唐代李崇嗣的《独愁》[③]，后四句来自唐代韩愈的《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 · 竹径》[④]。其中与目前我国所流传的版本不同的是，《独愁》中“销得此来愁”在高丽青瓷的铭文中为“消得自来愁”，而《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 · 竹径》中的“无尘从不扫”在高丽青瓷的铭文中为“无尘终不扫”（图一九）。

## （三）七言绝句

**1.“细镂金花碧玉壶　豪家应是喜提壶　须知贺老乘清兴　抱向春深醉镜湖”**

该青瓷阳刻莲花唐草纹葫芦瓶做工精美，底足留有支钉痕迹。其上的诗词铭文来源

① 김경동：白居易［勸酒十四首］의 한국적 수용과 변용. 중어중문학，2014，59：27-54.

② 《劝酒十四首 · 何处难忘酒七首》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创作的五言律诗，其中与文中高丽青瓷上的诗词铭文相关的部分为：“何处难忘酒，青门送别多。敛襟收涕泪，簇马听笙歌。烟树灞陵岸，风尘长乐坡。”

③ 《独愁》为唐代诗人李崇嗣所创作的五言律诗，原文为：“闻道成都酒，无钱亦可求。不知将几斗，销得此来愁。”

④ 《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 · 竹径》为唐代诗人韩愈所创作的五言律诗，原文为：“无尘从不扫，有鸟莫令弹。若要添风月，应除数百竿。”




图一九　象嵌青瓷云鹤纹诗词铭注子
（12 世纪，高 19.7、底径 8.4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有待进一步查证（图二〇）。





图二〇　象嵌青瓷诗词铭葫芦瓶
（12 世纪，高 39.3、口径 2.5、底径 11.1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2.“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该青瓷象嵌芦下水禽纹玉壶春瓶上的诗词铭文为唐代王维所作的《渭城曲 · 送元二使安西》[①]（图二一）。

① 《渭城曲 · 送元二使安西》是唐代诗人王维所创作的七言绝句，原文为：“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 三、佛教相关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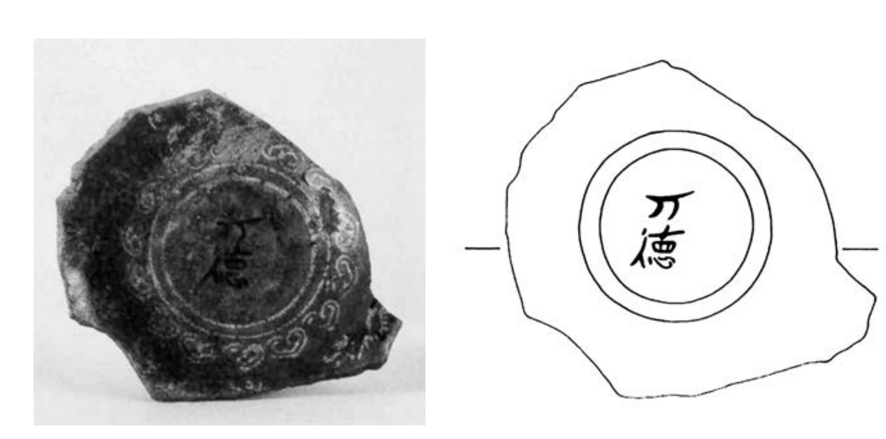
图二一　象嵌青瓷诗词铭玉壶春瓶
（14 世纪，高 28.4、口径 6.3、底径 10.8 厘米，藏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

高丽青瓷铭文中存在一些与佛教相关的铭文，主要为寺院铭、发愿文铭和梵文铭等。其中，有部分寺庙的名字因为简写的原因，在过去易被国内学者误认为是吉祥用语，如“万德”，实际上是指“万德寺”。

## 寺　院　铭

### 1. 万德

“万德”为“万德寺”的简称，在《高丽史》三十八《世家卷第三十八》和《高丽史》九十一《列传卷第四》[①] 中都有记载“置万德寺”。《高丽史》三十八《世家卷第三十八》中记为：“十二月辛卯永陵子释器置万德寺。”《高丽史》九十一《列传卷第四》中记为：“释器忠定祝发置万德寺。”（图二二）




图二二　象嵌青瓷云鹤纹寺院铭大碗标本
（13 世纪，高 2.3、底径 4.3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2. 青林寺

见图二三。

① 李朝、郑麟趾：《高丽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58 年。

**3. 发愿文铭**

见图二四。



图二三　铁画青瓷寺院铭花瓶
（10 ~ 11 世纪，高 11.9、口径 6.3、底径 7.7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二四　象嵌青瓷发愿文铭标本
（12 世纪，11.2 厘米 ×11.5 厘米 ×1.2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4. 梵文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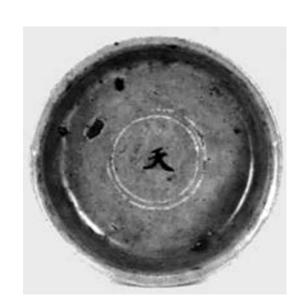
见图二五。



图二五　象嵌青瓷梵文铭标本
（12 ~ 13 世纪，高 7.7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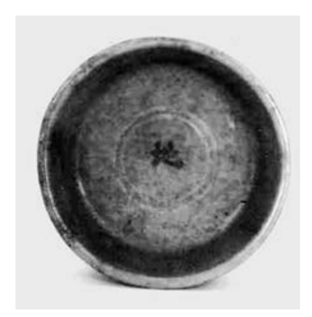
# 四、道教相关铭

在高丽青瓷铭文中也存在一些与道教相关的铭文，其主要分布的器物类型为碗、盘和盏，这一特点可能是因为其作为道教相关仪轨的使用有关。常见的铭文有“天”（图二六）、“地”（图二七）、“鬼”（图二八）、“十一曜前排”（图二九）等。






图二六　象嵌青瓷道教相关铭碟
（13 世纪，高 3.5、口径 11.8、底径 6.1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二七　象嵌青瓷道教相关铭碟
（13 世纪，高 3.7、口径 12.1、底径 6.9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二八　象嵌青瓷道教相关铭盏
（13 世纪，高 6.1、口径 8.7、底径 4.4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二九　象嵌青瓷道教相关铭碟
（13 世纪，高 3、口径 12.1、底径 6.2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五、官　署　名




图三〇　青瓷阴刻云龙纹“尚药局”铭盒
（12 世纪，高 9.3、口径 7、底径 5.5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10～14 世纪，朝鲜半岛受我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在官署制度方面向我国学习，故在许多官署的名称和用途上，朝鲜半岛与我国存在许多相似性。国内学界很早便开始关注高丽青瓷上有关官署名的铭文，如对纯青瓷上“尚药局”铭文（图三〇）的讨论，对比研究了同时期我国宋代带有“尚药局”铭文的瓷器[①]。然而，受制于高丽青瓷铭文材料和朝鲜半岛史籍的获取有限，部分高丽青瓷上的铭文内容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准备色”、“宴礼色”和“烧钱色”的重新认识。

高丽青瓷又有翡色青瓷一说，因受烧造时的温度和氧化还原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色泽。因为高丽青瓷的呈色差异，部分国内学者将“烧钱色”、“准备色”和“宴礼色”认为是窑工制作青瓷时根据不同需要所设计的不同颜色。特别是从出土的带有“烧钱色”铭文的两个高丽青瓷盏（图三一）来看，一个呈灰青色，另一个呈黄绿色，更是进一步强化了“烧钱色”、“准备色”和“宴礼色”作为高丽青瓷的三种不同颜色适用于不同场合的观点，如“宴礼色”则是专门为举办宴礼所制备的高丽青瓷颜色。



图三一　铁画青瓷“烧钱色”铭盏
（13 世纪，高 6、口径 9.3、底径 3.6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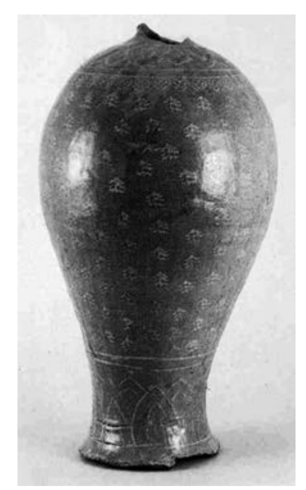
① 王子:《从高丽青瓷“尚药局”铭瓷盒看北宋与高丽的文化关联》,《中国港口》2017 年 A02 期，7～1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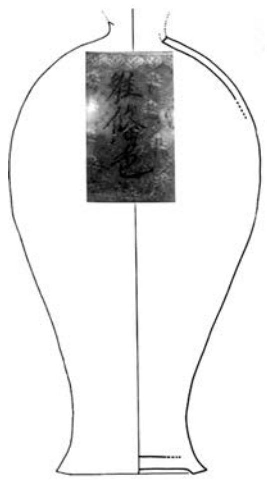
然而，通过考证“烧钱色”（图三二）、“准备色”（图三三）和“宴礼色”（图三四）发现，此三类铭文并不是指高丽青瓷针对不同用途所烧制的颜色，而是官署名。在《高丽史》四十五《世家卷第四十五》中有记载：“十一月己丑朔前郎将郭兴安伪造都堂经历司印牒付准备色军资寺受衣服米豆以与妓妾事觉斩之。”其中，“军资寺”掌军需储积（《高丽史》七十六《志卷第三十》)。可见“准备色”与“军资寺”的性质一样，都为官署之名。在《高丽史》七十七《志卷第三十一》中也有记载：“宝源解典库恭愍王十八年置：使秩从五品；副使从六品；丞从七品；注簿从八品；录事从九品。恭让王三年併供办署济用库于本库（恭让曾罢准备色置济用库）。”与“准备色”类同，“烧钱色”也是指官署的名称，在《高丽史》八十五《志卷第三十九》中记载：“署亦别建造醖都祭库烧钱色传请供设此外公私一皆禁断。”[①] 与之相似，“宴礼色”也是一种官署的名称。



图三二 铁画青瓷“烧钱色”标本
（13 世纪，高 2.9、底径 4.5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在高丽青瓷铭文中，“烧钱色”有时以“烧钱”（图三五）出现，“宴礼色”有时也以“宴礼”（图三六）出现。而与高丽青瓷呈色直接相关的铭文，则为“桐三紫一”、“紫三桐一灰三”和“桐三紫一灰木分”（图三七）等，而非“准备色”之类。观察“桐三紫一”这类铭文的位置，都位于





图三三 象嵌青瓷云鹤纹“准备色”铭梅瓶
（14 世纪，高 33.5、底径 11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三四 象嵌青瓷云鹤纹“宴礼色”铭大碗
（14 世纪，高 9.5、口径 18.6、底径 6.1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① 郑麟趾：《高丽史》，奎章阁本，1957 年。



图三五　象嵌青瓷“烧钱”铭盏

（13 世纪，高 5.3、口径 9.8、底径 3.8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三六　象嵌青瓷“宴礼”铭标本

（高 1.3 厘米，藏于韩国康津青瓷博物馆）



图三七　左起依次，“桐三紫一灰木分”铭标本、“紫三桐一灰三”铭标本和“桐三紫一”铭标本

（藏于韩国海刚陶瓷美术馆）

青瓷的纹饰之上，说明此类铭文并不是作为装饰之用，而是故意标记。且此类铭文大多位于不同色泽的梅瓶标本之上，结合其铭文大意，应该为生成不同青瓷颜色的釉料配方。

## 六、陵寝祭祀用铭

在高丽青瓷的铭文中，也存在一部分有关陵寝祭祀时使用的，如“正陵”（图三八）、“陵室”（图三九）等。其中，正陵是我国元朝魏王之女鲁国大长公主（恭愍王妃）的陵墓[①]，年代大约在我国的元末明初之际。在《高丽史》四十一《世家卷第四十一》中有记载：“壬辰葬公主于正陵。”

① 李朝、郑麟趾：《高丽史·恭愍世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58 年。



图三八　象嵌青瓷陵寝祭祀用铭标本
（1365 ~ 1374 年，高 3.3、长 9.1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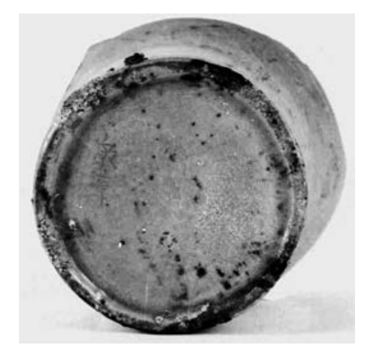
图三九　象嵌青瓷陵寝祭祀用铭标本
（14 世纪，高 6.3、口径 12.9、底径 5.9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七、人　名　铭

在高丽青瓷的铭文中，也经常可以见到与我国宋元时期瓷器表面相似的人名类铭文。如“崔信”（图四〇）、“敦章”（图四一）、“惠”（图四二）、“孝久刻”（图四三）、“丘”（图四四）等。其中，如“孝久刻”这一类铭文可以明显得知为制作器物的人所自铭外，类似于“丘”等铭文，除了可能是作者自作铭以外，也可能是订货方的名字。因为对于朝鲜半岛而言，直到高丽显宗时期（1010 ~ 1031 年），一些地方当权者尚不具备姓名，更不用说是普通的制瓷工匠了。



图四〇　青瓷“崔信”铭盘口瓶
（11 世纪，高 25.5、口径 8.4、底径 8.5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四一　青瓷“敦章”铭梅瓶标本
（12 世纪，高 9.5、底径 7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四二　象嵌青瓷“惠”铭梅瓶
（12 世纪，高 29.2、口径 5.1、底径 10.4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四三　青瓷“孝久刻”铭净瓶
（高 36.7 厘米，藏于日本根津博物馆）



图四四　象嵌青瓷“丘”铭盒
（13 世纪，高 3.5、口径 6.7、底径 5.4 厘米，
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八、其他类铭

高丽青瓷铭文除了位于常见的碗、碟一类器物上外，也位于一些如印章（图四五）、鼎形器等器物上。本文为了研究方便，暂时将此类铭文归为其他类。需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而言，鼎形器在朝鲜半岛的存世量很少，其中部分鼎形器的外底还带有铭文。而对于这类鼎形器，国内外学者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认为，此类鼎形器是反映 12 世纪左右我国与朝鲜半岛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书籍传播对朝鲜半岛物质文化产生影响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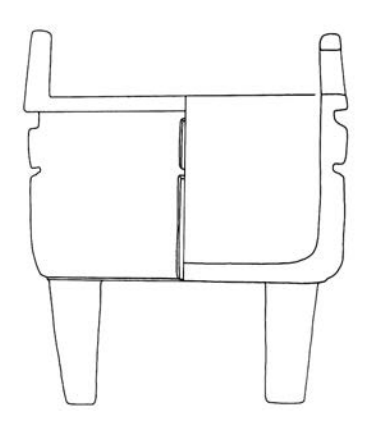


图四五　青瓷猿形印章
（12 世纪，高 4.3、印径 2.9 厘米 ×2.4 厘米，藏于韩国湖林博物馆）

在 12 世纪左右，我国大量的书籍流向朝鲜半岛[①]，高丽青瓷铭文中的诗词铭文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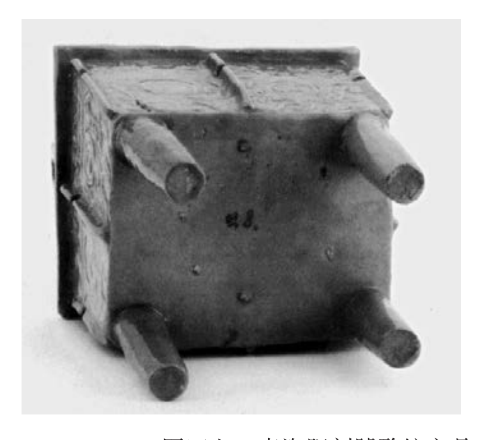
① 周海宁：《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之影响研究——以史学体例和史学思想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

可以印证诗词类书籍在朝鲜半岛的流行。而从一些鼎形器也可以看出,《考古图》《宣和博古图》[①] 或许也曾经在朝鲜半岛流行。如从目前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一件 12 世纪带铭文的鼎形器（图四六、图四七）可以看出，其与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的《宣和博古图》中绘制记载的“商亚[illegible]父丁鼎”的造型与纹饰是完全一致的。从鼎身正面的纹饰分格结构看，两鼎皆是上层为四个两两相对的夔龙纹，下层为一个饕餮纹。从鼎的四足纹饰看，也是一致的，都是蕉叶蝉纹。就铭文而言，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朝鲜半岛的制瓷工匠可能是依照《宣和博古图》上的图样制作瓷器，所以对瓷鼎的外观设计把握度较高，几乎能够做到完全一致，但对于我国商代的铭文却完全不懂，也不明白其是纹饰还是字样，所以在模仿的过程中有所走形，但铭文的主体结构依旧有所保留（图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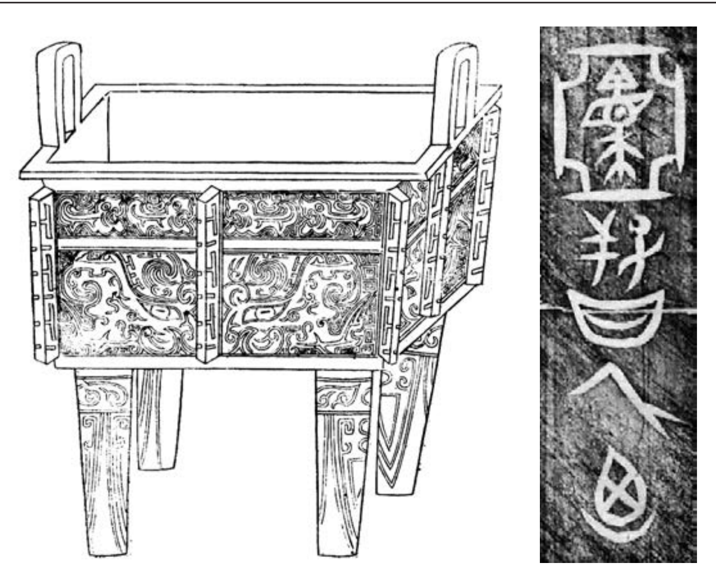
图四六　青瓷阳刻饕餮纹方鼎及线描图

（12 世纪，高 18.4、口径 15.5 厘米 × 14 厘米，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四七　青瓷阳刻饕餮纹方鼎底部及器身铭文

① 王黼:《宣和博古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年。



图四八 《宣和博古图》中所记载的商亚𠁁父丁鼎及其铭文

# 九、结　　语

本文主要对高丽青瓷涉及的铭文进行分类举要，大致分为干支年号铭、诗词铭、佛教相关铭、道教相关铭、官署铭、陵寝祭祀用铭、人名铭和其他类铭，共计八大类。其中，主要对诗词铭、官署铭和其他类铭文进行了探讨，对一些存在于高丽青瓷上的诗词铭文的作者进行了确定，并对以往学界对“准备色”等铭文认为是与高丽青瓷颜色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将其归为官署铭，并提供了与高丽青瓷呈色有关的铭文的相关材料，如“桐三紫一”等。同时，对于其他类铭文，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高丽青瓷鼎为例，将之与我国宋代古籍《宣和博古图》中记载的“商亚𠁁父丁鼎”相对照，反映12世纪的高丽青瓷的设计造型与我国文化的密切关系。整体而言，通过对高丽青瓷铭文的举要（表一），反映出10～14世纪的我国与朝鲜半岛存在着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表一　高丽青瓷铭文举要表**

| 铭文类型Ⅰ | 铭文类型Ⅱ | 铭文内容 | 青瓷类别 | 时代 | 现藏地点 |
| --- | --- | --- | --- | --- | --- |
| 干支年号铭 | 干支铭 | 己巳 | 象嵌青瓷 | 1269年（中国南宋咸淳五年）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干支年号铭 | 干支铭 | 庚午 | 象嵌青瓷 | 1270年（中国南宋咸淳六年）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干支年号铭 | 干支铭 | 壬申 | 象嵌青瓷 | 1272年（中国南宋咸淳八年）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续表

| 铭文类型Ⅰ | 铭文类型Ⅱ | 铭文内容 | 青瓷类别 | 时代 | 现藏地点 |
|---|---|---|---|---|---|
| 干支年号铭 | 干支铭 | 癸酉 | 象嵌青瓷 | 1273 年（中国南宋咸淳九年）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干支年号铭 | 干支铭 | 甲戌 | 象嵌青瓷 | 1274 年（中国元代至元十一年）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干支年号铭 | 干支铭 | 壬午 | 象嵌青瓷 | 1282 年（中国元代至元十九年）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干支年号铭 | 干支铭 | 丁未 | 象嵌青瓷 | 1295 年（中国元代元贞元年）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干支年号铭 | 干支铭 | 丁亥 | 象嵌青瓷 | 1347 年（中国元代至正七年）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干支年号铭 | 年号铭 | 至正 | 象嵌青瓷 | 14 世纪 | 韩国海刚陶瓷美术馆 |
| 干支年号铭 | 年号铭 | 淳化四年癸巳太庙第一室享器匠崔吉会造 | 纯青瓷 | 993 年（中国北宋淳化四年） |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 |
| 诗词铭 | 五言绝句 | 把琴沽一醉 尽日卧垂杨 暂入新丰市 犹闻旧酒香 | 象嵌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诗词铭 | 五言绝句 | 沙瓶酒长满 万年无终书 金瓶重沙瓶 置酒无重轻 | 象嵌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诗词铭 | 五言绝句 | 方四笑盃 三盃诗 天许方四盃 三盃皆已得 何逢方二杯 亦足含笑盃 | 象嵌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诗词铭 | 五言律诗 | 何处难忘酒 青门送别多 敛襟收涕泪 促马听笙歌 烟树灞陵岸 风尘长乐坡 此时无一盏 争奈去留何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诗词铭 | 五言律诗 | 闻道城都酒 无钱亦可求 不知将几斗 消得自来愁 无尘终不扫 有鸟莫令弹 若要添风月 应除数百竿 | 象嵌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诗词铭 | 七言绝句 | 细镂金花碧玉壶 豪家应是喜提壶 须知贺老乘清兴 抱向春深醉镜湖 | 象嵌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诗词铭 | 七言绝句 |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 象嵌青瓷 | 14 世纪 |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 |
| 佛教相关铭 | 寺院铭 | 万德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佛教相关铭 | 寺院铭 | 青林寺 | 铁画青瓷 | 10 ~ 11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佛教相关铭 | 发愿文铭 | 三藐三菩提诸佛户人……于此而般涅槃故我在……经安于茔上惟愿诸佛如经……此而转法轮今我亡母即离……乐土又愿一切圣贤天龙八部……法父住亦护我母导乐……此过者望者见闻随喜者……功苦类普及法界含……不思议之力…… | 象嵌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续表

| 铭文类型Ⅰ | 铭文类型Ⅱ | 铭文内容 | 青瓷类别 | 时代 | 现藏地点 |
|---|---|---|---|---|---|
| 佛教相关铭 | 梵文铭 | 梵文 | 象嵌青瓷 | 12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道教相关铭 | | 天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道教相关铭 | | 地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道教相关铭 | | 鬼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道教相关铭 | | 十一曜前排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官署名 | | 尚药局 | 阴刻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官署名 | | 烧钱色 | 铁画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官署名 | | 准备色 | 象嵌青瓷 | 14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官署名 | | 宴礼色 | 象嵌青瓷 | 14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官署名 | | 烧钱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官署名 | | 宴礼 | 象嵌青瓷 | 14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陵寝祭祀用铭 | | 正陵 | 象嵌青瓷 | 1365 ~ 1374 年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陵寝祭祀用铭 | | 陵室 | 象嵌青瓷 | 14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人名铭 | | 崔信 | 青瓷 | 11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人名铭 | | 敦章 | 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人名铭 | | 惠 | 象嵌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人名铭 | | 孝久刻 | 青瓷 | 12 世纪 | 日本根津博物馆 |
| 人名铭 | | 丘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其他类铭 | 表釉料成分 | 桐三紫一灰木分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海刚陶瓷美术馆 |

续表

| 铭文类型Ⅰ | 铭文类型Ⅱ | 铭文内容 | 青瓷类别 | 时代 | 现藏地点 |
|---|---|---|---|---|---|
| 其他类铭 | 表釉料成分 | 紫三桐一灰三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海刚陶瓷美术馆 |
| 其他类铭 | 表釉料成分 | 桐三紫一 | 象嵌青瓷 | 13 世纪 | 韩国海刚陶瓷美术馆 |
| 其他类铭 | | 金文 | 阳刻青瓷 | 12 世纪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 Research on Inscriptions of Goryeo Celadon

Tang Bangch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ssifies and listes the inscriptions of Goryeo celadon into eight categories: namely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poetry, Buddhism-related inscriptions, Taoism-related inscriptions, government offices, Mausoleum sacrificial inscriptions, personal name , and inscriptions about other content.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scriptions on poetry, government offices, and other content.

The inscriptions of poetry and lyrics are divided into five-character quatrains, five-character regulated verses and seven-character quatrains, and identify the authors of them. The Shang tripod, recorded in Xuanhebogutu, an ancient catalogue of antique bronzes of the Song dynasty, corresponds to the tripod-shaped wares of Goryeo celadon, reflec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spread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on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Goryeo Peninsula, and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other types of inscriptions in the study of exchanges of cultural materials between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Overall,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different types of inscription of Goryeo celadon and reflects the extensive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the 10th century to the 14th century.

**Keywords:** Goryeo Celadon; Inscriptions; cultural exchanges

# 白城市博物馆部分馆藏铁器的初步科学分析研究

郭美玲[1]　宋明雷[2]　董伟佳[3]　王　贺[4]

［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130033；2. 白城市博物馆，白城，137000；3. 洮南市文物管理所，洮南，137100；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沈阳，110003］

**摘要：**本文对白城市博物馆 8 件铁器进行了科学分析研究，经分析的铁器样品均属于生铁冶炼体系产物，分为铸铁、炒钢两大类，并根据器物类型及使用需求采用了不同的制作工艺。初步确认白城地区的先民在这一时期已熟练生铁制作技术，并极有可能存在较大规模的钢铁冶炼、制作活动。铁器夹杂物中的高硫特征，或可作为其铁器制作过程中熔铁、化铁时使用煤作为燃料的证据。

**关键词：**辽金时期　白城　古代生铁　技术特征

辽、金两个朝代分别是由契丹族和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活动时间从 10 世纪前叶到 13 世纪中叶，前后延续三百余年，为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地区是其活动的主要区域。吉林白城地区流经有松花江、嫩江两大水系，先后有濊貊、东胡、鲜卑、夫余、契丹、室韦、女真、蒙古、锡伯、汉、满等十余个民族在这片土地生活。辽金时期是白城市历史上空前发展的时期，此时白城地区生活的人群为契丹人和女真人，出于与中原地区的宋朝对峙等军事需要。其钢铁冶铸加工业有较快的发展，对辽金两代生产力水平提高并拥有与中原地区抗衡的实力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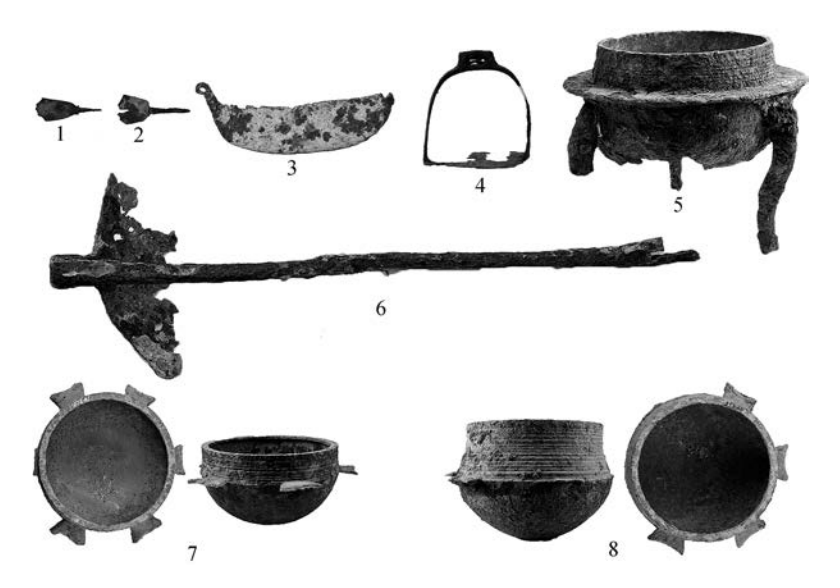
目前在华北北部与东北的广大地区内调查发现了很多辽金两代冶铸遗址、遗迹，但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数量却不多，经科学分析检测研究印证的数量更为稀少，很多遗址、遗迹仅停留在考古调查阶段，对出土铁器的研究大多也停留在类型学研究层面，这也导致对辽金两代冶铁手工业深入研究的进展相对缓慢。本文对白城市博物馆藏 8 件辽金时期铁器进行了初步科学分析，希望为揭示辽金两代冶铁手工业发展程度、生产力水平及社会形态的发展转变等问题提供有益的信息。

---

① 麻铃:《辽金时期东北农业发展述略》,《中外企业家》2010 年 8 期，149、150 页。

# 一、样品采集情况

本研究对白城市博物馆馆藏辽金时期部分铁器进行了取样分析。取样过程中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仅选择可辨器形的残块进行取样，在满足分析测试需求的前提下，取样量尽可能小（图一）。




图一　白城博物馆铁器样品器物照片

1. BC05 铁镞　2. BC06 铁镞　3. BC02 铁镰　4. BC09 铁马镫　5. BC10 铁釜　6. BC01 铁锄　7. BC11 铁锅　8. BC12 铁锅

本研究共获取铁器样品 8 件，包括农具 2 件、兵器 2 件、车马器 1 件、生活用具 3 件，取样详情见表一。

**表一　白城市博物馆馆藏铁器样品取样统计表**

| 类别 | 馆藏编号 | 实验编号 | 器物名 | 时代 | 取样位置 | 样品情况 | 器物来源 |
|---|---|---|---|---|---|---|---|
| 农具 | 003071 | BC01 | 铁锄 | 金 | 锄头残处 | 残余铁基体 | 征集 |
| | 002001 | BC02 | 铁镰 | 金 | 镰刃残处 | 残余铁基体 | 城四家子出土 |
| 兵器 | 000737 | BC05 | 铁镞 | 辽 | 根部 | 残余铁基体 | 城四家子出土 |
| | 000218 | BC06 | 铁镞 | 辽 | 镞尖 | 残余铁基体 | 城四家子出土 |
| 车马器 | 002024 | BC09 | 铁马镫 | 辽 | 脚踏残处 | 残余铁基体 | 征集 |
| 生活用具 | 014365 | BC10 | 三足铁釜 | 金 | 底残处 | 残余铁基体 | 征集 |
| | 026435 | BC11 | 六耳铁锅 | 金 | 锅沿残处 | 残余铁基体 | 征集 |
| | 002046 | BC12 | 六耳铁锅 | 金 | 锅耳残处 | 残余铁基体 | 征集 |

# 二、分析方法与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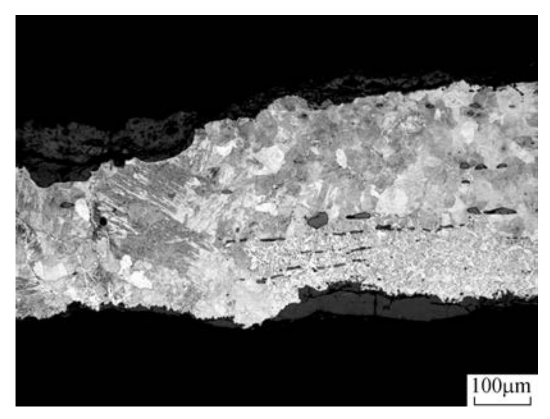
本次实验对样品进行整理、分类、详细记录后，按照标准的金相试样制作方法，选取合适的分析面，使用镶样树脂进行冷镶，经手工打磨、抛光后，用4%硝酸酒精溶液浸蚀，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金相组织并拍照，所用仪器为Olympus Vanox、Leica DMLM金相显微镜和Leica4000光学显微组织分析系统。浸蚀后的样品经重新打磨、抛光，在未浸蚀状态下进行喷碳处理后，置入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细部组织形态并观察夹杂物形态及其成分。本研究使用莱卡（Leica）DM4000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为蔡司（ZEISS）EV018高分辨扫描电镜进行组织观察，能谱仪型号为BRUKER XFlash Detector 5010，分析时设定加速电压为20kV，能谱搜谱时间大于60秒。

本次实验对8件铁器样品本体进行金相显微观察，结合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其夹杂物的分析，结果显示，车马器、农具、兵器样品均为炒钢锻打而成，容器样品为铸造成型，并可进一步划分出炒钢、炒钢脱碳至熟铁、过共晶白口铁、共晶白口铁（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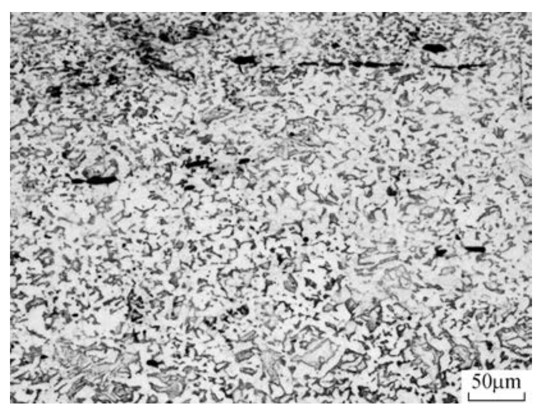
**表二　白城市博物馆馆藏铁器本体分析结果**

| 器物 | 时代 | 样品编号 | 金相组织观察结果 | 材质与工艺 |
|---|---|---|---|---|
| 铁锄 | 金 | BC01 | 金相组织为铁素体+珠光体，表面有大块夹杂并沿加工方向变形，碳含量分布不均，可能与锻打时受热不均有关 | 炒钢/锻打 |
| 铁镰 | 金 | BC02 | 铁素体+珠光体组织，夹杂物沿加工方向变形 | 炒钢/锻打 |
| 铁镞 | 辽 | BC05 | 铁素体+珠光体组织，夹杂物沿加工方向变形 | 炒钢/锻打 |
| 铁镞 | 辽 | BC06 | 铁素体+珠光体组织，夹杂物沿加工方向变形 | 炒钢/锻打 |
| 铁马镫 | 金 | BC09 | 铁素体组织 | 炒钢脱碳至熟铁/锻打 |
| 三足铁釜 | 金 | BC10 | 低温莱氏体+一次渗碳体，一次渗碳体以平面树枝晶形结晶，表面有石墨析出 | 过共晶白口铁/受热 |
| 六耳铁锅 | 金 | BC11 | 低温莱氏体+一次渗碳体，一次渗碳体以平面树枝晶形结晶 | 过共晶白口铁 |
| 六耳铁锅 | 金 | BC12 | 珠光体、二次渗碳体+莱氏体组织 | 亚共晶白口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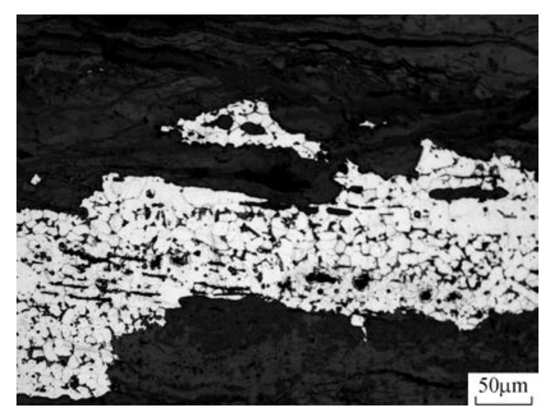
这批铁器样品均属于生铁及生铁制钢体系，1件铁马镫样品BC09呈纯铁素体组织（图六），其取样部位扁平，应为炒钢反复锻打过程中脱碳至熟铁。2件铁农具样品铁锄BC01（图二）、铁镰BC02（图三）以及2件兵器样品铁镞BC05（图四）、铁镞BC06（图五）均呈铁素体加珠光体组织，夹杂物沿加工方向变形明显，为炒钢锻打而成。3件容器样品均为铸造成型，铁釜BC10（图七）为低温莱氏体加一次渗碳体组织，一次渗碳体以平面树枝晶形结晶，表面有石墨析出，为过共晶白口铸铁，并有受热痕迹。六耳铁锅BC11（图八）呈低温莱氏体加一次渗碳体组织，一次渗碳体以平面树枝晶形结晶，为过共晶白口铁。六耳铁锅BC12（图九）呈珠光体、二次渗碳体加莱氏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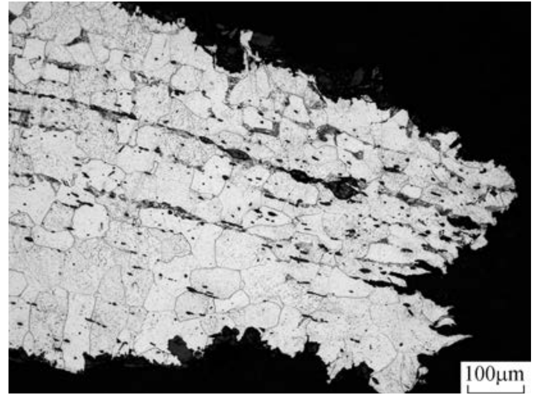

图二　BC01 铁锄样品金相组织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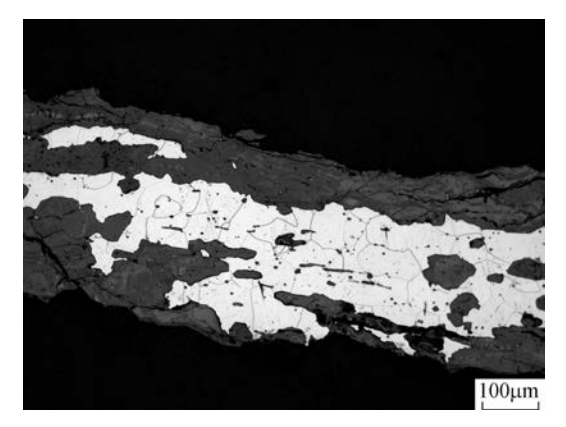

图三　BC02 铁镰刀金相组织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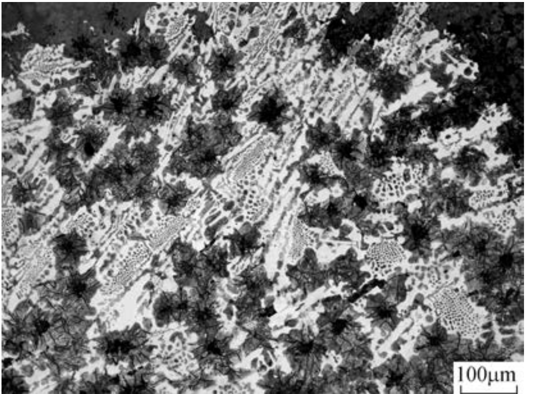

图四　BC05 铁镞金相组织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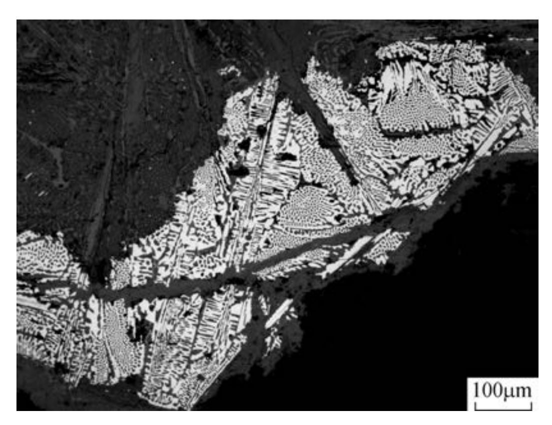

图五　BC06 铁镞金相组织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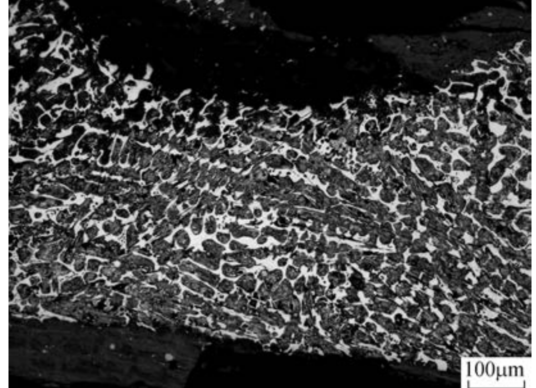

图六　BC09 铁马镫金相组织照片




图七　BC10 铁釜金相组织照片




图八　BC11 六耳铁锅金相组织照片




图九　BC12 六耳铁锅金相组织照片

组织，为亚共晶白口铁。

铁制品的夹杂物是金属在冶炼、再加工过程中未能实现分离的残留化合物，结合夹杂物的成分信息，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金属所采用的冶炼原料及加工技术。扫描电镜及其能谱分析结果显示，BC01 铁锄、BC02 铁镰、BC05 铁镞、BC06 铁镞、BC09 铁马镫样品的夹杂物均含少量的铝、镁元素，硅、钙元素含量较高，且普遍含有较高的元素（表三）。根据目前学界对炒钢制品的判定标准，夹杂物中的磷氧化物（$P_2O_5$）可作为判别炒钢的重要特征，炒钢工艺以氧化反应为主，将生铁冶炼过程中还原到生铁中的部分磷元素再次氧化带入铁制品夹杂物内，故炒钢制品夹杂物中一般含有较高的磷元素[①]。结合以上分析，BC01 铁锄、BC02 铁镰、BC05 铁镞、BC06 铁镞、BC09 铁马镫均为炒钢制品。

**表三　白城市博物馆铁器样品夹杂物分析结果**（wt%，经归一化处理）

| 样品信息 | 金相组织 | 测点 | Na | Mg | Al | Si | P | K | Ca | Mn | S | Fe |
|---|---|---|---|---|---|---|---|---|---|---|---|---|
| BC01 铁锄 | 炒钢 | 1 | — | 2.1 | 5.3 | 19.3 | 3.8 | 4.1 | 5.9 | 18.2 | — | 41.3 |
| | | 2 | — | 3.9 | 5.2 | 20.3 | 3.5 | 5.0 | 6.6 | 17.2 | — | 38.3 |
| | | 3 | — | 2.5 | 3.8 | 20.2 | 2.4 | 2.3 | 4.9 | 23.1 | — | 39.1 |
| | | 4 | — | 1.4 | 9.1 | 20.0 | 2.3 | 8.1 | 4.6 | 18.2 | — | 36.3 |
| BC02 铁镰 | 炒钢 | 1 | 2.1 | 1.4 | 2.9 | 13.2 | 2.9 | 1.7 | 9.2 | — | — | 66.6 |
| | | 2 | — | — | 2.1 | 12.5 | 1.8 | 0.6 | 5.2 | — | — | 77.8 |
| | | 3 | — | — | 1.0 | 8.9 | 1.7 | — | 6.6 | — | — | 81.8 |
| | | 4 | 2.7 | 1.1 | 3.6 | 17.5 | 1.3 | 1.6 | 10.5 | — | — | 61.7 |

① 刘亚雄、陈坤龙、梅建军、马库斯·马丁诺－特雷斯、孙伟刚、邵安定：《陕西临潼新丰秦墓出土铁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 年 7 期，108～116 页。

续表

| 样品信息 | 金相组织 | 测点 | Na | Mg | Al | Si | P | K | Ca | Mn | S | Fe |
|---|---|---|---|---|---|---|---|---|---|---|---|---|
| BC05 铁镞 | 炒钢 | 1 | 1.1 | — | — | 15.7 | 3.0 | — | — | 0.8 | — | 79.4 |
| | | 2 | — | — | 3.0 | 15.1 | 2.6 | 1.1 | 2.4 | — | — | 75.9 |
| | | 3 | — | — | — | 18.7 | 3.1 | — | — | 1.9 | — | 76.3 |
| | | 4 | — | 0.7 | 2.8 | 17.0 | 2.7 | 1.4 | 5.4 | — | — | 70.0 |
| BC06 铁镞 | 炒钢 | 1 | 2.5 | 0.7 | 2.4 | 7.0 | 13.5 | — | 16.4 | — | — | 56.6 |
| | | 2 | — | — | 1.2 | 2.9 | 22.9 | 0.7 | 17.1 | 0.6 | — | 51.7 |
| | | 3 | — | — | — | 18.6 | 20.3 | — | 9.4 | — | — | 51.7 |
| | | 4 | — | — | 1.6 | 7.5 | 21.4 | 2.4 | 27.7 | 1.3 | — | 38.1 |
| BC09 铁马镫 | 炒钢、（熟铁） | 1 | | | 1.7 | 11.5 | 9.9 | | 1.7 | 0.6 | 2.5 | 72.1 |
| | | 2 | | | 0.5 | 4.8 | 9.5 | 0.5 | 0.4 | | 1.6 | 82.7 |
| | | 3 | | 0.5 | 1.3 | 16.1 | 8.4 | | 0.9 | 1.1 | | 71.7 |
| | | 4 | | 0.8 | 1.8 | 16.7 | 8.4 | | 1.7 | 1.2 | | 69.4 |
| BC10 三足铁釜 | 过共晶白口铁 | 1 | — | — | — | — | 3.8 | — | — | 23.6 | 25.7 | 46.9 |
| | | 2 | — | — | — | — | — | — | — | 21.4 | 27.8 | 50.8 |
| | | 3 | — | — | — | 0.5 | 1.2 | — | — | 19.7 | 21.6 | 57.0 |
| | | 4 | — | — | — | — | — | — | — | 23.7 | 30.9 | 44.4 |
| BC12 六耳铁锅 | 亚共晶白口铁 | 1 | — | — | — | — | — | — | — | 31.3 | 36.5 | 32.2 |
| | | 2 | — | — | — | 1.0 | — | — | — | 14.5 | 29.8 | 54.7 |

由表三可知，经分析的 BC01 铁锄样品含有较高的锰元素，含量为 17.2%～23.1%。BC10 三足铁釜样品、BC12 六耳铁锅样品中含有较高的锰、硫元素。BC10 三足铁釜样品锰含量为 19.7%～23.7%，硫元素含量为 21.6%～30.9%。BC12 六耳铁锅样品锰含量为 14.5%～31.3%，硫含量为 29.8%～36.5%。另测得 BC12 六耳铁锅样品表面平均硫含量为 1.1%。BC01 铁锄样品为炒钢锻打，BC10 三足铁釜样品为过共晶白口铁，BC12 六耳铁锅为亚共晶白口铁。

# 三、相关问题分析

检测结果显示，白城市博物馆这批辽金时期的铁器样品均属于生铁及生铁制钢体系产物，材质工艺与铁器类型存在一定相关性，根据器物不同使用需求采取相应的加工制作技术。容器类六耳铁锅、铁釜样品均为铸造成型，铸铁锅坚固耐用，不易粘锅，传热均匀并易于保温，符合作为炊具的使用需求。车马具、农具、兵器类马镫、铁锄、铁镰、铁镞样品均为炒钢锻打成型，这样的钢制品强度高、韧性好，能承受更大的冲击，不易断裂。

生铁及生铁制钢体系是中国古代冶金技术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战国至秦汉时期

便形成了以生铁冶炼为基础的一整套钢铁冶金技术体系，并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昌盛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目前研究显示，辽代冶铁业已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如燕山地带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便是一处包含采矿、冶炼、作坊等功能于一体的生铁冶炼遗址，并实现了生铁冶炼与炒钢工艺联合运行①。河北兴隆蓝旗营冶铁遗址、河北滦平东沟冶铁遗址、河北赤城上仓冶铁遗址也证明燕山地带的辽代居民已掌握添加石灰石和白云石等作为助熔剂的生铁冶炼技术②。

关于金代冶铁遗址的科学分析研究甚少，关于女真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文献记载亦不充足，有关女真冶铁的文献记载有以下几则：《三朝北盟会编》卷18："自幼习射采生长而善骑射猎教人烧炭炼铁……"③；《金史》卷67列传第五《乌春》："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景祖与之处，以本业自给""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以被甲九十来售。……世祖与其甲，厮勒乃得归。乌春自此益无所惮"④。现已发现的金代冶铁遗址有以黑龙江阿城小岭地区五道岭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50余处古代冶铁遗址，其中五道岭冶铁遗址还发现古代铁矿坑⑤。哈尔滨阿城东川屯也发现4处冶铁遗址，其中东川冶铁遗址已确认为生铁冶炼遗址⑥。

在今天白城市区域范围内，分布有230余处辽金时期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是洮北区德顺乡城四家子城址，该城址是辽、金两朝吉林省西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古城城中偏东一处高岗上，发现一处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冶铁手工业作坊区，内有大量的炼铁残渣和较多的红烧土和灰烬⑦，但目前这一冶炼遗迹尚未进行系统的发掘研究。在距今白城市120千米的乾安后鸣字区辽金遗址，也发现有临时的金属加工场所，可以通过简单的人工鼓风和开放的加热环境对成品进行修补或对半成品进行二次加工⑧。可以看出，白城地区的先民在辽金时期已存在较大规模的钢铁冶炼及制作活动，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北京市延庆区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水泉沟冶铁遗址》，《考古》2018年6期，38～50页。

② 王启立、潜伟：《燕山地带部分辽代冶铁遗址的初步调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1期，44～52页。

③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7页。

④ 《金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920页。

⑤ 王永祥：《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考古》1965年3期，124～130页。

⑥ 李延祥、佟路明、赵永军：《哈尔滨阿城东川冶铁遗址初步考察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3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387～398页。

⑦ 聂翔雁：《从辽代皇帝春捺钵看泰州的中心地位》，《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2期，12～16页。

⑧ 李辰元、武松、冯恩学、李延祥：《吉林乾安后鸣字区遗址出土辽金时期金属遗物初探》，《中原文物》2018年6期，122～128页。

很大程度上已掌握并大规模发展生铁冶炼及加工技术。

需要注意的是，铁锄、三足铁釜、六耳铁锅夹杂物中均发现了含量较高的锰元素，类似问题在哈尔滨阿城东川辽代中后期至金末冶铁遗址[①]、河北赤城上仓冶铁遗址[②]生铁冶炼渣中也有体现，但其成因尚无定论。三足铁釜、六耳铁锅夹杂物及六耳铁锅表面平均成分中发现了含量较高的硫元素，且符合用煤炼制的铁其表面平均硫含量的特征[③]，但目前辽金时期冶铁遗址中，尚未发现用煤炼铁的证据。白城市博物馆铁器夹杂物中的高硫特征，仅能说明在铁器制作过程中熔铁、化铁时存在使用煤作为燃料的可能性，但冶炼过程中是否使用煤作为燃料，尚待相关冶炼遗址研究的佐证。

铁器的使用遍及辽、金两代人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辽金时期遗址、墓葬已有大量铁器出土，大致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车马具和兵器四大类。就生产工具来看主要可分为渔猎工具、农用工具以及手工工具三大类：渔猎用具主要包括渔叉、冰穿、鱼钩、铁矛、铁锤等；农用工具类型较为多样，主要有铁铧、铁铲、铁镬、铁锹、铁锄、铁铡刀、铁镰刀等；手工工具主要有铁凿、铁斧、铁锛、铁钳等。生活用具主要包括铁锅、铁鼎、铁炉、鐎斗、菜刀、铁勺、条形刀、铁盏、铁壶、铁熨斗、铁剪刀、铁锁、铁铃等。铁质车马具主要包括铁车辖、铁马衔、铁马镳、铁马镫等。兵器主要有铁剑、铁矛、铁镞、骨朵、铁甲片等。

随着铁器手工业的发展，民间对铁器的使用日益普遍，出土的生活用具数量、种类繁多。铁锅是辽人用于烹煮食品的主要炊具，目前已有许多不同形制的铁锅出土，类似 BC11、BC12 六耳铁锅在同时期北京、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均有出土，尤以吉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三足铁釜为金代墓葬中常见随葬器，BC10 三足铁釜形制与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④]中出土的三足铁釜基本一致，微敛口，口沿外有一周鋬沿，圆鼓腹，扁柱足呈“S”形。口沿外饰数道弦纹。类似的铁釜在黑龙江省阿城市（现阿城区）双城村金墓群[⑤]、桦南县岚峰林场[⑥]、哈尔滨

① 李延祥、佟路明、赵永军：《哈尔滨阿城东川冶铁遗址初步考察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 23 辑），科学出版社，2018 年 1 期，387 ~ 398 页。

② 王启立、潜伟：《燕山地带部分辽代冶铁遗址的初步调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 年 1 期，44 ~ 5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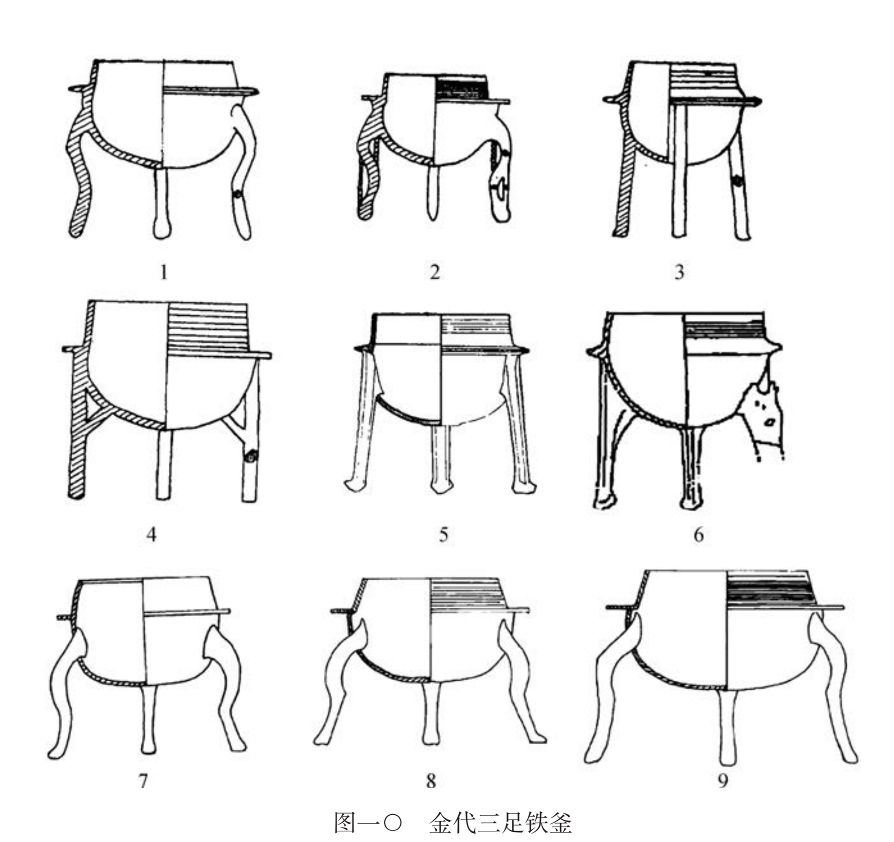
③ 黄维、李延祥、周卫荣、刘宇生：《川陕晋出土宋代铁钱硫含量与用煤炼铁研究》，《中国钱币》2005 年 4 期，44 ~ 50 页。

④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1977 年 4 期，40 ~ 49 页。

⑤ 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北方文物》1990 年 2 期，28 ~ 41 页。

⑥ 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黑龙江省桦南县岚峰林场出土的金代文物》，《北方文物》2000 年 2 期，48、49 页。

新香坊墓地[①]等地也有出土（图一〇），形制上略有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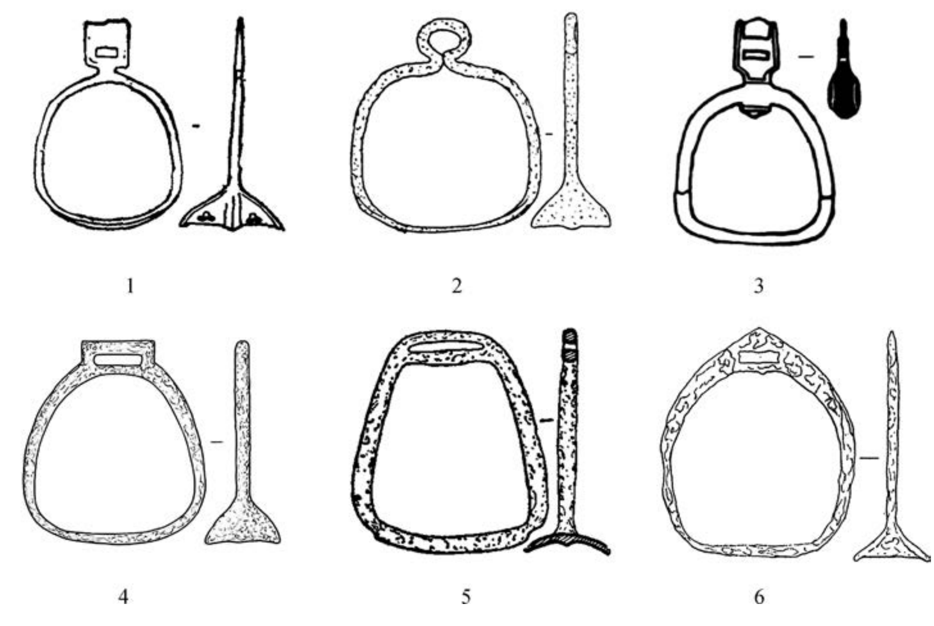

图一〇　金代三足铁釜

1～4. 黑龙江阿城市双城村金墓出土　5. 黑龙江绥滨中兴古城金墓出土　6. 黑龙江桦南县岚峰林场出土　7～9. 哈尔滨新香坊墓地出土

结合契丹、女真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生需求，车、马具不仅成为在四时迁徙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骑乘工具，也是交往交流、运输货物的重要交通工具。马镫是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而产生的，体现骑乘用品的完备性，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最早的马镫出现在北魏时期，后逐渐由单马镫演变为双马镫，辽人使用马镫已进入成熟阶段。研究显示，目前所见辽代马镫可分为四种类型：短柄镫、环柄镫、转柄镫、梁穿镫。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为短柄镫，其主要特征为柄与梁为一体，柄上有穿孔。环柄镫在辽代早期墓葬及女真墓葬中有所发现，其主要特征为镫梁在中部向上弯曲成环柄状。转柄镫在辽代中晚期和金初的墓葬中有所发现，其主要特征为梁与柄分开制作，再套接组合。梁穿镫为辽代晚期逐渐流行起来的新式镫，其特征为无柄梁中部射穿带孔[②]（图一一）。

① 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新香坊墓地出土的金代文物》，《北方文物》2007年3期，48～58页。

② 冯恩学：《辽代契丹马具探索》，《考古学集刊》2004年1期，441～464页。




图一一　辽金时期马镫

1. 短柄镫（沙钩子辽墓 M2） 2. 环柄镫（小塘土沟 M2） 3. 转柄镫（辽陈国公主墓）
4. 梁穿镫（忽洞坝辽代墓葬） 5. 梁穿镫（金代蒲峪路故城） 6. 梁穿镫（五甲地元代古墓）

BC09 铁马镫为较为典型的梁穿镫，类似形制的马镫在阿鲁科尔沁旗敖瑞山墓[①]、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②]、乌兰察布卓资县忽洞坝辽墓[③]都有发现。梁穿镫是从唐代流行的短柄镫逐步演变而来，柄由长变短，增加了马镫的灵敏适用度，这种马镫在辽晚期迅速流行，并逐步取代其他各类型式的马镫，金代中晚期城址和窖藏所见马镫均为此类，内蒙古兴和县五甲地元代汪古墓[④]、顺城堂明女真墓[⑤]等所见马镫均属梁穿型。

辽金两代十分重视农业发展，BC01 铁镰和 BC02 铁锄是金代典型的铁质农具。辽前期农业仍居于从属地位，圣宗、兴宗大力推行发展农业政策后，农业在辽代中后期已跃居诸经济首位，金代在辽代原有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将东北农业经济带入历史空前繁荣时期。辽金时期采取移民政策，向东北地区迁入大量有生产经验的农业人口并引进先

① 刘冰、赵国栋:《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 年 3 期，57 ~ 67 页。

② 李逸友:《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幕发掘简报》,《文物》1961 年 9 期，44 ~ 49 页。

③ 赵杰:《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忽洞坝辽代墓葬》,《草原文物》2016 年 1 期，55 ~ 61 页。

④ 盖山林:《兴和县五甲地古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 年 3 期，109 ~ 112 页。

⑤ 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吉林德惠顺城堂明墓清理》,《辽海文物学刊》1988 年 2 期，50 ~ 55 页。

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从考古资料看，在今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北部和辽西地区出土的辽代铁制农具种类繁多、数量大，出土的铁犁、铁斧、铁锄、铁镐、铁镰、铁叉，与当时中原地区同类器物形制相同。阜新红帽子古城（辽成州）和赤峰、北镇等地还发现了铸犁铧的铜范、铁锄、铁镰和铁斧头等。牛耕和铁制工具的使用是金代东北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两大标志，对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金代尤为突出。近年来，吉林各地陆续出土了大批金代铁制农具，如吉林省德惠市后城子古城出土的100余件金代铁器中，铁制农具种类繁多，包括铁铧、铁铲、铁锹、铁镐、铁镰、钐刀、垛叉、铁耙、铁斧等①。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白城市博物馆这批铁器样品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发达的冶铁业促成了辽金时期东北地区铁器的大量使用，并在东北地区先民农业定居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多样化的铁器类型也反映了分工的日趋细化，随着对冶铁技术的掌握和发展，辽、金两代国力迅速提高、发展壮大并多次入主中原。

## 四、结　语

本文对白城市博物馆藏部分铁器进行了科学分析并就相关问题做了初步探讨。结果显示，经分析的8件铁器样品均属于生铁冶炼体系产物，分为铸铁、炒钢两大类，并根据器物类型及使用需求采用了不同的制作工艺。容器类六耳铁锅、铁釜样品均为铸造成型，车马器、农具、兵器类马镫、铁锄、铁镰、铁镞样品均为炒钢锻打成型。白城地区的先民在这一时期已熟练掌握生铁制作技术，并极有可能存在较大规模的钢铁冶炼、制作活动。部分样品夹杂物的高硫特征，或可作为辽金时期白城地区铁器制作过程中熔铁、化铁时使用煤作为燃料的证据，但冶炼过程中是否使用煤作为燃料，尚待相关冶炼遗址研究的佐证。

附记：本研究得到“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9CKG003）的资助，为该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使用的铁器样品由白城市博物馆提供，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陈坤龙、李辰元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庆旭等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①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吉林德惠县后城子金代古城发掘》，《考古》1993年8期，721～733页。吴敬、邵海波：《东北地区金代遗址出土铁器的类型学考察》，《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263～274页。

#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Analysis of Some Iron Objects from the Baicheng City Museum

Guo Meiling　Song Minglei　Dong Weijia　Wang He

**Abstract:** Fundamental scientific analysis of 8 iron objects from the Baicheng City Museum have been conducted, the author present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ir cultural-technological feature. It is revealed that all the iron objects are made of cast iron, stirred steel and casting process are adopted on the basis of the artifacts category and the requirement in usage, indicating that the fishing and hunting nationality in Baicheng Region could have been skilled in cast iron production and most probably engaged in smelting cast iron on a large scale. The high sulfur content in the inclusions of two cast iron objects may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coal in the processes of melting and casting iron products.

**Keywords:** Liao and Jin Period; Baicheng Region; Ancient Cast Iron; Technology Feature

# 金元时期大同地区道教的民间传播
## ——从“锦绣中华——古代丝织品文化展”中的“罗地丝绣仙鹤纹霞衣”谈起

黄小钰

（首都博物馆，北京，100045）

**摘要：**本文从首都博物馆“锦绣中华——古代丝织品文化展”中的一件道士法衣谈起，考察了道士墓葬阎德源墓出土文物情况，并搜集了山西大同地区金元时期的墓葬出土文物信息，对墓葬中的供器组合进行研究。并通过史料记载和现存遗迹的佐证，印证了金元时期全真道在山西民间的迅速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金元时期　大同　道教

“锦绣中华——古代丝织品文化展”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至 11 月 24 日在首都博物馆方厅一层 B 展厅展出。展览共展出文物 175 组件，集合了首都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福建博物院、荆州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 14 个省市自治区 22 家博物馆和文博机构的文物藏品。展览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物讲述中国织绣印染历史及其文化，反映在历史进程中，在民族融合、内外交流的背景下，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在织绣工艺审美上的交流、融合、创新，逐渐形成中国织绣特有的民族风格。

在该展览的“两宋辽金”部分独立展柜中平铺展示了一件名为“罗地丝绣仙鹤纹霞衣”的展品，展品呈规则的长方形，名为霞衣却无领无袖，类似床单，让人很难与衣服联系起来。经查阅考古发掘报告，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件高功法师在道教大型斋醮科仪时穿的“法衣”。而出土该“法衣”的墓葬亦出土了大量随葬物品，尤其是出土的一些日常生活器具和供器组合，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非常凑巧的是，大同地区又出现了元代的另一座道士墓——冯道真墓，并且该地区非道教人士墓中也出现了具有道教文化色彩的供器组合，它们常常与明器家具共同出现，组成一个供奉的仪式空间。这些墓葬信息对研究道教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这些墓葬进行分析，进一步证明了金元时期大同地区道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

## 一、“霞衣”何物与“阎德源”何人

“霞衣”，以云霞为衣，这一带有文学色彩的名称用以指代仙道所穿的衣服极为贴切，它在道教服饰中的名称为“鹤氅”。根据考古发掘报告记载，这件鹤氅罗地黄褐色，长 2.34、宽 1.35 米，幅中丝绣四方连续的仙鹤及云纹图案，成组范围较大。鹤高 14、展翅宽 13.8 厘米，共有七十二只鹤，它们各以不同的姿态翱翔于云纹中。鹤氅四周镶黑边，边宽 11.3 厘米，绣了三十四只鹤[①]。北宋道书《玉音法事》记载宋真宗时《披戴颂》的有关规定，道士所穿法服包括云履、星冠、道裙、云袖、羽服、帔、朝简七部分[②]，其中“羽服”应当指的就是鹤氅。在为数众多的禽鸟中，鹤常被作为长寿的象征，神仙也以仙鹤为坐骑，鹤的形象成为道教中的重要文化标识，由此发展出羽衣的一支重要形态——鹤氅，然而鹤的羽毛并不容易得到，后来人们把周身绣仙鹤的衣服统称为鹤氅。以鹤氅为代表的羽衣，宽大飘逸，有仙气和潇洒之风，这也是鹤氅深受道家喜爱的缘由之一[③]。

既然这件鹤氅出自阎德源墓，那么阎德源为何人，阎德源墓又有何特殊之处呢?阎德源墓位于大同城西，为仿木构建筑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南北向，全长 4.8、宽 1.28 米，地面修台阶直通甬道。墓室平面呈方形，南北长 3.12、东西宽 3.11、高 3.28 米。墓顶为四角攒尖的圆锥形，中心嵌入一件素面大铜镜，墓室后壁砌长方形平面棺床，棺床前放置各种随葬器物。该墓共出土随葬器物 90 余件，包括木质明器家具、陶瓷器、骨器、铜器、石雕、印章以及丝织品等，并出有墓志一方[④]。根据墓志记载，阎德源为“西京玉虚观宗主”，他先是继任开元观主持，后在西京修建玉虚观，“度集徒众、琳宫壮丽，计日而成，清高之行宣传宇内”，西京的“贵戚、公侯、大夫、士庶敬之如神”[⑤]，可见，阎德源生前是西京地区深受权贵追捧的道教领袖人物。

纵观墓中出土器物，除了这件鹤氅之外，还有铜镜、象牙戒板、杖、道袍、道冠、印章等都与阎德源的道士身份相关，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墓中出土的供桌、长颈瓶、香炉、烛台这样一组供器组合既与道教信仰相关，且较为普遍地出现在大同地区的金元墓葬中。

---

①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 4 期，5 页。

② 张振谦:《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 4 期，96 页。

③ 王利民:《金代阎德源墓的研究与审视》,《文物天地》2019 年 11 期，109、110 页。

④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 4 期，1 ~ 7 页。

⑤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 4 期，6 页。

## 二、仪式空间：供器组合的出现及演变

一炉二瓶二烛台的供器组合是道教斋醮仪式中的重要陈设。在拜表、施食、炼度等仪式中皆有五供一节，亦称为“五献”，其法是将五种献祭品，即香、花、灯、水、果献于神坛之上，与之相对应的供器一般为香炉一尊、烛台一对、花瓶或花觚一对，用于燃灯、烧香和供花。

阎德源墓出土石刻大香炉 1 件、钧瓷小香炉 1 件、烛台 1 对、豆青暗纹长颈瓷瓶 2 件，虽然五供并非道教仪式的专属，在佛教和民间信仰中亦会出现，但在此墓葬中，加上其他出土器物和墓主身份的佐证，可以确定这组供器组合确为具有道教文化特征的表征物。值得注意的是，在金代阎德源墓之前并未出现供器组合，而继阎德源墓之后，大同地区的元代墓葬中却多次出现了五供组合，并且与供桌共同组合成一个供奉的仪式空间。以下列举大同地区金元时期墓葬中出土该类供器的情况，虽然单件器物的出现很可能为日常生活之用，而并非道教文化特征的表现，为反映供器组合的出现与演变规律，暂且列入考察范围之内。

在山西大同城南的云中大学 M1 中出土黄绿釉陶烛台 1 套，由支架和烛台两部分组成，支架为四叶状足，上端台面为盘形，中心有圆孔，外表施绿釉。云中大学 M2 出土黄绿釉烛台 1 件，形制与 M1 所出烛台一致①。

金代徐龟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内站东小桥街，墓中出土红陶炉 1 件，平沿，深直腹，平底，下附五个兽形足②。

山西大同齿轮厂元墓墓主人为元代汉族小官吏，墓中出土琉璃釉白陶香炉 1 件，炉身饰绿琉璃釉，腹部浮雕两龙③。

元代王青墓位于大同北郊孤山山麓，出土遗物丰富，随葬品以灰陶明器为主，出土有陶长方形供桌 4 件、陶方形供桌 1 件、陶小供桌 1 件、陶瓶 3 件（2 件带座、1 件不带座）、陶香炉 1 件、陶蜡烛台 2 件（由底座、杆、盘三部分组成）④。

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墓主为女性，此墓共出土随葬品 40 余件，主要为陶质明器和供器。出土供桌 1 件，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可取下的围栏，下半部分为长方形桌，上下部分均内外涂红，饰牡丹纹。香炉 1 件，三足，外壁有四处兽头浮雕，内有香灰。烛台 2 件，底座涂白，上半部涂红。带座长颈瓶 2 件，底座涂白，瓶体

①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 年 4 期，514、520 页。

②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考古》2004 年 9 期，55 页。

③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3 年 2 期，20 页。

④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墓、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 年 10 期，42、43 页。

涂红[1]。此墓与王青墓距离不远，两墓间仅隔一条御河，并且年代相近，故出土的供桌、蜡台、带座瓶等形状、大小与王青墓极为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大同地区还有另外一座元代的道士墓——冯道真墓，该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形制、大小与阎德源墓非常近似，墓室平面为方形，墓顶为四角攒尖的圆锥形，墓室南北长 2.64、东西宽 2.84、高 3.3 米。墓内出土器物约 45 件，除了铜镜、道冠、道袍、戒板、砚墨等彰显道士身份的器物外，该墓中还出土了木蜡台 2 件、木瓶 2 件、瓷香炉 1 件、残木供桌板 1 块[2]。根据出土墓志记载，该墓墓主人冯道真为“西京创建龙翔万寿宫宗主，清虚德政助国真人”，可见，他也并非一般的道人，而是宫观的宗主，受到朝廷的封赏，等级地位非比寻常。

**表一　山西大同地区金元墓葬出土供器统计表**

| 墓葬名称 | 年代 | 墓主身份 | 供桌 | 炉 | 蜡台 | 长颈瓶 |
|---|---|---|---|---|---|---|
| 金代云大 M1 | 1159 年左右 | 云大 M2 家族成员 | | | 1 | |
| 金代云大 M2 | 1159 年 | 等级较低的军吏 | | | 1 | |
| 金代徐龟墓 | 1161 年 | 隐居汉人 | | 1 | | |
| 金代阎德源墓 | 1190 年 | 道教宗主 | 3 | 1 | 2 | 2 |
| 元代崔莹李氏墓 | 1261 年 | 普通汉人（女性） | 1 | 1 | 2 | 2 |
| 元代冯道真墓 | 1265 年 | 道教宗主 | 1 | 1 | 2 | 2 |
| 元代王青墓 | 1297 年 | 普通汉人 | 6 | 1 | 2 | 3 |
| 大同齿轮厂元墓 | 1298 年 | 汉族小官吏 | | 1 | | |

如前所述，通过对大同地区金元墓葬出土器物的考察，或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道教的发展演变趋势。在年代早于阎德源墓的三座墓葬中虽然也出土了陶炉和烛台，但通过出土器物组合可以看出，此时的陶炉和烛台只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品。金代阎德源墓中开始出现供桌、一炉二瓶二烛台的供器组合，五供为道教斋醮科仪中的供器，长短供案安置炉瓶台组合，共同营造出一个供奉的礼仪空间，宗教信徒希望通过施舍供器的方式得到神灵的护佑，实现自己的祈愿。阎德源和冯道真独特的道教首领身份令其墓中出现这样的供器组合继而营造出宗教信仰的供奉空间或许并不奇怪，而无法忽视的是，继金代阎德源墓之后的元代崔莹李氏墓、王青墓等墓葬中依然沿用了这一做法。

此外，如若比较金代阎德源墓和元代冯道真墓这两座同为道士墓的墓葬，就会发现

---

① 大同市文物局文化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 年 6 期，87、88 页。

②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墓、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 年 10 期，34～40 页。

一个微妙的变化，阎德源所属的道派是符箓道，而冯道真所属的道派是全真道[①]。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的话，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在金末元初之际，大同地区的道教信仰发展兴盛，民间的宗教意识增强，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增大。并且，阎德源与冯道真二人所属教派的不同体现了这一时期大同地区道教信仰从符箓道派转为全真道派盛行的变化过程。

## 三、金元时期全真道在山西的传入

山西大同地区自北魏起就形成了以云冈石窟为主的佛教中心，佛教在此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再加上统治者的倡导，佛教一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而被当地民众尊奉。尤其到了辽代，设大同为西京，大规模修整云冈石窟、善化寺，新建皇家佛教寺庙华严寺，民间佛教活动活跃，佛教发展至鼎盛。直至金元时期，西京地区的佛教逐渐衰落，道教兴起并迅速发展。

金末元初之际，政权对立，战乱频繁，民族、社会矛盾尖锐，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统治的需要，大力笼络道教上层人士，在传统的符箓道派之外，又形成了许多新的派别，如河南萧抱珍创立的太一教、沧州刘德仁创立的真大教、咸阳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各个教派都在山西留下了活动的痕迹。再来看山西大同地区，地理位置独特，既处于河南、河北、陕西等地的中心地带，容易与周边地区形成交流融合，再加上它也是北方蒙古人、女真人与南边汉人民族融合、政权对立的战略要地，这对新兴道派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道教在民间的势力逐渐壮大，引起了上层统治者的重视，蒙金两国的皇帝几次召见道教首领，对他们推崇备至，尤其是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经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等“全真七子”大力推行，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龙门派在北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跃成为道教中最重要的派别，道士、道观数量大大增加，民间入道修道的信徒云集。丘处机曾多次向成吉思汗宣扬全真道“敬天爱民、清心寡欲、固精守神、止杀保民”等思想，深得成吉思汗赏识，尊称他为“丘神仙”，甚至赐虎符、玺书，命其掌管天下道教，获得免除道士赋役的特权。《元史・释老传》记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赐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赐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②] 丘处机抓住机会，大力发展全真道，不仅扩大了全真道的影响，也拯救了不少老百姓的性命。据《元史・释老传》记载：“时国兵践

---

① 王彦玉、李孜宣：《大同地区金元道士墓研究》，《四川文物》2018年6期，67页。

② 《元史》卷202《释老》，中华书局，1975年，4525页。

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于是，丘处机声望倍增，全真道深得百姓推崇。据《盘山栖云观碑》记载：“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①] 在统治阶层的扶持下，西京道教进入了鼎盛时期。

此外，今天的山西大同地区仍然保存着一些金元时期的道教宫观，或许从中也能推测出当年道教高速发展的盛况。例如，创建于金末元初的纯阳宫位于大同城鼓楼西街，是一座道教全真派寺观，在大同和晋北地区影响较大。玉龙洞是元代著名的道观建筑，位于大同市郊区口泉峪南侧的七峰山，该洞以道教圣殿三清殿为主要建筑，俗称“玉龙洞”。总之，金元时期道教的全盛发展，使大同地区道观林立、道士云集、信徒众多，从而取代佛教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

## 四、结论与讨论

山西大同地区先后发现了两座道士墓，元代的冯道真墓和金代的阎德源墓，并且二人都是身份地位较高的道教宗主，这种现象在墓葬考古中并不多见，两座墓中出土的铜镜、戒板、砚墨、道士服饰等随葬物品具有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将生前的法物带入墓中，既是墓主人道士身份的表征，也是事死如事生葬俗的表现。二人所属道派的不同，反映了宋金元时期，北方盛行的道教从符箓道到全真道的转变，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之际，统治者需要依靠新的宗教力量和意识形态来维护政权的稳定，而新兴的宗教力量更是需要利用政治形势的变化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和社会影响，借机取得快速发展和广泛传播。

从金元时期的其他墓葬来看，阎德源墓中开始出现的由供器与明器家具供桌组合而成的仪式空间开始在普通人群墓中沿用，在墓葬中营造这种供奉氛围，将世俗空间与神圣空间置于秩序化状态和沟通互动状态之下，实现精神期盼的寄托，这是墓葬营建者主观意识的反映，由此，或可推测金末元初之际，道教信仰群体的扩大，道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力得到极大发展。同时，史料记载和现存的道教宫观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旁证。当然，墓葬的形制、葬式葬俗、墓葬中的供器组合与壁画以及其他出土器物之间的组合关系是否能提供更为丰富的线索，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可留待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

①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34 册)，华夏出版社，2004 年，414 页。

# The Folk Spread of Taoism in Datong Area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alk from “Luodi Silk Embroidery Crane Pattern Xiayi” in “Splendid China” Exhibition

Huang Xiaoyu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Taoist frock in the exhibition of “Splendid China” in the capital museum, and investigates 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of Yan Deyuan’s tomb, and collects 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information of Jin and Yuan Dynasties in Datong area of Shanxi Province, and studies the donor combination in the tomb.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evidence of the existing relics prove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Quanzhen Taoism in Shanxi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 Jin and Yuan Dynasties; Datong; Taoism

# 明代龙庆州、隆庆州（延庆州）建置考

王伯轩

（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北京，102100）

**摘要：**明朝前期，延庆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废而复置的重大变迁，有关洪武时期龙庆州内附与废除、永乐时期隆庆州移民与重建以及隆庆州与辽金元三朝早期建置关系等问题尚无定论。本文在揭示明代龙庆、隆庆二州建置沿革和隶属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考据文献资料，指出洪武时期龙庆州内附、改属、废除的原因和经历；永乐时期隆庆州的创设时间和创建过程，隆庆州与辽金元三朝早期建置的承袭关系。进而提出文献关于朱棣北巡创设州县的说法证据不足；赵羾经略举措对创建隆庆州、永宁县具有重要意义；隆庆州城可能筑立于金朝末期等观点。

**关键词：**隆庆州　龙庆州　缙山县　建置

##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北京长城文化带研究热度持续升温，围绕延庆长城文化的讨论也逐渐增多。明代，延庆经历了从北平边塞向京师政区转化的特殊过程，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特别是在明代前期，延庆的行政区划变迁对北京长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本文拟以明代前期作为考察切入点，从历史地理角度剖析延庆（龙庆州、隆庆州）的行政建置变迁。通过分析归纳、逻辑推理等方法考据文献资料，梳理龙庆、隆庆二州政区设置的年代脉络和建置发展的层级变化，追溯并揭示辽、金、元、明四个时期的政区建置关系。同时，本文亦对相关人物事迹进行了调查研究，质疑了朱棣在北征途中驻跸团山并诏复州县的文献说法，考证了赵羾对安置移民和创建州县做出的重大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受当前资料局限影响，本文研究仍有待新资料、新观点补充完善。

## 二、龙庆州、隆庆州建置沿革①

龙庆州内附于明初，洪武二年六月以后属开平府。洪武三年三月改属北平府。洪武五年七月州废。

隆庆州创设于永乐十二年三月丁丑（1414 年 3 月 24 日），隶北京行部，领永宁县（非附郭县）。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壬午（1420 年 12 月 22 日）直隶京师六部。洪熙元年三月戊戌（1425 年 4 月 16 日）复隶北京行部，宣德三年八月辛卯（1428 年 9 月 20 日）改隶行在六部，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1441 年 11 月 14 日）复直隶京师六部。隆庆元年（1567 年）因讳年号，改称延庆州。

隆庆州城在今延庆旧城，该城可能筑立于金泰和年间，为缙山县（镇州）治。元代沿用，先后作为缙山县、龙庆州治。明代依托该城创设隆庆州，州治在城中心西北侧。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龙庆、隆庆二州的建置层级关系有异。洪武时期龙庆州的上级政区为开平府或北平府，隶属关系即以府领州。然而，隆庆州的情况与之大为不同。一方面，隆庆州与府平级，地位高于龙庆州。另一方面，在永乐至成化时期，隆庆州或直隶北京行部，或直隶京师六部（行在六部），隶属关系随高层政区调整而变动，直到正统六年才最终稳定。试对隆庆州的政区层级关系简析如下。

其一，北平布政司、北京行部与京师（北直隶，行在）的调整变化。

洪武、建文时期的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北平布政司）是掌管北平地方民政、财政的省级行政机构，辖区为省级行政区。永乐元年正月辛卯建北京于北平府，二月庚戌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行部，革北平布政司。永乐七年朱棣以巡狩名义迁驻北京，置行在六部（因扈行设置的临时中央行政机构）。在建设北京（京师）的特殊背景下，北京行部仿效中央六部官制配置官署、官员，执掌除与布政司基本一致外，又负责北京宫殿营缮、北征后勤保障等具体事务。就其本质而言，北京行部应是与北平布政司同级的临时地方行政机构，隶属于行在六部或京师六部。

永乐十八年九月丁亥，诏明年正月初一改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十一月壬午革北京行部，所领八府（顺天、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永平）二州（隆庆、保安）归六部管辖，属京师（又称北直隶）。洪熙元年三月戊戌仁宗拟迁都南京，复设行在六部和北京行部，北直隶府州归属北京行部统辖。宣德三年八月辛卯又革北京行部，所领府州改属行在六部统辖。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革行在六部，明朝京师终于确定在北京，北直隶府州复属京师六部统辖。

其二，隆庆州作为北京行部直隶州的时间阶段。

---

① 因篇幅有限，本文重点讨论明前期延庆的州级政区沿革。有关隆庆州（延庆州）所领永宁县的建置沿革将另拟文章。另外，明代延庆所处的督抚辖区变迁未置于本文考察范围，故而从略。

明朝布政司下设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领属关系一般是布政司领府，以府领州，州下领县，或府下直接领县。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某州不属府而直隶布政司，那么该州称为布政司直隶州，地位相当于府。

以北京行部（北平布政司）为例，永乐十二年以前的北平布政司或北京行部均未领有直隶州。永乐十二年北京行部始领隆庆直隶州，永乐十三年又添领保安直隶州，此后所领直隶州数量保持两个不变。受政区设置变化影响，北京行部统领直隶州只有两个短暂时期，一是自隆庆、保安二州创设至永乐十八年十一月革北京行部。二是自洪熙元年三月复设北京行部至宣德三年八月再革北京行部。这两个时期合计约为十年。

其三，隆庆州作为京师直隶州的时间阶段。

除作为北京行部直隶州外，隆庆州还有一个存续时间更长的身份，即京师直隶州，同样有两个时期。一是永乐十八年十一月至洪熙元年三月，由于撤销北京行部，隆庆州隶属京师六部，称京师直隶州，地位相当于直隶京师的府。二是自宣德三年八月革北京行部后，隆庆州隶属行在六部，正统六年十一月又革行在六部，隆庆州隶属京师六部直至明末。这一时期宣宗、英宗常驻北京，通过行在六部处理国事，北京已无异于“京师”，因此宣德三年八月以后，隆庆州即可视为京师直隶州。

## 三、洪武时期龙庆州的内附、改属与废除

龙庆州始置于元延祐三年（1316 年）八月，系由缙山县升格而来，属大都路，领怀来县，明初沿置。洪武初年，北平、开平一带战事频仍，百姓无法安生，政区建置亦屡有调整。洪武五年七月最终撤销了包括龙庆州在内的北平边塞诸多州县，所遗人口则悉数迁移至居庸关以南地区屯田。这一时期，龙庆州的建置沿革有三个阶段。

其一，明初龙庆州内附，洪武二年六月以后龙庆州属开平府。

洪武元年闰七月明军兵进大都，元主北奔上都。八月，明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洪武元年十月北平府属山东行省，洪武二年三月改属北平行省。据《西关志》[①] 记载，洪武元年攻克大都后，明军就在居庸关筑城设防。然而，毗邻关隘的龙庆、怀来何时内附，文献却没有详记。又据嘉靖《两镇三关通志》记载：“洪武二年夏五月，征虏将军常遇春来取开平，元主入于应昌。”注曰：“大将军北伐，而燕京为我都邑；副将军东拒，而开平入我版籍。至是，则中国之全险已复。”[②] 所谓全险已复，意指燕山、太行山地理屏障复归中原王朝控制之下。那么，龙庆、怀来地区则势必随之复归明朝版籍。由

① 王士翘：《西关志・居庸卷之一・沿革》，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 年，记作：“洪武元年既定燕京，遂城居庸关。”

② 尹耕：《两镇三关通志・宣府纪》卷 3［DB/OL］. https://www.loc.gov/resource/lcnclscd.2012402117.1A003/?st=slideshow#slide-6, 2018-1-3。

此推知，龙庆州内附时间应在明军攻占大都以后，收复开平之前。

文献对龙庆州的建置变动在洪武三年始有记述。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三月："甲午，以永平府所属宜兴、龙庆二州及怀来县俱隶北平府。"[①]《明史》记："延庆州，元龙庆州，属大都路。洪武初，属永平府。三年三月属北平府，寻废。"[②]永平府疑误，应作开平府。据查，永平府所领州县于文献中并未记有龙庆州、怀来县。永平府即元代永平路，洪武二年改平滦府，四年三月改称永平府。换言之，洪武三年龙庆州改属之时，尚无永平府之称。永平府在北平府正东部，治今河北卢龙，辖域接邻山海关，其范围约是今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等地。然而，龙庆州位于北平府西北部的军都山腹地，地接居庸关、怀来、赤城等地，与永平府在地理上大相径庭。元代龙庆州凭借黑谷东路（缙山道）、西路、驿路联通两都，加之元仁宗亦降诞此地，所以在延祐三年龙庆州就有从上都路改属大都路的先例。据此而论，明初龙庆州与永平府应无隶属关系，内附以后先属开平府。

洪武二年六月明军攻克上都以后，设置开平府。按《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六月："己卯，常遇春等克开平。"[③]《明史》："开平卫，元上都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为府，属北平行省，寻废府置卫。"[④]那么，龙庆州隶属开平府当在洪武二年六月以后。

其二，洪武三年三月龙庆州改属北平府。

开平府设置不久，常遇春在柳河川病逝，开平地区亦复被元军占据。洪武三年初，李文忠率军出居庸关，经兴和北上作战，五月再次攻克开平，开平府旋即废除，明军还师时又收复兴州。据文献记载，当年七月原属开平府的云、兴二州改属北平府，由此推测开平废府应发生在七月以前。按《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七月："辛卯，以古北口山外云州、兴州隶北平府。"[⑤]《明史》记："云州堡，元云州，属上都路。洪武三年七月属北平府。"[⑥]

据此分析，洪武三年三月位于北平近塞的龙庆、宜兴二州率先改属北平府，《明太祖实录》所记时间合理。

其三，洪武五年七月废龙庆州，徙民入北平。

改属北平府后，龙庆州不久就被废除。关于废除时间，嘉靖《隆庆志》《明史》等文献均未详记。按嘉靖《隆庆志》记："国初内附，徙其民于关内，州县俱废。"[⑦]《明

① 《明太祖实录》卷5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② 《明史》卷40《志第十六・京师》，中华书局，1974年。

③ 《明太祖实录》卷4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④ 《明史》卷40《志第十六・京师》，中华书局，1974年。

⑤ 《明太祖实录》卷5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⑥ 《明史》卷40《志第十六・京师》，中华书局，1974年。

⑦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1《建置》，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史》记："（洪武）三年三月，属北平府。寻废。"[①]

据查《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七月："戊辰，革妫川、宜兴、兴、云四州，徙其民于北平附近州县屯田。"[②] 妫川州系指龙庆州。妫川，嘉靖《隆庆志》见载，今称妫河。妫河发源于延庆境内，西南流经怀来，入于今官厅水库。实际上，上述四州皆原属开平府，在改属北平府后又同时撤销。那么，洪武五年七月应是龙庆州最终废除时间。

废除龙庆州主要是由于北平边塞局势不稳导致的。明初，北平地区是北防蒙古的军事要地和发动北征的集结枢纽。开平废府以后，原领南部州县改属北平府，遂成为北平北部的边塞前沿。其时，边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③]。加之洪武五年北征兼有得失，永清沙漠亦不能一战功成。因此，明朝采取了废除边塞州县建置，移民关内屯田等防御措施。先后于洪武四年四月徙顺宁、宜兴边民入北平屯戍。六月又以沙漠既平，南迁北平山后之民。洪武五年七月废除龙庆、宜兴、兴、云四州，内徙民众入关屯田。继而广置实土卫所，守御边塞领地。此后，延庆地区直到永乐时期才又恢复行政建置。

# 四、永乐时期隆庆州的创置与建设

## （一）创设时间考辨

隆庆州及其所领永宁县的创设时间应以《明太宗实录》《明史》等文献记载为准，即永乐十二年三月丁丑（初四日）。

按《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三月："丁丑，设隆庆州并永宁县，隶北京行部。隆庆，古缙云氏所都之地。金置缙山县。元仁宗生于县东，改为龙庆州。国初移其民入关内，州遂废。至是，上以其当要冲而土宜稼穑，改为隆庆州。又于州东团山下设永宁县，隶焉。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④]

《明史》延庆州："永乐十二年三月置隆庆州，属北京行部。十八年十一月直隶京师。隆庆元年改曰延庆州。"永宁县："永乐十二年三月置。"[⑤]

《国榷》永乐十二年三月："丁丑，设隆庆州、永宁县于关外，隶北京行部。地冲而腴。国初徙其民关内。至是专处罪谪。"[⑥]

---

① 《明史》卷 40《志第十六・京师》，中华书局，1974 年。

② 《明太祖实录》卷 7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③ 《明太祖实录》卷 6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④ 《明太宗实录》卷 14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⑤ 《明史》卷 40《志第十六・京师》，中华书局，1974 年。

⑥ 谈迁：《国榷》卷 16，中华书局，1988 年。

又按嘉靖《隆庆志·城池》记：“永乐甲午，复设州治。”[①] 甲午，即永乐十二年。《官署》记：“隆庆州废革有年，郡城鞠为茂草，国朝永乐甲午始复之。”[②]《艺文》所辑明代碑刻资料也持此说。例如，刘鉴《敕赐灵照寺碑》记：“永乐甲午，太宗文皇帝驻跸团山，览兹沃壤延袤，方数百里，于是开设是州。”[③]

嘉靖《隆庆志·建置》记载永乐十一年创设州县（详见下文），该说法仅此一例，系因该篇目遵照了《大明一统志》和成化《隆庆州志》（以下简称《州志》）的编纂体例，并继承了相关沿革表述。

《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天顺五年（1461年）撰修完成，颁行天下。该志对延庆明代州志的创修具有重要影响。成化《州志》是延庆明代首部方志著作，成书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又以此为基础续修州志，形成嘉靖《隆庆志》。由于成化《州志》已佚，嘉靖《隆庆志》就成为今天唯一可见的延庆明代州志。

成化《州志》开创不易，纂修者谢庭桂在修志之初遇到了编修难题，他在《隆庆志后序》自陈：“征文献则载籍散失，怀旧俗则非土著。”即使尽力搜阅了相关文献，也只能“略知开创之由”。因此“谨遵《大明一统志》为主，旁搜传记，博采见闻，门分汇别，诠次成编”[④]。据此可知，《大明一统志》为创修成化《州志》提供了体例示范和资料依据。

虽然成化《州志》今已不存，但据文献记载，该志体例结构完备，资料取材广泛。按隆庆知州李鼐为成化《州志》所撰《新修隆庆志序》记载：“废兴沿革之由，赋税生齿之数，山川物产风俗人材之类，学校坛缋桥梁寺观之属，与夫名宦政迹题咏诗文，靡不备载。”[⑤] 因此，嘉靖《隆庆志》又保留了成化《州志》的部分原纂篇目和原文记述。按嘉靖《隆庆志》续纂者苏乾《隆庆续志序》记：“旧志所有者，则存其是，而翦其芜。所未有者，则开其端，而著其迹。以接其绪，以达其流。……其列《疆域》于《建置》之前，数《山川》于《形胜》之后。”[⑥] 换言之，嘉靖《隆庆志》的《疆域》《建置》《山川》《形胜》等皆为成化《州志》原纂篇目，由于所涉内容和相关概念大多形成于明代前期，后世几无改易，所以除修正杂乱文辞外，续修时一般不会对原文再有改写。

就《建置》而言，该篇目来自成化《州志》，在体例上对应了《大明一统志》隆庆

①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1《城池》，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②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2《官署》，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③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④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志序后》，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⑤ 《新修隆庆志序》辑录于康熙《延庆州志》。迟日豫：（康熙）《延庆州志·延庆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⑥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续志后序》，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州《建置沿革》，在内容上也采用了《建置沿革》相关记述。兹将嘉靖《隆庆志》、天顺《大明一统志》中有关明代沿革的记载摘录如下，并在嘉靖《隆庆志》中以“﹏”符号标记出与天顺《大明一统志》表述相同或近似的部分。

天顺《大明一统志》隆庆州《建置沿革》[①]：“本朝初，（龙庆、怀来）州县俱废。永乐十一年诏复置州，改曰隆庆，直隶京师。编户一十四里。领县一。”

永宁县：“本朝永乐十一年始置，县治团山下。取《书》‘其宁惟永’之义为名。编户五里。”

嘉靖《隆庆志》卷之一《建置》[②]：“（龙庆州、怀来县）国初内附，徙其民于关内，州县俱废。永乐十一年，车驾北巡，驻跸团山，顾兹沃壤，诏复置州，改曰隆庆。迁民以实之，编户十四里。领县一。直隶京师。”

永宁县：“国初州废，徙其民于关内。永乐十一年，诏复置县。取《书》‘其宁惟永’之义为名。迁民以实之，编户五里。隶隆庆州。十三年设永宁卫。旧治团山下。宣德五年城灰岭，移县及卫治于此。”

通过对比可知，《隆庆志》遵循了《大明一统志》的编修体例，创建了记载“废兴沿革之由”的《建置》篇目，而且明代沿革内容几乎完全誊录自《建置沿革》，特别是照搬了永乐十一年创设州县的说法。同时《建置》又以《建置沿革》为蓝本，结合收集到的地方资料，增补了诸如移徙人口、朱棣北巡和永宁县治迁移等细节描写。由此说明，《建置》篇目出现的唯一一例永乐十一年创设州县说法，显然不是成化《州志》纂修者一时疏忽造成的，而是有意采用了来自《大明一统志》的官方记载。因此，续修的嘉靖《隆庆志》也未做修改，从而使州志与总志在内容上保持了相对一致。

那么，谢庭桂、苏乾是否认为该说法有误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谢庭桂在《隆庆志后序》中明确表示：“龙庆州废于国初，徙其民入居内郡，复于永乐甲午迁民以实之，而更今名。”[③] 苏乾也在《永宁县重修庙学记》中指出：“我朝永乐甲午，建永宁县于缙云山之阳。”[④] 表明二人都认为隆庆州、永宁县创设于永乐十二年。

另外，永乐十一年的问题说法还出现《宣府镇志》《两镇三关通志》《寰宇通志》等文献。例如，正德《宣府镇志》隆庆州城：“国朝永乐十一年设州。”[⑤] 嘉靖《宣府镇志》：“（永乐）十一年置隆庆州及永宁县。”[⑥] 嘉靖《两镇三关通志》：“（永乐）十一年，

① 李贤：（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5《隆庆州》，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

②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建置》，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③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志序后》，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④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⑤ 王崇献：（正德）《宣府镇志》卷 1《建置沿革》，线装书局，2003 年。

⑥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 1《制置考》，成文出版社，1970 年。

置隆庆州、永宁县。”[①] 景泰《寰宇通志》隆庆州《建置沿革》：“永乐十一年，车驾驻跸伯乐，诏复置隆庆州。”伯乐，不知所谓何处，疑误。永宁县：“永乐十一年始置。”[②]

据查《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朱棣驻跸行程，当年正月朱棣决定巡狩北京，二月车驾发京师（南京），四月至北京，此后仅在北京近处视察，未见巡幸居庸关迤北地区和创设隆庆州、永宁县记录。因此结合前述分析可知，有关永乐十一年创设州县的记载均为误记，应作永乐十二年三月。

## （二）州县创设与朱棣北征

永乐十二年创设隆庆州、永宁县之后，朱棣遂第二次亲征蒙古，三月中旬出师北京，八月上旬还师抵京。在此期间，朱棣曾两次驻跸隆庆州境。

据考，出征途中到达隆庆州的日期为三月二十日（4月9日），驻跸地点可能在岔道附近。按《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三月记载，庚寅（十七日）“车驾发北京……晚次清河”，辛卯（十八日）“驻跸沙河”，壬辰（十九日）“驻跸龙虎台”，乙未（二十二日）“驻跸沙城”[③]。其所未载的二十日、二十一日行程为龙虎台至怀来路段，据金幼孜《后北征录》可补，记作：“二十日（癸巳），晴。晨发龙虎台，度居庸关。途中多泥，马稍难行。午后，至隆庆州下营。二十一日（甲午）早，阴。晨发隆庆州，至榆林，雨。午后，至怀来下营，雨不止。二十二日（乙未）早，雨止。发怀来，午次沙城。晚晴。”[④] 又按《国榷》永乐十二年三月：“癸巳，次隆庆。”[⑤]

上述资料表明，朱棣到达隆庆州时，州县已经宣布创设，所以《后北征录》两次直称州名，印证了《明太宗实录》记载属实。从前后两日行军路线看，车驾通过居庸关后，遂渐次向西北方向推进，经过隆庆、榆林、怀来、沙城等驻跸处，每日行止距离不过数十里。其中，二十日（癸巳）路程最长，自龙虎台至隆庆州境至少有五十里，包括四十里关沟山谷通道，因前日降雨故而“途中多泥，马稍难行”。据此推断，所谓“至隆庆州下营”，应指当日午后在岔道附近驻跸。岔道是关沟北段的必经地点，位于隆庆州辖区南端，与隆庆卫管辖的八达岭接界。按嘉靖《隆庆志》记：“本州在京师西北，居庸关外。……南抵隆庆卫界八达岭。”[⑥] 也就是说，从八达岭向北进入岔道就等同于进

① 尹耕：《两镇三关通志・宣府纪》卷3［DB/OL］. https://www.loc.gov/resource/lcnclscd.2012402117.1A003/?st=slideshow#slide-19 [2018-1-3]。

② 彭时：（景泰）《寰宇通志》卷7《隆庆州》，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③ 《明太宗实录》卷14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④ 金幼孜：《后北征录》，《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⑤ 谈迁：《国榷》卷16，中华书局，1988年。

⑥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1《疆域》，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入了隆庆州境。另外，岔道也是永乐时期朱棣历次北征相对固定的驻跸处，文献对此多有记载。

还师途中驻跸岔道，日期为七月二十七日（8 月 12 日）。按金幼孜《后北征录》记："（七月）二十六日，晴。晨发土墓，午次怀来。二十七日，晴。晨发怀来，午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处暑。晨发永安甸，度居庸关。"[①]《明太宗实录》《国榷》记载简省，从略。永安甸即岔道。按嘉靖《隆庆志》记："岔道旧名三汊口，又名永安甸，为口外入居庸关之要道。"[②] 汊，应作汊。据此可知，还师路线与出师时基本一致，经土墓、怀来、永安甸、居庸关一线抵京，每日行程紧凑连贯，驻跸地点皆属常例。

据查，有关朱棣驻跸州境的记述在嘉靖《隆庆志》中多次出现，但是说法有异，即朱棣曾在北征途中驻跸团山并视察州境，因而诏建州县。除前述《建置》记载外，该说法还见于《山川》独山："一名团山，在永宁城西北十五里。其形独立，故名。妫川八景所谓'独山夜月'是已。永乐中，车驾尝驻跸于此。"[③] 团山在今延庆城区东北部旧县村南 1 千米处。林廷举《隆庆州城记》："永乐甲午，太宗皇帝巡狩北边，驻跸团山，以斯地厥土旷沃，群山环峙，遂创州治。"[④] 李东阳《永宁县重修庙学记》："永乐甲午，太宗皇帝銮舆北巡，顾此山水之秀，特建县治。"[⑤] 其中，"车驾北巡""巡狩北边"等皆指朱棣亲征蒙古。

上述资料皆以朱棣北征作为创设州县的前提显然是不对的，而且"驻跸团山说"也无法获得北征资料佐证。

其一，《建置》将"诏复置州，改曰隆庆"记于"车驾北巡，驻跸团山，顾兹沃壤"之后，完全颠倒了事件发生次序，是为误记。按前述，隆庆州、永宁县已于三月初四日宣布创设，这个日期不但早于三月二十日"至隆庆州下营"，更早于三月十七日"车驾发北京"，《明太宗实录》记载甚详，《后北征录》《国榷》皆为实证。同时，文献也没有确指团山为驻跸地点，更未指出朱棣曾进入隆庆州东北部视察巡游。那么，无论朱棣驻跸团山与否，《建置》所记"诏复置州"的时间都晚于州县实际创设时间。由此推断，《隆庆志》纂修者以及持有相同观点者可能并不知晓三月初四日创设州县的事实而有此误。

其二，"驻跸团山说"在北征资料中无迹可寻，无法证实确有其事。永乐十二年，阁臣金幼孜、胡广、杨荣奉命扈从北征，"凡山川气候之殊，道途涉历之远，所以充拓见闻，发舒志意者，靡不备之"[⑥]。金幼孜、杨荣还是负责纂修《明太宗实录》的总裁官，对

① 金幼孜：《后北征录》，《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②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③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山川》，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④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⑤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⑥ 杨士奇：《东里文集》卷 7《北征集序》，《明别集丛刊》（第一辑），黄山书社，2013 年。

北征经历十分熟悉。如果朱棣确曾驻跸团山，那么他们无论作为事件亲历者，还是实录编纂者，理应将这一事迹记录下来。然而查阅金幼孜《金文靖集》、胡广《胡文穆公文集》、杨荣《文敏集》，以及《太宗宝训》《国朝献征录》等有关资料，均未发现相关纪事作品，甚至嘉靖《隆庆志》、万历《永宁县志》也没有反映驻跸团山的诗文资料。

不仅如此，万历《永宁县志》记载更有舛误，其记："独山，一名团山，城西北十五里。永乐十一年，车驾驻跸于此。杨士奇、金幼孜、杨溥扈从有诗。"[①]按，永乐十一年系误记。而且杨士奇、杨溥二人不在当年扈从随行之列，查阅其作品亦未见相关纪事，何来"扈从有诗"呢？另外，嘉靖《隆庆志・艺文》辑录四篇金幼孜扈从诗，诗题分别为《次三汊口（即隆庆州）》《早发三汊口》《次永安甸（即三汊口）》《发永安甸入居庸关》，内容均为岔道、居庸关一带的军旅纪实、景物描绘和随行感获，无一例外。这表明在朱棣北征过程中，岔道应是今延庆境内唯一的驻跸节点。

总之，永乐十二年创设州县与朱棣北征皆发生在三月，虽然时序相近，却无因果关系。地方志中出现的记述逻辑问题，很可能是由于纂修者对资料细节掌握不足造成的。其他记述者也疏于考察事实经历，进而误以朱棣北征作为创设州县的前提。"驻跸团山说"缺乏直接证据，驻跸团山也不符合北征行程路线。相关记述更不断推演州县创设原委，以致出现了诸如"顾兹沃壤，诏复置州"，"以斯地厥土旷沃，群山环峙，遂创州治"，"顾此山水之秀，特建县治"等衍生说法。

## （三）赵羾督理与州县创建

赵羾，字云翰，山西夏县人，徙籍河南祥符县。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辛卯，赵羾以礼部右侍郎[②]升任本部尚书。永乐九年（1411年）九月庚午因事下狱，罢尚书职。获释时间不详，推测为永乐十年。永乐十二年十月开始督建隆庆、保安[③]、永宁诸州县。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经略结束，改任兵部尚书，巡督边塞屯戍。洪熙元年改任南京刑部尚书。宣德五年致仕。

其一，赵羾下狱以后至督建州县之前的经历不详，获释时间可能为永乐十年。

---

①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1《山川》，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② 右侍郎，《明太宗实录》永乐五年六月记："辛卯，升礼部左侍郎赵羾为本部尚书。"查《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十二月："庚寅，（升）工部右侍郎赵羾为礼部右侍郎。"《国榷》永乐五年六月："辛卯，礼部右侍郎赵羾为尚书。"《明太宗实录校勘记》："广本、抱本'左'作'右'，疑是也。"据此，正文作右侍郎。此外，《明史・七卿年表》永乐七年礼部尚书赵羾注："扈驾，兼署行在刑部。"《明史稿・大臣年表》同。查《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有六条记录与赵羾相关，除五月乙卯记"礼部尚书"外，余者皆记"行在礼部尚书"，未见兼任行在刑部，存疑。

③ 诏设保安州年代稍晚，《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十三年正月："壬戌，设保安州，隶北京行部。"

明代礼部下设主客清吏司，分管各番国朝见、进贡、接待、赏赐等事务。永乐九年九月朝鲜使臣即将回国，按照惯例应有赏赐，赵羾身为礼部主官却没有将此事上奏朝廷，朱棣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国体，遂将其下狱。不久，赵羾即获释放，唯时间失考，随后朱棣委派其督建隆庆、保安、永宁诸州县。按《明史・赵羾传》记："（永乐）九年秋，朝鲜使臣将归，例有赐赉，羾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远人心。'遂下之狱。寻得释，使督建隆庆、保安、永宁诸州县。"①

查《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九月庚午（下狱）以后至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改任兵部）之前，没有与赵羾有关的史料。又查《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1436年）七月戊申，赵羾卒，传作："戊午，敕诣北京，卜仁孝皇后山陵。壬辰，督开创隆庆、保安、永宁诸州县，抚安新集之民。"② 戊午，误，应作戊子，即永乐六年。壬辰（永乐十年）亦误，隆庆、保安、永宁诸州县当年尚未创设，如何督建？同样的说法还出现在杨荣《故资政大夫刑部尚书赵公神道碑铭》，作："戊子，仁孝皇后崩逝，敕公诣北京卜山陵。告成，膺楮币之赐。壬辰，督创隆庆、保安、永宁诸郡治。"③ 李濂《刑部尚书赵公羾传》作："戊子，仁孝皇后崩，上命公诣北京卜山陵。告成，有楮币之赐。壬辰，经略创建隆庆、保安、永宁诸郡。"④ 据此可知，碑铭、传记与《明英宗实录》记载如出一辙，均有意改写赵羾生平经历，删削下狱事件，并借此重塑赵羾的尚书形象。那么，永乐十年既然不是经略州县的开始时间，推测很可能就是赵羾获释出狱之年。资料有限，姑且存疑。

其二，永乐十二年十月，前礼部尚书赵羾开始经略督建隆庆州、永宁县。

首先，赵羾在永乐九年因事获罪时已遭免职。《明史・七卿年表》永乐九年礼部尚书记："羾，九月下狱。"⑤ 此后直至永乐十四年，六部尚书均未见赵羾任职记录，《明太宗实录》也未见相关记载，表明礼部尚书官职已削。那么，诸如嘉靖《宣府镇志》"礼部尚书赵羾来辑迁民"⑥ 之说，皆可视作对赵羾的尊称，确切称呼应作"前礼部尚书"。例如，《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改前礼部尚书赵羾为兵部尚书。"⑦

其次，永乐十二年十月赵羾到达隆庆州，是为经略之始。按正德《宣府镇志》记经略官赵羾："永乐十二年奉谕至保安、隆庆二州。"⑧ 说法欠妥，保安州创设于永乐十三

---

① 《明史》卷150《列传第三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

② 《明英宗实录》卷2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③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8《神道碑铭》，《明别集丛刊》（第一辑），黄山书社，2013年。

④ 焦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41《兵部四》，齐鲁书社，1996年。

⑤ 张廷玉：《明史》卷111《表第十二・七卿年表一》，中华书局，1974年。

⑥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25《经略考》，成文出版社，1970年。

⑦ 《明太宗实录》卷19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⑧ 王崇献：（正德）《宣府镇志》卷6《官迹》，影印本，线装书局，2003年。

年。嘉靖《隆庆志·职官》亦记经略赵羾："永乐甲午，督创隆庆、保安、永宁诸郡治。"[①]《艺文》又载赵羾纪事诗，序作："予自永乐十二年冬钦承上命，待罪塞垣。是时，隆庆州民未到，惟本州官吏穴居野处。"[②]可知赵羾在永乐十二年冬已至隆庆州。赵羾以"待罪"来指自己任职，其意为随时准备获罪，并不是说自己有罪，与"戴罪"不同。赴任月份，按嘉靖《两镇三关通志》作"冬十月"[③]。

另外，文献还称赵羾为经略官。所谓经略，指筹划治理，也可指明代都察院派驻地方的军政要员、封疆大吏，一般以巡抚或总督作为正式官号。由于永乐时期的督抚制度正处于萌发阶段，所以赵羾的"经略"身份还不属于督抚体系的正规职官，仅仅是受命于皇帝的临时差派官员，职权有限，任务单一，负责督理落实诸如安置移民、创建州县等具体事务，经略结束，公务即止。因此，正德《宣府镇志》[④]将"经略官赵羾"记录在宣府东路条目下，而不将其作为督抚大员置于卷首。同时，嘉靖《宣府镇志·经略考》还分析指出，朝廷委派赵羾经略边塞具有制度开创性，称此为："重臣行边之始。是后，有规划、有经理、有总制、有督饷，要皆需以经略我土者。有事即遣，无事即还，著为令甲。"[⑤]

其三，永乐十五年十一月赵羾经略结束，改任兵部尚书。

据查《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改前礼部尚书赵羾为兵部尚书，俾巡督塞北屯戍。"[⑥]改任兵部表明督建州县已经完成，即以永乐十五年十一月作为经略结束时间。按嘉靖《隆庆志》作："事竣，改兵部尚书。"[⑦]事竣，即经略完成。《明史·七卿年表》永乐十五年兵部尚书记："羾，十一月任，屯戍边塞。"[⑧]

《明史·赵羾传》对其就任兵部时间记述有误，作："（永乐）十五年丁母艰。起复，改兵部尚书，专理塞外兵事。"[⑨]按《明英宗实录》赵羾传记："丁酉，改兵部尚书。明年丁内艰，起复，专理塞外兵政。"[⑩]杨荣《故资政大夫刑部尚书赵公神道碑铭》记："丁酉，改兵部尚书。明年以内艰去，已而起复，专理塞外兵政。"[⑪]李濂

①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4《职官》，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②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③ 尹耕：《两镇三关通志·宣府纪》卷3［DB/OL］. https://www.loc.gov/resource/lcnclscd.2012402117.1A003/?st=slideshow#slide-21 [2018-1-3]。

④ 王崇献：（正德）《宣府镇志》卷6《官迹》影印本，线装书局，2003年。

⑤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25《经略考》，成文出版社，1970年。

⑥ 《明太宗实录》卷19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⑦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4《职官》，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⑧ 《明史》卷111《表第十二·七卿年表一》，中华书局，1974年。

⑨ 《明史》卷150《列传第三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

⑩ 《明英宗实录》卷2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⑪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8《神道碑铭》，《明别集丛刊》（第一辑），黄山书社，2013年。

《刑部尚书赵公羾传》记："丁酉，改兵部尚书。明年母殁守制还，起复，专理塞外戎政。"[①] 据此可知，赵羾就职兵部尚书是在永乐十五年，第二年丧母守制，起复仍为兵部尚书。《明史·赵羾传》没有厘清赵羾改任兵部经历，在叙述上颠倒了就职和丁艰的次序关系。

其四，赵羾的经略举措与隆庆州、永宁县的创建经历。

赵羾经略州县的时间阶段为永乐十二年十月至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经略的首要任务是安置迁民，恢复生产。为了达成目标，赵羾精心统筹谋划，亲自督导实施了"披荆棘，立坊市，画田亩，布约束"等行之有效的建设举措，在三年内恢复了州县城乡风貌，使延庆地区重新出现繁荣景象。上述创建经历和成果在方志文献中有清晰记载。

嘉靖《宣府镇志》记："州县虽命创置，尚无编户"，于是"迁内地民实之，乃命羾来安辑。羾至，披荆棘，立坊市，画田亩，布约束。二三载遂为都会之区云"[②]。刘鉴《敕赐灵照寺碑》谓："尤虑民不率教，命前礼部尚书赵羾总督其事。教民剪除荆榛，区别闾巷，以定民居；复立市廛，以来商贾。"[③]

嘉靖《隆庆志》部分篇目也记录了赵羾的经略举措。《街》记："本州街乃赵尚书所画，以居军、民者，分阴阳焉。"[④]《财赋》记："本州田之附郭者原是荆棘之区，始赵尚书授田之时，民多难之，愿受其远于城郭有蒿莱而易耕者，赵公婉以谕民，民始受之。间有正数之外授之三亩使艺菜者，公之心惟欲迁民之安其业而已。"[⑤]

嘉靖《隆庆志·艺文》[⑥] 还辑录了赵羾在经略州县期间创作的数十篇诗文作品，殊为珍贵。其中一部分诗文写实记录了社会新风貌和移民新生活，例如，"驱除瓦砾辟荆榛，比屋闾阎结构新"；"北徙民今治常产，南来我亦构行窝。风光无复前时比，市有亨衢野有禾"；"村堡人家打麦场，一时忘却在边疆。嘉禾遍野丰年兆，莫望并州是故乡"；等等。另一部分诗文系有关延庆地区人文历史、风物景观的题咏描绘，即《妫川八景诗》《永宁八景诗》，亦对乡土民生和建设成果有所涉及。例如，"封疆尽入皇明国，人物俱游不夜城"（妫川积雪）；"历尽羊肠路忽通，山村摇曳酒旗风"（岔道秋风）；"墟落山之阳，风景类盘古。泉甘土壤肥，偏宜播百谷"（苗乡秋稔）；"丁丁伐木声，响振青山外。落日负薪归，长歌起延濑"（峪口归樵）；等等。

除赵羾外，隆庆知州、永宁知县等地方官员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嘉靖《隆庆志》赵

---

① 焦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 41《兵部四》，齐鲁书社，1996 年。

②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 25《经略考》，成文出版社，1970 年。

③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④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街》，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⑤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3《财赋》，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⑥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羾纪事诗序作："予自永乐十二年冬，钦承上命，待罪塞垣。是时，隆庆州民未到，惟本州官吏穴居野处。左右四顾，荆棘萧然，鬼哭狼嗥，不胜悲惨。……岂意不二三年间，民益日广，相与披荆棘，除草莱，立成街市。渐至人烟繁伙，百货骈集，野有余粮，民无菜色。……皆赖朝廷洪福、州官勤劳、百姓效力，以致如斯，余何能焉！"[①] 这段诗序大约撰于永乐十五年经略结束前，除记述建设成果外，还可推知地方官员勤劳政务，配合得当，能够将赵羾的经略举措落实到位。

据查，隆庆州首任知州陆震，苏州吴县人，嘉靖《隆庆志》称其："永乐间首来莅任，草舍行事，以安新集之民。"[②] 陆震赴任隆庆州应在永乐十二年三月至十月期间，因州城建筑破败不堪，暂且搭建草房处理政务，落实移民安置工作。

永宁县开始创建于永乐十三年，首任知县史从政，湖广沔阳人。按万历《永宁县志》记："史从政，永乐十三年始分州地置县，公首事县尹也。"[③] 县尹，即指知县。正德《宣府镇志》亦记史从政"永乐十三年"任职[④]。嘉靖《宣府镇志》将隆庆知州、永宁知县任职时间均误记为永乐十一年[⑤]。

综合而言，洪武五年龙庆州废除后，州境荒芜已逾四十余年。在永乐十二年至永乐十五年恢复州县的过程中，由赵羾督理实施的安置移民、实行教化、拓荒垦殖、施画田亩、恢复商业、规划街巷、规范秩序等一系列经略举措成效卓著，经过地方官员和移徙人口的共同实践，创造性地开辟了明代隆庆州、永宁县的经济基础和城乡格局，有力地推动了明代延庆地区移民社会形态的初始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 五、隆庆州与缙山县等建置的关系

明代隆庆州城南临妫川，西枕沽河，城垣遗址位于今延庆旧城。按嘉靖《隆庆志》记妫川（今称妫河）："一名溪河，在州城南百余步。"沽河（今称三里河）："环流城下西南二面，东流入溪河。"[⑥] 需要指出的是，隆庆州城并非明代筑立，始筑年代可以追溯至金元时期。按嘉靖《隆庆志》记载："本州城因元之旧。"[⑦] 万历《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延庆州城记："本城故金元旧治，昔名龙庆，复为隆庆。"[⑧] 嘉靖《两镇三关通志》亦指

①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②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4《宦绩》，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③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 4《秩官志》，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④ 王崇献：（正德）《宣府镇志》卷 6《官迹》，线装书局，2003 年。
⑤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 29《职官表三・守土文臣》，成文出版社，1970 年。
⑥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山川》，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⑦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城池》，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⑧ 杨时宁：（万历）《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玄览堂丛书》第二十一册，台湾大学图书馆藏。

出龙庆州旧有城隍设施，记："(洪武）二十五年，都督刘真、指挥使李彬来行障塞。历宣德、兴和、云州、大兴、保安、龙庆、怀来诸处，度量城隍，增设险隘。"[①] 由此推知，明代隆庆州系依托元代旧有城垣设置州治。同时在政区建置上，隆庆州与金元时期设置的缙山县、龙庆州也存在承袭关系，诸州县治很可能都在延庆旧城附近，试析如下。

其一，延庆地区在辽代设有儒州、缙阳军，领缙山县，州治附县郭。州境有两条重要河流，即南溪河、沽河，据前述当指今妫河、三里河。按《辽史・地理志》载："儒州，缙阳军，中，刺史。……有南溪河、沽河……统县一：缙山县。"[②] 那么，辽代儒州、缙山县治应在南溪河以北、沽河以东，即今延庆旧城附近。

其二，金初，州县承袭辽代旧置。皇统元年（1141 年）废儒州，缙山县改属奉圣州。崇庆元年（1212 年）缙山县升为镇州，至宁元年（1213 年）镇州被蒙古军队攻陷。按《金史・地理志》缙山县："辽儒州缙阳军县故名，皇统元年废州来属，崇庆元年升为镇州。"[③] 又按《金史・毕资伦传》记载："崇庆元年，改缙山为镇州，术虎高琪为防御使，行元帅府事于是州，选资伦为防城军千户。至宁元年秋，大元兵至镇州，高琪弃城遁。"[④] 据此分析，缙山县在升级镇州之前应有城垣设施，遂有术虎高琪任用毕资伦为防城军千户，进而布置城防抗击蒙古军队。

辽金时期的缙山县又称缙阳县，县治位于明代州城南部。按嘉靖《隆庆志・建置》记："辽为儒州缙阳军，治缙阳县。"[⑤] 同书《古迹》缙山废县："在（隆庆）州城内……金废（儒）州为缙山县。"[⑥]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持此说。又按正德《宣府镇志》缙阳废县："在（隆庆）州城南，……金废（儒）州为缙阳县。"[⑦]

缙山县城可能筑建于金泰和年间（1201～1208 年）[⑧]。按嘉靖《宣府镇志》缙阳县

① 尹耕：《两镇三关通志・宣府纪》卷 3［DB/OL］. https://www.loc.gov/resource/lcnclscd.2012402117.1A003/?st=slideshow#slide-14 [2018-1-3]。

② 《辽史》卷 41《志第十一・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4 年。

③ 《金史》卷 24《志第五・地理上》，中华书局，1975 年。

④ 《金史》卷 24《志第五・地理上》，中华书局，1975 年。

⑤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建置》，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⑥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8《古迹》，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⑦ 王崇献：(正德)《宣府镇志》卷 5《古迹》，线装书局，2003 年。

⑧ 根据延庆出土墓志记载，延庆旧城在唐代筑有城垣，曾为儒价州治、防御军治。该城垣很可能遗留至辽金时期。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唐代城垣与金元明时期城垣存在关联的史料或考古依据，因此本文不做追加考述。儒价州、防御军考证参见拙文如下。王伯轩：《唐刘日用墓志考释》,《北方民族考古》(第 7 辑)，科学出版社，2019 年，272 页。王伯轩：《延庆两方唐代墓志考释》,《北方民族考古》(第 8 辑)，科学出版社，2019 年，309 页。

城：“今隆庆城傍，……金太和中城之。”[①] 其中，“太和”应作泰和，金章宗年号。“傍”则揭示出明代州城依附于金代缙山县城旧址。

另外，位于延庆旧城南部的灵照寺创建于金代，旧名观音寺，元末焚毁，明代复建，正统五年赐名灵照寺。该寺应在金代缙山县城中，为当地军民信仰寄托之所。按嘉靖《隆庆志》灵照禅寺：“在州治东南，面城。创自金，旧名观音寺，元末兵燹。永乐中，有玛禅师者，即故址募缘构庵，为祝厘之所。……宣德五年，僧清潭募建殿宇。正统五年，请赐今额。”[②]

其三，金代镇州在陷蒙之后即废，复为缙山县。元至元三年（1266年）裁缙山县，其境划属怀来县。至元五年（1268年）复置缙山县，仍属奉圣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仁宗降诞于缙山县。延祐三年（1316年）九月缙山、怀来二县从上都路宣德府奉圣州改属大都路，同时升格缙山县为龙庆州。延祐四年四月龙庆州添领怀来县。按《元史・地理志》龙庆州：“金为缙山县。元至元三年，省入怀来县，五年复置，本属上都路宣德府奉圣州。二十二年，仁宗生于此。延祐三年，割缙山、怀来来隶大都，升缙山为龙庆州。领一县：怀来。”[③]《元史・仁宗本纪》延祐三年九月：“庚戌，割上都宣德府奉圣州怀来、缙山二县隶大都路，改缙山县为龙庆州，帝生是县，特命改焉。”[④] 延祐四年夏四月：“壬辰，割怀来县隶龙庆州。”[⑤]

元仁宗降生地在缙山县香水园，明人可见旧址遗迹，俗称“东花园”。其地位于缙山县治东北部十余里，即今延庆上、下花园村一带。按《明太宗实录》：“隆庆，……金置缙山县。元仁宗生于县东，改为龙庆州。”[⑥] 嘉靖《隆庆志》香水园：“俗名‘东花园’，在州城东北十二里。元仁宗诞处，其址尚存。”[⑦] 据此推知，金元时期的缙山县治地望相同。香水园为元代缙山县（龙庆州）捺钵地，因有皇家花囿，故有花园之称。按胡庆云《天成观碑》记：“香水园，为花囿，即纳钵之所止也。……仁宗皇帝诞祥于此。……及龙飞九五，驻跸于香水园也。”[⑧] 天历二年（1329年）五月元文宗北迎明宗皇帝途中亦曾驻跸于此。按《元史・文宗本纪》天历二年五月：“庚辰，次香水园。”[⑨]

---

①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11《城堡考》，成文出版社，1970年。

②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8《寺观》，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③ 《元史》卷58《志第十・地理一》，中华书局，1976年。

④ 《元史》卷25《本纪第二十五・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二）》，中华书局，1976年。

⑤ 《元史》卷26《本纪第二十六・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三）》，中华书局，1976年。

⑥ 《明太宗实录》卷14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⑦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8《古迹》，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⑧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⑨ 《元史》卷33《本纪第三十三・文宗图帖睦尔（二）》，中华书局，1976年。

明初，龙庆州、怀来县延续至洪武五年七月，此后州县俱废。洪武三十年置怀来守御千户所于元代怀来县城，该千户所在永乐时期最终沿革为怀来卫。龙庆州则于永乐时期复置为隆庆州，领永宁县。

元代龙庆州与明代隆庆州在治地上具有承袭关系，皆治缙山县城。按嘉靖《宣府镇志》元代："龙庆州治缙山。"明代："隆庆仍治缙山。"[①] 换言之，元明时期诸州县治皆在今延庆旧城。乾隆《宣化府志》也有类似记载，元代："龙庆治缙山，领县二：缙山、怀来。"明代："延庆州仍治缙山，领县一：永宁。"[②] 但元代领县记载有误，应作领怀来一县。元代文学家周伯琦于至正十二年（1352 年）扈从元顺帝北巡经过龙庆州境，据其所撰《扈从诗前序》记："五月一日过居庸关而北，遂自东路至瓮山。明日至车坊，在缙山县之东。……今名龙庆州者，仁庙降诞其地故也。"[③] 说明缙山县作为历史旧称仍然流传使用，但是在政区建置上已被龙庆州取代。

另外，1984 年在延庆南菜园发现一座元代单人土坑竖穴墓，墓地在延庆旧城东南约 1.5 千米处，墓主颅骨上方覆瓦 1 块，刊刻"大元国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廿八日，故缙山县杨祐之，延祐四年十一月廿九日身故"等字。表明墓主杨祐之是缙山县人，生于至元二十二年，殁于延祐四年。按，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即元仁宗降诞之年，此时缙山县建置仍存。延祐四年缙山县刚升格为龙庆州不久，所以志文以"故缙山县"称其籍贯，说明该建置已不存在。同时，该墓葬的发现也反映出南菜园是元代缙山县治附近的一处重要墓地。

综上所述，缙山县是研究明代隆庆州行政建置的一条重要线索。通过资料梳理可以发现，儒州、镇州、龙庆州皆以缙山县为基础政区，历经辽金元时期的迭代演进，明代又因循创设隆庆州。同时，目前没有发现有关缙山县移治的资料，因此依据前述可以基本断定诸州县治皆在延庆旧城。

缙山县城可能筑建于金朝泰和年间，元代因袭为龙庆州城，明代又依附此城设立州治。万历《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本城故金元旧治"的说法是可信的。嘉靖《隆庆志》所称"本州城因元之旧"，仅从城垣角度说明了元明两代的沿革关系，但是元代设治于该城也具备了客观的文献依据和舆地环境。因此，该城垣即使在明初荒废四十余年，仍然引起朝廷重视，将隆庆州治复设城中。诚如嘉靖《隆庆志·地理》开篇所言："隆庆，地临朔漠，建置不常，疆理有分有合，郡名有沿革，城郭有废兴。然上应躔次，下踞形势，旁达舟车，则迄无变易；而况邑井内棼，郊圻外列，关梁错布，历历可指，千载如一日哉！"[④]

---

①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 7《疆域考》，成文出版社，1970 年。

② 王者辅：（乾隆）《宣化府志》卷 4《形势疆域》，成文出版社，1968 年。

③ 周伯琦：《扈从诗前后序》，《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 年。

④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地理》，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 六、结　　语

本文从四个方面研究了延庆明代州级政区建置，系统梳理了龙庆、隆庆二州的沿革变迁、建置关系和相关人物事迹，并且获得如下结论。其一，龙庆州内附于明初，洪武二年六月以后属开平府。洪武三年三月改属北平府。洪武五年七月因北平边塞局势未稳，明朝采取废州移民防御措施，龙庆州遂废除。其二，隆庆州创设于永乐十二年三月初四。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以后依次直隶京师六部、北京行部、行在六部，正统六年十一月复直隶京师六部。同时，隆庆州有两个直隶州身份，即北京行部直隶州和京师直隶州。其三，隆庆州创设时间应以《明太宗实录》《明史》等文献记载为准。《隆庆志》遵循了《大明一统志》编修体例，并且誊录了永乐十一年创设州县的错误记载。隆庆州创设于朱棣出师北征之前，文献有关朱棣驻跸团山的说法缺乏直接证据，也不符合北征行程路线。有关朱棣驻跸团山创设州县的衍生说法与史不符。永乐十二年十月至永乐十五年十一月，前礼部尚书赵羾以经略官员身份督建隆庆州，实施了安置移民、实行教化、拓荒垦殖、施画田亩、恢复商业、规划街巷、规范秩序等举措，创造性地开辟了明代隆庆州的经济基础和城乡格局，有力地推动了明代延庆地区移民社会形态的初始构建。其四，辽金元三朝的缙山县是研究明代隆庆州行政建置的一条重要线索，儒州、镇州、龙庆州等早期建置皆以缙山县为设置基础，明代又因循龙庆州创设隆庆州。根据目前资料分析，诸州县治皆在延庆旧城。明早期的隆庆州城为元代遗留城垣，可能始筑于金朝末期。

#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qing Zhou( 龙庆州 ) and Longqing Zhou ( 隆庆州 ) (Yanqing Zhou 延庆州 )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Boxuan

**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administrative classification of Yanqing went through major transformations from abolition to restoration.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inclusion and abolition of Longqing Zhou (龙庆州) in Hong Wu Period, the migrant issu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ngqing Zhou ( 隆庆州 ) in Yong Le Peri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gqing Zhou (隆庆州) and its previous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s during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are still inconclusive. Through unfolding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s of Longqing Zhou ( 龙庆州 ) and Longqing Zhou ( 隆庆州 )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clarifying their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and with critical examin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text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inclusion, reclassification and abolition of Longqing Zhou ( 龙庆州 ) in Hong Wu Period, and reveals the reasons behind such moves. This study also clarifies the time and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Longqing Zhou (隆庆州) in the Yong Le Period and the success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from the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Further revealed in this study is the lack of sufficient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argument that Emperor Yong Le (Zhu Di, 朱棣) established Longqing Zhou (隆庆州) during his expedition to the north. Also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are th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by Zhao Hong ( 赵羾 ) during his governance and its great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qing Zhou (隆庆州) and Yongning Xian (永宁县).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that the Longqing ( 隆庆 ) city wall was possibly built in the late Jin Dynasty.

**Keywords:** Longqing Zhou (隆庆州); Longqing Zhou (龙庆州); Jinshan Xian (缙山县);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

# 明代永宁县建置考

王伯轩

（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北 京，102100）

**摘要：**永宁县是明代隆庆州（延庆州）的唯一属县。通过考据文献资料，本文对明代永宁县的创建经历、县治地望、城池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永宁地区在辽金元明时期的建置活动，永宁县治的设置年代、地点及其变迁，永宁城的筑立原因和修筑过程。进而提出永宁县的建置因袭对象是元代龙庆州之神峰乡，明代永宁县的旧治地望在今旧县村，旧县屯堡修筑年代应不早于宣德五年，永宁城筑立于宣德五年六月中旬，宣德六年永宁县徙治永宁城等观点。

**关键词：**永宁县　旧县　永宁城　缙山县　神峰乡

## 一、引　　言

明代延庆地区的行政区划研究是北京长城文化带的重要课题之一。此前，《明代龙庆州、隆庆州（延庆州）建置考》[①] 已尝试讨论了明代龙庆、隆庆二州的政区变迁，追溯了延庆在辽、金、元、明四个时期的建置关系，调查了相关人物事迹，收获了崭新的研究结论。同时，对明代延庆县级政区，即永宁县的创置过程也已进行了文献初探。由于隆庆、永宁州县同时创设，二者的沿革经历具有补正关系，所以有必要对永宁县的建置形成与发展再做深入讨论，以期系统揭示明代延庆州县两级政区的沿革轨迹。

因此，本文仍以明代前期作为考察切入点，通过分析归纳、逻辑推理等方法考据文献资料，重点梳理永宁县的创建经历、县治地望、城池建设等方面内容，首先考证永宁县、缙山县和神峰乡三者的历史地理关系。继而，从地名沿革角度考证永宁县旧治地望，旧县村的名称由来；从城池建设角度考证筑立永宁城的背景、过程和相关人物事迹，最后指出永宁县徙治年代。同时，本文还考察了永宁县与神峰乡的农业环境特点，并对永宁旧治城堡（旧县屯堡）的修筑年代做出大致推断。仍需指出的是，本文研究所

---

① 王伯轩：《明代龙庆州、隆庆州（延庆州）建置考》，《北方民族考古》（第 12 辑），科学出版社，2022 年。

据资料有限，有待新资料的补充完善。

## 二、永乐时期初建永宁县的背景和地望

永乐十二年，明政府在创设隆庆州的同时，又在州境东部划设一处崭新的县级政区，特将其命名为永宁县，县名典出《尚书 · 吕刑》，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寓意百姓安土乐生，君王明德怀远，国家长治久安。

作为隆庆州的唯一属县，永宁县在明代为非附郭县。宣德五年以前，县治位于州治东北三十里团山下，尚无城池依傍，治地即今旧县村。若按永乐十三年永宁县正式施建推算，这处县治历时仅有十六年。宣德五年明政府为强化京师（北京）北部边防，遂在永宁至独石一线构筑城堡等防御工事。其中，永宁城以灰岭（地名）为地理坐标展开营建，城址位于县治（旧县村）东南十五里，州治（延庆旧城）东北四十里，即今永宁古城。宣德六年永宁县治徙建于永宁城，始有城池围护，此后治地无改。

### （一）永宁县建置背景

其一，永宁县作为隆庆州（延庆州）所领的县级政区，肇自明朝永乐时期，辽金元时期属缙山县辖地。文献对永宁县建置沿革记载混乱，说法不甚一致，需先做辨析。

例如，景泰《寰宇通志》记：“永宁县，在州城东三十里团山下，永乐十一年始置，取《书》‘其宁惟永’之义为名。”[①] 天顺《大明一统志》记：“永宁县，在州城东三十里，本辽缙山县地，金元因之。本朝永乐十一年始置，县治团山下。”[②] 两说年代皆误，应作永乐十二年。

又例如，嘉靖《隆庆志》记：“永宁县，在州城东四十里。本唐儒州地，辽以缙云氏故都立缙山县，金因之，元升龙庆州，为州之神峰乡。……旧治团山下，宣德五年城灰岭，移县及卫治于此。”[③] 万历《永宁县志 · 沿革》永宁县记：“元仁宗升缙山县，为龙庆州之神峰乡。”[④] 该志《城池》又记：“旧治团山下，无城池，金为州之神峰乡。”[⑤] 乾隆《延庆州志》誊抄此说，但二者所谓“金为州之神峰乡”尚不可考，由于其他文献皆以元代为记，疑“金”应作“元”。

需要指出的是，景泰《寰宇通志》、天顺《大明一统志》皆遗漏了永宁县移治经历，

---

① 彭时：（景泰）《寰宇通志》卷 7《隆庆州》，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② 李贤：（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5《隆庆州》，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

③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建置》，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④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 1《沿革》，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⑤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 1《城池》，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记述内容完全是宣德五年以前的建置沿革，所谓“在州城东三十里”者，实指永宁县旧治，地望在隆庆州城东北三十里团山北侧。团山又称独山，在今延庆区旧县村南 1 千米。嘉靖《隆庆志》等所谓“在州城东四十里”者，则指“宣德五年城灰岭，移县及卫治于此”，地望即永宁城，该城是宣德五年以后的县治驻地。按光绪《延庆州志・村镇表》所列各村镇皆以延庆州城为基准，度量该村镇至州城里程，其中永宁城作“距城四十里”[①]。那么，上述文献凡涉及辽金元时期建置背景的记载，都是针对永宁县旧治而言的。

据考，隆庆州在辽金元时期的早期行政建置或州或县，承袭演变一脉相承，诸州县治皆在延庆旧城[②]。因此，在辽金元时期，永宁县地区不存在县级建制，系以基层乡村组织形式从属上级州县政区，即辽代属于儒州缙山县辖地，金元时期为缙山县（镇州、怀来县、龙庆州）辖地。永宁县旧治地方在元代属于龙庆州神峰乡，明洪武五年以后，因废龙庆州，神峰乡亦由附近的实土卫所管领。

因此，嘉靖《隆庆志》将辽金时期缙山县沿革，即“辽以缙云氏故都立缙山县，金因之”编入永宁县，应视作对永宁县建置线索的补充说明，不能理解为永宁县因袭缙山县而设，或缙山县治在永宁县境。对比可知，天顺《大明一统志》所谓“本辽缙山县地，金元因之”说法最为明确，指出永宁县地区在辽金元时期皆为缙山县辖地而已。万历《永宁县志》“修志凡例”有言：“县自永乐年建置，以前或属郡、属州不一。”[③]《读史方舆纪要》亦称：“永宁县，州东三十里，本缙山县地。明永乐十一年，始置今县。”[④]虽然“永乐十一年”仍是误记，但是“始置今县”一语中的，说明县级政区建置始自明代。这也正是《明太宗实录》《明史》等文献对永宁县早期建置经历未做追溯的重要原因。

其二，明代永宁县的建置因袭对象是元代龙庆州之神峰乡。关于神峰乡的记载，除上述嘉靖《隆庆志》、万历《永宁县志》外，还有正德《宣府镇志》东路永宁城记：“元为龙庆州之神峰乡。”[⑤]此说虽谓东路永宁城，实指永宁县旧治。嘉靖《两镇三关通志・宣府纪》载：“（永乐）十一年置隆庆州、永宁县，州置于龙庆，改‘龙’曰‘隆’，

---

① 屠秉懿、胡振书、张惇德：（光绪）《延庆州志》卷 2《舆地志・村镇表》，《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 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

② 儒州及所领缙山（或称缙阳）一县应最早设置于唐代，后晋天福三年（938 年）州县改属契丹。金初因辽旧置，皇统元年废儒州，崇庆元年升缙山县为镇州，次年陷蒙，复为缙山县。元至元三年裁缙山县，县境划入怀来县，至元五年复置，延祐三年升缙山县为龙庆州，直至明洪武五年废州迁民。

③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修志凡例》，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④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17《北直八》，中华书局，2005 年，781 页。

⑤ 王崇献：（正德）《宣府镇志》卷 1《建置沿革》，线装书局，2003 年。

又置永宁县于州之神峰乡。”[①] 年代误，应作永乐十二年。“州之神峰乡”，州指龙庆州。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嘉靖《宣府镇志·制置考》隆庆州记：“即元龙庆。”永宁县记：“即缙山，元又名神峰乡，今置县隶州。”[②] 然而，同卷《疆域考》记：“龙庆治缙山”“隆庆仍治缙山”[③]。显然，这两处记载自相矛盾。《制置考》认为永宁县沿袭缙山县设置，同时认为缙山县又名神峰乡，与元龙庆州治地不同。但是《疆域考》记载则说明缙山县、龙庆州、隆庆州三者具有沿袭关系，而且治地一致。那么，隆庆州、永宁县究竟是谁因袭缙山县而设呢？根据上文分析可知《制置考》永宁县说法有误，倘若永宁县因袭缙山县而设，除非缙山县治曾从延庆旧城迁移到团山附近。不过就目前资料来看，能够合理解释县治迁移说法的文献资料和考古依据还不够充分。

元代神峰乡属于县级以下基层社会组织，形成时间不详，应不晚于龙庆州存续时期并沿革至明初。此后，永乐时期即以原神峰乡地区作为初建永宁县的地缘依据。永宁县旧治驻地很可能位于元代聚落神峰村。

据元代胡庆云《天成观碑》载：“出幽燕之北，登缙山之上。见其山也，揖太行而接居庸，襟桑干而抵开平。……山有仙髻之奇，村号‘神峰’之异。”[④] 说明缙阳山附近存在与神峰乡同名的元代聚落神峰村。“神峰”应指缙阳山，文献又称作缙山、缙云山、龙安山。按嘉靖《隆庆志》记：“缙阳山，在永宁城西北十三里。又名龙安山。”[⑤] 清末《延庆州乡土志要略》记：“缙阳山，一名缙云山，又名缙山。”[⑥] 缙阳山是延庆川区东北部的主要山峰和文化地标之一，位于今延庆区香营乡北部。“神峰”之名可能与缙阳山麓因有雾气疑似蜃景有关。据万历《永宁县志》记载，“缙阳晴岚”为明代“永宁八景”之一，“在城北十里缙云山下，每遇昼晴时，气清天朗，瑞霭横郊。《汉书》以‘海市’为蜃吐楼台，兹缙岚仿佛其光景矣”[⑦]。永乐时期谪官罗存礼《缙阳晴岚》诗亦云：“非云非雾亦非烟，多半晴天似雨天。……娇莺弦管声微度，老蜃楼台影倒悬。”[⑧] 由此推测，明代以前的当地居民亦可见到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故以“神峰”命名附近乡、村。由于乡、村同名，推知神峰村应为该乡一处核心聚落，地望可能在今旧县村。另外，顺风屯是明代永宁县管理的五个屯堡之一，其名疑从“神峰”转音而来。顺风屯与团山屯附

---

① 尹耕：《两镇三关通志·宣府纪》卷 3［DB/OL］. https://www.loc.gov/resource/lcnclscd.2012402117.1A003/?st=slideshow#slide-20 [2018-1-3]。

②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 1《制置考》，成文出版社，1970 年。

③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 1《疆域考》，成文出版社，1970 年。

④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⑤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山川》，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⑥ 佚名：《延庆州乡土志要略·地理》，据稿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⑦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 1《八景》，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⑧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郭永宁县旧治，详见下文考述。

其三，元代神峰乡地区具有良好的农业环境和经营基础，这是永乐时期继设永宁县并恢复人口的重要成因。元代缙山县（龙庆州）土产丰饶，农业出众，盛产优质谷类作物，朝廷因设栽种提举司，专门负责贡赋事宜。据《元史》记载，元朝中央机构设有宣徽院，掌供宫廷饮食，至元十七年（1280 年）下设缙山栽种提举司（后改称龙庆栽种提举司），“管领缙山岁输粱米，并易州、龙门、净边官园瓜果桃梨等物，以奉上供”[①]。说明在元世祖时期，缙山县的粱米种植就已形成规模，需要设置专职机构负责岁输。

特别是神峰乡所在的缙阳山麓平原，土田宜耕，岁供特产。据周伯琦《扈从诗前序》描述：“缙山，轩辕缙云氏山。山下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诗云：“缙云山独秀，沃壤岁常丰。玉食资原粟，龙洲记渚虹。”[②]这番景象是至正十二年（1352 年）周伯琦扈从元顺帝北巡上都途经缙阳山附近之所见。诗中所谓“岁供内膳”可能始自元仁宗时期。据文献记载，元仁宗继位后曾驻跸香水园，真大道掌教向其进献当地水果、粮食，这些特产深得皇帝喜欢，遂为常年奉祀。按胡庆云《天成观碑》记载：“真人进仙原之果，嘉禾之饭，帝喜食之。厥后，岁以为常奉。”[③]真人，疑指掌教张清志。另外，神峰乡地区还应设有官园，即具有官田性质的瓜果种植园。据《元史》记载，至顺三年（1332 年）元文宗“以车坊官园赐伯颜”[④]。车坊为缙阳山南麓附近驻跸处，即今延庆区车坊村，在旧县村东 1 里。

经过比较发现，明代“永宁八景”之一“苗乡秋稔”是永乐时期永宁县恢复人口、农耕劳作的鲜明写照。赵玨《苗乡秋稔》诗云：“墟落山之阳，风景类盘古。泉甘土壤肥，偏宜播百谷。白雨足春耕，黄云卷秋熟。家家涤场饮，含哺歌鼓腹。”[⑤]该诗创作于赵玨经略永宁县时期，即永乐十三年至十五年期间。从诗中可以了解到，永宁县苗乡地区风和雨润，土地肥沃，适宜耕种。“苗乡”即苗乡东、西二岭，与缙阳山同脉相连。据嘉靖《隆庆志》记载：“苗乡东岭在永宁城东北十里；苗乡西岭在永宁城西北十五里。”[⑥]万历《永宁县志》“苗乡秋稔”记：“在城西北十数里外，有苗乡东西二岭，即旧

① 宋濂：《元史》卷 87《志第三十七 · 百官三》，中华书局，1976 年。

② 周伯琦：《扈从诗前后序》，《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 年。

③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④ 宋濂：《元史》卷 36《本纪第三十六 · 文宗图帖睦尔（五）》，中华书局，1976 年。

⑤ 嘉靖《隆庆志》卷 10《艺文》载赵玨《苗乡秋稔》诗，其中三句原作“嘘落山之阳”“泉□土壤肥”“家家涤埸饮”，“嘘”“埸”二字有误，“泉”“土”之间缺字。按，正德《宣府镇志》卷 9《诗》亦载此诗，作“墟落山之阳”“泉甘土壤肥”“家家涤场饮”，其意甚为明晰。嘉靖《宣府镇志》同正德《宣府镇志》记载，据此校录。

⑥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山川》，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城居民之北。”[①] 据知，此二岭即永宁县“旧城”之北山。墟落，指永宁县旧治附近的村庄，位于苗乡东、西二岭南部。这首诗反映出明代“苗乡秋稔”的地域范围覆盖了元代缙云山“沃壤”之区，而且描述的风物景观又与元代神峰乡的宜耕环境形成呼应。

综上所述，元代神峰乡是龙庆州东北部重要的粮食和瓜果产区，特别是在仁宗至惠宗时期，神峰乡的农业经营格外出众，具有承担皇室饮食供奉的特殊职能。那么，这一地区需要具备充足的农业人口、稳定的乡村布局和有效的生产管理，才能支撑起实现长期赋役输出的农业活动。同时，神峰乡距离龙庆州治数十里外，北倚缙阳山和苗乡东西二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为明代创设县治奠定了地缘基础。

永宁县因袭神峰乡初建于团山下，实际是对元代该区域传统农业经济和乡村管理的继承和发展，符合《明太宗实录》关于隆庆州、永宁县“当要冲而土宜稼穑”[②] 的客观记录，以及《国榷》所谓“地冲而腴”[③] 的高度概括。

由此推论，明代创设永宁县的重要目的在于利用并扩大本地农业生产优势以实行屯田，为附近屯戍卫所提供必要的补给保障，从而减少田赋转输造成的成本和损耗。

## （二）永宁县旧治地望

文献将明代永宁县的旧治地望记作“团山下”，实际地点即今旧县村。

其一，“旧县”即旧永宁县，该称呼始于宣德六年永宁县移治以后。根据上文分析，永宁地区在辽金元时期并未设立县级治所，因此没有称作“县”的历史建置环境。那么，“旧县”作为一个相对概念应最早产生于明代，进一步讲是在宣德六年永宁县徙治永宁城以后，县治旧驻地方遂有“旧县”之称。按万历《永宁县志》记载：“旧县城在县城西北十五里。”[④] 卷之一《八景》“苗乡秋稔”记：“在城西北十数里外，有苗乡东西二岭，即旧城居民之北。”[⑤] 其中，旧县城、旧城指永宁县旧治，城、县城指永宁城。永宁县旧治在永宁城西北十五里，其地紧邻团山，二者相对于永宁城的方位、里程几乎是一致的。永宁县移治以后，位于旧治地方的民堡因以“旧县”为名。按嘉靖《隆庆志》永宁县属堡包括：“旧县屯堡、米粮屯堡、花园屯堡、吕庄屯堡。”[⑥] 因有“旧县屯堡”延续存在，所以“旧县”之名能够一直传用至今。那么，符合这一沿革经历和地望特征的村落只有今旧县村一例，亦即明代永宁县旧治所在。

---

①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 1《八景》，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② 《明太宗实录》卷 14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③ 谈迁：《国榷》卷 16，中华书局，1988 年。

④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 1《民堡》，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⑤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 1《八景》，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⑥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6《屯堡》，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其二，“旧县”有团山、顺风二屯附郭。根据嘉靖《隆庆志·隅屯》记载：“隅屯即乡都之制也。本州‘里’分在城者为隅，在乡者为屯。”[①]里，是明代赋役单元，原则上以 110 户编制一里。按嘉靖《隆庆志》、万历《永宁县志》统计，隆庆州实际编户十四里，其中四里附郭（称四隅），其余十里（屯）分布在乡；永宁县编户五里，称五屯（或五屯堡），即终食屯、团山屯、顺风屯、米粮屯、花园屯。永宁县移治以后，终食屯附郭永宁城，其余四屯均在乡落。按照上述分布规律，即所有隅屯只有附郭和乡落两种形式，可以推知永宁县的五个屯堡必然存在附郭旧治者。根据文献记载[②]，米粮屯（今米粮屯村）“在永宁城西北二十里”，花园屯（今古城村）“在永宁城西北三十里”，终食屯附郭永宁城（今永宁古城），此三者地望因不在永宁旧治，可排除。唯有团山、顺风二屯皆“在永宁城西北十五里”，是知此二屯附郭永宁县旧治，其地在今旧县村。

其三，“旧县”在清代逐渐成为团山、顺风二屯的总称或泛称，清末民国时期转而成为正式村名。从文献记载看，虽然明代旧县屯堡与团山、顺风二屯地缘一致，但是各自仍然保持独立身份。例如，嘉靖《宣府镇志·城堡考》[③]东路永宁城属堡，将旧县、顺风、团山三个城堡分别记录。万历《永宁县志》[④]亦将团山屯、顺风屯记于“五屯堡”条目之下，又将旧县城记于“民堡”条目之下，说明旧县（民堡）与团山、顺风（屯堡）的基本属性仍有一定区别，而且三者在明代后期尚未融合为一处村落。

清代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据乾隆《宣化府志》[⑤]记载，延庆州东路村庄总计 58 个，全部统计中没有出现以旧县为名的村落，而且团山、顺风二屯合并记作“团顺屯”，系因三者地缘一致，故按一处村庄统计。又据光绪《延庆州志》[⑥]所列东路村庄名目，分别记有团山屯、顺风屯，未记旧县村，而且团顺二屯的“四至、八到”记载完全相同。四至记：“东至车房一里，南至团山三里，西至米粮屯五里，北至黄峪口十里。”八到记：“东南至孟官屯五里，西南至大百老五里，东北至阎家庄三里，西北至李家窑七里。”然而邻近村庄却以“旧县（村）”标注方位里程。例如，阎家庄（今阎家庄村）记：“南至旧县三里。”车房屯（今车坊村）记：“西至旧县村一里。”均与实际地望相符。说明在清乾隆时期或更早时期，旧县村可能就与团顺二屯合并，但“旧县”之名仍有所保留。

清末民国时期“旧县”最终取代了团山屯、顺风屯成为正式村名并沿用至今。按清

---

①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隅屯》，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②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隅屯》，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③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 11《城堡考》，成文出版社，1970 年。

④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 1《屯堡》，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⑤ 王者辅：（乾隆）《宣化府志》卷 10《乡都户口》，成文出版社，1968 年。

⑥ 屠秉懿、胡振书、张惇德：（光绪）《延庆州志》卷 2《舆地志·村镇表》，《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 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

末《延庆州乡土志要略》[①] 东区村落唯见“旧县”村名，同时历史沿革一处按语又称：“旧县系团山屯、顺风屯之总称。”[②] 民国《察哈尔省通志》[③] 延庆县村庄统计亦将“旧县”作为正式村名。此时，团山屯、顺风屯遂成为历史旧称淡出文献记载和民间流传，甚至罕为今人所知。

## 三、宣德时期永宁城垣筑立与县治徙建

### （一）永宁县无城时间考

宣德五年以前，永宁县治、永宁卫治没有城防设施。据嘉靖《隆庆志·建置》永宁县记：“永乐十一年诏复置县，取《书》‘其宁惟永’之义为名。迁民以实之，编户五里，隶隆庆州。十三年设永宁卫。旧治团山下，宣德五年城灰岭，移县及卫治于此。”[④]《城池》记：“永宁县旧治团山下，无城。”[⑤] 所谓“无城”应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永宁县在驻治团山时期（永乐十三年至宣德五年）自身不曾修筑城池，文献也没有相关筑城记载。而且，团山及其附近地区在前代因无县级治所设立，亦无可以利用的早期城址。所以永宁县一直缺少城垣依托，文献仅以“团山下”作为这一时期的县治地理坐标。宣德五年以后，县治移驻地点更无早期建置可循，故以灰岭（地名）作为营建永宁城的地理坐标。

另一方面是在宣德五年以前，永宁卫没有营建军城。据《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记载，永宁卫有两次设置，初设于洪武十二年九月[⑥]，属北平都指挥使司，卫治驻地应在今延庆地区，确址及相关沿革失考。永宁县创建以后，永乐十四年十二月永宁卫再次设置，卫治附县郭，驻今旧县村。按嘉靖《宣府镇志》记：“永乐十三年……置永宁卫，附县郭。”[⑦] 设置年代说法有误，应作永乐十四年。按《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丙子，设永宁卫以统屯戍口北长安岭等处刑徒。”[⑧] 此外，天顺《大明一统志》永宁

---

① 佚名：《延庆州乡土志要略·地理》，据稿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② 佚名：《延庆州乡土志要略·历史》，据稿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③ 宋哲元、梁建章：《察哈尔省通志》卷 12《户籍编之二·延庆县》，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铅印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④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建置》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⑤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城池》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⑥ 按，《明太祖实录》永乐十二年九月“丙辰，置北平永宁卫指挥使司，及古北口守御千户所”。《明太祖实录》卷 12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⑦ 孙世芳：（嘉靖）《宣府镇志》卷 1《制置考》，成文出版社，1970 年。

⑧ 《明太宗实录》卷 1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卫公署记："在永宁县治西，永乐十五年建。"[①] 景泰《寰宇通志》记载相同，永乐十五年是指永宁卫公署建筑建立时间。由此可知，永乐十四年至宣德五年期间，永宁县、永宁卫的治所地望一致，因而嘉靖《隆庆志》的《建置》将二者的沿革经历进行整合表述。二者既然为附郭关系，那么，这一时期的永宁县"无城"也就等同于永宁卫"无城"。

上述认识可以从文献记载中获得证实。据《明宣宗实录》记载，早在宣德元年六月庚午，阳武侯薛禄就在备边奏报中首次指出："天寿山后别无城池围护，虽有永宁卫在东北山下，且无城堡。而隆庆州正在山后，旧城尚有，修葺颇易。"进而提出"请移永宁卫于隆庆州城中守护"的建议[②]。实际上，这项议案并未得到实践，永宁卫也没有移治隆庆州城。宣德五年三月丙寅，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等又奏："永宁卫、永宁县皆在平川，又有隆庆卫军相杂屯住，旧无城垣可依。县北有地，若筑城缓急可保。"但是明宣宗则以"边城当筑，但时当耕种，未可妨之"将此议暂时搁置[③]。直至宣德五年夏四月丙子，薛禄再次奏报："永宁卫团山及雕鹗、赤城、云州、独石四站最为紧要，应筑城堡，当用夫匠五万人，人赍两月粮，防护官军用万人，医者二十人。"[④] 朝廷才最终批准了这项议案。

可见，宣德五年四月以前，延庆地区兼具防御和设治功能的城池仅有隆庆州城一座。驻治团山下的永宁县、永宁卫既无早期城垣可用，也未曾新筑城堡。那么，《明史》记永宁（县）"本永宁卫，洪武十二年九月置。永乐十二年三月置县于卫城"[⑤] 则与史不符。按，永宁县是否因循洪武时期永宁卫治地而设目前无法详考。但是，永宁县创设早于永宁卫复置，况且永宁卫在宣德五年以前尚未筑城，所以"置县于卫城"的说法着实有误，此事应发生在永宁城筑立以后，即宣德六年永宁县徙治永宁城。

值得说明的是，旧县屯堡的城垣修筑年代应不早于宣德五年，并且不晚于嘉靖时期。今旧县村城址即明代旧县屯堡，据资料显示[⑥]，城址东西长约 250、南北宽约 180 米，占地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现存城墙约 30 米。此前未做发掘，文化堆积不详，城内尚有少量明清时期建筑、石雕、碑刻等。按前述分析，宣德五年以前，永宁县治、永宁卫治尚无城防设施。同时，永宁城也未在团山附近选址。那么，旧县屯堡的城垣筑立年代应晚于宣德五年。至于修筑年代下限，应不晚于嘉靖时期。据嘉靖《隆庆志》记

---

① 李贤：（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5《隆庆州》，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

② 《明宣宗实录》卷 18，"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③ 《明宣宗实录》卷 6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④ 《明宣宗实录》卷 6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⑤ 《明史》卷 40《志第十六 · 地理一》，中华书局，1974 年。

⑥ 延庆区文物资料档案、《北京考古志 · 延庆卷》等相关遗址资料。宋大川、盛会莲：《北京考古志 · 延庆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载："本州境内，军民杂处，屯营星散，其周以垣墉而为堡者仅数处。"[1] 嘉靖十六年后为防御蒙古军队入境攻扰，隆庆、永宁地区的筑堡数量骤增至 130 余处。其中，旧县屯堡隶属永宁县，且为永宁县旧治所在，地位特殊，因此推测在嘉靖时期以前就已筑堡，或者最晚不超过嘉靖十六年前后的集中筑堡阶段。

## （二）永宁城筑立时间考

宣德五年四至六月，阳武侯薛禄等督理永宁城筑立。八月，丰城侯李贤等督理城垣修缮。

其一，宣德五年四月丙子，筑城议案获得朝廷批准。戊寅，永宁卫团山与雕鹗、赤城、云州、独石四站城堡的筑建工作正式启动。按《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四月："戊寅，命阳武侯薛禄、丰城侯李贤等率师筑赤城等处城堡。"[2] 其中，永宁城的营建地点在卫治（县治）东南十五里处，其地旧称灰岭。城垣周长六里有余，规模超过当时的隆庆州城（周四里一百三十步）。按嘉靖《隆庆志・建置》记："宣德五年城灰岭，移县及卫治于此。"[3]《城池》记："宣德五年三月，侯薛禄奉命统兵至境，相地筑建于今所。周围六里十三步。"[4] 宣德五年三月系误记，其时薛禄尚未领命筑城。万历《永宁县志》薛禄记："（宣德）五年三月，奉命统兵至永宁，相地筑城池自公始。"[5] 时间亦误。相地，即勘察地理形势。

从上文分析可知，嘉靖《隆庆志》、万历《永宁县志》对永宁城筑建时间记载失实，而且内容粗略，故而不足为证，需另择文献以做考察。

宣德五年六月中旬阳武侯薛禄等督理永宁城筑竣。据查，民国《察哈尔省通志》载《敕赐显化禅寺之碑》，碑文系明代礼部尚书胡濙所撰，记："宣德五年春正月，宣宗皇帝以永宁为口外要地，特敕内官谷春，同太监祁三保、都指挥韩镇、指挥张华、陈震，领在京神机等营官军往彼镇守。初驻独山，后缘无城垣保障，具奏。本年六月，钦蒙遣总兵官阳武侯薛禄等，统领官军至地名灰岭，筑立土城。被雨水倾损，复以石包修完固。"[6] 据知，宣德五年六月永宁城筑立完工，后因雨水损坏而亦有修治。

又查《明宣宗实录》薛禄传记："（宣德）五年春，复佩镇朔大将军印，巡边至凤凰

---

①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6《屯堡》，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② 《明宣宗实录》卷 6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

③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建置》，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④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1《城池》，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⑤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卷 4《秩官志》，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⑥ 宋哲元、梁建章：《察哈尔省通志》卷 21《户籍编之十一・艺文》，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铅印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岭，遇虏逆战，斩其渠寇，尽收其家口、孳畜，升太保。居三月，奉命城永宁、赤城、独石，皆从禄所言也。……其董筑城之役，竣事将归，以疾闻。上遣中官以御医往视，且赐敕谕劳。至京，犹力疾入见。”[①] 是知薛禄督理“筑城之役”当在“升太保”过后的三个月左右。而且，永宁城筑立于薛禄抱疾之前。

据《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三月：“丙辰，总兵官阳武侯薛禄等奏，二月二十日兵至凤凰岭，遇虏寇，击之。……上嘉禄功，进禄太保。”[②] 说明凤凰岭（又作奇黄岭）战事发生在二月下旬。此后，薛禄于三月丙辰加封太保。由此推知永宁、赤城、独石等城在五六月间动工修筑。又据《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六月：“壬辰，副总兵丰城侯李贤等奏，总兵官阳武侯薛禄有疾。上谓侍臣曰：‘禄孜孜奉国，虽老犹尽心边事。’遂命中官金满，同御医沈以潜以药驰往视之。仍赐敕劳问。”[③] 此记载与薛禄传“上遣中官以御医往视”吻合。由是可知，永宁城应于宣德五年六月壬辰以前初筑完工。

需要指出的是，《明宣宗实录》等文献没有确切说明永宁城竣工的具体日期，不过在薛禄患病之前，仍有两条记录值得分析。一条是在六月癸酉（初四日）、乙亥（初六日）之际，记：“初筑独石、云州、赤城、雕鹗城堡完。”[④] 此系由北向南表述已完工的城堡，这与议筑永宁卫团山、雕鹗、赤城、云州、独石城堡的顺序截然相反，而且唯独不提永宁城完工，说明这些城堡的营建过程很可能是由北向南、从外缘向内地依次筑立的。换言之，雕鹗堡筑成之时，永宁城应尚未竣工。另一条是六月戊子（十九日），记：“修筑直隶隆庆州城时，阳武侯薛禄言：‘隆庆城周围四里，年久颓坏。用人四万，五日可完。请就以官军修理。’上从之。”[⑤] 修筑颓坏的隆庆州城在前述议案中并未提及，与新筑永宁城相比，显然是次要任务。“请就以官军修理”表明不需额外调派人力，推知其来源应属筑立永宁城之官军。那么，修理州城当在永宁城竣工之后实施。

由此判断，永宁城的筑立时间略晚于其他四堡，初筑完成日期是在宣德五年六月中旬，即癸酉至戊子期间。此后，薛禄请调筑城军队继续修理隆庆州城。

其二，宣德五年八月丰城侯李贤等督理永宁城修缮。当年七月下旬，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病逝，朝廷因此任命丰城侯李贤等人接替其职，督理城垣修缮事宜。按《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八月：“丙子，命丰城侯李贤、奉化伯滕定往来永宁卫、隆庆州提督修理城垣。”[⑥] 据前述，当年六月永宁城已初筑竣工，此后隆庆州城亦经修治，那么，为何八月再次修理这两处城垣？

---

① 《明宣宗实录》卷68，“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② 《明宣宗实录》卷6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③ 《明宣宗实录》卷6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④ 《明宣宗实录》卷6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⑤ 《明宣宗实录》卷6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⑥ 《明宣宗实录》卷6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筑城时机不当，恰逢夏季淫雨，导致土筑城垣严重受损。按《敕赐显化禅寺之碑》记："(永宁城）被雨水倾损，复以石包修完固。"[①] 倾损，即墙体倾倒损坏。推知隆庆州城垣亦因雨灾而损坏。实际上，雨灾对永宁城垣造成的影响在宣德六年更为严重，墙体崩裂竟有七十余处。按《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九月戊寅条下记载："守御永宁等处都指挥韩镇奏，永宁卫城因雨颓裂者七十余处，请以附近军民修筑。从之。命副总兵都督方政董其役。"[②]

另一方面，副总兵官丰城侯李贤在筑立城堡时督建落实不利，有敷衍之嫌，导致部分新建设施旋即损坏。按《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八月辛巳条下记载："修独石新城等处烟墩时，开平备御都指挥唐铭奏，独石新城及长宁、平戎二处烟墩损坏。上曰：'此皆丰城侯李贤等用工苟且。'时贤等往筑永宁、隆庆城，遂降敕责之。且命二城工毕，仍往独石修筑，务极完固，以盖前愆。"[③] 据此而言，修筑永宁、隆庆城垣的建设工程本身存在纰漏，墙体坚固程度令人担忧，加之淫雨侵蚀使其质量问题暴露显现，故而在雨季之后，朝廷再次遣官修缮整治。

八月下旬开始修缮永宁城垣，结束日期未详，应不晚于九月。按《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八月："乙未，上谕行在工部曰：'丰城侯李贤方修永宁城，俟其工毕，就令率军夫往各关口，相地势筑塞。'"[④] 乙未，即二十七日。九月上旬以后，永宁城之公廨、军营等开始筹建，据此推测城垣修缮应已结束。按《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九月："丙午，行在后军都督佥事沈清言：'永宁卫城临边地，公廨、军营俱未建。士卒散处，城池空虚。请令都指挥韩镇督永作之，以便守备。仍令副总兵都督方政董其事。'从之。"[⑤]

## （三）永宁县徙治时间考

宣德五年九月至宣德六年，永宁卫、隆庆左卫、永宁县渐次移治永宁城。上述两卫一县的移治年代大致在宣德五六年之间，具体过程和迁移时间在文献中没有详细说明。同时，文献所记年代实际是指各公署建筑在永宁城中的建立时间。一般而言，公署建立意味着治所已经迁移或即将迁移，二者在时间上相对接近。因此，权且以公署建立时间作为两卫一县移治标志，按纪年顺序说明如下。

宣德五年徙建永宁卫治。按嘉靖《隆庆志》记："永宁卫治，在永宁城西门内，宣

---

① 宋哲元、梁建章：《察哈尔省通志》卷21《户籍编之十一·艺文》，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铅印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② 《明宣宗实录》卷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③ 《 明宣宗实录》卷68，"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④ 《明宣宗实录》卷6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⑤ 《明宣宗实录》卷7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德五年建。”[1] 正德《宣府镇志》记：“永宁卫，在西门内，宣德五年建。”[2] 嘉靖《宣府镇志》、万历《永宁县志》同记。又按上述《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九月丙午记载推知，永宁卫治建立时间应在九月丙午以后。

宣德六年徙建永宁县治。按嘉靖《隆庆志》记：“永宁县治，在永宁城东北隅，宣德六年知县刘睿创建。”[3] 正德《宣府镇志》记：“永宁县，在东门内，宣德六年建。”[4] 嘉靖《宣府镇志》、万历《永宁县志》同记。

宣德六年徙建隆庆左卫治。按嘉靖《隆庆志》记：“隆庆左卫治，在永宁城东南隅，宣德六年建。”[5] 正德《宣府镇志》记：“隆庆左卫，在城东南隅，宣德六年建。”[6] 嘉靖《宣府镇志》、万历《永宁县志》同记。

永宁地区切近京师且路通边塞，实为隆庆州东部的要冲之地。宣德五年以前，永宁地区人口恢复，建设初兴。同时，永宁卫附郭县治，正当陵寝背后，防护职责尤其紧要，致使县域发展一开始就侧重于军事守御。

宣德五年以后，因宣镇防务形势发生变化，永宁地区的军事形态被重新定义，先有隆庆左卫调驻永宁以充实守御，继而筑立永宁城作为两卫一县建置保障。特别是薛禄既没有在永宁县、卫原址筑城，也未采纳总兵官谭广所谓“县北有地，若筑城缓急可保”的权宜方案，而是将防戍重心调整到永宁东南部地区，一举确立了永宁城防护南山、拱卫陵寝的战略地位，具有深远影响。此后，永宁城在成化时期先驻宣镇东路参将，嘉靖时期又驻宣镇副总兵官，遂为宣镇东部屏捍京师的最后一处战略要地和防御枢纽。正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评价的那样，永宁城“后当北山之冲，前为南山之障，虽近腹里，而其所翰蔽则甚重焉”[7]。

在军事主导的作用下，宣德六年永宁县完成县治迁移，虽然实现了城垣防护从无到有的转变，但是城郭内外留给永宁县的发展空间却是极为有限的，县域因卫所屯聚而挤占殆尽，最终呈现出地狭民寡的特殊现象。因此，迄至万历时期，《永宁县志》纂修者如是陈述：“志因县作，城虽以县名，然四面俱属永、延二卫。附郭民居止西北一短巷耳，外辖五屯，方圜十余里，人丁一千有奇。倘自志县事，微渺不足称矣。”[8] 由此反映出明代晚期永宁地区军、政发展的不平衡性仍未打破，为清初（顺治十六年）裁撤永宁县归并延庆州埋下了伏笔。

---

①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2《官署》，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② 王崇献：（正德）《宣府镇志》卷 2《公署》，线装书局，2003 年。

③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2《官署》，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④ 王崇献：（正德）《宣府镇志》卷 2《公署》，线装书局，2003 年。

⑤ 谢庭桂、苏乾：（嘉靖）《隆庆志》卷 2《官署》，上海古籍书店，1962 年。

⑥ 王崇献：（正德）《宣府镇志》卷 2《公署》，线装书局，2003 年。

⑦ 杨时宁：（万历）《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玄览堂丛书》第二十一册，台湾大学图书馆藏。

⑧ 李体严、张士科：（万历）《永宁县志・修志凡例》，据明刻本影印，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

## 四、结　　语

本文从两大方面研究了明代永宁县的政区建置，梳理了永乐时期初建永宁县的背景和地望，宣德时期永宁城垣筑立与县治徙建等问题，并且获得如下结论。其一，永宁县肇自明朝永乐十二年，其地在辽金元时期不存在县级建制，系以基层乡村组织形式从属上级州县政区。明代永宁县的建置因袭对象是元代龙庆州之神峰乡，该地区具有良好的农业环境和经营基础，成为永乐时期继设永宁县的重要成因。其二，永宁县的旧治地望在今旧县村。“旧县”即旧永宁县，该称呼始于宣德六年永宁县移治以后，位于旧治地方的民堡因以“旧县”为名。“旧县”有团山、顺风二屯附郭。“旧县”在清代成为团山、顺风二屯的总称或泛称，清末民国时期成为正式村名。其三，宣德五年四月以前，延庆地区兼具防御和设治功能的城池仅有隆庆州城一座。驻治团山下的永宁县、永宁卫既无早期城垣可用，也未曾新筑城堡。旧县屯堡的城垣修筑年代应不早于宣德五年，并且不晚于嘉靖时期。其四，永宁城选址于永宁东南部地区，具有防护南山、拱卫陵寝的重要战略地位。其修筑时间应略晚于独石、云州、赤城、雕鹗城堡，筑竣于宣德五年六月中旬。但因筑城时机不当，督建落实不利，永宁城垣新筑即损，当年八九月间再行修缮。其五，宣德六年永宁县移治永宁城，实现了城垣防护从无到有的转变。此后，县域空间被永宁卫、隆庆左卫屯占而压缩，呈现地狭民寡的最终现象。

##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Yongning Xian (永宁县)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Boxuan

**Abstract:** Yongning Xian (永宁县) is the only county under Longqing Zhou (隆庆州) (Yanqing Zhou 延庆州) in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Yongning Xian (永宁县)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lo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wall, and with critical examin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text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process of the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 of Yongning (永宁) area from the Liao, J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clarifies the time, location and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Yongning Xian (永宁县) governance. This study also reveals the reason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Yongning city wall. Further revealed in this study is: ① Yongning Xian (永宁县)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Shenfeng Xiang (神峰乡), which is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Longqing

Zhou (龙庆州) in the Yuan Dynasty; ② Jiuxian Cun (旧县村) is the first government residence of Yongning Xian (永宁县) in the Ming Dynasty; ③ The wall of Jiuxiantun Pu (旧县屯堡) was possibly built not earlier than Xuan De 5th year (1430 AD), and the Yongning city wall was built in mid-June of Xuan De 5th year (1430 AD); ④ In the Xuan De 6th year (1431 AD), the government residence of Yongning Xian (永宁县) moved to Yongning city.

**Keywords:** Yongning Xian (永宁县); Jiuxian (旧县); Yongning (永宁) city; Jinshan Xian (缙山县); Shenfeng Xiang (神峰乡)

# 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人群古遗传学初探

A. B. 帕列科夫[1] 著 特尔巴依尔[2] 译

（1. 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俄罗斯圣彼得堡市；
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28）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各研究组对米努辛斯克盆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和哈卡斯共和国）青铜时代墓葬材料所进行的古基因学初步研究结果。这一分析结果是通过比较古代人的全基因组和单亲遗传标记数据（线粒体和Y染色体）方法获得。其结果显示，在青铜时代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居住人群定期交替，说明当时的人群迁徙活动比较频繁。这一时期（阿凡纳谢沃、奥库涅夫、安德罗诺沃）的考古学文化表明当时此地涌入大规模新人群并且几乎完全取代了之前居民。没有系统性的证据表明人群被同化并融入文化共同体。对青铜时代晚期遗存的分析过少，是目前最为困难的情况。

**关键词：**米努辛斯克盆地 叶尼塞河中游 古遗传学 阿凡纳谢沃文化 奥库涅夫文化 安德罗诺沃（皮德罗夫斯卡亚）文化 青铜晚期

近十年来人类基因组学的研究发生了真正的改革。随着研究方法的简化和普及，不仅可以大规模分析现代人群的标本，同时也可以分析古代人群的标本。这些科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够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客观的角度正确看待已确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连续性问题，这种方法为解决古代人群的起源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数据。材料的积累，为描述不同时期人群迁徙的全貌提供了可能性，这能大大促进我们对古代人群构成的了解。最终随着客观数据的发布，在长期存在的本土说和外来说之间取得一个标准。古遗传学能够解决更广泛和具体的问题，如人类遗存的性别确定、亲属关系、人体表型学特征（如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及其他更多问题①。目前，古遗传学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并且在其发展的几十年中，所使用的方法也经过了很长的发展道路。目前的情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小组所做的研究方向不同，总

---

① Пилипенко А. С. Палеогенетика человека // Вавиловский журнал генетики и селекции. 2013.Т. 17, №4/2. С. 957-971.

结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大型研究机构会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直至对古代人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没有强大的实验室和分析基础的研究人员，主要依靠单亲遗传标记的分析（线粒体和 Y 染色体）。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古遗传学存在一些严峻的问题，如古 DNA 的降解和现代样本对古 DNA 的污染，应对这些现象的方法日新月异，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为之甚远。

本文将尝试总结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有关古代人群的首次发表的古遗传学研究数据。大多数研究是在国外古遗传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致力于研究整个欧亚草原，但并不是以取得叶尼塞河中游考古数据为主要工作。其结果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采集了大量的数据后，只取得了少量的科研成果，本文对现有的材料进行梳理，并与现代考古学概念进行讨论。

# 一、材料和方法

目前有四个科研小组正在对我们所关注地区的遗传学材料进行研究。其中第一个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大卫·里奇（David Rrich）领导的研究团队。他们的工作主要致力于南亚和中亚（主要是印度）人口遗传学的形成[①]。在研究过程中为了确立欧亚草原带的概念，他们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提取了研究标本，其中包括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纳谢沃和安德罗诺沃（费德罗夫）等文化，共计检测了 31 个标本。

第二个大型的研究是由艾瑞克·维乐斯利弗（Eric Willerslev）领导的来自哥本哈根大学（丹麦）地球遗传学中心进行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铜时代欧亚人群遗传学方面的科学论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三篇文章涉及阿凡纳谢沃和奥

① Narasimhan V., Patterson N., Moorjani P., Lazaridis I., Mark L., Mallick S., Rohland N., Bernardos R., Kim A., Nakatsuka N., Olalde I., Coppa A., Mallory J., Moiseyev V., Monge J., Olivieri L., Adamski N., Broomandkhoshbacht N., Candilio F., Cheronet O., Culleton B., Ferry M., Fernandes D., Gamarra B., Gaudio D., Hajdinjak M., Harney E., Harper T., Keating D., Lawson A-M., Michel M., Novak M., Oppenheimer J., Rai N., Sirak K., Slon V., Stewardson K., Zhang Z., Akhatov G., Bagashev A., Baitanayev B, Bonora G., Chikisheva T., Derevianko A., Enshin D., Douka K., Dubova N., Epimakhov A., Freilich S., Fuller D., Goryachev A., Gromov A., Hanks B., Judd M., Kazizov E., Khokhlov A., Kitov E., Kupriyanova E., Kuznetsov P., Luiselli D., Maksudov F., Meiklejohn C., Merrett D., Micheli R., Mochalov O., Muhammed Z., Mustafakulov S., Nayak A., Rykun M., Pettner D., Potts R., Razhev D., Sarno S., Sikhymbaevae K., Slepchenko S., Stepanova N., Svyatko S., Vasilyev S., Vidale M., Voyakin D., Yermolayeva A., Zubova A., Shinde V., Lalueza-Fox C., Meyer M., Anthony D., Boivin N., Thangaraj K., Kennett D., Frachetti M., Pinhasi R., Reich D. 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preprint) // bioRxiv, Posted March 31, 2018 https://doi.org/10.1101/292581.

库涅夫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米努辛斯克盆地晚期青铜时代材料[①]。总体而言，所研究地区提取了 29 个古代人群的材料进行了研究。

第三个是由克里斯蒂娜・凯泽（Christine Keyser）（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领导的法国和俄罗斯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进行的一系列直接针对米努辛斯克盆地古代人群的基因组的研究[②]。他们的研究涵盖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整个地层的 33 个研究标本。

第四个主要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学者组成（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细

---

① Allentoft M. E., Sikora M., Sjögren K. G., Rasmussen S., Rasmussen M., Stenderup J., Damgaard P. B., Schroeder H., Ahlström T., Vinner L., a-Sapfo Malaspinas A-S, Margaryan A., Higham T., Chivall D., Lynnerup N., Harvig L., Baron J., Casa Ph D., Dąbrowski P., Duffy P. R., Ebel A. V., Epimakhov A., Frei K., Furmanek M., Gralak T., Gromov A., Gronkiewicz S., Grupe G., Hajdu T., Jarysz R., Khartanovich V., Khokhlov A., Kiss V., Kolář J., Kriiska A., Lasak I., Longhi C., McGlynn G., Merkevicius A., Merkyte I., Metspalu M., Mkrtchyan R., Moiseyev V., Paja L., Pálfi G., Pokutta D., Pospieszny Ł., Price T. D., Saag L., Sablin M., Shishlina N., Smrčka V., Soenov V. I., Szeverényi V., Tóth G., Trifanova S. V., Varul L., Vicze M., Yepiskoposyan L., Zhitenev V., Orlando L., Sicheritz Pontén T., Brunak S., Nielsen R., Kristiansen K., Willerslev E. Population genomics of Bronse Age Eurasia // Nature: The intern. weekly journ. of sciens. 11 June 2015. Vol. 522. № 7555. // Rasmussen S., Allentoft M. E., Nielsen K., Orlando L., Sikora M., Sjögren K-G., Pedersen A. G., Schubert M., Van Dam A., Moliin C., Kapel O., Nielsen H. B., Brunak S., Avetisyan P., Epimakhov A., Khalyapin M. Vi., Gnuni A., Kriiska A., Lasak I., Metspalu M., Moiseyev V., Gromov A., Pokutta D., Saag L., Varul L., Yepiskoposyan L., Sicheritz-Pontén T., Foley R. A., Lahr M. M., Nielsen R., Kristiansen K., Willerslev E. Early Divergent Strains of Yersinia pestis in Eurasia 5, 000 Years Ago // Cell. Vol. 163, Is. 3. pp. 571-582. // Damgaard P., Martiniano R., Kamm J., Moreno-Mayar J. V., Kroonen G., Peyrot M., Barjamovic G., Rasmussen S., Zacho C., Baimukhanov N., Zaibert V., Merz V., Biddanda A., Merz I., Loman V., Evdokimov V., Usmanova E., Hemphill B., Seguin-Orlando A., Yediay F. E., Ullah I., Sjögren K-G., Iversen K. H., Choin J., de la Fuente C., Ilardo M., Schroeder H., Moiseyev V., Gromov A., Polyakov A., Omura S., Senyurt S. Y., Ahmad H., McKenzie C., Margaryan A., Hameed A., Samad A., Gul N., Khokhar M. H., Goriunova O. I., Bazaliiskii V. I., Novembre J., Weber A. W., Orlando L., Allentoft M. E., Nielsen R., Kristiansen K., Sikora M., Outram A. K., Durbin R., Willerslev E. The First Horse Herders and the Impact of Early Bronze Age Steppe Expansions into Asia // Science, 2018. Vol. 360, Issue 6396. p. 1422 DOI: 10.1126/science.aar7711.

② Keyser C., Bouakaze C., Crubézy E., Nikolaev V. G., Montagnon D., Reis T., Ludes B. Ancient DNA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south Siberian Kurgan people // Human Genetics. №126 (3). pp. 395-410. // Hollard C., Zvenigorosky V., Kovalev A., Kiryushin Y., Tishkin A., Lazaretov I., Crubezy E., Ludes B., Keyser C. New genetic evidence of affin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bronze age Siberian populations //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18. №167. pp. 97-107.

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迄今为止，这一组研究成果仅以简报的形式呈现，于 2017 年在巴尔瑙尔－别洛库里哈举办的全俄罗斯考古学大会和 2019 年在奥伦堡"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与森林草原及森林草原地区文化现象：公元前 5～前 3 世纪文化互动方式"研讨会上发布，以供科学界参考[①]。该小组的研究主要是对西伯利亚及邻近地区的古遗传学的研究，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青铜时代也是他们的关注点。

所有原始的单亲遗传标记数据汇集到一个单一的数据库中，并用传统的比较、分析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表一～表四）。

**表一　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考古学遗存中提取标本的（线粒体和 Y 染色体）单倍群测定结果**

| № | 标本来源 | 刊物 | 代码 | 性别 | 线粒体 | Y 染色体 |
|---|---|---|---|---|---|---|
| 阿凡纳谢沃文化 | | | | | | |
| 1 | 阿凡纳谢沃山墓地 M14<br>Афанасьева гора мог. 14 | Narasimhan 2018 | I10564 | Ж | V1a | — |
| 2 | 阿凡纳谢沃山墓地 M15<br>Афанасьева гора мог. 15 | Narasimhan 2018 | SI3387 | М | J2a2a | R1b1a1a2a2 |
| 3 | 阿凡纳谢沃山墓地 M15<br>Афанасьева гора мог. 15 | Narasimhan 2018 | I6711 | М | J2a2a | R1b1a1a2a |
| 4 | 阿凡纳谢沃山墓地 M15<br>Афанасьева гора мог. 15 | Allentoft 2015 | RISE509 | Ж | T2c1a2 | — |
| 5 | 阿凡纳谢沃山墓地 M15<br>Афанасьева гора мог. 15 | Allentoft 2015 | RISE511 | Ж | J2a2a | — |
| 6 | 阿凡纳谢沃山墓地 M15<br>Афанасьева гора мог. 15 | Narasimhan 2018 | I6712 | М | T2c1a2 | R1b1a1a2a2 |
| 7 | 阿凡纳谢沃山墓地 M17<br>Афанасьева гора мог. 17 | Allentoft 2015 | RISE510 | Ж | J2a2a | — |
| 8 | 阿凡纳谢沃山墓地 M17<br>Афанасьева гора мог. 17 | Narasimhan 2018 | I6713 | Ж | U5a1g2 | — |
| 9 | 伊特阔勒－Ⅱ墓地，K24M1<br>Итколь Ⅱ к. 24 м. 1 | Hollard 2018 | Kaf<br>Kh19 | Ж | C | — |
| 10 | 伊特阔勒－Ⅱ墓地，K23M2<br>Итколь Ⅱ к. 23 м. 2 | Hollard 2018 | Kaf<br>Kh20 | М | C | R1b1a1a2a-L23 |
| 11 | 伊特阔勒－Ⅱ墓地，K27M1 人骨 1<br>Итколь Ⅱ к. 27 м. 1 ск. 1 | Hollard 2018 | Kaf<br>Kh21 | М | H1bv1 | R1b1a1a2a-L23 |

① Журавлев А. А., Пилипенко А. С., Молодин В. И., Папин Д. В., Поздняков Д. В., Трапезов Р. О. Генофонд мтДНК и Y-хромосомы 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федоровского) и пост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Труды Ⅴ（XXI）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в Барнауле-Белокурихе.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17. Т. Ⅲ. С. 37-40.

续表

| № | 标本来源 | 刊物 | 代码 | 性别 | 线粒体 | Y 染色体 |
|---|---|---|---|---|---|---|
| 12 | 伊特阔勒－Ⅱ墓地，K27M1 人骨 2<br>Итколь Ⅱ к. 27 м. 1 ск. 2 | Hollard 2018 | Kaf Kh22 | M | H/U | R1b1a1a2a-L23 |
| 13 | 喀拉苏克－Ⅲ墓地，K1M1 骨架 −1<br>Карасук Ⅲ к. 1 м. 1 ск. 1 | Narasimhan 2018 | I3949 | M | U5a1d2b | Q1a2 |
| 14 | 喀拉苏克－Ⅲ墓地 K1M1 人骨 2<br>Карасук Ⅲ к. 1 м. 1 ск. 2 | Narasimhan 2018 | I3950 | M | U5b2a1a | Q1a2 |
| 15 | 喀拉苏克－Ⅲ墓地 K1M1 人骨 3<br>Карасук Ⅲ к. 1 м. 1 ск. 3 | Narasimhan 2018 | I6714 | M | U5a1d2b | Q1a2 |
| 16 | 喀拉苏克－Ⅲ墓地，K1M2 骨架 −1<br>Карасук Ⅲ к. 1 м. 2 ск. 1 | Narasimhan 2018 | I3951 | Ж | U5b2a1a | — |
| 17 | 喀拉苏克－Ⅲ墓地，K1M2 骨架 −2<br>Карасук Ⅲ к. 1 м. 2 ск. 2 | Narasimhan 2018 | I3952 | M | U5a1a1 | R1b1a1a2a2 |
| 18 | 喀拉苏克－Ⅲ墓地，K1M3<br>Карасук Ⅲ к. 1 м. 3 | Narasimhan 2018 | I3388 | Ж | U5a1d2b | — |
| 19 | 喀拉苏克－Ⅲ墓地 K2M1 人骨 2<br>Карасук Ⅲ к. 2 м. 1 ск. 2 | Narasimhan 2018 | I3954 | Ж | U4b3 | — |
| 20 | 喀拉苏克－Ⅲ墓地，K2M1 骨架 −1<br>Карасук Ⅲ к. 2 м. 1 ск. 1 | Narasimhan 2018 | I6715 | Ж | U4b3 | — |
| 21 | 帕德苏哈尼哈－Ⅱ墓地，K19A<br>Подсуханиха Ⅱ к. 19А м. 1 | Narasimhan 2018 | I11112 | M | H15b1 | R1b1a1a2a2 |
| | 奥库涅夫文化 | | | | | |
| 22 | 科拉斯内卡敏墓地 K1M1<br>Красный Камень к. 1，м. 1 | Hollard 2018 | Ok Kh1 | Ж | C5 | — |
| 23 | 科拉斯内卡敏墓地 K1M3<br>Красный Камень к. 1，м. 3 | Hollard 2018 | Ok Kh2 | Ж | C5 | — |
| 24 | 科拉斯内卡敏墓地 K1M6<br>Красный Камень к. 1，м. 6 | Hollard 2018 | Ok Kh3 | Ж | H1bv1 | — |
| 25 | 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 K1M1<br>Уйбат-Чарков，к. 1 м. 1 | Hollard 2018 | Ok Kh4 | M | — | — |
| 26 | 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 K1M2<br>Уйбат-Чарков，к. 1 м. 2 | Hollard 2018 | Ok Kh5 | Ж | — | — |
| 27 | 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K. 1 M3 人骨 A<br>Уйбат-Чарков，к. 1 м. 3 ск. А | Hollard 2018 | Ok Kh6 | M | — | — |
| 28 | 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 K1M3 人骨 Б<br>Уйбат-Чарков，к. 1 м. 3 ск. Б | Hollard 2018 | Ok Kh7 | M | J | R1b1a1a2a-L23 |
| 29 | 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 K1 M6<br>Уйбат-Чарков，к. 1 м. 6 | Hollard 2018 | Ok Kh8 | M | H1bv1 | Q1b-M346 |
| 30 | 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 K1M9 人骨 A<br>Уйбат-Чарков，к. 1 м. 9 ск. А | Hollard 2018 | Ok Kh9 | Ж | A10 | — |

续表

| № | 标本来源 | 刊物 | 代码 | 性别 | 线粒体 | Y 染色体 |
|---|---|---|---|---|---|---|
| 31 | 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 K1 M11 人骨 A<br>Уйбат-Чарков，к. 1 м. 11 ск. А | Hollard 2018 | Ok Kh10 | Ж | — | — |
| 32 | 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 K1 M11 人骨 B<br>Уйбат-Чарков，к. 1 м. 11 ск. В | Hollard 2018 | Ok Kh11 | М | — | — |
| 33 | 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 K1 M12<br>Уйбат-Чарков，к. 1 м. 12 | Hollard 2018 | Ok Kh12 | М | U5 | NO1 |
| 34 | 伊特阔勒Ⅱ墓地 K14M2<br>Итколь Ⅱ，к. 14 м. 2 | Hollard 2018 | Ok Kh13 | М | H | NO1 |
| 35 | 伊特阔勒Ⅱ墓地 K14M3<br>Итколь Ⅱ，к. 14 м. 3 | Hollard 2018 | Ok Kh14 | Ж | T2a1b | |
| 36 | 伊特阔勒Ⅱ墓地 K14M5<br>Итколь Ⅱ，к. 14 м. 5 | Hollard 2018 | Ok Kh15 | М | D4b2a2a | NO1 |
| 37 | 伊特阔勒Ⅱ墓地 K14M7<br>Итколь Ⅱ，к. 14 м. 7 | Hollard 2018 | Ok Kh16 | Ж | C5 | — |
| 38 | 伊特阔勒Ⅱ墓地 K14M8<br>Итколь Ⅱ，к. 14 м. 8 | Hollard 2018 | Ok Kh17 | М | A12 | Q1b1a-L54 |
| 39 | 伊特阔勒Ⅱ墓地 K14M9<br>Итколь Ⅱ，к. 14 м. 9 | Hollard 2018 | Ok Kh18 | М | A8 | — |
| 40 | 维尔赫内阿斯克兹墓地 K1M3 人骨 1<br>Верхний Аскиз к. 1 м. 3 ск. 1 | Allentoft 2015 | RISE515 | Ж | A8a | — |
| 41 | 维尔赫内阿斯克兹墓地 K1M3 人骨 2<br>Верхний Аскиз к. 1 м. 3 ск. 2 | Allentoft 2015 | RISE516 | Ж | H6a1b | — |
| 42 | 奥库涅夫乌鲁斯墓地<br>Окунев Улус | Damgaard 2018 | RISE662 | М | H6a | Q1a2a1-L54 |
| 43 | 奥库涅夫乌鲁斯墓地<br>Окунев Улус | Damgaard 2018 | RISE664 | М | A8a1 | Q1a2a1 c -L330 |
| 44 | 维尔赫内阿斯克兹墓地 K1M22<br>Верхний Аскиз к. 1 м. 22 | Damgaard 2018 | RISE667 | Ж | A8a | |
| 45 | 维尔赫内阿斯克兹墓地 K1M4 头骨 7<br>Верхний Аскиз к. 2 м. 4 чер. 7 | Damgaard 2018 | RISE670 | М | A8a | Q1a2b-L940 |
| 46 | 维尔赫内阿斯兹墓地 K2M 头骨 3<br>Верхний Аскиз к. 2 м. 4 чер. 3 | Damgaard 2018 | RISE671 | Ж | H6a1b | — |
| 47 | 维尔赫内阿斯兹墓地 K2M8 人骨 3<br>Верхний Аскиз к. 2 м. 8 ск. 3 | Damgaard 2018 | RISE672 | М | H6a1b | Q1a2-M346 |
| 48 | 维尔赫内阿斯兹墓地 K2M9<br>Верхний Аскиз к. 2 м. 9 | Damgaard 2018 | RISE673 | М | A8a | Q1a-L472 |
| 49 | 维尔赫内阿斯兹墓地 K2M21 人骨 1<br>Верхний Аскиз к. 2 м. 21 ск. 1 | Damgaard 2018 | RISE674 | М | A ＋ 152 ＋ 16362 | Q1a2-M346 |

续表

| № | 标本来源 | 刊物 | 代码 | 性别 | 线粒体 | Y 染色体 |
|---|---|---|---|---|---|---|
| 50 | 乌依巴特－Ⅴ墓地，K1M1 人骨 1<br>Уйбат Ⅴ к. 1 м. 1 ск. 1 | Damgaard 2018 | RISE675 | M | D4 ＋ 195 | R1b1a2a2-Z2015 |
| 51 | 乌依巴特－Ⅲ墓地，K1M4<br>УйбатⅢк. 1 м. 4 | Damgaard 2018 | RISE677 | Ж | A8a1 | — |
| 52 | 乌依巴特－Ⅴ墓地，K1M1a<br>Уйбат Ⅴ к. 1 м. 1а | Damgaard 2018 | RISE680 | Ж | A ＋ 152 ＋ 16362 | — |
| 53 | 乌依巴特－Ⅴ墓地，K1M3a-5a 人骨 C<br>Уйбат Ⅴ к. 1 м. 3а-5а，ск. С | Damgaard 2018 | RISE681 | Ж | A8a1 | — |
| 54 | 乌依巴特Ⅴ墓地 K4M4 头骨 A<br>Уйбат Ⅴ к. 4 м. 4 чер. А | Damgaard 2018 | RISE683 | M | H15b1 | Q1a1b1-L712 |
| 55 | 乌依巴特Ⅴ墓地 K4M12<br>Уйбат Ⅴ к. 4 м. 12 | Damgaard 2018 | RISE684 | Ж | C5c | — |
| 56 | 乌依巴特Ⅴ墓地 K1M3a-5a 人骨 B<br>Уйбат Ⅴ к. 1 м. 3а-5а ск. В | Damgaard 2018 | RISE685 | Ж | C5c | — |
| 57 | 斯依达Ⅴ墓地，K3<br>Сыда Ⅴ，к. 3 | Damgaard 2018 | RISE718 | M | C5c | Q1a2a1 c -L330 |
| 58 | 斯依达Ⅴ墓地，K4<br>Сыда Ⅴ，к. 4 | Damgaard 2018 | RISE719 | M | C5c | Q1a2a1 c -L330 |
| 安德罗诺沃（朴德罗夫斯卡亚）文化 | | | | | | |
| 59 | 索列纳奥泽尔纳雅Ⅳ墓地 K2M3<br>Соленоозерная Ⅳ к. 1 м. 3 | Keyser 2009 | S09 | M | T1 | — |
| 60 | 索列纳奥泽尔纳雅Ⅳ墓地 K1M4<br>Соленоозерная Ⅳ к. 1 м. 4 | Keyser 2009 | S10 | M | U2e | R1a1 |
| 61 | 索列纳奥泽尔纳雅Ⅰ墓地 M4<br>Соленоозерная Ⅰ м. 4 | Keyser 2009 | S11 | Ж | T4（T2a1b1） | — |
| 62 | 索列纳奥泽尔纳雅Ⅰ墓地 M15<br>Соленоозерная Ⅰ м. 15 | Keyser 2009 | S12 | — | — | — |
| 63 | 索列纳奥泽尔纳雅Ⅳ墓地 K1M4<br>Соленоозерная Ⅳ к. 1 м. 4 | Keyser 2009 | S13 | — | H6 | — |
| 64 | 索列纳奥泽尔纳雅Ⅰ墓地 M4<br>Соленоозерная Ⅰ м. 4 | Keyser 2009 | S14 | Ж | U4 | — |
| 65 | 索列纳奥泽尔纳雅Ⅰ墓地 M29<br>Соленоозерная Ⅰ м. 29 | Keyser 2009 | S15 | — | K2b | — |
| 66 | 乌斯特－阿巴坎区（查尔斯基库尔干）<br>Усть-Абаканский район（царский курган） | Keyser 2009 | S16 | M | U5a1 | R1a1 |
| 67 | 巴特拉什洛瓦－Ⅱ墓地石圈 7<br>Потрошилово Ⅱ，ограда 7 | Narasimhan 2018 | I1853 | M | H2b | R |
| 68 | 巴特拉什洛瓦－Ⅱ墓地石圈 5M1<br>Потрошилово Ⅱ，ограда 5 мог. 1 | Narasimhan 2018 | I1821 | M | T1a1 | R1a1a1b |

续表

| № | 标本来源 | 刊物 | 代码 | 性别 | 线粒体 | Y 染色体 |
|---|---|---|---|---|---|---|
| 69 | 巴特拉什洛瓦－Ⅱ墓地石圈 5M3<br>Потрошилово Ⅱ，ограда 5 мог. 3 | Narasimhan 2018 | I1856 | М | K1a＋195 | R1a1a1b2a2a |
| 70 | 乌斯特比力Ⅳ墓地 M28<br>Устье Бири Ⅳ，мог. 28 | Narasimhan 2018 | I1851 | М | H2b34 | R1a1a1b |
| 71 | 乌斯特比力Ⅳ墓地 M26<br>Устье Бири Ⅳ，мог. 26 | Narasimhan 2018 | I1828 | Ж | K1a4b | — |
| 72 | 乌斯特比力Ⅳ墓地 M10<br>Устье Бири Ⅳ，мог. 10 | Narasimhan 2018 | I1852 | Ж | T2b | — |
| 73 | 奥拉克科尔山墓地 K39<br>Орак у Кр. Горы，к. 39 | Narasimhan 2018 | I6718 | М | U4a | R1a1a1b |
| 74 | 奥拉克墓地 M10<br>Орак погр. 10 | Narasimhan 2018 | I3390 | Ж | U5a2＋16294 | — |
| 75 | 奥拉克科尔山墓地 K38M1<br>Орк у Кр. Горы к. 38 м. 1 | Narasimhan 2018 | I3395 | Ж | T1a1 | — |
| 76 | 奥拉克墓地 M15-1<br>Орак погр. 15-1 | Narasimhan 2018 | I3389 | М | H27＋16093 | R1a1a1b |
| 77 | 奥拉克墓地 M20<br>Орак погр. 20 | Narasimhan 2018 | I3392 | М | U2e2a1d | R1a1a1b |
| 78 | 奥拉克科尔山墓地 K38M2<br>Орак у Кр. Горы к. 38 погр. 2 | Narasimhan 2018 | I3394 | М | U4a1 | R1a1a1b2a |
| 79 | 奥拉克沼泽墓地 K10<br>Орак на Болоте к. 10, | Narasimhan 2018 | I3396 | М | T2b34 | R1a1a1b1a2b1 |
| 80 | 奥拉克 M16<br>Орак погр. 16 | Narasimhan 2018 | I3391 | М | U5b2c | R1a1a1b2 |
| 81 | 奥拉克科尔山墓地 K37<br>Орак у Кр. Горы к. 37 | Narasimhan 2018 | I3393 | М | U5b2b | R1a1a1b |
| 82 | 奥拉克墓地 M15-2<br>Орак погр. 15-2 | Narasimhan 2018 | I6717 | М | T1a1 | Q1a2 |
| 83 | 维都瓦亚尔克 1926 年<br>Выдува Ярки，1926 год | Narasimhan 2018 | I6716 | Ж | W1c | — |
| | 青铜时代晚期 | | | | | |
| 84 | 乌斯特－阿巴坎区墓地 K4M1<br>Усть-Абаканский район к. 4 м. 1 | Keyser 2009 | S18 | Ж | U5a1 | — |
| 85 | 巴格拉德斯基区墓地 M1<br>Боградский район м. 1 | Keyser 2009 | S19 | Ж | U4 | — |
| 86 | 米努辛斯克墓地（波德戈尔纳）M1（6）<br>Минусинск（Подгорный）м. 1（6） | Keyser 2009 | S20 | М | — | — |

续表

| № | 标本来源 | 刊物 | 代码 | 性别 | 线粒体 | Y 染色体 |
|---|---|---|---|---|---|---|
| 87 | 萨彬卡 -2 墓地 M30<br>Сабинка 2 мог. 30 | Allentoft 2015 | RISE 493 | M | C4a1c | Q1a1b1 |
| 88 | 萨彬卡 -2 墓地 M20<br>Сабинка 2 мог. 20 | Allentoft 2015 | RISE 494 | M | I4a1 | R1a1a1 |
| 89 | 阿尔班 -1 墓地 M27<br>Арбан-1 мог. 27 | Allentoft 2015 | RISE 495 | M | D4j1 | R1a1a1b2a |
| 90 | 阿尔班 -1 墓地 M6<br>Арбан-1 мог. 6 | Allentoft 2015 | RISE 496 | Ж | U5a1a2a | — |
| 91 | 阿尔班 -1 墓地 M55<br>Арбан-1 мог. 55 | Allentoft 2015 | RISE 497 | Ж | A ＋ 152 ＋ 16362 | — |
| 92 | 比斯特拉纳雅墓地 M4<br>Быстрая мог. 4 | Allentoft 2015 | RISE 499 | Ж | H5a1 | — |
| 93 | 波德库尼斯基墓地 M2-3<br>（Подкунинский мог. 2-3） | Allentoft 2015 | RISE 502 | Ж | U5a1d | — |

**表二　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各考古学文化个体 Y 染色体单倍群分布情况对比表**

|  | R1b | Q | NO | R1a |
|---|---|---|---|---|
| 阿凡纳谢沃文化 | 8 | 3 |  |  |
| 奥库涅夫文化 | 2 | 11 | 3 |  |
| 安德罗诺沃（朴德罗夫斯基）文化 |  | 1 |  | 12 |
| 青铜时代晚期<br>喀拉苏克文化 |  | 1 |  | 2 |

**表三　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个体线粒体单倍群数量的对比表**

|  | 欧亚西部 |  |  |  |  |  |  |  | 欧亚东部 |  |  |
|---|---|---|---|---|---|---|---|---|---|---|---|
|  | I | W | V | K | J | T | U | H | C | A | D |
| 阿凡纳谢沃文化 |  |  |  |  | 4 | 2 | 9 | 3 | 2 |  |  |
| 奥库涅夫文化 |  |  |  |  | 1 | 1 | 1 | 8 | 7 | 12 | 2 |
| 安德罗诺沃文化 |  | 1 | 1 | 3 |  | 7 | 9 | 4 |  |  |  |
| 青铜时代晚期<br>喀拉苏克文化 | 1 |  |  |  |  |  | 4 | 1 | 1 | 1 | 1 |

**表四　线粒体单倍群在叶尼塞河中游阿凡纳谢沃文化墓中的分布**

| 遗存 | C | H | U | J | T | V |
|---|---|---|---|---|---|---|
| 阿凡纳谢沃山 |  |  | 1 | 4 | 2 | 1 |
| 喀拉苏克Ⅲ |  |  | 8 |  |  |  |
| 伊特阔勒Ⅱ | 2 | 2 |  |  |  |  |

# 二、遗传学结论的探讨

阿凡纳谢沃文化是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最早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分范围比较广泛，包括戈尔诺阿尔泰、蒙古国中西部以及中国西北等地区。从米努辛斯克盆地四个考古学遗存（阿凡纳谢沃山、喀拉苏克－Ⅲ、伊特阔勒－Ⅱ、帕德苏哈尼哈－Ⅱ）中提取了21个标本进行古遗传学的研究。第一项研究是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实验室进行的，他们研究的三个标本来自阿凡纳谢沃山墓地[①]。另有两个标本来自阿尔泰阿凡纳谢沃文化库尤木墓地。由于研究目标的广泛性－分析青铜时代欧亚种群的基因，因此研究中很少直接涉及西伯利亚。运用一系列复杂的数学分析方法，研究人员仅得出以下结论：所研究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颜纳亚历史文化共同体人群的遗传结构彼此之间没有区别。

以这些材料为基础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即对古代遗骸中引起鼠疫的耶尔森氏菌遗传痕迹的研究[②]。为此，从阿凡纳谢沃山墓地（巴帖尼 )M15 合葬墓中提取了三个标本，作者清点了合葬墓中发现个体数，共计发现 4 个成年人（1 具男性和 3 具女性个体）以及 3 具儿童个体。据推测，这种合葬墓可能会有包含鼠疫在内的大规模致命菌感染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长 150、深 120 厘米[③]的椭圆形竖穴，对阿凡纳谢沃文

① Allentoft M. E., Sikora M., Sjögren K. G., Rasmussen S., Rasmussen M., Stenderup J., Damgaard P. B., Schroeder H., Ahlström T., Vinner L., a-Sapfo Malaspinas A-S, Margaryan A., Higham T., Chivall D., Lynnerup N., Harvig L., Baron J., Casa Ph D., Dąbrowski P., Duffy P. R., Ebel A. V., Epimakhov A., Frei K., Furmanek M., Gralak T., Gromov A., Gronkiewicz S., Grupe G., Hajdu T., Jarysz R., Khartanovich V., Khokhlov A., Kiss V., Kolář J., Kriiska A., Lasak I., Longhi C., McGlynn G., Merkevicius A., Merkyte I., Metspalu M., Mkrtchyan R., Moiseyev V., Paja L., Pálfi G., Pokutta D., Pospieszny Ł., Price T. D., Saag L., Sablin M., Shishlina N., Smrčka V., Soenov V. I., Szeverényi V., Tóth G., Trifanova S. V., Varul L., Vicze M., Yepiskoposyan L., Zhitenev V., Orlando L., Sicheritz Pontén T., Brunak S., Nielsen R., Kristiansen K., Willerslev E. Population genomics of Bronse Age Eurasia // Nature: The intern. weekly journ. of sciens. 11 June 2015. Vol. 522. № 7555.

② Rasmussen S., Allentoft M. E., Nielsen K., Orlando L., Sikora M., Sjögren K-G., Pedersen A. G., Schubert M., Van Dam A., Moliin C., Kapel O., Nielsen H. B., Brunak S., Avetisyan P., Epimakhov A., Khalyapin M. Vi., Gnuni A., Kriiska A., Lasak I., Metspalu M., Moiseyev V., Gromov A., Pokutta D., Saag L., Varul L., Yepiskoposyan L., Sicheritz-Pontén T., Foley R. A., Lahr M. M., Nielsen R., Kristiansen K., Willerslev E. Early Divergent Strains of Yersinia pestis in Eurasia 5, 000 Years Ago // Cell. Vol. 163, Is. 3. pp. 571-582.

③ М. П. Грязнов Афанась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на Енисее.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9. 16 с.

化[①]的合葬墓而言不符传统，尽管因为墓室的尺寸等问题存在争议。但在研究过程中，3 个女性中的两个个体中发现有鼠疫耶尔森氏菌的遗传痕迹。目前这一发现是该疾病早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有力证据。

大约同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对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墓葬遗存进行了一项遗传学的研究。这些资料不久前才公布，标本包括伊特阔勒－Ⅱ号墓地 3 座墓中提取的 4 个标本。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戈尔诺－阿尔泰地区 4 个墓地的 5 座墓地材料[②]（别尔斯尤克塔墓地 -1 号墓地 1 号库尔干，提特克斯克恩－Ⅵ号墓地 95 号库尔干，萨勒德亚尔墓地 25、36 号库尔干，乔布拉克－Ⅱ号墓地 1 号库尔干）。经检测发现，所研究的三个样本的 Y 染色体数据可以将阿凡纳谢沃文化男性单倍群分类为 R1b-L23。线粒体基因组分析结果显示存在四个不同的单倍群，其中三个（U、H、R）与西欧亚人群有关，只有 1 个（C）亚洲人的成分占主导地位。这使得作者得以证实和扩充了原先根据阿凡纳谢沃全基因测序和颜纳亚历史文化共同体人群遗传特征所取得的数据库。

第三个研究在哈佛大学大卫・里奇（David. Rrich）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并在 2018 年公布，文中公布了取自阿凡纳谢沃文化不同遗存 26 个标本的新数据（14 个取自叶尼塞河中游、12 个取自戈尔诺）[③]。因此，数据库几乎增加了两倍，并考虑到实验室工作的质量，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研究的主要部分致力于现代印度境

① Вадецкая Э. Б., Поляков А. В., Степанова Н. Ф. Свод памятников афанась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Барнаул: Азбука, 2014. 300-309 с.

② Hollard C., Zvenigorosky V., Kovalev A., Kiryushin Y., Tishkin A., Lazaretov I., Crubezy E., Ludes B., Keyser C. New genetic evidence of affin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bronze age Siberian populations //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18. №167. pp. 97-107.

③ Narasimhan V., Patterson N., Moorjani P., Lazaridis I., Mark L., Mallick S., Rohland N., Bernardos R., Kim A., Nakatsuka N., Olalde I., Coppa A., Mallory J., Moiseyev V., Monge J., Olivieri L., Adamski N., Broomandkhoshbacht N., Candilio F., Cheronet O., Culleton B., Ferry M., Fernandes D., Gamarra B., Gaudio D., Hajdinjak M., Harney E., Harper T., Keating D., Lawson A-M., Michel M., Novak M., Oppenheimer J., Rai N., Sirak K., Slon V., Stewardson K., Zhang Z., Akhatov G., Bagashev A., Baitanayev B, Bonora G., Chikisheva T., Derevianko A., Enshin D., Douka K., Dubova N., Epimakhov A., Freilich S., Fuller D., Goryachev A., Gromov A., Hanks B., Judd M., Kazizov E., Khokhlov A., Kitov E., Kupriyanova E., Kuznetsov P., Luiselli D., Maksudov F., Meiklejohn C., Merrett D., Micheli R., Mochalov O., Muhammed Z., Mustafakulov S., Nayak A., Rykun M., Pettner D., Potts R., Razhev D., Sarno S., Sikhymbaevae K., Slepchenko S., Stepanova N., Svyatko S., Vasilyev S., Vidale M., Voyakin D., Yermolayeva A., Zubova A., Shinde V., Lalueza-Fox C., Meyer M., Anthony D., Boivin N., Thangaraj K., Kennett D., Frachetti M., Pinhasi R., Reich D. 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preprint) // bioRxiv, Posted March 31, 2018 https://doi.org/10.1101/292581.

内古代人口的构成，阿凡纳谢沃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涉及很少。作者对全基因组进行了一系列数学分析，使得他们能够将颜纳亚历史文化共同体（除三个样本外）和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材料合并为统一的族群，因为他们几乎完全相同。尽管已经确定了单亲遗传标记（线粒体和 Y 染色体）的数据，但仍然没有基于此得出重大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阿凡纳谢沃墓地和喀拉苏克－Ⅲ墓地内的发现，它们之间具有近亲关系。

2019 年在奥伦堡举办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区文化现象：公元前 5～前 3 世纪文化互动方式”研讨会上，А．С．皮力培恩卡（Пилипенко）与他的团队作了以《阿凡纳谢沃文化和颜纳亚历史文化共同体人群基因库相互关系》为题目的报告。他们指出，这两种文化类型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中具有明显单倍群差别的个体罕见。

另外，有必要提及从戈尔诺－阿尔泰地区各遗存中提取的一系列线粒体 DNA 测定的研究，其中包括阿凡纳谢沃文化[①]。这项研究工作与米努辛斯克盆地没有直接关系，但得考虑到早期青铜时代数据的分析。经确定，在此段的戈尔诺－阿尔泰人群的母系 70% 属于欧亚西部类型线粒体单倍群。

距今为止，据已公布的数据，来自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遗存中已有 50 个样本进行了遗传学研究（获得阳性结果），其中 21 个样本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4 个墓地）、29 个样本来自戈尔诺阿尔泰（14 个墓地）（表一）。所有研究小组的主要结论归结为，这些标本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与颜纳亚文化历史文化共同体人群研究几乎没有区别，目前已经超过 100 个标本。这两组人群的紧密联系的另一个证据早已被考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所注意[②]。而且，这个结果是以系统发育分析和单倍群遗传标记比对所获得（线粒体和 Y 染色体 DNA）。

基于这些所研究获得的数据总和，可以进行更多必要的观察。对 Y 染色体数据分

---

① Чикишева Т. А., Губина М. А. Некотор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алеоген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древне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2008. №14. С. 275-281. // Губина М. А., Воевода М. И., Ромащенко А. Г., Куликов И. В., Чикишева Т. А., Молодин В. И. Кран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характер изменения состава гаплотипов мтДНК у древне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 Труды Ⅲ(Ⅹ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ъезда. Т. Ⅱ. СПб.; М.; Великий Новгород, 2011. С. 371-372. // Губина М. А., Куликов И. В., Бабенко В. Н., Чикишева Т. А., Ромащенко А. Г., Воевода М. И., Молодин В. И. Динамика состава гаплотипов мтДНК древне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от эпохи ранней бронзы (Ⅲ тыс. до н. э.) до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Ⅱ-Ⅰ вв. до н. э.) // Генетика. 2016. Т. 52, №1. С. 106-119.

② Хохлов А. А., Солодовников К. Н., Рыкун М. П., Кравченко Г. Г., Китов Е. П. Кран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к проблеме связи популяций ямной и афанась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 Евразии начального этапа бронзового века // Вестник археолог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2016. №3 (34). С. 86-106.

析表明，已测定的 18 个标本中 15 个属于同一个组，共同的突变位点为 L23，属于单倍群 R1b（表二）。这种单倍群是颜纳亚文化男性人群的主要特征（95% 以上）。已测定的 15 个标本中，有 7 个来自戈尔诺－阿尔泰，唯一可以表明男性数据具有相似性的地方，另 8 个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从而表明阿凡纳谢沃文化两个主要分布区之间同样具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 3 个个体的 Y 染色体类型属另一组单倍群 −Q1a2。他们似乎占了该区域已测定总数的 30%，但因为其中同一座墓坑里合葬的 3 个个体为亲子关系（喀拉苏克－Ⅲ号墓地 1 号库尔干，1 号墓坑），即应把他们视为一种情况。单倍群 Q 是奥库涅夫文化的特征，不能排除这座墓葬可以说明人群间相互同化过程，同时也可以考虑最新的研究成果，喀拉苏克－Ⅲ墓地年代较晚[①]。当然，等古遗传学的测定多了情况将会变得更加清晰。

通过线粒体 DNA 数据的分析同样获得有趣的结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测定标本共计 47 个（表三）。其中 26 个来自戈尔诺－阿尔泰地区，这组测定数据以起源于欧亚西部单倍群亚型为主（U、R、J、H、K、T），欧亚东部起源的单倍群亚型仅有 2 个（Y、F）。显然其中单倍群 U（U5a、U4）亚型占主导地位，40% 左右，同时 T（T2a、T1a）和 H 也占同样的比例，其余的占比较小。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情况也与这相同。研究的 21 个标本中只有 2 个属于欧亚东部单倍群 C，剩余的部分与戈尔诺－阿尔泰相同，呈现出欧亚西部分支（U、J、H、T、V）。此外，不难看出，表三中几乎与戈尔诺－阿尔泰一样只有 2 个比较少见的单倍群（R、K）并多了一个单倍群 V。这可能是统计的标本还不够充足的结果。同样米努辛斯克盆地单倍群 U（U5、U4）的各亚型占主导地位（约占 50%），排第二位的是来自 J2a2a 等四组单倍群。

米努辛斯克盆地所统计的线粒体样本中还可以进行一个重要的分析，墓地可以按“母系”来划分。这组中只进行过三个遗存。每个遗存中都有自己的线粒体单倍群。喀拉苏克－Ⅲ号墓地只呈现出单倍群 U 的各种亚型，阿凡纳谢沃山墓地的特征型为 J2a2a（四种单倍型）和 T2c1a2（2 种单倍型），仅有一个单倍群 U。值得注意的是，阿凡纳谢沃山墓地与喀拉苏克－Ⅲ号墓地之间直线距离 12 千米，可能为邻近人群遗留的遗存。第三座遗存伊特阔勒 −11 号墓地只显示 2 个单倍群 C 和 H。这种情况下，这 3 座墓地遗存的母系相互间几乎没有相交。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阿凡纳谢沃文化内部独立氏族或家族群聚（公社）是封闭的或跨氏族婚姻现象比较少。

奥库涅夫文化：公元前 26 ~ 前 25 世纪之交，米努辛斯克盆地整个考古学遗存的面貌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可以区分存在于阿凡纳谢沃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奥库

① Лазаретов И. П. К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хронологии афанась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реднего Енисея или хорошо забытое старое // Древности Сибир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8 (20).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ГАГУ, 2017. С. 8-34.

涅夫[①]。迄今为止，对来自 8 个（科拉斯内卡敏墓地、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墓地、伊特阔勒－Ⅱ墓地、维尔赫内阿斯克兹墓地、奥库涅夫乌鲁斯墓地、乌依巴特－Ⅲ墓地、乌依巴特－Ⅴ墓地、斯依达－Ⅴ墓地）墓地的 37 个样本进行了古遗传学的研究。两个研究小组几乎同时进行了研究。斯特拉斯堡大学从科拉斯内卡敏、乌依巴特－恰尔阔夫和伊特阔勒－Ⅱ等墓地中提取 18 个标本进行了研究[②]。经检测发现，随着奥库涅夫文化的出现，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居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测定的 7 个 Y 染色体单倍群中只有一个显示父系为阿凡纳谢沃人群特征的 R1b，其余 6 个测定结果显示基本上是新的单倍群 Q 和 NO。线粒体 DNA 基因组的研究揭示了类似的情况。追溯到先前文化材料中的母系的作用明显降低，并出现了新的单倍群 A 和 D，这些单倍群传统上属于欧亚东部谱系。

第二组研究在哥本哈根进行，这组研究包括来自乌依巴特－Ⅲ、乌依巴特－Ⅴ、维尔赫内阿斯克兹、奥库涅夫乌鲁斯和斯依达－Ⅴ等墓地的 19 个样本[③]。由于在此项工作中对完整的基因组进行了研究，因此更加深入。其结果发现奥库涅夫样本中具有 10%～20% 的成分与颜纳亚－阿凡纳谢沃人群有关，这些数据是通过单亲遗传标记分析所证实的。特别是，分析 10 个样本中的 Y 染色体时 1 个属于单倍群 R1b，其余的为单倍群 Q 的各亚类。此外，作者注意到，这些信号在 X 染色体上根本不可见，奥库涅夫文化和颜纳亚－阿凡纳谢沃人群之间的关系只能在父系上可追踪，估计为 10%～20%。

总结这两组研究数据，我们可以注意一些细节。成功测定了 16 个样本的 Y 染色体单培群，其中 2 个研究组检测到的单倍群 Q 的各亚型（测定的有 11 个，约占 70%）显

---

① Максименков Г. А. Окун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МИА. 1965. №130. С. 168-174. // Максименков Г. А. Окун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д-ра ист. нау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5. 39 с. // Поляков А. В.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ые даты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Записки ИИМК РАН. СПб., 2017. №16. С. 52-74.

② Hollard C., Zvenigorosky V., Kovalev A., Kiryushin Y., Tishkin A., Lazaretov I., Crubezy E., Ludes B., Keyser C. New genetic evidence of affin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bronze age Siberian populations //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18. №167. pp. 97-107.

③ Damgaard P., Martiniano R., Kamm J., Moreno-Mayar J. V., Kroonen G., Peyrot M., Barjamovic G., Rasmussen S., Zacho C., Baimukhanov N., Zaibert V., Merz V., Biddanda A., Merz I., Loman V., Evdokimov V., Usmanova E., Hemphill B., Seguin-Orlando A., Yediay F. E., Ullah I., Sjögren K-G., Iversen K. H., Choin J., de la Fuente C., Ilardo M., Schroeder H., Moiseyev V., Gromov A., Polyakov A., Omura S., Senyurt S. Y., Ahmad H., McKenzie C., Margaryan A., Hameed A., Samad A., Gul N., Khokhar M. H., Goriunova O. I., Bazaliiskii V. I., Novembre J., Weber A. W., Orlando L., Allentoft M. E., Nielsen R., Kristiansen K., Sikora M., Outram A. K., Durbin R., Willerslev E. The First Horse Herders and the Impact of Early Bronze Age Steppe Expansions into Asia // Science, 2018. Vol. 360, Issue 6396. p. 1422 DOI: 10.1126/science.aar7711.

然占优势，它是整个奥库涅夫文化的基础。排在第二位的是罕见的单倍群 NO（测定的有 3 个，约占 18%），仅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进行的研究组被确定。因为研究个体较少，所以还不清楚它们在奥库涅夫文化中的地位。

最后，第三组呈现 2 个单倍群 R1b 样本的亚类 L23 和 Z2015。它们与颜纳亚－阿凡纳谢沃人群中所记录的样本完全相同。此外，应该指出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个体由总体和线粒体（单倍群 J 和 D 组）分出来，它们在父系和母系方面均脱离了奥库涅夫的背景。可以肯定地将它们称为“外来人”。两个研究组对它们所进行的识别工作非常重要，可大大减少样本的错误或污染的可能性。提取第一个样本的乌依巴特－Ⅴ号墓地 1 号库尔干 1 号墓室的 $^{14}C$ 测年数据为（UBA-31597 4023 ± 56）是奥库涅夫文化确定年代最早的遗存之一[①]。第二个样本是从偏洞室墓中提取的，这两座墓葬均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早期类型。总之，具有单倍群 R1b 人群的墓葬存在于奥库涅夫文化早期阶段。

对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可能融入奥库涅夫文化的阿凡纳谢沃人群的后裔，只有极少数（10% ~ 20%）融入构成新的奥库涅夫文化。这种途径看上去最简单，说明了移民对先前人口的同化过程。在这方面，唯一不清楚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是男性。据现有数据，奥库涅夫文化的形成结果是由于叶尼塞河中游出现了新的欧罗巴外貌特征的男性人群。如果他们主要将阿凡纳谢沃人群中的女性纳入自己的集体内，那将合乎逻辑，但我们观察到截然相反的情况。据 Eske Willerslev 小组研究，在全基因组研究中未观察到颜纳亚－阿凡纳谢沃类型女性输入的痕迹。

第二个解释更具有假设性。奥库涅夫文化的构成只是整个迁徙过程的一部分，其结果形成了一群相近的文化（喀拉库勒、恰霍勒、切木尔切克、萨姆斯卡娅和其他）。与广阔范围内具有相似特征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不同，这种从西到东迁徙的“第二波欧洲人”，可能具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他们具有不同的物质文化。除此之外，还可以观察到体质人类学特征上的差异。例如，图瓦恰霍勒文化个体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与奥库涅夫人群不同而与阿凡纳谢沃人群接近[②]。鉴于这些人群最有可能来源于东欧草原，因此不能排除他们其中有颜纳亚系人群的后裔，他们中保留着体质人类学形态特征和基因库。因此，基因组父系部分的 10% ~ 20% 可能与阿凡纳谢沃无关，而直接起源于颜纳亚历史文化群。

研究奥库涅夫文化母系（线粒体）的遗传标记也证实了基于完整的基因组研究结论。共计 37 个个体中成功提取 32 个个体的数据。以阿凡纳谢沃文化类型为主的情况出

---

① Поляков А. В.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ые даты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Записки ИИМК РАН. СПб., 2017.№16. С. 52-74.

② Гохман И.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й расы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палео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палео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и краниологии СССР. Л.: Наука, 1980.С. 3-34 (сб. МАЭ; т. 36).

现了显著的变化。奥库涅夫人群主要是欧亚东部系单倍群 A（12 例）、C5c（7 例）和 D4（2 例）。总体而言，他们占总数的 65% 以上。唯一保留自己特点的欧亚西部谱系单倍群 H（8 例）各亚型，其中仅有几个样本呈现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特征，个别情况下在单倍群 J、T 和 U 上也会看到。他们的存在不能证明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的母系之间的联系。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其中一些是在与奥库涅夫文化男性无关的非本地人中发现。应该指出的是，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墓地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每个墓地均高度集中地保留着固定的母系线粒体，而奥库涅夫文化表明他们的母系线粒体混杂，这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同其他人群之间具有频繁通婚的现象。

有必要认清阿凡纳谢沃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之间几乎完全缺乏连续性。无论是在完整基因组分析的基础上还是在单亲遗传标记的研究中均已注意到这一点[①]。10% ~ 20% 的信息仅出现在父系中，其结果显示在奥库涅夫文化的早期类型中包含相当数量的外来成分，即颜纳亚 - 阿凡纳谢沃文化传统的人群。不过，这种情况很快被中断了，而且并未对奥库涅夫基因库做出任何重要贡献。因此，根据遗传数据，从一种文化过渡至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父系和母系均发生了几乎完全的种群改变。此外，根据线粒体的数据，欧亚西部的谱系变为欧亚东部方向的谱系。

安德罗诺沃（朴德罗夫斯卡亚）文化，是米努辛斯克盆地出现的另一个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也是大型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它占据着广阔的草原地带和邻接部分森林草原地区。最近十几年来，研究者们确定，其在叶尼塞河中游的出现是向东扩展的结果。三组研究人员对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遗传学资料进行了研究，但目前只有两项研究完全被发表，包括来自 6 处墓地的 23 个个体标本。第一批样本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进行并于 2009 年发表，基于来自三个不同墓地的 8 个样本进行研究的结果 - 索列纳奥泽尔纳雅 Ⅰ 、Ⅳ墓地和乌斯特 - 阿巴坎区（查尔斯基库尔干），其名称未标

① Hollard C., Zvenigorosky V., Kovalev A., Kiryushin Y., Tishkin A., Lazaretov I., Crubezy E., Ludes B., Keyser C. New genetic evidence of affin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bronze age Siberian populations //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18. №167. pp. 97-107.

Damgaard P., Martiniano R., Kamm J., Moreno-Mayar J. V., Kroonen G., Peyrot M., Barjamovic G., Rasmussen S., Zacho C., Baimukhanov N., Zaibert V., Merz V., Biddanda A., Merz I., Loman V.,Evdokimov V., Usmanova E., Hemphill B., Seguin-Orlando A., Yediay F. E., Ullah I., Sjögren K-G., Iversen K. H., Choin J., de la Fuente C., Ilardo M., Schroeder H., Moiseyev V., Gromov A., Polyakov A., Omura S., Senyurt S. Y., Ahmad H., McKenzie C., Margaryan A., Hameed A., Samad A., Gul N., Khokhar M. H., Goriunova O. I., Bazaliiskii V. I., Novembre J., Weber A. W., Orlando L., Allentoft M. E., Nielsen R., Kristiansen K., Sikora M., Outram A. K., Durbin R., Willerslev E. The First Horse Herders and the Impact of Early Bronze Age Steppe Expansions into Asia // Science, 2018. Vol. 360, Issue 6396. p. 1422 DOI: 10.1126/science. aar7711.

明[①]。结果发现，在两种情况下，Y-DNA 属于单倍群 R1a1 的 M17 亚型，该类型之前在该区域未被记录过。作者使用 7 个测定的线粒体 DNA，记录了欧亚西部人的单倍群 H、T、K 和 U。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了欧罗巴人群向东扩展到南西伯利亚的结论。

另一个 17 个样本组成研究系列，是由大卫・里奇（David Reich）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的[②]。他们对 3 座墓地进行了研究：乌斯特比力Ⅳ墓地、巴特拉什洛瓦－Ⅱ墓地、奥拉克科大墓群。应该直接指出的是，Г. П. 索斯诺夫（Соснов）在 1925 ~ 1928 年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存为多文化聚集的墓地而且该资料缺乏可靠的年代学划分。所获得的遗传学材料的分析结果中筛除了 2 个可能为发掘者错误地归入晚期墓葬的样本，这种晚期墓葬在米努辛斯克盆地不少见。其获得的结果与先前的研究完全相匹配。在 11 个个体中鉴定出的遗传标记的 Y 染色体与单倍群 R1a 惊人的一致，而另 14 个样本的线粒体的分析显示单倍群 H、T、K 和 U。

最后，新西伯利亚研究人员第三次对西和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资料进行了研究。虽然目前为止还没发表完整的研究数据，但初步研究结果已公布[③]。它们与以

---

① Keyser C., Bouakaze C., Crubézy E., Nikolaev V. G., Montagnon D., Reis T., Ludes B. Ancient DNA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south Siberian Kurgan people // Human Genetics. №126 (3). P. 395-410. // Hollard C., Zvenigorosky V., Kovalev A., Kiryushin Y., Tishkin A., Lazaretov I., Crubezy E., Ludes B., Keyser C. New genetic evidence of affin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bronze age Siberian populations //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18. №167. pp. 97-107.

② Narasimhan V., Patterson N., Moorjani P., Lazaridis I., Mark L., Mallick S., Rohland N., Bernardos R., Kim A., Nakatsuka N., Olalde I., Coppa A., Mallory J., Moiseyev V., Monge J., Olivieri L., Adamski N., Broomandkhoshbacht N., Candilio F., Cheronet O., Culleton B., Ferry M., Fernandes D., Gamarra B., Gaudio D., Hajdinjak M., Harney E., Harper T., Keating D., Lawson A-M., Michel M., Novak M., Oppenheimer J., Rai N., Sirak K., Slon V., Stewardson K., Zhang Z., Akhatov G., Bagashev A., Baitanayev B, Bonora G., Chikisheva T., Derevianko A., Enshin D., Douka K., Dubova N., Epimakhov A., Freilich S., Fuller D., Goryachev A., Gromov A., Hanks B., Judd M., Kazizov E., Khokhlov A., Kitov E., Kupriyanova E., Kuznetsov P., Luiselli D., Maksudov F., Meiklejohn C., Merrett D., Micheli R., Mochalov O., Muhammed Z., Mustafakulov S., Nayak A., Rykun M., Pettner D., Potts R., Razhev D., Sarno S., Sikhymbaevae K., Slepchenko S., Stepanova N., Svyatko S., Vasilyev S., Vidale M., Voyakin D., Yermolayeva A., Zubova A., Shinde V., Lalueza-Fox C., Meyer M., Anthony D., Boivin N., Thangaraj K., Kennett D., Frachetti M., Pinhasi R., Reich D. 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preprint) // bioRxiv, Posted March 31, 2018 https://doi.org/10.1101/292581.

③ Журавлев А. А., Пилипенко А. С., Молодин В. И., Папин Д. В., Поздняков Д. В., Трапезов Р. О. Генофонд мтДНК и Y-хромосомы 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федоровского) и пост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Труды V (XX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в Барнауле-Белокурихе.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17. Т. Ⅲ. С. 37-40.

前的研究一样，已确定主要 Y 染色体单倍群为 R1a，并确定这是安德罗诺沃人群的特征性遗传标记。根据线粒体的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为，当地土著居民的参与不那么明显，并且基因库以欧亚西部单倍群占主导地位。这些都证明，迁入的安德罗诺沃人群与之前的人群之间的基因接触度较低[①]。

总结以上所有实例，可以勾勒出清晰的画面。对 Y 染色体的分析数据显示，已公布的 13 个样本为统一的父系单倍群 R1a。线粒体的研究也显示非常紧密的联系，21 个样本的分析结果，记录出仅 4 组单倍群：H、T、K、H 和 U，它们呈现出相对均匀的分布，单倍群亚类 U（38%）和 T（29%）较为常见。与奥库涅夫文化相比像是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在此之前，欧亚东部单倍群占主导地位，那么在安德罗诺沃移民中仅确定了欧亚西部线粒体谱系。比较一组亚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据母系继承理论上可以不超过 10%（U5 和 H6）。但很有可能完全不存在，因为，它是在不充足的研究样本中被确定的。总结古遗传学研究资料，我们可以得出有关结论，安德罗诺沃移民迁入米努辛斯克盆地，对当地居民未产生同化。在巴拉彬（Барабинской）森林草原地区却记录了完全相反的情形，在那里发生了积极活跃的相互同化，与此同时也引入来自新西伯利亚同行们有关这方面的意见，即在不同的地区，安德罗诺沃的扩张而占领的结果也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②]。

青铜时代晚期－喀拉苏克文化。这一时期为米努辛斯克盆地极其复杂的时期。以前的传统概念上统一称它为喀拉苏克文化。但这一时期可分为四个年代阶段（8 个年代范围）。导致这一结果，是由于受到了各个地理和外来文化方面的强烈影响，其中还包括新的人群向该地区的迁入[③]。迄今为止，在两项不同的研究中仅对 10 个样本进行了分析，并在新西伯利亚研究团队的报告上指出研究结果。这些样本的数量仍然不足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但仍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分析的前 3 个样本的出处不是很清楚，并且仅检测了其中 2 个

---

① Журавлев А. А., Пилипенко А. С., Молодин В. И., Папин Д. В., Поздняков Д. В., Трапезов Р. О. Генофонд мтДНК и Y-хромосомы 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федоровского) и пост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Труды V (XX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в Барнауле-Белокурихе.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17. Т. Ⅲ. С. 37-40, 39.

② Журавлев А. А., Пилипенко А. С., Молодин В. И., Папин Д. В., Поздняков Д. В., Трапезов Р. О. Генофонд мтДНК и Y-хромосомы 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федоровского) и пост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Труды V (XX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в Барнауле-Белокурихе.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17. Т. Ⅲ. С. 37-40, 40.

③ Лазаретов И. П., Поляков А. В. Хронология и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комплексов эпохи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ерхнем Приобье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в конце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Барнаул: Концепт, 2008. С. 33-55.

线粒体单倍群 U5a1 和 U4[①]。另 7 个样本在哥本哈根大学进行，他们也获得了完整的基因组[②]。其结果注意到已获得的遗传资料的多样性以及欧亚东西部人群的混血。其中已分析的 3 个样本中 2 个 Y 染色体检测到了先前安德罗诺沃特征的单倍群 R1a。第三个属单倍群 Q。线粒体数据显示极度的多样性，7 个样本中的 6 个单倍群具有完全不同的分支。新西伯利亚的研究人员在自己的工作中指出“迁入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罗诺沃人的男性遗传成分在比它晚期的人群（青铜时代喀拉苏克人群）基因库中仍然很高”[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Y 染色体单倍群 −R1a 很关键。

由于所研究的样品数量很少，因此在研究完整基因组的基础上进行的观察至关重要。多样性遗传资料完全符合考古学家提出的关于多向性接触和可能积极注入新的人群，进一步的研究应基于已经确定的考古年代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加以验证。

单亲遗传标记的分析充分证明了这类情况。Y 染色体的研究表明“安德罗诺”单倍群 R1a 和 Q，是之前奥库涅夫文化的特征，但不能急于下结论。单倍群 R1a 的存在根本无法证明米努辛斯克盆地安德罗诺沃文化和青铜时代晚期这一地区人群间存在直接的连续性。值得回顾的是，“喀拉苏克文化”的起源一开始与哈萨克中部地区有关，在此期间单倍群 R1a 几乎在整个后安德罗诺沃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单倍群 Q 的出现与生活至这一时期的奥库涅夫文化人群的联系。恰恰是在青铜晚期，在南部的蒙古草原上分布非常广[④]。鉴于考古学观点在某个阶段与中国北方有着一定的联系，所以不能排除在这种情况下样本出现单倍群 Q 是迁徙而来。

分析已获得的线粒体数据时，观察到同样复杂的情况。在研究的 9 个样本中只显示

---

① Keyser C., Bouakaze C., Crubézy E., Nikolaev V. G., Montagnon D., Reis T., Ludes B. Ancient DNA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south Siberian Kurgan people // Human Genetics. №126 (3). pp. 395-410.

② Rasmussen S., Allentoft M. E., Nielsen K., Orlando L., Sikora M., Sjögren K-G., Pedersen A. G., Schubert M., Van Dam A., Moliin C., Kapel O., Nielsen H. B., Brunak S., Avetisyan P., Epimakhov A., Khalyapin M. Vi., Gnuni A., Kriiska A., Lasak I., Metspalu M., Moiseyev V., Gromov A., Pokutta D., Saag L., Varul L., Yepiskoposyan L., Sicheritz-Pontén T., Foley R. A., Lahr M. M., Nielsen R., Kristiansen K., Willerslev E. Early Divergent Strains of Yersinia pestis in Eurasia 5, 000 Years Ago // Cell. Vol. 163, Is. 3. pp. 571-582.

③ Журавлев А. А., Пилипенко А. С., Молодин В. И., Папин Д. В., Поздняков Д. В., Трапезов Р. О. Генофонд мтДНК и Y-хромосомы 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федоровского) и постандронов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Труды V (XX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в Барнауле-Белокурихе.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17. Т. Ⅲ. С. 37-40, 39.

④ Hollard C., Keyser C., Giscard P-H., Tsagaan T., Bayarkhuu N., Bemmann J., Crubezy E., Ludes B. Strong genetic admixture in the Altai at the Middle Bronze Age revealed by uniparental and ancestry informativemarkers //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Genetics. 2014. №12. pp. 199-207.

单倍群 U（4 组），所有其他单倍群都以单数记录。此外，欧亚西部的 I 和 H 重新与欧亚东部 A、C 和 D、与米努辛斯克盆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材料进行比较后发现母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至少 50%）。以前分布广泛的单倍群 T 和 K 未再被观察到，但出现了新的单倍群 I、A、C 和 D。只保留了单倍群 U。所有这些都证明，仅以安德罗诺沃当地人群的连续性来分析青铜晚期的叶尼塞河中游是没有根据的。大型的混合基因库，其来源尚待确定。

##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古遗传学研究刚刚涉及人类古代历史，方法尚未完善，每个研究团队都在探索属于自己的研究道路，分析所获得的材料。每个实验室的资源和能力明显不同。其中有的实验室使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全基因组，有的则将精力集中在关键的单亲遗传标记上。不论如何，这些都非常重要，全新而客观的信息基于现代科学的研究建立。正如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资料显示，人群的迁徙对该地区极为重要性。将这些数据与考古材料的分析结果相结合，可以使研究达到新高度。

第一阶段的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1）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基因库与颜纳亚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基因库几乎没有区别。这充分证明了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观察，并可以认为这些人群是近亲。这些数据不仅在研究单亲遗传标记的基础上获得，也比较了全基因组的数据。对于该人群的父系部分的特征为单倍群 R1b 的亚类 L23，母系主要显示由欧亚西部起源的单倍群（U、R、J、H、K、T），而且在不同的墓地中观察到他们的差异，这表明阿凡纳谢沃人群比较封闭，这已被研究人员反复指出。

（2）奥库涅夫文化的基因库结构主要与人群的更替有关。根据对整个基因组的分析，发现奥库涅夫文化的样本中仅检测到 10%～20% 的成分表明与颜纳亚－偏洞室墓有关，并且仅沿男性。这些数据通过单亲遗传标记的研究也得到了证实，该系统显示两个崭新的单倍群 Q 和 NO（Y 染色体）和先前的单倍群 R1a 仅占 12.5%（被确定 2 个）。相同的情况也在线粒体的研究中观察到，欧亚西部单倍群被东部单倍群大规模取代现象（A、C、D）。

（3）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安德罗诺沃（朴德罗夫）文化的出现同样与全新的人群迁徙有关。父系特征为单倍群 R1a，这在安德罗诺沃时期是最为普遍的单倍群。线粒体数据显示，又返回到了分布范围非常小的欧亚西部单倍群（H、T、K 和 U），这证明新迁徙来的人群与当地居民之间不存在任何混血现象。

（4）遗传学上，叶尼塞河中游青铜时代晚期是研究最少的时期。所分析的样本数量不足以得出较为均衡的结论。只能注意到，对完整基因组的分析显示欧亚东西部人群的混合现象，这由已确定的极少数关键单亲遗传标记所证实。

# Overview of the Results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Paleogenetic Research into the Population of the Minusinsk Basin in the Bronze Epoch

A. V. Polyakov

**Abstract:**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review of the results of paleogenetic studies conducted by various research groups using materials from the funerary sites of the Minusinsk Basin (south of the Krasnoyarsk Territory and the Republic of Khakassia) of the Bronze Age and analyzes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comparing the complete genome of the ancient men and the data of phylogenetically informative markers (mtDNA and Y-chromosome DNA). As a result, it was established that in the Bronze Ag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Midstream Yenisei there was a regular change of population, which indicates a high migration activity. The formation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is period (Afanasyevskaya, Okunevskaya, Andronovskaya) began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 large group of new people, almost completely crowding out their predecessors. Evidence of the assimil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into new cultural formations is rare and not systemic. The most difficult situation is with the sites of the late bronze period due to the small number of tests carried out so far.

**Keywords:** Minusinsk Basin; Midstream Yenisei; paleogenetics; Afanasyevskaya culture; Okunevskaya culture; Andronovskaya (Fedorovskaya) culture; late bronze period

# 哥诺尔（Gonur）遗址“羔羊之墓”出土银针饰

## ——关于青铜时代中亚音乐与宗教礼仪的研究

N. 勃罗夫卡[1] 著　昌　迪[2]　张　弛[3] 译

（1. 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所，柏林；2.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州，510013；3.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州，510000）

**摘要：**哥诺尔遗址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是中亚青铜时代“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称为“羔羊之墓”的1994M18中，苏联考古学家萨瑞阿尼迪发现了4枚银针饰，银针上的演奏者穿着苏美尔服饰，但乐器箜篌却带有本土特征，表明哥诺尔的早期音乐与宗教仪式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的同时，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地域特征。

**关键词：**哥诺尔　箜篌　青铜时代　中亚

在维克多·伊万诺维奇·萨瑞阿尼迪教授公布的哥诺尔①（Gonur）遗址考古资料②中，哥诺尔德佩古城1994M18引发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羔羊之墓”（Гробница ягненка）。此后，温克尔曼在文章③中提到了“羔羊之墓”出土的银制针饰，并对萨瑞阿尼迪“公元前第2千纪后半段”的观点提出质疑。萨瑞阿尼迪在报告中指出：“墓葬上层接近公元前2千纪后半段末期，此时哥诺尔居民点已被废弃。”④这4枚银针在墓葬附近的三号遗址被发现，此外还有山羊、绵羊和骆驼的遗骸

---

① Гонур-Депе（Gonur-Tepe），土库曼语“灰山之意”。1972年，苏联考古学家萨瑞阿尼迪发现了哥诺尔古城，并对其进行考古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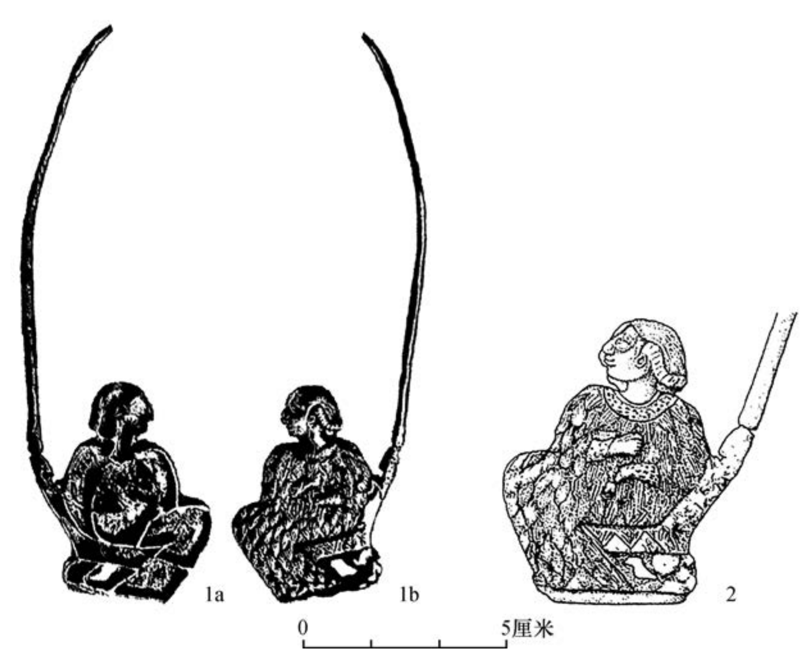
② Sarianidi V. The Biblical Lamb and the funeral rites of Margiana and Bactria. *Mesopotamia*, 1996 (31): 33-48.

③ Winkelmann S. Bemerkungen zum Grab 18 und den Silbernadeln von Gonur depe. *AMIT*, 1998 (30): 1-16.

④ Sarianidi V. The Biblical Lamb and the funeral rites of Margiana and Bactria. *Mesopotamia*, 1996 (31): 33.

各 2 具，应该与“羔羊之墓”存在某种联系[①]。萨瑞阿尼迪还说明了银针的出土位置：“在坑内出土物旁的地面上，有 4 枚银针饰，整齐置于 1 件包裹内，因时间久远，已粘在一起。据此推测，出土的 4 枚银针饰属于这座墓葬。”[②] 认真分析上述研究就会明白萨瑞阿尼迪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墓葬的确切年代相对于哥诺尔遗址的大多数建筑而言，年代更晚。事实上，银针饰的制造年代一定早于墓葬年代，除非因墓葬被盗而扰入。另外一种假设是，银针饰被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器放入祭祀坑内。因为从坑中埋葬的羔羊判断，这并非墓葬，而是完成宗教仪式的祭祀坑。因此，针饰不应该被视为与墓葬同期的随葬品。

萨瑞阿尼迪依据银针饰（图一）推测“羔羊之墓”的年代是“公元前 3 千纪的后半段”，可惜这一结论遭到其他发掘者的反对，他们的依据是“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联合体”出土的同类针饰均在公元前 16 ~ 前 15 世纪[③]。考虑到 4 枚针饰的特殊情况，萨瑞阿尼迪重新修改了观点。虽然哥诺尔民居遗址的放射性碳测年为公元前




图一　出土于“羔羊之墓”的银质针饰（1994M18）

（P. 勃罗夫卡、萨瑞阿尼迪绘，陈熙泞重描）

① Sarianidi V. The Biblical Lamb and the funeral rites of Margiana and Bactria. *Mesopotamia*, 1996 (31): 35.

② Sarianidi V. Margiana and Protozoroastrism. *Athens*, 1998a: 74-75.

③ айцева Г. М., Дубова Н. А., Семенцов А. А., Реймар П., Мэллори Д. ж., Юнгнер Х. Радиоуглерой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мятника Гонор Депе // Труды Марсиа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2.2008,С.166-179.

2500 ~ 前 1500 年，但银针饰的准确年代却无法通过 $^{14}C$ 来确定 ①。

萨瑞阿尼迪认为，银针饰的年代比“羔羊之墓”的年代要早得多 ②。因其具有超凡的艺术价值，这批针饰多次被刊登在出版物中 ③。根据萨瑞阿尼迪提供的数据，针饰全长 14.3 厘米，底部人形雕像为 5.4 厘米 ×3.7 厘米 ④。针饰背面有加强针体结构的支架，属于典型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风格的金属制品 ⑤。因此，针饰的主题也与上述文化群体完全相关。饰针上的人物身体朝左侧坐，身着苏美尔特色的卡吾那凯斯（kaunakes）服饰，类似塑像在苏锡安那（Сузиана）、伊朗古埃兰（Элам）和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Бактрий-Маргиана）文明中广泛存在 ⑥。

人物侧面塑造极具特点，最上方的头发倾斜于左耳附近，另有一条编织的发辫盘绕于此。人物所穿带花边的服饰属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风格，领口有三角形图案，衣领与袖口边缘有环形镂空花纹。人物双手放于身体一侧，右手高，左手低。在他左手下，可见一个正方形物体。椅子的下半部分面积较大，装饰着三角形图案，或许图二所描绘的支架是动物弯曲的腿骨。椅子后部从右侧朝上，连接着一个弯曲的长针。

“羔羊之墓”中未发现与银针饰相似的出土物。经过研究和基本的风格比较 ⑦，这些

---

① айцева Г. М., Дубова Н. А., Семенцов А. А., Реймар П., Мэллори Д. ж., Юнгнер Х. Радиоуглерой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мятника Гонор Депе // Труды Марсиа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и. Т.2.2008.С.166-179.

② 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Составные статуэтки Бактрии и Маргианы. ВДИ, 1995, №1 (212), С. 75-79.

③ Sarianidi V. The Biblical Lamb and the funeral rites of Margiana and Bactria. *Mesopotamia*, 1996 (31). Sarianidi V. Margiana and Protozoroastrism. Athens, 1998a: 73-76. Sarianidi V. Myths of Ancient Bactria and Margiana on its scals and amulets. M., 1998b: 284-285. Sarianidi V. Margush. Ancient Oriental kingdom in the Old delta of the Murghab river. Asgabat, 2002: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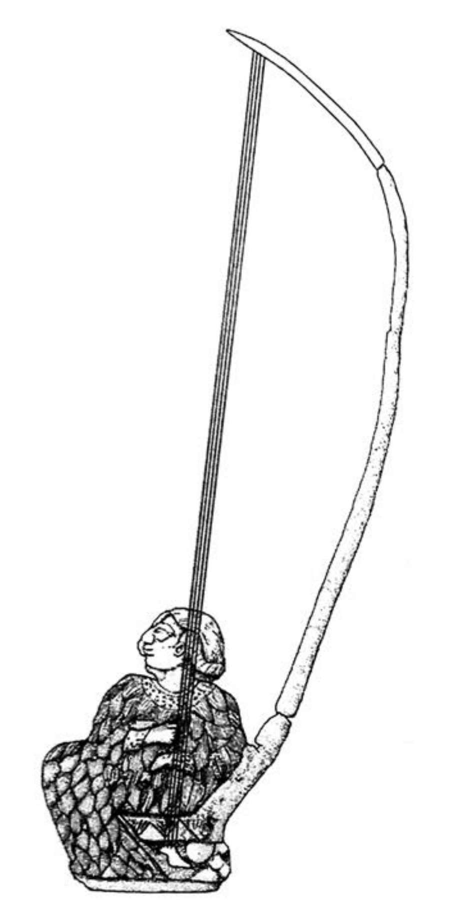
④ Sarianidi V. Margiana and Protozoroastrism. Athens, 1998a: Pic 34.

⑤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BMAC），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学文化联合体，“考古学文化联合体”是苏联时期常用的跨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表述形式，安德罗诺沃文化亦曾使用。Winkelmann S. Bemerkungen zum Grab 18 und den Silbernadeln von Gonur depe. *AMIT*. 1998 (30): 10.

⑥ Amiet P. L age des echanges inter-iraniens 3500-1700 avant J.-C. Notes et documents des Musees de France Editions de la Re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 P., 1986. Sarianidi V. Myths of Ancient Bactria and Margiana on its scals and amulets. M., 1998b. Winkelmann S. Bemerkungen zum Grab 18 und den Silbernadeln von Gonur depe. *AMIT*, 1998 (30): 10-12; Sarianidi V. Margush. Ancient Oriental kingdom in the Old delta of the Murghab river. Asgabat, 2002. Sarianidi V. I. Gonurdepe. City of Kings and Gods. Asgabat, 2005. 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Составные статуэтки Бактрии и Маргианы // ВДИ. 1995.№1 (212). С. 75-79.

⑦ Sarianidi V. The Biblical Lamb and the funeral rites of Margiana and Bactria. Mesopotamia, 1996 (31). Winkelmann S. Bemerkungen zum Grab 18 und den Silbernadeln von Gonur depe. *AMIT*, 1998 (30). 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Составные статуэтки Бактрии и Маргианы. ВДИ, 1995, №1 (212), С. 75-79.

针饰属于公元前3千纪末至前2千纪上半段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时期的遗物。尽管“羔羊之墓”中许多出土物归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但身着苏美尔卡吾那凯斯服饰的坐姿人物形象，为研究哥诺尔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针饰来自伊朗，而银质花瓶则来自波斯波利斯（Персеполь）——铭文中所提到公元前3千纪埃兰国王库提克·印舒希纳克（Кутик-Иншушинак）的名字[①]。波斯波利斯花瓶一侧的坐姿女性形象与哥诺尔遗址饰针上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反差。值得注意的是，在花瓶另一侧描绘着一位站立的女性，手持杆状物体，推测可能是一件乐器[②]。法国学者法兰克福（Frankfort）认为：“巴克特里亚金属筒形杯（即波斯波利斯花瓶）上有一位箜篌师和一名男性，他们正在树丛旁演奏。”[③]（Frankfort，2003，第45页，图6a-c）。



图二　经过修复的银制针饰
（P.勃罗夫卡、萨瑞阿尼迪绘，陈熙泞重描）

哥诺尔出土的针饰人物身体强烈弯曲，不像绝大多数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遗址中发现的针饰，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毫无疑问，针饰必须固定在某个表面，使其尖端能由下而上竖立，否则会被扭坏。这意味着饰针应该通过一条或多条丝状物及细绳固定，从而使针饰牢固装饰于衣服

① 就形状和弧形装饰品而言，哥诺尔出土有带骆驼图形伞状的银制花瓶（Sarianidi V. I. Gonurdepe. City of Kings and Gods. Asgabat, 2005: 236, Pic 95-96）。Girshman R. Notes Lraniennes ⅩⅥ. Deux statuettes elamites du Plateau Iranien. *Artibus Asiae*, 1968 (30): № 2-3; Hinz W. Altiranische Funde und Forschungen. Berlin, 1969: 11-44; Calmeyer P. Beobachtungen an der Silbervase aus Persepolis. *Iranica Antiqua*, 1989 (24).

② Calmeyer P. Beobachtungen an der Silbervase aus Persepolis. *Iranica Antiqua*, 1989 (24): 81.

③ Frankfort H. P. Observatios on the toreutics of the Oxus civilization // O. Bopearachchi, M. F. Boussac (Eds.). Afghanistan: old crossroads between I’est and I’ouset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at the Henri-Prades-Lattes Archaeological Museum from 5 to 7 May 2003.Indicopleustoi-Archaeologies of the Indian Ocean 3: Afghanistan. Brepols. Turnhout, 2005: 21-63.

或皮革制品表面[①]。考古发现表明，欧洲、西亚的大部分地区都采用上述固定方式。随着时间推移，针饰造型发生改变，丝状物与细绳逐渐被金属簧片替代[②]。

技术人员在修复针饰时，发现针饰人物所坐椅子下方有串接丝线的孔洞，正好能将尖端固定在预定位置。显然，针饰表现的是女子坐弹箜篌的形象。在众多刻画男女坐姿或站姿演的图像中[③]，最常见的是箜篌与七弦琴（лира），它们是古代中东地区最流行的乐器。

在伊拉克境内，出土了大量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7～前16世纪）的浮雕艺术，有立式（图三，1）和横式（图三，2）两种弹奏箜篌的方式[④]。在一块现藏法国卢浮宫的黏土浮雕艺术品中[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弓形箜篌保持在水平位置（图三，3）。而在公元前3千纪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王朝的石灰岩浮雕上[⑥]，描绘了众人宴饮的连续场景。浮雕中既有仆人奉上饮料、食物，又有宾主在马车旁进行游戏或比赛的场景。这些人物形

---

① Alexander J. A. The history of the fibula //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ce*. Essay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Willian Francis Grimes. L. NY: Seminar Press, 1973: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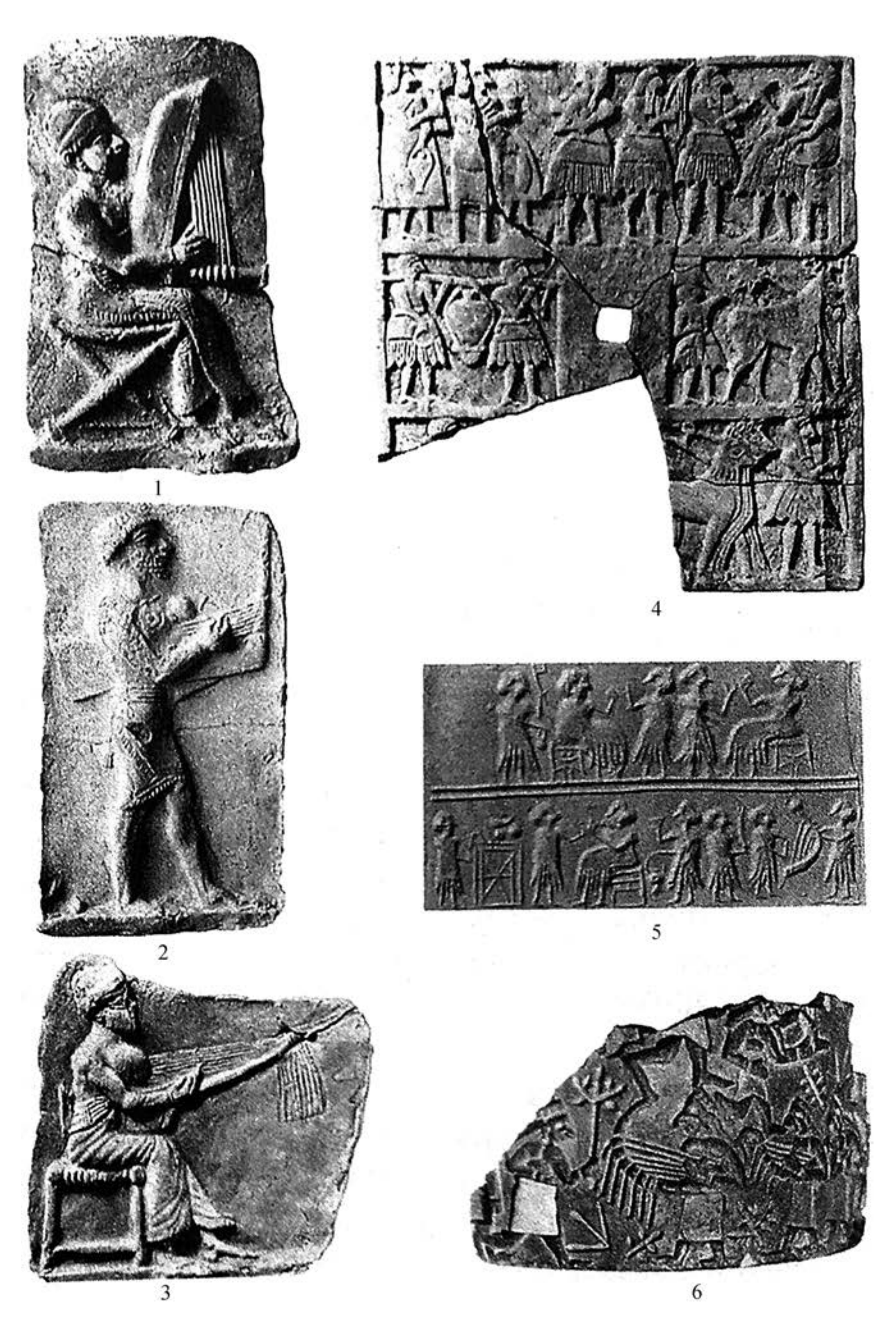
② Alexander J. A. The history of the fibula //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ce*. Essay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Willian Francis Grimes. L. NY: Seminar Press, 1973.

③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尽资料来自：Lawergren B.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angular harps // E. Hickmann, R. Eichmann (Eds.), Studien zur Musikarchaologie I. Saiteninstrumente I'm archaologischen context/ Stringed Instruments in archaeological context. Vortrage des 8. Symposiums der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ICTM), Limassol, 26. -30. August 1996 und andere Beitrage/Paper from the 8th Symposium of the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ICTM), Limassol, 26-30 August, 1996 and other contributions. Orient-Archaologie 6. Rahden/Westf., 2000: 53-64. Lawergren B. Angular harps through the ages. A causal history // A. A. Both, R. Eichmann, E. Hickman, L.-Chr. Koch (Eds.). Studien zur Musikarchaologie Ⅵ. Herausforderungen und Ziele der Musikarchaologie/Challenges and objectives in Music Archaeology. Vortrage des 5. Symposiums der Internationalen Studiengruppe Musikarchaologie im Ethnologischen Museum der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19-23. September 2006/Papers from the 5th Symposiunm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at the Ethnological Museum, State Museums Berlin, 19-23 September, 2006. Orient-Archaologie 22. Rahden/Westf. , 2008: 261-281.

④ Rashid S. A. Mesopotamien // Rashid S. A. Musikgrschichte in Bildern Band Ⅱ: Musik des Altertums. Lieferung 2 Mesopotamien. Leipzig, 1984: 89-90.

⑤ Rashid S. A. Mesopotamien // Rashid S. A. Musikgrschichte in Bildern Band Ⅱ: Musik des Altertums. Lieferung2 Mesopotamien. Leipzig, 1984: 88-89, Figure 75.

⑥ 发现于乌尔（Ур）、退尔（Телло）、法拉（Фара）、哈法提（Хафаги）、阿斯玛尔（Асмар）、阿格拉布（Аграб）等处。Rashid S. A. Mesopotamien // Rashid S. A. Musikgrschichte in Bildern Band Ⅱ: Musik des Altertums. Lieferung 2 Mesopotamien. Leipzig, 1984: 54-61.



图三　中东演奏箜篌的音乐家塑像

1. 浮雕，美索不达米亚　2、3. 浮雕，埃什努纳古城（退尔、阿斯马尔）　4. 哈法提，椭圆寺庙一层，石灰石　5. 乌尔，圆柱形印记　6. 阿达布－比什麦亚，皂石彩绘器皿碎片

（所有资料来源 Rashid S. A. Mesopotamien // Rashid S. A. Musikgrschichte in Bildern Band Ⅱ： Musik des Altertums. Lieferung 2 Mesopotamien. Leipzig, 1984. P. 勃罗夫卡、萨瑞阿尼迪原图，陈熙泞重描）

象中最常见的是乐师，如其中一幅浮雕中就有乐师弹奏立式弓形箜篌的形象（图三，4）。在圆柱形石柱上也有相似的场景，如来自乌尔的浮雕上（图三，5），有乐师在演奏立式弓形箜篌[①]。另一幅浮雕出自阿达布－比什迈（Адаб-Бишмай），现今保存在芝加哥东方学院博物馆[②]，画面反映的是宗教仪式场景，人物围聚一处，或抱树而立，或舞动树枝。在这些人物中，可以确定两位乐师在弹奏箜篌（图三，6）。此类与祭祀仪式有关的浮雕作品具有特殊的内涵，因为浮雕中的部分人物身着苏美尔服饰，这与哥诺尔针饰极其相似。但阿达布－比什迈浮雕上的人物则身着某种短裙类服饰，而非苏美尔服饰，这类着装也见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石雕上，应是中亚本土文化的产物。

综上所述，出土于哥诺尔德佩古城的银针饰可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末或公元前2千纪初。该针饰很好地展现了中东乐师的形象，还原了古代大型宴会演奏箜篌的场景。哥诺尔的乐师形象尤其引人注目，他们的出现甚至要早于中亚记载乐器的历史。通过文献可知，中亚乐师的最早形象不早于公元前1000年[③]。但事实上，哥诺尔德佩古城及中亚

---

① 亚美尼亚卡拉莎姆巴（Карашамба）出土的碗也有类似的仪式图像。Kushnareva K. Some evidence of musical instruments in Bronze Age Caucasus // E. Hickmann, I. Laufs, R. Eichmann (Eds.). Studien zur Musikarchaologie Ⅱ. Musikarchaologie fruher Metallzeiten /Music archaeology of Early Metal Ages. Vortrage des I. Symposiums der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MusicArchaeology im Kloster Michaelstein, 18-24. Mai 1998/Papers from the 1st Symposinm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at Monastery Michaelstein, 18-24 May , 1998. Orient-Archaologie 7. Rahden/Westf. 2000: 103-112. Smith A. T. The limitations of doxa: Agency and subjectivity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oint of view. J. of Social Archaeology, 2001, 1 (2).

② Rashid S. A. Mesopotamien // Rashid S. A. Musikgrschichte in Bildern Band Ⅱ: Musik des Altertums. Lieferung 2 Mesopotamien. Leipzig, 1984: 56.

③ Karomatov F. M., Meskeris V. A., Vyzgo T. S. unter Mitarbeit von A. Hausler und A. Mal' keeva. Mittelasien // Rashid S. A. Musikgeschichte in Bildern Ⅱ: Musik des Altertums, Lieferung 9. Leipzig, 1987: 8. Meshkeris V. Archaeological chordophones of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6/5th-9th century A. D. Typology, evolution, migration // E. Hickmann, R. Eichmann (Eds.). Studien zur Musikarchaologiel, Saiteninstrumente Im archaologischen kontext/Stringed Instruments in archaeological context. Vortragedes 8. Symposiums der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ICTM), Limassol, 26-30. August, 1996 and other contributions. Orient-Archaologie 6. Rahden/Westf., 2000: 85-90. Plates I-Ⅵ; Eichmann R. Music and Migration // R. Eichmann, H. Parzinger (Eds.). Migration and Culture Transfer. The Change in Front and Central Asian Cultures in the Change from the 2nd to the 1st Millennium BC November 26, 1999 Colloquia on Pre- and Early History 6. Dr Rudolf Habelt, Bonn, 2001: 473-483.

其他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银和陶制管乐[①]。萨瑞阿尼迪在对[②]“羊羔之墓”出土铜权杖的研究认为：“在铜权杖顶端放置有很多小石片，它们很可能是演奏某种乐器的弹拨工具。”目前，关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音乐史的研究还缺少充足的材料。但哥诺尔针饰的形象，无疑是一位女性箜篌演奏师，其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浮雕中宴会乐师的形象十分相似，两者间存在不言而喻的微妙联系。

未来中亚考古学的关注点或许会转向社会文化史的细节问题，如探讨类似哥诺尔针饰物的功能。目前学术界的研究都集中在箜篌的造型上，对许多细节则被完全忽略。仔细观察可知，阿达布－比什迈浮雕上的箜篌与埃什努纳（Эшнунна）（图三，3）苏美尔箜篌在外形上有明显差异，特别是他们的弹奏方式——阿达布－比什迈箜篌用拨片[③]进行演奏。从浮雕的装饰方法和艺术风格而言，石灰石浮雕的装饰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相似，而埃什努纳浮雕图像可能受印度河谷[④]文化的影响。斯蒂恩科勒[⑤]在《巴克特里亚》一文中认为，箜篌在古代可能被称为“parahsitu”，其起源或许在的伊朗东南部。尽管斯蒂恩科勒本人引述了法兰克福关于“巴克特里亚箜篌乐师图像”的材料[⑥]，但其图像解读还存在巨大争议，尤其是有关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的大量资料尚未公开，所举图像亦为孤例。哥诺尔针饰人物左手上的物品，或许与拨片可以等同起来——使用拨片弹奏是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乐师的特点。目前针对该推测，出土资料还十分欠缺，但哥诺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必然存在文化联系，特别是哥诺尔独创的箜篌弹奏法，在世界音乐史上独树一帜。另一个证据是哥诺尔发现的管乐，绝大多数起源于巴克特里亚地区，且在伊朗境内大量出土。显然，这些乐器作为媒介承担着将巴克特里

① Sarianidi V. Margush. Ancient Oriental kingdom in the Old delta of the Murghab river. Asgabat, 2002: 235-239. Lawergren B. Oxus trumpets. ca. 2200-1800 BCE: Materical overview, usage, societal role, and catalog. *Iranica Antiqua*, 2003 (38).

② Sarianidi V. The Biblical Lamb and the funeral rites of Margiana and Bactria. *Mesopotamia*, 1996 (31): 33-36.

③ Rashid S. A. Mesopotamien // Rashid S. A. Musikgrschichte in Bildern BandⅡ: Musik des Altertums. Lieferung 2 Mesopotamien. Leipzig, 1984: 88.

④ Rashid S. A. Mesopotamien // Rashid S. A. Musikgrschichte in Bildern BandⅡ: Musik des Altertums. Lieferung 2 Mesopotamien. Leipzig, 1984: 88.

⑤ Steinkeller P. New lighton Marhassi and its contacts with Makkan and Babylonia. J. of Magan Studies. I. 2007 (1): 7-10.

⑥ Frankfort H. P. Observatios on the toreutics of the Oxus civilization // O. Bopearachchi, M. F. Boussac (Eds.). Afghanistan: old crossroads between I’est and I’ouset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the Museum archaeological Henri-Prades-Lattes from May 5 to 7, 2003 Indicopleustoi-Archaeologies of the Indian Ocean 3: Afghanistan. Brepols. Turnhout, 2005: 21-63.

亚文化传入伊朗[①]的重任，也是巴克特里亚音乐文化向外传播的有力证据。

萨瑞阿尼迪在哥诺尔古城的工作，是中亚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区域考古发掘，强有力地证明了中亚地区弓形箜篌的存在，说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的音乐发展不落后于任何一个邻近地区，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

综上所述，我想再一次回到哥诺尔遗址“羊羔之墓”的论述上。很显然，萨瑞阿尼迪的发现说明此地曾进行过仪式性活动。但他出于慎重，仍然强调“没有人能对在此地进行的祭祀仪式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简而言之，哥诺尔古城发现的三处遗址均与祭祀有关，第一处出土的是羔羊骨骸和少数仪式用品（石杖、石塔、象牙箭镞和陶制品）；第二处有一套器皿，其中包括酒器、碗盘和带支架的高脚酒杯；第三处是 2 峰骆驼以及山羊、绵羊的遗骸[②]。类似的三处遗迹分布方式，不禁让人想起美索不达米亚的浮雕图像，而这些浮雕均出土于神庙中。通常浮雕画面间会用纹饰隔开：上图搭建有宴会宾客席和乐师演出台；中间的画面是举着各类器皿（食物或者饮品）的仆人和祭祀用的动物；下图包括马车或船，主要是交通工具（图三，4）。显然，美索不达米亚浮雕与哥诺尔德佩古城的情景十分相似。哥诺尔第一、第二处遗址用于举办宴会（盛装食物和奏乐所用的器皿）和存放献祭的羔羊，而第三处遗址用于随葬交通工具——骆驼。由此可见，哥诺尔遗址“羊羔之墓”（1994M18）整体布局可以用美索不达米亚浮雕情景中的宗教仪式来解释。就年代而言，来自伊拉克的浮雕艺术品要更加久远。萨瑞阿尼迪[③]（Sarianid，1990；Sarianid，1999）不止一次提到过宗教仪式，而这些箜篌的弹奏者或许正是仪式的传播者，是他们将其带到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

## The Silver Brooches from the “Tomb of Lamb” in Gonor Site —A Study of Music and Religious Rites in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

N. Boroffka

**Abstract:** Located in southern Turkmenistan, Gono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actria–

① Lawergren B. Oxus trumpets. ca. 2200-1800 BCE: Materical overview, usage, societal role, and catalog. *Iranica Antiqua*, 2003 (38): 65-66.

② Sarianidi V. The Biblical Lamb and the funeral rites of Margiana and Bactria. *Mesopotamia*, 1996 (31).

③ Sarianidi V. The Biblical Lamb and the funeral rites of Margiana and Bactria. *Mesopotamia*, 1996 (31). Sarianidi V. I. The Syro-Hittite origin of Bactrian-Margiana glyptics.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000 (6): № 3-4. 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Древности страны Мариуш. Ашхабад. 1990. 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Сиро-хетт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бактрийско-маргианской глиптикт. ВДИ, 1999, № 1 (228). С. 53-73.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BMAC) in Central Asia. In 1994, Soviet archaeologists Sarianidi discovered four silver brooches in 94M18, which are from the “Tomb of Lamb”. The harp player wears a Sumerian costume, but the harp carries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dicating that the music and religious ceremony of the early Gonor culture were influenced by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music and religious culture with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ere produced.

**Keywords:** Gonur; Harp; Bronze Age; Central Asia

# 斯杰布斯卡Ⅰ号遗址出土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的阿尔泰游牧人腰带具

A. A. 提什金[1]　S. S. 马特列宁[1]　A. L. 昆古罗夫[1] 著

王禹夫[2] 译　潘　玲[3] 校

（1. 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巴尔瑙尔；2. 黑龙江大学渤海研究院、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150080；3.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西安，710110）

**摘要**：本文是2010年阿尔泰共和国奥古达依地区布兰－科宾文化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出土的阿尔泰地区民族大迁徙时代的腰带具的综合研究成果。该遗址出土的腰带具包括金属的带扣、带环、銙环、銙板和鉈尾等带具。这些腰带具发现时均保持原位，使我们能够复原几种腰带具的结构。通过对比分析可知腰带具的年代为鲜卑－柔然时期（2～5世纪），其中一部分可以进一步精确断代为4～5世纪的腰带具。这些腰带具材料可以作为遗存断代的依据，也是判断民族大迁徙时期阿尔泰地区游牧人遗存的区域特征和分期的重要材料。通过对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腰带具的对比分析可知，布兰－科宾文化人群的带扣和带环受到中央亚洲腰带形制的影响，具有与欧洲腰带具明显有别的演变轨迹。这些差别体现在腰带具形制延续的时间不同，同类带具流行的相对年代也有差别。

**关键词**：阿尔泰　游牧人　鲜卑－柔然时期　布兰－科宾文化　腰带具　年代学结构

腰带具是皮质腰带上的金属部件。腰带具有佩带和装饰两种功能［包括带扣、带板（或銙）、串连带扣、鉈尾、带环以及其他几种带具］。上述腰带具多为金属质地，偶尔也用其他材料制成。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公元前一千纪初期，中央亚洲和北亚的游牧人开始使用腰带具。腰带具是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色彩，这也使其成为复原历史的重要材料。

因有机质的腰带保存状况较差，不美观，铁带具容易锈蚀等原因，导致当今学界对

亚洲民族大迁徙时代腰带具的研究很不充分。关于阿尔泰地区的腰带具，В. Н. 多比然斯基提出应绘制巴列克特尤利（Балыктыюль）和卡克－波什（Кок-Пош）两处墓地出土的两条腰带具的复原示意图①。《卡通河上游的匈奴——萨尔马特时期古冢》一书介绍了韦尔赫－乌依蒙（Верх-Уймон）墓地出土的一条腰带上的保存状况较差的铁带具②。А．С．瓦西京对卡克－波什墓葬群出土的腰带具做了专门的识别和研究，其成果发表在《民族大迁徙时代的东阿尔泰（3～7世纪）》一书中③。А．Ю. 鲍里西科和 Ю. С．胡佳科夫观察了乌鲁格－乔尔图赫Ⅰ（Улуг-Чолтух Ⅰ）墓地出土的部分鲜卑时期腰带具的结构④。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阿尔泰地区仍有大量2～5世纪的腰带具材料没有开展任何形式的科学研究。目前迫切需要对这一时期亚洲居民的腰带具做分类研究，并在现有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其形制的共性、个性，以及腰带具的细节问题。

本文介绍的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2010年出土的完整或残缺的腰带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⑤。该墓地位于阿尔泰共和国奥古达依地区的奥古达依村（现已无人居住）附近，属于乌尔苏拉河右岸的第三个洪泛区。墓地位于从丘伊斯基公路第651千米处沿山区延

---

① Добжанский В. Н. Наборные пояса кочевников Аз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Новосиб. ун-та, 1990, 164 с.

② Соенов В. И., Эбель А. В. Курганы гунно-сарматской эпохи на Верхней Катуни.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ГАГПИ, 1992, 116 с.

③ Бобров В. В., Васютин А. С., Васютин С. А. Восточный Алтай в эпоху Великого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народов (Ⅲ-Ⅶ век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03, 224 с.

④ Борисенко А. Ю., Худяков Ю. С. Наборные пояса кочевников Эдигана в сяньбийский период //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Т. Х. Ч. I.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04, С. 194-199.

⑤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Шмидт А. В. Женские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украшения из погребений сяньбий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Алтае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амят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 Вопросы археолог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Вып. 3. Алматы: Изд-во Ин-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м. А. Х. Маргулана КН МОН РК, 2011, С. 420-431.;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Шмидт А. В. Боевые ножи кочевников Алтая эпохи “великого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народов”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народов степной Евразии.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12а, С. 59-65.;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Шмидт А. В. Наборный пояс сяньбий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лтае //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Монголии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й Сибири. Улан-Батор: Изд-во Монгол. гос. ун-та, 2012б, С. 116-120.;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Поясные бляхи сяньбийско-жуж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лтае // Изв.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2013а, № 4/1 (80). С. 204-213.;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Воинское погребение раннежуж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могильнике Степушка-I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лтае // КСИА. 2013б, Вып. 231. С. 59-71.

伸至卡图河的河谷的公路建设区。根据建设计划，布兰－科宾文化的墓葬被分为两个区域，分别命名为斯杰布斯卡Ⅰ号和斯杰布斯卡Ⅱ号墓地。阿尔泰国立大学和戈尔诺－阿尔泰国立大学组成的考察队在这里做了全面的考古调查。

## 一、材料介绍

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有8座冢内发现腰带具。我们按照发掘程序清理完墓葬后，在提取人骨前后再将所有的遗物摆放在原位，这样可以确定腰带具的原始摆放顺序（从带扣到皮带末端）。所有出土遗物现收藏在阿尔泰国立大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以下介绍腰带具的发现情况、器物线图和复原图（图一～图五）。

**1. 5号冢**

铁质腰带具位于无头武士的腹部。根据放置位置可知，这条腰带是在墓主死后带上的。腰带具包括以下几部分：1个有椭圆形边框和活动扣舌的带扣，3个等距离分布的两面对折并缀环的折页状銙（图一，Ⅰ，2～4）。腰带两端之间的皮带长63厘米，推测皮带宽度不少于2厘米。带扣向左侧系结。将发掘时留下的标记与具体出土带具相结合，我们能做出腰带具的复原图（图五，A，1）。

**2. 6号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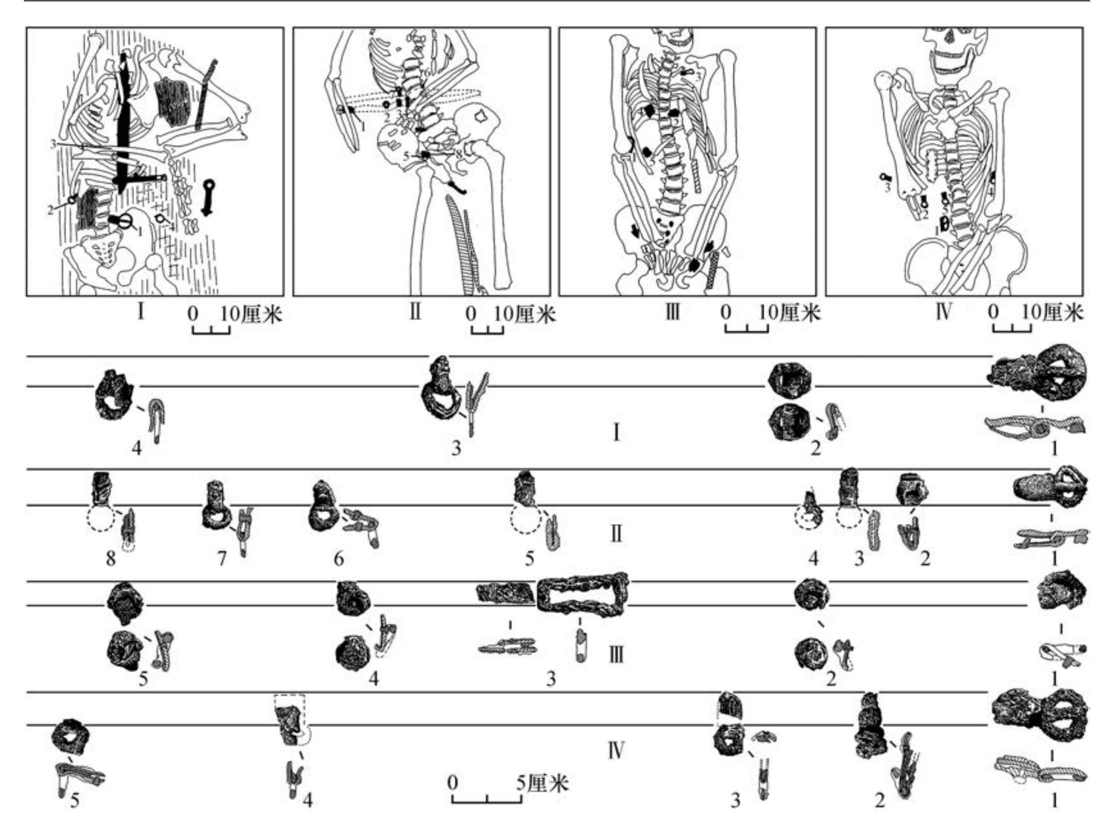
墓主人为12岁半至13岁的少年，在盆骨处略高的位置发现一套腰带具（由阿尔泰国立大学人类学办公室负责人、历史学副博士S. S. 图尔做年龄和性别鉴定）。腰带具包括1个有活动扣舌和椭方形折页的带扣（图一，Ⅱ，1）、6个缀活动环的折页状銙（一对折页在侧面，两个折页的位置尚未确定），以及1个缀固定环的折页状銙（图一，Ⅱ，4）。腰带宽度不少于3厘米，根据所有缀环都排列在折页状銙的上面推测，这条腰带倒挂在死者身上。我们根据上述发现，绘制了这条腰带的复原图（图五，A，2）。

**3. 9号冢**

铁质腰带具放置在35～40岁男性墓主人的胸部。腰带具包括1个扣舌缺失的椭圆形带扣、1个矩形串连带扣（图一，Ⅲ，3）、3个缀环的折页状銙（图一，Ⅲ，2、4、5），折页状銙之间有一个带椭方形折页的凹边梯形的串连带扣（图一，Ⅲ，3）。腰带的带身宽度不窄于2.7厘米。我们根据腰带具的发现状况绘制出复原示意图（图五，A，4）。

**4. 13号冢**

腰带具由较多金属部件组成，放置在50岁男性墓主人的腹部。发掘出土的金属带具如下：拱形边框、带活动扣舌和椭方形折页的带扣（图二，1）；用对折的窄皮带



图一　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发掘出土的铁腰带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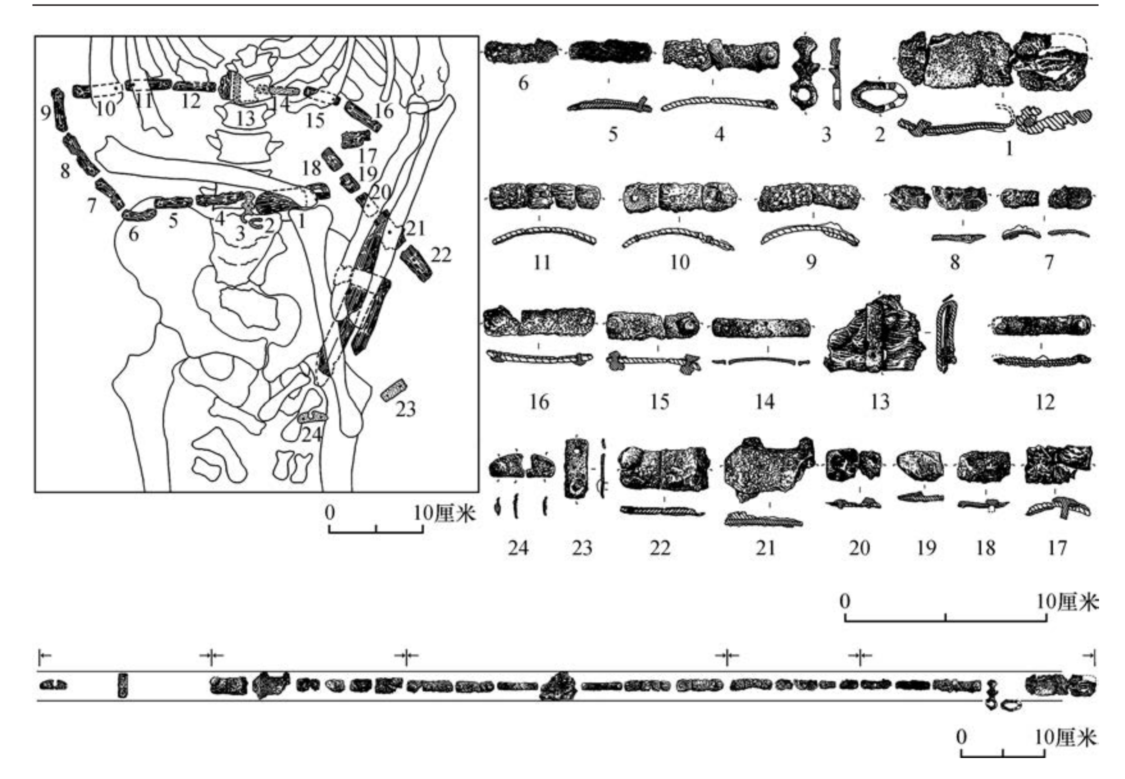
Ⅰ. 5 号冢（1. 带扣　2～4. 缀活动环的折页状銙）Ⅱ. 6 号冢（1. 带扣　2、3、5～8. 缀活动环的折页状銙　4. 缀固定环的折页状銙）Ⅲ. 9 号冢（1. 带扣　2、4、5. 缀活动环的折页状銙　3. 串连带扣）Ⅳ. 15 号冢（1. 带扣　2～5. 缀活动环的折页状銙）

（本图和以下各图的腰带具编号顺序均依照金属腰带具出土的原始位置，按照从带扣到带尾的顺序排列，所有的腰带都向左侧系结）

固定的青铜带环（图二，2）；有固定的环、带铆钉的“斧形”青铜銙（图二，3）；用铆钉固定在皮带同一水平线上的窄条形銙（11 个铁质、1 个青铜质）（图二，7～12、15、16）；1 个纵向安装的窄条形青铜带箍（图二，13）；用铆钉固定的矩形（图二，17～20）、六边形（图二，21）和梯形（图二，22）的铁质銙；长条形铜片制成的青铜銙（图二，23）；1 个半椭圆形的青铜銙残片（图二，24）。腰带的总长度不短于 110 厘米，宽度在 3.6 厘米以内。腰带的带扣向左侧系结。发掘时记录的信息为我们复原腰带结构提供了依据（图五，B，5）。

**5. 15 号冢**

铁质腰带具放置在年龄为 35～40 岁的男性墓主人的骨盆偏上腹部。腰带具包括 1 个有活动扣舌的边框为椭圆形的带扣，带扣后接椭方形折页（图一，Ⅳ，1）；4 个缀环




图二　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13号冢出土的金属腰带具及排列顺序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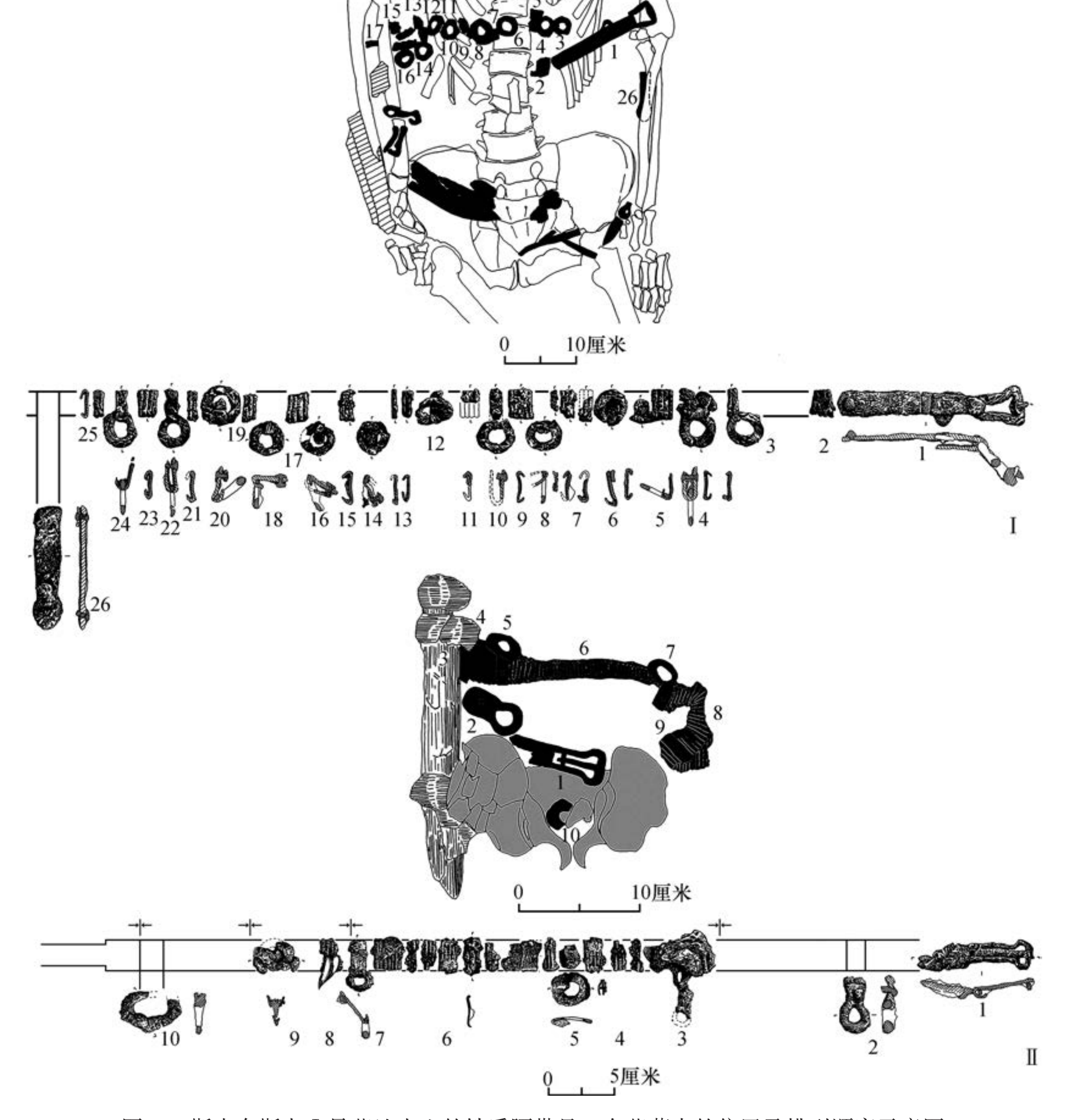
1. 带扣　2. 带环　3. 带固定环的銙　4～12、14～24. 銙　13. 开口带箍

（1、4～12、15～22. 铁质　2、3、14、23、24. 青铜　13. 青铜、皮革）

的折页状銙（图一，Ⅳ，2～4）：1个在腰带右半部的前面，2个在腰带的侧面，1个在腰带左半部的前面。腰带的宽度不窄于4厘米，从带扣到腰带另一端的金属带具之间的长度为80厘米。腰带向左侧方向系结。根据出土的带具及其在墓葬中的位置，可做出带具复原示意图（图五，A，3）。

**6. 17号冢**

腰带位于骨盆上方14厘米处，墓主人为15～16岁的少年（图三，Ⅰ）。腰带上有以下铁质带具：1个边框为梯形的带扣，带扣后接长条形折页（图三，Ⅰ，1）；12个缀环的折页状銙板（图三，Ⅰ，3、4、6、8、10、12、14、16、18、20、22、24）；至少53个銙状饰板，并排固定在腰带的各段（图三，Ⅰ，2、5、7、9、11、13、15、17、19、21、23、25）；皮带的末端有1个带头（图三，Ⅰ，26）。腰带主体的宽度不窄于2厘米，从腰带一端的金属带具到另一端的带扣之间的长度为73厘米。腰带向左侧系结，总长度可能超过100厘米。根据发掘出土遗物，可以复原腰带具的结构（图五，B，6）。




图三　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出土的铁质腰带具、在墓葬中的位置及排列顺序示意图

Ⅰ. 17 号冢（1. 带扣　2、5、7、9、11、13、15、17、19、21、23、25. 銙状饰板　3、4、6、8、10、12、14、16、18、20、22、24. 缀环的折页状銙　26. 金属带头）Ⅱ. 21 号冢（1. 带扣　2. 带环　3. 链环　4、6、8. 銙状饰板　5、7、9. 缀环的銙　10. 带环）

**7. 19 号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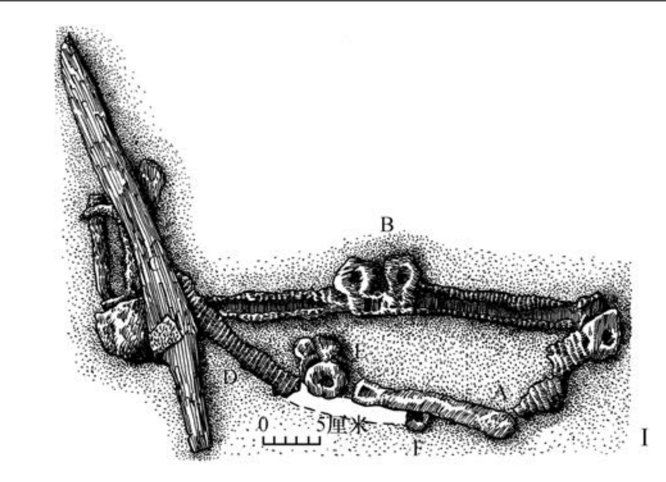
墓主人为 35 岁男性，该墓的腰带具保存状况最好[①]。金属腰带具位于墓主人盆骨上方 10 厘米处。发现了数量较多的腰带残片，根据其位置可清楚地再现系在墓主人身上的已腐烂的皮带的轮廓（图四，Ⅰ）。复原后的腰带具包括以下几部分（图五，B，7）：带固定扣针的带扣，带扣后接长条形折页（图四，Ⅱ，1）；7 个缀环的折页状銙（2 个在腰带背面的中部，2 个在腰带的右侧，3 个在腰带的左侧）（图四，Ⅱ，2、4、6、8、10、12、14）；至少 167 个并列分布的銙状饰板（图四，Ⅱ，3、5、7、9、11、13）；缀固定环的銙（图四，Ⅱ，15）。金属腰带具（包括带扣）的长度在 68 ~ 73 厘米。腰带总长不超过 120 厘米，皮带宽 1.9 ~ 2 厘米，腰带的末端略收窄，穿入带扣。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时缀环都位于折页状銙的上方。这种反常的摆放位置说明下葬时腰带倒置在武士的身上。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腰带旁边有一把插入剑鞘中的刀，刀尖向上指向人的头部（图四，Ⅰ）。很可能腰带在下葬时是解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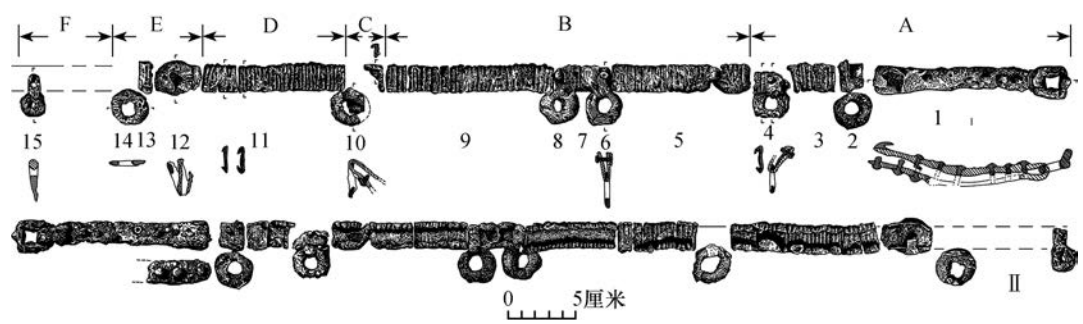
**8. 21 号冢**

墓主人为 5 ~ 6 岁的儿童，铁质腰带具分布在盆骨附近（图三，Ⅱ）。腰带具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 个横轴上有活动扣舌的轮廓为 T 形的带扣，带扣后接椭方形折页（图三，Ⅱ，1）；1 个一端连接梯形折页的带环（图三，Ⅱ，2）；1 个缀着链环的带板，链环下连着一把刀（图三，Ⅱ，3）；3 个缀环的折页状銙（图三，Ⅱ，5、7、9）；銙状饰板（至少 58 块）为纵向的窄长方形，在腰带具背面的有些区段形成连续的金属“条带”（图三，Ⅱ，4、6、8）；1 个椭圆形带环（图三，Ⅱ，10）。腰带总长至少 70 厘米，宽 2 厘米，腰带末端宽 1.5 厘米。我们根据出土材料绘制出腰带复原示意图（图五，B，8）。

---

①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Шмидт А. В. Боевые ножи кочевников Алтая эпохи “великого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народов”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народов степной Евразии.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12а, С. 59-65;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Шмидт А. В. Наборный пояс сяньбий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лтае //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Монголии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й Сибири. Улан-Батор: Изд-во Монгол. гос. ун-та, 2012б, С. 116-120;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Поясные бляхи сяньбийско-жуж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лтае // Изв.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2013а, № 4/1 (80). С. 204-213;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Воинское погребение раннежуж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могильнике Степушка-I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лтае // КСИА. 2013б, Вып. 231. С. 59-71.




图四 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 19 号冢出土的铁质腰带具及其排列顺序示意图

（Ⅰ为墓葬中腰带的摆放位置；Ⅱ为腰带结构示意图）

1. 带扣 2、4、6、8、10、12、14. 缀环的折页 3、5、7、9、11、13. 折页 15. 缀活动环的折页

（腰带具分布图上的拉丁字母，是腰带具从墓葬里分段取出时的分段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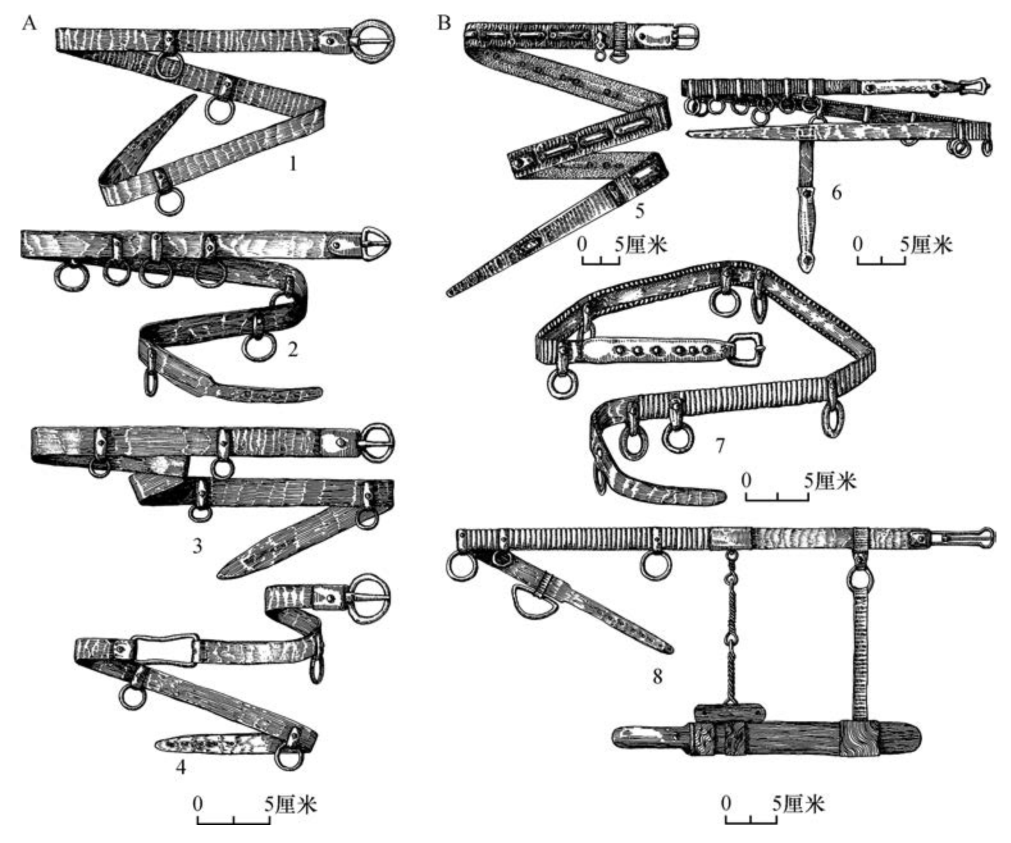
## 二、腰带具对比分析

经复原后重新排列组合的腰带具，是考古研究的重要断代依据。下面我们分类介绍斯杰布斯卡Ⅰ号遗址出土遗物。

**1. 带扣**

多数的腰带具（5、6、9、15 号冢）用带扣系结，带扣边框为椭圆形，有活动的扣舌，用折页固定在腰带上（图一，Ⅰ，1；Ⅱ，1；Ⅲ，1；Ⅳ，1）。从 2 世纪后半叶至 3 世纪初到 5 世纪，布兰－科宾文化人群都使用这种腰带。目前已经在阿尔泰地区的民族大迁徙时代墓葬中发现至少 20 件这类腰带，墓葬的年代主要为 3～4 世纪[①]。

① Матренин С. С. Комплексный анализ поясных пряжек кочевников Алтая сяньбийско-жуж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 Изв.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2013, № 4/1 (80). С. 231, 232.




图五　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出土腰带具复原示意图

A：1. 5 号冢　2. 6 号冢　3. 15 号冢　4. 9 号冢

B：5. 13 号冢　6. 17 号冢　7. 19 号冢　8. 21 号冢

出自 13 号冢的带扣为弧形边框带活动扣针，用椭方形折页固定在腰带上。这种形制的带扣在 3 ~ 5 世纪阿尔泰游牧人墓葬中比较少见①，在图瓦西部 5 世纪的属于肯科尔（文化）晚期遗存的乌斯季 – 哈德内赫Ⅲ号墓地（Усть-Хадынных Ⅲ）（21 号冢）发现了与其最相似的铁质带扣（但不完全相似）②。在阿尔泰东部年代为 5 世纪下半叶至 6 世纪上半叶的库德尔克墓地（Кудыргэ）的突厥墓中，发现了一个形制与其相似的装饰性带扣③。

21 号冢出土的边框轮廓为 T 字形（顶部为半椭圆形）的有活动扣舌的带扣，能够

① Матренин С. С. Комплексный анализ поясных пряжек кочевников Алтая сяньбийско-жуж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 Изв.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2013, № 4/1 (80). С. 231, 232.

② Панкова С. В. Погребения середины I тыс. н. э. в Западной Туве //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2003, № 11. С. 92-106. Рис. 4, 11.

③ Илюшин А. М. Могильник Кудыргэ и вопросы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аяно-Алтая //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Саяно-Алтае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Новосиб. ун-та, 2000, С. 157-169. Рис. Ⅱ, 1.

反映出不同时期欧亚草原东部和西部在游牧装备方面的相似性。东欧草原的游牧民族在萨尔马特时代中期（1 世纪下半叶至 2 世纪初）和晚期阶段（2 世纪下半叶至 3 世纪上半叶）使用此类带扣[①]。在图瓦地区属于乌卢格－赫姆文化晚期阶段的艾尔米雷格 XXXI 号墓地，以及年代为 3 ~ 5 世纪的肯科尔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带扣[②]。但是，与欧洲样式相似的腰带具不见于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 2 世纪的墓葬。阿尔泰地区布兰－科宾文化的人群最早在 3 世纪初期才开始使用这种形制的带扣[③]。

17、19 号冢的带扣为梯形边框，一端有固定的扣针，用细长条形折页将带扣固定在带身上。这种带扣在阿尔泰地区流行范围有限，这与阿尔泰－萨彦山地的国家有关。图瓦是这种带扣的流行中心，它们常见于 3 世纪下半叶的肯科尔文化遗存[④]。叶尼塞河

---

① Симоненко А. В. Хронология и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сармат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еверного Причерноморья // Сарматские культуры Еврази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хронологии. Краснодар: Фирма НСС, 2004, С. 134-173; Медведев А. П.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и хронология сармат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на Среднем и Верхнем Дону // Сарматские культуры Еврази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хронологии. Краснодар: Фирма НСС, 2004, С. 86-94. Рис. 1, 53; Труфанов А. А. Пряжки ранних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о-римских форм в Северном Причерноморье // РА. 2004, № 4. С. 160-170. Рис. 4, 1, 3-10; Малашев В. Ю.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ременных гарнитур позднесармат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 Сарматы и их соседи на Дону. Ростов-н/Д.: Терра, 2000, С. 194-232. Рис. 3Б, 2, 3; 5А, 3; Зайцев Ю. П., Мордвинцева В. И. Варварские погребения Крыма Ⅱ в. до н. э.-I в. н. э. // Сарматские культуры Еврази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хронологии. Краснодар: Фирма НСС, 2004, С. 174-204. Рис. 8, 37, 38.

② Дьяконова В. П. Большиекурганы-кладбищанамогильнике Кокэль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раскопок за 1963, 1965 гг.) // Тр. Тувинс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 Ⅲ: Мат-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окэль. Л.: Наука, 1970, С. 80-209.Табл. Ⅻ, 24, 33, 47; Николаев Н. Н. Поясные наборы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окэль //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Археология. Ритуал. Культура. СПб.: Изд-во СПбГУ, 2000, С. 70-85. Рис. 3, 2; 4, 2, 5.

③ Матренин С. С. Комплексный анализ поясных пряжек кочевников Алтая сяньбийско-жуж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 Изв.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2013, № 4/1 (80). С. 228-237.

④ Вайнштейн С. И., Дьяконова В. П. Памятники в могильнике Кокэль конца I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до нашей эры-первых веков нашей эры // Тр. Тувинс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 Ⅱ. М; Л.: Наука, 1966, С. 185-291. Табл. XIII, 17; Вайнштейн С. И. Раскопки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окэль в 1962 г. (погребения кызылганской и сыын-чуре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 // Тр. Тувинс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 Ⅲ: Мат-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окэль. Л.: Наука, 1970, С. 7-79. Рис. 100, 1; Дьяконова В. П. Большиекурганы-кладбищанамогильнике Кокэль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раскопок за 1963, 1965 гг.) // Тр. Тувинс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 Ⅲ: Мат-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окэль. Л.: Наука, 1970, С. 80-209. Табл. Ⅺ, 35-38, 41, 58; Ⅻ, 30, 32, 48.

中游的斯塔罗奥兹纳切斯卡亚渡口Ⅰ号墓地（Староозначенская переправа Ⅰ）也发现了形状类似的带扣[①]。与其结构相似的有色金属质地的带扣见于年代更晚的塔施提克文化的伊济赫斯基－切塔斯1号大墓（Изыхский чаатас）（不早于6世纪）[②]。这种带扣可能是在3世纪至4世纪之交从图瓦游牧人那里传入阿尔泰的。

**2.** 銙

大部分折页状銙的下面都缀环（总计38件）。在中央亚洲地区，此类器物最早见于（但基本上是单一的）东南外贝加尔的年代为1世纪末至3世纪初的佐尔郭勒Ⅰ号墓地（Зоргол Ⅰ）[③]。在这一地区的晚期，这类器物见于3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的杜洛伊Ⅰ号墓地（Дурой Ⅰ）的鲜卑墓葬，以及4～6世纪的布尔霍图伊文化的墓葬[④]。这类折页状銙较早的例子见于图瓦的巴依－达格Ⅱ号墓地和艾尔米雷格XXXI号墓地，但更多的是出自该地3～5世纪的肯科尔文化墓葬[⑤]。缀环的铁质折页状銙的相对年代应在2～5世纪（倾向从2世纪末至3世纪初开始流行）。2～5世纪的阿尔泰地区的布兰－科宾文

① Тетерин Ю.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таштыкского костюм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грунтовых могил) // Евразия: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древн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Вып. 2: Горизонты Евраз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Новосиб. ун-та, 1999, С. 56-65. Рис. 2, 12.

② Вадецкая Э. Б. Таштыкская эпоха в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СПб.: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9, 440 с. Табл. 90.

③ Яремчук О. А. Могильник Зоргол-I-памятник хунно-сяньбийской эпохи степной Даурии: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Чита, 2005, 296 с. Рис. 96, 5.

④ Кириллов И. И., Ковычев Е. В., Кириллов О. И. Дарасун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Восточное Забайкалье.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00, 176 с. Рис. 81, 4, 18-20; Зюзин А. В. Предметы вооружения из сяньбийского могильника Дурой-I в Восточном Забайкалье //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история Евраз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опыт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й. Барнаул: Азбука, 2008, С. 168-169.

⑤ Вайнштейн С. И., Дьяконова В. П. Памятники в могильнике Кокэль конца I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до нашей эры-первых веков нашей эры // Тр. Тувинс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 Ⅱ. М.; Л.: Наука, 1966, С. 185-291. Табл. XIII, 12, 22; Дьяконова В. П. Большиекурганы-кладбищанамогильнике Кокэль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раскопок за 1963, 1965 гг.) // Тр. Тувинс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 Ⅲ: Мат-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окэль. Л.: Наука, 1970, С. 80-209. Табл. XI, 13-24, 47; XII, 5-7, 23-28; Николаев Н. Н. Поясные наборы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окэль //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Археология. Ритуал. Культура. СПб.: Изд-во СПбГУ, 2000, С. 70-85. Рис. 3, 4, 12; Панкова С. В. Погребения середины I тыс. н. э. в Западной Туве //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2003, № 11. С. 92-106. Рис. 4, 6-8; 6, 6.

化墓葬有与此类似的折页状銙，这些墓葬位于卡尔班Ⅰ号墓地（Карбан Ⅰ）、特塔克西克Ⅵ号墓地（Тыткескень Ⅵ）、比克Ⅰ号墓地（Бике Ⅰ）、乌力塔墓地（Улита），阿伊雷塔什Ⅰ号墓地（Айрыдаш Ⅰ）、乌鲁格－乔尔图赫Ⅰ号墓地、别雷－博姆Ⅲ号墓地（Белый-Бом Ⅱ）、布兰－科宾Ⅳ号墓地、亚洛曼墓地（Яломан Ⅱ）、韦尔赫－乌依蒙墓地、卡克－波什墓地、佳良（Дялян）墓地[①]。

出自13号冢的细长或略弯曲的条形和梯形铁质銙，常见于1世纪至4世纪末东南外贝加尔的鲜卑遗存[②]。在布尔霍图文化人群的装备中，这种铁銙与鲜卑有关[③]。这种形制的铁銙在图瓦地区较少见，只见于艾尔米雷格ⅩⅩⅪ号墓地（1～3世纪早期），以及后来的肯克尔文化遗存（3～5世纪）[④]。现有发现表明，这种折页状铁銙最早传入阿尔泰地区是由于受到鲜卑物质文化的影响，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初是它们在中央亚洲地区最流行的时期。突厥文化遗存出现之后，阿尔泰的此类铁銙随之不再流行。此类铁銙可能“勉强持续到”5世纪下半叶和6世纪初，如在库德雷克墓地（Кудыргэ）的仪式性围墙内发现了与其相似的器物[⑤]。

---

①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Поясные бляхи сяньбийско-жуж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лтае // Изв.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2013а, № 4/1 (80). С. 209, 210.

② Яремчук О. А. Могильник Зоргол-I-памятник хунно- сяньбийской эпохи степной Даурии: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Чита, 2005, 296 с. Рис. 96, 6; 97, 4, 7; 99, 1, 2, 5-7, 10; 100, 2-4; 101, 2-7; 103, 1-4; Зюзин А. В. Предметы вооружения из сяньбийского могильника Дурой-I в Восточном Забайкалье //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история Евраз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опыт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й. Барнаул: Азбука, 2008, С. 168-169.

③ Асеев И. В., Кириллов И. И., Ковычев Е. В. Кочевник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огребени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4. 201 сТабл. ⅩⅩⅤ, 7, 11; ⅩⅩⅥ, 3; Литвинцев А. Ю. Комплекс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пади Кирпичной // Зап.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краеведч. музея. Вып. 2. Нерчинск, 2006, С, 46-48. Рис. 38, 7.

④ Дьяконова В. П. Большиекурганы-кладбищанамогильнике Кокэль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раскопок за 1963, 1965 гг.) // Тр. Тувинс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 Ⅲ: Мат-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окэль. Л.: Наука, 1970, С. 80-209. Табл. Ⅻ, 9; Панкова, 2003, Рис. 4, 10; Панкова С. В. Погребения середины I тыс. н. э. в Западной Туве //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2003, № 11. С. 92-106; Данченок Г. П., Нестеров С. П. Два погребения гунно- сарматской эпохи из Аймырлыг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й в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палеоэколог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9, С. 94-103. 1989, Рис. 2, 11.

⑤ Илюшин А. М. Могильник Кудыргэ и вопросы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аяно-Алтая //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Саяно-Алтае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Новосиб. ун-та, 2000, С. 157-169. Рис. V, 10.

13 号冢发现的长条形铁銙在中央亚洲地区极少见。可以确切地说，此类遗物来自图瓦地区的艾尔米雷格 XXXI 号墓地（1～3 世纪初）。在东外贝加尔年代为 1 世纪的晚期匈奴墓地——起亚 13 号墓地（Кия 13）中发现过类似的铁銙。在阿尔泰地区的阿伊雷塔什Ⅰ号、布兰－科宾Ⅳ号、韦尔赫－乌依蒙、卡克－波什、佳良和亚洛曼Ⅱ号等墓地也发现此类铁銙[①]，此类腰带具从 3 世纪开始便在阿尔泰地区的游牧人群中广为流传，它们在布兰－科宾文化中存在的年代上限是 5 世纪[②]。

17、19、21 号冢出土腰带上的折页状銙，与东南外贝尔加晚期鲜卑墓葬所出的非常相似（3 世纪下半叶至 4 世纪），也发现于布尔霍图文化的墓地（4～6 世纪）[③]。与其相似的器物发现于托木斯克鄂毕河沿岸地区的年代为 5～6 世纪初的鄂毕河上游文化的季米里亚泽夫斯基库尔干Ⅰ号墓地（Тимирязевский курганный могильник Ⅰ）[④]。根据目前的发现可知，此类折页状銙最早见于晚期的鲜卑游牧人遗存。布兰－科宾文化的此类銙的年代可断在 4～5 世纪，在阿尔泰地区的布兰－科宾Ⅳ号、别雷－博姆Ⅲ号、卡克－波什、阿伊雷塔什Ⅰ号等墓地均有发现。

6、19 号冢出土的缀固定环的折页状銙可以断在 2～5 世纪这一较长的时间范围内。

13 号冢出土的长条形青铜銙与很多地区的民族大迁徙时代墓葬出土的带具都有相似之处，如 4～6 世纪的科库列墓葬（когуреские погребения）、4 世纪末至 6 世纪初托木斯克鄂毕地区的上鄂毕文化墓葬、4～5 世纪东普里亚拉耶的德热特阿萨尔文化（джетыасар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墓葬、4 世纪末至 5 世纪哈萨克斯坦中部和黑海北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墓葬，以及 3 世纪下半叶至 4 世纪卡马河中游地区的马祖尼文化墓葬

---

① Соенов В. И., Эбель А. В. Курганы гунно-сарматской эпохи на Верхней Катуни.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 ГАГПИ, 1992. 116 с. Рис. 31, 39.; Тетерин Ю. В. Поясные наборы гунно-сарматской эпохи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 Проблемы охраны, изучения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Алтая.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гос. ун-та, 1995, С. 131-135. Рис. 76; Бобров В. В., Васютин А. С., Васютин С. А. Восточный Алтай в эпоху Великого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народов (Ⅲ-Ⅶ век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03, 224 с. Рис. 12, 41, 42; 13, 7, 23; 15, 34.

② Тишкин А. А., Матренин С. С. Поясные бляхи сяньбийско-жуж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гильника Степушка-I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лтае // Изв.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2013а, № 4/1 (80). С. 204-213.

③ Асеев И. В., Кириллов И. И., Ковычев Е. В. Кочевник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огребени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4, 201 с. 1984. Табл. XXI, 24; Зюзин А. В. Предметы вооружения из сяньбийского могильника Дурой-I в Восточном Забайкалье //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история Евраз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опыт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й. Барнаул: Азбука, 2008, С. 168-169.

④ Беликова О. Б., Плетнева Л. М. Памятники Томского Приобья в V-Ⅷ вв. н. э. Томск: Изд-во Томск. ун-та, 1983, 243 с. Рис. 10, 4; 11, 5; 13, 12.

等都出土过[①]。与之相似的带具在更早时期（1～3 世纪）已经出现于欧洲中部的巴尔巴里库姆（Барбарикум）人群中[②]。通过上述类比我们有理由推测，阿尔泰地区的这类带具出现于公元一千纪上半叶的晚段（很可能为 4 世纪）。更值得注意的是，斯杰布斯卡Ⅰ号出土的这种銙的固定方式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这是该墓地特有的（地域性的）带具结构。

13 号冢出土的椭圆形青铜銙，根据形态特征可断代为 2～5 世纪（可能在 3～4 世纪）。带固定环的“斧形”青铜銙上有铆钉，这与图瓦地区肯科尔文化科热埃里格－霍武－58-V 号（Кожээлиг-Хову 58-V）墓地（埋在草皮下）出土腰带具的细节相似[③]。这种腰带具的风格与年代为 2～3 世纪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所出的金属带銙相似。布兰－科宾文化和肯科尔文化的这种带具很可能是鲜卑带具在较晚时期的仿制品，年代不早于 3 世纪，很可能接近于 3 世纪的中下半叶。13 号冢出土的带固定环的銙由卷成半空心的平板制成，与萨尔马特晚期（2 世纪下半叶至 3 世纪上半叶）、中卡马地区（从 3 世纪到 4 世纪之交）、上鄂毕地区（不早于 2 世纪）、图瓦的肯科尔文化（不早于 3 世纪）等地的人群，以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4 世纪末 6 世纪上半叶）和科库列部落（4～5 世

① Генинг В. 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оясной гарнитуры I тыс. н. э.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Прикамья) // КСИА. 1979, Вып. 158. С. 96-106. Рис. А, 9; Б, 6; Ж, 17, 18; Беликова О. Б., Плетнева Л. М. Памятники Томского Приобья в V-Ⅷ вв. н. э. Томск: Изд-во Томск. ун-та, 1983, 243 с. Рис. 42, 7; 49, 5.; Засецкая И. П. Культура кочевников южнорусских степей в гуннскую эпоху (конец Ⅳ-Ⅴ вв. н. э.). СПб.: Эллипс Лтд, 1994, 224 с. Табл. 34, 7; 46, 5; Левина Л. М.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Приаралья. I тысячелетие до н. э.-I тысячелетие н. э. М.: Вост. лит., 1996, 396 с. Рис. 129, 9, 10, 14; 133, 1; Останина Т. И. Население Среднего Прикамья в Ⅲ-Ⅴ вв. Ижевск: Изд-во УИИЯЛ, 1997, 326 с. Памятники кокэл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увы: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 следования. СПб.: ЭликСис, 2010, 252 с. Рис. 11, 18, 19, 21, 38; 23, 14-18; 24, 10; 25, 2; 28, 3; 30, 17; 张雪岩：《集安出土高句丽金属带饰的类型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4 年，264～278 页。Бобров Л. А., Худяков Ю. С. Военное дело сяньби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итая Ⅳ-Ⅵ вв. н. э. // Военное дело номад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сяньбийскую эпоху.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Новосиб. ун-та, 2005, С. 80-199. Рис. 25.

② Малашев В. Ю.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южноуральских степей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Ⅱ-Ⅳ в. н. э.: поздне-сарматская или гунно-сарма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ы (вещевой комплекс) // РА. 2007, № 3. С. 111-121. Рис. 2, 4.

③ Грач А. Д.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Кара-Холе и Монгун-Тайге (полевой сезон 1958 г.) // Тр. Тувинс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 I: Мат-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Западной Тувы. М.; Л.: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60,С. 73-150.

纪）流行的腰带具相似[①]。在阿尔泰发现的唯一的有这种形状的带具出自巴列克特尤利墓地的 227 号冢，其年代为 2 世纪末至 3 世纪上半叶（接近世纪中叶）[②]。布兰－科宾文化墓葬的这类带具的年代不早于 3 世纪。目前还不能确定布兰－科宾文化的这类带具的年代下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带具不见于阿尔泰地区 5 世纪下半叶至 11 世纪的突厥人墓葬。

17 号冢出土的皮带上的铁质带头，由一块整体笔直的舌形板制成，用铆钉固定在腰带上。阿尔泰地区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游牧人遗存中很少见到这种腰带具。1 世纪晚期至 2 世纪早期的匈奴墓葬中就已经发现用铆钉固定在皮带末端的“实验性”带具。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的带头与晚期萨尔马特人的青铜带头——坠饰相似，后者出现于 3 世纪上半叶[③]。在卡马地区，从 3 世纪下半叶至 3 世纪末，再到 5 世纪的遗存中发现了与此类似的有色金属质地的带头和带板[④]，如布兰－科宾文化的阿伊雷塔什Ⅰ号墓地和卡克－波什墓地均有发现。阿尔泰地区的这种舌形带头的年代上限为 3 世纪，最新发现的年代为 4 世纪末至 5 世纪上半叶。

9 号冢出土的铁质腰带上的串连带扣的边框为凹边梯形，有半圆形的折页，在图瓦

---

① Троицкая Т. Н. Кул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м Приобье.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79, 124 с. Табл. XXⅣ, 10; Данченок Г. П., Нестеров С. П. Два погребения гунно- сарматской эпохи из Аймырлыг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й в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палеоэколог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9, С. 94-103. Рис. 3, 3; Останина Т. И. Население Среднего Прикамья в Ⅲ-Ⅴ вв. Ижевск: Изд-во УИИЯЛ, 1997, 326 с; Памятники кокэл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увы: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 следования. СПб.: ЭликСис, 2010, 252 с. Рис. 29, 13; 32, 1; 34, 17; 35, 20; 36, 19; 67, 24; Малашев В. Ю.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ременных гарнитур позднесармат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 Сарматы и их соседи на Дону. Ростов-н/Д.: Терра, 2000, С. 194-232; 张雪岩：《集安出土高句丽金属带饰的类型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4 年，264 ~ 278 页；Гао Фэн. Северо-вэйские погребения на шоссе в городе Датун провинции Шанси // Вэньу. 2006, № 10. С. 51- 71 (на кит. яз.); Малашев В. Ю., Яблонский Л. Т. Степ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Южного Приуралья в поздне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по мате- 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а Покровка-10. М.: Вост. лит., 2008, 365 с.

② Сорокин С. С. Погребения эпохи “великого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народов” в районе Пазырыка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 Гос. Эрмитажа. Вып. 18. Л.: Аврора, 1977, С. 57-67. Рис. 5, 15.

③ Малашев В. Ю.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ременных гарнитур позднесармат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 Сарматы и их соседи на Дону. Ростов-н/Д.: Терра, 2000, С. 194-232. Рис. 6Д, 1.

④ Генинг В. 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оясной гарнитуры I тыс. н. э.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Прикамья) // КСИА, 1979, Вып. 158. С. 96-106. Рис. А, 13; Г, 11; Д, 17, 22-23; Останина Т. И. Население Среднего Прикамья в Ⅲ-Ⅴ вв. Ижевск: Изд-во УИИЯЛ, 1997, 326 с. Памятники кокэл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увы: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 следования. СПб.: ЭликСис, 2010, 252 с. Рис. 51, 34.

地区3世纪末至4世纪的肯科尔文化遗存中有类似的带扣[①]。鄂毕河上游和库兹涅茨克阿拉套山麓的福明斯克文化（3世纪至4世纪上半叶）遗存中发现了1或2个可以自由转动的折页[②]。阿尔泰地区年代为4～5世纪的别雷－博姆Ⅲ号、布兰－科宾Ⅳ号、卡克－波什、亚洛曼Ⅱ号和佳良等墓地也发现这种腰带具。

**3. 带环－吊环**

有青铜（13号冢）和铁质（21号冢）两种质地（图二，2；图三，Ⅱ，10），可以套上皮绳圈固定在腰带上、缝在皮带上，或者缝在可以自由活动的皮条上。布兰－科宾文化年代在2～5世纪的遗存中也有类似的带具。除阿尔泰地区以外，这种带具更多的是见于图瓦地区年代为3～5世纪的肯科尔文化遗存。

总之，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5～7号和15号冢出土的金属腰带具在2～5世纪的布兰－科宾文化中很常见。我们将17号和19号冢出土的腰带具与阿尔泰地区4～5世纪的卡克－波什和布兰－科宾Ⅳ号墓地出土腰带具做了类比（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尚未完全发表）。这些地点出土腰带具的结构与21号冢腰带具接近，具有4世纪考古遗存的特征。13号冢腰带具原型的年代为3～4世纪。因此，根据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出土的腰带具，可以复原布兰－科宾文化人群使用的几类腰带具，包括17、19、21号冢出土的比较少见的腰带具，以及出自13号冢的以前未见过的腰带具。根据上述腰带具研究成果，可以复原布兰－科宾文化其他墓葬保存下来的部分腰带具的形制。

综上所述，斯杰布斯卡Ⅰ号墓地是阿尔泰地区鲜卑－柔然时期的重要考古遗存，这里发现的考古材料对于进一步深化北亚民族大迁徙时代游牧文化的区域性分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本成果得到阿尔泰国立大学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第220号决议）的资助（项目编号2013-220-04-129）。

本文作者感谢N. N.尼古拉耶夫先生提供了收藏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匈奴－鲜卑时期的艾尔米雷格XXXI号墓地的部分藏品。同时感谢E. B.科维切夫先生允许作者使用起亚13号墓地尚未公开发表的材料。遗憾的是，这座墓地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作者不能确定是否所有铁制品均为腰带具。

---

① Дьяконова В. П. Большиекурганы-кладбищанамогильнике Кокэль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раскопок за 1963, 1965 гг.) // Тр. Тувинской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 Ⅲ: Мат-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могильника Кокэль. Л.: Наука, 1970, С. 80-209. Табл. Ⅺ, 30, 31, 39; Ⅻ, 35.

② Ширин Ю. В. Верхнее Приобье и предгорья Кузнецкого Алатау в начале I тыс. н. э. (погребаль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фоми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овокузнецк: Кузнецкая кре- пость, 2003, 288 с. Табл. Ⅺ, 4, 5; Ⅻ, 2; XXV, 2-4; LXVI, 3, 4.

译者附记：

（1）本文原文发表于俄罗斯考古期刊《俄罗斯考古学》2015年1期，121～135页。

（2）本文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YJSCX2021-115HLJU）。

（3）本文原文只用字体区分文中的标题级别，中文译文将第一级别标题加了标题编号。本文的有些腰带具的形制和结构不见于中国古代腰带具，但是与后者有一定联系。译文中的銙、折页、折页状銙、銙状饰板、带环、带头等腰带具名称，是译者根据汉唐时期腰带具名称翻译或组合成的名词，与俄文原文的带具名称差别很大。译文中的“冢”的俄文原文是Курган，音译是“库尔干”，是指地表有封石堆或封土堆的墓葬，封石堆或封土堆下有一个或几个墓坑。在中文的现代考古专业词汇中，没有与Курган完全对应的词汇。古代汉语中的“冢”的含义与Курган基本相同。所以，本译文将Курган均翻译为“冢”。

## The Belts of the Altai Nomads Decorated with Plates of the Migration Period from the Site Stepushka I

Aleksey A. Tishkin　Sergey S. Matrenin　Artur L. Kungurov

**Abstract:** The article provides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complex examination of the belts' finds with decorated panels of the migration period from the barrow of the Bulan-Kobinsk culture Stepushka I excavated completely in 2010 in Ongudaysky District of the Republic Altai. The analyzed collection consists of metal buckles, plates, hanger rings, and a belt distributor and a belt tip. These makes were found in situ which helped to reconstruct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of the belts with decorated plates as well as their unique modification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elt sets found allowed identifying their relative chronology under the Xianbei-Rouran period (2th–5th cc. AD) and narrow periods of existing of some makes under 4th–5th cc. The received materials have proved to be an informative source for archaeological dating and finding regional and chr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ornamenting of belts with decorated plates in nomads of Altai in the migration period.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belts from the barrow Stepushka I confirm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ckles and plates among the population of the Bulan-Kobinsk culture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ized fashion of the belt sets and had its uniquenes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munitions of the European peoples. This has been reflected in different dur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morphological attributes of makes and dissimilarity of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of similar objects.

**Keywords:** Altai; nomads; the Xianbei-Rouran period; the Bulan-Kobinsk culture; a belt decorated with plates; chronology; reconstruction

# 俄罗斯阿穆尔州奥西诺沃湖村址中靺鞨陶工的陶器

涅斯捷罗夫 C. П[1] 著　盖莉萍[2] 译

（1. 俄罗斯联邦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新西伯利亚，俄罗斯联邦；
2.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1965年、2009年、2013～2015年在奥西诺沃湖湖畔发掘的4处房址和相邻的8～9世纪中世纪早期村址的生活区出土的一组靺鞨陶工的陶器。这组陶器包括厨具、餐具和容器，它们用于冶金生产、种植和捕鱼。专家认为，普通家用器皿通过工艺改进的方式具备了技术所需要的功能。村里的陶工仅塑造器皿作为容器的雏形，改变陶制品的功能已经超出了陶工最初塑制的范围。通过对陶器的技术工艺分析，认为陶器加工使用了四种成型材料的配方。当地陶工以手工塑制小器皿，而在陶轮上完成大型陶器。在村址里还发现了轮制陶器的陶片。因陶片是在房址外发现的，并且其尺寸较小，故暂不能断定其年代和文化属性，甚至不能确定其制造地点。

**关键词：**靺鞨　特洛伊茨基组　陶器　陶轮

## 一、绪　　论

1965年、2009年、2012年和2013～2015年分别对奥西诺沃湖的中世纪遗址进行过考古研究。共发掘了4所靺鞨特洛伊茨基组房址①。其中两所位于奥西诺沃湖考古文化的新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的村址内，另外两所是村址的一部分，位于村址西北的480米处。房址内发现了完整的或者考古学意义上完整的形状和用途各异的容器。具体

---

① 杰烈维扬科 E. И.：《黑龙江（阿穆尔河）中游的靺鞨遗存》，科学出版社，1975年。杰烈维扬科 A. П.、涅斯捷罗夫 C. П. 等：《2009年奥西诺沃湖中世纪早期村址发掘报告》，韩国文化遗产国立研究院出版社，2010年。涅斯捷罗夫 C. П.：《黑龙江（阿穆尔河）沿岸西部地区的大型靺鞨房址结构》，《西伯利亚的人文科学》2015年2期，69～74页。科瓦连科 C. B.、沃尔科夫 Д. П. 等：《2013～2015年黑龙江（阿穆尔河）沿岸西部地区奥西诺沃湖村落研究成果》，罗斯托克出版社，2018年，124～136页。

情况是在1965年发掘的房址里发现了3件陶器，在2009年发掘的房址里发现了11件陶器，在2012年发掘的房址中发现了10件陶器，在2013～2015年发掘的房址里发现了6件陶器。此外，在这里还捡拾到了常用大容器的残片，即蒸煮食物的辅助用具，如高脚盘、碗和杯子，它们可以单独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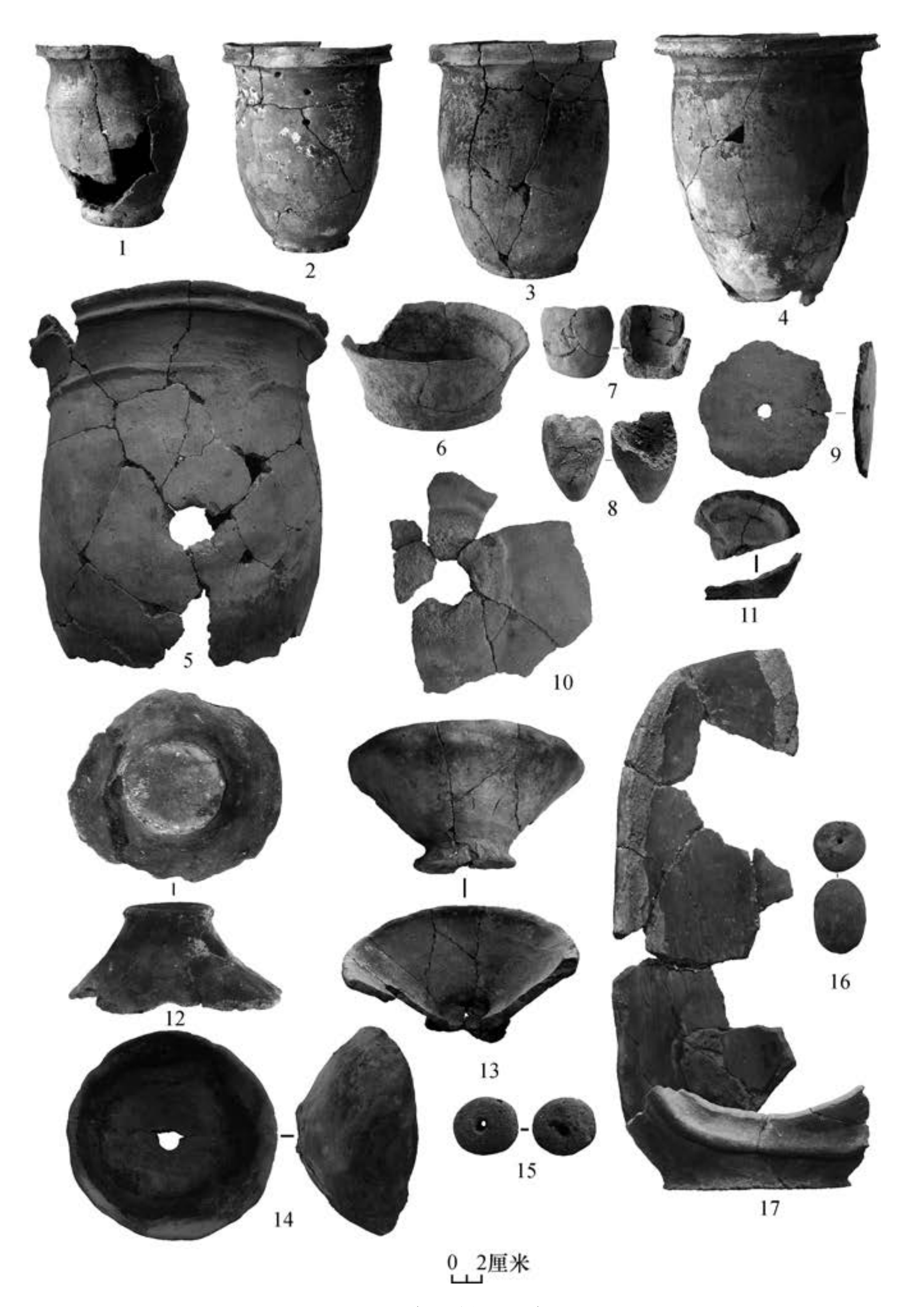
## 二、陶　制　品

陶工的制品包括塑造的厨具和餐具，用于存储颗粒和液态食物的较大容器和技术用陶器。Л. Н. 梅莉尼科娃对这些陶器进行了技术和工艺分析，阐述了四种成型材料的配方：黏土＋有机物（残渣）、黏土＋砂、黏土＋砂＋有机物和黏土＋砂＋火泥[①]。成型材料的配方中加入沙子，以及同时加入砂子和有机物，极有可能是在胜泥中加入有机溶液。其中为了提高陶器的强度和耐湿性在成型材料中添加了各种动植物属性的自然黏合物，这些添加剂的功能性负荷与制品的干燥和煅烧程度紧密相关。因此，在确定这一传统（黏土＋有机物）特性时应关注到在做准备成型材料时，用一种不添加人造矿物质的原料，以及在村落里使用黏土＋砂子配方制作陶器是比较普遍的。其中最常用的配方是黏土＋砂＋有机物，它的占比超过80%[②]。

陶罐高12～21厘米（图一，1～4）。从外形上看，是把它们放在火上煮食物。陶罐还制有陶罐盖（图一，12、14）。在黑龙江沿岸西部地区的遗址中靺鞨特洛伊茨基组的专用陶罐盖是第一次被发现。大碗还可以作为盖使用（图一，13）。一套特别的器皿，包括深碗、杯子和小菜盘是最新的发现（图一，6、7、11）。这些器皿是轮制陶器，房址3发现的大陶罐高44厘米，罐沿直径29～29.5厘米，罐身直径为47厘米，罐底外直径为28.5、内径为27厘米。自罐身至罐底的内部是均匀平滑的。罐壁厚9.6～12、罐底厚1.5厘米，罐的边缘向外弯曲，罐截面为椭圆形。在罐颈高3厘米处有细平压纹。房址3发现的陶器，外形为瓶形，总高为30.5、颈部高4.5、陶器口沿直径为13、颈部直径9、罐底直径为14厘米（图二，10）。但是在这些收集品中有的是完整的在陶轮上加工出陶器的陶片（图二，3、9）。这些陶器使用了水平纹和波浪纹（图二，3、7、8、

① 杰烈维扬科 А. П.、涅斯捷罗夫 С. П. 等：《2009年奥西诺沃湖中世纪早期村址发掘报告》，韩国文化遗产国立研究院出版社，2010年。梅莉尼科娃 Л. Н.、涅斯捷罗夫 С. П.：《黑龙江（阿穆尔河）沿岸西部地区奥西诺沃湖村落的中世纪早期陶瓷综合体》，《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学报》，2011年10卷5期，197～211页。

② 杰烈维扬科 А. П.、涅斯捷罗夫 С. П. 等：《2009年奥西诺沃湖中世纪早期村址发掘报告》，韩国文化遗产国立研究院出版社，2010年。




图一　陶工制造的陶器

1～4. 陶罐　5. 陶炉　6. 陶碗　7. 陶杯　8. 陶坩埚　9. 10. 陶坩埚支架　11. 陶盘　12、14. 陶罐盖　13. 杯形陶碗　15. 陶纺锤　16. 陶渔坠　17. 风门

（14、15出自科瓦连科 С. В.，沃尔科夫 Д. П. 等:《2013～2015年黑龙江（阿穆尔河）沿岸西部地区奥西诺沃湖村落研究成果》，罗斯托克出版社，2018年，124～136页；其他图片出自作者的发掘报告）

10）或者两种组合纹做装饰（图二，3），局部伴有花的图案（图二，4）[①]。




图二　在陶轮上加工的陶器和陶器的陶片

（图片出自作者的发掘报告）

1、4～6、10、11. 陶器　2、3、7～9. 陶片

用村里材料制成的技术陶是一组专业产品：熔炼坩埚，用作熔炼有色金属和铁使用

① 梅莉尼科娃 Л. Н.、涅斯捷罗夫 С. П.:《奥西诺沃湖中世纪早期村落的陶器陶瓷》,《西伯利亚及毗邻地区考古、民族和人类学问题》，俄罗斯联邦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出版社，2010 年，406～410 页。

的类似便携式炉的陶罐片，陶风门（进气口）、陶渔坠，陶纺锤[①]。在 1965 年的房址中还发现了陶珠（黏土）[②]。

陶坩埚高 5.8、外沿最大直径 4.1 厘米。陶坩埚容积 11.86 立方厘米（图一，8）。它是用添加了较多粗草并固化良好的黏土制成的。陶坩埚呈锥形轮廓，陶坩埚下半部壁厚 9 ~ 10、陶坩埚沿厚 3 ~ 4、底厚 2 厘米。

陶渔坠呈椭圆形（5.3 厘米 ×3.7 ~ 3.8 厘米），在卵形一端有一个直径为 3 毫米的通孔（图一，16）。陶纺锤直径 3.5 厘米，它的横截面为椭圆形（图一，15）。

房址 3 发现的陶风门（进气口）卵形的底部（11 厘米 ×8 厘米）略向内凹陷。在距风门开口壁 1.5 厘米处附有平滑纹。风门开口的底壁几乎是光滑的。陶风门完整轮廓的高度为 40 厘米（图 1，17）。在房址 2 还发现了另一个风门的陶片。这些陶风门的显著特征是开口较深，几乎到了容器的底部（约开到壁端的 7/8 处）。

日用陶器通过再加工，添加其他功能，便可作为技术工具使用。小村陶工的作用就是把初加工陶器改造成技术容器使用，陶器改造后的用途已完全超出了原来的使用范围。于是，把去掉底部并在开口下端壁体上打一个孔的这件陶罐就变成了制造首饰用的轻便陶炉缸（图一，5），用炉缸做成支架并把陶坩埚安放在其上面（图一，9、10）。陶罐也用作陶坩埚，用来熔炼小剂量的铁[③]。在多尔科耶湖遗址也发现过作为熔炉缸的类似器具。在熔铁时，可以在陶罐壁上另外钻一个孔，作为鼓风的风嘴[④]。这种陶罐－熔炼炉是一次性使用的炉子，它有别于熔炼有色金属的容器炉。

## 三、特洛伊茨基组靺鞨制陶的一些特点

根据奥西诺沃湖村址的文献，分析其制陶工艺并阐述其多相性和复杂性。居住在村落里或者在附近居住的陶工们在制造陶器时使用了不同方法：手塑和特殊工具制陶。但是制陶的整个过程中主要是使用手工塑造，随后使用陶轮处理陶器的表面。在靺鞨陶工的工具装备中出现了用于修正手塑陶器的陶轮，根据房址 2 的放射性碳测定年代，该陶轮属于 8 世纪末至 9 世纪初。在当今奥西诺沃湖遗址文献中尚未明确定义出在陶轮上完整地制造的陶器。在发掘的房址中还没有发现这种器皿。发现的圆形陶器的陶片不仅可能属于更晚时期，而且是更晚时期在转轮上经过再加工的器具，但是它们是引进的物

① 科瓦连科 С. В.、沃尔科夫 Д. П. 等：《2013 ~ 2015 年阿穆尔河沿岸西部地区奥西诺沃湖村落研究成果》，罗斯托克出版社，2018 年，132 页。

② 杰烈维扬科 Е. И.：《黑龙江（阿穆尔河）中游的靺鞨遗存》，科学出版社，1975 年。

③ 杰烈维扬科 Е. И.：《黑龙江（阿穆尔河）中游的靺鞨遗存》，科学出版社，1975 年。

④ 涅斯捷罗夫 С. П.：《阿穆尔州多尔科耶湖畔的靺鞨冶金生产文献》，《西伯利亚的人文科学》2016 年 13 卷 2 期，19 ~ 23 页。

品，最有可能是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的，可能是渤海陶工制造的产品[①]。

奥西诺沃湖的陶工在制造陶器时，有可能在转轮上修整过陶器，他们不仅在形状上仿照了渤海轮制陶器，还修整了陶器外表。根据 Л. Н. 梅莉尼科娃教授的资料，陶器的“化学”处理就是给陶器加上一个特殊层，并使其表面平滑（用于陶器）。但是这些陶器与轮制陶器相同，是在火中烧制而成的[②]。

现今，暂时还不能叙述奥西诺沃湖村址里轮制制陶出现的过程和使用情况：这是否是当地制陶自我发展的过程，抑或是借鉴学习和时尚的结果，它可能与熟悉轮制陶的居民迁徙有关。但是，毫无疑问，制陶的本土特征清楚地表现在村址的陶器中。Л. Н. 梅莉尼科娃教授认为，这些印证了黏土 + 砂子 + 火泥配方的存在。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制陶生产中火泥在新石器时代就被人们所熟知，随着时间推移，火泥逐渐被砂子或者碎石屑替代[③]。

如果说研究人员比较熟悉靺鞨特洛伊茨基组村址和墓葬中发现的手塑制陶器的话，那么经过转轮再加工的完整的陶器在房址中被发现还是首次，虽然其陶片曾不止一次在村址中被发现（例如，特洛伊茨基墓地附近）。这些陶器外形类似罐、瓶和球，陶器高 22 ~ 44、胎身直径 22 ~ 47、壁厚 0.6 ~ 1.5 厘米（图二，1、10、11）。

在村落两处房址中还发现了带斜口的椭圆形陶器——陶风门（进气口）。陶风门不仅仅局限在靺鞨的布拉戈斯洛韦尼斯组和奈菲尔德组的范围内，这种物品证明了其具有更广泛的文化和时间的存在（图一，17）。与这两组陶风门有别的是靺鞨特洛伊茨基组的风门具有更深的壁切口，其切口下沿至风门底约 4 厘米。

# 四、结　　论

分析奥西诺沃湖靺鞨村址考古资料中陶工制造的各种陶器，发现这些陶器品种具有多样性，不同种类的陶器全面地满足了村落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经过对 4 所房址中十几件不同用途陶器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房址内没有制陶生产的痕迹。但是，在房址 2 中测量出了首饰青铜锻造生产的痕迹，并在 1965 年发掘的房址中测量出了用陶罐炉和其上放置陶坩埚进行了铁熔炼，以及开始使用陶轮修整陶器，所有这些使我们能够推测出在奥西诺沃湖村落中有陶工工匠的存在。

---

① 季雅科娃 О. В.：《渤海国：考古，历史和政治》，科学东方文学出版社，2014 年。

② 杰烈维扬科 А. П.、涅斯捷罗夫 С. П. 等：《2009 年奥西诺沃湖中世纪早期村址发掘报告》，韩国文化遗产国立研究院出版社，2010 年。

③ 杰烈维扬科 А. П.、涅斯捷罗夫 С. П. 等：《2009 年奥西诺沃湖中世纪早期村址发掘报告》，韩国文化遗产国立研究院出版社，2010 年。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国学界的蒙元墓葬考古与蒙古族源综合研究”（17BKG025）阶段性研究成果。

# Pottery Made by Mohe Potters in Osinovo Lake Village, Amurskaya Oblast, Russia

Nesterov С. П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a group of pottery products made by Mohe potters, found in the living areas of four house sites and adjacent village sit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of the 8th-9th century excavated on the bank of Osinovo Lake in 1965, 2009 and 2013-2015. This pottery group includes kitchenware, tableware and containers, which are used for 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planting and fishing. Experts believe that ordinary household utensils have the functions required by technology through process improvement. The potters in the village only moulded utensils as the initial shape of containers. Changing the function of pottery products has gone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Potters' initial moulding. By analyzing the technical process of pottery,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formula of four moulding materials is used in pottery processing. Local potters make small utensils by hand and complete large pottery on pottery wheels. Pottery pieces of wheeled pottery were also found on the village site. Because the pottery is found outside the house site and its size is small, its age and cultural attribute can not be determined temporarily, or even its manufacturing location can not be determined.

**Keywords:** Mohe; Trotsky Formation; Pottery; Pottery Wheel

# 值得关注的藏品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土与收藏的高丽青瓷

夏洛特 · 霍丽科[1] 著

张　倩[2]　唐邦城[3]　李　欣[3]　刘杰恩[3]　崔康宁[3]
王俊琳[3]　杨珮诺[3]　薛　妍[3] 译

（1. 英国伦敦大学，伦敦；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3. 保定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院，保定，071000）

**摘要：**高丽青瓷是高丽王朝（918～1392 年）制造、14 世纪末停止生产的一种瓷器。随后青瓷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墓葬和遗址中陆续出土了青瓷。因此朝鲜半岛上的人们，特别是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对青瓷的兴趣日益增长。本文着眼于英国收藏的青瓷，概述了从 19 世纪 80 年代发现高丽青瓷到 20 世纪前十年高丽青瓷收藏市场繁荣，最终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收藏态势衰落的历程。本文认为人们收藏青瓷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相互关联，且受社会因素制约，包括收藏家对独特的朝鲜半岛艺术品、对真正的古物和美的完美追求。

**关键词：**朝鲜半岛　高丽王朝　青瓷　收藏　博物馆

## 一、引　　言

当日本强迫兴宣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 年）于 1876 年签署《江华条约》后，朝鲜半岛被拉进国际舞台，朝鲜王朝（1392～1910 年）的锁国政策随之结束。在与日本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后，朝鲜王朝与一些西方国家也签订了相似条约。1882 年，朝美签署条约。随后朝鲜王朝又与英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签订相关条约[①]。

---

① 1882 年，朝美双方签订了《朝美友好通商条约》，即 *Shufeldt Treaty*。随后在 1883 年 11 月与英国、德国，1884 年与意大利、俄罗斯，1886 年与法国以及随后与奥地利、丹麦、比利时签订了条约。Keith Pratt, Richard Rutt. *Korea: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ctionary*. Surrey: Curzon Press, 1999: 496-497.

朝鲜王朝与东亚以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形成给朝鲜带来了重要且不可逆转的变化，朝鲜王朝不能再以过去的方式自给自足，而是被迫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在此之前，世界对所谓的“隐士国”[①] 知之甚少。然而，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住在汉城和半岛其他地方。一些人在朝鲜半岛皇家政府担任官员或医生，一些人从事外交官、传教士、医生、旅馆经营者等职业。不久游客开始选择将朝鲜半岛作为令人兴奋的旅行目的地，并发表了他们记录的所见所闻。他们的著作丰富了当时对于朝鲜半岛语言、历史和习俗的记载[②]。其中一些著作探讨了朝鲜半岛的陶瓷和其他文物，吸引了艺术品收藏家、博物馆馆长的关注，标志着对朝鲜半岛文化遗产研究和收藏的开始。

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朝鲜半岛诸多文物的出土、对其研究及了解的深入，人们的兴趣也日益增长。学界内普遍误认为此时只有日本人对朝鲜半岛文物感兴趣。而 19 世纪末期的日记和其他记录表明，美国人和欧洲人也收购了许多朝鲜半岛文物。日本人和西方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高丽王朝（918～1392 年）的青瓷上，这些青瓷在 20 世纪初成为抢手货。朝鲜半岛从 10 世纪开始生产青瓷，但其产量却在高丽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下降。由于新的朝鲜王朝的贵族们更喜欢白瓷，青瓷的生产直到 1910～1945 年才得以恢复，当时日本建立了所谓的“新高丽窑”（新高丽烧），并赋予了高丽青瓷新的阐释[③]。

人们偏爱青瓷的原因仍有待深入研究。一般而言，按惯例收藏是“基本的推动力”，但这并不能解释偏爱某些特定文物超过其他文物的背后动机[④]。相反，对文物的收藏是由一系列不同因素驱动的，包括有计划的、冲动的，但是所有这些动机都是由特定时

---

① “隐士国”首次出现于 1878 年 5 月在纽约独立报刊登的《朝鲜王朝——最后的隐士国》一文。此后，在著作中“隐士国”经常被用作朝鲜王朝的别名，如 William Elliot Griffis.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2. Keith Pratt, Richard Rutt. *Korea: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ctionary.* Surrey: Curzon Press, 1999: 232.

② 早期游客、外交官和其他人发表的有关朝鲜王朝的文章太多，无法在此一一列出。相关综述参阅：Martin Uden. Times Past in Korea. London: Routledge, 2003. Brother Anthony 的朝鲜王朝“旧书”清单，网址为 http: // hompi.sogang.ac.kr/anthony/BooksKorea.htm［2013-1-21］。有关朝鲜王朝的早期英国著作，参见：Susan House Wade. *Representing Colonial Korea in Print and in Visual Imagery in England 1910-1939.* Brighton: University of Brighton, 2009.

③ Eum Sung-hee [ŏm Sŏng-hŭi]. Ilche sigi chaehan ilbonin ŭi ch’ŏngja chegak (The production of Koryŏ celadon by Japanese residing in Korea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Han’guk kŭndae misulsahak, 2004 (13): 175-177.

④ Sharon Macdonald. Collecting practices // Sharon Macdonald.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81.

间、地点的特定社会、历史、经济状况所决定[①]。我们认为对高丽青瓷的狂热收藏并非偶然现象。青瓷最初很难获得，因为亵渎墓葬以盗掘青瓷非法。再者对朝鲜半岛艺术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很难获得陶瓷的相关信息。此外，当日本人和西方人来到朝鲜半岛时，还有其他更易获得的艺术品。然而，到了 20 世纪 10 年代，青瓷已经成为人们想要拥有的收藏品。除其他特质外，它们因美丽、独特和作为古董的参考意义而闻名。本文将讨论这些特质并非青瓷特有，而是文化和社会状况便是如此[②]。收藏青瓷的重要性在于相关收藏实践和结果的聚集。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及朝鲜半岛上的人们对青瓷的兴趣和收藏，反映了他们对朝鲜半岛过去、现在的看法时而不同又时而重合，转而又影响了他们后来对朝鲜半岛艺术、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无法得知首次发现青瓷的时间、青瓷被发现并成为收藏家藏品的过程以及这些收藏者的身份。青瓷的商业价值、美学价值和古物价值以不同但并非无关的方式展现，这表明人们的审美观不断变化。本文概述了从 19 世纪 80 年代发现高丽青瓷到 20 世纪 10 年代高丽青瓷收藏市场繁荣，最终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收藏态势衰落的历程。当时人们认为青瓷基本上是朝鲜半岛上发现的最好、最美丽、最独特的艺术品之一。直至今日在朝鲜半岛内外，青瓷也被视为朝鲜半岛文化遗产的精髓之一[③]。本文探讨了影响不同人群收藏实践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包括对朝鲜半岛特有文物的渴望、瓷器的实用性以及历史时代文物的附加价值。本文讨论的重点是英国收藏的朝鲜半岛藏品，然而美国对朝鲜半岛艺术的兴趣和学术研究亦在不断发展，因此本文也包含了精选的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参考资料。

## 二、追寻“朝鲜半岛物品”

19 世纪末的收藏家并未记录他们开始喜欢收藏高丽青瓷的原因。因此，他们偏爱当时相对未知艺术品背后的动机是模糊的。然而，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旅行日记和文章表明，

---

① Sharon Macdonald. Collecting practices // Sharon Macdonald.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83. James Clifford. On collecting art and culture // Nicholas Mirzoeff. *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94-107.

② Elizabeth Hallam, Brian V. Street. Visualising “otherness” // Elizabeth Hallam, Brian V. Street. *Cultural Encounters: Representing Other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9.

③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出版的书籍中，收录的高丽青瓷经常是藏品中的精品，诸如 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100-sŏn（100 highlight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Kyŏnggi-do P‘aju-si: An Gŭrap‘iksŭ, 2006. 此类藏品展览由韩国政府赞助，并已成为韩国大型文化遗产国际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1957～1958 年在美国巡回展览的韩国艺术杰作、1961 年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展览的韩国艺术珍品以及 1984 年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的韩国珍宝展。Charlotte Horlyck, Sascha Priewe. Displaying Korean artefacts in the UK. Museum & Society（待出版）.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主要动力是寻找“朝鲜半岛物品”。当外国人到达朝鲜半岛时，他们通常希望获得旅游目的地的纪念品。然而许多人没有找到任何感兴趣的东西，尤其是他们几乎不知道该寻找何物。关于朝鲜半岛艺术的书籍很少，直到1929年，第一本专门研究朝鲜半岛文化遗产的书籍才在西方出版。该书由本笃会传教士安德烈亚斯·埃卡德（1884～1974年）撰写，涵盖了从建筑到佛教雕塑的所有艺术，还包括有关高丽瓷器的部分内容①。在此之前，有些作者提到过朝鲜半岛的传统文化，最早的一位是路易丝·乔丹·米尔恩（1864～1933年），但他们的讨论往往含糊不清，有时会造成误导②。

在许多著作中，朝鲜半岛文物由于缺乏艺术价值而被摒弃，这使博物馆馆长面临着如何用好的艺术品来扩大朝鲜半岛藏品的挑战。1888年，在首尔领事馆工作的托马斯·沃特斯（1841～1901年）向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捐赠了一个镶嵌漆盒、一些烟盒和刺绣品，一位博物馆馆员指出：“这些文物的重要性和价值不大。”但为了扩大博物馆的朝鲜馆藏，他仍然收购了这些文物③。

在20世纪初，数次前往朝鲜半岛旅行的苏格兰女士康斯坦森·J. D. 库尔森（1868～1948年）是为数不多的迷恋朝鲜半岛商品的西方人之一。她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值得购买：“商店里摆满了用来作帽绳的、颜色漂亮的丝绸和薄纱、丝带、珊瑚串和琥珀串；还有黑色漆面的橱柜和盒子，或饰以珍珠母贝，或漆成亮绿色和红色。”④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西方博物馆收购了上述文物，这些文物通常由专门负责收集地方典型物品的人采购⑤。1912年，由于对朝鲜半岛

---

① Andreas Eckardt. *A History of Korean Art*. London and Leipzig: Edward Goldston and Karl W. Hiersemann, 1929.

② 在题为“朝鲜半岛艺术一览”一章中，Miln研究了陶瓷、漆器、铜器等典型的朝鲜半岛文物，并探讨了图案特征。Miln的大部分文字都引自Percival Lowell. Chosön： the Land of the Morning Calm. A Sketch of Korea. Boston: Tickner, 1886．该书是Lowell于1883～1884年在朝鲜半岛度过了一个冬天后写就的。Miln认为她的朋友Mrs. Q“对朝鲜半岛有独到的见解”，因此引用了Mrs. Q的部分笔记。法国人Maurice Courant（1865～1935年）亦出版了诸多有关朝鲜半岛的著作，与本研究相关的有Maurice Courant. Souvenir de Séoul, Corée. Paris: Publisher unknown, 1900，其中他简略涉及了朝鲜半岛文物。值得注意的是，陶瓷是该书中包含的唯一一种19世纪之前的艺术品，但他只是模糊其词地描述了它们，对它们知之甚少。Louise Jordan Miln. *Quaint Korea*. London: Osgood, McIlvaine & Co., 1895: 9-10, 209-225. Maurice Courant. Souvenir de Séoul, Corée. Paris: Publisher unknown, 1900.

③ Liz Wilkinson. Collecting korean art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888-1938.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003, 15 (2): 243.

④ Constance J D Coulson. *Korea: Peeps at Many Lands.*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10: 35-36.

⑤ Susan House Wade. *Representing colonial Korea in print and in visual imagery in England 1910-1939.* Brighton: University of Brighton, 2009: 29.

艺术的兴趣日益浓厚，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派遣了陶瓷馆馆长 C. H. 怀尔德前往京城（译者按今首尔）进行采购，并购买了数件纺织品、家具和陶瓷器[①]。

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文物是朝鲜半岛特有的。一般来讲，朝鲜半岛的水墨画与中国水墨画看起来非常相似，但质量不如中国水墨画[②]。包括卡尔斯在内的西方人通常最终会选择购买当时的铁烟盒，用卡尔斯的话说，“这是现在能买到的确属朝鲜半岛本土的物品”[③]。其他被认为是质量合格、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物品比如木制橱柜和铜器，也是当时生产的[④]。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收购了数件上述物品，包括木盒，还有碗、筷子及烛台等铜器[⑤]。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面临的挑战是，在朝鲜半岛可购买的大多数物品都带有民俗生活用品，这使得一些博物馆馆长不愿购买它们[⑥]。相比之下，青瓷被选作真正的朝鲜半岛艺术品，并超过了中国和日本生产的同类产品，因此有人称赞它们是朝鲜半岛唯一值得收藏的伟大产品。

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好艺术”。最初，西方人对好的朝鲜半岛艺术的评判主要来自日本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数本西方文献都提到了日本人对青瓷的高度珍视。鸟类学家皮埃尔・路易斯・乔伊（1856 ~ 1894 年）写道：“高丽青瓷被认为是古代的文物，被日本鉴赏家高度推崇。”[⑦] 同样，美国传教士、医生和后来的外交官霍勒斯・艾伦

---

① Lisa Bailey, Liz Wilkinson. *Korean art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Korean Culture 18)*. London: V & A Publications, Spring 1997: 5.

② Saunderson H S Korea and its people.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5 (24): 312. F. S. K. Korean pottery. *Museum of Fine Arts Bulletin 9, no. 54*.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December 1911: 63.

③ 他购买了一个铁烟盒、纸和高丽参，并捐赠给了 19 世纪晚期牛津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William R Carles. *Life in Core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8: 37. Liz Wilkinson. Collecting korean art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888-1938.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003, 15 (2): 244.

④ George G Gilmore. *Corea of Today*. London: T. Nelson and Sons, 1894: 107; Angus Hamilton. *Korea: Its History, Its People, and Its Commerce*. Boston and Tokyo: J. B. Millet Co., 1910: 29.

⑤ Liz Wilkinson. Collecting korean art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888-1938.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003, 15 (2): 244.

⑥ Liz Wilkinson. Collecting korean art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888-1938.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003, 15 (2): 244.

⑦ Jouy 是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一员，19 世纪 80 年代初访问朝鲜半岛时，他为博物馆收购了一些陶瓷、宗教物品、纺织品及其他文物。Pierre Louis Jouy. The Collection of Korean Mortuary Pottery in the U. S. National Museum. *Smithsonian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US National Museum, 1888: 589. Chang-su Cho Houchins. An Ethnography of the Hermit Kingdom. *The J. B. Bernadou Korean Collection 1884-1885*.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4: 18-19.

（1858～1932年）指出，在19世纪后期，日本对青瓷的需求旺盛，因此价格很高[①]。这也表明许多西方学者和收藏家都非常了解日本的收藏实践[②]。数个世纪以来，由于对茶具的喜爱，日本人对朝鲜半岛陶瓷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③]。他们对朝鲜半岛瓷杯的偏爱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当时朝鲜王朝早期的瓷器在喝茶的日本贵族中广为流行，因此出口到日本。16世纪日本军阀丰臣秀吉（1536～1598年）入侵朝鲜半岛，甚至被当代艺术史学家称为“陶器战争”，原因是大量的制陶工人被强行带到日本建立陶窑。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日本人从发现青瓷时便开始对它们产生了兴趣。

西方人对青瓷的赏识还受益于朝鲜半岛人们的审美，尤其是1909年帝室博物馆（帝室博物馆）开馆之后，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们无法得知19世纪后期朝鲜半岛上的一部分人对青瓷和其他当地艺术品的研究、收藏有多大程度的兴趣。学者俞吉濬（1856～1914年）在《西游见闻》中写道，一些朝鲜人以高丽青瓷为荣，“高丽青瓷享誉世界”，并将它们与朝鲜半岛的其他伟大成就相提并论，如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④]。我们尚不清楚俞吉濬的说法是从日本和西方人的收藏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还是由朝鲜半岛上的人们口中得知。大约此时，日本收藏家似乎远远多于朝鲜半岛本土收藏家，但是朝鲜半岛上一些有特殊背景的人在19世纪末确实获得了青瓷。高宗王（大约1863～1907年）赐予了上文提到的霍勒斯·N.艾伦一个青瓷盘，以感谢他在1885年救了女王侄子闵泳翊（1860～1914年）[⑤]。艾伦后来指出，尽管他一开始并不太喜欢这个青瓷盘，但这是朝廷能赐予他的最珍贵的物品。然而，这似乎激发了他对高丽

---

① Horace Allen于1884年12月到达朝鲜半岛，当时他被召集来照顾在Kapsin政变中受伤的人。后来他成为美国驻汉城的部长兼总领事。Horace N Allen. *Things Korean: A Collection of Sketches and Anecdotes Missionary and Diplomatic*. London and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8: 210-211.

② 对于某些人来说，共享知识构成了个人友谊的一部分。例如，美国收藏家、弗里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创始人Charles L. Freer（1854～1919年），与Hara Tomitarō（1868～1938年）、Masuda Takashi（1848～1938年）便是好友，这两人均是朝鲜半岛艺术品收藏界中的重要人物。Godfrey St G M Gompertz. The study and appreciation of Koryo wares // Rhee Byung-chang. Kankoku bijutsu shūsen (Masterpieces of Korean art). Volume 2.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8: 422.

③ Itō Yasuburō, Nishimura Shōtarō. Kōryū-shō (Koryŏ celadon). Tokyo: Itō Yasuburō and Nishimura Shōtarō, 1910, pp. 4-5.

④ Yu Kil-chun, annotated by Hŏ Kyŏng-chin. Sŏyugyŏnmun (Observations on travels in the West). Kyŏnggi-do P'aju-si: Sŏhae munjip, 2004: 402. 该书于1889年完成，直到1895年才出版。

⑤ Edward B. Adams. *Korea's Pottery Heritage Vol Ⅱ*. Seoul: Seoul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90: 101-103. 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Miguk, Han'guk Misul ŭl Mannada. *Korean A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12: 2.

青瓷的兴趣，因此他住在汉城时收购了大量的藏品[①]。路易丝・乔丹・米尔恩在 1895 年写道："朝鲜半岛上的人们非常重视各种开片瓷器（青瓷），我认为他们自己制造的青瓷无可比拟。"[②] 他在文中提到的朝鲜半岛上的人们可能是指皇室成员。

到了 20 世纪 10 年代，东西方收藏家都确信高丽青瓷是朝鲜半岛上最好、最美丽、最具特色的物品，正如 1911 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公报》刊印的一篇文章所述："像朝鲜半岛绘画、雕塑和建筑一样，（朝鲜半岛陶瓷器）起源于中国，并将其传承给了日本；与这些更伟大的艺术不同的是，朝鲜半岛的制陶业以自己的方式发展，逐渐形成一种与中国产品不大相同又丰富多彩的风格。除了美之外，它教会了日本一切，即朝鲜半岛最好时期（高丽王朝时期）的陶瓷器展现出了朝鲜半岛上的人们独特的品位和技艺。"[③]

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馆员都认为高丽青瓷超越了其他类型的朝鲜半岛陶瓷器。1918 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伯纳德・拉克汉姆说："在朝鲜半岛发现的所有最好的陶瓷器都可以追溯到高丽王朝时期。"[④]

## 三、寻找差异

正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公报》所述，与中国、日本艺术进行比较是证明高丽青瓷独特性的关键方式。在 20 世纪 10 年代，学者对中国和朝鲜半岛釉瓷之间的差异尤其感兴趣。这种转变源于西方收藏家对中国瓷器品位的不断变化。1929 年，日本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藤田亮策（1892 ~ 1960 年）认为，欧洲人厌倦了繁缛的明、清瓷器，宋、元瓷器似乎"纯净无瑕"。藤田亮策说道，高丽青瓷也具有这种令人满意的品质，因此被人收藏[⑤]。藤田亮策还提到了 1910 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在伦敦举办了"早期中

---

① 第一次看到该盘子时，Allen 觉得它看起来像"相当普通的瓷器"。Walter Hough 举例说"朝鲜王朝国王授予 Allen 博士"的很可能也是该盘子。Horace N Allen. *Things Korean: A Collection of Sketches and Anecdotes Missionary and Diplomatic*. London and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8: 211-212. Walter Hough. The Bernadou, Allen and Jouy Corean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From the Report of the U. S. National Museum 189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1893: 437.

② Louise Jordan Miln. *Quaint Korea*. London: Osgood, McIlvaine & Co., 1895: 212.

③ F. S. K. Korean pottery. *Museum of Fine Arts Bulletin 9, no. 54*.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11: 63.

④ Bernard Rackham. *Catalogue of the Le Blond Collection of Corean Pottery.* London: H. M. Stationeary Office, 1918: 4.

⑤ 藤田曾在京城帝国大学担任教授，并在京城的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担任馆长（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是专有名词，网上可查到，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即现在的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Fujita Ryōsaku. Ō bei no hakubutsukan to Chōsen (ge). *Museums in Europe and America part 2*. Chōsen 164, 1929: 28. 藤田在朝鲜半岛所做的考古工作参见：Hyung Il Pai. The politics of Korea's past: The 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 archaeolog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East Asian History*, 1994 (7): 42-43.

国陶器和瓷器”这一开创性展览后，人们对宋元陶瓷的兴趣发生了转变[①]。伯灵顿美术俱乐部展览图录的作者写道：“……其精致内敛的色彩吸引了中国艺术爱好者。”[②]当时中国 18 世纪的瓷器在 19 世纪的收藏家中很受欢迎，然而与宋代瓷器相比，它们被认为是衰落的、商业化的，宋瓷因它的纯净而值得收藏[③]。收藏家兴趣的转变与 20 世纪 10 年代朝鲜半岛、日本、美国、英国的艺术品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对高丽青瓷日益增长的迷恋一致，这也表明对宋元陶瓷器的新品位促进了对高丽青瓷的欣赏。当然，与宋元青瓷相比是证明高丽瓷器独特性的一种方式，这也可能是部分原因。例如，拉斐尔・佩初兹在对高丽青瓷碗的描述中指出：“胎体……似乎与……宋元瓷器不同，它更厚，而且更模型化。”[④]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是什么使高丽青瓷独具魅力，我们将在后文继续探讨。

此时对高丽青瓷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增多[⑤]。一些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家，对高丽青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早期中国陶瓷器。因此，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瓷器有时会同时展出[⑥]。例如，1914 年在纽约举行的宋元瓷器展览，同时展出了约 50 件高丽青瓷[⑦]。这种展览方式使得包括乔治・尤摩弗帕勒斯（1863 ~ 1939 年）在内的一些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也购买了高丽青瓷。1936 年，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开幕的尤摩弗帕勒斯中国艺术展览中，他将高丽青瓷藏品与中国早期陶瓷器一起展出（图一）[⑧]。

① Stacey Pierson.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Museums. *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1560-1960*. New York and Vienna: Peter Lang, 2007: 89-94.

② 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xviii*. London: 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 1911 ( 引自 Stacey Pierson.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Museums. *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1560-1960*. New York and Vienna: Peter Lang, 2007: 94.)

③ Stacey Pierson.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Museums. *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1560-1960*. New York and Vienna: Peter Lang, 2007: 97.

④ Raphael Petrucci. Corean pottery.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2, 116 (22): 87.

⑤ Rackham 在“Le Blond Collection of Korean Ceramics”中罗列的参考书目，涵盖了 20 世纪 10 年代后期出版的有关朝鲜半岛陶瓷历史的学术著作。Bernard Rackham. *Catalogue of the Le Blond Collection of Corean Pottery vii–viii*. London: H. M. Stationeary Office, 1918.

⑥ John Platt 指出：“应该对朝鲜半岛墓葬进行深入研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早期中国的瓷器。”John Platt. Korean pottery.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0, 205 (36): 203; John Platt. Ancient Korean tomb ware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2, 116 (22): 230.

⑦ Hobson R L. Sung and Yüan wares in a New York exhibitio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4, 132 (24): 320-323.

⑧ Charlotte Horlyck, Sascha Priewe. Displaying Korean artefacts in the UK. Museum & Society ( 待出版 ).



图一　1936 年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行的尤摩弗帕勒斯中国艺术展览中展出的高丽青瓷
（引自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档案，文件名称《乔治・尤摩弗帕勒斯夫妇》）

## 四、追求古物

高丽青瓷被公认为是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器物。从首次在高丽王朝时期墓葬中发现高丽青瓷以来，古董参考资料将其称为“明器”，确定了它们作为艺术品的价值。正是通过我们对过去的解释，文物才被认为是文化或艺术“真实性”的特殊形式。古董通常被赋予一种“时代感”。因此，一般认为收藏古代文物比收藏当代物品更有价值。此外，通常具有文化或历史价值的物品被称为艺术品，如青瓷[①]。

从 19 世纪末开始发表的著作来看，朝鲜王朝被公认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许多人被朝鲜王朝的概念所迷住，因为可以说朝鲜王朝是一个在时间上静止不动的国家，过去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被保存了数百年。这与“广为人知的‘隐士国’形象相吻合，也激发了人们对朝鲜半岛的迷恋”[②]。朝鲜半岛乡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遍布山坡的众

① James Clifford. On collecting art and culture. *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00.

② Walter Hough 指出：“我们拥有整个人类生存所需的工业、习俗等，而在周边地区却扫除或改变了这些因素，这是我们关注朝鲜的兴趣点。”Walter Hough. The Bernadou, Allen and Jouy Corean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From the Report of the U. S. National Museum 189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1893: 432.

多坟墓。朝鲜半岛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墓地，埋葬着许多不同年代的具有考古学意义的墓葬和墓碑①。从首次发现和收藏青瓷开始，人们就知道它们出土于古代墓葬，在许多早期著作中青瓷被称为“明器”或“随葬器物”②。这些名词的持续使用说明收藏家们极其重视青瓷来源于墓葬。而且收藏家把青瓷称作“随葬器物”、古董，从而将青瓷与朝鲜王朝时期和当代低质量的文物区分开来。他们强调青瓷的历史价值，鉴定青瓷为收藏品，并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古物收藏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学术著作中普遍将青瓷称作随葬器物，但是到了 70 年代后，这一现象从学术著作中消失了，人们不再把它们看作是随葬器物，而是把它们当成一种艺术品，这也标志着人们对青瓷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③。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不再宣传它们的古老内涵，而是把青瓷当作是值得收藏的文物，经常会在博物馆看到青瓷及阐释。因此，人们也重新定义了青瓷的历史意义，而不再重视它们作为随葬器物的角色。

我们目前尚不清楚首次发现青瓷的具体时间，但是有文字记载指出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1888 年，英国副领事威廉 · R. 卡尔斯（1848 ~ 1928 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讲述了青瓷是如何从开城附近的王室墓葬中被盗走的。他写道：“1884 ~ 1885 年，在我回到汉城的那年冬天，我成功地购买了几件（青瓷），据说是在开城的一座大墓中挖出来的三十六件中的一部分。”④ 他收购的大部分器物是青瓷器皿，其中一部分使用了镶嵌工艺进行装饰（图二）。当时人们并不了解镶嵌工艺，而卡尔斯的误打误撞证明了镶嵌图案是“在烧制青瓷前，将一些不规则的白色石英或者瓷器碎片镶嵌在瓷土里”⑤。事实上，这些镶嵌图案是用小碎片来填充雕刻的图案而形成。

英国收藏家、业余考古学家威廉 · 戈兰德（1842 ~ 1922 年）也提到了 19 世纪 80

① Pierre Louis Jouy. The Collection of Korean Mortuary Pottery in the U. S. National Museum. *Smithsonian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US National Museum, 1888: 589. Jouy 的观点随后被 Randolph I. Geare 重申。Randolph I. Geare. The potter’s art in Korea. *The Craftsman*, 1904, Ⅶ (3): 294-298.

② John Platt. Ancient Korean tomb ware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2, 116 (22): 230.

③ 1979 年，韩国政府在美国举办了“韩国艺术五千年”大型巡回展，展览图录中未提及青瓷曾被用作随葬品，也未提及青瓷何时以及如何成为收藏品。在此之前，由韩国政府赞助的“韩国艺术杰作”巡回展，展览的图录写道：“高丽青瓷和其主人一同被埋葬，直到本世纪才出土，开城地区在 20 世纪 10 年代数万个墓葬被疯狂盗掘。”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Masterpieces of Korean Art: An Exhibi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1957: 19.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5000 Years of Korean Art*.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1979.

④ William R Carles. *Life in Core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8: 139. Carles 买了两个壶、一个 meibyǒng 蔷薇花瓶、一个碗、一个盘子、两个杯子、两个杯架。

⑤ William R Carles. *Life in Core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8: 140-141.



图二　卡尔斯购买的青瓷

（引自威廉 · R. 卡尔斯：《生活在朝鲜》，麦克米伦公司，1888 年，140 页）

年代高丽王朝时期墓葬的发现，他写道："浅黄色釉"瓷（当时称呼高丽青瓷常用的术语）也是在开城古墓葬中出土①。当高丽青瓷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人们对青瓷的历史知之甚少，而它们成为收藏品的速度非常快。戈兰德甚至没有尝试弄清他所看到的瓷器的年代，仅仅称"朝鲜半岛上的人们创造的一个伟大时代"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朝鲜半岛内外出土和销售的青瓷越来越多，20 世纪 10 年代青瓷艺术市场的繁荣达到顶点。1904 ~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修建了新的公路和铁路，许多墓葬内的随葬品浮出水面③。在 20 世纪初，日本人从法国和美国公司手中接管了从汉城到新义州之间的部分铁路，以此作为在朝鲜半岛上的堡垒。该铁路于 1905 年建成，距离中国和朝鲜半岛接壤的鸭绿江河口 40 千米。该铁路贯穿开城，促使偶然发现了一些位于开城且装饰精美的皇室和贵族陵墓，因此该铁路十分重要。到了 20 世纪 10 年代，人们普遍认识到拥有"最好的随葬品"的"最富有的墓葬"位于开城

① 1872 ~ 1888 年 Gowland 居住在日本，曾在大日本帝国铸币局工作。William Gowland. Notes on the dolmens and other antiquities of Korea.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5 (24): 322.

② William Gowland. Notes on the dolmens and other antiquities of Korea.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5 (24): 322.

③ Godfrey St. G M Gompertz. *Korean Celadon and Other Wares of the Koryŏ Perio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14.

周围的山区[①]。

20 世纪 30 年代，甚至 50 年代，瓷器陆续出土。1935 年夏，据说“新出土”的瓷器来自开城附近海州湾的岛屿，这则消息在学者和收藏家中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②]。据报道，许多中国宋瓷包括定窑瓷器，都是从该地区的墓穴中被盗走的，特别是在该地区最大的岛屿永美多岛上，据传在那里发现了至少 100 座高丽时期的墓葬。它们的墓主人很可能是生活在当地的贵族和商人[③]。然而，当它们出现时，殖民政府已经颁布了严格的收藏和出口法律，因此无法合法出口瓷器，这些瓷器大多数成为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的收藏品，下文将进一步讨论[④]。

## 五、了解往昔

19 世纪末，国际学术研究开始关注朝鲜半岛的古往今来，研究内容包含过去的王朝和统治者，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文化遗址。到 20 世纪 10 年代，朝鲜半岛的详细历史情况逐渐浮出水面。然而，并非所有过去的时代都被赋予了同等的价值，有些时代的价值远高于其他时代。威廉・戈兰德是关注朝鲜半岛史前文物的极少数收藏家之一[⑤]。他对日本的考古兴趣促使他前往朝鲜半岛游历，1884 年他从汉城出发去了釜山。他对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公元 4 世纪 ~ 公元 7 世纪中叶）的陶器很感兴趣，发掘并收藏了数件。后来被 S. W. 弗兰克斯（曾在大英博物馆保管文物）收购并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⑥]。

---

① 西方和日本作家都提到了这一点。如 John Platt. Ancient Korean tomb ware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2, 116 (22): 229. Bernard Rackham. *Catalogue of the Le Blond Collection of Corean Pottery*. London: H. M. Stationeary Office, 1918: 4. Itō Yasuburō, Nishimura Shōtarō. Kōryū-shō (Koryŏ celadon). Tokyo: Itō Yasuburō and Nishimura Shōtarō, 1910: 2.

② Okudaira Takehiko. Chōsen shutsudo no shina tōjiki zakken (Miscellaneous findings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Korea). Tōji Ⅸ, 1937 (2): 1-11. Godfrey St. G M Gompertz. Gilded wares of Sung and Koryo. I. Gilded Sung ware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1956, 642 (98): 300-303.

③ Okudaira Takehiko. Chōsen shutsudo no shina tōjiki zakken (Miscellaneous findings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Korea). Tōji Ⅸ, 1937 (2): 1-11. Charlotte Horlyck. Gilded celadon wares of the Koryŏ kingdom (918-1392 CE) [J]. Artibus Asiae LⅩⅫ, 2012 (1): 118.

④ 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Chungguk toja (Chinese ceramics)*.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07.

⑤ Jane Portal. Korean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a century of collecting.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5-1996 (60): 50-53.

⑥ Jane Portal. Korean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a century of collecting.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5-1996 (60): 53. Jane Portal.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s Korean collec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 Branch*, 1995 (70): 42-44.

另一个收藏三国陶器的早期收藏家是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1838 ~ 1925 年），就像戈兰德一样，他对史前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很感兴趣[①]。但是，他们都属于极少数对三国陶器感兴趣的收藏家，大多数收藏朝鲜半岛艺术品的收藏家只关注青瓷。尽管三国陶器早于高丽青瓷，且原则上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但大多数收藏家不会如此重视陶器。

西方和日本收藏家所写的文章里认为高丽王朝代表了过去曾经辉煌的时代。朝鲜王朝统治的 500 年间几乎没有像样的艺术品，因此其在艺术方面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人忽视了[②]。相比之下，高丽王朝时期被誉为朝鲜半岛最好的陶瓷制造时期[③]。因此，青瓷代表了一种消失的艺术，无法复兴。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和其艺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就像亚特兰蒂斯，这一浪漫化的形象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古物的价值。数百年来，它们一直埋藏于地下，富有神秘感，这增强了它们的吸引力。

## 六、定义其美

对特定美感的追求往往会推动文物的收藏，高丽青瓷除了具有独特的朝鲜特色和作为古董的参考外，还展示出一种广受欢迎的美学吸引力。乔治·尤摩佛帕勒斯在有关他本人收藏的中国陶瓷的讨论中，总结了他个人的收藏态度：“仅凭考古学上的吸引力是无法促使我收藏，成为我的收藏品必不可少的一点就是，它应该同时以某种美吸引我。”[④] 毫无疑问朝鲜的收藏家们赞成他的上述观点。

虽然将文物分类是以某些永久性的概念为前提，但这些类型的定义是暂时的。同样，尽管美的物体保持不变，但是不同的人对美的定义可能不同。以高丽青瓷为例，对其美的定义形成于 19 世纪 80 年代并在 20 世纪 10 年代标准化。然而，到了 20 世纪 30

---

① Morse 的朝鲜半岛陶瓷器现收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内。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Miguk, Han’guk Misul ŭl Mannada. *Korean A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12: 14.

② 例如，1884 年，来自史密森学会的馆员 John Baptiste Bernadou 写给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Spencer F. Baird 的信中曾提到。Chang-su Cho Houchins. An Ethnography of the Hermit Kingdom. *The J. B. Bernadou Korean Collection 1884-1885*.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4: 144-145.

③ F. S. K. 认为高丽青瓷的最佳制作时期开始于高丽王朝，并随着高丽王朝的衰落而结束。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 10 年代和 20 年代的著作中十分常见。F. S. K. Korean pottery. *Museum of Fine Arts Bulletin 9, no. 54*.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11: 63. Lorraine d’O Warner. Korean grave pottery of the Korai dynasty. *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19, 6 (3): 460. Andreas Eckardt. *A History of Korean Art*. London and Leipzig: Edward Goldston and Karl W. Hiersemann, 1929: 169.

④ George Eumorfopoulos. *Preface to Th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Vol. I* // R. L. Hobson. London: E. Benn Ltd., 1925 (引自 Stacey Pierson.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Museums. *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1560-1960*. New York and Vienna: Peter Lang, 2007: 91).

年代，西方和日本收藏家对其美的构成因素有不同的解释。对西方人来说，与宋瓷相比是展示高丽青瓷具有独特魅力的一种方式。高丽青瓷往往有着较为突出的宋瓷所没有的装饰特色，如釉色透亮、色泽柔和、雕刻图案精美、镶嵌装饰精致，这些装饰特色通常被认为是组成高丽青瓷魅力的重要因素①。

然而，日本人对高丽青瓷之美的看法深深根植于过去和现在对朝鲜半岛社会的解读中。日本著名的朝鲜艺术品收藏家、研究学者柳宗悦（1889～1961年）的理论极有影响力，其在1922年发表了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在该文中柳宗悦描述了朝鲜半岛历史不稳定等特点，这些导致了朝鲜半岛艺术品孤独、伤感和精神的“本质”。这种民族特征又表现在艺术形式、色彩和线条上。他认为朝鲜半岛艺术的特点是细长的线条，象征着脆弱，相比之下，中国艺术以稳定的形式象征着力量，日本艺术以鲜艳的色彩象征着快乐。同样，朝鲜半岛艺术品中色彩匮乏也表明其“生活缺乏乐趣”②。

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上述对朝鲜半岛艺术的分析。英国收藏家、学者戈弗雷·冈伯茨爵士（1904～1992年）严厉批判了朝鲜半岛陶瓷器的美承载着朝鲜半岛人民悲伤和痛苦的观点。他认为高丽王朝时期“与其他充满着光与暗的人类时代一样”③。尽管如此，柳宗悦的理论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及后来的朝鲜半岛上的人们对朝鲜半岛陶瓷器之美的诠释。许多日本学者和收藏家，如小山富士夫（1900～1975年）和内山尚三（1920～2002年）在评价朝鲜半岛陶瓷器时重申了柳宗悦的观点，他们认为心灵的安宁和孤独感构成了高丽青瓷之美及其本质④。

## 七、非法获得

青瓷在被发现之前已沉寂了数百年，未被打扰，排除浪漫色彩，这种看法大致是正确的。1392年高丽王朝灭亡后，由于儒家的行为准则要求朝鲜王朝诸王拜访和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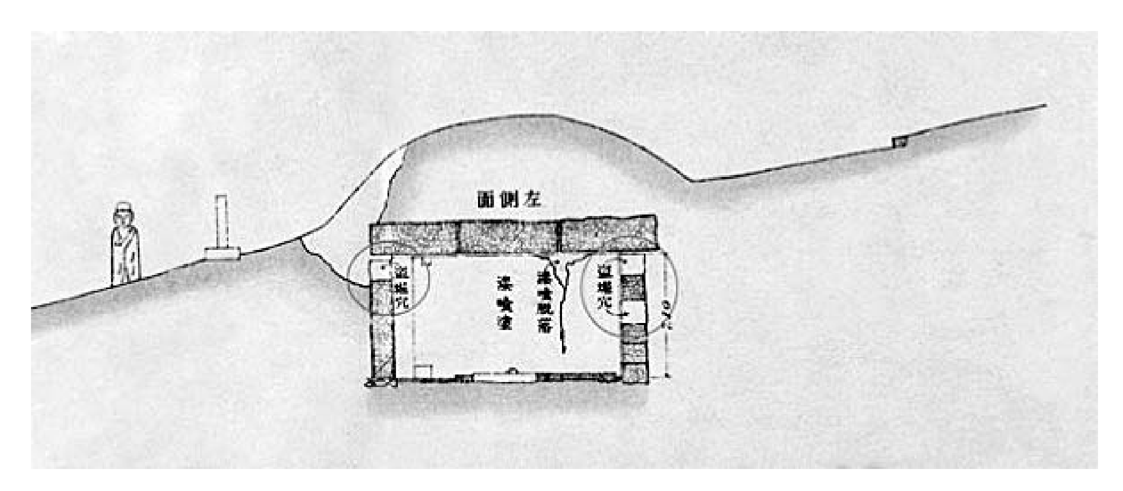
① F. S. K. Korean pottery. *Museum of Fine Arts Bulletin 9, no. 54*.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December* 1911: 64. Hobson R L. Sung and Yüan wares in a New York exhibitio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4, 132 (24): 322-323.

② Yanagi Sōetsu. *Yanagi Sōetsu zenshū (Collected works of Yanagi Sōetsu) Vol. 6*. Tokyo: Chikuma Shobō, 1980-1992: 89-109［引自 Kim Brandt. *Objects of desire: Japanese collectors and colonial Kore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2000, 8 (3): 734-736］.

③ Godfrey St. G M Gompertz. The appeal of Korean celadon. *Oriental Art XXIII*, 1977 (1): 63-64.

④ Fujio Koyama. Koryo celadon // Rhee Byung-chang. *Kankoku bijutsu shūsen (Masterpieces of Korean art), Volume 2*.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8: 412. Godfrey St. G M Gompertz. *Korean Celadon and Other Wares of the Koryŏ Perio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3-4.

前统治者的陵墓，因此他们继续守护高丽王朝皇家陵墓[1]。这些陵墓形制为石室墓，地面上筑有小坟丘，其前放置有石造官员和老虎。然而，盗墓者可以轻松地打破这些墓室的石墙进行盗掘，在明宗皇帝（1170～1197 年）陵墓内部图中，盗洞就极其明显（图三）[2]。




图三　位于开城附近的明宗（1170～1197 年）陵墓内部（图中圆圈所示为盗洞）
（引自朝鲜总督府：《大正五年年度户籍调查报告书：1916 年历史遗迹调查报告》，1916 年，507 页）

尽管进入陵墓内并不难，但在 19 世纪末之前，这些陵墓都没有被破坏。然而，到了 1916 年，就职于朝鲜总督府的日本考古学家在调查陵墓时，陵墓里的部分甚至全部随葬品已被盗[3]。这些墓葬之前之所以完好无损，主要是因为对亵渎陵墓者的严厉惩罚。在朝鲜王朝时期，盗掘墓葬是违反儒家孝道的道德罪行，是朝鲜王朝刑法最严重的罪行之一[4]。H. S. 桑德森在 1895 年指出，西方人也知道盗掘陵墓是死罪，所以最初“很难获得文物”[5]。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朝鲜王朝的衰落，法律逐渐失效，从而导致了盗墓活动的增加。

① John Platt. Ancient Korean tomb ware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2, 116 (22): 229.

② 墓室里有 12 件青瓷、1 支镀金发簪和 3 枚铜钱，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Chōsen Sōtokufu. Taishō 5-nendo Koseki Chōsa Hōkoku. *1916 Report on investigations of historic remains*. Keijō [Seoul]: Chōsen Sōtokufu, 1916: 512-516. Charlotte Horlyck. Burial offerings to objets d’art: Celadon wares of the Koryŏ king-dom (AD 918-1392).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08, 73 (9): 84.

③ Chōsen Sōtokufu. Taishō 5-nendo Koseki Chōsa Hōkoku. *1916 Report on investigations of historic remains*. Keijō [Seoul]: Chōsen Sōtokufu, 1916.

④ Homer B Hulbert. *The Passing of Korea*.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06: 568.

⑤ Saunderson H S. Korea and its people.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5 (24): 312.

约翰・普氏很好地总结了当时朝鲜半岛的局势：亵渎陵墓便是死罪，即使冒着很大的风险盗墓，也很少能获得文物。直到日俄战争时，日军总部设在朝鲜半岛，精美的高丽青瓷才逐渐增多。良机不可失，并且日本人和朝鲜半岛上的人们都知道在陵墓里可能会发现何物，他们有组织地盗取了陵墓，获得了大量珍贵的高丽青瓷。开城一带早期高丽王朝的国王和贵族墓葬是重大发现，如今这些陵墓大多已被洗劫一空①。

1905年日本成为朝鲜半岛的"保护国"之后，文物仍然被盗掘。冈伯茨甚至将朝鲜半岛的情况描述为"真正的掠夺狂欢"②。1908年，下郡山诚一（1883年出生）在担任帝室博物馆的政府顾问时写道，在汉城就任后，他参观了内阁秘书长小宫三保松（1859～1935年）的官邸，他很惊讶地看到一个房间里堆满了从高丽王朝时期墓葬里盗取的文物。为了避免被警察看到，盗墓者会在晚上把他们的货物送到汉城的经销商那里，经销商会在第二天早上把它们卖给感兴趣的买家。经销商们拜访了小宫三保松，他几乎每天都要评估和买进一些文物。参观结束后，下郡山诚一本人也开始与经销商频繁往来③。

英国的艺术品收藏家也听到了关于陵墓盗掘以及随后出现的廉价随葬陶瓷器的消息。1912年，约翰・普氏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地解释了墓坑及随葬品是如何被盗墓者发现的：为了找到陵墓的位置，（盗墓者）曾使用过重棒和尖尖的铁棒。通过敲击地面，人们可以知道在地下有一块中空的地方，当尖尖的铁棒穿过地面向下探测时，便能判断此地有墓葬④。

据传在汉城可以找到许多古代陶瓷器，而且通常价格便宜，因此吸引了一些西方收藏家前往朝鲜半岛寻找廉价品。英国收藏家奥布里・勒・布隆德（1869～1937年）就是其中一员，他将许多个人的朝鲜半岛藏品捐赠或出售给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⑤。

---

① John Platt. Ancient Korean tomb ware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2, 116 (22): 229.

② Godfrey St. G M Gompertz. The study and appreciation of Koryo wares // Rhee Byung-chang. *Kankoku bijutsu shūsen (Masterpieces of Korean art)*, Volume 2.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8: 420.

③ Park So-hyŏn. Koryŏ chagi nŭn ŏt'ŏk'e "misul" i toeŏnna-shingminji sidae "Koryŏ chagi yŏlgwang" kwa Yi wangga pangmulgwan ŭi chŏngjihak. How "Koryŏ celadon" became "Art": Koryŏ celadon mania and politics of the Yiwanga Museum in the Colonial period. *Sahoe yŏn'gu*, 2006 (11): 13.

④ John Platt. Ancient Korean tomb ware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2, 116 (22): 229. 与高丽皇室、王族相比，社会地位较低的人被埋在小土墩墓中。关于高丽不同埋葬方式参阅：Charlotte Horlyck. Ways of burial in Koryŏ times. *Death, Mourning, and the Afterlife in Korea: Critical Aspects of Death from Ancient to Contemporary Times.*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⑤ 1918年，Le Blond持有的大量高丽文物被V&A收购，1937年V&A又从他的手中收购了少量高丽青瓷和朝鲜陶瓷。Wilkinson Liz. Collecting Korean Art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888-1938.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2003, 15 (2): 248-250. V&A Archive, MA/1/L594. nominal file: Le Blond, Mr & Mrs Aubrey.

1913 年，勒・布隆德和他的妻子结识了阿奇博尔德・H. 塞斯教授，后者建议他们去朝鲜半岛购买物美价廉的古董收藏[①]。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日本人采取措施保护朝鲜半岛文化遗产，“狂欢”结束了。1916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一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保护法，即《古迹及遗物保护规则》(以下简称《规则》)，阐明了如何界定古迹和古代遗物，并指出应向警方报告破坏古迹和遗物的肇事者。此外还规定，移动、修复和保藏遗物需得到政府的官方许可[②]。尽管《规则》并未完全阻止盗墓活动，但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

随着艺术品市场上青瓷数量日趋减少，价格飞涨，导致许多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机构感到非常沮丧。1920 年，A. S. 休利特牧师写信给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询问其是否有兴趣购买他个人收藏的青瓷等朝鲜半岛古董。他解释说，他很难给这些文物定价，“由于朝鲜半岛的保护国和日本政府……制止盗墓行为，因此朝鲜半岛文物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价格都极高”[③]。1933 年制定的《宝物古迹名胜纪念物保存令》取代并补充了 1916 年制定的《规则》，加强对私人机构和私人购买国宝行为的监管[④]。它有效地终止了古董的出口，此后西方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只能从朝鲜半岛以外地区已有藏品中寻找朝鲜文物[⑤]。

## 八、博物馆展览青瓷

毫无疑问，盗墓的非法性最初阻止了许多朝鲜半岛上的人亵渎陵墓。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 19 世纪末之前，当地学者并未关注过朝鲜王朝的考古遗迹，藤田隆作认为这是因为儒家学者偏爱文书[⑥]。朝鲜王朝贵族收藏了中国绘画、中国古代青铜器和当代陶瓷器，在这方面，他们遵循了当代和早期中国皇帝的做法，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⑦]。

---

① Le Blond 通过一位韩国商人在首尔购买了一些文物，显然该商人英语说得很好。Mrs Aubrey Le Blond. *Day In, Day Out*.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imited, 1928: 162-164.

② Hyung Il Pai. The politics of Korea’s past: The 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 archaeolog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East Asian History*, 1994 (7): 32-33.

③ V&A Archive, MA/1/H1842. nominal File: Hewlett A S (Rev).

④ Hyung Il Pai.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treasures and monuments: the 1916 Japanese law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Korean remains and relics and their colonial legacies. *Korean Studies*, 2001, 25 (1): 78-79.

⑤ 例如，它导致 Bernard Rackham 敦促 V&A 购买 Aubrey Le Blond 收藏的朝鲜王朝青瓷，他认为由于朝鲜半岛的出口限制，现在很难购买。V&A Archive, MA/1/ L594. nominal file: Le Blond.

⑥ Hyung Il Pai. The politics of Korea’s past: The 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 archaeolog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East Asian History*, 1994 (7): 28-29.

⑦ Rosemary E Scott. The Chinese imperial collections // Stacey Pierson. *Collecting Chinese Art: 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2000: 19-32.

然而，由于大部分人普遍认为祖先的身体和陵墓是神圣的，因此朝鲜半岛上的贵族并不贪图来自当地陵墓的文物，而来自朝鲜半岛之外的中国文物，可能更容易让朝鲜王朝的儒生们忽视中国古董的原始墓葬环境。即使在朝鲜王朝衰落之后，他们仍然不愿购买出土于朝鲜半岛墓葬中的随葬品。1930 年，洛林·德奥·华纳曾写道："朝鲜人对收藏随葬品有着强烈的宗教厌恶，因此他们认为随葬用的陶器没有太大的价值。"①

然而，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皇室成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购买青瓷，正如前文提到的高宗王送给霍勒斯·艾伦的青瓷盘所展现的一样。目前尚不清楚该青瓷盘是否属于一大批陶瓷器藏品的一部分，但它标志着皇室成员对当地随葬品态度的转变。我们亦不清楚皇室成员购买朝鲜古董的动机，也许是对当时正大量购买朝鲜古董的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一种反抗。

官方对收藏随葬品的认可最终促成了朝鲜帝国博物馆的成立，但现已不可得知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发起建立的这座博物馆②。由于高宗帝③的官邸要从德寿宫搬到昌德宫，因此必需翻修昌德宫，1907 年小宫三保松负责该项目。据小宫三保松讲，内阁首相李完用（1858～1926 年）和最高官李允用（1854～？）担心高宗帝在昌德宫会无聊，询问是否能为高宗帝安排某种形式的娱乐活动。因此小宫三保松提议在紧邻昌德宫南侧的昌庆宫内修建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④。

博物馆于 1909 年向公众开放，收藏了 17000 件各种材质的文物⑤。孙宗帝（约在 1907～1910 年）宣布博物馆将"与人民共享"，标志着皇室的许可⑥。展馆内青瓷与考古文物、佛教雕塑和朝鲜王朝时期水墨画（图四）共同展出。该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朝鲜半岛人民第一次接触到本国文化遗产，影响了朝鲜半岛内外。20 世纪 20 年代，英文版的京城旅游指南建议游客参观该博物馆，以学习"这个国家的古代艺术"⑦。从开馆之日起，该博物馆就公开表明，作为收藏品的青瓷是朝鲜半岛文化遗产不可分割

---

① Lorraine D'O Warner. Kōrai celadon in America. *Eastern Art*, 1930 (Ⅱ): 65.

② 1911 年帝室博物馆更名为李王家博物馆。

③ 高宗帝于 1897 年建立大韩帝国，但 1907 年被日本人逼迫退位。

④ Komiya 将此事写进了 1912 年出版的第一部李王家博物馆图录中。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Han'guk Pangmulgwan Kaegwan 100 Chunyŏn kinyŏm t'ŭkpyŏlchŏn. *Korean Museums' 100 year celebration*.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09: 38.

⑤ 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Han'guk pangmulgwan kaegwan 100 chunyŏn kinyŏm t'ŭkpyŏlchŏn. *Korean Museums' 100 year celebration*.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09: 25.

⑥ 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Han'guk pangmulgwan kaegwan 100 chunyŏn kinyŏm t'ŭkpyŏlchŏn. *Korean Museums' 100 year celebration.*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09: 28.

⑦ Thomas Cook. *Cook's Guide to Peking, North China, South Manchuria, and Korea*. Peki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24: 134.



图四　李王家博物馆的陶瓷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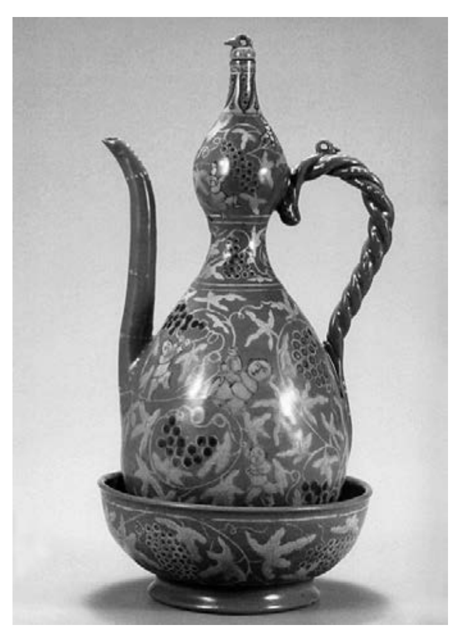
（引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韩国博物馆百年庆典》，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2009 年，42 页）

的一部分。1908 年该馆获得了第一批藏品，其中包含一套 13 世纪釉下红铜彩装饰的镶嵌青瓷酒壶（图五），该文物是以 950 韩元从生活于汉城的日本籍古董经销商近藤佐五郎手中购入。为了便于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的入场费最初定为每位成人 10 韩钱，同年近藤佐五郎向博物馆出售了一件 13 世纪的镶嵌青瓷瓶，仅售 150 韩元（图六）①。1915 年，日本人在京城开设了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进一步增强了高丽青瓷的文化和考古意义②，亦便于保存和展示日本考古学家在朝鲜半岛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该博物馆坚定地将青瓷置于朝鲜半岛古代文化遗产中，并强调了它们作为古董的参考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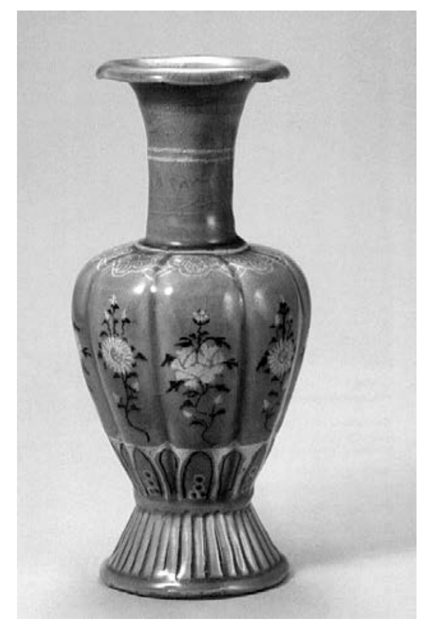
在京城的这些博物馆开放前，陶瓷器已在朝鲜半岛以外地区的博物馆和展馆展出过。1885 年 10 月，在纽约爱德华・格雷（1835 ~ 1888 年）的展馆举行了朝鲜半岛陶瓷器的第一次海外展览，爱德华・格雷是一位著名的中日艺术品交易商，这次展览出售了弗朗西斯・布林克利船长（1841 ~ 1912 年）收藏的东亚陶瓷器。布林克利是定居在日

① 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Han’guk pangmulgwan kaegwan 100 chunyŏn kinyŏm t’ŭkpyŏlchŏn. *Korean Museums’ 100 year celebration*.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09: 31-33.

② 1945 年，该博物馆被命名为韩国国立博物馆，1972 年更名为现名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殖民期间相继在庆州（1926 年）、平壤（1931 年）、开城（1933 年）和 Puyŏ（1939 年）开设分馆。Kungnip chung’ang pangmulgwan. Han’guk pangmulgwan kaegwan 100 chunyŏn kinyŏm t’ŭkpyŏlchŏn. *Korean Museums’ 100 year celebration*.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09. 47.



图五　双葫芦酒壶
［釉下红铜彩，绘有男孩和葡萄纹。13 世纪高丽王朝（918 ~ 1392 年）。壶高 34.2、腹径 14.6、底径 8.5 厘米。盆高 7.4、口径 17.9、底径 11.2 厘米。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六　镶嵌牡丹、菊花瓶
［13 世纪，高丽王朝（918 ~ 1392 年）。高 25.6 厘米。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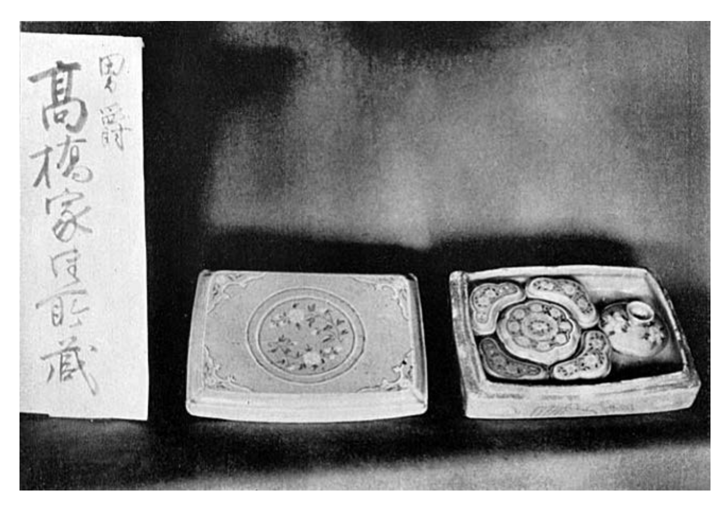
本的爱尔兰籍报刊老板、编辑和学者，他的藏品中有 13 件朝鲜陶瓷器，其中一些似乎是高丽青瓷①。

1909 年秋，东京举行了日本第一次青瓷大型展览，展出了东京、大阪、京都和汉城的日本收藏家的藏品。一些收藏家来自贵族和上流社会，包括侯爵松方和男爵高桥，这表明当时主要是上流社会追求收藏青瓷（图七）。大约展出了近百件藏品，其中包括流行于高丽贵族中的宋代定窑黑釉瓷（图八）。根据图录作者所讲，展览的意义在于展示通常在市面上看不到的文物，敦促日本人“深入朝鲜半岛，挖掘仍有文物遗留的古墓”，从而表示日本人是朝鲜半岛文化遗产的保护者②。在 20 世纪，类似的展览在朝鲜半岛内外相继举办，为高级政府机构展示青瓷奠定了基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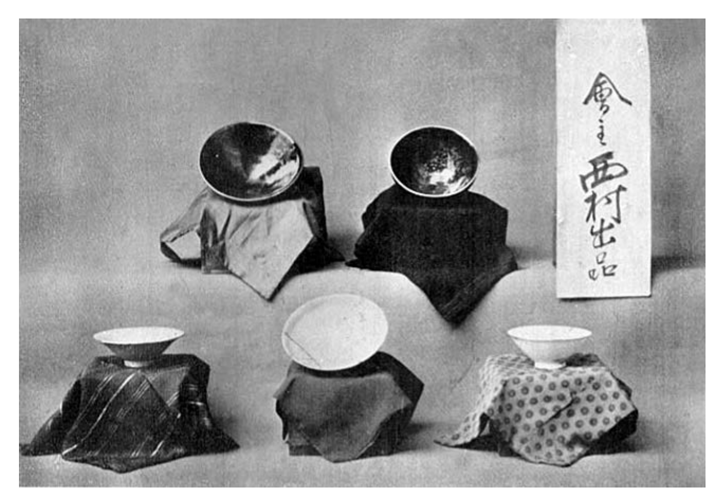
① Francis Brinkley. *“the Brinkley collection” of antique Japanese, Chinese and Korean Porcelain, Pottery and Faience*. New York: E. Greey, 1885. Charlotte Horlyck. Burial offerings to objets d’art: Celadon wares of the Koryŏ king dom (A. D. 918-1392).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08, 73 (9): 81-83.

② Itō Yasuburō, Nishimura Shōtarō. Kōryū-shō (Koryŏ celadon). Tokyo: Itō Yasuburō and Nishimura Shōtarō, 1910: 3-12.




图七　男爵高桥收藏的一套青瓷化妆盒和一个油瓶

（引自《伊藤安部郎和西村正太郎的高丽青瓷》，伊藤安部郎和西村正太郎，1910 年）




图八　西村正太郎收藏的定窑瓷器

（引自《伊藤安部郎和西村正太郎的高丽青瓷》，伊藤安部郎和西村正太郎，1910 年）

## 九、结　　语

青瓷在 19 世纪后期开始被发掘，到 20 世纪 10 年代已经成为朝鲜半岛人们、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及其他西方人渴望得到的藏品。在 20 世纪的前十年中，对青瓷的兴趣引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收藏狂潮，数百件瓷器被转手。然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这种繁荣结束了。最富有的陵墓被洗劫一空，日本在 1933 年颁布了严格的出口法律，规定出土的东西不能再卖给海外买家。但当时的朝鲜半岛、日本和西方人已经收藏了大量的陶瓷器。

显然，不同人群收藏高丽青瓷的原因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青瓷最初呈现出一种不同且独特又积极的朝鲜半岛形象，西方人以此为标志在更广泛的东亚背景中来定位朝鲜半岛的文化遗产。收藏青瓷的另一个强大动力在于青瓷作为古董的参考意义。西方和日本的收藏家认为高丽王朝有着一段早已逝去的全盛时期，青瓷是全盛时期留下的唯一痕迹。对朝鲜半岛历史的这种看法在日本收藏家和学者中影响甚广。

事实上，青瓷十分符合主流的审美观念，这使它们更具吸引力。西方人认为高丽青瓷器不同于明清瓷器，20 世纪 10 年代的明清瓷器已被贴上了颓废和丑陋的标签，而高丽青瓷与形制简约、内敛的宋元青瓷相似，吸引了收藏家们。日本人认为高丽青瓷不同于宋元青瓷，他们指出高丽青瓷的美丽根植于安宁、灵性、虚无和悲伤等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朝鲜半岛的本质。

到了 20 世纪 10 年代，机构和学术著作早已涉及青瓷，证明了青瓷是古董，重视青瓷具有的“朝鲜半岛特性”、历史意义和美学特质。一些青瓷甚至被推崇为“最好的”朝鲜半岛艺术品。自从第一次发现青瓷以来，它们已经从地下的晦涩之物变成了越来越多个人和机构所垂青的珍贵展品。它们的时代内涵也发生了变化。20 世纪初，日本和西方收藏家认为青瓷代表了朝鲜半岛过去时代的精髓，但在 50 年代之后，它们成为朝鲜半岛过去和当时成就的国家象征。这一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近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主任金永娜重申了这一观点，她说“高丽青瓷作为精髓，代表了最好的艺术和工艺”[①]。

附记：原文发表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2013, 76 (3). 本文的翻译工作已得到作者夏洛特·霍丽科的授权。

感谢 Anna Contadini、Charles Gore、George Manginis 和两位匿名审稿人评阅本文并提出修改建议。Chihiro Sasaki 慷慨地帮我翻译了日文文献。如有疏误，请各位方家指正。本研究得到了韩国基金会和韩国政府（MOE）建立的韩国研究院（KSPS）的鼎力资助（AKS-2011-BAA-2104）。

参考文献中，韩文和日文出版物作者的姓氏排在第一位，英文出版物作者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由于许多韩国作者姓氏相同，因此引用时韩国作者名称是全名。韩语的罗马标音使用 McCune-Reischauer 体系，日语的罗马标音使用 Hepburn 体系。

① Kim Young-na. Foreword to Ch’ŏnha cheil pisaek ch’ŏngj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 Park Hae-hoon, Jang Sung-wook. Ch’ŏnha cheil pisaek ch’ŏngj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Seoul: Kungnip chun- g’ang pangmulgwan, 2012: 4.

# Desirable Commodities–Unearthed and Collected Goryeo Celadon Ceramic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Charlotte Horlyck

**Abstract:** Goryeo celadon ceramics were manufactured during the Goryeo kingdom ( 918–1392), but by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ir manufacture ceased and they virtually disappeared from view until the 1880s when they began to be unearthed from tombs and other sites, which led to increased interest in them from Koreans, and especially the Japanese,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Focusing on British collection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collecting practices of Goryeo celadon wares from the time of their discovery in the 1880s to the market boom of the 1910s, culminating in the decrease in their availability in the 1930s. It will be argued that the desire for celadon wares was socially conditioned and that celadon were collected for a range of different, though not unrelated reasons, ranging from collectors' pursuit of unique Korean artworks, to their want of genuine antiquities and aesthetic perfection.
**Keywords:** Korea; Koryŏ; Colonial; Celadon; Collecting; Museum

# 地区形势与国家宗室政策演变视角下的北魏《元朗墓志》探究

王　萌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呼和浩特，010070）

**摘要：**北魏孝昌二年（526 年）《元朗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元朗墓志》不仅是探究北魏洛阳宗室成员发展轨迹、国家宗室政策所依凭的重要史料，亦为探讨北魏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北部与西部地区形势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

**关键词：**北魏　《元朗墓志》　宗室　北部西部地区　宗室政策

《元朗墓志》刊刻于北魏孝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志石边长 52 厘米；志文正书，29 行，行 29 字；1926 年洛阳城北后李村出土[①]。志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②]。《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③]《鸳鸯七志斋藏石》[④]《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⑤]《汉魏六朝碑刻校注》[⑥] 著录该墓志拓片，《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⑦]《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⑧]《汉魏六朝碑刻校注》[⑨]《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⑩] 著录该墓志志文。

清代晚期至今，河南洛阳出土北魏洛阳时代墓志甚多，其中以北魏宗室墓志为众。

---

①　赵力光：《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 年，88 页。

②　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河南美术出版社，2011 年，74 页。

③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53 页。

④　赵力光：《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 年，88 页。

⑤　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 年，图版一三二，346 页。

⑥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六册），线装书局，2008 年，74 页。

⑦　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 年，图版一三二，108、109 页，346 页。

⑧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201 ~ 203 页。

⑨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六册），线装书局，2008 年，74、75 页。

⑩　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河南美术出版社，2011 年，73、74 页。

孝昌二年《元朗墓志》为较早发现、公布的北魏宗室墓志之一。此方墓志史料价值之所在，一是墓志主人为史籍所失载，墓志具有补史籍缺失之价值；另一是该墓志对探究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北魏北部西部地区形势以及洛阳时代国家宗室政策的演变，大有裨益。所以有必要对《元朗墓志》进行深入探讨。文中不当之处，恳请方家赐教。

为研读之便利，现将墓志志文释读标点如下（图一）。

图一　北魏孝昌二年《元朗墓志》拓片[1]

魏故安西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元公之墓志铭

君讳朗，字显明，太武皇帝之母弟乐安宣王范之孙，处士苌生之仲子。其先龙飞创历之元，凤翔出震之美，丹青垂之无穷，国籍炳其鸿烈，文传已详，故可得如略也。君禀乾元之派流，资昆岳之神气，器亮早凝，英明夙发。弱冠除步兵校尉、直后。及至宿卫紫宫，忠勤之迹每彰；列侍丹墀，匪解之音克

① 赵力光：《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 年，88 页。

远。俄迁左中郎将、直寝，转直阁将军。朝廷以平城旧都，形胜之会，南据猃狁之前，东连肃貊之左，保境宁民，实拟贤戚，乃除君持节、征虏将军、平城镇将。君遂御夷狄以威权，导民庶以礼信。其时十余年间，凶奴不敢南面如坐者，殆君之由矣。逮神龟二年，以母忧去职。君孝行过礼，哀深孺慕，初丧一旬，水浆不入于口，苫块二期，鬓发皓然俱白。勉丧之后，还复缁首。天子嘉之，敕下有司，标其门芦，以彰纯孝。纵王褒朽树于前，孟仁变竹于古，方之于君，无以过也。属皇家多难，妖氛竞起，河西之地，民莫安居。朝廷以君果毅早闻，戎照夙著，乃除君持节、行河州刺史。道届长安，未获前达，寻被别敕，兼行台尚书，节度关右。君乃淹思内凝，神机外发，折胜之筹，举无遗算。当尔陇贼未夷，秦妖尚蠢，雍华之民，屡相扇动，或屠没郡县，煞害王人，群行不轨，劫绝公使；致令奔命之符，潜行夜川；告庆之驿，偷驰宵谷。京师怀櫟幕之忧，西军有缀流之顾。朝廷患之，未或能御，复以君为使持节、安西将军、都督回镇冲关。君遂抚众以驯雉之仁，董盗以仓鹰之猛。于是奸轨潜形，寇贼远迹，京西无苟吠之虞，周疆绝问鼎之客。王室之不坏，实君是赖。方将蹑三阶以上驰，迈九树如余远，岂图皇天不吊，与善愆期，萎兰桂如早亡，摧青松以夙殒。春秋五十一，以孝昌二年九月丁酉朔戊申日薨于师。于是朝廷爰案故典，加以二等之礼，赠使持节、安北将军、并州刺史，礼也。闰十一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葬景陵东岗。若夫天长杳眇，地厚深沉，刊石泉门，式照德音。其词曰：

葳蕤鸿绪，世载攸长，惟公之先，且帝且王。龙昇日道，凤翥云乡，言发朱邸，来朝未央。降逮夫公，夙踵高风，才为世范，器实人雄。执官廊庑，给事清宫，守兹恭愿，保是虔忠。资仁以性，禀孝自天，腾踪柴闵，岂伊二连。爰丧先妣，素首立年，亦既阕止，皓鬓徂玄。或镇蕃要，或司莫府，策禀兵韬，虑深钩拒。动必穷代，算无遗举，言开六郡，载清三辅。云途未骋，鵾路已骞，寂寥泉户，如何夜天。霜悲墓道，风急松阡，匪资玄勒，孰响幽埏。

元朗活跃于北魏平城后期至洛阳时代，此时间段正值北魏统治重心南移、统治者将注意力之大部倾注于南方、北魏由稳定强盛逐步向动荡衰弱转变之阶段。所以，只有结合具体时代背景，方可洞悉墓志所蕴含的历史讯息。

## 一、元朗的家世

墓志颂辞“葳蕤鸿绪，世载攸长，惟公之先，且帝且王”，高调渲染元朗出身帝王世家，宣扬元朗血统之高贵。关于元朗所属家世，志文记载有旁系与直系两支。旁系先祖：志文记载元朗从祖祖父太武帝拓跋焘。直系先祖：①志文云元朗祖父“乐安宣王

范”，即史籍所载明元帝子拓跋范。《魏书》卷 17《明元六王·乐安王范传》所载“世祖以长安形胜之地，非范莫可任者，乃拜范都督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高选才能，以为僚佐。范谦恭惠下，推心抚纳，百姓称之。时秦土新罹寇贼，流亡者相继，范请崇易简之治，帝纳之。于是遂宽徭，与人休息”，反映出拓跋范身居中原重镇长安镇将之任，又深得太武帝信任，那么这些是否有利于拓跋范仕途空间的进一步扩展、位极人臣以及巩固其家族与宗室群体的地位？本文认为，以拓跋范的资历、功勋以及与太武帝的紧密君臣关系而论，拓跋范确实有很大机会使自己的仕宦达到显赫顶点、树立并巩固其家族在宗室群体中的崇高地位。但是拓跋范在太武帝后期的宫廷内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史籍记载“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①]，拓跋范知晓刘洁欲阴谋拥立乐平王拓跋丕为帝这一严重僭越行为却不告发，其必然遭到太武帝猜忌，虽然史籍云拓跋范“因疾暴薨”，但不排除拓跋范被太武帝赐死，或者忧惧而亡的可能。②元朗父，志文只有“处士苌生”的极为简略记载。拓跋苌生，不见于史籍，因此志文可补史籍缺失。志文称拓跋苌生为处士，反映出拓跋苌生并未进入仕途。似乎拓跋苌生受其父牵连。但由《魏书》卷 17《明元六王·乐安王范传附拓跋良传》所载拓跋苌生长兄拓跋良“世祖未有子，尝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亲抚养之。长而壮勇多知，常参军国大计。高宗时，袭王。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为内都大官”来看，拓跋范长子拓跋良仍受太武帝信任与重用。所以，本文认为，拓跋范事件对其子嗣影响相对有限，否则拓跋范长子在太武帝中后期不可能处于决策核心层、在文成帝时期亦不可能成为中央与地方军政要员；拓跋苌生未入仕，主要是其选择远离充满内争危险的政治中心。由此可见，元朗所属家族之地位，总体上来看应未经历太大波折。

## 二、元朗入职禁卫

元朗进入仕途初期，志文云“弱冠除步兵校尉、直后。及至宿卫紫宫，忠勤之迹每彰；列侍丹墀，匪解之音克远。俄迁左中郎将、直寝，转直阁将军”。古代称二十岁男子为弱冠。根据志文所云元朗生卒年。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 年），刚成年的元朗任职步兵校尉、直后，负责皇帝侍卫事务，开始接近权力核心；不久，元朗相继任左中郎将、直寝、直阁将军，在禁卫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禁卫职官，事关皇帝安全，任职禁卫，足以显示统治者对任职者的信任。而元朗累任禁卫职官且在禁卫系统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与确立，较受统治者宠信与重用。志文云元朗供职禁卫系统期间“忠勤”“匪解”之事迹，至少包含两层信息：一方面，“忠勤”“匪解”是其为官必备的优良品格，以及接近、立足权力核心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元朗行事特重恭谨之态度，也是基于

---

① 《魏书》卷 17《明元六王·乐安宣王范传》，中华书局，1974 年，415 页。

现实因素的考虑。首先，很有可能受其祖父拓跋范因没有很好履行臣子之责而受到猜忌的影响，也就是说，元朗在任职禁卫系统期间的忠于职守、恭谨行事之风格，不仅是要获得统治者的进一步信任，更为重要的是，借谨慎行事消除拓跋范事件对家族长远发展的潜在不利影响。其次，宣武帝时“宗室大臣，相见疏薄”[①]即宣武帝对宗室血缘近亲成员持有猜忌、防范态度，这使由孝文帝过渡到宣武帝时期、出身宗室血缘近亲且带有政治污点家族的元朗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而元朗恭谦谨慎、尽职尽责，为其日后履职边疆，成为边疆大吏打下基础。

## 三、元朗任职北方所反映的北魏后期北方形势以及统治者应对策略

根据志文，至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元朗任平城镇将已有十年，则可知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元朗始任平城镇将。关于元朗任平城镇将之缘由以及任职期间事迹，志文云“朝廷以平城旧都，形胜之会，南据猃狁之前，东连肃貊之左，保境宁民，实拟贤戚，乃除君持节、征虏将军、平城镇将。君遂御夷狄以威权，导民庶以礼信。其时十余年间，凶奴不敢南面如坐者，殆君之由”，以上反映出：北魏迁都洛阳后，统治者对旧都平城以及以平城为核心的部分北方地区之防御是非常重视的；北魏北方所面临的柔然威胁仍较严重；统治者主要从心腹成员尤其是宗室成员中选任平城镇将。平城地区，北以北疆六镇防线为依托，近有勾注山天险为屏障，东北控扼东胡系民族与北魏北方边疆交界之地域，即志文所云“形胜之会”。《北史》卷15《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元淑传》“孝文时，（元淑）为河东太守。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淑下车劝课，躬往教示，二年间，家给人足，为之谣曰：‘泰州河东，杼柚代舂。元公至止。田畴始理。’卒于平城镇将”，这是目前所见平城镇出现最早的记载，本文认为，平城镇设置于北魏孝文帝迁都后的太和后期；宣武帝继续设置平城镇以加强北魏旧都之地以及所临近北疆地区的防御。

若仅根据《魏书》卷18《太武五王・广阳王建传附元深传》所载“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很容易使人认为洛阳时代的孝文帝及以后的统治者对北疆经营持轻视之态度进而导致北疆形势渐趋混乱。但实际上，一方面，崛起于漠北的柔然在与北魏对峙中，虽历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发动的大规模征讨作战的打击，力量受到削弱，但尚存部分实力，直至北魏灭亡，柔然对北魏北方地区一直存在威胁。另一方面，北魏北

① 《魏书》卷72《阳尼传附阳固传》，中华书局，1974年，1604页。

疆在抵御柔然、保障内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洛阳统治集团如若因南迁将北疆地区置若罔闻，一旦柔然突破北魏北疆防线、进占平城，其南下中原将如入无人之境，北魏在中原将无屏障以进行防守；如果北魏北疆防线崩溃，北魏政权的存续成为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对于已南迁至洛阳的众多北族来说，其在中原已无任何退路，迁洛的北族重回塞北或者再回到拓跋先祖曾经生活的大兴安岭地区，恐怕不可能，因为塞北部分地区以及大兴安岭地区已为柔然、东胡系等民族所占据；继续留在中原，中原社会能否接纳这些已经失去国家依托的北族群体，亦为未知。正因为此，我们应尽量摆脱孝文帝迁都、汉化改革、国家发展重心转变对北魏北疆经营之影响等思维视野的羁绊，从北疆地带本为胡族统治集团根基所在、北魏所面临实际边疆形势角度出发进行探究，透视迁洛后的北魏统治集团关于经营北疆之核心决策。其实早在孝文帝迁洛之初，统治集团对北方态势仍给予足够重视，如《魏书》卷 53《李冲传》载太和十五年（491 年）李冲上书孝文帝分析当时边疆态势“魏境所掩，九州过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与江外耳”，“江外”指江南萧齐，此时萧齐正陷入激烈的宗室内争，已无法大规模北上攻魏，对北魏构不成太大的威胁；“漠北”主要指柔然，柔然虽经过太武帝时期的军事打击，力量有所削弱，但此时尚存部分实力，并不时对北魏北疆地区进行掳掠。所以迁洛后的孝文帝对北疆所面临严峻形势还是非常清楚的，进而通过设置怀朔镇都督区与柔玄镇都督区来加强北疆防守、保障旧都平城安全。另据《魏书》卷 19 下《景穆十二王下・乐陵王胡儿传附元思誉传》所载太和后期“（元思誉）为镇北将军，行镇北大将军。高祖引见百官于光极堂，谓思誉曰：‘恒代路悬，旧都意重，故屈叔父远临此任，不可不敬慎所临，以副朕望’”，亦可看出迁洛后锐意改革、欲拓地江南的孝文帝对北疆与旧都的防守是非常重视的，这有利于北魏在北疆地带与柔然的对抗中占据上风、保持主动性。而志文与史籍所云平城镇就是在孝文帝迁洛后加强北疆防御与巩固北疆防线后方旧都形势目的下设置的。

柔然边患威胁的存在使宣武帝集团对北疆与北疆后方平城形势仍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而使孝文帝所制定的积极部署北疆防御与规划旧都的政策在当时继续实行。《魏书》卷 41《源贺传附源怀》所载“正始元平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恒代。诏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征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怀旋至恒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表曰：‘……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剪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世宗从之。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便鲜明反映出柔然当时欲利用北魏统治集团迁洛所引起的北疆防御一度松弛、洛阳统治集团对北方防线与旧都的控制由

于空间距离的因素而渐显吃力的困境，首先南下扰掠北魏北疆防线、然后进占与北疆防线唇齿相依的北魏旧都平城地区。熟知柔然意图的洛阳统治集团，首先通过增设镇戍来加强北疆的防御力量；其次通过巩固平城镇进而在北方地区形成南北多道防线协同防守之势，实现将柔然御于域外、保障北方边地以及旧都平城稳定的战略目的。而志文所云元朗于永平三年出任平城镇将并以恩威并施之策控御柔然，与正始年间北魏增设北疆镇戍是相辅相成的。

熙平元年至神龟二年，元朗继续任职平城镇将，首先与漠北形势的变化有关。《魏书》卷103《蠕蠕传》载“熙平元年，（郁久闾伏图）西征高车大破之，禽其王弥俄突，杀之，尽并叛者，国遂强盛”，也就是说，柔然实力的复兴，必然使北魏北方边地面临的压力有所增加。所以，孝明帝集团为巩固北疆边防与旧都平城以及实现抵御柔然于域外的战略目标，除继承前代所置之怀朔镇都督区与柔玄镇都督区，就是重视平城镇之防守。其次是与孝明帝集团调整宗室政策背景紧密相连。《魏书》卷9《孝明帝纪》载：“（熙平二年八月）诏曰：‘皇魏开基，道迈周汉，蝉连二都，德盛百祀，虽帝胤蕃衍，亲贤并茂，而犹沉屈素履，巾褐衡门，非所谓广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近远，叙之列位。’”明确透露出孝明帝将宗室成员视为巩固统治的核心势力，要扭转宣武帝时期“宗室大臣，相见疏薄”[①]即宣武帝与宗室成员渐生嫌隙所导致的洛阳统治集团实力削弱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孝明帝重用宗室成员背景下，出身宗室近亲、有治边经验的元朗自然得到重用。

根据《魏书》相关记载，宣武帝永平年间至延昌年间、孝明帝熙平元年至神龟二年，柔然无南下侵犯北魏北方边塞事迹，由此，本文认为，北魏增设北方镇戍与元朗积极经营平城防务，共同造就了宣武帝中后期至孝明帝前期北魏北疆及旧都平城的有利形势。

## 四、元朗任职西方所反映的北魏后期西方形势及统治者应对策略

《魏书》卷9《孝明帝纪》所载“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衅起四方，祸延畿甸”，反映出孝明帝时期洛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动荡时局，一方面使北魏洛阳统治集团控制边疆地区的力量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使原本就叛服不定、具有离心倾向的边疆及邻近地区形势趋于动荡。在此背景下，统治者必然要派遣以宗室为核心的心腹出镇边疆，尤其是对洛阳京畿产生直接影响的西方地区，以稳定当地形势。

志文所云“皇家多难，妖氛竞起，河西之地，民莫安居”，透露出动荡的西部地区

---

① 《魏书》卷72《阳尼传附阳固传》，中华书局，1974年，1604页。

成为北魏洛阳中央极为关注之地。元朗正是在如《魏书》卷9《孝明帝纪》所载正光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庚戌，假光禄大夫邴虬抚军将军以讨之”“（十二月）以东益、南秦氐反，诏中军将军、河间王琛讨之，失利”；正光五年“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八月甲午，元志大败于陇东，退守岐州”，即北魏在关中、河陇失利的情况下出镇西部地区的。由志文所云“朝廷以君果毅早闻，戎照夙著，乃除君持节、行河州刺史。道届长安，未获前达，寻被别敕，兼行台尚书，节度关右。君乃淹思内凝，神机外发，折胜之筹，举无遗算”，河州为连接北魏关中与河西的枢纽地带。河州形势的稳定与否，事关西部地区稳定；对河州能否有效控制，影响北魏洛阳与西部凉州、敦煌镇之间的联络沟通。孝明帝集团考虑到元朗任职平城镇将期间所积累的治边经验，原本任命元朗为河州刺史，但基于整合关中西部军政力量以平定当地叛乱的需要，孝明帝集团任命元朗为关中西部行台、执掌当地军政事务。由此可见，元朗任行台尚书、节度关右，应与指挥南秦州、雍州等关中西部军事力量以及平定当地叛乱有关。在河陇、关中西部叛乱尚未完全平定之际，靠近洛阳京畿的关中地区局势再度陷入动荡，志文所云此次关中“秦妖尚蠢，雍华之民，屡相扇动，或屠没郡县，煞害王人，群行不轨，劫绝公使”即指《魏书》所载秦州城人莫折太提聚众反叛、南秦州城人孙掩等聚众叛乱、高平镇叛乱势力首领胡琛派遣宿勤明达寇掠豳夏北华三州，众多叛军大有向洛阳京畿抵近之势。在洛阳京畿所面临严重危机之际，元朗被委以“使持节、安西将军、都督回镇冲关”指挥、协调关中军事力量以平定当地乱局。根据志文“君遂抚众以驯雉之仁，董盗以仓鹰之猛”，可知元朗以恩威并施之策安抚关中民众、打击当地叛乱势力，收到了“奸轨潜形，寇贼远迹”的积极效果，保障了京畿安全。而“京西无苟吠之虞，周疆绝问鼎之客”原指公元前771年，申侯勾结犬戎攻占西周镐京、杀死周幽王。既然志文撰写者以西周镐京乱局来形容正光至孝昌年间关中乱局以及对洛阳京畿的威胁，那么当时洛阳统治集团对关中的控制与否以及当地形势对全国政局所形成的牵动之势必然有清醒的认识。

志文“王室之不坏，实君是赖”在向众人表明元朗是扭转孝明帝时期关中、河西局势中的关键人物。如果另据《魏书》卷9《孝明帝纪》所载“（孝昌元年正月）萧宝夤、崔延伯大破秦贼于黑水，斩获数万，天生退走入陇西，泾、岐及陇东悉平”便可看出当时西部局势的稳定，萧宝夤、崔延伯等汉族官员亦发挥重要作用。至此我们可清晰看出孝明帝集团在应对西部地区乱局、选任西部作战区域指挥官的战略对策：派遣能征善战的汉族官员负责地方基层作战任务；以部分宗室成员统兵、参与到地方基层军事活动中，如元琛、元志、元修义率军在南秦州、秦州等地征讨作战；以部分宗室成员作为西部诸路征讨军的最高统帅，负责指挥与协调北魏军队在关中的作战，如元朗以“使持节、安西将军、都督”的身份统率诸路征讨军。进而可见，西部地区动荡形势出现后，孝明帝统治集团一方面积极调动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进行平叛；另一方面以宗室成员为西部诸路征讨军最高指挥官、以部分宗室成员以及汉族官员为基层作战指挥官，即将地

方军权更多地掌握在宗室成员手中，形成以宗室成员为西征平叛指挥核心、以汉族成员为辅助力量的格局。

## 五、由元朗仕宦所见北魏孝文至孝明三朝的宗室政策

根据元朗在孝文、宣武、孝明三朝所任职官的实际职掌与品级，表面上，元朗逐步晋升，仕途显赫，备受孝文等三帝重用。但只有将元朗仕宦与当时具体背景相结合，方可洞悉孝文至孝明三帝宗室政策的内涵及其对元朗仕宦的影响。

首先，孝文帝时期，元朗在禁卫机构中的实际权力与地位在逐步上升，且接近权力核心，与孝文帝调整宗室政策相关。《魏书》卷 7 下《孝文帝纪下》载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此制正式全面推行于宗室群体。孝文帝调整宗室政策之核心要义，在于以血缘亲疏为标准，将北魏建立者道武帝子嗣视为宗室血缘近亲、道武帝之前的拓跋统治者子嗣视为宗室血缘远亲。孝文帝亲近与重用道武帝子嗣，将道武帝子嗣视为自己巩固统治所依靠的真正心腹势力；限制北魏建立前拓跋统治者子嗣的权力，但该部分成员毕竟与北魏统治者有血脉之亲，在北魏国家中亦具有一定影响，亦为统治者可利用，所以，孝文帝将宗室血缘远亲视为权力核心的辅助力量，但对宗室血缘远亲权力进行一定限制。张金龙在《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中认为“孝文帝时期北魏政治舞台上可见到六十位宗室贵族的政治活动，其中太武帝拓跋焘太子晃之子孙后代最多，占三分之一强”①，如果将道武帝至献文帝系宗室综合考量，则可以看出宗室血缘近亲占孝文帝时期政治舞台宗室比例的近十分之九。至此可见，出身宗室血缘近亲的元朗在孝文帝时期禁卫机构的权力与地位的晋升以及处于权力核心层，与孝文帝重用血缘近亲的宗室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元朗在宣武帝时期任职禁卫机构与担任地方军镇镇将，亦与宣武帝调整宗室政策有关。元朗任直阁将军，作为禁卫武官活跃于宣武帝身边，而且元朗所任直阁将军之权力与品级已较之前所历禁卫职官有明显提升。若仅据此，很容易使人认为元朗得到宣武帝的信任与重用，仕途大有显赫之势。但若考虑到之后元朗出镇地方以及被授予之职权范围，我们便可看出其中的微妙变化。首先，元朗以“贤戚”即拥有才能与宗室身份而出任北魏北方重镇平城镇将，此点亦确实体现出北魏宣武帝重视从宗室与胡族贵族群体中选任镇将的特点；元朗任平城镇将十年之久，是北魏时期任职镇将时间较长者，非众多胡汉贵族所能企及，似乎透露出元朗虽然不在中央核心任职，却为边疆军镇实权人物，其仕途仍非常显赫。但仅凭此尚不足以认为宣武帝对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元朗给予完全宠信。其次，关于元朗在平城镇所行使职权范围，志文云“持节”。持节，

---

①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 年，107 页。

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授予出任地方官员节仗之统称。持节制度起源于西晋，北魏继承西晋的持节制度。据《晋书》卷 24《职官志》所载“晋受禅，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便可知，出任地方的官员被授予“持节”在日常行使职权范围远逊于被授予“使持节”者。而平城镇作为北魏北方军事重镇、紧邻六镇地带，平城镇形势的稳定与否，事关北魏北部边疆地区局势的稳定。对于如此重要的军镇，宣武帝任命元朗为平城镇将时，仅授予元朗“持节”。难道宣武帝忽略了平城镇的实际地位以及平城镇将应拥有更多实权以应对边疆地区复杂局势，实则不然。志文所云“平城旧都，形胜之会，南据猃狁之前，东连肃貊之左”反映出宣武帝明晰平城镇之地位，但宣武帝只授予元朗“持节”，实则透露出宣武帝有意将元朗调离中央，外任为地方镇将但又要限制元朗在军镇权力的深层目的。此种现象的出现，与宣武帝改变其父孝文帝所制定的宗室政策有关。而宣武帝改变孝文帝既定的宗室政策，是受当时部分宗室近亲成员威胁自己权力以及宗室谋反事件的影响。《魏书》卷 21 上《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载孝文帝选定自己兄弟咸阳王元禧为“宰辅之首”即作为宣武帝的重要辅政大臣，但宣武帝继位之初，元禧不但未尽辅弼之职，反而“阴为威惠”，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元禧又将“田业盐铁”遍于京畿，与国家争利，由此引起“世宗颇恶之”；甚至元禧“与其妃兄兼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谋反”，景明二年（501 年），元禧谋反失败，被宣武帝赐死。元禧谋反可谓继位不久的宣武帝与宗室血缘近亲成员最严重的矛盾冲突，进而导致“宗室大臣，相见疏薄”[①] 即宣武帝对宗室血缘近亲成员的猜忌逐渐加深。《魏书》卷 21 上《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载元详在宣武帝继位之初的景明年间“位望兼极，百僚惮之”“军国大事，总而裁决”，即元详擅权干政。《魏书》卷 22《孝文五王・京兆王愉传》载宣武帝永平元年（508 年），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在冀州僭越称帝。宣武帝面对来自宗室血缘近亲成员的挑战、威胁，只能对孝文帝既定宗室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即拉拢宗室血缘远亲、限制宗室血缘近亲。明晰此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元朗任职平城镇将期间为何行使职权时受到限制。对于宣武帝来讲，其任用元朗为边镇镇将，也是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宣武帝看到元朗“策禀兵韬，虑深钩拒”即擅长军事谋略，是边镇镇将的最佳人选；而且注意到元朗“忠勤之迹”“匪解之音”，即元朗在政治上较为可靠。另一方面，宣武帝面对宗室血缘近亲的多次挑战与威胁，对元朗自然持有一定怀疑，宣武帝将恭谨职守的元朗调离事关自己安危的禁卫机构，就是防患于未然；任命元朗为平城镇将但限制其在平城镇行使职权范围，既要充分利用元朗军事才能，又要防止元朗在边镇势力做大。所以，元朗在宣武帝时期的仕宦，隐晦地反映出部分宗室血缘近亲在当时的仕宦境遇。

最后，元朗在孝明帝时期备受重用亦与统治集团的宗室政策有关。史籍所载“魏自

---

① 《魏书》卷 72《阳尼传附阳固传》，中华书局，1974 年，1604 页。

宣武已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衅起四方，祸延畿甸”①，反映出孝明帝时期洛阳统治集团内部紊乱失序、地方叛乱已严重侵蚀北魏国家根基。另据《魏书》相关记载，孝明帝时期部分宗室谋逆于地方、叛逃江南，对于已经衰颓、无法应对天下乱局的洛阳统治集团来说，其巩固统治所依靠的核心根基已出现明显动摇。如果不对宗室群体进行整合，继续实行宣武帝对宗室血缘近亲与远亲区分对待的政策，皇帝与宗室之间的裂痕会加深，洛阳胡族统治集团在中原将无法立足。所以，洛阳统治集团对宣武帝制定但不利于巩固密切宗室与皇帝关系的宗室政策进行调整，具体而言，就是不再刻意区分宗室血缘远近，对政治上可靠、具有一定军政才能的宗室成员予以任用。《魏书》与墓志便有较多的宗室成员在孝明帝时期活跃在中央与地方的军政事务中、在乱局中力挽狂澜的记载。以元朗而言，在孝文帝与宣武帝时期任职禁卫机构所表现出的恪尽职守、在宣武帝时期出镇地方所积累的丰富治理边地经验，自然会为孝明帝统治集团所注意。志文所云元朗出镇关中“兼行台尚书，节度关右”“使持节、安西将军、都督回镇冲关”明确透露出孝明帝集团授予元朗全权处理关中军政事务之权力，这自然有利于元朗协调关中各地军政力量以对抗关中叛乱势力、稳定关中局势。

## 六、元朗卒葬地

志文云孝昌二年（526 年）九月，元朗卒于洛阳；十一月十九日，元朗葬于“景陵东岗”。景陵，北魏宣武帝之陵。也就是说，元朗葬地位于北魏宣武帝景陵区。

今河南“铁谢—上河图—三十里铺—平乐镇”② 为北魏洛阳时代陵区的重要分界线，该线以西区域为北魏帝陵、众多宗室血缘近亲陵墓、后宫成员陵墓、众多胡族高门与汉族高门陵墓分布所在的北邙山墓区，以东区域为部分宗室血缘远亲陵墓与帝室十姓陵墓、中下层胡汉贵族与部分外戚陵墓分布所在的乾脯山、首阳山墓区。北邙山墓区是北魏洛阳时代的核心墓区。迁洛胡族成员故去后，葬于洛阳地区，与《魏书》卷 20《文成五王・广川王略传附元谐传》所载北魏孝文帝规定“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有关。

北魏宣武帝景陵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北郊邙山乡冢头村东 1 里处③。元朗墓志，1927 年，洛阳城北后李村出土；元朗墓志出土地“在尖冢（宣武帝景陵）东南数十步”④。据此可见，元朗葬地距离宣武帝景陵是非常近的。元朗卒后获得葬于北邙山墓区宣武帝景

① 《魏书》卷 9《孝明帝纪》，中华书局，1974 年，249 页。

② 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 年，141 页。

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第三章《墓志、碑刻、黄肠石与帝陵地望的探索》，文物出版社，2018 年，513 页。

④ 郭培育、郭培智：《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象出版社，2005 年，32 页。

陵附近的殊荣，对于元朗家族成员以及故去的元朗来说，可谓是荣耀之举。

根据目前所见北魏洛阳时期宗室墓志所云墓主人葬地，宗室故去后以葬于长陵（孝文帝陵，亦称为金陵、大陵、东垣之陵）茔域附近为主流，葬于宣武帝景陵茔域较少。根据《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等文献，宗室卒后葬于孝文帝陵茔域者有三十人；宗室葬于宣武帝景陵者有九人，与葬于孝文帝陵茔域的宗室相较，明显要少。凭借资历与功劳，元朗卒后理应获得葬于北魏洛阳时代祖陵即孝文帝长陵的殊荣，但其最终葬于宣武帝景陵。是元朗资历、功劳与其他宗室相较尚浅，还是受其祖父拓跋范事件的影响？以元朗资历与功劳而论，元朗侍奉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属宗室中元老级人物；元朗任职北方重镇平城镇将期间，恪尽职守，保障了北部边疆部分地区近十年的稳定局面；元朗出镇关中，平定乱局，化解了洛阳京畿的危机，可谓北魏后期的栋梁之臣。从以上方面而言，元朗之资历与功劳非众多宗室成员所能企及。关于拓跋范事件，如前所论，拓跋范事件对元朗在孝文帝至孝明帝三朝的仕宦影响甚微；元朗被宣武帝调离禁卫机构、外任边镇，是宣武帝调整宗室政策的影响，如果宣武帝对太武帝朝的拓跋范事件始终耿耿于怀、对元朗始终颇为猜忌，断然不会将北方重要边镇平城镇的军政权力交给元朗。既然元朗资历、功劳以及拓跋范事件不是影响元朗卒后葬地的因素，那么处于动荡时局中且欲拉拢宗室以共抗时艰的孝明帝集团，为何不将元朗葬于孝文帝长陵之茔域以符合当时宗室陵分布之主流趋势，进而可有效凝聚宗室力量。在这里，本文认为可从宣武帝陵所处之地势以及元朗在宣武帝朝仕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探究。北魏宣武帝景陵“位于河南洛阳市北郊邙山乡冢头村东 1 华里处，为一圆形大土冢，直径 110、高 24 米”[①]，可见宣武帝景陵之规模。又据《资治通鉴》卷 188 唐武德四年“(二月）辛丑，世民移军青城宫，壁垒未立，王世充帅众二万自方诸门出，凭故马坊垣堑，临谷水以拒唐兵，诸将皆惧。世民以精骑陈于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谓左右曰：‘贼势窘矣，悉众而出，徼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可知宣武帝景陵地处险要之地。险要之地，可作为古代皇帝、官员卒后陵墓的首选之所，亦为军事防守中的屏障。基于此，本文审慎认为，宣武帝卒后，其陵墓亦需人守护；而元朗生前在宣武帝朝任职禁卫机构，后又守卫北魏北方冲要之地平城镇，既然元朗生前侍卫宣武帝左右、防守冲要之地，那么卒后，孝明帝集团让其葬于宣武帝陵之地，应有让元朗继续侍卫宣武帝左右之隐含用意。

## 七、结　　语

元朗一生经历颇为丰富，元朗墓志不仅可补史籍关于明元帝后裔记载的缺失，亦为

---

①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第三章《墓志、碑刻、黄肠石与帝陵地望的探索》，文物出版社，2018 年，513 页。

探究北魏平城至洛阳时代统治重心转移、中央云谲波诡形势、国家实力由盛转衰等背景下宗室个人仕宦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个案史料，亦可为史籍记载的国家调整宗室政策、北部与西部地区动荡局势及统治者应对策略提供佐证与补充，该墓志史料价值珍贵。

# Research on “Epitaphy of Yuanlang” of Northern W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ea’s Situation and National Royal Clansmen’s Policy

Wang Meng

**Abstract:** “Epitaph of Yuanlang” inscribed in 524 of Northern Wei was excavated in Luoyang, Henan Province. “Epitaph of Yuanlang” not only i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exploring the official career of royal clan members and National Royal Clansmen’s Policy during the Luoyang Periods of Northern Wei but also provides the crucial materials for approaching the situation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areas of Emperor Xuanwu and Xiaoming periods of Northern Wei.

**Keywords:** Northern Wei; Epitaphy of Yuanlang; Clansmen; Northern and Western Areas; Royal Clansmen’s Policy

# “隆庆议和”后大同镇长城城堡建设研究
## ——以石刻史料为中心

尚 珩[1] 赵 杰[2]

（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100009；2.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太原，237016）

**摘要：**本文以长城碑刻为基本材料和依据，结合其他历史文献，探究“隆庆议和”后大同镇城堡的建设、发展与演变。

**关键词：**碑刻 大同镇 长城 城堡

发生在隆庆四年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俺答封贡”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古各部与明王朝之间近200年兵戎相见的战争局面。但双方的和平能持续多久，明廷并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在此之前蒙古对明廷的纳贡称臣多次反复，双方旷日持久的战争，加上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明廷对其早已失去信任，尤其是嘉靖朝，蒙古对边防的冲击规模日益扩大，次数日益频繁，影响愈发深远，这对当时的士大夫们所形成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可谓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上到天子、下至僚臣无不谈及色变，心中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此，这次“封贡”，对于明廷来说，最迫切、最现实的目的是得到喘息的时间，修筑边防工事。隆庆五年十二月，宣大总督王崇古便“条陈边事曰：一，修险隘。谓当乘虏纳款之际，缮完城隍墩堡”①。万历三年陈文燧提议“增城堡以完保障”②。

从道理上讲，双方议和后应停止任何军事动作，以免招致对方的猜疑。但时任宣大总督的郑洛积极主张修筑边防。消息传到蒙地，“虏王果使使来诘：‘两家和好欲长久，修边欲何事？或边完则杜关矣’”。郑洛回答：“华夷两家自有界限，如我中国人兄弟分析房产，亦各院落为自家计。今北地虽款，尔通夷多潜逃来乡里，我中国又有恶少捉尔马，不为边以防，尔即索逋逃诘盗马者，尔能不问我，我且奈何。是修边为北地计也。”③虏使听完后“唯唯”。此次外交的胜利也拉开了“和平”时期修建边墙、墩堡的

① 李峰、张焯：《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1025页。

② 李峰、张焯：《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1049页。

③ 郑洛：《抚夷纪略》，《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140页。

高潮。

目前对于隆万时期大同镇长城建设的研究，学界主要依据《明实录》、万历三十一年前后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万历四十四、四十五年成书的《三云筹俎考》等文献，并以后两者最为流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云筹俎考》两书对大同镇所辖军事城堡的建设发展和建筑形制描述甚详。此书付梓之后的城堡建设并未停止，但文献多失载，且囿于文献记载自身的缺陷，详尽程度有限。随着近年长城沿线城堡内石碑的发现，我们能够更加细致地研究这一时期城堡建设的详情。

## 一、创建城堡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云筹俎考》记述了大同镇72座城堡的肇建时间，其中洪武、永乐时期修建的共14座，正统、天顺、成化、弘治朝修建的共6座，嘉靖、隆庆（隆庆议和前）朝48座，万历朝创修4座。

俺答受封后向明廷宣誓永不犯边，明朝也申令今后禁止捣巢、烧荒，停止招徕逃民，使汉地居民安心生产。自“俺答封贡”以后，到“隆万间，中土安平，不见兵革”[①]。边塞止熄数十年，出现了“数月之间，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稀见之事而今有之”[②]的情景。但实际上，大同镇的边镇建设并未停止。

“隆庆议和”后，城堡建设以砖包为主，布局、建置日益完善。两书对于“议和”之后新建城堡的记载，仅桦门堡（万历九年）、新云石堡（万历十年）、马营河堡（万历元年）、将军会堡（万历九年）4座。但实际上还有大水口堡，失载于该文献中。

大水口堡。“明崇正（祯）十三年（1640年）指挥郑一元筑堡，砖包，周一里六十步，高连女墙三丈五尺，东门上有楼，外有东关”[③]。该城堡修建时间较晚，《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云筹俎考》失载，且应是明代大同镇修建最晚的军堡。该城堡承担分管边墙的任务，“大水口堡营分管边墙一道，南自败虎堡头墩边界起，北至威虎堡十六墩边界止。沿长二十里。原设边墩二十五座……内东十八墩、西十九墩两墩对峙，各建砖楼，中有水口，汤溪河及近不诸水皆从此流出口外，西入黄河”[④]。

大水口堡的地望学界普遍认为位于今山西朔州平鲁区大河堡村村东。村内尚存有2通门额：“屹然保障”和“金汤永固”（图一）。据当地长者回忆，门额原位于城堡南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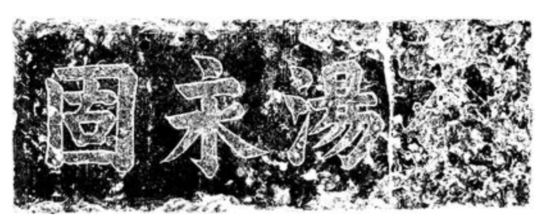
---

① 查继佐著：《罪惟录》卷11下《梁梦龙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1741页。

② 《明穆宗实录》卷59《隆庆五年七月戊寅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1435页。

③ 刘士铭修，王霨纂：《朔平府志》卷4《建置志·城池》，三晋出版社，2016年，373页。

④ 刘士铭修，王霨纂：《朔平府志》卷8《武备志·边防》，三晋出版社，2016年，1014、10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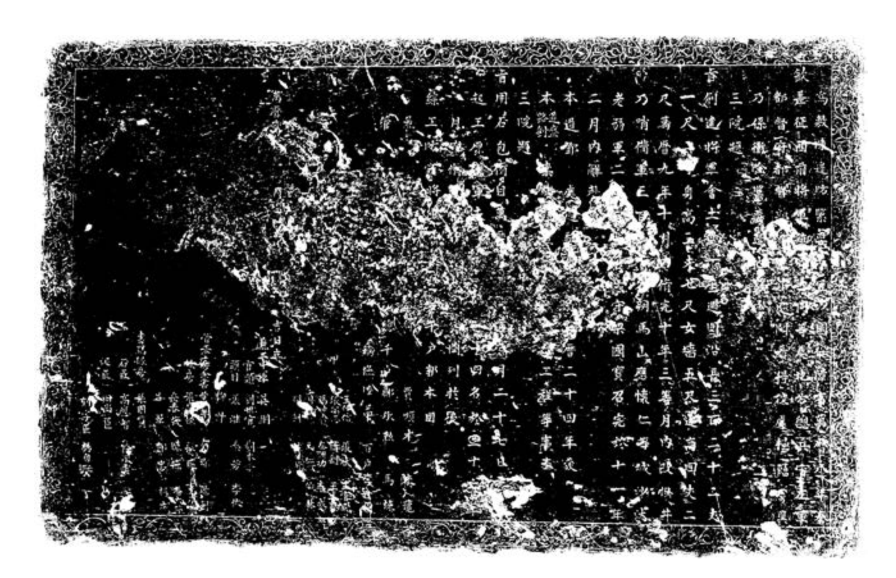



图一　大河堡村（大水口堡）“金汤永固”“屹然保障”门匾拓片

及瓮城东门上。从门额所题内容特征上考察，当属明长城沿线城堡风格，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大河堡即明代之大水口堡。

对于万历朝创建的城堡，石碑的发现也能起到校对文献的作用，如将军会堡。

将军会堡在文献中的记载为万历九年修建土城，万历二十四年在原基础上包石，城堡周围 1 里 5 分（1 里 184 步），城高 3 丈 7 尺（4 丈 4 尺）。现存城堡墙壁上的《创建将军会土堡记》（图二）则详细记载了城堡的修建情况：



图二　将军会堡“创建将军会土堡记”石碑拓片

“為敷陳邊防緊要，□宜以圖保障事，萬曆八年奉」欽差征西前將軍鎮守大同等處地方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郭琥□□閱看，得彼處極臨虜巢，」乃係衝險緊要邊也。會」三院題」旨，創建將軍會土堡一座，邊周沿長三百二十二丈」一尺二寸，身高三丈七尺，女牆五尺，通高四丈二」尺。萬曆九年十月內修完。十年三等月內，改撥井」乃哨備軍三百二十名，朔、馬、山、應、懷仁等城，沙汰」老弱軍二□□名，防守梁國寶，召完於十一年」二月內解赴」本道鄧處□驗。□□□萬曆二十四年，蒙」奉本道盛、本路劉案

驗，□□□□□□□工程等事，奉」三院題」旨，用石包修，自万曆□□□□八月二十七日」起工，原□軍士□□□□□十四名，於二十六年」□月內修完，□□□□□□開列於後。」……（略）”[①]

从碑文来看，将军会土堡的创建工程于万历九年十月修完，这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但是包砌砖石的时间起工于万历二十四年，竣工于万历二十六年，文献仅选取了起工时间作为甃石的标志，这一记载虽然无误，但容易使人难以理解西城门瓮城南门门匾“安攘门”[②]的落款时间——万历二十五年的来龙去脉。显然，该石碑的发现更加丰富了创建将军会堡的背景、建造过程和建造者。

## 二、展修城堡

“隆庆议和”后，明朝“边境晏然，居民安枕”。和平时期的到来，使得原本“无岁不为战场”的大同镇出现了“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③]的场景。

大同镇的城堡集中修建于洪武、永乐朝和嘉靖朝，随着边关贸易的繁荣和人口数量的激增。早年修筑的部分城堡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因此迫切需要扩大城堡建筑规模——展筑，以容纳激增的人口和繁荣的马市贸易的需求。依据调查，现存“展筑”痕迹的城堡有得胜堡、助马堡、破胡堡、杀胡堡。

### （一）得胜堡

得胜堡肇建于嘉靖二十七年，属北东路管辖。该路参将“添设于嘉靖十八年，初驻宏赐堡”。后因得胜堡“逼临虏穴”“贡市往来接踵塞上”于是在嘉靖二十三年，移驻得胜堡。依据《三云筹俎考》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得胜堡于万历二年砖包，城池“周三里四分（合今1958.4米），高三丈八尺”。依据田野调查，现存得胜堡平面呈长方形，周长已达到1978米（含瓮城城墙长度），与文献记载的“三里四分”即1958.4米十分接近。若仅从文献上考察，得胜堡为一次修建而成。

得胜堡地处得胜口马市附近，明蒙战争时期，是“丑虏必攻之地”，“俺答封贡”后，又承担着护卫得胜口马市市场的重要职能，随着市场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旧堡已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在万历三十二年，展筑修建“关城”。展筑之事在经典文献中失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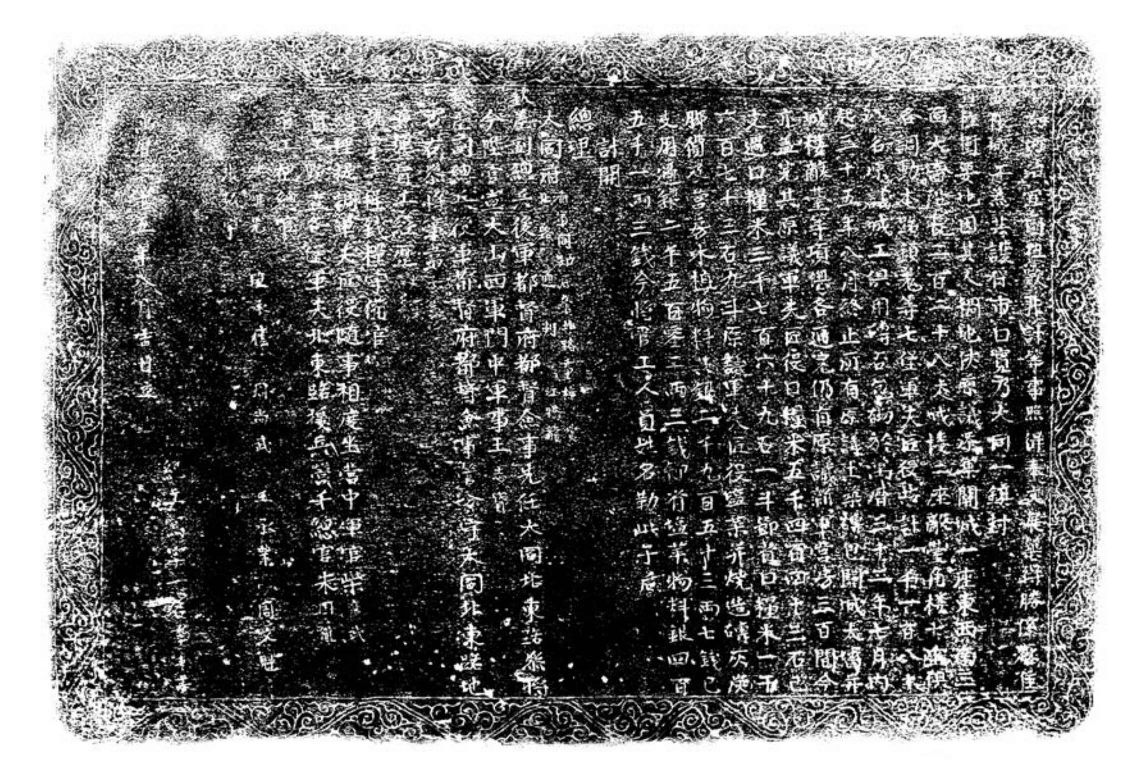
---

① 周亮：《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8年，56页。

② 周亮：《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8年，55页。

③《御选明臣奏议》卷29《方逢时·论俺答贡市疏》，（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

只是将最终结果——城堡总周长记录在案。但展筑之后，时人将此役刊刻于石碑上，镶嵌在得胜堡南门门洞内东壁上（图三）。录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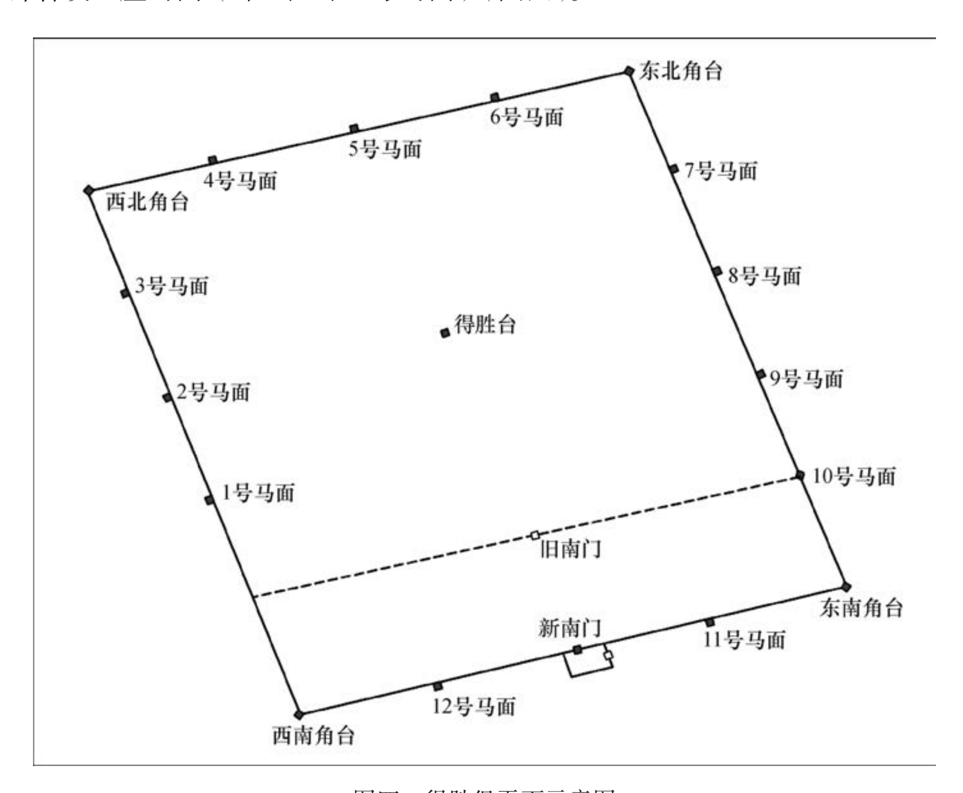
图三　万历三十五年展筑得胜堡城工题名碑拓片

> “□□□宜□□□□计等事，照得奉文，展筑得胜□。□准」□□城工，为其护保市口，实乃大同一镇封」□，极衝要地。因其□稠地狭，原议添筑关城一座。东、西、南三」面大墙沿长二百二十八丈。城楼二座。敌台、角楼十座。俱」各调动本路镇羌等七堡军夫匠役，共计一千一百八十」八名。原议城工俱用砖石包砌，于万历三十二年七月内」起，三十五年八月终止。所有原议土筑、砖包关城、大墙并」城楼、敌台等项，俱各通完，仍有原议新军营房三百间，今」亦盖完，其原议军夫匠役口粮米五千四百四十三石，已」支过口粮米三千七百六十九石一斗，节省口粮米一千」六百七十三石九斗。原议军夫匠役盐菜并烧造砖灰炭」脚□及营房木植物料共银二千九百五十三两七钱，已」支用过银二千五百零二两三钱节省盐菜物料银四百」五十一两三钱。今将管工人员姓名勒□于后。」”（略）

从现存遗迹考察，得胜堡两次修筑的痕迹十分明显。首先，东墙南端的马面与城墙墙体的关系“与众不同”。通常而言，马面与城墙墙体的夹角多呈直角垂直关系。但这座马面却斜出城墙，与东北、西北、东南角台类似。其次，城内现存的明代楼阁基座

（今名：得胜台）所处位置偏北而非居中，但若以东墙南段的马面以西的延长线作为南端基准，则正好位居城堡中央。因此，我们认为，嘉靖二十七年土筑，万历二年包砖的得胜堡，位于今堡城中北部地区，即东墙南端的马面实为该期城堡的东南角台。该马面以南区域为万历三十二年添筑的“关城”——在原基础上向南展筑东、西堡墙，创筑新南墙，共二百二十八丈（合今 729.6 米）。现存这部分墙体长度约 720 米（含瓮城城墙长度）两者十分接近。

碑文中，展筑城墙的同时，还修建城楼两座，敌台、角楼十座并全部包砌砖石。结合现今得胜堡遗存的城门、角台、马面（敌台）综合判断，万历三十二年修建的 2 座城楼应为现存“保障”门额的南城门及瓮城东门——其北侧的旧南门已无存。10 座敌台、角楼则明显不局限于增筑的 228 丈墙体上的设施，而是涵盖了整座城堡。包括新南墙上的 11、12 号马面，东南、西南角台；东墙 1、3 号马面，西墙上的 7、9 号马面，北墙上的 4、6 号马面。由此，我们也可以复原万历三十二年展筑之前的得胜堡的建置：城堡平面近正方形，边长约 400 米，开设南门，四角各置斜出式角台，东、西、北三面堡墙中部各设 1 座马面（即 2、5、8 号马面）（图四）。




图四　得胜堡平面示意图

最后，新盖的 300 间营房，现已无遗迹可寻。本次展筑所需劳动力来源于“本路镇羌等七堡军夫匠役”即得胜堡下属的镇羌、弘赐、镇川、镇边、镇河、镇虏堡、拒墙共 7 座城堡的士兵，总计 1188 名，工期起工于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竣工于三十五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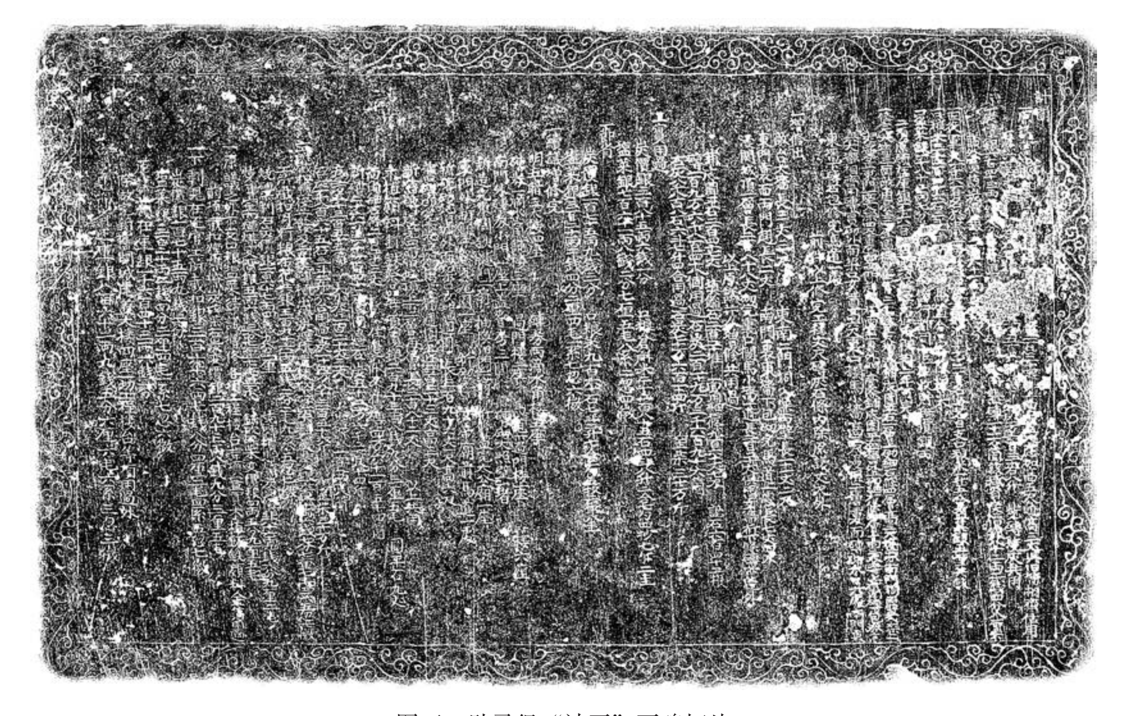
历时 3 年零 1 个月，工程量之大，可见一斑。

## （二）助　马　堡

助马堡设自嘉靖二十四年，属北西路管辖。嘉靖二十六年，该路参将驻扎地由原先的应州城移驻助马堡。开启了助马堡作为北西路的路城——核心城堡的时代。依据《三云筹俎考》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助马堡城于万历元年砖包，城池“周二里四分（合今 1382.4 米），高三丈八尺”。依据田野调查，现存助马堡平面呈刀形，分为东、西两城，总周长已达到 1607 米（不含瓮城城墙长度），规模远大于文献记载，说明后期曾有展筑活动，且文献失载。

现镶嵌于助马堡东城南门门洞内东侧墙壁上的《计开》刻石，记述了万历三十八年的展筑城堡的造价、内容、材料、建筑形制等情况（图五）。

> 一、原议……一百三十尺□，高□□□。应加高五尺，通高三丈六。旧墙□□估用」石条六……五百六……，灰一万六百三十石八升。烧砖□灰共用」
>
> 一、炭价银六百四十三两七钱……。砖一十一万个。该减省□价银八十二两二钱四分八厘□。」议外买该炭价银五百六十一两五钱四分。」
>
> 一、匠役、军夫一千六百名。于……派军……。支口粮米一升五□……银五厘共该。」



图五　助马堡“计开”石碑拓片

一、口粮米三千二百四十六石二□……粮米。」

一、盐菜银一千八十二两七分……行都司官库收贮班价银两。」二项原领在库银一千六百……二年可完。」

一、修完大墙三面，敌、角台三座，周围……，底围立石一层，上砌细石条四层，高三丈□券南门□□□□□」夹□券正东门一座，入深四尺，里□……外门壕□铺底围□□层，上砌细石条□层。……砖包券□」□大墙相齐，用砖实砌，外面垛口女墙高六尺，里口拦马小墙高三尺，漫顶二层，里面砖砌水口六处。南门里」东墙下砖石包修完马道一处。」前件以上修完工程丈尺、砖、灰、石条内，除原议丈尺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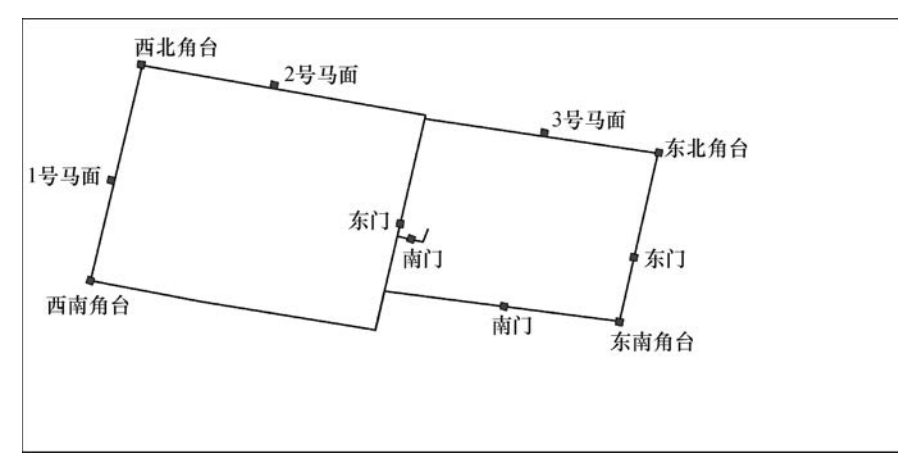
一、增修出」敌台大墙，长三丈三尺，东南二门洞□□西壁长一十一丈二尺。」东门里面两门翅长二丈。南门里东墙下包砌完马道一处，长七丈四尺。」漫关城顶一层，长二百八十八丈。砌完里口拦马小墙一道，长二百二十丈。俱用旧女墙拆下条砖□造外。」以上原议并人增修共用过」铺底围平石二百四十七丈。填馅石二百二十堆。面用细石条九百六十丈七尺。□石六百四十二根。」砖一百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八个。用过石炭二百一十九万三千六百九十六个。」石灰八千八百八石六斗七升四合。用过石炭七十万六百一十四斤。窑柴三十万斤。」

二、实用过」炭价银三百八十五两六钱一分。口粮仓斛米二千六百八十五石四四斗八升二合七勺四抄七□二圭。」盐菜银七百六十一两八钱二分七厘五毛八系二忽四微。」

一、节省」炭价银一百七十五两九钱三分。口粮米九百六十石七斗二升七合二勺五抄二撮八圭。」盐菜银三百二十两二钱四分二厘四毛一系七忽六微。」

一、续议增修完」明五暗三大楼四座。砖券两滴水角楼五座。砖券一滴水角铺楼三座。过门楼二座。马道下过门楼一座。楼六座。南门外砖券小门一座，上盖□房三间。砖砌大照壁一堵。新造完东关铁裹门二扇，抽换旧门二扇，拆修盖完太公庙一座。东门外新创土筑完瓮圈一座。拆砌完玄帝庙前马道一处。

依据碑文的记载可知，万历三十八年，助马堡得到了修缮和展修。修缮部分是将旧堡的总高度加高到三丈六尺。展修则是本次工程的重点内容。从碑文的描述，结合现存遗迹考察，即为助马堡东城。东城建筑规制全部为砖石砌筑。“大墙三面”即在助马堡旧堡即西城的基础上向东扩展，修建东城，即东城的东、南、北三面城墙。敌、角台三座即东城北墙马面，东北、东南、西南角台。此外还有东城的东门和南门，其中东门外建有瓮城。城墙顶部外侧修建六尺高的女墙，内侧修建三尺高的拦马小墙，这个拦马小墙在《营造法式》中称“护险墙”，今人称“宇墙”。南门内侧修建马道。此外，还增修城门楼、角楼、铺房、过门楼、照壁等附属建筑（图六）。




图六　助马堡平面示意图

门洞内西墙壁上的《计开在工经管官员旗牌管队在后军士开列于后》刻石，详细记述了这次展筑工程的人员分工和用工情况。助马堡作为参将一级的城堡，其展筑工程施工工人来自参将府、援兵营、助马堡老家营、拒门堡、破虏堡、保安堡、灭虏堡、威虏堡、宁虏堡、云西堡、云冈堡的士兵共 1804 人，以及泥匠、石匠、木匠等“各色匠役”80 余人，总人数与得胜堡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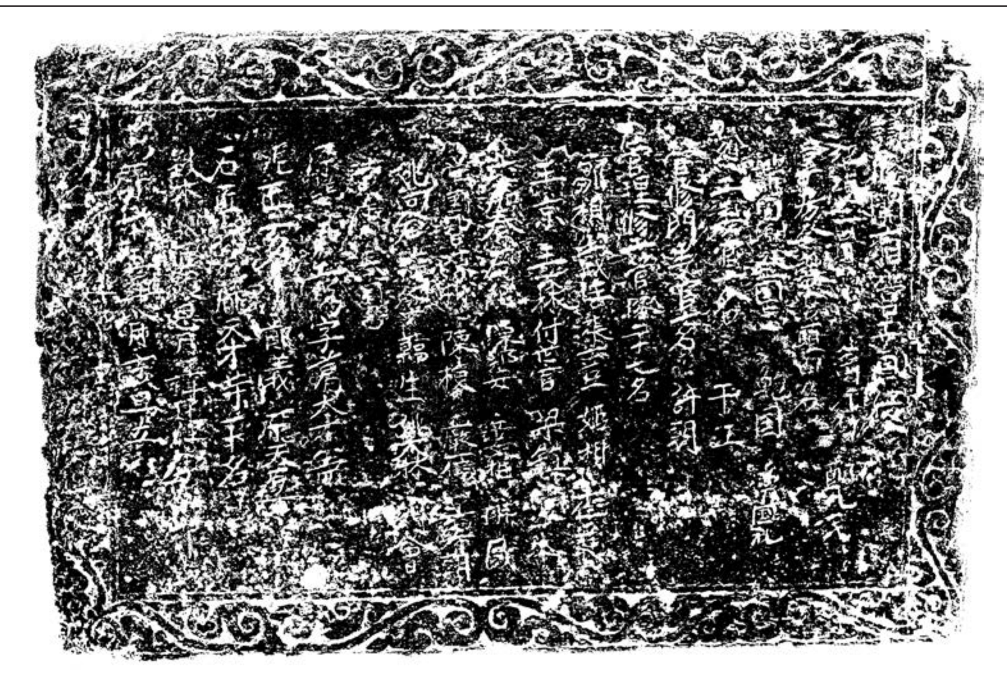
## （三）破　胡　堡

破胡堡始建于嘉靖二十三年，属中路管辖，由于该堡“逼临虏巢”嘉靖年间“零骑窃犯无虚日”，于是万历二年砖包，城池“周二里零八步（合今 1164.8 米），高三丈八尺”。

依据田野调查，现存破胡堡周长约 1167 米，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展筑一事，而是直接记述展筑后的城堡总周长。现镶嵌在南城南门门洞内东墙壁上的万历二十五年《议修关厢管工□役碑》（图七）记述了这次展筑的情况。录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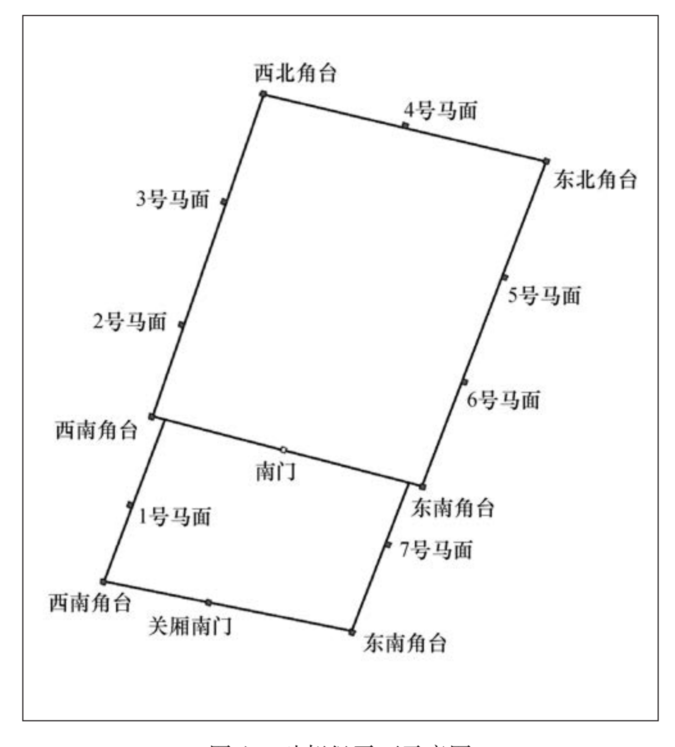
> 议修关厢管工□□」把总二员……」掌房……头四名」……鲍国 梁国礼」总工委官一名 于江」管修门委官一名 许朝」管理修工管队二十七名」邹……」王京 王□林 付世官 梁镇 □□」□□春……」……」姚可仓……」……」……工写字 葛大……」泥匠二名……」石匠……」铁木匠……」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吉旦立」

石碑仅记载了参与展筑工程的人员清单，并没有记述展筑内容及工程丈尺。通过现存遗迹的调查，大致可复原出这次展筑的详情。嘉靖二十三年土筑、万历二年包砖的破虎堡平面呈矩形，开设南门（南门外瓮城情况未知），周长约 905 米（不含瓮城城墙）。



图七　破胡堡万历二十五年“议修关厢管工□役碑”拓片

万历二十五年，城堡在原基础上向南展筑，修建关厢，包括东、南、西三面城墙墙体，东南、西南角台以及南门（图八）。




图八　破胡堡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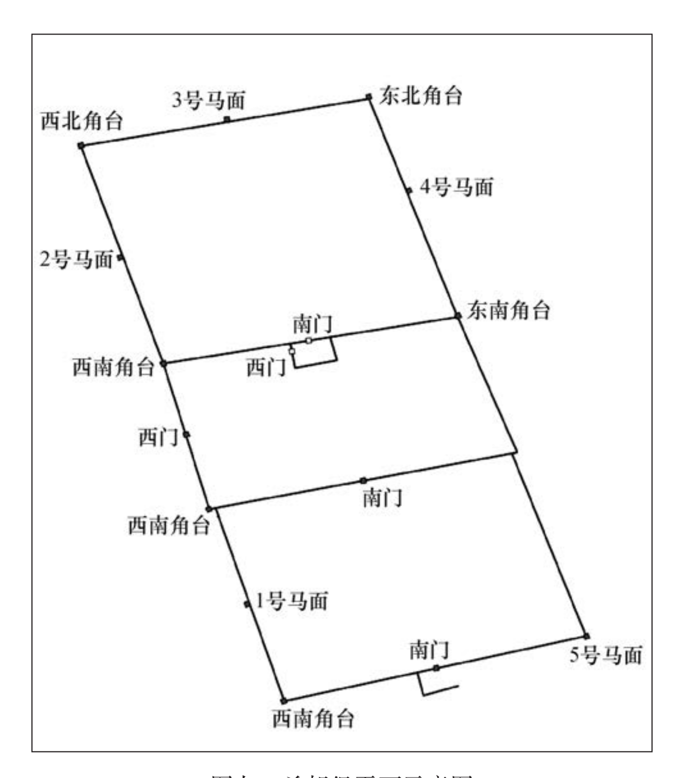
## （四）杀　胡　堡

杀胡堡肇建于嘉靖二十三年，属中路管辖。虽为军阶较低的守备管辖，但杀胡堡管辖马市一处，且“相距虏巢最近，兔毛河直通塞外，川流平衍，虏易长驱”，防御压力极大。“隆庆议和”后，还是由于其“地当孔道，虏使往来境上必假道于此，且市场应酬繁剧，抚防两艰难”。故于万历二年包砖。城池“周二里（合今 1152 米），高三丈八尺”。

随着“隆庆议和”后边地市场贸易的繁荣。原来的旧堡难以满足市场交易的需要，因此对其进行展筑。万历四十三年“于近关处另筑新堡一座，名平集堡”。城堡“周二里，高下与旧堡等，中建客店，内外交易”。同时“复于两堡中间东西筑墙，连环为一，前后左右安门，东西南北四通，周围五百四十丈，共计三里，唇齿相依，犄角互援”。

现存杀胡堡平面呈目字形，由北（旧堡）、中（中关）、南（平集堡）三部分组成。平面布局和结构表明，北堡为嘉靖二十三年创修时土筑，同时也是万历二年包砖的对象。现存总周长约 1254 米，与文献记载的“周二里”相近。

南堡南门尚存门额，正题“平集堡”，左侧落款“万历岁次戊午孟秋吉……”说明万历四十三年另筑的新堡于万历四十六年竣工。随着两堡间连接墙的修建。最终成就今日城堡的格局。由于尚未发现当年展筑的城工碑，展筑的工程详情亦无从考证（图九）。




图九　杀胡堡平面示意图

# 三、维修城堡

城堡作为明代边防军事防御建筑，时常受到自然和战争人为破坏双重因素的损毁。因此，时人常兴工役维护、修缮，其中包括在原有土墙的基础上包砌砖石，以及对坍塌、破损处加以修缮等内容。

## （一）修缮详情

在明代传世文献中，记载边镇建设详情的记录多出现于边防大臣的奏疏之中。奏疏原文多出现在作者的个人文集里。由于这些文集传世甚稀，或散失仅存书目，或成为珍本、善本文献，深藏于各图书馆之中而不易阅读。虽然有的奏疏部分内容被摘录进《明实录》或《明经世文编》等奏议合集而存于世，但仅摘其要，而未收录全文，造成原始内容严重缩减，无法窥其全貌。最为普遍的情况便是一语带过。施工刻石的发现，能够很好地还原当时施工建设的详情。

### 1. 王家庄堡

王家庄堡土筑于嘉靖十九年，归不属路管辖。后期包砖情况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仅云“业经题准砖包，目今鸠工办料，刻期督修”未明确时间，说明包砖时间与该书截稿刊刻时间大致相当。《三云筹俎考》中记述为万历三十年砖包，且未详述修缮内容。现存王庄堡南城门门洞西壁内的《碑记》不仅提供了详细的砖包情况，同时也记载了其他修缮内容，录文如下。

计□築包本堡工程丈尺數目。於萬曆三十一年起，三十二年六月完，包修過周圍大牆、敵臺、瓮圈外面共長六百一十七丈，大墻身高三丈，女墻六尺，通高三丈六尺；瓮圈身高二丈五尺，女墻六尺，通高三丈一尺，俱用石條五層。周圍城□俱墁磚二層，裏□水道一十九處，券完城門四座，鐵裹門八扇，又磚包完南北二門裏面兩翅，大墻馬道二處。券完出入水道二處，興水利、惠民生。創建軍儲庫廒一座，下開大風道五孔，上蓋氣樓二座，糧廳一間，曬米臺一處，門樓一間，教場一所。旗臺、旗杆、彩布旗、麻繩旗、斗葫蘆各一件。沿城旗面、旗杆、繩斗各一十二件，重修完察院一所。周圍舊土墻共長七百二十六丈，照原議從頂上截去丈餘作爲壕墻，仍建蓋大樓、中角、懸樓，共一十二座，馬道門樓門房各兩間，各樓鐵鎖并鑰匙牌一十二副。其城樓木植聖像金青等項，并□動費官錢，皆系區處俱各□全。以上備載，□爲記焉。

从碑文可知，本次除修缮王家庄堡堡墙、敌台、堡门、瓮城、水门、水道、马道等城防设施外，还修建了城内的粮仓、教场等附属建筑。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缮将王庄堡外周围原有的七百二十六丈旧土墙的高度减去一丈左右，改建为壕墙。“壕墙”一词，见于嘉靖时期尹畊所著《乡约》一书：

> 壕墙者，为墙于壕之内，堡之外也。临壕为墙，则壕愈深；夹堡为道，则堡愈险。……制墙高六尺，基二尺余，收顶尺余。外逼壕堑，内为夹道。有善射者，则墙稍高，开口如垣陴，或为旁牌数十面，与之对射。无善射者，则不必露形，人伏墙内，器置墙下，陴上以旗为诏，敌南则南，北则北，东则东，西则西所伏人视旗应之，外击渡壕，内仆竿辕，可也。近有议于壕外为墙者，一则虏隐之以避矢石，二则虏堕之即可填壕，不足用也①。

**2. 西安堡**

西安堡设置于嘉靖四十年，初为土堡，属井坪路管辖。万历二年砖包女墙，二十八年砖墁堡顶。在万历三十一年刊刻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提到“近题请砖包”但未叙述详情，因此推测“题请包砖”应在万历三十一年，由于该书定稿之时尚未实施，因此书中失载。

现存西安堡开设南北城门，旧时南门门额“金汤”，北门门额“锁钥”。如今两块门匾均已脱落，镶嵌于堡内关帝庙的乐楼墙壁上。两块门匾的落款均为万历三十二年，由此可知，城门的修缮应与城墙砖包同期，并于万历三十二年竣工。

## （二）包砖时间辨析

大同镇城堡的包砖甃石工程是隆万时期边镇建设的主流，据统计，大同镇 72 座城堡中，包砖于万历朝的占 38 座，比重高达 52.78%。城堡甃砖工程与土筑创建时类似，需要一定的时间，即起工、止工两个时间点，如同人的虚岁和周岁类似，选取哪一个时间点作为城堡创建（包砖）的节点，明人并没有明确的统一要求。在经典文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考》中，对于包砖时间的记载基本一致。今人亦无法得知该时间点是城堡的起工时间还是竣工时间。城堡碑石、门匾的发现，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了解了当时包砖工程的时间。

**1. 许家庄堡**

许家庄堡为不属路管辖，原为民堡，嘉靖三十九年改为军堡。城堡包砖的时间《宣

① 尹畊：《乡约及其他一种》，《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 年，10 页。

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述为万历二十九年。现镶嵌于城堡南墙马面上的石碑《许堡堡墙石碣》罗列了这次包砖工程中各施工负责人的名单。可知本次工程由大同县主簿曹尔恭主持，落款时间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

这次包砖工程不限于堡墙，堡门亦包含其中。许家庄堡南门瓮城东西城门原镶嵌有门匾“迎恩”和“息警”，前款均为“欽限磚包”落款为“大明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九月吉日重修”，可知许家庄堡的包砖工程起工于万历二十八年，城门部分于本年竣工，城墙部分于二十九年完工。

**2. 保安堡**

保安堡归属北西路，创建时间，《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述为嘉靖二十四年，而《三云筹俎考》则记为嘉靖二十五年，两者之别，当为选取创建的时间点不同，即起工和竣工时间点。初建时为土筑，砖包于万历元年。

该堡南门门洞内墙壁上原镶嵌一通隆庆六年（1572 年）《砖包保安堡准奏碣记》石碑，现存本堡南寺院内。录文如下：

> 大同北西路操守保安堡地方指揮僉事王安為酌時宜，陳邊務，以禪安攘，以修實政事，蒙欽差分守大同北西路地方左參將都指揮僉事尚、欽差協同鎮守大同等處地方左副總兵官都指揮使麻、欽差徵西前將軍鎮守大同等處地方總兵官左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欽差整飭大同左衛等處兵備兼管屯田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崔、欽差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劉、欽差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王金強，題准奏：欽依磚包本堡重建……

由此得知，保安堡砖包工程于隆庆六年起工，万历元年竣工。

**3. 迎恩堡**

迎恩堡属西路，城堡土筑自嘉靖二十三年，万历元年包以砖石。现存于堡内，原城堡东门“迎恩堡”门匾[①]中左右两旁竖刻楷体 15 行 306 字，记述主持本次甃砖工程官员和工匠名单，包括宣大总督、大同巡抚、总兵、副总兵、冀北道兵备和大同南路通判、朔州知州等官阶较高的官员，迎恩堡守备、把总等基层武官，以及管工、工匠姓名（图一〇）。该门额的落款时间为“隆慶陸年歲次仲夏”（1572 年），由此可知，迎恩堡砖包工程于隆庆六年起工，万历元年竣工。

---

① 周亮：《三晋石刻大全 · 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8 年，44 页。




图一〇　迎恩堡“迎恩堡”门额拓片

**4. 灭胡堡**

灭胡堡属井坪路所辖，城堡设于嘉靖二十三年，万历元年包砖。城堡内现存两通门匾，其中“灭胡”门匾[①]为外城南门门额，落款时间为“明隆庆元年六月吉旦”。“款塞”匾额[②]为灭胡堡内城（北城）南门门额。石匾正中横刻楷体“款塞”两字，左右两边竖刻楷体10行，约120字，刻当时戍边将官名讳。落款为“隆慶陸年歲次壬申月吉日”（图一一）




图一一　灭胡堡“款塞”门额拓片

综合上述两通门匾可知，灭胡堡砖包工程于隆庆六年起工，万历元年竣工。

**5. 乃河堡**

乃河堡属井坪路，于嘉靖四十五年土筑，万历元年包砖。现存于堡内，原镶嵌于堡门上的“乃河堡”石匾[③]上记述了包砖工程中各级将官的名讳，其落款时间为“隆慶陸年肆月”，由此可知，乃河堡砖包工程于隆庆六年起工，万历元年竣工。

## （三）失载的修缮

前文“展修”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云筹俎考》虽然记载了某一时间节点时城堡的最终建置，但也是依据第一手的工程基础资料整理、摘要汇总而成。“展修”这种重大而少的工程尚且不记，日常维护性修缮的记载更为空白。但是，部分碑石的发现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岁修”的史实。

① 周亮：《三晋石刻大全 · 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8年，38页。

② 周亮：《三晋石刻大全 · 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8年，46页。

③ 周亮：《三晋石刻大全 · 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8年，36页。

**1. 云冈堡**

云冈堡属北西路管辖，分为新、旧两堡。旧堡土筑于嘉靖三十七年。因选址“地形卑下，北面受敌”于是在“本堡北崖创筑一堡”。新堡堡墙仍“土筑，女墙砖砌，通高三丈五尺，周围一里四分”。新堡创建后，旧堡仍在使用“以便行旅”。但是文献中并未提新堡的修缮情况，现存云冈石窟的《重修云冈堡记》则记述了新堡土筑不久后的一次修缮情况。

古者，石佛寺通西四衛道也。於嘉靖□□七年，内爲右衛餉道，改□雲岡堡，□□□一員，把總二員，坐堡一員；召募官□□□名。所以保障地方、轉送粮餉甚便。是我□巡撫楊爺、鎮守張爺垂恩，而民沾其澤也。累年風雨推壞，操守吴公彈厥心思，隨其規模，委把總陳公，用本堡軍士河南運土，修造堡門一□、□樓座；築堡東面敵臺三座，上蓋城樓□間；修公館二所；修塌堡墻一面，周圍欄□墻，挑洗壕塹；修蓋披塌營房百間；改□□裝，什物鮮明；要路挑窔，賺窑三百餘箇；□飭火路烽堠、墩臺十座。公早興晚休，□□不問鉅費，區處捐財，不時犒賞，始終勤□，一一修飭。其忠於爲國者哉。迺我吉宣，具重修始末，事工雖未□，前請爲紀工記録。其大者，操守、指揮吴公昆，把總陳公嘉謨、袁公鎮，興斯舉者，悉□之。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吉日。

**2. 高山城**

高山城属左卫道分辖不属路。城于天顺六年置，即旧高山城；嘉靖十四年改建今城，即新高山城，万历十年砖包。现存新高山城东门瓮城南门门匾“靖宁门”的落款时间为万历五年（图一二），说明砖包之前的万历五年曾修缮该瓮城城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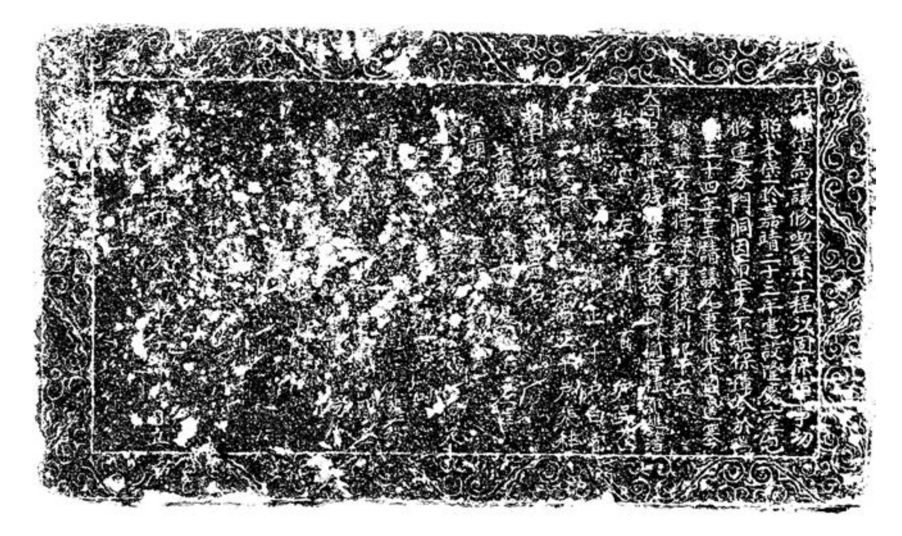



图一二　高山城“靖宁门”门额拓片

**3. 残胡堡**

残胡堡属中路管辖，城堡设于嘉靖二十三年，石包于隆庆六年。城堡开设南门，万历三十四年因持续降雨导致城门坍塌，随即修缮，并于万历三十五年竣工。此事不见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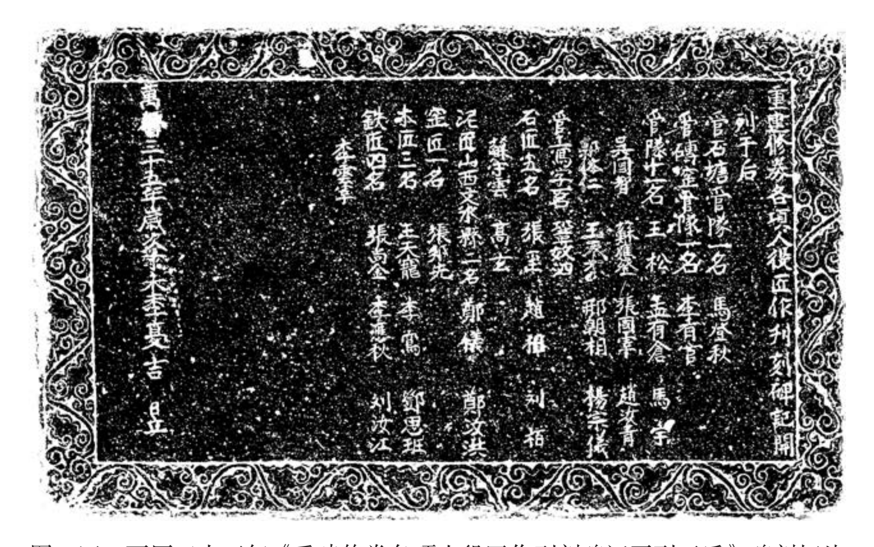
文献记载，南城门门洞两壁镶嵌的两方碑石（现存右玉县博物馆）中《重修残虎堡堡门城工题名碑》（图一三）详细记录了重修情况，录文如下：



图一三　万历三十四年《重修残虎堡堡门城工题名碑》拓片

残[胡]堡为议修契紧工程，以固保障事。切」照本堡于嘉靖二十三年建设，隆庆六年包」修，建券门洞。因雨年久，不堪保障，今于万」[历]三十四年呈请议□重修，永图边塞，」锁钥一方。因将□工实役刻纪于左」（略）

另外一方为《重建修券各项人役匠作刊刻碑记开列于后》（图一四）则详细记载了重修工程中各个工匠的数量和姓名，其落款时间为万历三十五年，说明本次南门修缮工程历时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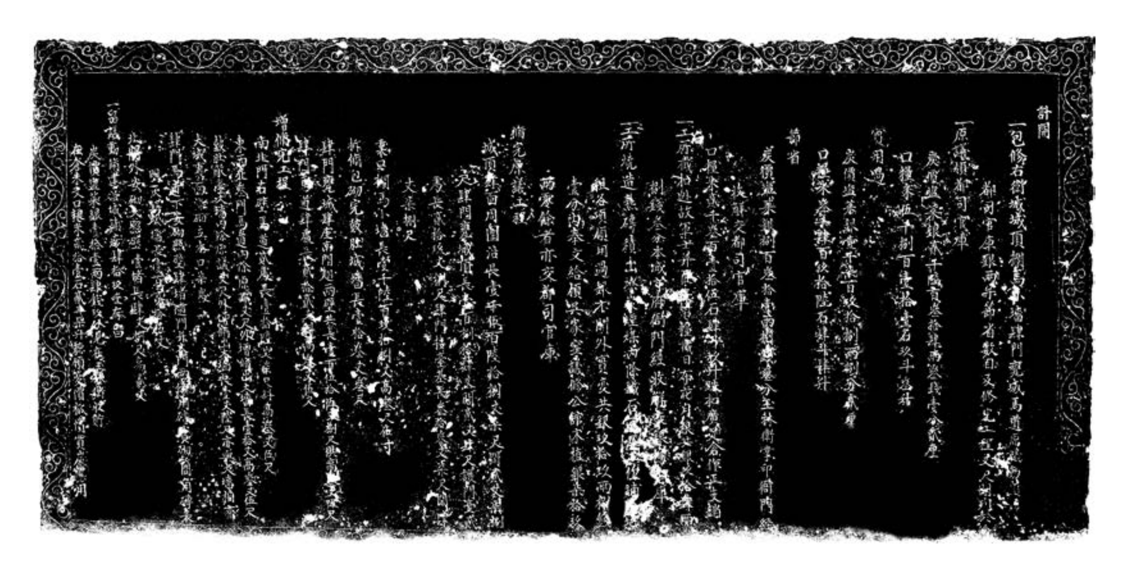


图一四　万历三十五年《重建修券各项人役匠作刊刻碑记开列于后》碑刻拓片

需要注意的是，两方碑石上的“胡”和“历”字均遭人为凿毁。其中“胡”字的凿毁时间应不早于顺治元年（1644 年）[①]，即清廷宣布避“胡”“虏”“夷”等字之时所为。“历”字则应属避乾隆皇帝之讳。

**4. 右卫城**

右卫城于永乐七年始设，属中路管辖，中路参将原设在左卫城，嘉靖三十三年移右卫驻扎，由此，右卫城一跃上升至本路的指挥中枢，至万历三年砖包。此后，万历四十四年再次修缮，本次修缮在文献中失载。现镶嵌于右卫城南门门洞内墙壁上的《计开》（图一五）石碑详细记录了此次修缮内容、造价以及所用材料等情况。



图一五　万历四十四年修右卫城《计开》碑拓片

計開」

一、包修右衛城城頂攔馬小牆、肆門甕城、馬道。原議動領」都司官庫銀兩，並節省數目及修完工程丈尺開列於後。」

一、原議領都司官庫」炭價、鹽菜銀貳千陸百叁拾肆兩叁錢壹分貳厘。」口糧米伍千捌百壹拾壹石九斗叁升。」實用過：」炭價、鹽菜銀壹千柒百玖拾捌兩捌分貳厘。」口糧米叁千肆佰玖拾陆石四斗四升。」節省：」炭價鹽菜銀捌百叁拾壹兩捌錢叁分。玉林衛掌印衙門經」收解交都司官庫。」口糧米貳千叁百壹拾伍石肆斗玖升，跌扣廣足倉作正支銷。」

一、工所截扣外故軍士並匠役幫糧截日布花月糧共銀玖拾肆兩」捌錢叁分。本城守府衙門經收解交銀□官庫。」

① 《清实录》第八册《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条”，中华书局，696 页。

一、工所燒造熟磚積出燎炭煙煤，內除鐵石匠及工位補給地」租各項領用過銀不開外。實變共銀玖拾玖兩捌錢」一分。內奉文給領吳家窯議修公館、木植銀柒拾玖」兩零。餘者亦交都司官庫。」

修完原議工程。」

城頂肆面周圍沿長壹千伍百陸拾捌丈柒尺，闊貳丈柒捌」尺。肆門甕城頂長壹百捌拾肆四丈，闊貳丈肆尺。護門台貳」處，長貳拾玖丈捌尺。四門樓臺基長叁拾叁丈柒尺，闊肆」丈七八尺。」裏口攔馬小牆長壹千陸百玖拾捌丈，高叁尺伍寸。」拆修包砌完鼓肚城牆長壹拾叁丈叁尺。」肆門甕城肆座。南門翅兩壁共長壹百伍拾伍丈捌尺，俱高三丈五尺。」肆門馬道肆處。長貳拾貳丈，斜高叁丈伍尺。」

增修完工程。」

南、北門右壁馬道貳處，長壹拾陸丈柒尺，斜高三丈五尺。」東、西、北三門馬道內，除原議丈尺外，增修出大牆，長壹拾丈，高三丈五尺。」鼓肚敵臺大牆內，除原議丈尺外，增修出大牆，長壹丈陸尺，亦與大牆相齊。」大城裏面添砌立水口柒處。」四門馬道下安砌照壁肆堵。隨門並大門兩傍，用磚實砌簡角磚表」□灰蜈蚣牆，長壹百貳拾伍丈。」北門外安砌大照壁壹堵，長肆丈捌尺，高貳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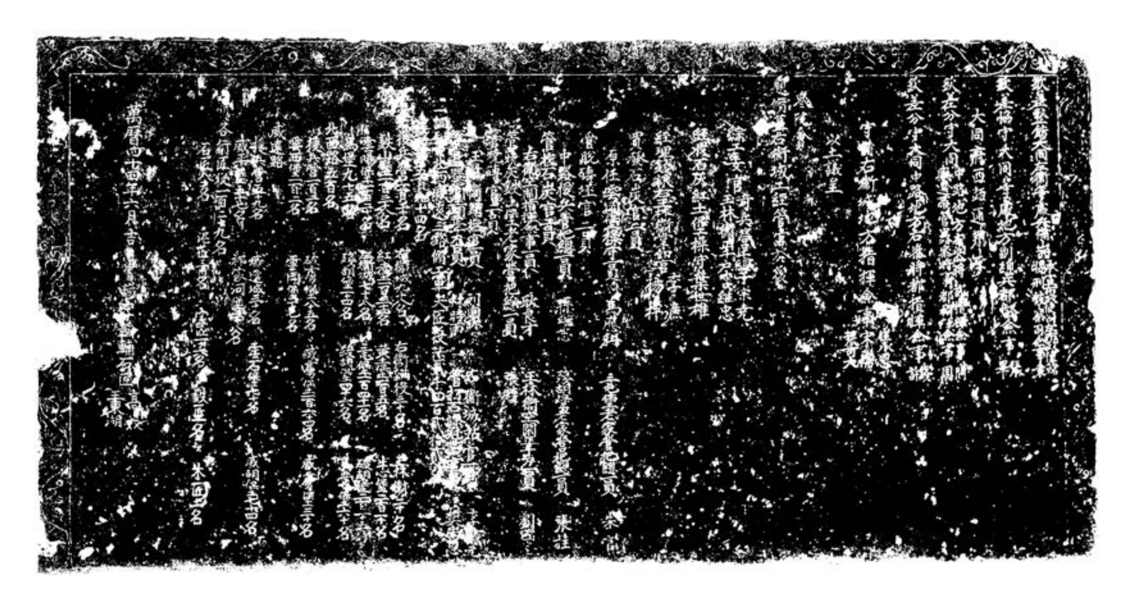
一、留議動修建沿城鋪房肆拾玖座。存留」炭價、鹽菜銀壹拾壹兩肆錢玖分。見在玉林衛收貯。」在倉未交口糧米貳拾壹石貳斗柒升，聽领变价抵賞買炭應用。」

通过碑文可知，本次右卫城的修缮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内容。计划内的修缮包括城墙顶部的地面——海墁、内侧的拦马小墙，四座城门的门楼、瓮城、护门台、登城马道，以及存在“空鼓”病害的城墙等。“计划外”包括南、北城门右侧的登城马道，东西北三门马道内的大墙。鼓肚敌台的大墙，城墙内侧的水口，四门马道下的照壁，北门外的照壁，以及城墙顶部的铺房等。

上述修缮内容除城门一侧的马道外，仅存护门台遗迹。碑文中记述的 2 座护门台位于右卫城南、北瓮城城门外东侧。现仅存夯土结构墙体，外包砖石无存。护门台的建筑形制与普通马面差异最大之处在于其外伸出城墙的距离较长。这种形制狭长的“马面”早在北宋便有记载，沈括在考察统万城后说：“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攻也。予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临之。”[1] 右卫城护门台的长度与所对应的瓮城墙体长度、高度相当，“护门”作用显著。

① 沈括著，侯真平校点：《梦溪笔谈》卷 11《官政一》，岳麓书社，2002 年，82 页。

另外一通石碑记述了本次修缮工程的各级官员名单、用工量及来源，录文如下（图一六）。



图一六　“万历四十四年修右卫城题名碑”拓片

欽差整飭大同左衛等處兵備山西承宣佈政使司左布政使韓，」提刑按察司僉事袁，」欽差協守大同等處地方副總兵都督僉事張、」畢，」大同府西路通判李，」欽差分守大同中路地方右參將 指揮僉事閻，」威遠帶管中路參將事都指揮僉事周，」欽差分守大同中路地方右參將都指揮僉事錢、」許」，守備右衛城地方指揮僉事崔承恩、」宋偉、」張可大。」以上議。呈」參院會」題，修葺右衛城工經管官於後。」

奇兵營千總于宗堯」，綜工委官玉林衛正千户李繼忠」，經收石灰紅土堡操守葉世雄、」李濂」，經理錢糧右玉林衛掌印官楊抍。」

買發石炭官二員。」原任雲岡堡操守一員：馬應科。三屯堡老家營把總一員：朱官」。

管脫磚坯官二員。」中路援兵營把總一員：孫繼志。殘胡堡老家營把總一員：張桂。」

管收石炭官二员。」右衛空閒指揮僉事一員：耿良才。玉林衛空閒正千户一員：劉國忠。」

管燒灰鐵山堡老家營把總一員：張麟。」

管燒磚官二員。」玉林衛鎮撫官一員：劉國环。右衛城站官一員：李應元。」

經官工器右衛工閑正千户一員：林时雨。管打石條冠世□官一員：樊崇恩。」

調到中、北西、威遠三路修工軍夫匠役共貳千四百貳拾貳名。」

中路軍五百九十四名。」援兵營一百三十名。右衛城九十八名。右衛輔役

三十名。玉林衛二十名。」鐵山堡一百三十八名。紅土堡一百三十四名。黄土堡一百五名。牛心堡二百一十名。」雲陽堡一百二十名。左衛城七十八名。三屯堡一百四十一名。破胡堡二百一十五名。」馬堡九十五名。殘胡堡一十四名。殺胡堡四十六名。馬營堡六十名。」

北西路五百名。」援兵營一百二名。破虜堡八十五名。滅虜堡一百六四名。威虜堡三十名。」雲西堡一百二名。雲岡堡一十七名。」

威遠路」援兵營五十九名。威遠城三十名。雲石堡七十名。滅胡堡七十四名。」威平堡五十七名。祁家河堡三十八名。」

各行匠役一百二十九名。」石匠八十名。泥匠三十名。窯匠一十六名。鐵匠一名。木匠二名。」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吉日書識，李翰輔。石匠：高效、王東湖」

与得胜堡、助马堡不同的是，除各级管理官员外，鉴于修缮工程浩大，仅右卫城所在的中路一路难以完成，因此又调集东侧相邻的北西路和西侧的威远路，三路修工军夫、各色匠役共 2420 名实施。

**5. 败虎堡**

败虎堡属西路，该堡创自嘉靖二十三年，隆庆六年甃以砖石。到万历三年再次修缮堡门，此事在文献中记载缺失。现存堡内，原堡门额中有载。该石匾[①]为青石质，宽 170、高 90、厚 12 厘米。碑周线刻缠枝花纹。碑面正中阴刻楷体“永宁”两字，左右两边阴刻楷体戍边将官名讳，共 8 行 120 余字。落款为万历乙亥年，即万历三年。

**6. 平虏城**

平虏城为西路路城，参将驻扎之地。该城土筑于成化时期，万历二年包砖。到万历三十一年，再次修缮。本次修缮过程，《平虏卫城修缮碑》中有详细记载。录文如下：

□□□□□縣章世元……」承修過大□□□□□□□金剛石墻連前後掛」面□□□□□長捌丈，大洞石墻高壹丈」□□□□□□捌尺，伍伏伍券，門洞壹」□□□□□□叁尺，前后掛面磚墻肆堵，」□□□□□前面磚墻貳堵，砌高陸拾」捌層，城垣磚墻貳堵，砌高伍拾伍層，中」間□□磚墻砌高貳拾貳層，寬壹丈貳」尺，口□城左右金剛石墻連前後掛面，」石墻每邊長伍丈壹尺伍寸，各砌高叁」尺，南城門两邊虎皮石墻貳堵，西邊壹」堵，長叁丈伍尺，高叁丈，東邊壹堵，長肆」丈，高貳丈。土胎拾捌段，城東南角起」□□南角

① 周亮：《三晋石刻大全 · 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8 年，48 页。

止，共長壹百陸拾丈。」□□□□□□魁星楼壹座。」萬曆叁拾壹年玖月初□日鐫立」[①]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考》记载虽然已十分详尽，但和工程原始资料相比，无论是修建时间、内容，还是建筑形制、尺寸、用工数、用料量、造价等方面均缺失，使我们难以真实还原当年的修造过程。城工碑、题名碑、匾额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同，补充了更为真实、详细的史料。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山西长城碑刻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BZS025）阶段性成果。

##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of Datong Town Fort after the "Longqing Peace Negotiation" ——Centered on Stone Carv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Shang Heng　Zhao Jie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one tablet as the basic material and basis, combined with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Datong Town Fort after the "Longqing peace negotiation".

**Keywords:** Stone Tablet; Datong Town; Great Wall; Fort

① 周亮：《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8 年，58 页。

# 明朝《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考释

顾春军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珠海，519090）

**摘要：**《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是2005年发现于张家口宣化区的一方墓志，墓志撰写者是明代南京礼部尚书倪谦，存世的《倪文僖公集》没有收录这方墓志，这方墓志可以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这方墓志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撰写方式突破常规，叙事生动有晚明小品文的气息；墓志内容也反映了明代宣府教育发展情况；这方墓志涉及的相关人物，基本就是军士及其家属，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宣府在明代的军事地位。

**关键词：**明朝　宣府　杜妙玉　墓志　考释

《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是2005年发现于张家口市宣化区的一方明代墓志，墓志长18、宽15厘米，志文楷书，凡16行，志文满行20个字，全文共452字，志文清晰，唯在结尾行有损泐，缺少刻石工匠的名字，现保存于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内，本墓志未经整理，也未有刊布（图一）。笔者对其略加点校，录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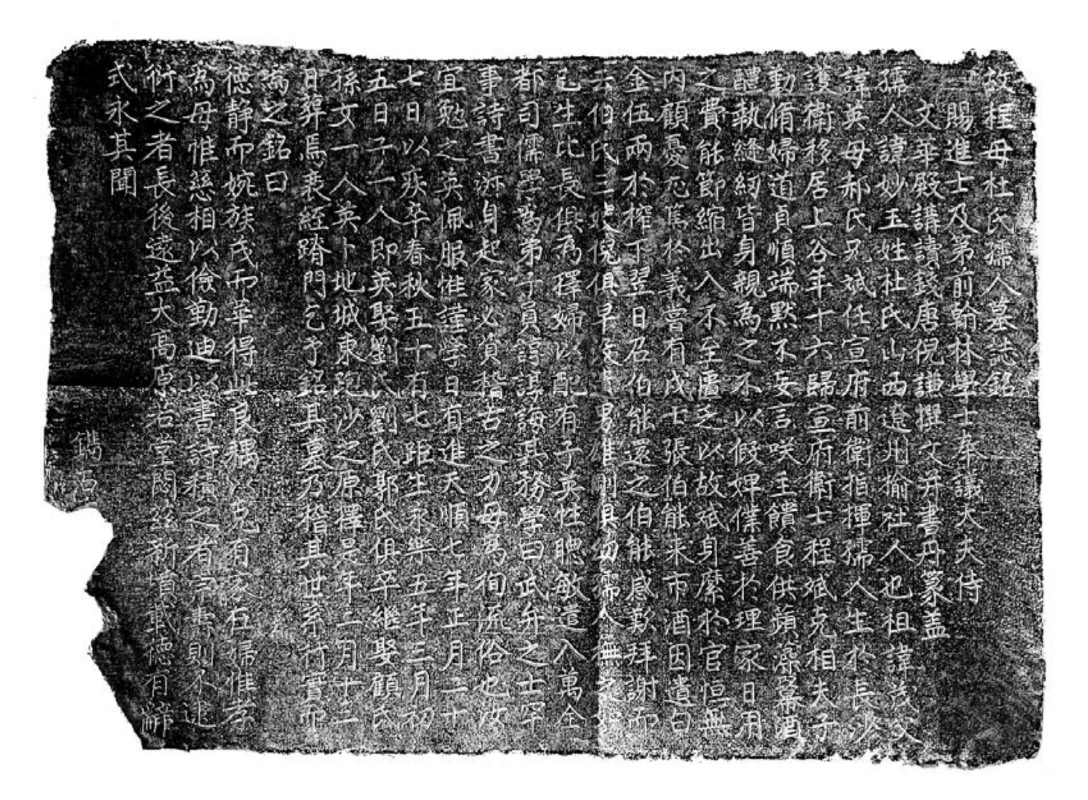
故程母杜氏孺人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前翰林學士、奉議大夫、侍文華殿講讀，錢唐倪謙撰文，並書丹篆蓋。孺人諱妙玉，姓杜氏，山西遼州榆社人也。祖諱茂，父諱英，母郝氏，兄斌，任宣府前衛指揮。孺人生於長沙，護衛移居上谷，年十六歸宣府衛士程斌。克相夫子，勤脩婦道，貞順端默，不妄言咲。主饋食，供蘋藻，冪酒醴，執縫紉，皆身親為之，不以假婢僕。善於理家，日用之費，能節縮出入，不至匱乏，以故斌身縻於官，恒無內顧憂。尤篤於義，嘗有戍士張伯能來市酒，因遺白金五兩於榨下。翌日，召伯能還之。伯能感歎拜謝而去。伯氏三嫂倪俱早沒，遺男雄、剛，俱幼，孺人撫之如己生。比長，俱為擇婦以配。有子英，性聰敏，遣入萬全都司儒學為弟子員，諄諄誨其務學，曰：武弁之士，罕事詩書，淑身起家，必資稽古之力，毋為徇流俗也。汝宜勉之。英佩服惟謹，學日有進。天順七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七，距生永樂五年三

月初五日。子一人，即英，娶劉氏，劉氏、郭氏俱卒，繼娶顧氏，孫女一人。英卜地城東跑沙之原，擇是年二月十三日葬焉。衰絰踵門，乞予銘其墓，乃稽其世系行實而為之銘曰：

德靜而婉，族茂而華；得此良耦，以克有家；在婦惟孝，為母惟慈；相以儉勤，迪以書詩；積之者崇，壽則不逮；衍之者長，後遠益大；高原若堂，閟茲新墳；載德有辭，式永其聞。

鐫石者〇〇〇。



图一　《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拓片

## 一、墓志的文献价值在于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

墓志撰写者是明代礼部尚书倪谦。倪谦（1415～1479 年），字克让，号静存，南直隶应天府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四库馆臣这样评价倪谦的文学成就：

《倪文僖集》三十二卷，明倪谦撰。谦有《朝鲜纪事》，已著录。据李东阳序，谦所著有《玉堂稿》一百卷，《上谷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南

宫稿》二十卷。又有奉使朝鲜之作，为《辽海编》，别行于世，今皆未见。此本凡赋辞、琴操、古今体诗、诗馀十一卷，颂、赞、表、笺、箴、铭一卷，文二十卷。盖谦所自编，于生平著作，汰存六之一者也。三杨台阁之体，至宏正之间而极弊，冗阘肤廓，几于万喙一音。谦当有明盛时，去前辈典型未远，故其文步骤谨严，朴而不俚，简而不陋，体近三杨而无其末流之失。虽不及李东阳之笼罩一时，然有质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矣。固未可以声价之重轻，为文章之优劣也[①]。

倪谦所撰写的诗文，按照作品撰写时间分门别类：玉堂，官署名，汉代侍中有玉堂署，宋以后翰林院亦称玉堂，《玉堂稿》一百卷，当是倪谦在翰林院供职所作诗文集。上谷是宣府旧称，也即今天张家口市宣化区，倪谦曾因贬谪在宣府四年，《上谷稿》八卷当为贬谪期间撰写。归田就是辞职归隐，《归田稿》四十二卷，为倪谦致仕回到南京所作。南宫是皇室及王侯子弟的学宫，《南宫稿》二十卷，为倪谦为太子侍读期间撰写。辽海泛指辽河流域以东至海地区，倪谦曾出使朝鲜，《辽海编》现在尚有刻本存世，所记就是出使朝鲜的见闻及所作诗文，《朝鲜纪事》是《辽海编》中的一卷[②]。《倪文僖公集》最后收录有其子倪岳撰写的后记：

先少保文僖府君，自游庠序即负重名，平生制作极富。成化庚寅回禄之变，岳方归省于家，仓促之际絜一笥以出，及归，他已无及。由是先世所藏荡然一空，惟先君文稿幸在笥中得存，岳即收拾散亡，今为百七十卷，钞录数本，与诸弟共藏之。其间有经先君手自校订者，得诗若文八百九十篇，别为三十二卷，谨用刻梓以传。噫！自先君弃不肖，今且十有五年，而始克就编，稽缓之罪诚无所逃，因拜纪刻完岁月于卷之末，俾后有考云。时弘治癸丑秋八月朔也。资善大夫礼部尚书不肖男岳百拜谨识[③]。

倪岳说："其间有经先君手自校订者，得诗若文八百九十篇，别为三十二卷。"这就证明四库馆臣所言非虚，传世的《倪文僖公集》是出自倪谦之手的选集，这仅仅相当于文集的六分之一。对照今天的排印本《倪文僖公集》，情况基本属实，其余作品没有传世，已经散佚。《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一文，不见于传世文献，那么可以猜测，这篇墓志应该收录在《上谷稿》八卷中，这篇出土文献，最大的价值就是弥补《倪文僖公集》的不足。

①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70，中华书局，1965年，1487页。

② 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721～734页。

③ 倪谦著，舒仁辉点校：《倪文僖公集》后记，杭州出版社，2014年，376页。

1459 年（天顺己卯年），倪谦主顺天府乡试，因黜权贵之子，被构罪戍边："天顺初，累迁至学士，简侍宪庙于春宫，日进讲读，多所启沃。己卯，主考顺天乡试，斥黜权宪之子，遂诬构以罪论戍开平。"[①] 差不多同时撰写的倪谦墓志也认为，倪谦贬谪之地是开平卫。开平卫最早治所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及多伦县，宣德五年（1430 年）废弃，移治独石堡（今张家口市赤城县北独石口），属万全都司。

《倪文僖公集》中有《北园燕集诗序 》云："天顺庚辰夏五端阳日，余被谪来宣城，僦屋以居。有公事则出应驱策。否则杜门守静以经史自娱。"[②] 依照传世文献，倪谦贬谪地在宣府，而非开平卫；出土文献《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云："孺人讳妙玉，姓杜氏，山西辽州榆社人也。祖讳茂，父讳英，母郝氏，兄斌，任宣府前卫指挥。孺人生于长沙，护卫移居上谷，年十六归宣府卫士程斌。"墓志又有"衰绖踏门，乞予铭其墓"。倪谦谪居宣府四年，闲暇无事，乐于为人操刀撰文，故有为一普通军士之母撰写墓志之说。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就可以断定，倪谦贬谪地是宣府，而非开平卫[③]。

## 二、墓志的书写风格是晚明小品文的流风余韵

《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的墓主是一位 57 岁的家庭主妇杜妙玉。杜妙玉墓志文字清晰可辨，只是在结尾处损泐，不能辨别刻石工匠名字；书丹之楷书，字体板滞朴实，倪谦存世书法作品潇洒飘逸，显然非出同一人之手，那么可以推测，这方墓志的书丹者，绝非倪谦，而是另有他人。

从文学角度看，这方墓志语言质朴，刻画人物喜欢从小事入手，描写墓主就用了两件琐事：一是抚育失去父母的侄儿："伯氏三嫂倪俱早没，遗男雄、刚，俱幼，孺人抚之如己生。比长，俱为择妇以配。有子英，性聪敏，遣入万全都司儒学为弟子员，谆谆诲其务学，曰：武弁之士，罕事诗书，淑身起家，必资稽古之力，毋为徇流俗也。汝宜勉之。"另一件事情，书写墓主的拾金不昧："尤笃于义，尝有戍士张伯能来市酒，因遗白金五两于榨下。翌日，召伯能还之。"一般来说，墓志书写格式陈陈相因，虚美之词多于叙事，然倪谦撰写的墓志，语言朴质，叙事生动，有晚明小品文的韵味，故其文学价值应当肯定。就像四库馆臣所言："然有质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矣，固未可以声价之重轻，为文章之优劣也。"

当然，由于书丹者的轻率，本墓志内容略有瑕疵，一是"伯氏三嫂倪俱早没"句，

① 焦竑撰:《国朝献征录》卷 36，明刊本。

② 倪谦著，舒仁辉点校:《倪文僖公集》卷 21，杭州出版社，2014 年，235 页。

③ 1984 年，宣化文保所征集到《解士郁墓志》一方，撰写者为倪谦，可见倪谦在宣府期间，为人撰写墓志并非一方（刘海文:《宣化出土古代墓志录》，远方出版社，2002 年）。

明显不通，“倪”或为衍字；另一句“子一人，即英，娶刘氏，刘氏郭氏俱卒，继娶顾氏”，本句话没有交代郭氏的由来，然后就说“刘氏郭氏俱卒”，行文有点突兀。

墓志的书写，往往有其特定义例。而每个墓志的撰写者，往往又有其笔法，倪谦推崇孔孟的义利观，当撰写社会底层小人物墓志之时，喜欢从“义”和“利”两个方面寻找写作角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陆母王氏墓志铭》云：“尝有贾媪置货物于母，去而暴卒，物主索之急，媪子莫知所置不能偿，母召而归之。媪子德之，为称颂于人人，用是里鄙皆知其贤云。”[①] 另一方出土的《解士郁墓志》，也体现了倪谦的这种墓志撰写风格：“正统己巳，客有寓布百匹者于公者，经兵革，莫知所往，恒戒家人谨藏勿妄费，以俟其人，至今封识如故。其拯危急踈财利者如此。”[②]

## 三、墓志内容与宣府官办教育相印证

宣府地处边陲，教育落后，即使普通官员的子弟也没有求学的场所，直到韩雍巡抚宣府之后，宣府的教育才有了改观，倪谦在《宣府新建义学记》一文中，对办学的初衷、校舍的建设、师资的配备均做了详细描述：

> 宣府文昌祠侧有隙地焉，可以营学，公乃发羡粮积赀，募工简材，命万全都司都指挥使李显、都指挥佥事江山经理，兴创始于天顺辛巳四月十七日，中为堂曰“申义”，左为宅曰“时敏”，右为宅曰“日进”，为师生训肄之所，以间计者各五；堂后为宅二区，以处其师，以间计者各九。崇垣四周高门外伉，规制焕然，罔有不备。以是年某月某日告成。至于束脩、书札、笔墨凡百所需，皆给于官，名曰“义学”。前刑部员外郎李衍、平阳知府杨辕谪宦于斯，聘以为师，诸生来学者百二十人，巡按监察御史朱君铉躬奖厉之[③]。

比照墓志记载：“有子英，性聪敏，遣入万全都司儒学为弟子员。”可以推测，墓志主人杜妙玉的儿子，也在新建的宣府义学读书。墓志中，杜妙玉这样教育儿子：“谆谆诲其务学，曰：武弁之士，罕事诗书，淑身起家，必资稽古之力，毋为徇流俗也。汝宜勉之。”而倪谦则在《宣府新建义学记》中说：“今公追复古制，嘉惠后学，萃武弁子弟而游歌于斯教之，以诗书六艺之文，孝悌忠信之行，成德成材，明体边用，使皆知圣贤之道，君臣之义，以淑其身，将见其朝益暮习，日改月化，忽不知其造乎？”两相对照，杜妙玉教诲儿子的话语，不过是倪谦的夫子自道罢了。特别需要

① 倪谦著，舒仁辉点校：《倪文僖公集》卷 21，杭州出版社，2014 年，316 页。

② 刘海文：《宣化出土古代墓志录》，远方出版社，2002 年，76 页。

③ 倪谦著，舒仁辉点校：《倪文僖公集》卷 21，杭州出版社，2014 年，170 页。

提到的是，倪谦长子倪岳，亦在宣府义学学习，后考中进士，成为宣府义学培养的第一个进士①。

## 四、墓志反映了宣府的重要军事地位

"明代，宣化是北部边防重镇，不设地方政府，只沿长城设九镇，宣府镇为九镇之一，辖四海县至大同1300里的防御任务，是宣府镇总兵驻地和指挥中心，又称宣府镇城。"②有明一代，宣化的人口构成，基本就是以戍守边关的军士及其家属为主体，"宣之户口、天赋、明以前无确据，盖屡遭兵燹，典籍不详也。至明，多系官军之舍人余丁，而民户极少。""明，万全都指挥司宣府前卫官户九百三十六，军户九千八百一十四，屯丁二千七百六十二。"③直至明朝晚期，宣府（今天的张家口市宣化区）为边关重镇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

传统社会，人们世代恪守乡土，人员流动往往以商贩居多。《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则向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情况：墓主杜妙玉原籍山西，生于长沙，随父兄镇守边关而移居宣府，嫁给了宣府卫士程斌。"孺人讳妙玉，姓杜氏，山西辽州榆社人也。祖讳茂，父讳英，母郝氏，兄斌，任宣府前卫指挥。孺人生于长沙，护卫移居上谷，年十六归宣府卫士程斌。"也就是说，杜妙玉的家人是军籍，而丈夫也是军籍。其中，墓志记载的一件拾金不昧的逸事也与军士相关联："尤笃于义，尝有戍士张伯能来市酒，因遗白金五两于榨下。翌日，召伯能还之。"也就是说，墓主及其家人都是军籍，墓志涉及的张伯能，也是军人。

"明代军制施行卫所制度，军犯是明代的重要兵源，因此流放以充军为主。明代执行充军，用于实边，是把犯人发往军事设施——卫所，充军按照路途远近及地域把罪至充军者，强迫安置到各地卫所充当军户。"④墓志的撰写者倪谦，本是朝廷的五品官员，因为贬谪，来到了宣府戍边。《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从另一个角度，为研究宣府在明代中晚期的人口构成提供了翔实的案例。

附记：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学科"共建项目，"五代十国墓志研究"（课题编号GD16XLS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① 郭维城总修，王继红整理：《宣化县新志》卷15《选举制》，北京出版社，2010年，320页。

② 雷桂明主编：《塞北明珠：历史文化名城宣化》，远方出版社，1999年，2页。

③ 郭维城总修，王继红整理：《宣化县新志》卷6《地理志》，北京出版社，2010年，100页。

④ 王云红：《流放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76页。

#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pitaph of the Du Family of the Old Cheng Mu” in Ming Dynasty

Gu Chunjun

**Abstract:** “The Epitaph of the Du Family of the Old Cheng Mu” is an epitaph discovered in Xuanhua District, Zhangjiakou, in 2005. The epitaph was written by Ni Qian, the Shangshu of the Nanjing Rite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existing “Ni Wenxi’s Gongji” does not include this epitaph. Nevertheless, it can supplemen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handed-down documents; this epitaph has a high literary value, the writing method breaks through the conventions, and the narrative is vivid and has the atmosphere of the eassays in late Ming; the content of the epitaph also reflects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Xuanfu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persons to whom the epitaph refers are sergeants and their families, which also confirms the military status of Xuanfu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one side.

**Keywords:** Ming Dynasty; Xuanfu; Du Miaoyu; Epitaph; Textual Research

# 征稿启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办的学术刊物。为及时反映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本刊从 2018 年起每年出版 2 辑，分别在每年 6 月和 11 月，由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现征稿件为 2022 年出版的第 13、14 辑。

本刊设置栏目包括：①考古新发现；②研究与探索；③考古新视野；④文博与科技；⑤北域撷英；⑥译介与书评等。稿件内容以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为主，同时欢迎其他方面的优秀成果投稿。

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刊用意见将在收稿 3 个月内通知作者。

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用，一经刊用，即奉样刊 2 本。

电子邮件投稿地址：ruckaogu@qq.com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人文楼 301 室），邮编：100872

《北方民族考古》编辑部

2021 年 11 月

(K-3588.31)



科学出版社互联网入口



赛博古二维码

文物考古分社
电话：(010) 64009636
邮箱：arch@mail.sciencep.com

www.sciencep.com



ISBN 978-7-03-071164-9

定　价：228.00 元